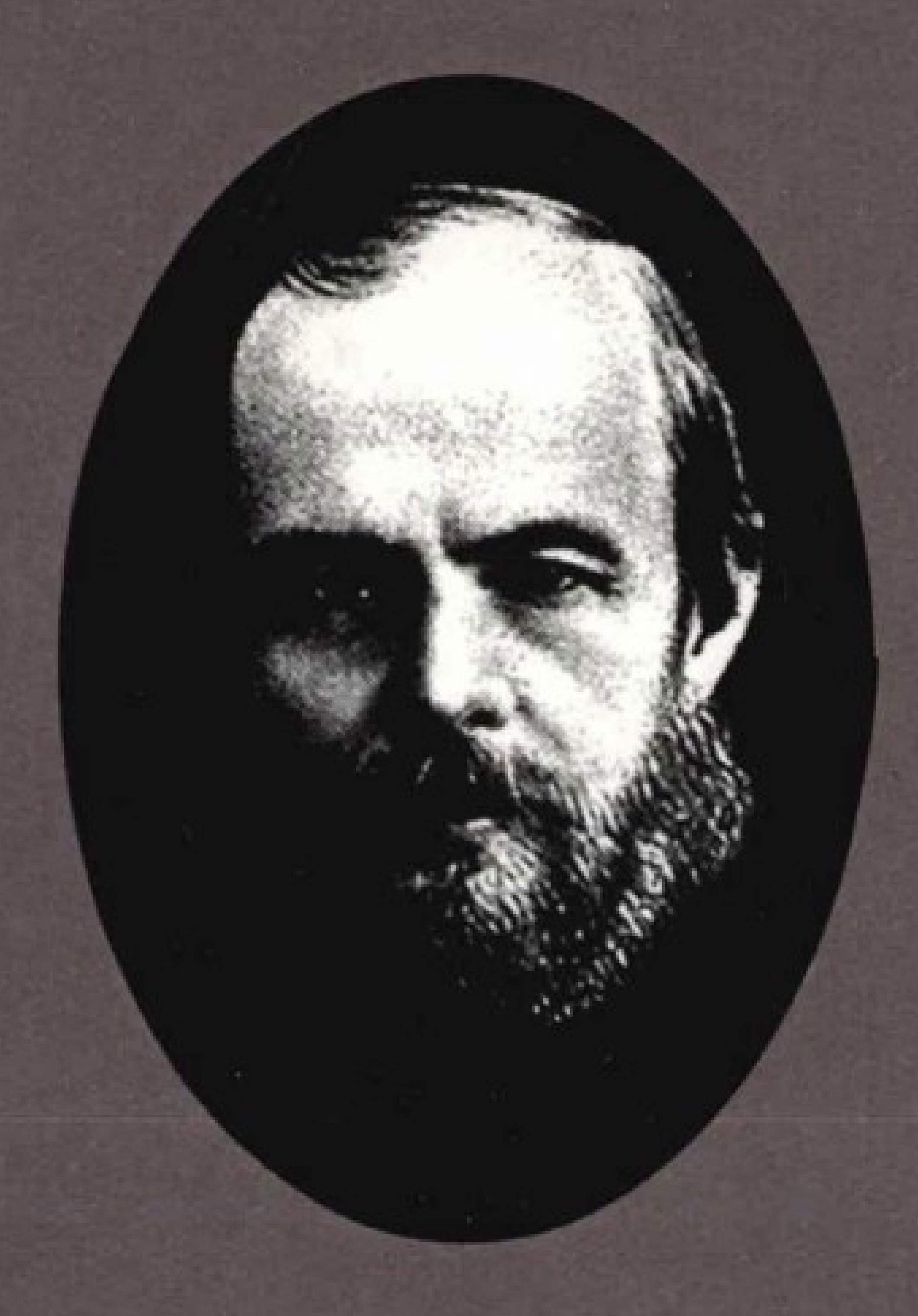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 作家日记 [上]

张 羽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 作家日记[上]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张 羽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 陈燊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434-7440-6

Ⅰ. 陀… Ⅱ. 陈… Ⅲ.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全集 ②日记－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Ⅳ.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96397号

| | |
|---|---|
| 书　　名 | 作家日记 |
| 责任编辑 | 王萍　高树海 |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br>（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050061） |
| 印　　刷 |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38.375 |
| 字　　数 | 910千字 |
| 印　　数 | 1-5 000 |
| 版　　次 | 2010年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34-7440-6 |
| 定　　价 | 69.00元（上、下） |

# 译 者 序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遗产中，《作家日记》占有一席重要位置。但他是如何出版这部作品的，它的出版的经过是怎样的，它的内容是什么，他又何以命名为“作家日记”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是“热衷于当前题材的作家”（《少年》），报刊则是他认识现实的重要渠道，他对报刊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也热心于创办刊物。19世纪60年代，他与自己的长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创办过《时代》（1861—1863）与《时世》（1864—1865）月刊，1865年《时世》停刊后，他就萌生了再办刊物的念头。这就导致他1873年接受弗·彼·梅谢尔斯基公爵的邀请，担任其《公民报》主编。梅谢尔斯基公爵是接近俄国皇室的贵族，曾经写过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是极右翼的政论家，他坚持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反对改革现行的沙皇专制制度。他于1872年开始发行《公民报》，目的是同对青年产生影响的改革思潮进行斗争。梅谢尔斯基知道，他这种办刊方针和他本人的声名狼藉注定刊物不可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为了使刊物获得成功，需要一位在读者中有声望的人物出面主持刊物。他曾邀请自由派政论家格·康·格拉多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到1872年底格拉多夫斯基

要求梅谢尔斯基把《公民报》完全交由他个人主持，梅谢尔斯基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辞去主编《公民报》的工作。

格拉多夫斯基离开《公民报》之后，梅谢尔斯基即提出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接替格拉多夫斯基出任《公民报》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仍处于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1875 年解除监视，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解除，实际上他终身都受秘密监视），对其任命需经沙皇政府御前办公厅的第三厅批准。梅谢尔斯基及其周围的人们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群魔》之后，政府对其政治信念已应无可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完全弥补了他作为政治罪犯在 1848 年所做的事。"① 于是梅谢尔斯基向第三厅呈交了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公民报》主编的报告，第三厅虽然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此职，但又声称，它"不为此人未来的编辑职务活动承担责任"。1872 年 12 月出版事务管理总局通知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任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公民报》的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职务，也是出于他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他想利用这个刊物公开答复长篇小说《群魔》引起的各种批评；另一方面，他想在刊物上阐述自己的基本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试图以这些观点去认识国家所处的时刻，揭示社会思潮的现状，展望俄罗斯和欧洲未来的社会发展。但是主持刊物的工作并没有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满意，这是因为编辑事务繁重，并且一再受到政府检查机构的干预。他身为主编，却没有处理稿件的决定权：梅谢尔斯基把决定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当时，梅谢尔斯基的友人、国务活动家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此人后来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任正教院总

① 《文学遗产》，第 86 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监，成为声势显赫的宗教界人物）也是《公民报》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利用该报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在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匿名文章。他蓄意通过刊物接近并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后者在《群魔》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反对俄罗斯思想界的“欧洲化”思潮的言论及其泛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根基论观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纳入巩固俄罗斯君主制制度、恢复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宗教势力的轨道。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总是同意梅谢尔斯基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人的观点，这就使他产生了脱离《公民报》的想法。1874 年 3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辞职，4 月离开该报。

1873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公民报》期间，在该报上设立了《作家日记》栏目，如同“刊物套刊物”，专门发表自己撰写的评论文章和小说。至 1874 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离开《公民报》时，就开始考虑如何继续写作和创办《作家日记》。1875 年，长篇小说《少年》完成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完全致力于出版自己的刊物《作家日记》，1876 年 1 月该刊第 1 期与读者见面。这个《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月刊，是作家自己个人的刊物，它并非《公民报》上的《作家日记》的简单继续。《公民报》上的《作家日记》因为只是该报的一个专栏，他刊登自己的文章时，从篇幅到内容都不能不考虑整个刊物的整体结构与刊物已经形成的面目，因而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只以刊登自己的作品为任务的杂志上则可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图。新的《作家日记》篇幅扩大了许多（每期一个半印张），内容也更加广泛多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论家的才能和思想家的面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作家日记》发行两年（1876—1877）之后，陀思妥耶夫

斯基为了写作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宣布该刊物暂停两年，但实际上却停刊三年，1881年才复刊。在停刊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刊登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说以及为演说辩护的文章，在1880年又出了一期。《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完成之后，1881年1月《作家日记》复刊。可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病危，以致没能看到复刊后的第一期（也是《作家日记》最后一期），这一期是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出版的。

在月刊《作家日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发表本人的评论文章，偶尔有个别中短篇小说。但这能说是"日记"吗？从什么意义上说它是"日记"呢？大家知道，一般的看法是，日记是作者为自己写，给自己看的，最多也不过是经写作者的同意给少数人看的，或者是写作者有意留给后世的。日记不是为公之于众而写的，正因为如此，日记的写法因人而异，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模式。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或其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来看，隐私性可以说是日记的普遍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日记》中的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记。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言论看，他在筹备刊物期间对刊名和自己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的体裁问题也曾反复斟酌过。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集）中《作家日记》的编者注说，作家于1876年1月7日给伊·伊萨耶夫的信中说："我不想办任何刊物，我倒是想出版文集，由于缺少资金，我想按征订的数量出版。"数日之后，在给弗谢·谢·索洛维约夫的信中说："显然，《作家日记》类似杂文，但与杂文不同之处是，每月一期的杂文当然不同于每周一期的杂文。与其说这是关于新闻事件的报道，不如说是关于事件留下的更持久的，与总的、整体的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事情的报道。再就

是，我完全不想以写报道来束缚自己……我不是写编年史的人，恰恰相反，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日记，也就是说，这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事情的记载，甚至还有我的古怪想法。”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明确了自己写的是日记，而且说明了从什么意义上说是日记。1875年底，在即将出版的《作家日记》的广告和1876年《作家日记》第1期征订启事中，对刊物的性质是这样说的：“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是每个月的切身感受的印象的记载，是所见、所闻和阅读到的一切的记载。当然，刊物里也会有故事小说之类，但主要的是真实事件。”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书信中有关刊物性质的说法还是作家与友人交流自己的思想，那么在广告和征订启事中则已是向读者介绍刊物的面貌，强调读者在刊物上看到的将是经过作家的个人感受折射出来的真实事件。《作家日记》发行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私人通信中，进一步吐露出为什么要写《作家日记》的用意。他在1876年4月9日写给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中说：“您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我在《日记》里‘尽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在这里也听到这种说法，可是我要顺便告诉您：我得出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除开史诗外，一个文学家对他所描写的现实，连细枝末节（历史的和当前的）都应该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在准备写作一部规模非常庞大的小说[①]的时候，我要一心一意埋头研究当前时代的细枝末节，而不是一般的现实。说实在的，一般的现实，即使不去研究，我也一清二楚。对我来说，在目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举例来说，就是青年一代人，同时还有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单是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就大不相同，这

① 指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

一点我早就有预感了……因此，我要花一些时间观察、思考，同时还要写《作家日记》，以免把很多印象白白丢弃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言论表明，他把汇集自己的文章的刊物定名为《作家日记》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要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从体裁上说，其实就是政论、杂文、回忆以及几篇小说，把这样的作品称为“日记”，看来，其用意可能是突出这个刊物是专为发表自己的作品的个人刊物，突出它不同于一般刊物的特点。再就是，刊物上将要发表的虽然都是作家个人的创作，但除少数几篇小说之外，都是政论和时评文章，它们都不是作家的艺术虚构的产物，是作家受到现实生活中某些事件、问题的触动有感而发的，是以读者眼前发生的迫切的现实问题为题材而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作家日记》的构想时说，要写自己“每个月切身感受的印象”，写自己“所见、所闻和读到的一切”，写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为自己保留可以不受局限地、挥洒自如地写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问题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也是确定刊名的一种考虑。

正如他在思索刊物的名称时所设想的，《作家日记》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国家的政治、外交、战争、法律、宗教、家庭、青年以及文学艺术与往事回忆等等。作家的评论与探讨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所有的方面和问题，议论的问题之多有时给人以庞杂之感，《作家日记》似乎是作家信笔写就的各种文章与小说的汇编。这种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文章都是受报刊材料的激发而写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的素材和写作动机虽然源于报刊，但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写事实报道，不是写编年史，而是“事件留下的更持久的、与总的整体的思想有更密切联系的事情”。这就是说，作家关心的是观察、揭示事件所蕴蓄的内涵及其对社会、对人民

生活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文章的材料都是经过作家刻意选择的。报刊材料纷繁凌乱，作家选择的着眼点之一是多样性，他深知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选材时着意从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件和现象中撷取素材。作家通过对这些事件、现象的叙述和剖析，引导读者透过事件（即使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小事）的表面看到产生它们的社会根源，看到带有全社会性的典型的问题，从而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总之，《作家日记》不是一部零散的、各篇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的作品的汇编，它是作家在自己的思想艺术构思的基础上创作的一幅全面、深入展现俄罗斯社会的全景图和作家对这幅画面所呈现的景象的解读。

早在《作家日记》问世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中就曾借小说人物之口提到过类似《作家日记》这种体裁与结构的作品。《群魔》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小说的一位人物莉莎向另一位人物沙托夫说她准备编著一部书，这本书“只限于选择那些多少能够表现当前人民精神生活与俄罗斯人民的个性的事例。当然，什么材料都可以收入：奇闻轶事，火灾，捐款，一切善举与恶行……然而在一切材料中只选那些能反映时代特征的东西；选入的材料都要能表现一种观点，一种方针，一种意图，一种能阐明总体、阐明事实总和的思想。”沙托夫听过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一步阐明她的意图说：这“将是一种有倾向性的书，是按照一定的意向编成的一部事实汇编”，“这部事实汇编也将指出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些事实。”这里所谈的选材范围与标准以及编选意图，可以说与《作家日记》基本上是吻合一致的。应该说，这种一致性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群魔》时头脑中就曾考虑的未来的一部独特刊物的蓝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的那些年代，俄国社会上各种思潮的代表人物竞相以自己的主张治理俄罗斯，他们为此进行着激烈的论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就曾以自己的刊物《时代》与《时世》投身到争论之中，至19世纪70年代，他则在《作家日记》中，以各种形式的作品在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上与他认为是西欧派（即主张欧洲化）的人物进行激烈的论争。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俄罗斯之所以贫困落后的症结所在与拯救的出路。他认为，俄罗斯自身不仅蕴蓄着建设光明未来的无穷潜力，而且还将为全欧洲人类的未来指出新的道路。在论争中，他对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都分别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本文在前面引述的1876年4月9日给赫·达·阿尔切夫斯卡娅的那封信中，作家表示当前俄罗斯家庭状况的变化一直在吸引着他的注意。《作家日记》表明，正是由于他的关注，关于当代俄罗斯家庭现状的叙述、观察和评论就成为《作家日记》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无论是过去时代的还是当时的许多俄罗斯文学的作品的主题都是以家庭为舞台展开的，读者对俄罗斯家庭的状况并不陌生。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俄罗斯社会的观察发现，在社会的转折过程中俄罗斯的家庭也在默默地发生着变化。他指出，人们熟悉的那种传统的俄罗斯家庭将要从历史上消失，“当代的俄罗斯家庭单是与二十年以前相比就大不相同”，而且他“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了。因此，他表示要花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由于他对历史转折时期俄罗斯家庭的变化早有察觉，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凝结着他对俄罗斯家庭的观察和思考。其中，《少年》（1875）便是一部以刻画当代家庭的面貌特征为主题的长篇。作家构思这部小说的着眼点是从社会道德和心理的层面上展现俄罗斯社

会转型期的家庭与青年的面貌特征。作家通过对几个家庭的描写使读者看到，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不同的各阶层人物的心目中，除个别人物外，历史筑造的那条心理和道德规范的堤防正在崩溃，金钱的力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历尽坎坷曲折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的“结尾”借一个与小说情节无关、据称是“少年”的监护人之口概括他的观察说，当代俄罗斯家庭已经成为“偶合家庭”，而“少年”便是“偶合家庭”的“偶然”成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第一次提出“偶合家庭”这个术语）。《少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从心理和道德伦理的层面看，可以说描写的是以卡拉马佐夫一家为中心的各种类型的“偶合家庭”，表现出这些家庭在价值观、道德伦理观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日益衰颓的世风和作家关于人性的充满哲理的沉思和期待。《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在写《作家日记》的时期内完成的，关于“偶合家庭”的思考、论述多次出现在《作家日记》中，构成《作家日记》的主要内容之一。

19世纪60年代以来，也就是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以来，俄罗斯家庭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惶惑。他看到，俄罗斯的社会和生活正面临“某种根本性质的转折，起码是向着崭新的和未来的几乎不为人知的形式，进行巨大而脱胎换骨的转变。”① 随着旧生活的衰落，旧日的俄罗斯家庭也在解体。他怀着深沉的忧思说：“俄罗斯家庭的旧日面貌仿佛突然消失了，仿佛眨眼就不见了，可是新的面貌……

① 见《过命名日的人》（此处及下面注文中的此类篇名，均出自《作家日记》）。

它还能够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众望所归的和满足俄罗斯心灵的面貌吗?"①

俄罗斯的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当今的俄罗斯家庭越来越成为一种**偶合**家庭。正是**偶合家庭**——这就是当代俄罗斯家庭的定义。”“偶合家庭”的含义是什么？《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阐述：“这种所谓的偶合性是什么意思，我使用这个词有什么所指？……我认为当代俄罗斯家庭的偶合性就在于，当代做父亲的人丧失了对待家庭的一切共同思想，也就是对于所有的父亲都普遍适用的思想，将他们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他们不仅自己相信这种思想，而且还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们也相信，并将这种生活信念传授给孩子们。”② 他又进一步解释，共同思想就是“能起联结作用的、共同信奉的、合乎道德情操和激发公民感情的思想”③，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一种行为准则的基础，也就是道德情操行为准则的基础”④。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共同思想并非什么治家处世之道，而是生活信念、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并遵循的道德情操的行为准则只能建立在普遍认同的社会理想、公民理想上，即共同思想的基础上，没有这个社会理想的共识为基础，就不可能形成道德情操行为的准则，没有道德共识这条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纽带，每一个社会和家庭成员则不可能密切结合到一起，各个成员必然是人人为自己，各行其是，各持己见，处处事事也必然是一团混乱，无章可循。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当代的俄罗斯家庭由于没有共

① 见《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

②③④ 见《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个词可能大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再论偶合家庭》。

同思想而演变为偶合家庭。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过去时代的俄罗斯社会曾经存在普遍认同的共同思想，也就是共同的社会理想，并在这种理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信奉的伦理道德规范，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精神面貌上表现出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从而使当时的时代面貌获得一定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童年》、《少年》与《战争与和平》为例说，正是借助时代的这种确定性和明确性，托尔斯泰才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那么清晰明快地把时代描绘出来”①，甚至在对一个十二岁少年的描写上表现出时代特征。然而，在他看来，托尔斯泰等作家所描写的是已成为过去时代的历史画卷，而不是当前的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把 19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的俄罗斯家庭定义为偶合家庭时，显示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独特深邃的洞察力。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俄罗斯带来的不仅是贵族地主经济的衰落，广大城乡劳动者的苦难日益深重，它还从社会心理上、伦理道德上腐蚀了俄罗斯。在《再谈优秀人物》一文中他谴责金钱的力量对社会的腐蚀作用时说，过不了一代人，人民就会变成钱袋的奴隶，从道德上、意志上依附于钱袋。他指出，金钱的力量扭曲了人的心灵，重塑了人的精神面貌，迫使人们抛弃了世世代代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在人们的心目中，除开金钱之外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事物。激励人心的社会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被视为迂腐，卑鄙无耻反而被视为清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不止一次愤慨地指出当时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过去的一切社会和道德观念，

① 见《我同莫斯科一位熟人的谈话。关于一部新书的札记》。

“对过去的事物彻头彻尾地全盘否定（一味否定，决无任何肯定）。”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论俄罗斯家庭的演变时曾表示自己并非一般地反对家庭的变化，不是要求恢复改革前的家庭面貌，而这也是不可能的。他惋惜的是在全盘否定的浪潮中，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思想即社会理想，被一股脑地否定了。而这正是俄罗斯家庭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在他看来，这基石就是人民的真理。

与此相联系的是当代俄罗斯青年的命运问题，它也是《作家日记》中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谈偶合家庭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不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其中也包括从前的上层贵族和有文化教养的知识阶层的家庭。偶合家庭已成为俄罗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俄罗斯家庭之所以演化为偶合家庭，其原因就在于它丧失了多少个世纪形成的家庭普遍遵循的道德伦理传统，以致家庭和社会都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过去时代的家庭面貌的蜕变而感叹时，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射到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上，因为青年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当他从政治、社会、道德和宗教等各个层面观察当代青年时，他对青年（“偶合家庭”中的“偶然成员”）的成长充满焦虑。他认为，这一代人中的那种“脱离根基，脱离人民真理的状况也已经达到使他们的‘父辈们’自己也应该感到震惊、感到可怕的时刻了”②。然而，在他看来，“老一代人”（即“父辈”，实际上指19世纪40年代的各种类型的民主

① 见《渴望听到谣传和“秘而不宣”的事。“秘而不宣”这个词可能大有前途，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措施。再论偶合家庭》。

② 见《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

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因否定、蔑视俄罗斯的一切所造成的恶果。因为脱离人民的真理就是脱离并抛弃人民认为神圣的、做人行事必须遵循的生活理念，而没有这一切，青年人就难以迈进生活，投入社会。他还特别指出，当时一种如同瘟疫般流行于俄国社会中的青年人自杀现象，整个社会都为之震惊。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撰文探讨原因，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年的教育问题。他在《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活理想和生活目的对青年人的重要意义。他深信不疑，大多数青年人“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出于同样一种精神疾病——在他们的心灵中没有生存的最高理想。”他们在家庭和学校得不到“应该相信的、敬重的、崇拜的和向往的东西，而这一切对青年人又是那样需要，那样必不可少，青年渴望获得这一切，时时处处都抱着这种渴望!”但是“老一代人”却醉心于“俄国大地的最高批评者”的角色，除开否定外，没有留给青年人可以寄托精神的理想。青年人必须自己寻找、摸索自己的生活道路，这就容易为各种思潮所俘虏。

1876年12月6日，刚刚成立的俄罗斯民粹派的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在喀山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吸引了一部分青年学生参加示威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述文章中对这一活动表示否定态度，但他表示不赞成对参与活动的青年一味斥责。在他看来，活动的组织者是蓄意以“为了某种高尚的、美好的事业，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作自我牺牲的口号把青年人煽动起来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在哪里，他们因渴求高尚理想而被利用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对社会现象所进行的观察是十分广泛的，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探索是十分认真的，他把自己从观察与探索中得出的答案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就是真

理问题，也就是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信念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真理、理想不仅是青年一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命运的问题，而俄罗斯及其人民的命运则取决于俄罗斯走什么道路。他在《作家日记》中据自己观察所得的大量材料说明，彼得大帝向欧洲打开的“窗口”使俄罗斯的视野开阔了，接触到欧洲文明，更明确地意识到俄罗斯的世界使命。但是，“窗口”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俄罗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就是抛弃了俄罗斯的人民本原，东正教文化消失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二百年来俄罗斯所走的仿效欧洲的道路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贫困落后，相反的是俄罗斯陷入了停滞不前、动荡混乱、更加落后于欧洲的境地。他看到农奴制改革后，农民不仅没有获得他们期盼的那种解放，反而更深地沦为资本的奴隶。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感到焦虑不安的是，他发现俄罗斯社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过程之中，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心灵的向往正在蜕变之中。他所视为神圣的人民真理动摇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世世代代形成的人民的真理观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这种力量就是金钱，金钱使人民中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扭曲，动摇了俄罗斯人民以基督精神为灵魂的理想、信念。人民看到，“钱袋现在就是一切，钱袋的力量无穷无尽”。[①]“如果人民对这些思想执迷不悟，那就是灾难，可是怎么能使人民不这么想呢？”[②]照此下去，“过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就会变成钱袋的奴隶，比过去的农奴处境还要糟。他们不仅是被强制依附于钱袋，而且是从精神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依附于钱袋

①② 见《俄国动物保护协会。信使。绿酒。淫威欲和沃罗比约夫。从结尾还是从开头做起？》。

的。”①

那么为了拯救俄罗斯，出路何在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一味怪罪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救治药物。”② 事实上也可以说，他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即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就已开始探索拯救俄罗斯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而到创作《作家日记》的年代，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救国良药。当然，这药物与他19世纪40年代所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药物是什么呢？他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说：“药物就在人民中间，在人民最珍视的东西里面，在我们与人民的结合之中。”③为什么必须与人民结合？如何实现这种结合？对这些问题，在《作家日记》中他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与人民结合的思想是他后期的主要思想，他认为，这是他思想探索过程重大转折的结果。他在《作家日记》中叙述了自己在人民的感召下领悟这一思想的过程。在《当代谎言之一》一文中说：“这件事不是那样快就发生了的，而是逐渐地、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发生的。”据他说，转变发生在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而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和当兵的十年间。在那里，他密切接触的是罪犯和士兵，这些人原本都是农民或者城市底层的劳动者。他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经年累月的观察感受中发现，这些人貌似残暴，有时也确实残暴，但他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怀着沉重的负疚感默默地为自己的罪行忏悔，真心诚意地承受惩罚，以苦难和自我谴责洗涤心灵的罪恶，使心灵净化。他断言，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受到深刻启迪，他说自己领悟到，如果人人内心都有负疚感，以不断地忏悔、

① 见《再谈优秀人物》。

②③ 见《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

自责达到自我完善，社会就会变好。他似乎幡然醒悟，对自己从前的真理（指当时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此前自己和周围的上层社会那些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社会革命的理想与广大人民的信仰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从而使他先前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信仰与追求发生了动摇与转变。原来，所谓的新认识就是由社会革命的理想转向人民的宗教信仰，而这“人民”当然不包括不信宗教、有反抗意识的人。他返回彼得堡后，俄国和欧洲的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促成了他的世界观的这种根本转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的文章如《当代谎言之一》中谈到自己的信念转变时，一方面表明转变是真诚的信念转变，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了他所谓的人民真理的感化力量。他在文章中宣称：“不是流放的年代，也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恰恰相反，任何事物都没有压垮我们，我们的信念以履行义务的意识支持了我们的精神。不，改变了我们的观点、信念和心灵的是别的东西……这里所说的别的东西就是同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同人民的亲密结合。自己也成了跟人民同样的人的观念，同人民无区别，甚至把自己看做属于人民的最底层的人的观念。”“同人民的亲密结合”，“把自己看做属于人民的最底层的人”，这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实现了与人民的结合，在结合中找到了真理，即治病的良药。这真理在他看来，就是俄罗斯人民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谈的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在《时代》和《时世》杂志上提倡的根基论体现了他思想转折的根本。所谓“根基”，指的是人民，是作家心目中驯顺的、笃信东正教的人民。根基论一反他19世纪40年代主张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

想，认为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同于欧洲的独特道路，俄罗斯的上层统治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利害冲突是可以缓解调和的。他以1861年俄国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作为他的这一观点的支柱，而在《作家日记》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在这里，他多次提到俄罗斯的农民是由沙皇的一道谕旨获得的解放。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视当时社会中实际的剧烈的阶级矛盾，却据农奴改革来说明俄罗斯的社会矛盾无需以暴力革命解决，应该也只能遵循基督的博爱、忍让的精神来解决，东正教所体现的基督思想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灵魂。但是俄罗斯上层社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却倾心于欧洲文明,脱离了根基即人民,蔑视以东正教思想为根本的人民真理。为了达到俄罗斯社会的团结一致,以爱心解决社会矛盾,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必须改变对人民的看法,接受人民的真理。

根基论与斯拉夫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相近的，但毕竟还有折衷性质，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自称已成为斯拉夫主义者了。1877年，他在《作家日记》的《一个斯拉夫主义者的自白》一文中说："我在很多方面持有纯斯拉夫主义者们的信念，尽管我可能还不是一个十足的斯拉夫主义者。"在谈到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的信念时，他还在一系列文章中一再提出并论述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在1877年俄土战争时写的《关于和平的议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这有可能吗？说法不一》一文中，在谈到君士坦丁堡只有归属俄罗斯才能解决整个东方问题时，他公然宣称：俄罗斯是东方各民族命运无可争辩的主宰者。而在上引的《自白》中还说"斯拉夫主义就是要致力于解放所有的斯拉夫人，并把他们联合起来置于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之下"。不仅如此，他断言，斯拉夫主义还有更宏伟的理想，那就是要结成以俄罗斯为首领的"真正把全人类联合成

一个新的、友爱的、全世界的联盟”，并且说：“我本人就是属于这种信念和信仰的人。”他表示，在《作家日记》中他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随声附和，不偏离自己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和他发表的拯救俄罗斯的主张表明，他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从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起步后退到根基论以至斯拉夫主义；从倾向社会革命后退到主张以东正教教义陶冶人民的心灵，以个人内心的自责、赎罪意识达到全体社会的和谐团结，从而反对以社会革命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应该看到，他的思想发生的这种转折是由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促成的，其重要原因，一方面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并未使人民真正获得解放的现实和俄罗斯不彻底的农奴制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他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俄罗斯。另一方面是他自称已成为“君主主义者”，而且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当前俄罗斯社会的道德沦丧都是仿效欧洲的结果。他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反对西欧派，这一方面正如他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1863）中所叙述的那样，是因为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面；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反对西欧广泛流传的民主思想、社会主义以至那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在《作家日记》中他更激烈地反对西欧派。实际上，他所宣扬的对抗西欧派的主张，即他所谓的拯救俄罗斯的良药，不仅不能拯救俄罗斯，在客观上却是在麻醉、缓解人民群众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意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念的转变实质上使他在思想上背离了俄罗斯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道路，然而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而断言自己的主张是领悟了人民的真理的结果。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可能无视在贫穷、备受凌辱和无权的处境中挣扎求生的劳苦群众，不可能不

发出为人民鸣不平的呼声，他对俄罗斯人民和全人类的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毕竟并未因信念的转变而泯灭。例如他在1876年《作家日记》的一篇文章中谴责那种企图使人民永远愚昧无知，只能做供少数人役使的工具的思想。他说："我永远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思想，即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应该获得很高的文化程度，而其余的十分之九的人则只能做前者的材料和手段，永远停留于愚昧之中。"① 他认为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坚信九千万俄罗斯人民总有一天都将会成为有教养、有人性和幸福的人。他说，如果"离开这个信念，我无法思考，也无法生活"。但是如何实现他所向往的那种人人有教养、人人都幸福的社会呢？

尽管如此，他从斯拉夫主义的信念出发，反对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反对社会主义。他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产生是罗马天主教背叛基督精神的结果。"这种社会主义也就是已经没有基督以及将基督排除在外的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安乐"②，是"强制的人类统一"③，是以社会革命的暴力解决人类命运的问题。他认为，暴力革命把社会的罪恶完全归咎于人类自身以外的外部世界，否定宗教和社会道德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环境论"的反对者，他断言社会罪恶问题的根源主要不在于社会，而是在人类自身，并断言这是俄罗斯人民的观点。他的依据是，人民称有罪的人是"不幸的人"④，而不称其为罪人。这个称谓中包含着自我

① 见《俄罗斯动物保护协会。信使。绿酒。淫威欲和沃罗比约夫。从结尾还是从开头做起？》。

②③ 见《三种思想》。

④ 见《环境》。

谴责，表示“他自己以及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有罪的。”① 也就是说，人民并不诿罪于环境，相反的是，“他（指人民）相信环境完全取决于他，取决于他的不断忏悔与自我完善”②，自己一旦达到完美的境界，“环境也会好起来”。③总之，在如何实现公正合理的社会的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限于肯定人的道德修养、自我完善在社会改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却断然否定社会革命的必要性。

显然，他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第8部时，他指出欧洲所采取的人类自身之外的各种社会手段都不可能拯救人类。原因是“深藏于人类之中的恶远比社会主义者们的这些医师所认为的要更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都摆脱不掉恶，人的心灵会依然故我，不正常现象和罪恶都渊源于他本身”。④ 在谈到卡列宁与弗龙斯基在安娜·卡列尼娜病榻前的和解场面时，他高度称赞托尔斯泰洞察人类心灵活动的现实主义艺术，但是随之他却提出人类不可能认识心灵活动规律的见解：“人类的精神的规律还如此不为人知，如此不为科学所窥测，如此不可确定和如此隐秘，以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良医，不可能有什么终审的法官。”⑤如果是这样，那么心灵如何净化、道德完善的是非曲直又应如何理解呢？人类如何摆脱罪恶的环境呢？在这一难题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乞灵于宗教。他说：“然而有一个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他⑥。只有他一个知晓这

①②③ 见《环境》。

④⑤ 见《〈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⑥ 指上帝。按：“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前的题词。这题词引自《新约全书·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

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类的最终命运。”①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宗教就是基督教的东正教。他认为，俄罗斯人民是东正教的虔诚信徒，东正教的教义是俄罗斯人民的共同信念，共同信念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东正教的教义也就成为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的基础和准则。在社会中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幻想人类可以通过基督教教义基础上的个人心灵净化和道德完善来清除社会罪恶，达成团结友爱的联盟，实现人人幸福的公正社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他对俄罗斯的光明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而这希望就是东正教。他在《作家日记》中多次谈到，在解决斯拉夫各民族和欧洲人民面临的问题上，俄罗斯人民必将做出贡献，向人类发出东正教的声音，遵循基督的精神解决人类命运的问题，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坚信俄罗斯人民有智慧和力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护人民，我如同相信最神圣的事物一样相信人民的心灵，相信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实现他的期望和预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他一再重复的观点——上层社会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结合。他要求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服务于人民，而他们自己则需倾听人民的声音，接受人民的真理即人民的信仰，放弃自己的傲慢，向人民驯服。他断言，这种结合如能实现，将是比农奴制改革更重要的又一次解放，头脑和心灵的解放。这样，俄罗斯的整体的希望就形成了，民族的、国家的目的就明确了：“那时在罗斯将会出现多么强大的、积极的和极其美好的力量，新的、从未

① 见《〈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有过的新的力量！”[1] “在大地上牛奶要像河水一样地流淌”。[2]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热切希望实现这种结合。他深感遗憾的是，在走向结合的道路上的障碍就是上层有教养的西欧派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隔阂。知识分子蔑视人民，脱离人民这个根基，否定人民的真理，认为人民愚昧落后，因循守旧。

如何评价俄罗斯人民，主要是如何评价农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与西欧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导致争论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对俄罗斯发展应走的道路持截然相反的见解，由此产生对人民评价的分歧。西欧派（在当时是指革命民主主义者）责怪人民消极落后，对自己被奴役的无权地位逆来顺受，不思抗争。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这是西欧派对人民的诬蔑，是他们受欧洲文明的腐蚀的结果。这里涉及关于人民的理想的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人民的理想是什么，这是有关俄罗斯命运的大事。西欧派的观点，实质上是否认俄罗斯人民有理想，而这并非因为人民真的没有理想，而是因为人民的理想与西欧派心目中的人民理想格格不入。他说西欧派希望看到俄罗斯人民像1793年（指法国大革命）巴黎街头的法国市民，而这的确也是当时他反对西欧派的动机之一。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俄罗斯人民的理想是什么呢？他在与西欧派的论争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俄国人民自幼就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东正教的熏陶，他们对基督的真理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远远超过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基督的真理就是人民心目中坚定不移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在苦难时刻拯救了人民。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认为，俄罗斯的希望和光明

①② 见《第一个根基。我以老生常谈取代明确的财政语调。汪洋大海。渴求真理和有益于财政稳定的必要性》。

来自底层。他斥责西欧派的目光始终盯着欧洲，亦步亦趋地模仿欧洲，以为俄罗斯可以变成欧洲。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虽然也肯定彼得大帝改革的积极意义，但认为“窗口”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已是提倡俄罗斯民族的独立精神的时代。在同西欧派的争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坚持斯拉夫派的主张，明确提出俄罗斯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特殊的、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国家”①，“俄罗斯的心灵始终是，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憎恶欧洲文化，在很多、极多方面都与欧洲文化格格不入”②，西欧派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混为一谈了，对欧洲适用的，对俄罗斯并不适用。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国情的根本区别何在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斯拉夫派认为，主要区别表现在欧洲与俄罗斯的当政者同本国人民的关系上。欧洲各国政府与本国人民处于分裂、对抗的关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预言，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和穷人的不满将使欧洲各国精疲力竭，成不了强国，而俄罗斯则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他所认为的俄罗斯的统治者和人民在道德上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和谐的，甚至在农奴制时代的俄罗斯就是如此。他在《优秀人物》一文中就谈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罗斯大贵族与人民在道德上接近的程度之深是欧洲无法比拟的。他认为，俄罗斯的不同于欧洲的农奴制改革则更加说明俄罗斯的农奴主与农奴在道德与利益上的一致与和谐。他说，在欧洲，农民是以起义、暴动争取解放的，如果说农民获得了解放，那也是按照无产者的方式作为纯奴隶解放的。俄罗斯解放农民的方式则是遵照沙皇的旨意，连带土地一起解放

① 见《奇谈怪论的结论》。
② 见《我的奇谈怪论》。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得出结论说，俄罗斯的民众是满意的，今后还会更加满意，共同一致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因而在欧洲大陆上将只剩下一个巨人——俄罗斯。可能，比人们想象的快得多，行将成为事实。欧洲的未来属于俄罗斯。”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满怀信心地预言俄罗斯在不远的未来就将成为欧洲的巨人，而俄罗斯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点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以沙皇为首的俄罗斯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在道德与利益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竟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没有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对抗的国家和民族。为了更深入、更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他在《让别人先说，我们暂且旁观，唯一的目的就是学聪明一点》一文说，人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具的观点。他居然写道：“他们（指人民——引用者）是沙皇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亲生的孩子，沙皇则是他们的父亲。”而农民改革则使沙皇“在事实上成了人民的父亲”。在同一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说，这种表达人民与沙皇的关系的亲密语言蕴蓄着深厚的含义，不应将其理解为挂在口头上的颂扬沙皇的陈词滥调，它表明在人民的心目中“沙皇就是他们自己的化身，是他们的思想、希望和信仰的化身”，是人民认为自己已与沙皇融为一体的表现。“这是一种思想，深刻的独特的思想……这种思想就是力量。”而它不仅是俄罗斯现行一切改革的基础，它还必将对俄罗斯社会的历史进程发挥作用。由于这种思想是俄罗斯人民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具的思想特点，因而在它的作用下发生的社会历史进程也必将表现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点，不可能与其他民族的历史进程相类似，更不可能是对他们的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认

① 见《谈点政治问题》。

为，主张俄罗斯应仿效欧洲的人不理解人民与沙皇的特殊关系，即使有所理解，他们也不能把人民对沙皇的态度融入自己的血液，因而也就不可能与人民站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上面的阐述表明，他与西欧派的争论所涉及的，无论是人民的真理问题，还是俄罗斯历史的独特道路问题，追本溯源都是如何认识与对待沙皇专制制度的问题。

如何认识东正教对俄罗斯的意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西欧派的争论的根本分歧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及其人民精神之所以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之处是与东正教的作用分不开的，他在《作家日记》中关于“老一代人”的回忆、“偶合家庭”与环境论等一系列问题的文章中都着重阐明了东正教的道德意义。他对科学和理智在解决人类问题上的作用表示怀疑，断言科学和理智只能构筑蚁穴，而人类期盼的公正合理、友爱团结的社会只能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他所说的道德原则就是东正教的道德规范，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中他提出，社会中的罪恶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在欧洲，为杜绝犯罪，以法律界定、惩处罪恶和犯罪，事实证明，这是无济于事的，这是欧洲的方式。另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方式是以仁慈宽厚之心感化人的心灵，以基督的真理拯救人，这是俄罗斯的方式。它之所以是俄罗斯的方式，是因为只有俄罗斯人民才能一切从基督出发，以实现基督的真理为己任。他站在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的立场上评论罪恶产生的根源与防范、杜绝罪恶的方式时，无论谈的是他所唾弃的欧洲方式，还是他所推崇的俄罗斯方式，实质上都是否定社会制度的作用，把一切都归结为道德伦理问题，从而否定以革命手段改造社会的方式，以致把俄罗斯由于长期的沙皇制度、社会停滞和落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与人民的精神

状态，称为俄罗斯的独特性。他甚至认为体现这种独特性的解决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俄罗斯方式，无可比拟地优于欧洲方式。他还据此断言，俄罗斯定将以自己独到的世人闻所未闻的新见解向全世界的人们指破迷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新见解无疑就是东正教的思想，与此相反的见解，如西欧派的见解、社会革命论、社会主义与无神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无疑都是人类的思想迷误。关于东正教对俄罗斯、对全世界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谈彼得堡的巴登-巴登精神》一文中说："我敢于设想，俄罗斯能够对未来的人类的新生活做出贡献，因为俄罗斯有可靠的保证，这就是它的人民本原，它的东正教（我所理解的东正教就是一种思想，我这样理解完全没有背离东正教）。"

东正教怎么会是俄罗斯为世界做贡献的保证呢？上述引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段话说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与阐释中，对俄罗斯来说，东正教不仅仅是履行某种宗教仪式，崇拜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宗教信仰，它更是一种把握世界的真理观、道德伦理观，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种思想"。他断言，俄罗斯人民深信，东正教的事业就是"人类的进步，是人类的普遍的人性化"（《宗教狂热》）。为东正教的事业献身，就是为人类做奉献。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视东正教思想为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唯一真理，但他认为，世人并非都能认识、承认这一真理，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俄罗斯才能高举东正教思想这面真理的旗帜。他在《三种思想》一文中评论世界上试图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三种思想——罗马的天主教、德国的路德新教与俄罗斯的斯拉夫思想——所面临的处境时认为，天主教及其领头羊法兰西，路德新教及其发源地、认为自己将成为当然的世界首脑的德意

志，都已面临困境。罗马的天主教为了取得自己在人间的统治出卖了基督，从而使人类离开了自己，基督的真理在欧洲处于日趋衰落的境地，天主教也成了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温床。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基督的命运在俄罗斯则呈现出另一种景象，“被遗弃的基督在东正教里保留了自己纯洁形象的全部光辉”①，“基督的真理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实现，它完完整整地保存于东正教之中。”(《我的奇谈怪论》) 因此，“在东方，一种世界性的思想的确在热火朝天地兴起……这就是斯拉夫思想，新生的、正在成长起来的思想”(《三种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斯拉夫思想仍然是指东正教的思想、基督的思想。显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述中，东正教的兴起不仅与俄罗斯的未来命运攸关，而且是关系到欧洲甚至是关系全人类的大事。当他谈到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的兴起时，他表示寄希望于东正教，他认为东正教或许能够扑灭这些宣扬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东正教的这种期望：“很可能这就是解决全人类的以及欧洲的命运问题的第三种思想。”(《三种思想》) “从东方响起了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新的声音，或许这种声音能够再次拯救欧洲的人类。”②

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民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同时也是复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阐述东正教意义的出发点是与西欧派的论争，他从正面的意义上完全肯定了东正教与俄罗斯上层统治者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在俄罗斯，斯拉夫思想已经不仅仅是斯拉夫派的思想，它已深入到人民心灵的深处，牢牢扎根于

①② 见《关于和平的议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我们”——这有可能吗？说法不一》。

社会。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东正教不只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整个俄罗斯的事业。他在上引论证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俄罗斯的文章中说：“以自己的沙皇为首的俄罗斯关于自己已经意识到，只有它才是基督思想的体现者，东正教的学说在俄罗斯正在变成伟大的事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向基督做奉献的思想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共识，正是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的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甚至是“亲缘”关系，从而使俄罗斯的社会改革可以、也只能走自己的独特的道路——斯拉夫主义的道路。

正是因为他对沙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对东正教持这种说法，因此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的东方问题上他才同沙皇政府站在了一起。1875—1876 年保加利亚、波斯尼亚等地暴发了反抗土耳其占领的起义时，1877 年俄国向土耳其宣战。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上发表了多篇政治评论，以犀利的文笔抨击英、法、德等国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施展阴谋，进行勾心斗角的争夺。而对沙皇政府则倍加颂扬，对战争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沙皇政府参与这场战争的动机与目的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与政府完全一致的态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发表的作品，除时政评论外，还有小部分中短篇小说和作家评论。其中《温顺的女人》是他的中短篇中的杰作。此外，作家评论中涉及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和外国的狄更斯、乔治·桑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表示过，在《作家日记》中尽量少谈文学，在作家评论中虽然也谈到一些对作家创作的见解，特别是关于创作思想的理论见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现实与真实、创作的倾向性、作家与其笔下人物的关系等问题，但总的

说来，陀思妥耶夫斯的评论的着眼点不是作家创作本身，而是借创作中的某个问题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可以说是这方面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演说激起了俄罗斯思想政治斗争舞台上的一场大辩论。演说凝聚着他关于普希金的长期的思考，他对普希金在俄罗斯的文学与文化史上的意义给予了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他认为，假如没有普希金在前，就不可能有后来那一批群星灿烂的俄罗斯作家，但他着重阐述的却是普希金的作品所表现的俄罗斯重大社会问题以及普希金关于人民历史命运的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普希金所描绘的生活，他所塑造的形象、性格，不仅忠实地、切中要害地表现了时代生活，而且还预示了生活深处正在形成和必将爆发的潜在矛盾、冲突，正在蕴酿之中的新的憧憬和理想，也就是正在现实中孕育着的未来。普希金提出的问题已被俄罗斯文学和社会历史的进程所证实，普希金找到了俄罗斯社会问题的症结，指明了出路，这表明普希金的作品仍然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普希金和他的创作是具有预言意义的现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断言，普希金的作品从最初就表现出正在萌生的俄罗斯民族的正确的自我意识。但他所强调的是，普希金的长诗《茨冈》的主人公阿乐哥“就已经表现出深刻的、令人信服的纯粹俄罗斯的思想”①；他认为，阿乐哥由于脱离人民而注定成为祖国大地上的一个不幸的漂泊者，而阿乐哥所体现的思想在《叶夫盖尼·奥涅金》中得到更充分、更完美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这些人物的阐释是，他们胸怀

① 见《普希金（简论）。6月8日在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会议上的发言》。以下引文均出自此发言，不再加注。

世界，但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在祖国“感到自己像是在自家做客”，在外国就更是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也爱祖国，但不信任祖国……他相信的只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结果一事无成。普希金塑造的这两个形象显示出俄罗斯知识分子社会的最主要的病态现象：脱离了根基，高踞于人民之上。普希金指出了社会的沉疴，也指出了救治的希望。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普希金已经提出要“按照人民的信仰、人民的真理解决问题，提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俄罗斯方式，这便是：‘驯服吧，骄傲的人，首先放弃自己的傲慢。驯服吧，无所事事的人，首先要在故土上耕耘’”，真理“不是在你身外，也不是在海外的某处，首先在于你的自我修养……你的伟大事业就从这里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人民的真理时表示，向人民驯服，接受人民的真理，就是接受东正教的真理。谈到俄罗斯的漂泊者追求的不仅是俄罗斯人民的幸福，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人民的本性就倾向于追求全世界人民的友爱团结，普希金的创作对别的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深刻与敏锐的领悟就已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种精神。普希金已经预感到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以俄罗斯的心灵为欧洲指明出路，“按照基督福音的教义说出关于普遍的伟大和谐、各民族的彻底友爱和谐的决定性意见！”但是，俄罗斯的漂泊者由于蔑视人民，却看不见他们所追求的真理就在人民的精神之中，就在俄罗斯人民的基督教信仰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就是呼吁俄罗斯的漂泊者向人民的真理俯首帖耳，实际是呼吁西欧派回到俄罗斯的土壤上，接受人民的基督教真理，放弃模仿欧洲的方向，摒弃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他的这个演说与他在《作家日

记》上发表的其他文章在总的精神上是一致的，他对普希金的作品与思想的解读贯串着斯拉夫派的观点，无怪乎他的演说引起当时一些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的争论与驳斥，他们批评他曲解了普希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范围内寥寥可数的艺术卓越、思想深邃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文学遗产对世界艺术和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颇具特色、富于创新的艺术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位在思想上极其复杂、深刻矛盾的艺术家。在他的后期作品《作家日记》里，也就是在他的政治、社会观点变化后的总结性的作品里，最充分地、也最直接地表现出他后期的思想观点。因此，它是深入研究这位作家后期思想和创作的十分重要的文献。此书涉及的方面很广，涉及的问题与观点又相当复杂，本书只是选译其中一些涉及重要事件的文章，而本文则只是根据翻译过程中所接触的材料，对它作初步的简要介绍。我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当时俄罗斯家庭的解体，青年一代缺乏理想，指出当时俄罗斯资本主义兴起以及由此导致金钱万能与拜金思想的危害性等观点是非常中肯的。但他不了解俄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必然性，以为是来自于西欧，并且不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农奴制的优越性；他断言当时的救世良方是有文化教养的阶层与人民结合——接受人民的真理，即信仰东正教；他反对当时民主派对俄罗斯农民的温顺和逆来顺受的批评；他还认为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自身，而摆脱社会罪恶只能依赖东正教使人心灵得到净化，由此他反对社会革命；他宣称俄罗斯的人民自认为与沙皇是父子关系，上下是一致的。这种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后一点。作为关心并了解俄罗斯现实、目光锐利的思想

家，竟然看不到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俄罗斯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学潮和后来的工人运动，看不到沙皇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宣扬沙皇与人民亲如父子的关系，这确实令人惊异，难以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20世纪初已经介绍到中国，而《作家日记》一书，迄今为止，除了摘译的个别片断外，尚无比较完整的译本。因此，现在的这个译本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汉译。鉴于原著篇幅过大，其中有许多论述又互相重复，我们做了认真的比较和筛选，择要译出。这是一项较为庞大的工程，我们虽然尽力把它做好，但选择是否得当，译文是否确切，尚希大家指正！

此书为张羽与张有福合译。张有福译的是下卷中的一部分（自563页至849页与1134页至1163页），其余部分均为张羽所译。

张　羽

# 目　录

## 二　刊载于《作家日记》上的文章、特写、报道

# 前　言

## （《公民报》，1873 年 1 月 1 日，第 1 期）

12 月 20 日我得知我将任《公民报》[1] 的主编，这时一切都已决定了。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也就是对我来说（我不想让任何人见怪），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但是发生得相当简单。12 月 20 日，我正在阅读《莫斯科新闻》[2] 上一篇

---

① 俄国政治与文学报刊，1872—1914 年在彼得堡出版，在 1872—1878 年间为周报，1879—1881 年间曾停刊数年。刊物创办人费·彼·梅谢尔斯基公爵（1839—1914）是极右翼政论家，反对改革的派别的思想家。他创办《公民报》的目的是，保卫教会的威信，保卫专制制度，与自由主义的刊物进行斗争。因其要求给一切改革“画上句号”，被自由主义者称为“句号公爵”。在刊物发行后，为扩大刊物影响，梅谢尔斯基于 1872 年聘请自由派政论家亚·德·格拉多夫斯基（1842—1915）出任第一任主编。年底，格拉多夫斯基拒绝与梅谢尔斯基继续合作，要求梅谢尔斯基将《公民报》完全交由他负责，否则即退出《公民报》。格拉多夫斯基退出后，至 1872 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梅谢尔斯基的聘请，同意担任该报的主编。虽然他的政治信念，在《群魔》出版后，似乎不再引起当局的疑惧，但此时，他仍处于秘密监视之下。梅谢尔斯基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已足以洗刷他作为政治犯的前愆。终于呈准沙皇御前办公厅第三厅，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担任此职。他于 1873 年 1 月莅任，至 1874 年 4 月离职。此后他也曾参加这一工作，但无固定时间。

② 俄国最古老的报纸之一，1756—1917 年在莫斯科出版。1859 年起改为日报。1779—1789 年实际主编为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19 世纪 40 年代是自由派的主要报纸。1863 年起成为与沙皇政府立场一致的报纸，由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和帕·米·列昂季耶夫（1822—1874）任主编。十月革命后停办。

关于中国皇帝的婚礼[1] 的文章；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壮观的、看来极为复杂的事件进行得却也惊人得简单：这一事件的一切，直至细枝末节，早在一千年之前那部差不多有二百卷的礼书[2]中就已考虑周到并且做出规定。把我被任命为主编这件事同中国的大事的重要性相比时，我忽然感到，虽则对我的审批通过很容易，可是本国这一决定并不值得感谢，我想，我和梅谢尔斯基公爵如果在中国，会比在这里办《公民报》有利得多。在那里一切都是那样明确……我们两人都会在指定的那一天走进那里的报刊事业的主管部门。我们在地上叩首并以舌舐地之后就站立起来，把拇指举到面前，谦卑地低下头。报刊事业的主管官员当然会装出一副样子，对我们毫不在意，如同看到飞进屋内的一只苍蝇，但是他的第三秘书的第三助手会出现在面前，手中拿着任命我为主编的委任状，用威严但却和蔼的口气向我们宣布礼仪规定的训示。训示简洁明了，我们两个人听起来极为悦耳。假如我是在中国，因我的头脑愚笨，心地又单纯，在开始编辑工作时，由于自知才疏学浅而感到胆怯与内疚的话，——那么立即就会有人告诉我，我有这样的感受，说明我是双料的笨蛋。就是从这个时刻起，我就根本用不着头脑了，即使没有它也行；正好相反，如果根本就没有头脑，那倒更好些。不必说，听起来，这话是叫人很愉快的。第三秘书的第三助手把放在红缎子上用金线绣字的漂亮委任状授给我之后，以一句很动听的话结束了训示："去吧，编辑，从现在起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吃你的饭，喝你的茶了。"梅谢

---

①② 据当时俄国驻中国的记者报道说，中国皇帝的一切行动和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在礼典中一切都有严格规定。皇帝生活中的所有事件，从出生到死亡，事无巨细在礼典中都早已做了规定。所谓多达二百卷的礼书，显然出于传闻。

尔斯基公爵就会送上一份贵重的贿赂，我们两人回到家中，立刻就编出一期十分出色的《公民报》来，这在俄罗斯是绝对编不成的，而在中国我们却能干得很漂亮。

不过，我怀疑梅谢尔斯基公爵在中国会跟我耍花招，他请我任主编的主要目的是，每当报刊的主管部门请他去，要用竹板打他的脚后跟[①] 的时候，他就派我去替代他。可是我也会跟他耍手腕：我立即停止刊载《俾斯麦》[②]，尽情地去写自己的文章，——这样就可以每隔一期才被召去挨一次竹板。然而我却因此学会了写作。在中国我能够写得很好；在这里则困难得多。

在中国一切都是预先考虑好的，一切都要管一千年；在这里，一千年的时间内一切都要翻个底朝天。在那里我不知不觉地就能够写得明了易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人会读我写的东西。在这里，为了让别人阅读自己写的东西，写得越艰深难懂，就越有好处。只有《莫斯科新闻》的社论写一栏半的字数，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写得明白易解；即使出自名人的手笔[③] 也是如此。而《呼声报》[④] 的社论则占八、十、十二甚至十三栏。请看，为了迫使别人尊敬自己，在这里需要浪费多少栏。

在我们这里，与别人谈话——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乍然一看，大概很像在中国；像在那儿一样，有几个非常简化了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戏言的方式表示他可能与书刊检查机关发生冲突。

② 指梅谢尔斯基在《公民报》连载的长篇小说《我们的一位俾斯麦》。按：俾斯麦（1815—1898），德意志帝国宰相。

③ 《莫斯科新闻》的社论通常由主编米·卡特科夫撰写。

④ 俄国自由派报纸。主编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他的为人常为时人非笑，这里也是在讽刺他。

的、纯粹是科学的程式。比如说，从前，“我什么也不懂”这句话，只是表示说话者的愚蠢；现在却会使他博得高度的尊敬。只要公然傲慢地说：“我不了解宗教，我不了解俄罗斯的一切，我对艺术一无所知。”① 那么，您立刻就使自己高人一等。假如您真的什么都不懂，这就更加有利。

其实，这个简单化的手法不能说明任何事情。实际上，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愚蠢，既不深入想一想，也不反躬自问:“事实上，是否这是我自己愚蠢呢?”情况是皆大欢喜，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满意，全都是怒气冲冲。深思熟虑在我们这个时代简直是不可能的：太费事了。真的，人们都在因袭现成的思想。到处都这样在贩卖现成的思想，甚至是无偿的；其实，无偿取得的东西付出更大，人们已经开始预感到这一点。结果是毫无好处，依旧是一片混乱。

就算我们同那个中国一样吧，只是我们没有它那种秩序。我们刚刚着手做的事，在中国则已经完成。毫无疑问，我们也要达到同样的结局，但要到什么时候呢？要想把那上千卷的礼仪书籍接受过来，从而最终有权对什么事都无须思考，那我们至少还得再过一千年深思熟虑的生活。没有办法——谁都不想缩短这个时限，因为现在谁也不愿深思熟虑。

不错，如果谁都不愿意多多思考，那么，做俄罗斯的文学家似乎就容易了。是的，的确是容易些；可这样一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愿意多多思考的文学家和出版家就可悲了；更可悲的是自己愿意学习、愿意通达事理的人；最可悲的则是真诚地说出这一愿望的人；假如他声言，他已经懂得点什么，而且想把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暗讽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中的一句话，即：“您以为我对俄罗斯了如指掌，而我对它却一无所知。”

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那么所有的人就会立即离开他。他所能做的只是寻求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或者干脆雇用这个人，仅仅是为了能同他交谈；或许光是为他一个人办杂志。这种处境是极其令人难堪的，因为这就等于自己同自己交谈，而办刊物也只是为了自娱。我很怀疑，《公民报》还得长期自己同自己交谈，并且只是为了自娱。单就自己跟自己谈话这一点来看，在医学上就属精神失常的征兆。而《公民报》却必须与公民对话，这也就是全部不幸的症结所在！

这就是我要参与的刊物。我面临的处境是极其不明确的。办得好也罢，坏也罢，我将以这种日记的形式自己跟自己谈话，求得自我满足。谈些什么呢？谈论一切，凡是使我感到惊讶，或是使我不能不加以思考的一切。如果我遇到读者和论敌(但愿不会)，我也懂得，要善于同他交谈，了解他是什么人，如何同他谈话。我将尽力学会这样做，因为在我们这里，也就是在文学界里，这是最难做的事。加之论敌有各种各样的：不是同任何人都可以交谈的。我讲一则最近听到的寓言。据说，这则寓言是古老的，多半是来自印度，十分有趣。

有一天，一头猪跟狮子争吵起来，猪便要与狮子决斗。回到家中反复思忖后又胆怯了。一群猪便凑到一起，想了想后，决定这么做：

“猪，你看，离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泥塘，你躺到那里面好好滚一滚，就这样去决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猪就按照说的去做。狮子来了，用鼻子闻了闻，直皱眉头，就走开了。后来，这头猪没完没了地自我吹嘘，说得狮子害了怕，从战场逃跑了。

寓言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这里没有狮子，——倒不是因为气候，而是因为这样就太壮观了。不过，可以用正派的人

（每个人都必须是正派的）代替狮子，寓言的劝喻意义还是相同的。

顺便我再说几句开场白。

有一次，我同现在已故的赫尔岑谈话，我高度赞扬他的《彼岸来信》[1] 这部作品。十分高兴的是，对此书，米哈伊尔·彼特罗维奇·波戈金[2] 在那篇关于他在国外与赫尔岑会晤的优美动人的文章中也大加称赞。这部作品是以两个人——赫尔岑及其论敌交谈的形式写成的。

“我特别喜欢的是，——我顺便说，——您的论敌也非常聪明。您会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他把您逼得走投无路。”

“是啊，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赫尔岑笑了笑。——我给您讲个笑话。我在彼得堡的时候，有一次，别林斯基把我拉到他那里，让我坐下听他谈他的一篇言词激烈的文章:《A.先生与Б.先生的谈话》(此文已收入他的文集)。文章中的A.先生自然就是别林斯基自己，表现很机智。而Б.先生即A.的论敌则显得有些头脑简单。他读完文章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喂，你认为怎样?’

‘好倒是好，显然，你很聪明，可是你怎么有兴趣跟那个傻瓜浪费时间呢。’

别林斯基猛然扑到沙发上，把脸埋在垫子里，一边笑，一边大声喊叫:‘切中要害！切中要害!’”

---

① 阿·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长期流亡国外。《彼岸来信》或译《彼岸来鸿》（1847—1850），反映了他在目击1848年法国革命及其失败后的心灵悲剧。

② 米·彼·波戈金（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

# 老一代人

## (《公民报》，1873 年 1 月 1 日，第 1 期)

关于别林斯基的这个笑谈现在使我回想起我初涉文坛的情况，天知道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了；对我来说这是苦闷的、决定命运的时期。别林斯基浮现在我的头脑中，还是我当时见到的那副样子和他接待我的情景。现在我经常回想起故人，显然，这是由于我常接触新人。在我一生所遇到的人中，别林斯基最热情奔放。赫尔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①]：他是我们贵族社会的产儿，首先是 gentilhomm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②]，唯独俄罗斯才能出现的人物，俄罗斯之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出现。赫尔岑并非侨居国外，也没有为俄罗斯侨民开路；不，他生来就是侨民。类似他的所有那些人都是我们这里天生的侨民，虽然其中大多数人并未离开过俄罗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老一代人》这篇文章的用意是回忆与评论 19 世纪 40 年代对他在思想上、艺术上起过重要影响的别林斯基与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 1846 年结识赫尔岑的，此后，互有交往。1865 年他在致阿·苏斯洛娃的信中说："我与赫尔岑关系很好。"1868 年春两个人的关系就恶化了。当时两人虽然都在日内瓦，却互无来往。该年 3 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阿·迈科夫的信中谈到自己与赫尔岑的关系时说："在街上偶然遇到赫尔岑，以客气中夹带嘲讽的不友好语气交谈了十来分钟就分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赫尔岑的艺术和政论作品评价很高，但却与赫尔岑不断进行争论，这种争论也表现在《作家日记》中。1870 年赫尔岑逝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文评论了赫尔岑一生的活动。

② 法文：俄罗斯贵族与世界公民。

的生活里[1]，俄罗斯贵族老爷，除极少数外，最后的根柢都腐烂了，与俄罗斯根基[2]、俄罗斯真理的最后联系都动摇了。历史仿佛注定要通过赫尔岑这个最鲜明的人物类型表明我们的有教养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与人民之间的这种裂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类型是历史性的。由于脱离人民，他们自然也就抛弃了上帝。他们中间不甘寂寞的人成了无神论者，而委靡不振、与世无争的人则成了遁世者。他们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就是蔑视，与此同时却想象并深信自己是热爱人民的，是期望人民生活美好的。他们是从相反的方面热爱人民，他们想象以某种理想的人民取代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民应该成为他们所想

---

① 指从彼得大帝之后到当时。

② 根基（почва），陀思妥耶夫斯基常用此词，他所谓的“俄罗斯根基”就是指俄罗斯人民。称俄罗斯人民为“根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倡导的一种理论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流放地返回彼得堡后与其兄长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 年逝世）发行期刊《时代》（1861—1863）与《时世》（1864—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两刊物发表的作品表明，他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他的整个社会思想倾向较之被流放前流露出重要转折的迹象。这时，他宣扬的主张是，俄罗斯有其不同于欧洲的即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俄罗斯人民与上层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俄罗斯不需要以革命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坚信，俄罗斯人民必将以自己的基督真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只有人民才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构成人民本原的核心观念即人民与沙皇的团结一致，人民对东正教的虔诚信念。他批评上层社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崇拜并仿效欧洲的文明，蔑视俄罗斯人民，脱离了人民这个“根基”。他呼吁上层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一方面，应以自己的文化向人民进行启蒙教育，另一方面，则应接受人民世世代代形成的道德伦理观念，接受人民的真理，与人民结合，回归人民这个“根基”。这种结合一旦实现，俄罗斯就将成为光明幸福的王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主张根基论的观点，在当代社会思潮的斗争中被称为“根基派”。

象的那种样子。这种理想的人民在大多数先进人士的眼里无形中就表现为 1793 年的巴黎平民[①]。那时，这曾是最令人向往的人民。不言自喻，赫尔岑正是作为俄罗斯的贵族公子才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说，他没有任何需要和目的，完全是出自“思想的逻辑发展”和在祖国感到心灵空虚。他脱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否定了家庭[②]，但却似乎是好父亲和好丈夫。他反对私有财产，然而他却不出所料，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家业[③]，心满意足地在国外领略没有衣食之虞的生活。他发动了革命，煽动别人参加，同时他却喜欢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的恬静。这是一位艺术家、思想家、杰出的作家，学识渊博、机智灵敏的人物，惊人的健谈家（他的言谈甚至胜于他的写作）和极其擅长内省反思的人。内省反思，善于把自己感情深处的东西形象化并把它摆在自己的面前，向它膜拜，也许，立即又加以嘲弄，这种才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毫无疑问，这是非凡的人物；但他无论做什么——撰写自己的札记，与蒲鲁东合办报纸[④]，走上巴黎的街垒（在自己的札记中对这件事作了可笑的描写）[⑤]；痛苦、欢乐和怀疑；在 1863 年，迎合波

① 指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民。

② 指赫尔岑主张社会改革应包括婚姻与道德的改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的说法并不符合赫尔岑的思想。赫尔岑认为：“在将来的时代，没有婚姻，妇女摆脱奴隶的地位……而现在，妇女被贬低得像牲畜……”他还说，到那时，“两性间的自由关系……将由道德、良心，而不是由警察、社会舆论来决定人们关系中的一切细节。”

③ 在写《群魔》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准备以近似的说法来说明这是“理想的西方派”的特点。

④ 赫尔岑曾与蒲鲁东（1809—1865，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共同发行《人民之声报》（出版于 1849 年 10 月—1850 年 5 月）。

⑤ 关于此事，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第 5 部中的《西方小品》之一《在大风暴中》曾经谈到。

兰人的愿望把自己致俄罗斯革命者的呼吁书传进俄罗斯[①]，尽管此时他并不相信波兰人，他知道波兰人欺骗了他，知道自己的呼吁书将会毁灭数以百计的不幸青年；他在自己晚年的一篇文章中以罕见的天真承认了此事，虽然他很清楚，这种自白会把自己置于何等境地，——他无论做什么，时时处处，以至在整个一生中，他首先是 gentilhomme russe et citoyen du monde，照实说，就是他出身于其中而又为他所憎恨的那个从前农奴制度的产物。说他出身于农奴制度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父亲[②]，而且由于他脱离祖国的大地，脱离祖国大地的理想。别林斯基则相反，——别林斯基全然不是 gentilhomme，——不是。（天晓得他是什么出身。他的父亲似乎是军医[③]。）

他基本上不是内省反思型的人物，他一生自始至终都是豪爽而又热情奔放的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受到他的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赫尔岑在他创办的俄国最早的革命报纸《钟声》（1857—1867，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上发表的呼吁书《致波兰的俄国军官们》。1863 年波兰爆发了反抗沙皇俄国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起义。赫尔岑号召俄国军官支持波兰的起义。他认为，波兰起义的胜利不仅能够使波兰脱离俄国，而且将使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受到鼓舞。但结果波兰起义失败了，赫尔岑后来明白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在 1865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但他认为支持波兰起义的行为仍然是正义的。1864 年他在写给伊·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我们拯救了俄国这个名字的荣誉，但为此竟遭到甘做奴隶的大多数人的中伤。”后来，列宁充分肯定了赫尔岑支持波兰起义的立场。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列宁说：“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时，赫尔岑没有张皇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

② 赫尔岑的父亲 И. А. 雅科夫列夫是大地主。

③ 别林斯基的父亲确实是军医。

赞赏（后来，差不多是一年之后，我们发生了分歧——由于各种原因，其实，从各方面看，都不是重要的原因）[①]；那时，我们刚结识不久，他便把全部心思都倾注到我身上，他立即开始以毫不掩饰的急切心情要使我接受他的信仰。我丝毫没有夸张他对我那种全神贯注的心情，至少在我们结识的最初几个月里是这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同我交谈径直从无神论开始。在这种交谈中有很多令我难忘的东西，——这就是他那灵敏得惊人的辨别力和执著地献身于一种思想的自由特点。大约两年之前，共产国际的一篇宣言就是从这样一句重要的声明开始的:“我们首先是无神论者的同盟。”[②]也就是说，从事情的根本开始的；别林斯基也是这样开始的。他虽然认为智慧、科学和现实主义高于一切，但他同时比所有的人都更深刻地理解，单靠智慧、科学和现实主义只能建立蚁穴，而不是人们能够在其中和睦相处的社会的“和谐”。他知道，一切的基础是道德原则。他狂热地、毫无辨析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原则（除开卑鄙地歪曲自然与合理的思想之外，社会主义直到现在连一个原则也没有提出来），一味加以赞扬。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他首先要贬斥基督教；他知道，革命必须以无神论为起点。他必须推翻他所否定的那个社

①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的破裂原因为哲学与美学上的分歧。别林斯基为无神论者，不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灵魂不死的信仰；在美学方面，别林斯基认为，在《穷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背离了《穷人》的艺术原则。

② 这句话出自俄国革命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1814—1876）1868年在日内瓦建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宣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误以为出自马克思与恩格斯建立的第一国际的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曾于1871年发表声明，抗议把这句话强加于第一国际。

会的道德基础赖以存在的宗教。他激烈地否定家庭、私有财产和个人的道德责任（我要说明，与赫尔岑一样，他也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毋庸置疑，他很明白，否定了个人的道德责任，从而也就否定了个人的自由；他毫无保留地相信（他的盲目性远远超过赫尔岑，赫尔岑到后来似乎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不仅不摧毁个人的自由，而且恰恰相反，还要在新的、牢固的基础上重建从未有过的辉煌的自由。

但是，基督本人的光辉形象巍然屹立在那里，同他斗争谈何容易。别林斯基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推倒基督的学说，说它的博爱是虚伪的，愚昧的，受到现代科学和经济学说谴责的；但是，这位神人的光辉面貌，他道德上的不可企及，他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美依然巍然不动。别林斯基不像勒南[①]，他那种勇往直前的旺盛热情，即使在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前也没有像勒南那样，而后者在自己那部没有任何信仰的"Vie de Jésus"[②] 一书中声称，基督终归是人类美的理想，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即使到未来也不可能重新出现。

"可是您知道吗，"——有一次晚上，他面对着我，尖声喊道（他十分慷慨激昂的时候，有时就会喊叫）——"您知道吗，在社会极其不合理、人不可能不干坏事的条件下，在经济

① 约瑟夫·勒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院士。著有《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一书，试图排除宗教的神秘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对别林斯基的宗教观点的评论是不确切的。别林斯基主张基督是历史人物，排除了基督形象的神秘性。但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萨尔茨堡的一封信中又指出，基督是"……第一个向人类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学说的人，他以自己遭受的磨难表明、证实自己的学说是真理。"

② 法文：《基督教起源史》。

会导致人去干坏事的条件下，是不能向人历数他有多少罪恶，不能用种种义务和自愿让人抽打面颊之类的说教去压抑人，也不能要人去做那种按照自然法则他即使想做……但也做不到的事，否则就是荒唐的，残忍的。”

这天晚上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话，在座的还有别林斯基的一位朋友①，别林斯基很尊重这位朋友，常常听从他的意见；他也是一位年轻的、刚刚开始写作的文学家，此人后来在文学界颇有声望。

“看着他，我都觉得可怜，”别林斯基突然中断了慷慨激昂的言词，把脸转向自己的朋友，还用手指着我，“每一次，我一提到基督，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仿佛要哭的样子……请相信，您是一个天真的人，”他又蓦地转向我，“请相信，您的基督假如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会是一个最不显眼、最平凡的人；在当今科学和当今推动人类的力量面前，他将变得暗淡无光。”

“不，不！”别林斯基的朋友接过话茬儿说（我记得，我们是坐着，他则在屋中来回走动）。“不！假如基督在今天出现的话，他就会参加运动、领导运动……”

“对，对！”别林斯基立刻表示赞同，快得惊人，“他必定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走在一起。”

基督必定要归附的人类的推动力量，在当时全都是法国人：首先是乔治·桑②、如今完全被人忘却的卡贝③、皮埃尔·

---

① 当是指瓦·彼·鲍特金（1811—1869）。他是俄国作家、文艺批评家、西欧派。

②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在自己的小说中宣扬空想社会主义。

③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

勒鲁[①]、与当时刚开始活动的蒲鲁东[②]。据我的记忆，别林斯基那时最尊崇的是这四个人。傅立叶[③] 已远不是那样受尊敬了。别林斯基整个夜晚整个夜晚地谈论这些人。那时还有一个他所顶礼膜拜的德国人——费尔巴哈[④]（别林斯基一生没有学会一门外语，他把费尔巴哈说成费伊耶尔巴哈）。谈到施特劳斯[⑤] 时充满敬慕之情。

这样满腔热忱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可想而知，这是最幸福的人们中间的一个。噢，后来人们枉费心机地写道，别林斯基如果再多活一些时候，他就会成为斯拉夫派。但他永远也不会以斯拉夫派而告终[⑥]。别林斯基如果能够活得长一些，而且得

①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 蒲鲁东（1809—1865），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③ 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④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哲学家。

⑤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耶稣传》（1840）。

⑥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45年与别林斯基结识的，当时他深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成为俄罗斯文学“自然派”行列中的一员。1861年他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写到这个时期时态度是肯定的，同年在《——勃夫先生与艺术问题》一文中反驳《祖国纪事》杂志对别林斯基的批评，高度评价别林斯基的功绩。他在文章中写道：“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命运，别林斯基……在两页纸上所说的话的分量超过了《祖国纪事》从1848年直至今天的全部活动的分量。”可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别林斯基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9世纪60年代初提出根基派的观点，此后，他在思想上日益倾向斯拉夫派，他对别林斯基的评价也随之发生变化。1863年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说，别林斯基既是“激情满怀的俄罗斯人”，同时，作为西方派“看来又蔑视一切俄罗斯的东西”。1867年在写给阿·迈科夫的信中更说别林斯基是19世纪60年代那些“自由主义分子和进步分子”的始祖，这些人“最愉快，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辱骂俄罗斯”。显然，这种评价是偏激的，颇具争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致尼·尼·斯（转下页）

以移居国外的话，那么他的结局可能是做一名侨民，这样他现在就会是一位热情昂扬的小老头儿，一如既往、毫不踌躇地热衷于自己的信念，奔波于德国和瑞士的各种代表大会之间，或者是作为随从依附于某位德国的霍格夫人[①]，为某个妇女问题而到处奔走。

这个怡然自得、良心极其平静的人，其实有时也非常烦恼；不过这是另一种性质的烦恼，——不是由于怀疑，也不是由于失望，不是的，——令他烦恼的是，为什么不在今天，为

（接上页）特拉霍夫的信中还辱骂过别林斯基。不过，他对别林斯基的评价并非只有这一个方面，《作家日记》中写到别林斯基的几篇文章表明，他对别林斯基，无论是作为对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别林斯基，还是对作为西方派的别林斯基都没有全盘否定，在文章中有时不仅流露出敬重和缅怀之情，并且还提出与从前的评价自相矛盾的观点。在本文中说别林斯基蔑视俄罗斯，断言他可能作为“依附于”某位德国夫人的俄罗斯侨民而终其一生。然而他在1876年写的《我的奇谈怪论》中却认为，俄罗斯的“最激烈的西方派”在欧洲“成了欧洲的否定者，站到了极左翼的队伍里”，“结果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变为最真诚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精神而斗争的战士……其实，他们自己原来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写道，别林斯基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差不多是第一个公然倾向欧洲社会主义的人……而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文学里，他同斯拉夫派战斗了一生”，但在斯拉夫派看来，由于他否定整个欧洲文明的秩序，他就成为“为斯拉夫的真理、俄罗斯的独特性与俄罗斯的本原而斗争的最坚定的战士”。这样阐述与理解别林斯基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显然是出于误解或曲解，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想借别林斯基的声望为斯拉夫派扩大影响。这也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中的矛盾。但从斯拉夫派的观点看，这无疑是肯定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的论争的结果是殊途同归，是对别林斯基的一生活动的意义的高度评价。

① 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1868年12月11（23）日致阿·迈科夫的信。

什么也不在明天呢[①]？这是全俄罗斯最性急的人。有一次，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在兹纳缅教堂附近遇见他。他告诉我，他是出来散步的，现在要回家。

“我经常到这里来，看看建筑（正在建设中的尼古拉铁路[②] 的一个车站）进行得如何。哪怕是站在这里看一眼工地，心里也很舒畅：我们终于有了铁路，虽然还只是一条。您信不信，有时候这个思想使我心里感到轻松。”

这话说得既热情，又中肯；别林斯基从来不装腔作势。我们在一块儿走着。我记得，他在途中对我说：

“等到人们把我埋进坟墓的时候（他知道，他在患肺痨病），他们才会清醒过来，知道他们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③]，我已经不常到他那里去。他不欢迎我了；而我却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整个学说。又过了一年，在托博尔斯克城，我们在羁押流放犯人监狱的院子里，等待着下一步的命运，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④] 求得监狱看守的允许，在看守的住所同我们秘密会见。我们看到了这些自愿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的伟大受难者。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财富和亲友，为了高尚的道德义务，所有义务中最没有任何约束的义务，她们牺牲了一切。在漫长的二十五年里，她们

---

① 指别林斯基急于想在“今天”或“明天”看到自己活动的成效。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他同俄国解放运动中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基本分歧之处。他曾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代人》杂志：“你干吗这么急急忙忙？”在写《群魔》的过程中，他再三提到别林斯基这一“性急”的特点。

② 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的铁路，建于 1843 年至 1851 年，1923 年后改称十月铁路。

③ 别林斯基于 1848 年俄历 5 月 26 日逝世。

④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许多人被流放，他们的妻子大多随从他们到流放地。

被判刑的丈夫所经受的一切，她们也全都承受了，虽然她们没有任何罪过。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她们为我们下一段路程祝福，为我们祈祷，向每个人赠送圣经——唯一的一本允许在监狱里看的书。这本书当我服苦役时在枕头底下放了四年。我自己读，有时也读给别人听。我用它教会了一个犯人读书。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按照别林斯基的信念，全部是不可能不犯下自己那些罪行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是无辜的，只是比别人更为不幸。我知道，全体俄罗斯人民也把我们称为“不幸的人们”，这种称呼我听到过多次，从很多人的嘴里都听到过。但在这里却有另外一种含义，完全不同于别林斯基所说的，而是像我们的陪审员们现在在一些判决书中所说的那种含义。在“不幸的人们”这个词中，在人民的这种判决中，表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含义。四年的苦役是一所长期的学校；我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判断……现在正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 环　境

（《公民报》，1873年1月8日，第2期）

看来，全世界的陪审员们，尤其是我们的，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当然，除开其他的感受），这大概就是权力感，或者更确切些说，就是专制独裁的权力感。有的时候，如果某一种感受凌驾于其他感受之上，这种感受就是极其恶劣的。它即使是处于隐蔽形式之中，即使是受到许多其他善良感受的压抑，它在每个陪审员的心灵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在他对自己的公民责任有高度认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出于自然的自身法则。因此，我记得，在我们刚开始实行新的（公正的）审判制度时，我对一件事很感兴趣。在想象中我仿佛看到一个法庭。那里坐的，比如说，将是清一色的农民，昨天的农奴。检察长和律师们要巴结他们，观察他们的神色，和他们共事，我们的农夫们则坐在那里，心中暗想："现在就是这个规矩，我高兴，就无罪释放你，不高兴，你就得流放西伯利亚。"

就是这样，不过，现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经不惩罚人，而是一味为人开脱。当然，这也是在运用权力，甚至是滥用权力，只向某一个方向倾斜，是否向温情倾斜，说不清，——但却是向一个共同的、差不多是我们一致预定的方向，好像事先经过协商。"倾向"的共同性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患有这种无论有罪无罪都要加以开脱的流行病的，不仅是农民这些昨天还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而且是所有的俄罗斯陪审员，甚至是造诣很深的人和大学教授，单是这种共

同性就是一个极其诱人的思考题目，大概有时它能引起各种各样的奇怪猜想。

不久前，我们的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登载了一篇很谦恭的、用意很善良的小文章。文章中流露出一种猜测：我们的陪审员们，作为突然之间不明来由地感到自己有股强大的力量（宛如从天而降）的人，而且这还是在世世代代蒙受屈辱与折磨之后，他们是否想给“权力机构”找点麻烦，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比如说，跟检察官开个玩笑，或者说，为了与过去形成对照？这种猜测不乏机智，也不无某种开开玩笑的意思，不过，显然，不能用它解释一切。

“简直不忍心毁掉别人的命运，他们也是人。俄罗斯人是富有怜悯心的。”有的时候能够听到某些人是这样解释的。

然而，我也常想，在英国，例如，人民也是有怜悯心的；即使说英国人没有我们俄罗斯人那种软心肠，起码也有人道精神；对他人也怀有基督教义务的意识和深刻情感，而且可能这一切都得到高度发展，形成坚定、独立的信念；如果考虑到那里的教养程度和世代相传的独立精神，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信念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坚定。在那里不是“突然从天上”给他们降下那么多权力，就连陪审员审判制度本身也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过来，是经过多少个世纪形成的，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而不是通过恩赐的形式得到的。

事实上，在那里，陪审员明白，在法庭上，他只要一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就不只是一个心肠仁慈、感情丰富的人，他首先是公民。他想的是（无论正确与否），履行公民义务高于个人心灵上的善行。不久之前，陪审员们宣告一名证据确凿的小偷无罪，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全国一致的举动证明，如果说在那里也可能有像我们这样的审判，那也是少有的例外情况，

而且立即激怒公众舆论。那里的陪审员明白，首先，他手中所持的是整个英国的旗帜，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他应该通过自己表达全国的意见。做一个公民的能力——也就是使自己上升到体现全国整体意见的高度的能力。噢，那里也有审判的“怜悯心”，那里也考虑“摧残人的环境”（这似乎是我们现在所喜爱的学说）——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全国的健全舆论和基督教道德观对这个问题的阐释程度（这个程度似乎是相当高的）所允许的限度。因此，常有这种情况，那里的陪审员硬着心肠宣布确认有罪的判决书，因为他明白，首先，他的责任主要是，以自己的判决向全体同胞证明，在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惜为之付出热血的古老的英国，罪恶依然被视为罪恶，暴行依然被视为暴行，国家的道德原则还是原来那一些，牢不可变，仍然像从前那样屹立不动。

“假定说吧”，有人说道，“你们那些牢固的原则（即基督教的原则）全然未变，确实是首先应该做一个公民，也要高举旗帜，等等……就像您说的那样，——再假定说，暂时没有人反对您的话，那么请想一想，在我们这里，公民从何而来呢？只须想想昨天还是什么样子就够了！公民权利（而且是这样一些权利！）突然间从山顶上滚下来，落到他面前。这些权利把他压得直不起腰来，对他来说，这些权利目前纯粹是重荷，重荷！”

“当然，您说的也有道理”，我回答说，多少有点儿气馁，“但是，俄罗斯人民毕竟是……”

“俄罗斯人民？请原谅”，我听见另一个人说，“人人都说，恩赐是从山顶上滚下来的，都把他压垮了。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不只是感受到，他得到的那些权利是一种恩赐，不仅如此，他还觉得，他不花分文就得到这些权利，也就是说，他觉

得，现在他还不配得到这些恩赐。请注意，这完全不是说他真的不配这些恩赐，不应该给他或者给得早了些；恰恰相反：这是人民自己基于谦恭的良心意识到他与这种恩赐不相称，——人民关于自己不配这种恩赐、既谦恭又高尚的意识正好说明他应该得到这种恩赐。人民是由于自己的谦恭而暂时困惑不解。有谁深入观察过人民心灵深处的隐衷呢？在我们这里，谁能说他完全了解俄罗斯人民呢？不，不像您所嘲笑的那样，在人民的心中不仅仅是怜悯和软弱的心肠。在那里，这种权利本身就是令人可怕的！对兄弟姐妹的命运、对人的命运的这种威严权利使我们感到恐惧，在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像你们的公民那样之前，我们还是宽恕吧。由于恐惧而宽恕。很可能，我们坐在陪审员席上的时候，心中却在想：'我们自己比受审的人更好吗？我们富有，不愁吃穿，可是，一旦我们处于他那种境地，那我们干的勾当可能比他干的还要坏，——所以我们还是宽恕一点吧。'可能这样还好，这是发自内心的温情。也许，这就是走向未来某种更高级的基督教的温情的基础，直至今日世界上还未有过的温情！"

"这多少有些斯拉夫派的腔调"，我暗自思索着。这的确是令人宽慰的思想，关于人民因不花分文便得到了本来不配恩赐的权利而谦恭的猜测与另一种猜测相比较，当然更为纯洁，这另一种猜测认为陪审员想"戏弄检察长"。我虽然欣赏这种猜测的现实主义（当然，提出这种猜测的人已经说明，这种猜测是指个别情况），不过……更使我困惑的是：我们的人民怎么忽然感到自己的怜悯心是可怕的？"判人有罪，是很痛心的。"有什么办法呢，痛心就痛心吧。真理高于您的痛苦。

实际上，假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比罪人还坏，从而我们也就承认，对罪人的犯罪行为我们应负一半责任。他

如果践踏了大地为他制定的法令，现在他站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罪责就在于我们。因为，我们大家要是都好的话，他也就会好，现在就不至于站到我们的面前……

“那么就这样判他无罪吗?”

不，完全相反。正因如此就该说真话，把恶称之为恶；但是，因此自己要把判决的罪行的一半重负承担起来。我们走进法庭时就带着我们有罪的思想。这是真诚的痛苦，现在人人都害怕这种痛苦，我们将怀着这种痛苦走出法庭，这就是对我们的惩罚。这种痛苦如果是真挚的和强烈的，我们就使自己净化，使自己变得更好。自己变好了，我们就能矫正环境，把环境变好。只有这一条道路才能改善环境。那种回避自己的怜悯心，为了自己不感受痛苦而干脆判决无罪——这是容易做的。然而，这样我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一个结论：根本就没有犯罪行为，一切都是“环境的罪过”。我们就会得出循环性的结论，甚至把犯罪看做义务，看做反抗“环境”的义举。“由于社会是龌龊的，在这样的社会就不能不反抗、不犯罪而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由于社会很坏，不动刀枪就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与基督教义相反的关于环境的学说所主张的，基督教义充分承认环境的压力，怜悯犯罪者，但它认为，同环境斗争是人的义务，它划定环境问题与义务问题的界限。

基督教在认定人的责任的同时也承认人的自由。环境论断言，人为社会制度中每一个过错所左右，从而使人成为完全没有个性的人，使他完全摆脱任何个人道德义务，摆脱任何独立性，使他陷入所能设想的奴隶制中最恶劣的奴隶境地。这样一来，一个人要是想吸烟，可是又没有钱——为了得到烟，那就去杀害别人。请原谅：有文化教养的人比没有文化教养的人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需要不能满足的痛苦，在需要钱满足自

己时——他为什么不去杀害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呢？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得到钱的话。难道您没有听见辩护律师们的话："当然是犯了法，他杀害了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当然是罪行，但是，陪审员先生们，请考虑这些那些……"等等。实际上，差不多已经说出这种看法了，而且还不是差不多……

"但是，您"，我听到一种挖苦的声音："您似乎在把当代的环境哲学强加于人民，这种哲学怎么会落到了人民的头上呢？坐在那里的十二位陪审员有时全是农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斋戒期吃荤看做不可饶恕的罪过。您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指控他们有社会倾向呢。"

"当然，当然，他们，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从哪里知道'环境'论"，我思索着，"可是，思想是回荡在空间的，思想里面有一种有渗透力……"

"原来如此！"——一声挖苦的哈哈大笑。

"可是，如果我们的人民，由于自己的本性，又比如，由于自己的斯拉夫趋向，而特别倾心于环境论呢？如果他正是欧洲某些宣传者的最好对象又该怎么办呢？"

揶揄的笑声嗓门更高了，不过，显得有些做作。

不，这只是跟人民耍花招，而不是什么"环境哲学"。这里有一个错误，一个谎言，在这个谎言里面有许多诱惑人的东西。

这个谎言可以这样解释，至少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

比如说，人民把被判有罪的人称为"不幸的人"，给他们铜板和白面包。可能这样做已经几个世纪了，人民想以此说明什么呢？是说明基督教的教义还是说明"环境论"的真理呢？关键就在这里，"环境论"的宣传者可以有效地操纵的杠杆也就隐藏在这里面。

有些思想是难以说得明确的，是无意识的，只能被强烈地感受到的；这类仿佛是与人的心灵凝聚在一起的思想很多。全体人民中有这样的思想，作为整体的人类也有这样的思想。现在这些存在于人民生活之中的思想还没有被意识到，它们只能被强烈地、确切地感受到，只是在此之前人民的生活才可能是充满蓬勃生机的。人民生活竭力追求的就是理解这些蕴诸内心的思想。人民越是坚定不移地保持着这些思想，越是不轻易地背叛原有的情感，越是抵制关于这些思想的形形色色的错误的阐释，人民就越是坚强有力，越是幸福。把犯罪称作不幸，把罪人称作不幸的人，就属于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蕴诸内心的思想——俄罗斯人民的思想。

这种思想纯粹是俄罗斯思想。在任何一个欧洲人民身上都是找不到的。在西方，现在只有哲学家和阐释者才能说出这种思想，而我们的人民早在自己的哲学家和阐释者之前就说出来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人民不会由于阐释者对这一思想的错误发挥而迷失方向，陷入暂时的迷误，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最终的意义和结论，毫无疑问，永远是属于人民的，但暂时——可能并非如此。

简短些说，人民似乎在用“不幸的人们”这句话对“不幸的人们”说：“你们犯了罪，现在在遭受痛苦，不过我们其实也是有罪的。假如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们做的可能更坏。如果我们自己好一些，也许你们就不至于坐牢了。你们遭到报复，承受折磨，是因为你们的罪行，同时也是因为共同的目无法纪。你们为我们祈祷吧，我们也为你们祈祷。‘不幸的人们’，现在请收下我们的铜板；我们把这些东西给你们，是让你们知道，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不会与你扯断手足般的联系。”

您会同意，把关于“环境”的学说运用到这种观点上，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社会恶劣，因此我们也坏；但是，我们富有，我们不愁吃穿，我们只是偶然地避免了你们遭遇的事情。我们如果也遇上的话——我们做的，也会跟你们一样。是谁之罪？罪在环境。可见，只有恶劣的环境，而罪行则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种诡辩论的结论也就是我所说的那种花招。

不，人民并不否认有罪行，人民也知道，罪犯是有罪的。人民仅仅认为，他自己以及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他责备的同时，也以此证明他不相信“环境”学说；相反，他相信环境完全取决于他，取决于他的不断忏悔和自我完善。毅力、劳动和斗争——这就是改造环境的东西。只有靠劳动和斗争才能获得独立精神和自己的自尊感。“一旦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会变好，环境也会好起来。”这就是俄罗斯人民关于犯罪者的不幸的隐秘思想，这就是他虽然不能说出来，但却是以强烈的感情体验到的思想。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罪犯自己听到人民说他是“不幸的人”，就认为自己只是不幸的人，而不是犯罪的人。那时人民就会离开这种错误的阐释者，指责他背叛人民的真理和信念。

我本来可以用实例来说明，不过，暂且就这样谈，把实例先放在一边。

罪犯和图谋犯罪的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人，但都属于同一个范畴。比如说，一个罪犯在自觉地准备犯罪时，却对自己说：“罪行是不存在的！”难道人民会把他称为“不幸的人”吗？

可能，是会这样称呼他的；无疑是会的；人民是富于怜悯心的；然而，再也没有比那种居然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罪犯更

不幸的了：这是畜牲，是野兽。他不明白自己是畜牲，他扼杀了自己的良心，这说明什么呢？他只是双重的不幸。是双重的不幸，而且是双重的犯罪。人民怜悯他，但并未放弃自己的真理。人民虽然说罪犯是“不幸的人”，但从来也不否认他是罪犯！假如人民自己也与罪犯一致，回答他说：“不，你没有罪过，因为不存在‘罪行’！”那么，我们这里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幸了。

我要说，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共同的信念；这是所有抱有希望、有所期待的人们的信念。我还补充两句话。

我服过苦役，看到过一些罪犯，一些“被判决”的罪犯。我重复说一遍，这是一所长期的学校。这些犯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否认自己是罪犯。从外表看，他们都是令人生畏的、残忍的人。“吹牛皮”的只是那些愚蠢的人，还有新到的人，人们都嘲笑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阴郁的、耽于沉思的。没有人谈论自己的罪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牢骚话。关于自己犯罪的事甚至不能出声说。有时候，谁要是讲一句挑衅的、带点阴阳怪气的话，“整个牢房”就如同一个人，起来把这个出风头的人压下去。关于这事，大家都不喜欢谈论。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大能使人净化、使人坚强起来的磨难。我看见过他们单独沉思默想的样子，我也看见过他们忏悔前在教堂祈祷的情况；倾听过他们突然冒出来的只言片语，他们的叹息；我现在还记得他们的面孔，——噢，请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内心里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不希望把我的话理解为残忍。但是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说出来。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大概，你们以严厉的惩罚、监狱和苦役拯救了他们中间的半数人。减轻了他们的痛苦，而不是加深了他们的苦难。以苦难求得自我净化要舒畅些，我是说，

比你们在法庭上一个劲儿地为他们辩解而造成的结局更舒畅。你们只能往他们的心灵里灌输厚颜无耻，而留在他们身上的则是会引起邪念的问题和对你们的嘲讽。你们不相信吗？嘲讽你们，嘲讽你们的法庭，嘲讽全国的法庭！你们往他的心灵灌输的是不相信人民的真理，不相信上帝的真理；使他困惑不解……他离开法庭后还在想："啊，现在就是这样，不严厉了。看来，人们变聪明了。也许，人们是害怕了。这就是说，还可以再犯罪。很清楚，既然我这么贫穷——干吗不去偷盗呢？"

难道你们以为，把所有的人一律作为无罪的人或者"应该得到各种宽恕的人"而释放，你们从而就给了他们改恶从善的机会吗？他们会改正给你看的！这对他们是什么样的灾难呀？"看来，我根本就没有罪过"——这就是他们归根结蒂要说的话。是你们自己把他们引向这一结论的。主要的是，对法令、对人民的真理的信念动摇了。

不久之前，我在国外接连居住了几年。在我离开俄罗斯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施行新的审判制度。在国外，我贪婪地阅读我们报纸上关于俄罗斯法庭的一切消息。在国外，我怀着苦痛的心情观察着我们的罢选运动者①；观察着他们那些不会讲祖国语言或忘记了祖国语言的子女们。我那时就明白，事物本身的力量会使他们中间一半人最终成为侨民。想到这里我总是痛苦地想：这里有多少力量，可能，这都是优秀的人物，而在我国又是多么需要人啊！可是有时候，在从阅览室往外走的时候，上帝啊，我不由自主地就跟罢选运动主义和罢选运动者们和解了。心跳得痛起来。你读到的是——这里判决杀害丈夫的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不是西方那种拒绝参加选举或某一活动的人，而是指在外国居住的俄罗斯人。

妻子无罪。罪行是昭然若揭的，证据是确凿的；她自己却认为：“不，我没有罪。”那里一个年轻人撬开钱柜，偷了钱。“他在那时正在热恋之中，需要弄到钱讨好情人。”——“不，他没有罪。”所有这些事情即便可以因同情和怜悯心而得到辩解：问题也正在这里，我不明白为之辩解的原因，我给弄糊涂了。头脑中产生的印象是忐忑不安的，——几乎像是受了侮辱。在这烦恼的时刻，我觉得，俄罗斯有时就如同有人想要在上面建筑宫殿的一片沼泽、泥潭。从外表上看基础似乎坚硬、平坦，实际上却是类似豌豆羹的表层，一踩上去——就会陷下，一沉到底。我为自己的灰心丧气而狠狠责备自己；但我想，我毕竟是从远处看问题，可能看错了，而且我目前毕竟也是罢选运动者，没有在近处看，也没有听得清清楚楚……因而又振作起来。

而现在我又重新生活在祖国了。

“算了吧，他们真的是怜悯人吗?”——问题就在这里！请莫讥笑我如此重视这个问题。“怜悯心”至少可以隐隐约约地说明点什么，解开点困惑，而如果连这个最起码的说明都没有——那就是整整一个疑团，如同某个疯人生活于其中的一片黑暗。

一个农民多年来一直毒打自己的老婆，折磨她，凌辱她，拿她比狗还不如。她绝望得要自杀，几乎像疯了似的走进自己村子的法庭。在那里他们漠不关心地懒洋洋地对她说，“你们和睦些过日子吧”，然后便让她走了。难道这是怜悯心吗?这是刚从狂饮中醒过来的醉鬼的胡话，他影影绰绰地认出来，是您站在他的面前，他糊涂地、漫无目标地向您挥动着手，要您别妨碍他，他连话也说不清楚，满脑子是昏云迷雾。

顺便说说，这个女人的事人人都知道，刚发生不久。人们

在所有的报纸上都读到过她的事情，大概都还记得。妻子纯粹是因为忍受不了丈夫毒打而自缢的；丈夫受了审判，可却认为他值得宽恕。过了很久这幅情景还在我眼前隐约地浮现，至今也还浮现出来。

我一直在想象中勾勒这个农民的容貌：据说，他是高个子，很粗壮，力气大，长着淡黄色头发。我想还该加上——头发浓密。身躯白净，臃肿，动作迟缓傲慢，目光专注；话少，也不大讲话，他的话像珍珠似的，一粒一粒往外吐，首先他自己认为这些话很珍贵。证人的证词说，他性格残忍：抓住鸡就头朝下脚向上倒挂起来，他喜欢这样做。这是他的乐趣，是极其突出的特点！多少年来他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老婆——绳子、棍棒都使用过。他把地板条抽出来，把她的两只脚硬塞进地板缝里，然后往缝里塞木板条，还不停地打。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她，大概同他把鸡倒挂起来的动机一样。还用饥饿折磨她，三天不给她东西吃。把面包放在柜橱里，把她叫到跟前对她说："不准动这面包，这是我的。"——这也是极突出的特点！她带着十岁的孩子到邻居家乞讨：给点面包——就同孩子吃，不给——就挨饿。催着要她干活；她片刻不停地、不声不响地、战战兢兢地干着活，结果成了精神失常的人。我也在想象她的相貌：应该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女人。有的时候，常有这种情况，高大、粗壮、又白又肥胖的男人娶又小又瘦的女人（我发现，他们喜欢这种选择），他们站在一起或者一块儿走路的时候，让人看上去都感到奇怪。我觉得，她如果在最近期间怀了孕，这又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不可避免的特点，有了它情况就更完整了；否则，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您看见过丈夫如何打老婆吗？我看见过。他开始是用绳子或皮带抽打。农民的生活中没有审美享受——没有音乐、

剧院、报刊之类的东西；自然需要用什么东西填补这种生活。这个农民先把老婆捆绑住或者把她的两只脚塞进地板缝，然后开始打，一定是不慌不忙地，冷静地，甚至睡眼蒙眬地有节奏地打，任凭她怎样喊叫和哀求，就是说正是要听，惬意地听，否则他打老婆又能得到什么乐趣呢？先生们，你们知道，人出生于各种不同的境况：你们难道不相信，这个女人在另外的境况下就可能成为莎士比亚① 的朱丽叶② 或者贝特丽丝③、《浮士德》④ 中的格蕾琴⑤ 吗？我并不是说她就是这些人物，——如果这样断言，那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在她的心灵中可能存在某种很高尚的东西的萌芽，大概不会比上层社会的人逊色：怀有爱心，甚至是高尚的心肠，一个富于独特的美的性格。她生活了那么久的时间才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光是这一点就表现出她的平和、温顺和坚韧的耐性。人们鞭打的，像打猫似的鞭打的就是这个贝特丽丝或者格蕾琴！殴打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多地数不清；他开始变得狂暴，开始产生了嗜好。他已经完全变成野兽，他对此很明白，却扬扬得意。受难者的野兽般的惨叫像美酒一样使他陶醉："我给你洗脚，喝你的洗脚水！"——贝特丽丝以非人的声音喊叫着，后来终于沉寂不响了，似乎只是大口大口地喘吁着，时断时续地喘着气，可是这时打得更多了，更狂暴了……他忽然扔开皮带，发疯似的抓起棍棒、树枝，碰到什么就拿什么，最后那三下毒打落在她背

---

①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诗人、剧作家。
② 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中的女主人公。
③ 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1598—1599）中的女主人公。
④ 德国诗人歌德写的悲剧（1806 年第 1 部脱稿，1832 年完成第 2 部）。
⑤ 《浮士德》中的人物。

上时，棍棒折断了，——这才算完事！他走到一边，在桌子旁坐下来，呼哧带喘地喝起克瓦斯[①]来。小姑娘，他们的女儿（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坐在炕炉上的角落里直发抖，想躲藏起来：她听见了妈妈是怎样在嚎叫。他迈步走出家门。到了拂晓妈妈才苏醒过来，她站起身来，每动一下都痛得呻吟，哀叫，又去挤牛奶，担水，干活。

他在走出家门时，用不慌不忙的，慢腾腾的，但却严肃的语气对她说："不准吃这块面包，这是我的面包。"

最后，他也喜欢把她像鸡那样倒吊起来。大概是把她倒吊起来后，自己就可以走到一旁，坐下来喝克瓦斯，吃饭，后来忽然又拿起皮带开始动手，开始打那吊着的女人……小姑娘又在炉顶上缩成一团，不停地发抖，惊讶地偷看一眼双脚被吊起来的妈妈，便又躲藏起来……

大概是在5月的一个早晨，在那个晴朗的春日里，她上吊了。前一天，人们还看见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神志不清的她。临死之前她同样去过乡里法庭，在那里人们也懒洋洋地对她说："和睦地过日子吧。"

当她上了吊，发出嘶哑的声音的时候，小姑娘从屋角里向她喊道："妈妈，你干吗上吊呀？"然后，胆怯地走到跟前呼唤吊着的人，惊讶地打量她，那早晨她好几次从屋角里出来看她，一直到她父亲回来。

于是他——一个傲慢、肥胖、若有所思的人出现在法庭上；一切都拒不供认："我们是和睦相处的。"——他像抖落珍珠似的吐出寥寥可数的几句话。陪审员们退席，经过"短暂的商议"做出判决："有罪，但应予宽恕。"

① 俄罗斯民间的一种清凉饮料，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

请注意，小姑娘作证反对她的父亲。她说出了全部事情，据说，旁听的人都落了泪。如果不是陪审员们的“宽恕”，就该把他永久流放西伯利亚了。但是，得到了“宽恕”后他只坐了八个月的牢，一回到家中就把为母亲作证反对他的小姑娘要回来。他还会把人倒挂起来。

“应予宽恕！”明摆着会做出这样的判决。他们也知道，等待着小姑娘的是什么。宽恕什么人，什么事？您会感到自己处在一团旋风里面，您被卷进去，在里面旋转，不停地旋转。

请稍等，我再讲一个事例。

在实施新的审判制度之前的某个时候（其实是在这之前不久），我在我国的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母亲在手上抱着一个周岁或者十四个月大的婴儿。正是长牙的时候；孩子们不舒服就要哭，烦躁不安。孩子惹烦了母亲，可能，她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还要把他抱在手上，听他那令人心烦的哭声。她发火了。可是，能够因此就打那么幼小的婴儿吗？其实也不忍心打他，他懂什么？他已经虚弱无力，弱不禁风了……即使打，他也不懂事：他要哭得更厉害，不是用两手抱住你，就是亲你，不停地哭啊，哭啊。不过她没有打他，屋子里的茶炊正巧烧开。她把孩子的小手放在茶炊筒下面，拧开了开关。她抓住小手在开水下浇了十来秒钟。

这是事实，是我读到的。不过可以设想，这件事是在目前发生的，而这位女人也被传唤到法庭上。陪审员们退席，进行“短暂的商量”后做出判决说：“应该得到一切宽恕。”

好啦，请想一想吧；我至少要请母亲们想一想。大概辩护律师又会在那里兜圈子：

“陪审员先生们，当然，这件事根本不能说是人道的，但是要从整体上看这件事，请注意环境和情况。这个女人贫穷，

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承受着种种苦恼。她没有钱雇保姆。很自然，在那种时刻，由于折磨人的环境而造成的残暴可以说已成为习性，先生们，她把孩子的手放到茶炊的开关下是很自然的……”

噢，当然，我明白人人尊敬的律师称号的全部功用及其崇高。但是，有时候也不能不从这样一个角度观察他（我同意，这个角度是轻率的，但却是不得不这样的）：要知道，他们的职务有时候是多么受罪，你想想看，像蛇似的绕来绕去，讲谎话，违背自己的良心，违背自己的信念，违反一切道义，违反一切人性！不，钱真的不是白拿的。

“得了吧！”——刚才那个讥讽的声音又在喊叫了。——“这一切全是无稽之谈，全都是您编出来的。陪审员们从来没有做出过那样的判决。辩护律师从来也没有狡辩。一切纯属捏造。”

而同鸡一样，两脚朝上倒吊着的老婆，“这是我的面包，不准你吃”，在炕炉上听妈妈叫喊了半个小时，吓得全身发抖的小姑娘，“妈妈，你干吗上吊哇？”——这一切岂不是同用开水浇手毫无区别吗？其实，几乎是一回事！

“落后、愚蠢、环境，请怜悯他们吧”，——农民的辩护律师坚持说。然而，这样的农民有千百万，并不是都倒吊自己的老婆！应该说还是有性格特点……从另一方面看，有教养的人很快也要这样吊起自己的老婆了。辩护律师先生们，不要再拿你们的“环境”来狡辩了。

# 个人琐事

## （《公民报》，1873年1月8日，第3期）

人们已经好几次要求我写我的文学活动的回忆录了。我不知道能否写成，记忆力也减退了。回忆也是不愉快的事；一般说来，我不喜欢回忆。但是我的文学活动的某些情景却不知怎的记得非常清楚，尽管记忆力不好。下面这个笑谈就是一个例子。

有一次，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信步走到现已去世的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① 的家。他非常欣赏我的小说《罪与罚》，是在《俄国导报》② 上发表的。他热烈地称赞小说，还向我转告了某个人的、我认为是颇为可贵的评论，我不想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这个时候，有两份杂志的两位发行人③ 相继走进屋来。其中一份杂志在当时刚开始出版，但后来得到了我们任何一种杂志从未有过的大量订户。另一种杂志则相反，刊物办得出色，对文学与读者产生过影响，可它正在

---

① 叶·彼·科瓦列夫斯基（1809—1868），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基金会第一任主席。

② 《俄国导报》(1856—1906)，米·卡特科夫发行的文学和政治杂志，1862年后成为保守派的喉舌。

③ 从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活动的材料看，此处谈到的两种杂志发行人之一可能是自由派倾向的文学与政治月刊《欧洲通报》（1866—1918）的发行人，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米·马·斯塔休列维奇（1866—1908）；另一个是文学、社会与政治刊物《现代人》的发行人，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按：下文谈到的两种杂志，前者似即《欧洲通报》，后者即《现代人》。前者创办于1866年，后者则在1866年被迫停刊。

结束自己的存在；但是当时，在那个早晨，这个杂志的出版人还不知道，他的刊物已经接近尾声了。于是我同这位发行人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要单独谈话。

我不说出他的姓名，我只想说，我同他在一生中的第一次见面[①] 气氛是非常热烈、异乎寻常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能，他也会记住。那时他还不是杂志发行人。后来，发生了很多误会。我从西伯利亚返回之后，我们很少见面，有一次，他匆忙地对我说了十分热情的话，顺便给我看一些诗——他写过的最好的诗。补充说一句，从外表和习惯看，没有比他更不像诗人的人了，何况还是出自“受苦受难者”的诗人。然而，他却是我们最热情、最忧郁、“受苦受难”最多的诗人之一。

“我们狠狠批评了你。”他对我说（就是在他的杂志上批评《罪与罚》）。

“知道。”我说。

“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吗?”

“应该是为了原则。”

“是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②]。”

我惊讶得发了呆。

---

① 指涅克拉索夫，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见面是在 1845 年，当时他同德·格利戈罗维奇在通宵读过《穷人》手稿后，大清早一起去看作者，向他表示自己的狂喜心情。

②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1856—1862 年为《现代人》杂志领导人之一，继承并发展了别林斯基的传统，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在哲学上主张人本主义唯物论。1862 年被捕，1864 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服苦役，直至 1883 年获释。著有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论文与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和《序幕》（约 1867—1869）。

“某某，就是写批评文章的人[1]，”这位发行人继续说道，“对我说：‘他的长篇小说写得好，可是，他两年前在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里，无耻地嘲弄不幸的被流放者[2]，还丑化他，因此，我狠狠地批评了他的长篇小说。”

“可是，这不就是关于《鳄鱼》[3] 的那些无聊的诽谤吗？——我一明白过来就大声叫嚷起来。——难道您相信吗？您亲自读过我的中篇《鳄鱼》吗？”

“不，没有读。”

“这全都是诽谤，最卑鄙的诽谤，没有比这更卑鄙的了。需要有布尔加林[4] 那样的智慧和艺术嗅觉才能在这篇仅供消遣的小玩意儿的字里行间找到那种‘人身’的讽喻，而且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您该知道，这种牵强附会是多么愚蠢！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宽恕自己，因为两年以前，这种诬蔑刚刚出笼时，我没有提出抗议，反对这种下流的诬蔑！”

我同现在早已停刊了的杂志的发行人这次谈话发生在七年之前，可是我至今还没有对“诬蔑”提出抗议，——有时是不在乎，有时是“没有时间”。然而，强加于我的这种耻辱就是这样留在某些人士的记忆中，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文学团体中传播，还流传到读者里面，已经不止一次给我带来不快。

---

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格·扎·叶利谢耶夫，他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发表的《罪与罚》头几章中攻击并诽谤进步的青年大学生。

② 下文提到的是中篇小说《鳄鱼》，它发表时（1865），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流放中。

③ 《鳄鱼》（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影射手法嘲笑车尔尼雪夫斯基。

④ 法·维·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曾向俄国政府第三厅写过告发文学家的告密信，出版反动报纸《北方蜜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数次嘲笑他没有艺术嗅觉。

现在这一切都该说说了，即便是说一句话，何况现在说正是时候，虽然有点儿空口无凭，但是，应该推翻那更是极端空口无凭的诬蔑。我长期的沉默和满不在乎的态度，直到现在，似乎还在证明这种诬蔑的可信。

我同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见面是在1859年，我从西伯利亚返回的第一年，地点与情况不记得了①。此后有时也相遇过，但很少；交谈过，但也不多。见面时总是相互伸出手来。赫尔岑对我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留给他的印象是不愉快的，显然是外表和风度的印象。我是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外表和风度的。

一天早晨，我发现住房门的锁上插着一张传单，当时这种传单相当多；这一张是最富特色的传单之一。传单标题是《致年轻的一代》②。简直想象不出比这些传单更荒谬、更愚蠢的了。内容令人气愤，形式又极可笑，只有最憎恨他们的人，为了糟踏他们，才能够想得出这种形式。整整一天我极其懊恼，非常苦闷。这一切在当时都还是初见，却又那么近在身边，要想仔细观察一下这些人当时都还很困难。其所以很难，就是因为令人难以相信，在这一片纷乱之下隐藏着那么肤浅的东西。我不是指当时的运动，不是指整个运动，我只是说一些人。至于说运动，这曾是令人苦恼的、病态的现象，但又是由于历史

① 他们俩的会面不可能在1860年之前。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59年12月中旬以后回到彼得堡的。据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们是在1862年第一次见面的。

② 出现于1861年9月，作者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尼·瓦·舍尔古诺夫（1824—1891）与米·拉·米哈伊洛夫（1829—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记错了。他说的传单当为《青年俄罗斯》，作者是彼·扎伊契涅夫斯基，是在1862年5月散发的。这份传单宣扬布朗基的革命纲领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的逻辑性而导致的注定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将在我国历史的彼得堡时期写下自己严肃的一页。我觉得，这一页到现在还远未写完。

至于我，我的整个身心早就与这些人、同他们的运动思想分道扬镳了，——我当时突然感到郁闷，几乎是为他们的笨拙感到可耻：“他们怎么会干得那样愚蠢，那样笨拙？”此事同我有何相干？我并不为他们的失败而惋惜。其实，散发传单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直到现在也都不认识；但是令人苦恼的是，我以为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不是与我毫无关系的那些人的拙劣把戏。这里有一件事是令人沮丧的：教育和发展的水平，还有对现实的某种理解水平，都极其使人沮丧。我在彼得堡虽然已经居住了三年，看惯了各种现象，——那天早晨的传单还是使我震惊得不知所措，对我来说似乎完全是出乎意外的新发现：在那天之前我从未想象到竟有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令人吃惊的正是传单的低劣程度。傍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之前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想过要去，他同样没有到我这里来过。

我记得，这是在下午五点左右。我碰上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一个人在家，连一个仆人都不在，是他自己给我开的门。他见到我时异常高兴，把我带进自己的工作室。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这是什么东西？”——我掏出传单。

他接过传单，好像拿到他毫不知情的东西读了起来。一共才十行。

“喂，怎么啦？”——他略带笑容地问道。

“他们真的那么愚蠢可笑吗？难道不能制止他们，让他们停止这种讨厌的勾当吗？”

他极其郑重地回答说：

“难道您以为我同他们合作，并且认为我会参与编造这种传单吗?”

“恰恰不是这样想，——我回答。——我想这是无须向您证明的。但不管怎样也要想方设法制止他们。您的话对他们是有分量的，当然，他们是畏惧您的意见的。”

“他们这些人我谁都不认识。”

“对此我也相信。但是，完全不必认识他们，也不必亲自同他们谈话。您只须在任何场合大声说出您的反对意见，就会传到他们的耳朵。”

“可能也不会起作用。而且这些现象作为一些派生的东西，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对一切都是有害的。”

这时有另一位客人叩门，不记得是谁了。我就告辞。我认为，我有义务说明，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谈话是真诚的，我那时就像现在这样完全相信，他没有与散发传单的人“合作”。我的感觉是，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并不讨厌我去探望他；几天之后他就证实了我的感觉，他到我这里来了。他在我这里坐了一个小时左右，应该说，我很少遇见比他更随和、更热情的人，所以我奇怪，关于他的性格为什么有那样一些议论，说他似乎生硬、孤僻。我开始明白，他愿意结识我，我记得，这也使我感到愉快。此后我又去过他那里一次，他也到过我这里。不久，由于我的某些情况，我移居莫斯科，一住就是九个月。已经开了头的交往就那样中断了。后来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被捕和流放。关于他的事情我就再也无从知道什么了，直到现在也还什么都不知道。

过了一年半之后，我产生了写一篇幻想小故事的念头，想

模仿果戈理的短篇小说《鼻子》。我还从未试过写幻想形式的东西。这纯粹是为了取笑的文学游戏。不过确实也有几个可笑的情景，我想加以发挥。虽然不值得，不过我把故事情节说说，后来从这件事引出的一切就可以理解了。当时在彼得堡的游廊商场有个德国人展出一条鳄鱼，观看要付钱。彼得堡的一个官吏，在出国之前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和一位形影不离的朋友到商场去看鳄鱼，当时大家都想看看鳄鱼。这是一位中等身份的官吏，但他属于拥有某种独立地位的人，年纪还轻，自尊心却极强；他首先是个傻瓜，就像丢掉自己鼻子的令人难忘的科瓦廖夫少校[①]。他对自己的高贵身价迷信到可笑的程度；他稍有教养，却以为自己几乎是个天才，而在自己工作的部里他被认为是最无足轻重的人，常常因为被大家忽视而感到受侮辱。似乎为了对这一切进行报复，他肆意摆布自己那位意志薄弱的朋友，向他炫耀自己的智慧。这朋友憎恶他，却又忍受一切，因为他暗暗地爱上了这官吏的妻子。这位太太年轻美貌，纯彼得堡型的女人，中等身份的、好卖弄风情的、有点傻气的女人，她观看同鳄鱼一起展出的猴子，看出了神。她的天才丈夫好像是在挑逗一直如同一段木桩躺在那里睡觉的鳄鱼；鳄鱼突然张开大口把他整个吞了下去，落得个尸骨无存。很快就清楚了，这个伟人并未受任何伤害；不但如此，他凭着他特有的那种固执脾气，从鳄鱼肚子里声明说，他坐在里面很舒服。朋友和妻子都跑开去求长官解救他。为此就确实需要杀死鳄鱼，剖开肚子，救出伟大的人物；当然，这就要付给鳄鱼的主人德国人和他的时刻不离的妻子一笔报偿。德国人开始是愤怒和绝望，他担心他的鳄鱼会因吞食“官吏汉斯”而死掉；但是他很

① 果戈理的短篇小说《鼻子》的主人公。

快就明白过来，被鳄鱼吞下腹后仍然活着的彼得堡政府官吏今后可以在全欧洲给他带来一笔巨额收入。他要求昂贵价款作为鳄鱼的代价，此外，还要求俄罗斯上校的头衔。从另一方面说，长官也遇到不少难题，这是部里最新鲜的事件，迄今为止还没有过先例。“如果我们有从前类似的先例可循，那就可以处理了，否则就很难办。”值得长官怀疑的是，官吏是否由于某些被禁止的自由主义倾向而钻进鱼腹的。夫人也发现，“类似孀妇”的处境也不无乐趣。陷身鱼腹的丈夫同时也向自己的朋友坚定地声明说，置身于鳄鱼腹内比在工作职位上，好得无法比拟，因为现在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人们注意自己，这是他过去办不到的。他坚持要求妻子举行晚会，把他和鳄鱼装进箱子里一起运到每场晚会上。他深信，整个彼得堡和全部国家要人都会奔到这些晚会上，以便一睹新的西洋镜。他盘算着在晚会上得到好处：“我要宣讲真理并且教导人们；向政府官员提建议，向部长显示我的才能。”——他说着说着就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人，已经有权力向人们提出各种建议并做出裁决。朋友向他提出审慎的、然而却恶毒的问题：“如果由于某种意外的、但应该想象到的过程而被消化掉，变成某种人所共知的东西，那时该怎么办?”伟大的人物回答说，他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他将愤怒反抗这种由于自然规律完全可能的现象。妻子虽然对举办晚会的主意感兴趣，但她不同意举办晚会的目的：“我的丈夫怎么能给装进箱子运送给我?”——她说。况且她愈来愈喜欢这种类似孀妇的处境了。她产生了兴趣；她博得了同情。丈夫的长官来看望她，同她玩叫王牌打法的纸牌……这就是这篇滑稽小说的第一部分——小说还没写完。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把它写完，现在我已经把它忘记了，需要重读一遍才能回想起来。

然而，从这篇小东西中竟引申出这样的事。这篇小说在《时世》杂志[1]上刚一出现（1865年），《呼声报》突然在杂文栏登出奇怪的短评。全文我记不起来了，而且这也会扯得太远，文章大意似乎是，"《鳄鱼》的作者走上这条道路是徒劳无益的；它既不会给他带来荣誉，也不会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好处"，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接着就是几句含混不清的恶意挖苦。我匆匆看了一遍，什么也没弄明白，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是许多恶言恶语，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篇含混不清的短评本身，显然不会给我造成什么伤害；读者总归也会像我一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可是，一个礼拜之后，尼·尼·斯特拉霍夫[2]突然对我说："您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样想的吗？他们确信，您的《鳄鱼》是一篇隐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的故事，认为您想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形象展示出来，嘲笑他一番。"我虽然也吃惊，可是不太在意；什么样的猜测没有呢？我觉得，这是极个别人的看法，过于牵强，不会有市场，我也以为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反驳。对此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这种看法扎下了根，产生了影响。Calomniez, il en restera toujours quelque chose.[3]

其实，我就是现在也深信，那篇小说里根本没有什么诽谤，——再说，为什么要诽谤呢？在文学上我几乎没有同任何人争吵过，至少是没有大吵过。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二十七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兄共同创办的杂志，1864年其兄逝世后即由他单独主持。

② 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政论家、文学批评家、斯拉夫主义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著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1部）。

③ 法文：诽谤吧，总会留下一点儿什么。

年的文学生涯中，我总共是第二次自己谈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纯粹是愚蠢，是一种阴暗的、疑神疑鬼的愚蠢的想法在作祟，它已经深入某人的“派性”的头脑中了。我深信，这个煞费苦心的头脑直到现在还完全确信他没有错，认为我一定是嘲弄了不幸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还深信，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能以任何解释与道歉改变这个头脑的观点，使他相信我。正因如此，这个头脑才称得上是煞费苦心。（当然，我说的不是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①]；他作为自己的报纸的编辑和发行人，在这件事情上也同往常一样，是袖手旁观的。）

隐喻所指是什么呢？当然啦——鳄鱼表现的是西伯利亚；自命不凡的、轻浮的官吏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落进鳄鱼的肚子，还依然幻想教训全世界。他那位可以任人摆布的没有主见的友人，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的那些朋友。官吏的妻子，那个为自己的“类似孀妇”的处境而高兴的、美貌但却有点傻气的女人，就是……[②] 可这是多么卑鄙龌龊，我不想玷污我的笔来继续剖析隐喻了。（但是，隐喻已经流传开了，而流传的可能正是最后那个暗示；我有毋庸置疑的证据。）

这就是说，人们假定，我，自己是一个过去曾被流放的判处苦役的人，看到另外一个“不幸的人”被流放而感到高兴；不仅如此，甚至还对这件事写了幸灾乐祸的诽谤文字。但是证据何在呢？在隐喻里吗？那么就按照您的意思拿些作品给

① 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新闻工作者、出版家、《呼声报》的主编与发行人。按：上文说过，批《鳄鱼》的短评发表在《呼声报》上。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鳄鱼》被许多人认为是隐射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事，比较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进行辩解，但迄今仍然成为疑案，未能澄清。

我……《狂人日记》[1]、《上帝》[2]、《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3]、费特的诗歌[4]——随您的便——我保证在您选定的头十行里立即找到关于普法战争[5]的隐喻，或者对演员戈尔布诺夫[6]的诽谤。总之，可以是对任何人的诽谤，可以是对您指定的任何人。请想想，在从前，比如说，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书刊检查官检查书稿和底稿：没有一处字里行间不被怀疑暗含着什么东西、什么寓意。最好请从我的全部生活中提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东西来，证明我像恶毒而冷酷无情的诽谤者，证明可以从我这里找到那种隐喻。

事实正好相反，迫不及待地做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论断足以表明指控者本人的灵魂有些卑鄙，表明他们的观点粗暴、不人道。任何猜测，即使是最坦诚的，那也是不可原谅的；为什么？坦诚也可以是卑鄙的，就是这样。

是不是我本人憎恨车尔尼雪夫斯基呢？为了预防这种指责，我在前面有意谈了我们短暂的和愉快的交往。人们可以说——这说明不了什么，说我内心怀有憎恨。但请摆出这种憎恨的理由来，如果他们有什么可以公之于众的事实。可没有这种事实。另一方面，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天能够读到我写的这篇东西，我相信，他会证实，关于我们的交往我写的是确实的。愿上帝使他有可能这么做。我也热切地盼望这一天，如同我曾为他的不幸真诚地惋惜过，现在仍然感到惋惜一样。

---

①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中篇小说。
② 俄国诗人加·罗·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
③ 又名《1612年的俄罗斯人》（1829），俄国作家米·尼·扎戈斯金（1789—1852）的历史小说。
④ 阿·阿·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
⑤ 1870—1871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
⑥ 伊·费·戈尔布诺夫（1831—1895），俄国演员、作家。

然而，能否由于信念而憎恨呢？

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以自己的信念开罪过我。同一个人的意见截然相左时，也可以非常尊重这个人。我不会说毫无根据的话，我甚至还有小小的证据。在业已停刊的《时世》杂志的最后几期中，有一期（差不多是最后一期）刊登了一篇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1]的大文章，这篇出色的文章是一位名家的手笔[2]。文章怎样呢？在文章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智慧和才能做了足够的、应有的评价。关于他的小说本身评论尤为热情。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非凡智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在我们这篇文章中谈论的只是他的智慧的特点与趋向，文章本身的严肃性就说明，我们的批评家充分尊重他所分析的作者的尊严。现在你们应该同意：如果由于信念而憎恨他，显然，我就不会允许在杂志刊登怀着充分敬意谈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实际上，编辑《时世》杂志的毕竟是我，而不是别人[3]。

也许，在发表这篇辛辣的讽喻时，我希望取悦于某处的 en haut lieu[4] 吗？但是，关于我，谁能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我什么时候，在某一 lieu[5]，谄媚过别人，也就是出卖过自己的笔。我甚至认为，这一猜测的作者本人尽管很单纯，但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指责的仅止于此，这种猜测在文学界无论

---

① 发表于 1863 年。

② 这里的“名家”多半是指尼·尼·斯特拉霍夫。但是，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对《怎么办?》同时持批评态度；而且因《时世》停刊，该文发表于《读者文库》(1865 年，第 2 期)。

③ 按《时世》杂志的名义上的发行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故云。

④ 法文：在上层。

⑤ 法文：地方。

如何也不可能有市场。

至于说，可能指责我在诽谤性的隐喻中影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的某些家庭情况，那么我要再次声明，为了不玷污自己，我不想从这个角度去做我的“辩解”……

我很懊恼，我竟在这一次谈起自己来。这就叫写文学回忆录；我再也不会写它了。十分抱歉，我肯定使读者厌烦了；不过我写的是日记，我个人的部分印象的日记，恰巧在不久之前，我得到一个“文学”印象，它突然间接地使我想起关于我那篇被忘却的《鳄鱼》，被忘却的笑谈。

近日我最尊敬的人们之一、我很重视他的意见的人对我说起：

“我刚刚读过您关于《环境》和关于我们的陪审员的判决的文章(《公民报》，第 2 期)。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您的文章可能引起不愉快的误会。人们会认为，您主张取消陪审制度而代之以新的行政监护的干预……”

我感到惊讶和可悲。说这话的人是极其超脱的人，站在一切文学派别和“隐喻”之外的人。

“难道能够那样解释我的文章吗！这么一来就什么都不能谈了。自从摆脱农奴制桎梏以来，人民的经济和道德状况是极其恶劣的。确切无疑的极度令人不安的事实时时刻刻都在说明这一点，道德堕落，猥琐庸俗，犹太人酒馆老板，盗窃和白昼抢劫——这一切都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一直还都在上升，上升。怎么办呢？如果有的人心神不安，动笔写出来，——难道就能对之大喊大叫，说他是农奴主，说他主张退回到农奴制吗？”

“无论如何也希望人民有充分的自由，自己从可悲的处境中挣脱出来，不要任何监护和倒退。”

“必须这样，这也正是我的想法！我是说，如果发生了某种真正的、毋庸置疑的人民不幸，道德上的某种大堕落、大灾难（他们自己有时也仔细观察自己，现在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堕落了，堕落了！’）——那时人民必将自己拯救自己，并且拯救自己和我们，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了，人民的全部历史就是证明。这就是我的想法。这就是说——不需要干预了！……但是，这些话会被如何理解和解说呢。也许，又碰上隐喻！”

## 弗　拉　斯

（《公民报》，1873 年 1 月 22 日，第 4 期）

您还记得弗拉斯① 吗？我隐隐约约想起了他。

身穿翻领呢大衣，
头顶没帽子，
慢腾腾地满城走
白发老伯弗拉斯，
胸前挂着铜圣像：
化缘造庙宇……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弗拉斯，从前“不相信上帝”。

……用毒打
把老婆赶进棺材，
打家劫舍的盗马贼，
却被他隐藏起来。

连盗马贼都藏起来，——诗人操着虔诚老太婆的口吻吓唬我们。多大的罪孽呀！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弗拉斯病倒了，他看见了幻景，从这以后他发誓走出去乞讨，攒钱建造庙

① 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诗作《弗拉斯》（1855）中的主人公。下文引用的都是《弗拉斯》中诗句。

宇。他看见了地狱：

他见到过朗朗乾坤，
他看见过地狱的罪人：

忙忙跌跌的魔鬼折磨他们，
老女妖-淘气鬼在刺他们，
一个个傻瓜——全身黑糊糊
两眼也像黑炭。

有些人被串在长竿上，
有的人在舔灼热的地板……

一句话，无法想象的恐怖，甚至连读起来都觉得可怕。“但是用笔墨是写不全的”，——诗人继续说道：

朝圣的香客，全都是聪明的娘儿们，
她们能讲得更好些。

诗人啊！（可惜，我们真正的诗人）如果您不是以赞赏的态度对待人民，您说人民：

朝圣的香客，全都是聪明的娘儿们，
她们能讲得更好些，——

那么您的结论就不会使我们受到侮辱，您的结论说，由于那些终归是娘儿们的鸡毛蒜皮。

上帝的庙宇拔地而起
耸立在亲爱的土地上

虽然弗拉斯由于自己的“愚昧”才背起行囊到处奔走，但是您毕竟理解他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他那庄重的身影总还是使您为之惊叹不已。（您是诗人，不可能不这样。）

心灵的全部伟大力量
都用在上帝的事业上，——

您说得太妙了。顺便说一句，我愿意相信，您加进去的嘲笑是不得已的，是出于自由主义的恐惧，因为弗拉斯这种可怕的、甚至令人生畏的、甘心驯服的力量，这种自我拯救的要求，这种渴求忍受苦难的强烈欲望震撼了您，一般的人和俄罗斯的 gentilhomme①，以及庄重的人民的形象，迫使您从高度自由主义的心灵里发出赞叹和敬意！

弗拉斯散尽了家产，
自己落得个片瓦不存
为了建造上帝的庙宇
自己动身到处去募化。
从那时起庄稼汉浪迹四方
转眼就将三十年，靠着人家的施舍度日
严格恪守自己的誓愿。

---

① 法文：贵族。

…………

黝黑的面孔、高大笔直的身躯
满怀着无可告慰的悲痛，

（妙极了，多么好啊！）

他迈着不慌不忙的脚步
走遍村庄，走遍城镇。
…………
他挂着圣像，捧着圣经，
自己跟自己自言自语
肩上的铁枷锁[1]
每一步都发出低沉的响声。

妙极了，妙极了，多么好啊！好得简直不像您写的；此后，似乎不是您，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代替您，在一篇关于纤夫的诗歌《在伏尔加河上》[2]、同样是关于纤夫的瑰丽诗篇中写下了耸人听闻的诗句。可是——您即使在《在伏尔加河上》也没有想耸人听闻，也许多少有一点，因为您在伏尔加河上也是爱纤夫身上的一般的人，确实也在为他们而痛苦不堪，也就是说不是为纤夫本人，可以说是为一般的纤夫。您明白了吧，爱一般的人——这就必然要蔑视、有时还要憎恶站在您身边的真实的人。在您这篇诙谐的（请原谅，这是从整体来说）诗篇

① 古时俄罗斯的苦行僧和自愿以苦难折磨自己、以受苦赎罪的人，均在肩上戴铁枷锁。
② 也是涅克拉索夫的诗作。

中，我特意着重指出这些无与伦比的优美诗行。

我之所以想起诗歌中的这个弗拉斯，是因为近来听到关于另外一个弗拉斯的奇异惊人的故事，这是两个完全独特的、迄今从未听说过的弗拉斯。这是真实的事件，只从其异乎寻常这一点来看，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件。

据说，在罗斯①，各修道院里现在是另一类苦行僧和修士——听忏悔的人和拯救灵魂的人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需要这些修士还是不需要，对此现在我不想加以议论，我也不是为此而动笔的。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之中，如果故事是以修士为主的，那就不能从故事中把修士抛开。这些修士——拯救灵魂的人有时好像有高深的学问和智慧。至少人们是这样谈论他们的；我则毫无所知。据说，他们里面有些人具有洞察人的心灵并且善于疏导人的心灵的惊人本领。还说，有几个人在全俄罗斯都出了名，其实是在需要他们的人里面出了名。比如说，这个老人住在赫尔松省，前来找他的人则有来自彼得堡的、阿斯特拉罕的、高加索的和西伯利亚的；有的乘车来，有的则徒步前来。当然，来的都是些心灵承受着绝望的折磨，已经失去治愈希望的人，或者是心灵上压着可怕重负的罪人，他不是由于恐惧或者不信任，纯粹是由于对自己得救的可能完全绝望，而不向自己的神父忏悔的人。他忽然听说有这样一位拯救心灵的修士，便来找他。

“您看，”——其中的一位老人，有一次在同他的一位谈话者单独谈心时说，——“我听人们忏悔已经二十年了，您信不

① 即俄罗斯。

② 俄语原文为советодатель，即听取自称有罪者或作恶者的忏悔，并对其进行开导，解脱心灵困境的神父或游方僧，故译为拯救灵魂的人。

信，二十年，看起来，我该熟悉了多少人的心灵的最隐秘、最复杂的病痛；可是，过了二十年，在倾听别人的秘密时，你自己有时竟也战栗起来，愤怒起来，失去了为安慰别人而必需的平静心情，自己也不得不竭力使自己保持温顺和镇静……”

于是他就讲述了我下面提到的那个来自人民生活的令人惊诧的故事。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庄稼汉向我匍匐而来。我从窗子里观察他怎样在地上爬行。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不能得救啦；我是被诅咒的！你不管怎样说——我都是被诅咒的！’

“我尽量安慰他。看得出，这个人是由于痛苦而爬行前来的，来自很远的地方。

“‘村子里我们几个小伙子聚在一起，——他开始说道，——互相争论起来’。‘比试谁的胆子最大？’我出于傲气在众人面前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我推开，还面对面地对我说：

“‘你绝对做不到像你说的那样。你吹牛皮。’

“我向他发誓。

“‘不，等一等，你发誓，’他说，‘用死后自己的灵魂拯救起誓，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我发了誓。

“‘现在快到大斋了，’他说，‘你去祈祷。到领圣餐时，去领圣餐，可是不要吃下去。把圣餐用手拿起来，藏在手里——就走出来。然后还做什么，听我的吩咐。’

“我照他说的做了。他把我从教堂一直领到菜园里。他拿一根杆子，插到地上，又吩咐我：‘放在杆子上面！’我就把圣餐放到杆子顶上。

“‘现在，’他说道，‘把枪拿来。’

“我取来枪。

“‘装上子弹。’

“我装上了子弹。

“‘举起枪，向天上放。’

“‘我举起手来，向上瞄准。正在要放的时候，我的眼前好像突然出现一个十字架，架上钉着耶稣。那时我就拿着枪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这是他来找老人之前几年发生的事。这个弗拉斯是谁，他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当然，老人都隐瞒不说，就像他所听到的忏悔一样。弗拉斯以为受的罪越多越好：“为了折磨自己，我爬着来了。”看来，巨大的痛苦压在他的心灵上，已经是非人力所能承受的。这里发生的事情，从一方面看，确实是很有特点的，能说明很多问题，因此，或许值得花上两三分钟特别加以分析。我的看法始终是，讲出决定性的话的是他们这些人，是忏悔的和没有忏悔的、形形色色的弗拉斯们。最终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不是彼得堡。因此，关于这些现在已是“新人”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细小的新的特点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我感到的就是惊讶——最令我惊讶的是事情的开端，这就是在俄罗斯的农村里，“谁比谁更大胆?”这类争论和较量的可能性：这是说明许多问题的事件，对我来说则是几乎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我看到过的人够多的了，而且都是最有特点的，我要指出的是，这一事件看起来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性恰恰就证明它的可信性：因为人们在说谎时，为了使人们相信，编造的都是非常平凡的事情或者近乎日常的事情。

其次，这件事情的医学方面也是不同寻常的。幻觉主要是病态现象，这种病症是十分少见的。虽然极端兴奋的人有突然出现幻觉的可能性，但在完全健康的人中间，可能这还是闻所未闻的情况。不过，这是医学方面的事，我知道的很少。

这件事情的心理方面则是另一回事。这里，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两种人的类型，它们都从整体上向我们高度表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首先这就是在一切事情上不顾任何准则。（还请注意，这种肆无忌惮的作为几乎总是片刻之间的，一闪念的。作为某种难以理解的现象而出现的。）这就是要求做得过分，要求全神贯注，如同走到悬崖边缘，探出半个身子张望无底深渊，——有些时候，其实这种时候是常有的，——像痴呆的人一样一头栽下去。这就是要求人做出否定，要求有时什么也不否定的、虔诚笃信的人做出否定，否定一切，否定自己的心灵最珍视的东西，否定自己的整个理想，彻底否定人民所珍视的一切，而这一切他刚才还对之顶礼膜拜，转瞬之间，似乎就变为他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特别惊人的是，俄罗斯人的匆促性和急迫性，有时急于显示自己，在自己的或者人民生活的某些特殊的时刻，急于从好的方面或者坏的方面显示自己。这种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匆促与剧烈的态度令人特别震惊，有时简直失去了自制能力。无论是爱情，也无论是酒，或者是胡作非为、自尊心、忌妒——有的俄罗斯人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甘愿割断一切，抛弃一切，抛弃家庭、习俗与上帝。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只要他一落进这股激流，也就是癫狂的、急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这个对我们来说致命的激流，他就会突然变为极坏的歹徒和罪犯，而这种旋涡又是在生活的某些紧急时刻俄罗斯人民性格习以为常的。但是，一般地说，当俄罗斯人走到最后的一步，也就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如同整

个人民一样，能以那样的力量、那样急转直下的速度和那样的自我保全与忏悔的渴望，自己拯救自己。特别突出的是逆向的推动力，向着改正和自我拯救的推动力总是比从前的冲动——否定和自我毁灭的冲动更为认真。通常认为这是只堪鄙视的意志薄弱；然而俄罗斯人是以艰巨的、严肃的努力求得改正的，以蔑视自己的态度看待自己从前的否定行为。

我认为，俄罗斯人民最主要、最根本的精神要求就是要求处处事事都承受永远的、无休止的苦难。看来，他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这种承受苦难的强烈欲望。承受苦难的倾向贯穿于他的全部历史，这不仅仅是由于外在的不幸和灾难，而是从人民自身的内心迸发出来的。在俄罗斯人民的幸福中甚至都一定含有苦难的部分，否则对他来说幸福就是不完全的。他从来没有，即使在他的历史上最得意的时刻也没有表现过自豪的、喜形于色的样子，而是表现出痛苦得令人怜悯的样子；他叹息，把自己的荣耀归之于上帝的赐予。俄罗斯人民似乎欣赏自己的苦难。一般地说，存在于全体人民中的东西，也存在于个别人物的身上。请看形形色色的俄罗斯的不轨之徒。在他们身上不只是毫无节制的胡作非为，这种胡作非为有时以其极度的放肆与心灵堕落的丑恶程度而令人吃惊。这种不轨之徒自身首先就是一个受难者。俄罗斯人全然没有那种幼稚的自鸣得意，就连愚鲁的人也是如此。可举俄罗斯的醉鬼与德国的醉鬼为例：俄罗斯的醉鬼比德国的更下流，但是醉酒的德国人比俄罗斯的醉鬼更愚蠢，更可笑。德国人——基本上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傲慢的人民。在喝醉了的德国人身上，表现出他的人民的这些基本特点，他喝得越多，表现越突出。喝醉的德国人无疑是幸福的人，他从来不哭泣；他唱的是吹嘘自己的歌，觉得自己了不起。回到家中已烂醉如泥，却仍然是傲慢的。俄罗斯醉鬼喜欢

在苦闷时喝酒，还喜欢哭。即使吹牛，也不夸耀，而是胡诌瞎扯。总是回想起曾经遭受过的屈辱，指责使他受辱的人，不管这个人在场还是不在场。也许，他无所顾忌地证明自己差不多是个将军，谁要不相信，他就痛骂一顿，为了使人相信，最后总是以喊“卫兵”而收场。他之所以那样丑态毕露，他之所以喊“卫兵”，是因为他在自己的醉醺醺的心灵深处大概清楚地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将军”，只不过是一个讨厌的醉鬼，他把自己糟蹋得比牲畜都脏。在显微镜下般的小小事例中看到的，也能在大的事例中见到。最坏的不轨之徒，甚至那种以自己的举动粗鲁和别出心裁的罪恶而见称的不轨之徒，即使有些蠢货以他为榜样而效法他，他也会靠自己丑恶心灵深处的某种嗅觉而感知，归根结蒂，他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个无赖，仅此而已。他对自己不满，在心中怨言丛生，于是为此而对周围的人进行报复；向所有的人发泄狂怒，于是走到极端，一方面他同自己心中日积月累的苦痛做斗争，与此同时似乎又自我欣赏似的，陶醉于自己的苦痛之中。如果他有力量从自己的屈辱中站立起来，那么他为自己过去的堕落而自我谴责。他在胡作非为时也曾由于不满自己而产生内心痛苦并为此而迁怒于人。但他对自己过去堕落的自我谴责比起那时的迁怒于人来要强烈得多，痛苦得多。

是谁挑起两个小伙子争论：“谁更胆大?”这种较量的出现是什么原因促成的——这都无从知道，但是两个人肯定都在痛苦——一方接受挑战，另一方提出挑战。显然，这里是有某种前嫌的：或者他们之间暗怀敌意，或者是童年时期就有的，他们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憎恨在争论和挑战的关头忽然流露出来。更可能的是：在此之前他们大概是朋友，和谐相处，可是越往后他们彼此就越变得无法忍受；在挑战的时刻，相互憎恨的强

烈，牺牲者对自己的梅菲斯特[1]的忌妒已经是非同寻常。

“我什么都不怕，你说什么，我都能做到；豁上命也要让你丢脸！”

“你吹牛，你要溜掉的，就像耗子往地板底下钻一样，就是豁上命，也要看你的笑话！”

本来为了较量可以选择其他更为莽撞的行为——抢劫、杀害或公开斗殴以反对强壮有力的人。既然小伙子发誓什么都敢做，他的蛊惑者就知道，这次说的是认真的，真的能做到。

不，蛊惑者觉得即使是最可怕的“莽撞的行为”也嫌太平常了。他要想出从未听过、从未有过以致不可想象的莽撞的行为来，于是在他的选择中就反映出人民的整个世界观。

不可想象吗？然而他看中了的正是这件莽撞的行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可能他已经想到过它。可能很早以前，在童年时期，这个梦幻就已潜入他的内心，梦幻的可怕使他战栗，同时他又体会到痛楚的愉悦。一切，包括枪支和菜园在内，他早已盘算过，不过都严守秘密——这差不多是毫无疑问的。显然，他心中盘算的并不是要去做的，可能他一个人永远也不敢去做。这种幻象只是使他感兴趣，它不时地潜入他的内心，引诱他，他也战战兢兢地进入过圈套，但又立即退缩出来，吓得全身发凉。为了一次这种从未听说过的莽撞的行为，豁出一切也值得！不必说，他相信，为了这件事，他将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我毕竟是登上过顶峰！……”

有很多事可以是没有意识到的，只能是感觉到的，有非常多的事情是无意识地认识到的。这不是好奇的心灵吗？主要的

① 德国作家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魔鬼。这里指诱人犯罪的人。

是，它来自这种生活。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要知道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自己比自己的牺牲品罪过更大，还是没有罪？根据他似乎有的教养来判断，应该说，他认为自己更有罪，至少是罪过相等；因而，他在向牺牲品提出“莽撞的行为”的挑战时，也是在向自己挑战。

据说，俄罗斯人民不熟悉圣经，不知道基本的信条。确实如此，但是，自古以来他就知道基督，把基督铭刻在自己的心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关于信仰的学说，怎样可能有关于基督的真实理解呢？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基督有出自内心的领会和真实的理解，这是无须怀疑的。这种认识代代相传，已经深入人心。可能，俄罗斯人民唯一的爱就是基督，他们是按自己的方式爱基督，也就是一直爱到受苦受难。东正教在信奉基督的真诚方面超过所有其余的人，俄罗斯人为东正教这个名称而无比得自豪。再说一遍：可以无意识地知道很多事情。

凌辱人民的圣物，从而与整个大地决裂，永远毁灭自己，仅仅是为了以否定和高傲取得片刻的胜利——俄罗斯的梅菲斯特再也想不出比这更莽撞的事情了！在普通老百姓的内心中竟可能有这种强烈的欲望，可能有这种阴森复杂的感受，这是多么惊人！还应注意，这一切几乎发展为自觉的思想了。

但是，牺牲者并不认输，不屈服，不害怕。至少是装出一副不害怕的样子。小伙子接受了挑战。一天一天过去了，他毫不动摇。降临的已经不是梦幻，而是事实本身：他上教堂，每天都听基督的话，仍然不认输。有一些可怕的杀人犯，他们面对被他们杀害的牺牲者时也面不改色。在这些凶手之中，有一个被当场抓获，证据确凿，他却始终不认罪，对侦察人员说谎。在命令他站起来，把他带往牢房时，他脸上露出深受感动

的表情，像是请求施舍似的，要求允许他同躺在面前的被害者（他因争风吃醋而杀死的过去的情妇）告别。他弯下身去，哀痛吻她，放声痛哭，还没有站起身来，就搓搓手，又重复说，他没罪。我只想说明，人的冷酷无情可以达到何等野蛮的程度。

但是，这里则完全不是冷酷无情的问题。不仅如此，这里还有某种完全特别的东西——神秘的恐怖，压在人的心灵上的巨大力量。神秘的恐怖确实是有的，至少按照事情的结局判断是这样的。但是小伙子的强壮的心灵还能够同恐怖进行斗争；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是力量呢，还是极端的意志薄弱？大概二者都有，两种对立物交织在一起。尽管如此，这种神秘的恐怖不仅没有中断斗争，而且使斗争延长了，可能，也正是它把斗争引向了终结，其原因是它从罪人的内心铲除了任何同情感，这种同情感受到的压力越大，就越难出现。恐怖的感受是一种严峻的情感，它使人的心肠变得冷酷僵硬，不再有任何同情和高尚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罪人虽然由于恐怖而变得麻木、疲乏，还是坚持到了领圣餐的时刻。我也在想，牺牲者和加害于他的人之间的仇恨在这些日子里完全淡薄了。为一时冲动所驱使的人可以怀着病态的狠毒心情憎恨自己、憎恨周围的人和在教堂祈祷的人，而对自己的梅菲斯特的憎恨却最少。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为了合力完成这件事，他们是彼此相互需要的。大概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无力单独做成这件事的。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继续干下去，为什么要承受那么多痛苦？其实，他们不能撕毁盟约。他们的契约一旦被违反，他们彼此的仇恨立刻就会比从前强烈十倍，很可能发生谋杀：受难者杀死加害于自己的人。

就算是这样。可是这与以牺牲换得的恐怖感相比也算不了

什么。问题就在这里，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必定有一种由于自己的毁灭而体会到的恶魔般的愉悦，都要求体验俯身于悬崖边沿、探视谷底那种惊险得喘不出气来的感受，都要求陶醉于自己的莽撞行为造成的惊心动魄的感受。如果没有这些激奋人的、狂热的感受而把事情进行到底，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从“莽撞行为”的较量开始，到面对老人的绝望，——都说明他们不单纯是恶作剧者，不是愚顽的、粗鲁的小伙子。

还请注意，蛊惑者并没有向自己的牺牲者揭开全部秘密：牺牲者从教堂走出来，直至蛊惑者命令他把枪拿来的那一刻，他还不知道拿圣餐干什么。若干天来一直处于神秘的闷葫芦之中，这又一次说明罪人的可怕的顽强劲头。另一方面，这个农村的梅菲斯特表明自己是个不简单的心理学家。

可能，在走进菜园时，两个人都神志不清了吗？但是，小伙子记得往枪里装子弹和瞄准的情形。也可能，正如有的时候人处于恐惧状态中常有的情况，理智虽然清醒，动作则是机械的？我可不是这样想：因为，如果他变成了一具机械，完全是靠惰性而完成他的动作，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出现的幻象；在全部惰性消失之后，一下子就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这不是发生在放枪之前，而是在放枪之后。不，最可能的是，尽管致命的恐惧在随着时间急速增长，意识却始终处于极清醒的状态。牺牲者之所以经受住不断增强的恐惧的压力，我再说一遍，是因为他确实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再看看，往枪里装子弹是一个至少应该引起某些注意的动作。我认为，在这种时刻最艰巨、最难承受的事情就是摆脱自己的恐惧，摆脱压制自己的思想。一般地说，陷于极端恐惧之中的人们是不能摆脱对恐惧的观察的，摆脱不了使他们震惊的事物或思想的：这些事物或思想如同插进泥土中似的竖立

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像着魔似的目不转睛地凝视自己的恐惧。小伙子小心地装上了子弹，这事他还记得；他还记得后来是怎样瞄准的，直到最后一刻的事情他全都记得。可能，他的感受是，装子弹的过程是一种缓解，是他的痛苦心灵的出路，他愿意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到任何外部出路的事物上，即使只有片刻工夫也好。在断头台上被砍头的人就有这种情况。杜巴里[①]对刽子手喊叫："Encore un moment，mon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②] 如果真的再赏给她片刻工夫，那么在这片刻之间她的痛苦会增加二十倍，但她还是喊叫了，请求了。如果设想，我们的罪人装子弹就像杜巴里喊叫"encore un moment"[③] 一样，当然，他就不可能在此后再去注意自己已经摆脱了的恐惧，不可能再继续他的事情，瞄准和放枪。手也就干脆麻木了，不听从他的支配了，枪也会自动从他手中掉下来，尽管他还没有失去意识和意志。

于是在最后的时刻——所有的虚伪，行为的全部卑鄙性质，被看做力量的意志薄弱，道德堕落的一切耻辱——瞬息之间全都从心中冲决出来，在他面前遭到彻底的揭露。难以置信的幻象呈现在他的面前……一切都完结了。

当然，在他的心中会响起审判的雷声。为什么不是自觉地、不是由于头脑和良心的猛醒而响起这种雷声呢？为什么审判似乎是由外在的、与他的灵魂全然无关的事件促成的呢？这是心理学的重大课题，是上帝的事情。对于他，对于罪人来

---

① 玛丽·杜巴里（1743—1793），伯爵夫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的情妇。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为革命法庭处死。

② 法文："请再等一会儿，刽子手先生，再等一会儿！"

③ 法文："请再等一会儿。"

说，这当然是上帝的事情。弗拉斯走上乞求施舍的道路，要去受苦受难。

另外那个弗拉斯，那个仍然留在家里的弗拉斯，那个诱惑者又是怎样呢？传说中没有提到他匍匐前去忏悔的情节，丝毫没有提到他。也许，他也匍匐去了，也可能，他还留在村子里，至今仍然像从前那样生活着，依然喝酒，每逢节日照旧作弄人：因为那个看到幻象的人不是他。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为了报道，为了评论，很想知道他的情况。

为什么还想知道呢？如果他确实是农村的真正虚无主义者，头脑简单的否定者和思想家，没有信仰，以高傲的玩世不恭的态度选择较量的手段，没有体验过痛苦，正像我们在评论中设想的那样，没有同自己的牺牲品在一起经历心惊胆战的时刻，而是以冷漠的好奇心注视着牺牲品的战栗和抽搐，只是为了制造别人的痛苦和人格屈辱，——天晓得，可能，是为了学术观察？

如果在人民的性格中也有这些特征的话（在当前这个时代一切设想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在我们的农村，这就是有些出乎意料的新发现。过去从未听说过类似的特征。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①]的喜剧佳作《切勿随心所欲》[②]中，诱惑者刻画得并不很成功。遗憾的是，在剧中看不到任何真实可信的东西。

当然，这个故事的意义，——如果故事里还有意义的话，——就在于它是真实的。然而仔细观察现代弗拉斯的心灵，有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现代的弗拉斯变化很快。从

---

① 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

②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

2月19日[①] 开始，在他那里，在底层，如同在我们这儿的上层，同样沸腾起来。勇士醒过来了，舒展舒展四肢；可能，他想要纵情畅饮一番，一切都抛诸脑后。据说，他已经纵酒狂欢了。人们在传说着，报纸上也不断刊登种种可怕的传闻：酗酒、斗殴、醉醺醺的儿童、醉醺醺的母亲、恬不知耻、贫困、心术不正、亵渎神灵。有一些严肃而又稍稍有点儿性急的人在思索，有事实依据的思索，如果照这样“胡闹”下去，即使是十年的光景，只从经济的观点看，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一想到“弗拉斯”，我们就放心了：在最后的关头一切虚假的东西（只要有虚假的东西的话），都会从人民的心中倾泻出来，在他们面前受到揭露，受到难以置信的有力的揭露。弗拉斯一旦省悟，他就会想起上帝的事业。如果真的遇到灾难，他总是能够自己拯救自己。拯救自己，也拯救我们大家。因为，归根结蒂——光明和拯救的希望来自底层。（可能以一种全然意料不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面前，这里面将有许多滑稽可笑的东西。）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已有迹象显示出来，具体事实也正在出现……不过，这一点可在以后再谈。无论如何，作为“彼得巢中的鸟”[②]，我们的无能为力现在是显而易见的了。俄罗斯历史上的彼得大帝时代已于2月19日正式宣告结束，因此我们早已迈入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时代。

---

① 指农民改革。在那一天俄国沙皇政府颁布农民改革法令(《1861年2月19日法令》)，废除农奴制。

② 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1898) 中的诗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此诗句比喻由于彼得大帝（1672—1725）的改革形成的有文化的俄罗斯贵族。

## 噼噼啪啪[1]

（《公民报》，1873年2月5日，第6期）

现在我把《一个人的札记》登在这里。这个人不是我，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想，没有必要再写什么前言。

### 一个人的札记

谢苗·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好在前天对我说：

“伊万·伊万内奇，请问，你什么时候能清醒一点儿？”

莫名其妙的要求。我不生气，我是胆小的人；可他们却把我当成疯子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给我画了一张像：“你，他说，总还算是一名文学家。”我听信了，他就把画展了出来。我看到，写的是：“请来看看这张病态的、近似精神失常的面孔。”

就算是这样吧，然而，在报纸上难道应该写得这样粗鲁吗？在报纸上一切都应该是高尚的；要有理想，可是这里却……

至少该说得委婉些，这就是文体的用处。不，他不愿写得委婉。如今看不到幽默和优美的文体了，把漫骂当成了俏皮话。我不生气：发了疯，那还算什么文学家。我写过小说——没人给发表。写了讽刺小品——又遭拒绝。我向各种编辑部送过很多这类小品文，到处都遭到拒绝：“他们说，您不够风趣。”

---

① 本篇有题解，见本卷(《作家日记》）书末附录。

“你莫非要什么风趣，”——我嘲讽地反问。——“是阿提卡风趣[1]吗？”

他竟然不懂。我更多的是给书商翻译法文书。给同人写广告：“稀世珍品！自己种植场的红茶……”给已去世的彼得·马特维耶维奇大人阁下写的颂辞赚了一笔大钱。按照书商的订货编写了《讨太太们欢心的艺术》。这类书我一生写了六本。我想收集伏尔泰[2]的俏皮话，可是又怕我们的人觉得这东西索然无味。现在要什么伏尔泰；当前需要的是笨蛋，而不是伏尔泰！彼此把牙齿全都打掉了！这就是我的整个文学生涯。难道我就老是无偿地往编辑部寄信，还签上我的全名。我不停地给他们忠告和建议，批评他们，还给他们指路。上一个星期，我给一个编辑部寄出了两年以来的第四十封信；仅仅是邮票就花费了四个卢布。我的性格坏透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画家给我画像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我额头上那两个对称的疣：这是少见的事。思想是没有的，现在他们就是靠猎奇。我画像上的两个疣他画得多好，——简直画活了！他们说这就是写实主义。

说起精神病来，去年我们那里把很多人登记进疯人院了。而且是用什么文笔写的！“尽管有，据说，那样独特的才能……然而到最后却……其实，早就应该预料到……”这还是写得相当巧妙的；因此从纯艺术的观点看甚至是可以称赞的。可是那些人回来时突然变得更聪明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使人

---

① 指微妙、机敏的语言风格、俏皮话。阿提卡是希腊雅典所在的半岛的名称，阿提卡风趣亦即希腊风趣。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18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的作品多种多样，有史诗、悲剧、喜剧、诗歌、小说、随笔、政论文、历史著作等。

发疯，我们办得到，可是还没有使任何人变聪明过。

我认为，如果有人在一个月里哪怕有一次把自己叫做傻瓜，那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是当今罕见的才能！首先，至少是傻瓜在一年里有一次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傻瓜，可是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事情竟然混乱到分不清傻瓜和聪明人的地步。他们故意闹成这个样子。

我想起了西班牙人的尖刻，两个半世纪之前，法国人建造了自己的第一座疯人院，西班牙人说："他们把自己的傻瓜全都关进一所特别的房子里，目的是使自己相信，他们自己是聪明人。"事情确实像他们说的：把别人关进疯人院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智慧。"某某疯了，这就是说，现在我们是聪明人。"不，还不是这样。

可是，见鬼……我怎么卖弄起自己的智慧来了：唠叨起来没个完。连女佣都厌烦了。昨天晚上来了个朋友："你的风格，他说，变了，变得粗鲁了。粗言粗语，粗言粗语——加上插入句，然后，插入句中又加插入句，接着又是带括号的句子，再接下去又是粗声粗气的话，粗声粗气……"

朋友说得对。我觉得我变得有些奇怪了。性情变了，头也痛。我开始看到和听到一些古怪的东西。不像是人的声音，好像在我的身边有"噼噼啪、噼噼啪、噼噼啪"的响声。

"噼噼啪"是什么声音？应该散散心。

出去散心，却碰上了丧事。是远房的亲戚。还是一个六等文官。身后留下遗孀，五个女儿都是未出嫁的姑娘。全都是要穿要戴的，日子就得这样过下去了！过去是死者养家糊口，现在——是靠一点儿抚恤金。该把尾巴夹起来了。从来没有热情接待过我。如果不是这种意外情况，我现在也不会去的。跟其

他人一块儿送到坟地；人们都躲开我，都自以为了不起。我的文官制服的确是旧了些。我在想，大约二十五年没有到过坟地了；还有这样的地方！

首先，是气味。来了十五个死人。棺材罩有各种价钱的；还有两辆灵车：一位将军的，还有一位什么太太的。很多悲痛的面孔，也有许多佯装的悲痛，而很多人却公然有说有笑。教士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收入。但是这种气味呀，气味。我可不想做这里的神职人员。

我往死者们的脸上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因为在我的头脑中不容易留下什么印象。有的表情温和，有的难看。总的看来，他们的微笑都是令人不快的，有些人尤其令人不快。不想看；会做梦的。

做完祈祷就走到教堂外面；天灰蒙蒙的，可却干燥。也还有点儿冷；可不是吗，已经是 10 月了。在坟墓中间溜达。各种不同等级的坟。第三等的价钱是三十卢布：还算体面，价钱也不算贵。头两个等级是在教堂里面和教堂台阶下面，太贵了。这一次埋葬在第三等级的一共是六个人，其中有一位将军和一位太太。

向墓穴一看——真可怕：水，多少水啊！全是绿色的……原来是这样！掘墓工一刻不停地用勺子往外舀水。趁着祈祷的工夫转游到门外。那里现在是养老院，再走不远就是饭店。饭店还可以，不错，吃的、喝的全有。里面挤满了送葬的人。看见很多人高高兴兴和发自内心的兴奋。吃了一点儿，喝了一点儿。

后来就加入到抬棺材的人群里，把棺材从教堂抬到墓地。死人装进棺材之后为什么就那样沉重了？据说，是由于某种惰性，身体似乎不能由自己支配了……以及其他类似的荒诞无稽

之谈；这是违反力学和正常思想的①。我不喜欢那种只凭普通的教育去插手解决专门问题；而我们这里却到处是这样。文职人员喜欢议论军事，甚至是元帅们的事情，学工程技术的人更爱议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没有去参加安灵祈祷②。我是有自尊心的人，如果只是由于意外的需要才接待我，那么我还何必去吃他们的午餐，尽管是送葬午餐？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么竟会留在墓地里；在一块墓碑上坐下来，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

开始想到的是莫斯科博览会③，最后想到关于惊讶的问题，总的说来，都是正题。关于“惊讶”，我的看法是：

“对什么都惊讶，当然是愚蠢，无论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讶的姿态要雅观得多，已被公认为优美的风度。不过事实上未必如此。据我看，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到惊讶的人比对什么东西都

---

① 这句话看来有两重用意：一是反讥维·彼·布列宁（1841—1926，俄罗斯作家）对他的评论。布列宁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一进入理论思维，一想到要作政治、哲学和道德说教时，他就会失去正常的思想和逻辑的能力。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还另有一番用意，他在自己的作品《噼噼啪啪》中，借“一个人物”之口把布列宁文章中的“逻辑”一词改为“力学”，可能是针对屠格涅夫的《关于〈父与子〉》一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群魔》中就已嘲讽过屠格涅夫这篇文章。屠格涅夫文章的原话是向“讲求实际的人们”呼吁：请你们“起码要尊重力学定律，从每一件事物中吸取最大的好处！否则，真的，读者由于在一些刊物上耗费时间阅读那些毫无生气的、混乱的和空泛无力的高谈阔论，自然会以为你们真的是在用简单的支柱替换杠杆，你们是要回归到力学本身的幼稚时代。”“力学”一词即取自这段文字。

② 东正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是在把死者的棺材抬至墓地后，在掩埋之前为死者举行祈祷。

③ 1872 年 5 月，彼得大帝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在莫斯科举办的工业博览会。

惊讶的人要愚蠢得多。不仅如此，对任何事物都不惊讶几乎等于什么都不尊重。愚蠢的人是不懂得尊重的。

“我可是首先就希望能尊重人。我一心想尊重人。”——最近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

他一心想尊重人！上帝啊，我在想，你现在如果鼓起勇气来，把这句话登出来，你会遭遇到什么呢！

想到这里我就昏昏欲睡了。我不喜欢读墓志铭；老一套。我身旁的石板上有一块吃剩的夹肉面包：真蠢，放的也不是地方。我把它扔到地上，因为这不是面包，不过是块夹肉面包。再说，把面包捻碎扔到地上似乎也不是罪过；扔到地板上才是罪过。① 要去查苏沃林日历②。

应该说，我坐了很久，太久了；也就是说，居然躺到像大理石棺材似的长石上去了。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听见各种声音？开始没有注意，没有当回事。可是，谈话声还在继续。又一听——声音是低沉的，好像是枕头压在嘴上；虽然是这样，声音还是清晰可辨，距离很近。我清醒过来，坐起来，开始仔细倾听：

“大人阁下，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不可能的。您叫了红桃，我跟进，可是您却突然出了方块七。关于方块应该事先讲好条件。”

“这么说，就是玩明的？那又有什么好玩的呢？”

① 据巴赫金的解释，这个细节具有狂欢性的象征意义，把面包屑扔到土地上是播种，是施肥；扔到地板上则无收获。

② 阿·谢·苏沃林（1834—1912），俄国新闻记者和出版者。出版并发行《新时代》和《历史通报》杂志。苏沃林的《1872 年俄罗斯日历》与过去的一般日历不同，是带有各种常识的知识手册性的日历。

“不成，大人阁下，绝不能不约定条件。必须有明家，还要有一个出暗牌的。”①

“嗯，明家在这里是找不到的。”

这些话多么傲慢！既奇怪，又突然。一个声音是那么有力和威严，另一个则似乎是柔和谄媚的声音；如果我不是亲自听到，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好像是没有做安灵祈祷。然而这里怎么还有玩朴烈费兰斯牌②的，还有什么将军？坟墓里面有响声，千真万确，是有响声。我弯下腰去读墓志铭：

“别尔沃耶多夫少将遗体安葬于此……某种、某种勋章获得者。”哼！“逝世于本年8月……终年五十七岁……安息吧，亲爱的遗骸，敬祝安眠！”

哼，见鬼，真的是个将军！从另外一座坟里传出来阿谀奉承的腔调，那座坟上还没有墓碑，只有一块长方石柱，大概也是新埋葬的。听腔调像是七等文官。

“嘿——嘿——嘿！”——又传过来一个完全新的声音，显然是从新坟中发出的，离将军的坟五俄丈左右，——是男人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不过，毕恭毕敬、充满感慨的腔调使这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嘿——嘿——嘿——嘿！”

“哎呀，他又打起嗝来了！”——突然间像是有一位上层社会的太太怒气冲冲地以厌烦的、盛气凌人的口气说道。——“挨着这小买卖人简直是受罪！”

“我没有打嗝，一点儿东西都还没有吃呢，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太太，凭您那股任性的脾气您总也不会心情平静的。”

“可是您为什么要躺在这里？”

---

①② 朴烈费兰斯牌系扑克牌的一种游戏方法，其游戏规则不详。

“是把我安放在这里的，妻子和几个小孩子把我安放的，不是我自己躺下的。这是死亡的规矩！否则我怎么也不会躺在您的旁边，无论多少钱；从价钱上看，我是凭自己的财产躺在这里的。我们一向是能够按第三等级的墓地为自己的坟墓付钱的。”

“发财啦！坑了多少人？”

“怎么能坑您，从1月份起您就没有付给我们一个钱。铺子里有您的小小一笔账。”

“喂，太蠢了；依我看，在这里讨账是非常愚蠢的！到上面去。找我的侄女要，她是继承人。”

“看您说的，现在到哪里去讨账，又能往哪里走。咱们两个人都走到头啦，在上帝的惩罚面前咱们都是同样有最（罪）的。”

“有最（罪）的！”——女尸轻蔑地模仿他的话说。——“永远不准跟我说话！”

“嘿——嘿——嘿——嘿！”

“小铺掌柜的倒是听从这位太太的话，大人阁下。”

“他凭什么不听从？”

“嗯，大人阁下，很清楚，因为在这里是新规矩。”

“什么新规矩？”

“大人阁下，这么说吧，我们都死了。”

“啊，是啊！规矩就是规矩……”

嗯，他们找到了根据；心安理得了！如果这里都是这等样子，那么在这上面是什么样子还需要问吗？不过，这算什么勾当！虽然是满腔怒气，可我还是继续听了下去：

“不，我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不……我，您要知道……

我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突然冒出一个新的声音，好像是来自将军和那位爱发脾气的太太之间的那个地方。

“您听，大人阁下，咱们的人又提起这个来了。已经三天了，沉默，沉默啊，突然间：‘我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您看，还是那么贪心，嘻嘻，嘻嘻！”

“还那样轻浮。”

“他的心动起来了，大人阁下，您知道，他睡过去了，已经完全睡过去了，从4月起就到了这里，可是突然间说：‘我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

“不过，有些寂寞。”大人阁下说。

“大人阁下，有些寂寞，是否再逗逗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玩？嘻嘻！”

“不，算了吧。我忍受不了这位好大喊大闹、无事生非的女人。”

“不对，是我忍受不了你们这两个人，”好大喊大闹的女人厌恶地回敬说，“你们两个是无聊透顶的人，一丁点儿高尚的东西也不会说。我说的是您，大人阁下，——请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我知道您的一点儿丑事；仆人一清早是怎样用扫把把您从一对夫妇的床底下赶出来的。”

“无赖的女人！”将军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老太太，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小铺掌柜的忽然又叫起来，“我的亲爱的太太，请不要见怪，请告诉我，我就是这样到处漂泊，还是干点什么呢？……”

“哎，又是他，我早就觉出来，因为我闻到从他身上散出来的气味，一股气味，这是他又在翻身！”

“我没有翻身，太太，我身上什么特别的气味都没有，我还保留着自己完好的身体，而您，太太，可是开始腐烂

了，——所以这股气味真是难闻极了，即使在这里，也算是难闻的。出于礼貌，我什么也没有说。”

“嗨，侮辱人的下贱货！明明是从你自己身上发出来的，反而栽到我身上。”

“嘿——嘿——嘿——嘿！我们的四十日祭辰[①]快一点到来吧：我准能听到上面哭泣的声音，妻子的号啕痛哭和孩子们的低声啜泣！……”

“哼，这就是为什么要哭：大吃大喝一通，完事就走。哎，要是有个人醒过来才好！”

“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一个阿谀奉承的官吏开口说，“请稍等一会儿，新来的人要说话。”

“他们中间有年轻人吗？”

“年轻的也有，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还有少年呢。”

“嗯，来得正是时候！”

“怎么，他们还没有开始吗？”大人阁下问道。

“前天到的还没有醒过来呢，大人阁下，您知道，有的时候要沉默一个星期。幸好在昨天、前天和今天把他们一下子全送来了。否则在我们周围十俄丈左右差不多全是去年的。”

“是啊，有意思。”

“大人阁下，今天埋葬了二等文官塔拉谢维奇。我听声音就知道了。我认识他的侄子，刚才是他把棺材放下来的。”

“嗯，他在哪里？”

“大人阁下，就在您左边，离您五步左右。几乎是在您的脚下……大人阁下，您可以跟他认识认识。”

---

① 俄罗斯风习，人死后第四十天设宴追悼死者的仪式。

“不……我难道先去见他。”

“是的，大人阁下，他自己会先来的。他会感到荣幸的，这事就交给我吧，大人阁下，我就……”

“哎呀……哎呀，我这是怎么啦？”有人忽然呻吟起来，是一个新人的惊慌失措的声音。

“新来的，大人阁下，新来的，感谢上帝，多么快呀！有的时候，一个星期都不出声。”

“嗬，好像是个年轻人！”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尖声尖气地叫起来。

“我……我……我因为并发症，一下子就突然完了！”小伙子又嘟囔起来，“前一天舒尔茨还告诉我：您得了并发症，可是我刚到早晨就突然死了。咳！咳！”

“唉，没办法呀，年轻人！”将军慈爱地说，显然他为新人的到来而高兴。“心要放宽些！我们欢迎您到我们这里，就是说，到约沙法谷① 来。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您会看到的，也会高兴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尔沃耶多夫少将，愿为您效劳。”

“啊，不！不，不，我绝不能！我是在舒尔茨那里，您看，我患的是并发症，开始是胸部难受，咳嗽，后来感冒了：胸部难受和流感……完全是突如其来……主要的是，完全没有料到。”

“您说啦，起初是胸部。”官吏婉转地答上了话茬儿，似乎想使新来的人振作起精神。

“是的，胸部和痰，后来，痰突然没有了，胸部也不难受

① 据圣经预言，世界末日到来时，上帝在约沙法谷进行审判。见《旧约全书·约珥书》，第 3 章，第 2 节、第 12 节。

了，可是呼吸困难……您就知道了……”

“我知道，知道。如果是胸部，您就应该去找艾克[①]，而不是找舒尔茨。”

“不过，我，您看，一直想去找包特金[②]……可是突然间……”

“包特金太狠，”——将军插话说。

“噢，不，他一点儿也不狠；我听说过，他很细心，全都能事先看出来。”

“大人阁下说的是价钱，”小官吏纠正说。

“噢，没那回事儿，总共才要三个卢布，可是他看得那么仔细，处方也……我决心想找他，因为人家告诉过我……先生们，我该怎么办，去找艾克，还是去找包特金?”

“怎么办？上哪儿去?”将军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连他的尸体都在跟着颤动。小官吏也跟着假笑起来。

“可爱的小伙子，可爱的、叫人高兴的小伙子，我是多么喜爱你呀!”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提起尖嗓门兴奋地叫起来。“把这样一个放在我身旁就好了!”

不，我不答应！他是新近的死人！不过还要再听一听，不必急忙做结论。这个没出息的新来的人——我还记得他刚才在棺材里的样子——表情像一只吓呆了的雏鸡，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难看的了！不过再接下去看看是什么样子吧。

可是，接着就是一场混乱，我没办法全都记住，因为非常多的死人一下子全都醒了：一个五等文官刚醒过来就立即毫不

---

①② B. E. 艾克（1818—1875）、C. П. 包特金（1832—1889），均为彼得堡名医。见上面谈到的苏沃林日历“医学专家”栏。

迟疑地同将军讨论一个方案，——部里面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分会的方案，此事与委员会分会有关，是公职人员的职位变动，将军对这件事的兴趣非常非常之大。我承认，我自己也知道很多新闻，因此，有时能在首都探听到政务消息的那些渠道使我感到惊讶。后来一个工程师似醒非醒，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半天，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我们的人没有去理睬他，让他暂时躺着。最后，早晨才在灵台下埋葬的一位显贵的太太流露出坟墓中特有的那种激情的样子。列别贾特尼科夫（我所憎恨的那个安放在别尔沃耶多夫将军身旁的、曲意奉承的七等文官原来叫列别贾特尼科夫）手忙脚乱，他十分惊讶，怎么这样快一下子大家全都醒了。我承认，我也觉得奇怪；醒过来的人里有些是前天刚安葬的，例如，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才十六岁，总是嘿嘿笑……笑得令人讨厌，还有些放荡。

“大人阁下，二等文官塔拉谢维奇醒了！”——列别贾特尼科夫立刻慌慌张张地通报说。

“啊？你说什么？”突然醒来的二等文官用厌恶的口气问道，话说得不清楚，还夹带着嘶嘶的声音。话中含有执拗的命令语气。我怀着好奇心听着，因为不久前我听说过关于这个塔拉谢维奇的一些事情，都是饶有兴趣而又极其令人不安的。

“这是我，大人阁下，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您要什么，想干什么？”

“只想问问大人阁下您的健康如何；由于不习惯，这里的每一个人刚开始时都觉得很狭窄……别尔沃耶多夫将军希望能有幸认识您，大人阁下，他希望……”

“没听说过此人。”

“大人阁下，请原谅，别尔沃耶多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将军……”

“您是别尔沃耶多夫将军？”

“不是，大人阁下，我只不过是七等文官列别贾特尼科夫，愿为您效劳，而别尔沃耶多夫将军……”

“无聊！请您让我安静一会儿。”

“算了吧，”——最后，别尔沃耶多夫将军摆出自己的尊严，阻止了在坟墓中的自己部下的讨厌的急躁行为。

“大人阁下，要考虑到他们还没有醒过来；他们这是还不习惯：一醒过来，他们就会用另一种态度对待……”

“算了吧。”——将军又说了一遍。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喂，大人阁下，我在跟您说话！”一个完全新的声音在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的旁边突然急躁地高声喊叫起来，说话的腔调听起来粗暴无礼，像位老爷，话中还夹带着眼下时髦的懒洋洋的语气，他好像故意侮辱人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我观察你们这伙人两个小时了；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三天；您还记得我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我是克利涅维奇，我们在沃洛康斯基家见过面，我不明白，那里怎么把您也放进去了。”

“原来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伯爵……难道您也……还这样年轻……太遗憾了！”

“是啊，我自己也觉得遗憾，不过我在哪儿都一样，我到哪儿都要把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都弄到手。我也不是伯爵，而是男爵，仅仅是个男爵。我们是些讨人嫌的小男爵，奴仆之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管它呢。我只是所谓的上层社会的无赖，自认为是‘可爱的浪荡公子’。我的父亲是个什么小小的

将军，母亲也曾被 en haut lieu[①] 接纳过。我和犹太人济费利用五万卢布假币度过了去年一年，把他告发了，可是所有的钱都给尤莉卡、Charpentier de Lusignan[②] 带往波尔多[③] 了。要知道，我已经订了婚，是谢瓦列芙斯卡娅，她差三个月十六岁，还在读书，陪嫁九万卢布。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还记得吧，十五年以前，我还是十四岁的军官学校的学生的时候，您是怎样引诱我堕落的？……"

"啊，那就是你呀，无赖，虽然上帝把你送到这里来，可是……"

"您错怪了您的批发商邻居，怀疑他身上有臭味……我一句话也没说，暗地里在笑。其实臭味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把我在钉紧的棺材里埋葬的时候就是这样。"

"哎，多么不要脸的东西！不过我终归还是高兴的；您不会相信，克利涅维奇，不会相信，这里是多么没有生活，没有幽默。"

"好吧，好吧，我打算在这里做出点异乎寻常的事。大人阁下，——我不是叫您，别尔沃耶多夫，——我是叫另一位大人，塔拉谢维奇先生，二等文官！请回答！我是克利涅维奇，就是在斋戒期把您送到菲尤里家去的那个人，您能听见吗？"

"我听见您的话了，克利涅维奇，非常高兴，请相信……"

"我一点儿也不相信，去你的吧。亲爱的老头儿，我就是想同您亲热一番，但是，感谢上帝，我不能跟您亲吻。先生们，你们知道吗，这位 grand-père[④] 干了些什么？他是三天或

① 法文：上层社会。
② 法文：夏尔邦蒂埃·德·吕西尼昂。
③ 法国城市。
④ 法文：老爷爷。

者四天以前死的，你们能够想象吗，他留下了整整四十万卢布公款的亏空？全花在了那些遗孀和孤儿身上，他怎么能一个人为所欲为呢，因为最后的八年没有人检查他。我在想象，现在那里所有人的脸要耷拉多长，他们会怎样为他祈祷？这是一个使人很感兴趣的思想，对不对！我最近整整一年都惊讶不已，这样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痛风症、手痛风症的患者，哪里还有那么多的精力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现在这个谜解开了！这些孀妇和孤儿——一想到这些人就足以使他全身发热！……我早就知道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Charpentier 对我说的，我一知道这消息，在复活节周，立即向他友好地扑过去：‘给我两万五千卢布，否则，明天你就受到检查’；你们想想看，他那时只有一万三千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他是死得非常及时。Grand-père，grand-père，您听见了吗？”

“Chèr[1]，克利涅维奇，我完全同意您说的，不过您……何必说得那么详详细细。生活里苦难和折磨是那么多，而报偿又是那么少……我希望最终安静下来，指望从这里获得我所看到的一切……”

“我敢打赌，他已经嗅出了卡季希·别列斯托娃！”

“谁？……谁是卡季希？”老头子的颤抖声音里夹带着放荡的腔调。

“谁是卡季希吗？就在这里，在左边，离您五步，离您十步。她在这里是第五天了，grand-père，您如果知道她是什么样的贱货……家庭优裕，受过教育——还是个丑八怪，最丑的丑八怪！在那边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她，就我一个人知道……卡季希，回话！”

---

① 法文：亲爱的。

“嘿——嘿——嘿！”回答的是少女的颤抖声，听起来似乎有根针在刺她。“嘿——嘿——嘿！”

“还是金——发——女郎？”grand-père小声地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来。

“嘿——嘿——嘿！”

“我……我早就，”老头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嘟哝说，“幻想有一个金发女郎……十五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哎哟，恶魔！”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惊叫起来。

“好啦！”克利涅维奇最后说道，“我看货色是上等的。我在这里马上就会过得更好。主要的是，要快活地度过剩余的时间；噢，可这是什么样的时间了？喂，那个官吏，列别贾特尼科夫，对不对，我听人们都这样叫您！”

“列别贾特尼科夫，七等文官，谢苗·叶夫谢伊奇，愿为您效劳，非常——非常——非常高兴。”

“您高兴不高兴都无所谓，不过您好像对这里什么都知道。告诉我，首先（我从昨天就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在这里怎么能够讲话？其实我们都已经死了，然而却在说话；似乎我们还在活动，实际上我们不是没有说话，也没有活动吗？这是变的哪门子戏法？”

“如果您男爵想知道这一切，普拉东·尼古拉耶维奇能够给您解释得比我好。”

“普拉东·尼古拉耶维奇是什么人？不要慢慢吞吞的，快点儿说。”

“普拉东·尼古拉耶维奇是我们这里的一位不大高明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硕士。他写过几本哲学书，已经睡了三个月，完全睡着了，因此现在不可能叫他打起精神来。一个星期才嘟哝一次，说几句不明不白的话。”

“快一点，快一点！”

“他用最简单的事实解释这里的一切，就是说，在上面，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认为在那里死了就是死了，这是错误的。身体在这里似乎还能复活一次，生命的余烬集中了，可只能集中在意识里面。这件事——我对你们说不清楚——生命好像是由于惰性而继续活着。据他说，一切都集中在某处，在意识里，继续存在两三个月……有时甚至是半年……例如，这里有一个，几乎完全腐烂了，可是过六个星期之后有一次他忽然又嘟哝了一句话，当然是毫无内容的话，说的是什么‘噼噼啪’：‘噼噼啪，噼噼啪’，——但是，这就说明，在他的身上还闪现出生命的一点微弱的火花……”

“十足的愚蠢。可是我没有嗅觉了，还怎么能闻到臭味？”

“这……嘻——嘻……嗯，这是我们的哲学家散布的迷雾。他说的就是嗅觉，他说这里能闻到臭味，也就是说，是道德的臭味——嘻——嘻！似乎是心灵的臭味，这两三个月里还可能闻得到……他说，这是最后的慈悲……男爵，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全都是神秘的梦呓，从他的处境看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够啦，我相信，再说下去也全是胡说八道。要紧的是两三个月的生活，最后就是噼噼啪。我向大家提议，这两个月要过得尽可能地快活，为此，人人都要按照另一种道理来生活。先生们！我提议要不顾廉耻！”

“哎，来吧，让我们不顾廉耻吧！”很多声音一齐喊道，奇怪的是，在喊叫中有些声音完全是生疏的，这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又有人醒过来的。已经完全清醒的工程师特别满意，他以男低音的洪亮嗓门表示自己同意。小姑娘卡季希乐得咻咻地笑。

“哎，我是多么想不顾廉耻呀!”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高兴得大声喊叫。

“听见了吧，连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都想不顾廉耻……”

“不——不——不，克利涅维奇，我是知道廉耻的，在那边我是有廉耻的，可是在这儿我是非常、非常想丝毫不顾廉耻!”

“我明白，克利涅维奇，”工程师以低沉的声音说，“您是建议把这里的生活，可以说，建立在新的合理的基础上。”

“嗯，我才不管这些呢！这事要等库杰亚罗夫，昨天把他送来的。他醒过来就会对您解释一切。他这个人，像个巨人!明天大概还要拖来一个自然科学家，可能还有一个军官，如果没记错的话，再过三四天还有一个杂文家，似乎他是和一个编辑一块来。不过，管他们呢，只要是我们凑成自己的一群人，我们的一切就自然形成。目前我想做的，是不说谎。我唯一想做到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是主要的。在世界上要想生活又不说谎是办不到的，生活和虚伪是同义词；而在这里，为了开玩笑，我们就不说谎。见鬼，要知道，坟墓也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大家都要大声地叙述我们的历史，也就丝毫不顾廉耻了。我第一个说说自己。你们知道，我属于放荡不羁之徒。所有这一切在上面那边都给腐朽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挣脱绳索，我们要在最无耻的真实中度过这两个月！我们要脱得赤条条的，裸露得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一丝不挂!”——全都大声喊叫起来。

“我最、最想一丝不挂了!”——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尖声喊叫道。

“啊……啊……啊，我看，这里就会很开心了；我不想去

找艾克医生了！”

“不，我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不，你们知道，我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

“嘿——嘿——嘿！”卡季希又在嘿嘿地笑。

“主要的是，没有人能够禁止我们，别尔沃耶多夫也办不到，我看得出来，他在生气，可是他的手毕竟是够不到我，Grand-père，您同意吗？”

“我完全、完全同意，非常高兴地同意，我还同意要卡季希第一个开始讲自己的身——世。”

“我抗议！我全力抗议。”别尔沃耶多夫将军态度坚决地声明。

“大人阁下！”无赖列别贾特尼科夫慌慌张张地压低声音嘟哝着劝说道，“大人阁下，如果我们同意的话，这事对我们其实还有好处呢。您看，那里一个小姑娘……再说，这里全是各种不同的人……”

“就算这样吧，有个小姑娘，可是……”

“有好处，大人阁下，真的有好处！即使当做一个例子，不妨试一试……”

“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

“首先，将军，您在坟墓里玩朴烈费兰斯牌；其次，我们不——理——睬您。”克利涅维奇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语气说。

“阁下，不过，我请您不要得意忘形。”

“说什么？要知道，您够不到我，我可以从这里戏弄您，如同戏弄尤莉卡的哈巴狗。再说，先生们，他在这里算什么将军？他在那边做过将军，而在这儿等于零！”

“不，我在这儿……也不是零……”

“在这儿您要在棺材里腐烂掉，从您身上只能留下六颗铜

纽扣。”

“好极啦，克利涅维奇，哈——哈——哈！”齐声喊道。

“我为我的陛下效劳过……我有长剑……”

“用您的长剑去刺耗子吧，何况您从来也没有抽出过您的长剑。”

“不管怎样说，我是整体的一部分。”

“整体的部分可多啦。”

“好极啦，克利涅维奇，好极啦，哈——哈——哈！”

“我不懂，长剑是什么。”工程师说。

“我们见到普鲁士就逃跑，像耗子一样，溃不成军！”一个我没有听见过的声音从远处大叫说，他高兴得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长剑，先生，就是荣誉！”将军大声喊道，不过只有我听见了他的声音。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疯狂吼叫、骚乱和喧嚣，只有阿芙多季娅·伊格纳季耶芙娜的不耐烦到歇斯底里的尖叫还能听得出来。

“喂，快点吧，快点吧！哎，咱们什么时候才丝毫不顾廉耻地干啊！”

“哎呀——哎呀——哎呀呀！心灵真正是在受折磨！”一个平民的声音说，还……

这时我突然打了个喷嚏。这是冷不防地、无意之间发生的事，效果却是惊人的；顿时寂静无声，仿佛墓地上的一切都像梦幻似的消失了。出现真正的坟墓间的宁静。我不认为他们是在我面前害羞了：他们已经决心丝毫不顾廉耻了！我又等了五分钟，无声无息。可也不能设想，他们会怕人向警察局告密；因为警察在这里又怎能奈何他们呢？我无意中冒出一个想法，他们总还是会有什么秘密，凡人不知道，他们对所有的凡人都精心隐瞒了这个秘密。

“算了，我想，亲爱的，我还要来看望你们。”我说着这句话离开了墓地。

不，我不能允许出现这一切；不，实在不能，不！噼噼啪啪不能使我困惑。（它，噼噼啪啪，不过如此！）

在这种地方放荡，最后的希望是放荡，委靡的、腐烂的尸体的放荡——甚至不惜利用意识的最后瞬间！最后的瞬间是给他们的、赐予他们的……而主要是，主要是，在这种地方！不，我不能允许出现这一切……

我要到其他等级的墓地去走走，到处去听听。就应该这样，要到处去听听，为了获得认识，不能只听一个地方。说不定也能遇到令人欣慰的事情。

我一定还要回到这件事上来。都说定了要叙述自己的经历和各种趣闻。呸！但是，要去，一定还要再去；凭良心办事！

要把《札记》送到《公民报》去；那里一位发行人的画像也展出了。或许能发表出来。

# 从博览会[1] 说起

（《公民报》，1873 年 3 月 26 日，第 13 期）

我观看了展览。我们俄罗斯画家的很多幅绘画都将送往维也纳世界博览会参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欧洲，人们开始了解俄罗斯的当代艺术家。不过还是有一点儿想法：那里能否理解我们的艺术家，那里将从什么角度评价他们？依我看，请把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喜剧——例如，《自家人好算账》[2]，或者其他任何喜剧，——翻译过去，要尽可能译得好，译为德语或法语，搬上欧洲某地的舞台，我真的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当然，总能理解一些，说不定，可能他们还能得到某种满足，但至少会有喜剧的四分之三是完全不能为欧洲所理解的。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则消息唤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这就是维亚尔多先生（在我们这里上演的意大利歌剧中演唱过的著名女歌唱家的丈夫[3]），毫无俄语知识的法国人，在屠格涅夫先生的指导下翻译我们的果戈理。维亚尔多先生自然是有艺术评论才能的，此外，还有把握其他民族艺术的敏感，他已经以其译为法语的《堂吉诃德》[4] 的卓越译文证明了这一点。屠格涅夫先生了解果戈理，可以说，深领其微妙之细节；我认为，

---

① 指 1873 年在彼得堡举办的绘画和雕塑的美术展览会。它是为参加维也纳的世界博览会作准备的。

② 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

③ 女歌唱家指波丽娜·维亚尔多。她是西班牙人，嫁给法国人、巴黎的意大利歌剧院经理路易·维也尔多。

④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小说。

他像当时所有的人一样，热爱果戈理，达到狂热的程度，此外，他自己是诗人，虽然他自己的艺术生涯在当时差不多还没有开始。（注意，他写过几首诗，我忘记是哪些诗了，此外，还有中篇《三肖像》——这已经是有分量的作品。）看来，可能译得不错。我还要指出，应该说，屠格涅夫先生精通法语。结果如何呢？虽然我事先就预感到果戈理是无法译成法文的，对译出的东西还是感到惊讶，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这个译本现在还能找到，请看一看，翻译成什么了。简直不成其为果戈理了。果戈理的全部幽默，全部喜剧性，全部细节以及结局的主要场面——对于这些，就是现在，当自己单独一个人无意中想起它们的时候（常常是生活中最没有文学意境的时刻），就会突然暗自忍俊不禁。——因为上述的一切全都不见了，好像根本都没有过。我不知道，依据这部翻译本，法国人关于果戈理能说些什么呢；其实，似乎什么也说不出来。《黑桃皇后》和《大尉的女儿》当时也被译成法语，尽管在这些作品里能够理解的东西远比果戈理的作品要多，毫无疑问也已经丧失过半了。总之，一切有特色的、一切主要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艺术性的东西），依我看来，对于欧洲来说都是不能理解的。请把屠格涅夫先生中篇小说《罗亭》[①] 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我之所以举出屠格涅夫先生，是因为他是俄罗斯作家里面最适于翻译的，而中篇小说《罗亭》则是屠格涅夫先生的所有作品中最接近德国生活的。）——就连这部小说也不能被理解。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完全不容置疑的。《猎人笔记》也像普希金与果戈理的作品，同

① 屠格涅夫曾称之为“中篇小说”，后来才决定称之为“长篇小说”。

样是不能被理解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所有拥有巨大才华的作家，可能，注定长期不能为欧洲所了解；甚至是才华越大，越是独特，就越难被认知。与此同时我们则能通过俄罗斯语言了解狄更斯①，我深信，我们对他的理解，可能几乎同英国人一样，连他的细致微妙之处都能理解；甚至还可能，我们对他的热爱不亚于他的同胞。然而狄更斯是非常典型的、独特的又是民族的！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能否认为对其他民族的这种理解乃是俄罗斯人不同于欧洲人的特殊才能呢？可能，这种才能是特殊的，如果有这种才能的话（正如讲其他民族语言的才能真正胜过所有欧洲人），这种才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预示着未来的很多事情，它赋予俄罗斯人很多使命，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完全是好的才能，还是里面也有某种不好的东西……说得确切一点（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欧洲人对俄罗斯和俄罗斯生活了解很少，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很详细地了解俄罗斯的必要。确实如此，在欧洲直到今天的确还没有任何特殊需要使他们详细地了解我们。但是，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他在学习另外一种欧洲语言，洞察任何一个欧洲民族的心灵时，总要比他学习俄罗斯语言，了解我们俄罗斯的实质容易得多，我总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这种目的是有的）而特意研究我们并且为之付出很多精力的欧洲人无疑都离开我们，他们尽管进行过很多研究，但是到头来对某些事情还是不能彻底了解，甚至可以说，在长时期内，至少在现代与最近几代人的时期内，他们还不能了解。这一切都在向我们预示，可能，在欧洲各民族的家庭里我们还

① 狄更斯（1812—1870），英国作家。他的成名之作《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于1838年底已有俄文节译本。

要长期处于可悲的孤独境地；欧洲人对俄罗斯的错误看法在未来还将长时期存在；表明存在着他们总是往坏的方面判断我们的明显倾向，可能，还表明欧洲为什么对我们怀有长期的、普遍的，而且以极强烈的、恶劣的直感为依据的敌视态度；为什么他们回避我们如同回避令人厌恶的东西，有时在我们面前还流露出某种近乎迷信的恐惧以及为什么他们对我们保持着一成不变的、众所周知的、由来已久的论断：说我们根本不是欧洲人……我们当然感到气愤，于是我们竭尽全力地去证明我们是欧洲人……

当然，我不是说，在欧洲，比如说，连我们的风景画家也不能理解：克里木、高加索的景色，我们草原的风光，显然也会让他们感兴趣。然而我们俄罗斯的、主要是有民族特色的风景画也就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部和北部地带的风景画，我想，在维也纳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响。“这个乏味的大自然”[①]，可以说，没有特点就是她的全部特点，而她对我们来说是可爱的和可贵的。可是德国人能理解我们的感情吗？又比如库因吉[②] 风景画《瓦拉姆的景色》中的那两棵白桦树：画的前景是沼泽和沼泽的灌木丛，后面是树林；从那里出现的像似乌云又非乌云，而是弥漫着潮湿的雾气；潮气似乎浸透您的全身，您几乎感觉到它，在画面当中，在树林和您的中间，两棵白桦树，两棵鲜丽挺拔的白桦树，——是这幅画中最着力之处。这又有什么非凡之处？有什么独具特色之处呢？然而实际上这是多么好啊！……可能，我说得不对，不过德国人是不会

① 出自俄罗斯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的《这些贫穷的村庄》（1855）一诗。

② 阿·伊·库因吉（1842—1910），俄罗斯画家。

像我们那样喜欢的。

关于历史题材的绘画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纯历史题材方面我们早就没有很出色的东西了，从而也就不可能使欧洲感到惊奇；即使是描绘战事的题材也没有特别惊人之作；甚至契尔克斯人的转移[①]（一幅巨大的色彩缤纷的画面，可能是成就卓越的画，——我不能判断），我认为也不能在国外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生活风习画，我们的生活风习画——他们在这方面又能了解什么呢？生活风习画在我们这里，已经多年占绝对统治地位了；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可以展示的，当然就是生活风习画。比如说马科夫斯基那张画幅不大的画，似乎叫《夜莺啼啭的爱好者》[②]；我不记得画的题名了。请看吧：一间小市民的屋子，也可能是一个退伍士兵、卖鸣禽的人同时也应该是捕鸟人的屋子。画面上还有几个鸟笼子；板凳、一张桌子，桌上一个茶炊，茶炊后面坐着的是客人，两位商人或者是杂货铺老板，他们是喜欢听夜莺啼啭的人。一只夜莺靠窗挂在笼子里，看得出来，夜莺正以婉转嘹亮的歌喉放声歌唱，客人在听。看样子，他们两个都是正派的人，宽裕的小老板和商贩，大概都已经上了年纪，在家庭生活中肆意妄为（整整这个“黑暗王国”[③]必定是由肆意妄为的人们构成的，在家庭生活中也自然是肆意妄为，这一切似乎已成惯例），而这时两个人看来都沉浸于最纯洁的、几乎是深深感动的喜悦之中。

---

① 俄罗斯画家 И. А. 格鲁津斯基（1837—1892）的绘画《俄罗斯军队逼近时山民放弃村庄》（1872）。

② 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画家弗·叶·马科夫斯基（1846—1920）的成名之作，他因此画而被授予院士称号。

③ 俄国文学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评论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的文章。“黑暗的王国”指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中所描写的专制的家长制的商人家庭。

这里发生的是感动得如醉如痴的场面。坐在靠近窗子的那个人略微低着头，举起的一只手竖在空中，他正听得着了迷，陶醉了，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他要听完这曲抑扬婉转的歌声……他想要用手去抓什么，可是又怕把它丢失掉。另外一个人坐在桌子后面，正在喝茶，我们只能从背后看他，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苦恼”不亚于自己的同伴。在他们面前的那个人是这里的主人，是他请他们来听的，当然，是想把夜莺卖给他们。这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细高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穿着很随便的家常衣服（这工夫有什么好讲究的）；他在向两个商人讲话，您可以感觉到，他的话讲得很有权威。在这两位老板面前，按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就是按财富而言，他当然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然而现在他有夜莺，很好的夜莺，因而，看上去他很自豪（仿佛是他自己在唱），他对待商人的态度竟然有些放肆，有些严厉（这是不行的），……有趣的是，两个老板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认为他给他们一点儿教训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的夜莺太好了！”茶喝完了，交易也就开始了……好啦，试问，德国人或者维也纳的犹太人（据说，维也纳也跟敖德萨一样，到处都是犹太人）从这幅画上能看懂什么呢？也许有人能够解释画上是怎样一回事，他们知道，俄罗斯的中等阶层的商人有两个嗜好——快马和夜莺，因此，十分可笑。但这能说明什么呢？这种知识是抽象的，德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竟是那样可笑。我们眼看着这幅画时，也会露出微笑；等到后来回想起这幅画，还会觉得好笑和愉快。说实在的，即使人们讥讽我也不要紧，我认为，在这幅小画中有对人类的爱，不仅是特别对俄罗斯人的爱，而是从整体的意义上说。我举出这幅画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德国人的类似的画，来自德国人生活的事，我们的理解同他们自己毫无二致，

我们甚至能与他们同样地赞赏，几乎与他们德国人的感情都是相同的，而我们的画他们则全然不懂。不过，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我们反而是有益的。

又如在爱沙尼亚或者利夫兰[①] 的船舱里玩纸牌的游戏——这当然是可以看懂的，特别是参加玩牌的男孩子；人们都在用纸牌游戏或者算命，因此，《黑桃 10》（一幅画的题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例如佩罗夫[②] 的《猎人》这幅画是大家都能理解的。我是故意举出我们民族风习画中最容易理解的这幅画的。这幅画就是早已尽人皆知的《猎人们在休息地》：一个人在兴致勃勃地述说着他的故事，他明明知道这全是他自己编造的，另外一个人则在听他的故事，并且在尽力相信他，第三个人却什么都不相信，躺在旁边，不住地笑……多么迷人啊！当然，做些解释——德国人也就明白了。但是他们的理解不像我们，他们不知道，这是俄罗斯式的吹牛皮，他是在按照俄罗斯的方式吹牛皮。我们几乎能听见，能知道他在说什么，知道他吹牛皮使用的全部词汇、表述方式和他的情感。我相信，假如佩罗夫先生（他大概是能够做到的）画法国或者德国的猎人（当然是另外的画法和另外的人物），那么我们，俄罗斯人，是能够理解法国人或德国人是如何吹牛皮的，只要看到画面，就能猜测出一切，从全部细节、全部民族特点到叙述方法和吹牛皮的话题。可是德国人无论花多大工夫也不能理解我们俄罗斯人吹的牛皮。当然，他不会因此而受到

---

① 17—20 世纪初拉脱维亚北部地区和爱沙尼亚南部地区的正式名称。

② 瓦·格·佩罗夫（或译别罗夫，1833—1882），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协会的组织者之一。他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画像（1872）。

多少损失，对我们呢，可能反而有利；不过画是不能得到充分理解的，从而也就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这就遗憾了，因为我们去参展的目的是得到称赞。

我不知道，在维也纳将会怎样评价马科夫斯基的《诵经士们》①。我认为这不是风习画，而是一幅历史题材的画。当然，我是在开玩笑，不过，请仔细看看，除开唱诗的人外，什么也没有，这是在做弥撒时演奏音乐的带有某种官方性质的合唱团。一个个都穿着制服、下颏都刮得光光的先生们就说明这一点。又如，请看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先生。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为了化装才穿上这身与他完全不相称的服装，只有举行教会仪式时才穿的。不错，全体唱诗班的人也只有在举行仪式时才穿那身衣服，历来如此，从宗法制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但在画上那身装扮就显得特别刺眼。您已经习惯于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官吏身着文官制服，还是在政府的部机关里，这是一位谦恭庄重的衣着得体的中等地位的人。他吃力地唱着什么“我被伤害了!”之类的歌词，但是，只要看看他的样子，这句“我被伤害了”也就成了某种惯唱的应景歌词。最可笑不过的是设想这位忠实可靠的、对职务心满意足的人竟然可能是“我被伤害了”！转过身去，不看他们，只是听，那就会听到优美悦耳的东西；但是，如果眼看着这些人，您的感觉是，圣诗只能那样唱……现在唱的则完全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我非常害怕“倾向”，如果它支配了年轻艺术家的话，特别在他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您认为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就是倾向的目的达不到。有一位可爱的批评家，我不久前读过他

① 指《宫廷的诵经士在唱诗班上》(1870)。

的文章，但现在不想说出他的名字[1]，——不知道他是否相信，不带先入为主的倾向观点，只凭艺术的需要而完成的一切艺术作品，即使以完全无关紧要的、不暗含任何“启示”的素材完成的作品，对他的目的的益处，远比一切关于衬衫的（不是胡德[2] 的，而是我们作家的）诗歌[3] 要大得多，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作品很像所谓“满足无聊的好奇心”的作品。不知道这位批评家是否相信，如果有学问的人们，大概都还没有悟透这个道理，那么，在我们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心灵与头脑中有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理解中和带有成见的感受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呢？为了迎合社会的压力，年轻的诗人扼杀塑造自己心中成熟形象的自然要求，畏惧因“无聊的好奇心”而受到谴责，扼杀、勾销内心中呼之欲出的形象，不去发展和关怀他们，而是以不正常的病态心理生硬制造出满足一般的、模式化的[4]、自由主义的和社会的舆论所要求的主题。但这是多么简单的，极其简单的和幼稚的错误，愚蠢的错误！一个最愚蠢的错误就是，认为揭露罪恶（或者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罪恶的事）和激发憎恨或复仇感是达到目的的唯一的、可能的途径！然而，即便在这样狭窄的道路上，巨大的才华也可以挣扎着露出头角，不会在活动的初期就销声匿迹；有必要经常

① 指俄国民粹派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政论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

② 托马斯·胡德（1799—1845），英国诗人，著有《衬衫之歌》等描写劳动者贫困生活的诗歌。

③ 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于 1873 年 1 月在文章中称赞胡德的《衬衫之歌》。

④ 俄文原文为 Мундир，即按规定制作的俄国文官制服或官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文中以制服比喻文学思潮、派别，认为文学派别的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均遵循一定的模式，故这里将该词译为“模式”。

想想那句至理名言：说出来的话是白银，没有说出来的话是黄金。有一些非常非常卓越的天才，他们已经显示出将有远大的前程，但是倾向坑害了他们；从头到脚给他们披上了模式的外衣。我读了涅克拉索夫最近的两首长诗[①]——我们这位可敬的诗人现在毫无保留地穿上了模式的外衣。即使如此，在这两首诗中也还是有一些精湛之笔，显露出涅克拉索夫先生从前的才能。但有什么办法呢：模式化的情节、手法的模式化、思想、文体和本能的模式化……是的，甚至是本能自身的模式化。比如说，我们的著名诗人是否知道，没有一个女人，即便是公民情操高于一切的女人，她为了与不幸的丈夫相会而历尽艰辛，乘马车跋涉六千俄里，“饱尝颠簸的滋味”，并且如您所断言的，“从阿尔泰山的顶峰”飞驰而下（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您知道吗，诗人，这样的女人绝不会首先去亲吻亲爱的人的镣铐[②]，即使她心中突然间猛烈地迸发出一股公民感的高尚激情，她也必定是首先去吻她亲爱的人，而后才去吻镣铐，每一个女人毫无例外地都会这样做。当然，我的看法是

①② 指他写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的两首诗，一首是《特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1872），另一首是《沃尔孔斯基公爵夫人》（1873）。1873年出版诗集时涅克拉索夫将两首诗合并在一起，冠以《俄罗斯妇女》的标题收入诗集。亲吻镣铐的诗句出自《沃尔孔斯基公爵夫人》一诗，原文是：“我不由得跪倒在他面前，在拥抱丈夫之前，举起镣铐放在唇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评的这个情节，其实并非涅克拉索夫的虚构，而是他根据沃尔孔斯基公爵夫人自己的记载：“谢尔盖（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公爵的名字——译者）向我扑过来；他那镣铐的哗啦哗啦响声使我大吃一惊；我还不知道，他原来还铐着枷锁。看到监禁这样的严酷，我明白他的苦难是多么沉重，我的心顿时要跳出来，我的心情激动不已，我向他奔过去，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镣铐，然后才去亲吻他自己。”

随便说说而已，本来也不必写出来，因为诗刚刚写出来，为了赶在 1 月 1 日之前脱稿……然而，涅克拉索夫先生毕竟是已经饮誉文坛的诗人，几近定型的诗人，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诗篇。说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他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惋惜的还是那些新人：并非每一个人在创作初期都具有那种足以与模式化思想抗争的杰出才华，也就是说，保护自己免于文学肺痨病和死亡的才华。没有办法：模式的外衣毕竟是那样华丽，穿上它就光彩夺目……是的，多么有利！就是说现今尤其有利。

我从报上刚刚读完关于列宾先生画纤夫的画[1] 的评论，立刻为之震动。情节本身就是惊人的：在我们这里普遍认为，纤夫是最适合表现上层阶级有负于人民这一流行的社会思想的。我也正是准备看到所有的纤夫都身着模式化的外衣，额头上贴着流行的社会标签。可是结果怎样？我喜出望外，我的全部担心原来都是没有必要的：纤夫，就是真实的纤夫，就是这样。没有一个纤夫在画面上向观众喊叫："你看，我是多么不幸，你欠了人民多少债！"只是这一点就可以算作艺术家的伟大功绩。画面上是一些可爱的熟悉的面孔：在前面的两名纤夫差不多是在笑，起码是一声也没有哭，更没有去想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个退伍的士兵在耍滑头，装作出了毛病，他想吸口烟。那个男孩子的表情一本正经，他在呼喊，还在争吵——多么生动感人的形象，几乎可说是画中最完美的形象，从构思上看，这个形象可以与最后面那个纤夫相媲美，那个纤夫耷拉着头，脚似乎在往前拖着走，特别缓慢，他的面孔则看不见。不

---

① 伊·叶·列宾（1844—1930），俄罗斯画家，他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870—1873）是为他博得世界声誉的第一幅画。它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展出时颇受赞许。

可能想象，上层阶级欠下人民的政治债、经济债和社会债这种思想能够或多或少地渗透进这个被世世代代的苦难折磨着的农民的可怜的耷拉着的脑袋里面去……可是您知道吗，可爱的批评家，这个农民的思想的温顺无邪所达到的效果，要比您启示的、自由主义的目的所希望的大得无法比拟！要知道，有的观众将要带着心灵的创伤和对这个农民、这个孩子或者对这个骗子——坏蛋士兵的爱（多么深的爱！）离开这幅画！因为不可能不爱他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们，不可能毫无爱怜之心就走开。不可能不感到有愧，愧对人民……这伙纤夫"党"还会出现在以后的梦中，再过十五年还会想起他们来！然而，他们如果不是那么自然、朴实和单纯——就不会产生那样的印象，也不能成为那样的画了。而现在这才可以说是一幅真正的画！可见一切模式化的衣领都令人厌恶，无论它们如何镀金镶银！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可以高谈阔论的；这幅画也没有什么可以述说的；画是极难用语言表达的。简单地说：果戈理式的形象。这话是夸张，不过我并不是说，列宾就是自己的艺术门类的果戈理。我们的风习画还没有达到果戈理和狄更斯的水平。

实际上，在列宾先生的画中也可发现某些夸张：这就是衣着方面的夸张，这不仅表现在两个人物的身上。那样褴褛的衣衫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件衬衣一不小心掉进剁肉饼的木槽中。毫无疑问，纤夫的衣服是不值得炫耀的。人人都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至少已经不止一次报道过，在冬季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在家吃树皮为生，一开春就去给东家拉平底船，至少是有一些人仅仅为了一碗粥，没有任何其他要求。不止一次发现这样的事情，有的纤夫在最初几天就饿倒在吃饭的地方，奄奄待毙，有的上吊，有的"撑死"。据说，医生解剖过这些人，发现直到喉咙尽是粥。有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一些

人。但总还是没有说出来的话是金子，何况是那样的衬衣是不能穿的，只要一脱下来，就再也穿不进去了。不过同这幅画的构思之精彩及其独立精神相比，衣着上的这点小小的夸张是算不了什么的。

可惜的是，关于列宾先生我毫无所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位年轻人？我多么希望他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刚刚开始起步的艺术家。在前面几行话中，我赶紧说了有所保留的话，这毕竟还不是果戈理。是的，列宾先生与果戈理比还相差很远；不要为已获得的成功而傲慢起来。我们的风习画正走在康庄大道上，也有一些人才，但是，要达到视野开阔、多姿多彩，还有些不足之处。其实，狄更斯也不过是风习画作家；可是，狄更斯创作了《匹克威克》、《奥列佛·特维斯特》和长篇小说《老古玩店》中的《祖父与孙女》①；我们的风习画要达到狄更斯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风习画还处于《猎人》和《夜莺》② 的阶段。狄更斯的大多数《夜莺》和《猎人》都是他的二流作品。我甚至在考虑，在我们艺术的当前时刻，我只能依据某些特征来谈，对我们的风习画来说，《匹克威克》和《祖父与孙女》似乎是某种理想，而我在与我们某些大艺术

① 狄更斯的《老古玩店》俄文译本发表于 1853 年，1861 年为儿童改写读物时以《祖父与孙女》的书名出版单行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到的都是狄更斯早期的小说，在俄罗斯深受读者欣赏。与狄更斯晚期的侧重社会问题的小说相比，早期小说中蕴蓄着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呼吁俄罗斯艺术家“不要惧怕‘理想的东西’，而是……应该更多地信赖自己的思想（理想）时，所说的‘理想’”指的就是狄更斯早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引文出自苏联学者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家与思想家》一书。）

② 指上文提到的马科夫斯基和佩罗夫的两幅画。

家的谈话中数次发现——他们如同惧怕邪恶力量那样惧怕理想。惧怕，无疑是出于高尚的考虑，然而是有偏见的，不公允的。我们的艺术家们需要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思想独立性，可能还需要有更多修养。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题材受到损害、毫无起色的原因。看来，我们当代的艺术家们害怕绘画中的历史题材，一头扎进风习画，把它看做一切才华的唯一真正的与合乎规律的出路。我感到，艺术家似乎预感到（按照他的理解），在历史题材中他不得不“理想化”，也就是说假话。“要按照现实本来的面貌表现现实”，——他们这样说。然而这种现实根本不存在，而且在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过，因为人是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的，人感受的自然是通过他的感觉而反映在他的思想中的自然；由此可见，必须给思想以更多的活动余地，不要惧怕理想的东西。例如，肖像画家把他的对象安置恰当，为的是画他的肖像，画家要做好准备，仔细揣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从实践中得知，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像自己，因此他要“在人的面貌上捕捉这个人的主要特征”，捕捉这个人最像他自己的时刻。肖像画家的才能就在于，他善于发现并且把握这一时刻。可见，与眼前的现实相比，艺术家应该更多地信赖自己的思想（理想），否则，他该怎样做呢？其实，理想也是现实，是无异于眼前现实的合理现实。我们的很多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布龙尼科夫的画《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颂歌》[①]就是一例：有一位风习画艺术家（还是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甚感惊讶，现代的艺术家怎么竟选择这样的主题。实际

① Ф. А. 布龙尼科夫（1827—1902），俄罗斯画家、教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颂歌》的全名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致初升太阳的颂歌》(1869)。按：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又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

上，那样的主题（几乎近于幻想的主题）与目前的现实一样，同样是现实的，同样是艺术和人所需要的。

从实质上说，什么是风习画？风习画就是描绘当代的、正在发生的现实的艺术，艺术家亲自感受、亲眼目睹的现实，不同于历史的现实，艺术家既不可能亲眼目睹历史的现实，也不可能在正在发生的形态中，而是在完成的形态中去表现它。（请 nota bene：[①] 我们说“亲眼目睹”。其实狄更斯从未亲眼见过匹克威克，只是在他所观察的纷繁现实中发现了匹克威克，创造了这个人物，把他作为自己观察的结果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这个人物毫无疑问是实在的，无异于真实存在的人物，虽然狄更斯据有的只是现实的理想。）然而，在我们这里关于现实的各种理解恰恰存在着混乱。例如，在艺术中历史的现实当然不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风习画），——其所以不同正在于，历史的现实是已完成了的，而不是正在发生的。随便向哪一位心理学家请教，他都会告诉您，如果在想象中再现过去的事件，特别是很久以前的、已经完成了的、历史上的事件（如果活着，就不可能不想象过去），那么事件必然是将在完成的形态中呈现出来，也就是附加上事件在后来的整个发展，即艺术家竭力再现的人与事所属的那个历史时刻之后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事件的本质不可能在艺术家的手中被表现得与现实中可能发生过的事件丝毫不差。这样一来，似乎有一种近似迷信的恐惧把艺术家笼罩住了，艺术家怕的是他可能不由自主地去“理想化”，按照他的理解，这就是说假话。为了避免这种虚构出来的错误，艺术家想出的办法（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是把两种现实——历史的与正在发生的混合为一体；由于这种人为的

① 拉丁文：注意。

混合就出现了比一切谎言都更厉害的谎言。据我的看法，在盖伊先生[①] 的一些画中就可看到这种致命的错误。例如，他把自己那幅在当时曾经引起许多议论的画《最后的晚餐》画成了纯粹的风习画。请留神细看：这是很普通的人们之间的一场普通的争论。基督坐在那里，——难道这是基督吗？可能，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因同犹大争吵而非常懊恼，犹大站在那里，正在穿衣服，准备去告密，但是，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基督。老师的门徒们都来到老师的面前安慰他；试问：后此持续十八个世纪的基督教表现在哪里，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如果像盖伊先生的画所表现的，这是一群聚集在一块儿准备吃晚餐的人的一场普通争论，那怎么可能从这里产生出那样重大的事件？

这幅画根本就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没有历史的真实；甚至连风习画的影子都没有，这里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您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评论，这件事都不可能是那个样子发生的：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与未来的历史完全不相称，不成比例。提香[②] 赋予这位老师的面貌，起码是像他在自己的名画《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中所描绘的那样；这样就会立刻使很

---

① 尼古拉·尼古拉叶维奇·盖伊（1831—1894），俄罗斯画家，巡回展览画派创始人之一。《最后的晚餐》（1863）取材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6 章。这幅画刚一出现就引起普遍的注意和热烈的争论，因为它摆脱了那种宗教题材的传统式表现法。进步的评论界认为它体现了现实主义的重大成就，反对者则认为它贬低了崇高的永恒的主题，剥夺了基督的神性。

② 提香（原名蒂齐亚诺·维契利。蒂齐亚诺的英语读音为提香，因而在意大利之外的许多国家，均称他为提香。约 1476 或 1477，一说为 1489 或 1490—1576），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首要人物。他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取材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17 节。

多问题明白易解。在盖伊先生的画中纯系一群善良的人们在吵架；结果是矫揉造作和先入为主的思想，而一切矫揉造作都是谎言，那就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盖伊先生追求的是现实主义。

我竟然忘记了谈展出。不过……我算什么采访记者；我不过是“借展出”谈几点想法。何况编辑部已经答应就赴维也纳参展的画家的作品刊登一篇详尽的评论，或者，可能还更好，尽量从博览会上报道他们，那就注意到他们对汇集在那里的外国人造成的印象了。

# 幻想与憧憬

（《公民报》，1873 年 5 月 21 日，第 21 期）

我们在上一期的《公民报》上又谈到酗酒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医治全民酗酒顽症的可能性，是关于我们的希望，关于我们为时不远的更好的未来的信念。但是，很早以前，不知不觉地在心中就产生一种苦闷和疑虑。当然，眼前的重要事情很多（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是那种一本正经的、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顾不上去思考十年以后会怎样，或者是到世纪末，也就是我们这些人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将会怎样，即使去想这个问题，那也是愚蠢的。当代真正有事业心的人的座右铭是——après moi le déluge①。但是游手好闲的、好空想的和没有事情做的人有时幻想一下未来，如果只停留于幻想的话，还是可以原谅的。波普里辛（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就幻想过西班牙的事情："所有这些事件都使我受到极大的打击和震动，以致我……"② 等等，这是果戈理四十年以前写的。我承认，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使我震惊，说实在的，我的幻想甚至使我陷入沮丧。例如，最近我就幻想过作为伟大的欧洲强国的俄罗斯的形势问题，为这个令人苦恼的题目我什么没有想过啊！

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快成为伟大的

---

① 法文：准确写法应为"Après nous le déluge"，"我死后哪怕它洪水翻天"。据传此话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② 引自果戈理的《狂人日记》（1835），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波普里辛幻想自己就是西班牙国王。

欧洲强国。假定说，我们已经是伟大的强国；但是我想说的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远比其他伟大强国的付出大许多，这就是一个极其不利的标志。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不正常。不过，我要马上说明：我完全是从西方派的观点谈论这个问题，从这种观点出发，我确实就得出这个结论。从民族的，也就是多少带有斯拉夫派色彩的观点出发则是另一回事；众所周知，这就是对人民的某种内在独特力量的信心，对某种人的本原——只属于自己的、独具一格的、我们的人民特有的、挽救并支持我们人民的本原的信心。读过佩平[①]先生的文章我就清醒了。不必说，我希望，像从前那样仍然全心全意地希望俄罗斯人民特有的那种可贵的、坚定的和独立的本原确实是存在着；不过您也许会问——这种本原究竟是什么呢？佩平先生自己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也没有发现，人民本原被掩藏了起来，躲藏起来，无论如何也不愿被发现。因此我不得已只好避开这个令人欣慰的本原。由此得出我的看法，这就是，目前我们只不过是以我们的伟大强国的标准塑造自己，同时，竭尽全力使邻国不至于很快发现这一点。在这方面，全欧洲对俄罗斯一切的普遍无知对我们极为有利。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无知还没有受到怀疑——我们完全不必为这种情况发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邻国从较近的距离，较快地把我们看清楚，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我们的伟大力量就在于——他们到现在对我

① 亚·尼·佩平（1833—1904），俄国文学史家，著有古代和当代俄国文学史以及社会思想史等。他长期为《现代人》、《祖国纪事》撰稿。这里涉及的是他的论著《从 20 年代到 50 年代文学见解的特征》的第六部分《斯拉夫派》，文章与斯拉夫派的理论家们争论，并且触及“年轻的”斯拉夫派，即 19 世纪 60 年代的“根基派”理论家们。

们一点儿也不了解。然而，问题就在于，现在他们似乎开始了解我们，比从前了解得更好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强大的邻国正在不遗余力地研究我们，很多事情似乎已经看得一清二楚。暂且不管细节，只拿最明显的、一目了然的事情来说，就以我们的疆土和边界来说（这里居住着异族人和异国人，他们自己固有的民族个性、另一部分是相邻的异国人的特性，一年年日益强烈），看一看，想一想：我们的战略薄弱点有多少个？为了保卫这一切，我们需要军队（根据我的，普通人的看法），需要远远超出我们邻国的军队。再则，以现在与其说是以武器作战，不如说是以智慧作战这点而言，您知道，后面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尤其不利。

现在几乎每隔十年武器就更新一次，甚至不到十年。再过十五年可能已经不是用枪支射击，而是某种速射武器、喷射燃烧的电火之类的武器射击。请问，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发明什么，作为对付我们的邻居们的不时之需？如果十五年之后每一个伟大的强国都制造出一件那种武器，秘密地储存起来，以备万一，我们应该怎样办？我们只能仿造，购买别人的武器，我们还会修理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发明这些机器，需要有独立自主的科学，而不是购买的；自己的，而不是舶来的；需要扎根于本国的、自由的科学。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科学；即使是购置的也还没有。再拿我们的铁路来说，看看我们的疆土和我们的贫穷；比比我们的资本和其他大国的资本，您就会明白，从我们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需要来说，我们的道路网能够说是相称的吗？您会发现：在人家那里这些道路网早已建成，是逐步建设的，而我们则必须追赶上去，加紧步伐；那里的网是小的，而我们则简直像太平洋。我们现在已经痛感到仅仅是我们这个网的开端就要付出多少代价；它的标志就是不惜伤害业已贫困

的农业和其他工业，把大量资金投到一个方面去。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金钱的数量，还不如说是民族努力的程度问题。其实，如果一一列举我们的需要与缺陷，那是数说不尽的。最后，再以我们的教育也就是科学来说，请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多少事情需要追赶人家。据我的粗浅看法，我们如想赶上任何一个强国，考虑到时间已经耽误了很多，我们没有这笔钱，最后，还得考虑到的是，这一切只能是一次推动，而不是正常的工作，可以说，是掀起一次震动，而不是教育，——我们每年应该用于教育的钱，至少应该同用于军队的相等。

显然，这都是我的幻想；但是……再重复说一遍，有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要幻想这方面的事情，因此我的幻想还是要继续下去的。看得出来，我是在用钱衡量一切；然而这是正确的考虑吗？无论如何也不是一切都能用钱买到的；只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的喜剧中某个没有教养的商人才能这样处事。比如说，您用钱可以建立学校，教师却不能立即培养出来。教师——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人民的、民族的教师是若干世代培养出来的，是靠世世代代的传统、无数的经验哺育出来的。不过，假定说，用钱不仅能造就教师，甚至最终造就出学者来；那又怎样呢？——终归还是造就不出人来。他是一位学者，如果不通晓事理，那又有什么意义？又如，他把教育学背得通熟，在讲台上把教育学的课程也讲授得很精彩，而他自己却毕竟没有成为教育家。人，人——这是最重要的。人甚至比金钱更可贵。人是无论用多少钱，在任何市场上都买不到的，因为人不是通过买卖所能得到的，说来说去只能经过若干世纪培育出来；需要漫长的岁月，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即使在我国这个时间不值钱的地方，时间也是漫长的。有独立的科学和思想的人，独立从事事业的人，只有经过民族的长期独立的生

活，经过民族的世世代代艰苦卓绝的劳动才能够成长起来——总之，是国家的全部历史生活培育出来的。而我国的历史生活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并不完全是独立的。人为地加速人民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和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是绝不可能的。我国自己的生活中就有过这种事例，而且一直存在到现在：早在两个世纪前我国就想加快步伐，全面追赶上去，结果适得其反，停滞了；尽管我们的西方派发了一大通豪言壮语，我们却毫无疑问是停滞了。我们的西方派——就是这样一种人，今天，他们幸灾乐祸地、盛气凌人地大喊大叫地说，科学、健全的理智、耐心和技能，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欧洲的后面爬行，在一切方面都奴隶般地模仿欧洲，接受欧洲的监护，连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独立性都是罪过；而明天，您只要稍一开口，对两个世纪之前施行的变革[①] 所起的绝对有益的作用表示一点怀疑，——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叫嚷，说你们关于人民的独立性的幻想——不过仅仅是克瓦斯、克瓦斯，最后还是克瓦斯，两个世纪之前我们从野蛮人的乌合之众变成了最有教养、最最幸福的欧洲人，我们躺进棺材的时候也应该满怀感激的心情记住这一切。

我们暂且不提西方派，假定说，用钱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可以购买时间，可以设法利用蒸汽制造生活的独特性；试问：从哪里得到这些钱？我们现在的预算将近半数都是来自伏特加[②]，就是像现在这样，是以人民的酗酒，人民的堕落，——可以说是整个人民的未来为代价的。可以说，我们为我们的伟大欧洲强国的巨额预算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砍树是

① 指彼得大帝的改革。
② 俄国白酒。

从根上砍，为的是尽快取得成果。谁希望这样做呢？这种情况是身不由己地、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事件的严格历史进程促成的。我们的人民是由伟大君主的话获得解放的，没有新生活的经验，从未独立生活过，在新的道路上开始迈出自己最初的步伐：转折是巨大的，非同寻常的，几乎是突然发生的，就其完整性而言，就其性质而言，几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被解放了的勇士在新的道路上迈出的这些最初的独自的步伐面临巨大的危险，要求高度的谨慎；而实际上，我们的人民在迈出最初这些步伐时遇到的是什么呢？社会上层的动摇，我们的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若干世纪的脱节（这就是最主要的），最后是——劣质酒和犹太人。人民则大吃大喝起来——开始是出于高兴，后来就成为习惯。是否给过人民比劣质酒更好的东西？曾否给人民排遣过忧愁？曾否教导过他们做什么事情？目前在一些地方，甚至是在很多地方，已经不是数百个居民平均有一座酒馆，而是数十人就有一座；还有更少的——不到几十人。有些地方平均五十人一座酒馆，有的还不足五十人。《公民报》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已经报道过一次现在的酒馆的细账：不能设想这些酒馆只靠酒就能够生存下去。那么它们是靠什么支撑自己呢？人民的堕落、盗窃、窝赃、高利贷、抢劫、破坏家庭和人民的可耻勾当——这就是它们赖以生存的东西！

母亲喝酒，孩子也喝酒，教堂里冷冷清清，父亲则去抢劫；伊万·苏萨宁[①] 铜像的手被锯下送到酒馆里；酒馆居然收

① 伊万·苏萨宁（？—1613），俄国农民、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英雄。1613 年冬为波兰干涉者军队带路，将其引进无路通行的森林沼泽地，因而被虐杀。

下了！只要向医学请教就够了：醉鬼的双亲能够生出什么样的后代？不过，但愿但愿，（上帝保佑！）但愿这只是悲观主义者的一个想象，把灾难夸大了十倍的想象！我们相信，愿意相信这是夸大，然而……如果在最近十年、十五年人民酗酒的嗜好（这是确切无疑的）没有减轻，依然如故，这就是说，还更严重了，那么——上述整个想象岂不成为现实？我们需要成为大国的经费，因此就非常非常需要钱；请问：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持续不变，谁能在这十五年当中支付这笔钱？劳动和工业？正常的经费只能来自劳动与工业。但是，在酒馆林立的情况下，能有什么样的劳动？在一个国家里，真正的、正常的资本的产生是以普遍的劳动财富为基础的，只能如此，否则就只能形成富农和犹太人的资本。如果事情像现在这样持续下去，如果人民自己还不醒悟，未来必然是这样；知识分子也无能为力。如果不醒悟，那么全体人民在最短时间内就将全部落入形形色色的犹太人的手中，到那个时候，什么村社也救不了他：整个村社都只能成为彼此毫无区别的穷人，成为靠典当度日的、沦为奴隶的穷人，而犹太人和富农将替他们支付生活开支。渺小的、极端卑鄙无耻的资产者和被他们奴役的多得不可胜数的贫穷奴隶就出现了——这就是未来的画面！犹太人将要吮吸人民的血汗，用人民的堕落和卑躬屈膝养肥自己，但是，由于生活开支是他们支付的，当然，他们就应该得到拥护。这是令人厌恶的想象，可怕的想象，——谢天谢地，这仅仅是一个梦！九等文官波普里辛[①] 的一个梦，我同意说这是一个梦。这个梦是不能实现的！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挽救过自己！他在自己的

① 果戈理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他有许多幻想，甚至认为自己是西班牙国王。

身上总是能够找到足以自卫的力量；在自己的身上找到足以自卫和自救的本能，——而这正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人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人民自己不愿意下酒馆；他希望劳动和正常生活，要有荣誉，而不是酒馆！……

谢天谢地，这一切似乎正在得到证实：至少是有了征兆；我们已经提到过戒酒协会的事。不错，这些协会刚刚开始工作；最初尝试的力量还薄弱，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只希望不要因为某些理由去妨碍他们开展活动！相反，——如果支持他们就更好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先进人士、我们的文学家、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宗教界以及所有那些每月都在报刊上表白，对人民的义务的沉重压力已使自己精疲力竭的人们①都从自己的方面来支持他们，那将会怎样！如果我们的正在成长起来的学校教师也来支持他们，那将会是怎样一副情景！我知道，我是不切实际的人（现在，在斯巴索维奇②先生不久前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说之后，承认自己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是针对民粹派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的评论而发的。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说："……是由于思想的'逻辑发展'……还是由于直感，由于长时间的思索，还是由于突然间的闪念，是出自崇高的全人类思想，还是出自直接的观察，总之，我们形成了一种思想，这就是，我们是欠人民的债的人……欠了多少债以及偿还的方法我们是可以有争论的，但是，这笔债留在我们的良心上，我们愿意偿还……我们欠人民的债是数不清的……这些承认自己欠了债的、可怜的 citoyen 们（公民们——法文）的良心是如何痛苦，尤其是因为债主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债主……如果您，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就好了。"

② 弗·达·斯巴索维奇(1829—1906)，俄国律师、作家。他在辩护词中经常把人分为各种心理类型，如务实型与不切实际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篇文章时，斯巴索维奇正在为被控挥霍银行存款的一名从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成员进行辩护，认为被控告者属于不切实际型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文中嘲讽这种观点。

荣幸），但是我——请想——我认为，即使是随便哪一位最贫穷的学校教师，只要有愿望，仅仅凭自己的主动精神就能够做很多事情！这里重要的是人，是性格，重要的是有事业心的人，真正有做事愿望的人。现在，在我们这里在教师职位上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虽然有做好事的愿望，但不了解人民，疑心重重，不相信人民；在最初几次有时是热忱的、高尚的努力之后，很快就厌倦了，心情忧郁，开始把自己的职位视为向更好的职位过渡的跳板，然后——或者彻底沦为酒徒，或者为了多得十个卢布就抛弃一切，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甚至竟无缘无故地走开，直至去美国，“为了在自由的国度体味自由劳动的滋味”。从前是这样，据说，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在美国，任何一个可恶的老板都可以用粗笨的手工劳动折磨他，克扣他，甚至对他拳脚相加，而他呢，每一拳都使他激动，并且感慨万分地说：“上帝啊，同样是一些拳头，在我的祖国怎么竟是那样反动、可憎，相反，在这里却是高尚、舒服，而且是自由主义的！”他还会长期这样想；怎么能因为一点儿区区小事而改变自己的信念呢！我们不必去管他，就让他待在美国吧；我还要继续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再提醒一次——就是，即使是一位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教师，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肩负起使人民摆脱酗酒恶习的全部创举，发挥主动精神。我还有一篇小说的情节①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可能，在小说写成之前，我先冒险把情节告诉读者……

---

① 可能指札记《学校教师》以及与之有关的长篇小说《少年》初稿的情节线索。

# 关于一个新剧本

（《公民报》，1873 年 6 月 18 日，第 25 期）

这个新剧本就是吉申斯基[①]先生的《一饮而尽，灾祸降临》，我们下决心在《公民报》第 25 期一次刊出该剧的后三幕，占用了一期杂志将近一半的篇幅。剧本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想给读者完整的印象，读者大概也会同意这样做。剧本是为人民剧场写的，作者熟悉他所写的事情，态度明确，表现了不容置疑的才华——这是主要的，特别是现在，几乎没有出现新的有才华的人。

剧中人物全是工厂生活、“工厂村庄”的各种人物的类型——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刻画清晰有力。情节就在剧本中，我们就不详细叙述了。思想是严肃的、深刻的。这是实实在在的悲剧，fatum[②]悲剧——就是伏特加酒；伏特加酒在维系一切、迷惑一切，在支配一切、毁灭一切。显然，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不以更开阔的目光观察他所描绘的世界，虽然他的剧本的名称已经宣告他的剧本的主题就是：一饮而尽，灾祸降临。此外，在当代制度的巨大改革[③]之后，经济上与道德上所有的激烈动荡在剧中都有反响。从前的世界、从前的秩序——是非常脆弱的，但毕竟是秩序——一

---

① 吉申斯基，生平不详。写过剧本与政论，剧本取材自农民生活。剧本《一饮而尽，灾祸降临》获征文奖，但被禁止演出。此后似未再发表作品，传说此人后来酗酒，死于自杀。

② 法文：命运，注定的。

③ 指 1861 年俄国的农民改革。

去不复返了。而奇怪的是：从前的秩序中那些道德的阴暗面——利己主义、卑鄙无耻、奴隶心态、离心离德和叛卖行为——不仅没有随着奴隶制生活的消灭而逝去，似乎反而更严重，更发展，更多了；从前生活中毕竟有过的、道德上那些好的方面，几乎都荡然无存了。这一切在吉申斯基的画面中都有反映，至少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在剧中一切都是过渡性的，一切都是动摇不定的——唉——甚至连将会有更好的未来的暗示都没有。

作者坚信不疑地指出，教育是救星，是唯一的出路；而现在呢——伏特加酒征服了一切，毒害了一切，使一切变得比从前更坏，迷惑并奴役了人民。俄罗斯农民摆脱了从前的奴役制又陷入了新的奴役制，吉申斯基先生描写的就是这幅新的奴役制的阴暗可怕的画面。

剧中有两种类型的人物——过了时的人和新人、年轻的一代。

作者熟悉年轻的一代。一种类型是作者喜爱的人物，是作者作为未来的希望、作为阴暗画面中的光明而塑造的，这些人物的刻画相当成功。（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们的作家们塑造的“正面的”形象几乎没有成功的。）至少玛丽亚的形象是无可指责的。她的未婚夫伊万就较逊色，虽然对他的描写是很忠实的。这个年轻小伙子漂亮、勇敢，有文化，见多识广，了解新事物，为人善良、正直。他的缺点就是，作者对他稍有偏爱，把他表现得过于正面。作者对他如果有所否定——读者的印象就会更有利于作者所钟爱的人物了。当然，作者是一位敏锐的艺术家，他没有忽略自己的伊万的最不利的性格特点。伊万有坚强的毅力，卓越的智慧才能，但他年轻，自视甚高。他坚信真理与正确的道路，却把真理与众人混为一谈，不正确地

向人们提出他们不可能做到的要求。例如，他知道一些法律，因此文书“列万尼德·伊格纳季奇”不敢直接攻击他，但他过于天真地相信自己的知识，因而对恶就毫无防范，不仅不知道危险，而且没有想象到会有危险。这一切都恰如其人，应该说，写的是成功的，因为他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仅如此，作者还抓住了许多最令人产生好感的细节：瓦尼亚[①]虽然知道恶棍们（而且是与他为敌的恶棍们）的所有卑鄙无耻之处，然而他年轻，朝气蓬勃，精力旺盛，热爱世上的一切，他不能只是嫌弃那些人，他还跟他们交往，跟他们一块唱歌。这一年轻人的特点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我再说一次，作者太喜爱他了，一次也不肯从更高的角度观察他。我们认为，光是忠实地再现人物全部的原有特征还是不够的；必须以自己艺术家的观察透彻地阐明人物。真正的艺术家绝不能与他笔下的人物处于平等地位，满足于人物的实在的真实这一点：这样造成的印象不会有真实感。作家对人物的自以为是和年轻人的傲慢如果稍加一点点嘲讽的语气——读者就会觉得他更可爱。否则，读者会以为，作者就是想把他写成完全正确的人，在他遭遇的所有不幸中，他自己一点儿过错都没有。

年轻一代的另外一些人物——这是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给毁掉的人们，“被牺牲了的一代”，这些人物写得比“正面的”类型更为成功。这些人物可以分为两类：无辜的和有罪的。例如，这里有个女孩子（玛特廖莎）——她是被牺牲了的、不幸的人，最令人可怕的是，您会感到，像她这样的人，不仅仅只是一个，这类“不幸的人”在我们俄罗斯举目皆是，遍布在所有农村，数不清有多少。这种描写的真实性迫使有心肠的人和

---

① 伊万的昵称。

自觉地思考我们未来的人为之震惊。这已经是在改革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一代人在刚进入童年时期就遇到家庭的瓦解和可耻的普遍酗酒，再往后就直接落进工厂。可怜的女孩子！她行为放荡，大概才十二岁就是这样了，而她自己甚至还不知道她是行为放荡的人。圣诞节她从工厂到农村休假，看到从前的女友、农村姑娘玛莎把忠贞看得比衣着还重要，这使她真正感到惊讶："你看，斯切潘·扎哈雷奇，一眼就看出，没教养！"她说道，"商人或者老爷调戏姑娘，这有什么不好的。"她这样说，是因为她完全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是正确的，此外，她还怜悯玛莎和农村的姑娘们；当玛莎推开无耻商人的时候，她毫不掩饰地说："你何必跟这种人废话！别理她！要是把她换上别的姑娘，高兴还来不及呢！自己就勾引他们，允许他们了，自己得到好处，也让兄弟满意！"最后，这个不幸的姑娘给玛莎下了迷魂药，因为她跟商人密谋，在可怜的、忠贞的玛莎失去知觉后强奸玛莎，此后，她又爬上炕炉去看牺牲品是否睡着了，她在做这件坏事的时候，不仅没有意识到这是罪恶，而且还深信，她是在为自己从前的女友玛莎做好事，做有利可图的事，事后玛莎还会为这件事感谢她呢。在第五幕，在最后这场可怕的灾难中——无论是玛莎的绝望，她父亲和她的未婚夫的绝望，还是眼看着就要闹出的人命，——都没能使她后悔；其实，她已经连一丁点儿良心都没有了，——她身上哪里有良心的容身之处呢？她耸耸肩膀，张口就讲出自己说惯了的话："没教养！"作者描绘这个人物的艺术特征的最后一笔时，还没有忘记这句感叹话。可悲的命运！人这种东西竟变成了腐烂的蛆虫之类，而且还心满意足，为自己的可怜的见解扬扬得意呢。

这都归罪于环境，这都归罪于fatum[①]，这个不幸的姑娘是无辜的，对此，您是理解的。但这里还有另一种类型，剧中最完整的类型——玛莎的弟弟，一个堕落的、骨瘦如柴的、难看而又令人厌恶的工厂年轻人，他后来为了三百卢布和一件丝绒大衣把自己的姐姐卖给了商人，——这，哎，这已经属于“被牺牲了的”一代中的有罪者了。这已经不能只归罪于环境。是的，情况相同，环境也相同：酗酒、道德堕落的家庭和工厂。但是这一个不像玛特廖莎那样头脑简单，把堕落当做好事，他不像玛特廖莎那样由于头脑简单才干卑鄙的事，他是出于内心的喜好，他对卑鄙行为有自己的理解。他懂得堕落就是堕落，他也懂得怎样才是不堕落；但他从心中喜欢堕落，蔑视正直。他自觉地否定家庭和风习的旧秩序；他既愚蠢又迟钝，这是事实，但他的纵欲和最卑鄙、最厚颜无耻的唯物主义达到狂热的程度。他已经不单单是玛特廖莎那样的一具渺小、干瘪的蛆虫。他在村社的群众集会上一站，您就会感觉到，他对村社已毫无所知，他也不可能理解，他已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人，已经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了。他在良心上毫无内疚地出卖姐姐，他穿着丝绒大衣，背着新的手风琴，一清早就来到父亲的家中，看到绝望的场面。他只相信有一种东西是威力无穷的；这就是——伏特加酒。他有一种愚钝的但却很可靠的手段，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把伏特加酒摆出来——给农夫喝味苦的，给农妇喝味甜的，他深信，他的任何如意算盘都能实现，伏特加酒没有办不成的事。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极端的卑鄙无耻与过去的那种谦恭态度、农村固有的那种“礼貌”同时并存于他一个人的身上。来到农村，在同

① 拉丁文：命运。

母亲见面之前，先坐进酒馆里，有礼貌地派人从酒馆给母亲送上甜伏特加酒。为了从容不迫地哄骗她同意把亲生女儿卖给商人，任其凌辱，他和玛特廖莎把母亲引诱到酒馆里，他首先恭敬地献上甜伏特加酒，并用手指着座位说："清（请）坐，情（亲）爱的妈马（妈）"，这种"里（礼）貌"使母亲感到非常满意。读过剧本第一幕的人曾指责我们的作者在使用农民语言方面太"自然主义"了，认为语言本来还可以再标准一些。我们也不赞成语言的这种自然主义；一切都应该是艺术性的。但是，仔细通读一遍剧本，再读它一遍，您不知不觉地就会同意，至少在有些地方，语言不能改动，否则，就会损害剧本的特点。这句"清坐，情爱的妈马"是不可能改动的：要不就表现不出卑鄙了。您会看到，这个儿子并不比尊敬自己的鞋掌更尊敬这个龌龊、愚昧、喝得醉醺醺的老太婆、自己"情爱的妈马"。

你看这个家庭的父亲、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子关于"被牺牲了的一代"所说的可悲的话：

扎哈尔 （把一杯伏特加酒一饮而尽）全是醉鬼！你们线（现）在想想吧，朋友们：这个工厂的人在机器旁边坐了整整一个礼拜，手和脚全都麻木了，脑袋里好像一团雾！人好像全都变傻了！厂房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四面的墙是光秃的——最好别去看它！阳光照不到这里！每逢节日才能见到太阳！哎，朋友们，前几天，节日一到：你老人家念圣经，别的人跑到田地里看庄稼，还有的去森林，有的去养蜂场，有的跟邻居聊天——聊村公所、村社、粮食的价钱——你说说看，工厂的人有什么地方可去？有什么可说的？他的一切都是精打细算办的！无非是说说，不知道为什么罚了款，发放发霉的食品，值一个卢布的茶叶要两个半卢布，不准走出

厂门，这是为了要人们买他的东西，为了闹出更多的堕落事！还不就是说这些话！唔，这就是说，只有进酒馆这一条路好走！谈的也只是伏特加和伤风败俗的事。

瓦西里 一点不错！

扎哈尔 你们想想，伙计们，他们也想休息！也是年轻人！凑个合唱团，唱歌，欢笑——当差的人却不准！那么就成群结队地上酒馆、饭馆！议论姑娘，比赛喝酒！你看看吧，在工厂里都干些什么！十二岁的小丫头就去找姘头！摇线工人喝酒像喝水！工厂里到处在骂娘、在干无耻的勾当——不停的呻吟，简直是活地狱！孩子学习大人的坏样子！咱们明知是把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推，可还是往那送！在工厂有哪一个姑娘不堕落，有哪一个小伙子不是醉鬼？

不过，这个民间戏剧的所有场面中最有特点的是第三幕，村社会议①的场面。剧本的这个场面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村社会议——这就是人民的俄罗斯体制中保存下来的全部最牢固的、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的、历来就有的联系和它主要的未来的希望，——现在这种会议本身已经包含着自己的瓦解的因素，它已经病入膏肓！您会看到，在很多方面它已经只是一种形式，它的内在精神，内在的古老的真理已经摇摇欲坠——同摇摆不定的人们一起摇摇欲坠了。

在这个会议上出现了令人愤慨的不公正现象：违反惯例与法规，把寡妇的儿子（戏剧的主角伊万）抓去当兵，以替代有钱人家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最恶劣的是，这是自觉干的，是自觉地蔑视真理与惯例，为了酒为了钱而干出来的。在这件事上没有贿赂；如果是由于受贿，问题还不是太严重；受贿可能

①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前农民村社的成员会议。

是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还可以纠正。不，在这件事情上，一切几乎都是出于自觉地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审判，也可以说，不尊重自己本身的生活体制。玩世不恭表现在违反惯例和古老的规则上，会议的领导者们在开会之前大吃大喝，同时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带着酒味审判更公正。"前来开会的村民有一半人早已不信任村社的决定，也就是说，不相信村社决议的必要性；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形式，随时都可以避开。为了眼前的好处，就可以而且应该不管它是不是真理。再过不久，您就会看到，新式的聪明人会认为整个这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蠢事，纯系一种毫无必要的负担，因为村社的审判说来说去都是符合有钱有势的操纵村社会议的吸血鬼的要求的。与其诉诸这种没用的形式，还不如直接听从吸血鬼的支配。何况吸血鬼还给伏特加酒喝。您可以看到，大多数自治成员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决定本来也可以不顾有势力的人物的意愿；他们全都成了"软骨头"；全都脑满肠肥了；他们全都想尝到甜头，得到物质好处。所有这些人实质上是奴才，已经不能想象他们可以做出为真理而不是为一己利益的决定。年轻的一代就在现场，亲眼目睹父辈的所作所为，不仅毫无敬意，不仅嗤之以鼻，他们还认为这是一种过了时的荒唐事，纯粹是愚昧的、毫无用处的形式，它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仅仅是由于两三个愚昧老头子的顽固不化，而这几个老头子是随时都可以收买的。斯捷潘，也就是那个瘦弱、讨厌、喝酒喝穷了后来又卖了自己姐姐的年轻人，他在会议上就是这样看、这样做的。作者成功地描写了村社会议的全部情节。主要的是写出了斯捷潘不仅对村社会议毫无理解，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理解它，在这点上可以说斯捷潘是对的。他不可能看不到会议已经受到商人的外来影

响，帮助商人毁灭了万卡[1]，夺走了他的未婚妻。村社喝了商人的酒，允许商人的管事人高声对自己说话，商人、商人工厂主让他们在工厂干活挣饭吃，如果没有商人工厂主“你们全乡就得在教堂台阶上讨饭吃，如果按照商人的要求进行审判，老板、商人为此就可以少要很多罚款”。当然，事情的结果有利于商人，把万卡送去当兵。

会议（由于各种各样的人与性格，会议非常杂乱）上有两个几乎可说是悲剧性的人物；一个是纳乌姆·叶戈罗夫，他是在村社会议的第一把交椅上坐了二十年，掌管会议的老人，另一个是伊万的母亲斯捷潘尼达。纳乌姆·叶戈罗夫是个精明、坚定、正直、心地高尚的老人。他是从崇高的角度看待会议的审判的。在他的眼中，这不是某个村庄的家长们的简单聚会；他在感情上对村社会议的理解是：审判虽然只是村社会议做出的，他认为，这好像是整个农民的俄罗斯做出的审判的一个部分，而这个农民的俄罗斯只是由于有村社和村社的审判才得以持续存在下去。但是，唉，他很精明，他不会看不清楚村社已经开始动摇，而这动摇已经有一些时间了。当然，徇私舞弊、为非作歹在从前的会议上也时有发生，二十年前就有过；但是，会议自己的成员不尊重会议，不尊重自己的事业却未曾有过，至少是没有成为准则。过去人们做了坏事，但他们知道那是做了坏事，同时也知道什么是好事；而现在则不相信有好的事情，甚至不认为做好事是必要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纳乌姆是最后的一个莫希干人[2]，他总是要尽量、甚至强制

① 万卡以及下文提及的瓦尼亚、瓦纽沙，均为伊凡的昵称。

② 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衰亡的种族。美国作家库珀(1789—1851)的长篇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问世后，最后的莫希干人一词即被用以比喻正在衰落的种族或社会集团的最后代表人物。

自己相信村社的真理，——他的悲剧也就在这里。他是形式主义者；由于感到内容正在丧失，他就更紧地抓住形式。他看到全村社每一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因此要求推迟会期，但当人们喊叫“带着酒味审判更公正”时，他屈服了：“村社决定了，不能冒犯村社。”他心中很清楚，也不无痛苦。他知道，实际上他们用的文书列瓦尼德·伊格纳季奇一手遮天，商人的管事人指示村社会议如何做决定，会议就做什么决定。但是这位老人只要有机会，依然要自己欺骗自己，尽管他这样做是很勉强的；他把列瓦尼德从第一个座位上赶下来，作为会议主席，他因商人的管家讲了没有礼貌的反对村社的话而教训他。

有几个主持正义的人发言为万卡辩护，夸奖万卡，说他是明白事理的、村社用得着的好小伙子，应该珍爱这样的人。可是在人们中间突然有个年迈的、喝醉了的人冒出来：“嗯，因为他是最好的，送他去当兵比别人都好！”这已经是公然嘲弄真理，以不讲理为荣，戏弄……审判者自己嘲笑自己，而且是在关系人的命运的事情上！纳乌姆全听到了，当然也明白，他的“村社”寿终正寝了。伊万的母亲也在现场。这是一位岁数不大、坚强、高傲的农妇。她早就年轻守寡了。因为她是寡妇，村社就欺负她、亏待她。但是她挺住了，她修缮了房屋，把自己唯一的心爱的瓦尼亚抚养成人，这是她的欢乐，她的安慰。可是——现在听到，村社要夺走她最后的指望，最后的欢乐，她的儿子。纳乌姆·叶戈雷奇[①] 察觉到村社要通过醉汉胡闹的决议，他急忙告诉斯捷潘尼达：“唉，没有办法！村社有权力！求求情吧，斯捷潘尼达，求求村社吧！”但那一位却不愿意哀求。她倔强地斥责村社不公正，受贿，决议是喝醉后做

① 即纳乌姆·叶戈罗夫。

的，村社忌妒她的万尼亚。“斯捷潘尼达，你惹恼了村社没有好处！”——纳乌姆惊恐地劝告她。“纳乌姆·叶戈雷奇，你想想，”——斯捷潘尼达回答他说，——“我要是看到这里有法律和良心的话，——可这里是伏特加酒！我要是知道在这里哀求有用，我会在潮湿的土地上把膝盖跪破，用自己的眼泪刷洗地板，叩破脑袋，向村社苦苦哀求！可是在这里哀求没有用，感动不了他们！难道你还没有看见——这里全都串通一气，背地里安排定了！他们这群乌鸦要陷害雄鹰，要啄吃它！你们这些人都把自己的灵魂换酒喝啦——你们向谁祈祷——向伏特加酒祈祷！谁给的多——谁就能把你们买去。万尼亚啊，你得罪了商人，难道你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商人喝醉酒爬上炕炉糟踏了瓦尼亚的未婚妻！你们全知道！商人的酒堵住了你们的嘴！你们这伙不要脸的东西，吸血鬼！我抚养孤儿还犯了罪！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的！你们办不到！调解人知道瓦尼亚——不会让他受冤枉！（她快步走开）”

这位高傲的女人是我们的艺术家笔下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先生们，无论你们怎样看，这可是有力之笔。当然，这是俄罗斯农村，而人物则是说话言词不通顺的普通农妇，但是，说实在的跪破膝盖、“我要是知道在这里哀求有用”这些独白胜过类似的其他悲剧中许多慷慨激昂的言词。这里没有经典性的词藻，没有美妙的语言，没有洁白的罩单，没有拉舍尔①那双乌黑晶莹的眼睛，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假如我们有自己的拉舍尔，在舞台上母亲诅咒村社法庭那个场面，母亲讲的一针见血的真实会使你为之战栗。结束这个场面的情节蕴涵着许多

① 拉舍尔（1812—1858），法国的悲剧女演员，19世纪50年代曾在俄国演出。

意义——跑去向“调解人”寻求真理，控告村社的审判，而这是面临重重困难的预言。

继续一一列举这部作品的所有成功的场面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不能不说说我的印象。可以开门见山地说：我很少读到比第四幕的结尾更有力、更悲惨的东西。

被母亲和弟弟出卖给商人的牺牲品喝下迷魂药之后，睡倒在炕炉上，毫无知觉。玛特廖莎这个天真的罪人爬上炕炉去察看，她从心里认为她现在给玛莎找到了幸福，高兴地告诉商人：“妥当啦！你就是一刀一刀地割她，她也不会动一动！”商人的朋友、文书列瓦尼德站起身来，一边向外走，一边说：“生活全属于你们商人！”——他的话流露出忌妒的心情。而商人呢，他在爬向自己的猎物之前，诗兴大发：“我们现在就是力量！”——他以淫荡的腔调，像预言家似的大声说道。——“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假如商人现在想做什么，——一定能做什么——因为有力量！”“力量——没话可说！”——牺牲者的弟弟随声附和地谄媚说。此后，其余的人都走出屋子，这个坏蛋爬到玛莎身边。出卖了自己的清白女儿、不幸的万尼亚的未婚妻的母亲喝得烂醉如泥躺在地上，在这一家人的父亲脚旁睡着了，这位幸福家庭的父亲同样也已醉得不省人事了……一饮而尽，灾祸降临！

我不再一一列举这幅以其真实而令人惊心动魄的可怕画面的全部特点了，——这些人犯了罪，可几乎不明白自己犯了罪；而明白自己犯了罪的人则失去了谴责罪行的权利，例如这一家人的父亲，他的女儿惨痛地面对面地斥责他，向他发出女儿的诅咒……有一些描写十分深刻细致的情节：苏醒过来的玛莎想要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她却穿上商人留给她的丝绸长衫，是下狠心穿上的，为了折磨自己，残酷地折磨自己：

看，现在自己也成荡妇了！下面是在灾祸发生的第二天，“无辜的”母亲与“无辜的”玛特廖莎的一段对话：

玛特廖什卡[①]　（走进屋子）你好，阿莉娜[②]婶子！你们在干什么呀？说实在的，昨天我都没敢到你们家来！

阿莉娜　唉——唉，姑娘，熬过了多么可怕的一天呀！可怕极了！闺女早晨一发现了这回事，她就抓起了刀子，差一点儿把我们全都宰了，末了宰自己！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制住！斯捷普卡[③]现在连面也不敢露！

玛特廖什卡　他告诉我了！

阿莉娜　唉，到晚上才放开她，——她现在像块石头！她说，上帝是因为玛特廖什卡惩罚我，现在——她说——自己也跟玛特廖什卡一样了！刚才，我把西兰季·萨维利奇[④]从你那儿给她买的长衫给了她，她穿上了，——她说，我成了玛特廖什卡，穿上了她的长衫！我成什么了！

玛特廖什卡　现在她在哪儿？

阿莉娜　在干草棚里，一头扎进草堆里，还在那儿趴着呢！

玛特廖什卡　可别寻短见呀！

然而牺牲者并没有寻短见：事后“觉得可怕”，她自己这样说。我们的艺术家深谙人民的心理。再看看万尼亚，他到调解人那里去了一昼夜，又突然从那里回来了。为了真实，作家没有袒护自己的主人公：伊万刚登场时，盛怒之下，一味责怪

---

① 玛特廖莎的昵称。
② 玛莎的母亲的名字。
③ 斯捷潘的小名。
④ 商人斯捷潘的名字及父名。

玛莎一个人，有失公正，令人反感。但是，他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似乎未加思索就要求玛莎就是这样嫁给他。不过，作家很清楚，只要事关贞节，这在我们人民的风俗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被凌辱了的姑娘，尽管是受了欺骗，没有罪过，在人们的心目中即使不是完全不清白，毕竟还是不清白的。何况玛莎为人也是高傲的："不要沾我，万尼亚！"她喊道，"走开吧！""再见，万尼亚！"——接着是最后一次独白。她快步走近桌子，倒满一杯伏特加酒，用亮晶晶的目光扫了一眼周围的人，用绝望的恶狠狠的怪腔怪调大声喊道："喂，垂头丧气干什么？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妈妈！爸爸！喝吧，尽情欢乐吧！爸爸，你不再是一个人去逛酒馆啦！跟女儿一块去！妈妈，从前一个人喝太寂寞，现在是咱们两个，跟女儿一块喝！把杯斟满！让酒淹没我的痛苦和我的良心吧！"

于是把酒杯举到唇边。剧到此结束。

我不是说毫无缺陷；但在这部作品中有那么多真正的优点，相形之下，这些缺陷也几乎是不值一谈了。例如，在玛莎以美妙激昂的内心活动而结束的第四幕中，玛莎独白说："现在同流合污就容易了！"——语调有点儿太悦耳了。其实，这不太像独白，而是心绪、情感，——就是在这种心绪和情感影响下，俄罗斯人谱写了融和着心灵和诗意的俄罗斯人民的歌曲。玛莎的心绪实质上是极其真实的，自然的，从自己的表达形式而言可以说是有些抒情性。但是，艺术有自己的分寸和规律，独白可以简短一些。也许，剧本的尾声，在灾祸降临之后，玛莎的语言不够真实：如果她少说些就会更好些。她对父亲说的那些严酷的话，要是简短一点儿，韵律不那样强，效果就能加强许多。不过这都是能够修改的，作者在再版时很可能

加以修改。再说一遍，与作品的无可争议的优点相比，可以说这些不足都是细微末节。作者如果把出现于剧本的结尾（根本没有必要的），大谈我们“对人民的义务”的那个品德高尚的老头儿——厂主的话完全删掉，那就会更好一些。正是这个老厂主奴役周围一带所有的人，任意以罚款惩罚他人，并给工人吃发霉的食物，因此，让他出现就太荒唐了。最后，关于这一家的主人扎哈尔，交代不太清楚。他自己解释他酗酒的原因时，好像有点儿虚假，有点儿不清不楚和牵强附会；其实事情本来可以处理得更简单、更自然些。

不过，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可能错了，但是我相信，肯定这部严肃作品的那些毋庸置疑的成就，我是没有错的。我非常愿意与读者交流我的印象。最近时期，可能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的文学里至少是没有出现过一部比这部作品更严肃的东西……

## 街头即景

（《公民报》，1873年7月16日，第29期）

### 一

夏天，度假；尘埃和炎热，炎热和尘埃。留在城里，日子是难熬的。人们纷纷离开。近日想读一读编辑部积压的稿件……关于这些稿件虽然有些话该说，不过，还是等以后再说吧。我需要空气、轻松和自由自在；但是，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满是沙尘和石灰的街道上闲逛，得不到空气，也谈不上自由自在，你会感到自己好像受了什么人的欺负——真的，很像是这种感受。显然，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在这件事上对不起你的人，苦恼就会减轻一半，如果一个人都找不到，那就会更加懊恼……

近些天来在涅瓦大街上人们都是从向阳的那一面过到没有阳光的那一面去。谁都知道，横穿涅瓦大街时，总是要小心翼翼，稍一疏忽就会挨撞，——躲躲闪闪，左顾右盼，迈出危险的一步之前，先看准机会，两三列马车在大街上并驾齐驱，川流不息，稍有一点儿空当儿就得过。比如说，冬季，圣诞节前两三天，穿越涅瓦大街尤其有趣：您是在勇敢地冒险，特别是当白茫茫的寒冷雾气降落在城市的黎明时刻，三步开外就看不清行人了。驶向警察桥的马车行列从您身旁疾驰而过，您总算从中穿了过去，您正在为自己不再怕它们了而沾沾自喜，马蹄声、车轮声和车夫们嘶哑的呵斥声已经离开了您，然而，您高兴得还是太早了：您危险地横穿涅瓦大街的行程刚刚到达路中

间，还须继续冒险，吉凶未卜。您慌慌张张地左顾右盼，匆忙地琢磨，怎样穿过身旁驶向安尼奇科夫桥的另一列车队。但是，您会感到根本来不及思考，何况还有那可怕的雾气：只能听见马蹄声和吆喝声，向周围张望只能看出一沙绳远[①]。忽然间，冷不及防地从雾中传来急剧密集、清晰有力的声音，越来越近，这声音很像六七个人用弯刀在剁木桶里的白菜，[②] 此时此刻听起来令人感到可怕和不祥。"往哪儿钻？向前还是向后？我躲得开吗？"不过，算你走运，过去了：在距您只有一步远的地方，突然从雾中钻出一个喘着呼呼热气的灰白马头，马正以特快火车的速度飞奔着，马嚼子上冒着白沫，马轭高耸着，缰绳绷得紧紧的，强壮漂亮的马腿迈出敏捷、匀称、有力的步子，每一步都有一沙绳远。刹那间，车夫一声惊叫，一闪就逝去了，从雾中来又到雾中去，马蹄声、剁菜声和嘶喊——一切全都沉寂了，如同一幕幻景。名副其实的彼得堡幻景！您在胸前画个十字，片刻之前还让您心惊胆战的马车，您已经不屑一顾了，您赶紧迈上想走的便道，您还在为刚刚经受的印象全身发抖。说来也怪，与此同时，您又莫名其妙地感到某种快乐，这完全不是因为您躲过了危险，恰恰是因为您经历了险境。我不否认，这是反常的快乐，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无益的，相反的是应该抗议，而不是快乐，因为奔跑的马是不讲自由主义的，它跟骠骑兵和狂欢暴饮的商贾一样，也就是说，不讲平等，放肆无礼，la tyrannie[③]，等等。我知道这些，也不想争论，现在只是把话说完。我接着说吧，最近一天，我像冬季习

① 相当于二点一三四米。
② 俄罗斯民间制作，类似中国泡菜的一步程序。
③ 法文：专制。

以为常的那样，小心翼翼地横穿涅瓦大街，我从聚精会神中清醒过来之后，立刻惊讶地伫立在街道中间：连个人影、车影都没有，连一辆吱吱咯咯作响的轻便马车都没有！向左右两边望出五十沙绳远都是空荡荡的，站在路中间跟朋友谈论俄罗斯文学也不会有一点儿危险！竟然感到有点儿遗憾。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情景？

尘埃和酷热，奇怪的气味，挖开的路面和改建中的房屋。为了摆阔气，有特色，旧建筑物的门面大都翻改一新。当代这种建筑艺术令人吃惊。总的说来，整个彼得堡的建筑艺术的极具特色之处，与众不同之处，而且总是令我惊讶不已的——这就是，彼得堡的建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毫无特色与个性可言。在最繁华的大街上，高楼大厦的旁边是残存的破烂的小木房，它们如同大理石宫殿旁边一堆朽木，异常刺眼，难道这些腐朽的小木房子就是自己的地地道道的特色。谈到宫殿，那么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宫殿上表现出贯穿于整个彼得堡时期[①]的思想上毫无特性和实质上的全部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与彼得堡相像的城市；从建筑艺术的观点看，彼得堡表现出世界上所有的建筑艺术，所有时期和所有流行样式的建筑艺术；亦步亦趋地借鉴了一切，又都按自己的主意歪曲了一切。好比读书一样，从这些建筑物上可以看到正常地或者突然间从欧洲涌向我们的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想和猥琐念头，这些思想渐渐征服和迷惑了我们。例如，上个世纪那些教堂的毫无特色的建筑，本世纪初那些罗马风格的不伦不类的复制品，又如

① 从15世纪后半期起，俄国首都在莫斯科，至1712年迁都彼得堡，所谓彼得堡时期，即指自1712年以来的俄国。

文艺复兴时代风格，以及据说是建筑师托恩[1]发现的古代拜占庭风格。还有那些医院、高等学校，甚至还有本世纪头十年到20年代的宫殿等几座建筑，都是拿破仑一世时代的风格，高大、矫揉造作的宏伟气魄与难以置信的枯燥乏味，这里有某种生硬牵强的、蓄意臆造的东西，其中包括绣有蜜蜂的拿破仑皇帝的红袍，这一切都是为了显示那时卷土重来的时代和安图与世长存的史无前例的王朝的伟大气魄[2]。这就是后来，但已晚了很多时期，我们有些贵族的那些邸宅，或者可以称之为宫殿。这已经是对某些意大利官邸样式的模仿，或者说是大革命时代前的并非纯法兰西的风格[3]。但是，数百年来，有多少代古老的贵族一代接一代地生活在那些威尼斯的或罗马的官邸中，直至今天仍然生活在那里。而我们的这些官邸只不过在前一个王朝才建造起来，当然，似乎也是做了千百年的打算，因为当时确立的秩序看上去已经充分巩固与完善，而这些官邸的建造则表达了对当时秩序的全部信念：也是准备在这些官邸里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然而，几乎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夕就发生了这一切，后来又是解放农民[4]……如果有那么一天，在这些宫殿上我看到附设娱乐场的酒馆的招牌，或者是接待过往行人的法兰西饭店的招牌，我会感到忧伤的。最后就是那现代的大饭店建筑——这已经是务实态度，美国精神，数百套客房，庞大的工业机构：一眼就可看出，我们有了铁路，我们忽然变

---

① 康·安·托恩（1794—1881），俄国建筑师。

② 在拿破仑一世的帝国时期，在建筑和造型艺术中盛行帝国的风格，它袭用罗马帝国的风格。

③ 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建筑的主导倾向是古典主义和洛可可的混合。

④ 指沙皇政府根据《1861年2月19日法令》进行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成经营事业的人了。可是现在，现在呢……的确，还不知道该怎样来评论我们现在的建筑。这是一种杂乱无章，这种杂乱还是与当前的混乱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很多高大的（首先是高大）住宅楼房，据说，楼房墙体极薄，工程简陋，正面装饰华丽：这里既有拉斯特列利式[①]，也有后期洛可可式[②]、督治宫式[③] 的阳台和窗户，窗户必须呈圆形，楼房必须是五层，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呈现于建筑的同一个正面上。“伙计，你一定得给我造督治宫式的窗户，因为我哪一点儿也不比他们任何一个衣衫褴褛的督治[④] 差；住房，你还是得给我建五层；窗户要像个窗户，楼要像一座楼；我不能把所有的钱花费在玩具式的东西上。”其实，我不是彼得堡的杂文家，谈起完全不该谈的事情来。从编辑部的稿件开头竟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 二

尘埃和酷热。据说，为留住在彼得堡的人们开辟了几处公园和消遣场所，让人们在那儿呼吸新鲜空气。我哪儿也没有去过，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可以呼吸的。在彼得堡更好一些，可是也更闷热些，更忧郁些。单独一个人边走边看，要比欢乐的彼得堡公园里的新鲜空气更惬意。何况在城里忽然开辟了很多公园，就连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都开辟了。现在几乎是每一条街上，你刚走近某处门口，一眼就可看见“酒店公园入口”的牌

① 弗·巴·拉斯特列利（1700—1771），俄国建筑师，俄国巴洛克式建筑的代表人物。

② 18 世纪前半期欧洲艺术的一种风格。

③ 在威尼斯，意大利 14—15 世纪哥特式建筑的杰出古迹。

④ 威尼斯共和国（7 世纪末—18 世纪）和热那亚共和国（14—18 世纪）的元首。

子，有的时候门口还堆积着石灰和砖头。四十年前，那是一所院子里的厢房前面用栅栏围成的十步长五步宽的小花园；这就是现在的“酒店公园”。请问，在彼得堡为什么星期日比平时更烦恼？因为酒？酗酒？还是因为像我亲眼看到的那些情景，醉汉们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在涅瓦大街上横倒竖卧，昏然入睡？我不认为是这些原因。逛大街的工人们并不妨碍我，从前我简直无法忍受，甚至厌恶他们，可是，现在留在彼得堡之后，我对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每逢节日他们都喝得烂醉，在大街上闲荡，有的时候成群结伙，对行人推推撞撞——这不是因为醉了，不为什么，喝醉的人不能不推不撞；他们满口脏话，一群群儿童和妇女从他们身边走，毫无顾忌，——这不是耍流氓，不为什么，喝醉的除了脏话之外，不可能有别的语言。不久之前我才完全明白，正是这种语言、这一套语言是最方便、最独特、最适合醉汉或者仅仅喝得醉意朦胧的人的语言，可以说，根本不可能没有这种语言，即使根本就没有——il faudrait l' inventer。[①] 我一点儿也不是说笑话。请想一想，谁都知道，人在喝醉的时候，首先是舌头不灵活，发僵，一个醉醺醺的人，或是喝醉了却还没有烂醉如泥的人，思绪和感受异常纷繁活跃，几乎比平时增强十倍。因而自然就需要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要能够适应上述两种彼此相反的状态。这种语言早已出现，在古时候就已传遍全俄罗斯。这不过是不入词典的一个名词，因为整个这套语言都是由一个词构成的，说起来非常方便。有一个星期天，已经是深夜，我在路上走着，离开我大约十五步远，走着六个喝醉了的工匠。我倏忽开窍了，全部思想情绪，甚至整套的深刻议论，只用一个词，而且是音节最

① 法文：也会把它臆造出来。

少的名词就可以表达出来。有一个小伙子粗鲁地、果断地说出这个名词，表示轻蔑地否定他们在此之前谈论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则重复了同一个名词作为对他的回答，但已经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的重复——表示怀疑第一个小伙子的否定态度的正确性。第三个人突然对第一个开口的小伙子发了脾气，粗暴激昂地加入了谈话，他对第一个小伙子喊叫的还是那同一个名词，但已带着侮辱与谩骂的含义。这时候，第二个讲话的小伙子又参加进来反驳第三个人，说他欺侮人，他的意思是责备那个小伙子，说你闯进来干什么？我们本来是在心平气和地说话，可是你怎么却无缘无故地蹿出来骂菲利卡！所有这些意思他都用那同一个禁忌的词表达出来，这个词是一样东西的只有一个音节的名称，他仅仅是把一只手举起来，拍了一下第三个讲话的小伙子的肩膀。这时候，第四个小伙子、这伙人里面最年轻的那一个，突然大声叫出来，他在此前一直没有吭声，看来，他大概是想出了解开最初引起争论的那个难题的主意。他兴奋得把手一扬大声喊起来……你们以为好极了吗？解决啦，解决了吗？没有，根本不是好极了，没有解决；他只是重说了一遍词典中没有的那个名词，只是一个词，所有的话就是这一个词，不过他说得很激昂，是兴奋地喊叫出来的，也许是因为嗓门太高了，第六个人，就是一直沉默不语的那个年龄最大的小伙子觉得“不以为然”，他一下子就使那个小伙子的轻浮的兴奋冷却下来，他对着那个小伙子用阴郁、教训的语气，低沉的声音……又把那个在女人面前最忌讳的名词重复说了一遍，然而却把“你叫什么，嗓门都扯破啦！”这个意思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就是这样，他们没有说其他任何一个字眼儿，仅仅把这一个他们惯用的字眼儿一次接一次地接连重复了六遍，相互就了解得明明白白。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够

啦！”——我不由得叫出声来（我走在他们中间）。——“你们刚走了十步就反复说了六遍（那个名词）！简直是丢人！难道你们不害臊吗?”

他们立刻全都用眼睛盯上了我，像是在看一个突如其来的东西，刹那间哑然无声；我以为他们要骂我了，可是没有骂，唯有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走出十来步远的时候猛然转回身来对着我，边走边喊：

“给我们数了六遍，可是你自己为什么还把它提了第七遍?”

“轰”的一声哈哈大笑，于是，这伙人就把我抛到脑后走开了。

三

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些逛大街的人，我也不是因为他们每逢星期日才特别烦恼。不久前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彼得堡有那么一些头脑非常清醒的男子汉、小市民和工匠，甚至在星期日他们也不“使用”任何酒类；令我惊讶的还不是他们不喝酒，而是这种人比我原先想象的多得无比。就是看见这些人比看见那些逛大街的醉汉更使我烦恼，这不是由于同情那些人；根本没有同情他们的理由；而是平白无故地从脑子里冒出来一种奇怪想法……每逢星期日的傍晚（平日根本就看不到他们），有很多这种一周都忙于工作，但仍十分清醒的人就走上街头。就是出来散步的。我注意到，他们从来不上涅瓦大街，多半是在自家的周围溜来溜去或者是携带全家从某处做客回来时，走着“乘凉”（在彼得堡有家室的工匠似乎非常多）。他们不慌不忙地迈着脚步，面孔极其严肃，不像是在散步，彼此之间很少交谈，尤其是丈夫跟妻子，几乎完全是在默默无言地走着，但

是穿戴总是像节日一样。衣服并不好，都是旧的，女人们穿得花花绿绿，但都刷洗得干干净净，准备过节似的，也许就是专为这个时刻的。有一些人是穿俄罗斯服装，更多的人是穿德国式的服装，胡须刮得净光。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似乎郑重其事地认为，这样的散步会使自己享受到星期天的快乐。其实在这条宽阔、光秃、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尤其是在日落之后尘土更多的大街上，有什么快乐可谈呢？他们恰恰以为这是天堂；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

他们经常是带孩子一块散步；在彼得堡小孩子也是非常多的，可是人们还说在这里儿童死亡的极多。我注意到，这些孩子大多数常常是幼儿，一岁左右，刚刚会迈步或者根本还不会走；年龄大一点儿的孩子这样少，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长大就死去了？在人群中我看见一个孤单的工匠，不过他还带着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两个孤单的人，看样子两个人都是孤独的。工匠有三十岁上下，面孔显得疲惫虚弱。他穿着节日的服装：衣服是揉皱了的德国式长礼服，磨损了的纽扣和油污很厚的衣领；裤子是“意外之物”，从旧货市场买的三手货，但尽可能都修饰得干干净净。白布胸衣、领带、皱皱巴巴的高筒礼帽，刮了胡须。看上去像是在钳工作坊或者印刷所干什么活的。面部表情阴沉忧郁，深沉生硬得近乎凶狠。他拉着孩子的手，孩子则跟在他后面摇摇晃晃地走着，几乎要倒下去。这个孩子两岁多一点，非常虚弱，面无血色，穿一件俄罗斯式长上衣，一双带红边的小靴子，帽子上插一根羽毛。他累了；父亲对他说了句什么话，大概只是随便说的，结果却像是申斥。男孩儿立刻安静下来。但是，又走了五步左右，父亲弯下腰用双手把孩子小心地抱起来，随即抱到胸前。男孩儿习惯地、信赖地伏在他身上，用右手挽住他的脖颈，然后用童稚的惊异目光

盯着看我：大概是在想，我为什么跟在他们身后，还老是看他们？我对他点点头，微微一笑，但他却皱皱眉头，更紧地抱住父亲的脖子。看得出来，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喜欢在街道上一边走一边观察完全陌生的来来往往的行人，端详他们的面孔，揣测他们：他们是些什么人，生活得怎样，做什么事情，此时此刻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关于那个带男孩子的工匠当时我想的是，这个工匠在一个月以前刚刚死了老婆，不知为什么我想她必定是死于肺痨病。把这个小孤儿暂时交给一位老太婆管（父亲整整一周都在作坊里干活），他们和老太婆住在地下室，在那里他们租了一间小屋，也许那只是一个屋角。现在是星期日，鳏夫带着儿子到远离维堡区的某个地方去看望他们还在世的唯一亲人，多半是死者的姐姐，从前他们不常往来。姐姐的丈夫是带军衔的士官，必定是住在一所宽敞的公房里，也是地下室，不过只是自己一家人单独住。姐姐大概是为死者悲伤了一阵子，但不是很沉痛，鳏夫在做客的时候想必也不是很悲伤的，但始终是愁容满面的，偶尔说句话，但话很短，他还必定是把话题转向日常的具体事情，就连这也是说了几句就完了。应该是摆上茶炊，咬着糖块喝茶[①]。男孩儿一直坐在角落里的长凳上，紧皱着眉头，怕见生人，后来又打起瞌睡来。姨母和她的丈夫很少照顾他，不过终于还是给了他一点儿牛奶和面包，作为主人的士官一直没有理会他，现在为了表示爱抚，说了一句逗孩子的俏皮话，但说得很粗鲁，也不得体，于是他自己（其实就是他一个人）笑了起来，而鳏夫则相反，恰恰在这节骨眼儿上不知为什么对着孩子厉声

① 俄罗斯人一种喝茶方式，即咬下一小块糖含于口中再喝茶，而不是把糖放于茶水中。

厉色地喊一声，弄得孩子立刻就要哭出声来，这时父亲就不再喊了，绷着脸把孩子抱到室外待了一会儿……告别时也都是面色阴沉，客客气气，跟谈话时一样，谦恭有礼。父亲把孩子搂在怀里抱着往家走，从维堡区走到铸造大街。明天又要到作坊去，还是把男孩儿交给老太婆。就是这样，我在不停地走着的时候，为了消遣，构想着这类不着边际的画面。这些想象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任何教益可以汲取”。正因为这样，每逢星期天，每逢假期，在尘土飞扬的、阴沉的涅瓦大街上就会感到忧郁。您是否想到过，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是阴沉的？我觉得，彼得堡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阴沉的城市！

在平常的日子确实也有很多小孩子到街上来，但是在星期日的傍晚，街上的孩子差不多要增加十倍。这些孩子全都是那么虚弱，那么苍白、枯瘦，面无血色，他们的脸上都是同样没有一丝笑容，尤其是那些还抱在手上的孩子们；而那些会走路的孩子们——全都是罗圈腿，走起路来明显地左右摇晃。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经过仔细打扮的。然而，上帝啊，孩子如同花朵，如同树木春天生长出的嫩叶：他需要阳光、空气、自由、新鲜的食物，可是代替这一切的却是闷得透不过气的地下室和那股克瓦斯和酸白菜的气味，夜间发出的恶臭，没有营养的食物，蟑螂和臭虫，潮湿气味和墙上渗出的水珠，在院子里则是尘土、碎砖破瓦和石灰。

但是，他们喜爱自己的面色苍白、营养不良的孩子。我面前一个三岁的小姑娘，很可爱，穿着新连衣裙，她朝妈妈跑过去，妈妈和很多人一起坐在大门口，他们是从各家各户凑到这里来聊一会儿天的。妈妈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瞧着离自己十步远在玩耍的孩子。小姑娘弯下腰去捡东西，似乎是一粒小石子，不小心踩住自己的裙子下摆，怎么也迈不开步，试了两

次，摔倒了，哭了起来。妈妈站起身来去帮她，可是我在她之前把小姑娘扶起来了。小姑娘站直了身子，马上就好奇地望着我，眼里噙着泪水，可是突然向妈妈扑过去，有点儿怕生和稚气的羞怯。我也就向前走了几步，有礼貌地询问，小姑娘几岁了？母亲和蔼地、但却很冷淡地回答了我。我说，我也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儿；这句话没有得到反应："也许你是一个好人，"——母亲无言地望着我，——"不过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走你的路吧。"所有谈话的人们也都不出声了，心中似乎也在说这句话。我举手摸摸草帽檐就走过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女孩儿在热闹的十字路口掉在了妈妈的后面，本来妈妈是同她牵着手的。这位女人猛然看到在大约十五步远的地方一位女朋友正在迎着自己走来，于是，她以为孩子认得路，便松开手，朝着客人跑去，然而，顿时剩下孩子一个人，害怕了，叫起来，哭着去追赶妈妈。

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蓄着胡须的白发市民突然挡住奔跑着的陌生女人的路，抓住她的手：

"跑什么！没听见吗，孩子在后面喊叫呢；不能这样；孩子会吓坏的。"

女人似乎想说句机智的话反驳他，但是又改了主意，没有反驳；毫不懊悔地、从容不迫地握住已经跑到跟前的小女孩儿的手，若无其事地向自己的客人走去。那位市民严肃地看完这一切，然后才走开。

没有意思，最没有意思的一些场景，把它们写进日记里面都感到有些惭愧。以后尽量写得认真些。

# 谈谈吹牛

## （《公民报》，1873年8月27日，第35期）

为什么我们这里人人都在吹牛，而无一例外？我知道，人们会立刻打断我的话，还向我喊叫："哎，这是胡说，根本不是人人都吹牛！你这是没有题材了，于是你就捏造，想要耸人听闻。"我早受到主题枯竭的指责了；可事实是，我现在对我们普遍吹牛这一点真正是深信不疑。带着这个思想生活了五十年，天天看到它，接触到它，可是它却突如其来地呈现出来，以致似乎迄今为止我对它毫无所知。不久之前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在我们俄罗斯，在知识阶层里面全然不可能有不吹牛的人。这正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就连很正直的人也要吹牛。我相信，在其他民族里面，在大多数民族里面，只有那些无耻之徒才吹牛；吹牛是为了得到实际好处，也就是说直接有罪恶目的。在我们这里最可尊敬的人们可以毫无目的地吹牛，为了最可敬的目的而说谎。我们的大多数人是出于礼貌而吹牛。希望唤起听话人的审美感受，使听话人得到愉快，甚至可以说，吹牛是把自己奉献给听话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妨回忆一下，比如说，只要是需要，为了加深听者的愉快印象，是否曾经把你驾驭的马在一个小时内奔跑的里程夸大了二十倍。听话的人是否也确实高兴得立即使你相信，他知道的一套三驾马车，在打赌时追过了火车，等等，等等。还有猎犬，或是说，在巴黎怎样给您镶牙，以及在俄罗斯包特金医生怎样治愈了您的病？关于自己的病，您有没有讲过这类奇迹，虽然刚刚把故事讲了一半，您就让自己相信，谈的全是真的了（因为总是在谈到一半

时自己就开始信以为真了），不过，在上床睡觉并且美滋滋地回想起听话的人是多么惊喜时，您就会骤然停下来，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嘿，我吹得真棒！"其实，这是一个并不突出的例子，因为，只要有人听，没有比谈论自己的病更愉快的事情了；而一谈起来，就不可能不吹牛；这甚至能给人治病。还有，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您是否讲过自己"目睹"的千奇百怪……不过，我不说这个例子，因为从外国回来的俄罗斯人不可能不谈谈"外国事"；否则就不值得出去跑一趟。再比如说，自然科学！您谈论过自然科学没有，或者，谈论过彼得堡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因破产而逃亡国外的事没有？尽管您关于这些犹太人一无所知，关于自然科学也茫然无知。请问，您是否把似乎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笑话向一个人讲述过？而他就是曾经把这个故事作为自己的事向您讲过的那个人。难道您忘记了，您是怎样在讲到一半时忽然想起来了，同时也猜到了，听您讲话的那个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您的那种难过眼神也显然证实了您的猜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为什么总是以十倍的倔强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您会记得，您虽然已经失去您的全部幽默，无论如何还是以此与伟大目的相称的勇气继续唠叨您的故事，尽快以神情慌张的礼节、握手和微笑结束谈话之后，就分头走开了，可是，天晓得为什么，您在茫然失措时，无缘无故地向在同一楼梯上急走的听您讲话的那个人大声喊叫，问候他姑母的健康，这时候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关于姑母的话，这给您留下了比您的整个这场笑话都更难堪得多的回忆。总之，如果有谁对我说的这一切回答说不对，也就是说，他没有转述过任何笑话，没有牵涉过包特金医生，没有讲过有关犹太人的谎言，没有在楼梯上询问过姑母的健康，他从来没有遇到任何这类事情，我是根本不相信这种话的。我知道，俄罗斯

吹牛的人几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吹牛的，因而根本就一点儿也没发现在吹牛。甚至有这种情况：一个人说了一点儿谎话，而且说得成功，那就喜欢得不忍割舍，以至于把编造的话算做自身生活中一件确凿的事实；而且做得完全心安理得，因为自己对这件事确信无疑；偶尔对此不相信反倒是不正常。

“哎，无稽之谈！”又会这样说我。“无可非议的吹牛，区区小事，没什么了不起。”就算是这样吧。我自己也同意，一切都是非常单纯的，仅仅是表明性格特点，比如说，感激之情。因为你吹牛的时候，别人如果恭听你说，那么，即使仅仅为了回敬，也不该不准别人吹牛。

在吹牛这件事上彬彬有礼的相互尊重几乎是俄罗斯社会的首要默契，这里说的俄罗斯社会是指俄罗斯的各种会议、晚会、俱乐部，各种学术团体，等等。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十足的蠢货在这种场合下会去较真儿，忽然对您的马跑出的里程数字，或者是包特金医生给您治病的奇迹产生疑问。不过，这都是一些缺乏同情心的、患痔疮的人，他们即刻就会给自己招来报应。事后他们还诧异不解，为什么受到惩罚？这是些无能之辈。然而，这一切谎言无论怎样单纯而无恶意，但却暗示着我们极其重要的基本特点，它几乎达到了显示意义重大的特点的程度。例如，首先它表明，我们俄罗斯人最怕真理，也不能说是怕，如果你愿意的话；而是我们经常把真理看成是什么太枯燥、太平淡的东西，缺乏诗意，过于平凡，因而总是躲避它，最终是把它变成一种最不寻常的、我们俄罗斯社会中最稀有的东西（我指的不是报纸）。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丧失了这样一个公理，这就是，真理是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尤其是最纯真状态的真理；不仅如此，它还更离奇，胜过人的善于变换的智慧所能够胡编和想象的一切。在俄罗斯，真理几乎总是具有十

分离奇的性质。事实上，人们终于把人的智慧为自己胡编乱造的一切都变成了远比真理更易于为他们所理解的东西。真理在人们面前的桌子上躺了上百年，可是人们不要它，而要去追求臆造的东西，这正是因为人们认为真理是幻想的、空想的。

其次，我们俄罗斯的普遍吹牛表明，我们全都为自己本身感到羞耻。的确，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几乎都为自己、为自己自身的形象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所有的俄罗斯人只要一置身于社会之中，每个人都要竭力尽快地、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看上去务必像另外一个什么人，只求不要像他自己本来的形象，每个人都赶紧装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赫尔岑关于在国外的俄罗斯人早就谈到，说他们在公共场合不善自持：在别人都沉默的时刻，他大声说话，在需要说话的时候，不会说得得体，说得自然。确实是这样：立即表现出装腔作势，言不由衷，手忙脚乱；立即为真实的自己感到羞愧，急于隐匿、掩饰自己的、上帝赐予俄罗斯人的形象，摆出另外一副迥然不同于俄罗斯的非俄罗斯面貌。这一切都是出自最深的内心信念，认为每一个俄罗斯人的本来形象必定是卑微的、滑稽到可耻的程度；他如果换上法国人的、英国人的面貌，总之，不是自己的面貌，那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在这副面貌的掩饰下，人们就决不可能认出他来。在这里我要指出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所有这种糟糕的自卑感和所有这种卑劣的自我否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意识的；这像是一种癫狂的无法克服的东西；但在思想上，俄罗斯人，即使是其中最坚决的自我否定者，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不会那么轻易承认自己的渺小，而且必定要求得到尊敬：“其实，我与英国人完全一样，”俄罗斯人这样说，“这就是说，必须尊敬我，因为英国人无一例外都受到尊敬。”我们社会的这种主要类型是在二百年的过

程中[1] 培养出来的，是在二百年前就确立的坚定不移的原则下培养出来的，这个原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显露真实的自己，要伪装成其他民族的面貌，要永远蔑视自己，永远为自己感到可耻，绝不要跟真实的自己一样——这就出现了最完满的结果。没有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在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英国人，他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他扪心自问，自己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他却为自己的面貌感到羞耻的。俄罗斯人很清楚，没有这样的英国人；有教养的俄罗斯人也知道，不自惭形秽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恰恰是个人尊严的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希望显得更像法国人或者英国人，他正是为了尽快把他当做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自惭形秽的法国人或者英国人。

“纯洁无瑕，古风旧习，已经说过上千遍了”，——人们又会这样说。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这已经是某种更有特色的现象了。有一件事情，任何一个知识界的俄罗斯人，一旦进入群体或公众之中，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极强烈的要求，绝不退让。(在自己家中以及面对自己，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问题就是——智慧和要显得比实际更聪明的愿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愿望绝不是要显得比一切人或比任何人都聪明，仅仅是要不比任何人愚蠢。“你要承认我不比任何人愚蠢，我就承认你也不比任何人愚蠢。”这又是某种相互恭维之类的事情。例如，尽人皆知，俄罗斯人在欧洲权威面前是怀着如获殊荣与唯恐落后的心理顶礼膜拜，甚至不让自己稍做一些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甚至特别不喜欢分析。噢，如果这位天才人物从宝座上跌落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后。

下来或者只是不时兴了，那就是另一回事：那时就没有人比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这一人物更严厉的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傲慢、轻蔑和讥讽是无以复加的。等到后来，如果我们无意中突然得知，这位在我们这里已经从宝座上跌落下去的人物，在欧洲仍然继续受到尊敬，受到应有的评价，我们就会极其天真地表示惊讶。然而，就是那同一个俄罗斯人，尽管他为了赶时髦，甚至不假思索地崇拜过那位天才，这时却无论如何也绝不承认自己比这位天才愚蠢，尽管这位天才是风靡欧洲的人物，不久前还受到他的崇拜。“就算是歌德、李比希[①]、俾斯麦吧，就算是这样……可我也是一样啊”，——只要一谈到这里，每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是最卑鄙的俄罗斯人，必然都是这样认为。其实也说不上是认为，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思考，只不过是一种癫狂。这是无限膨胀的自我欣赏，这种自我欣赏是无聊的，无所作为的，毫无根据的。总之，上层社会的俄罗斯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达到人类尊严的最高表现，这就是在真正比自己高明的他人面前承认自己比他愚笨，我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所例外。请不要大肆嘲笑我的“荒唐言论”。李比希的对手可能连中学都没读完，在人们告诉他，并且指给他，此人就是李比希之后，当然，他不会同李比希较量高低。他保持缄默，然而，即使在李比希的面前……他也不愿甘拜下风。如果他遇到了李比希，就算是在火车车厢里吧，但他不知道，此人就是李比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一开始关于化学的谈话，我们这位先生又能参加谈话，他对化学虽然仅仅知道“化学”这两个字，但他无疑地会进行最有学术性的争

---

① 李比希（1803—1873），德国化学家、科学学派的创始人、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30）。

论。当然，他会使李比希感到惊讶，不过，谁能知道，也许，在听众的眼里他还是个胜利者呢。因为俄罗斯人的学术语言的胆量几乎是没有限度的。这里发生的正是存在于知识界的俄罗斯人心灵中的现象：只要这个心灵感觉到自己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就不仅毫不怀疑自己的智慧，如果事关学问的话，他甚至毫不怀疑自己的渊博学识。关于智慧还可以理解；而关于自己的学问，似乎每个人都应该有自知之明的……

当然，只有在公众面前，在外人中间才会这样做。在家中，关于自己则……可以这样说，在家中谈到自己时没有一个俄罗斯人操心自己的教育和学问，甚至从不把它当做一个问题……即使把它作为一个问题的话，那也多半是处理得有利于自己，虽然说对自己的学问是一清二楚的。

不久前，在火车里，在两个小时的行程中我自己就听到了关于古典语言的一大套议论。一个人讲，其余的人全在听。乘客们谁也不认识这位先生，他仪表堂堂，中等年纪，有一副矜持的老爷派头，说话字斟句酌，不慌不忙，如同往外吐字似的。他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刚一开口，就可以听得出，他是头一回讲这件事，甚至可能还是头一回思考这个问题，可见他说这些话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完全否定古典教育，并且认为实施这种教育是“历史性的、严重的蠢事”——应该说，这是他允许自己使用的唯一的激烈词句；他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话的，这就不允许他发脾气，仅仅是出于对这件事的蔑视也不能发火。他的立论依据是最浅显的，只能与十三岁的小学生相称，与迄今为止我们的某些反对古典语言教育的报纸的论据如出一辙，例如，“由于全部拉丁文著作都已有译文，就不再需要学习拉丁文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在我们的车厢里，他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很多人，尤其是女人们，

同他分手时，都为从他那里得到的愉悦而感谢他。我相信，他是满怀极其自命不凡的心情下车的。

如今我们这里的公众（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其他地方）话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从前那些古老的年代不同了；现在人们渴望听到关于各种公众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谈话，渴望找到这方面的老师。的确，在公众里面挑起议论是极不容易的；在下决心开口之前，人人都首先要反复揣摩良久，而一旦谈起来——有时则兴奋得无法拦阻。比较矜持的和有风度的，也可以说是更高级的和私下的议论，大多是围绕着市场或者政府这些主题，但这些谈话所持的是秘密的、反面的观点，掌握普通老百姓不知道的高层秘密和原委。普通的听众聚精会神地、心怀敬意地在听，高谈阔论的人则以自己的风度令人倾慕。显然，他们谁也不相信谁，但是，告别的时候他们几乎总是彼此都非常满意，相互之间甚至还有些感激之情。为了在我们的火车上舒适、愉快地度过旅程，那就要善于给别人以吹牛皮的机会，还要尽力相信别人的话；如果您也有这个愿望，别人也会让您吹得天花乱坠；可见，这是礼尚往来的。不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谈话也有全部听众都参与的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这种谈话并不单单是为了愉快地消磨时间：再说一遍，人们渴望学习，渴望弄清当前的困惑，人们在寻求、期待老师，女人们、家庭的母亲们尤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对社会咨询者与指导者虽然怀着这样强烈的求知欲望与充满期望的渴求，虽然抱有这些高尚的愿望，他们却极容易得到满足，有时容易得出乎意料，他们相信一切，他们受到的训练和知识准备非常之差——远远不如几年之前您的最丰富的幻想能够向您描绘的那样，现在已经有了较多的事实与资料，与现在相比，几年之前关于我们的俄罗斯社会还难以说出确切的看法。可以肯

定地说，任何一个有些正派风度的谈话者（唉，我们的公众直至今日仍然对正派的风度感到生疏，尽管从杂文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都能够取得成功，能够随意让自己的听众相信什么，博得感谢，自命不凡地走开。当然，不言而喻的是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无需提醒的。还有一次，也是在车厢里，也是不久之前，我听到了一套关于无神论的议论。演说者是一位有着上流社会和工程师外貌的先生，表情阴郁，但有一种赢得听众的强烈病态的欲望，他是从寺院谈起的。从第一句话就听得出，他不了解寺院问题：他以为寺院的存在是与宗教信条密不可分的，以为寺院是由国家供养的，耗费了巨额国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僧侣也如同所有其他团体，是一些人的完全自由的结合。他出于自由主义的考虑，要求消灭僧侣，就像消灭某种暴政那样。他以立足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彻头彻尾的无神论结束了谈话。他频繁地提到自然科学和数学，然而，在自己的整个演说中却没有从这些科学中举出一个实例。说话的依然是他一个人，其余的人只是在听："我教导我的儿子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别无他求。"——他以这个结论结束了谈话，他深信不疑，善良的事业、品德和正直是某种天生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受任何制约，如果需要的话，毫不费力，无须迟疑和揣度，随时唾手可得。这位先生同样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座的有军官、老人、太太和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们。告别的时候，人们为了从他那里得到的愉快而热情地感谢他，尤其是一位衣着华丽、长相也很不错的太太，家庭的母亲，大声地、笑容可掬地宣布说，她现在完完全全信服了，在她的灵魂里"只有一股气"。这位先生，应该说，同样也是带着自命不凡的非凡感受而走开的。

正是这种自命不凡使我莫名其妙。有的人是傻瓜，有的人

是饶舌家，当然，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这位先生显然不是傻瓜。大概也不是无赖，不是骗子；甚至很可能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好父亲。他只不过是对于他所要着手解决的那些问题一窍不通。经过一个小时、一天、一个月之后，难道他还不明白："我的朋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或者另外的什么人'，你在争论，其实你一点儿也不懂你所谈论的问题。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你谈话援引了自然科学和数学——其实你最清楚，你早已把从自己的专科学校学的那点可怜的数学忘光了，何况在学校里你也没有好好学过，在自然科学方面你连起码的概念从来都没有过。你是怎样说的？你是怎样教诲的？实际上你知道，你一直在说谎，然而迄今你还在自鸣得意；你不为此感到可耻吗？"

我确信，他能够向自己提出所有这些问题，虽然他可能在忙于"事业"，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无用的问题。我还深信不疑，这些问题即便是一闪而过，总还是在他的头脑中出现过。但他不感到可耻，不感到内疚！俄罗斯知识界的人的这种尽人皆知的厚颜无耻——在我看来是一个重要现象。固然，这种厚颜无耻在我们这里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对此也已习以为常；但它毕竟还是令人惊异的、难以理解的事实。这种厚颜无耻表明，对自己良心的自我谴责是如此无动于衷，或者可以说，是如此缺乏自尊心，以致令人陷于绝望，对这类人、对这个社会丧失一切希望，甚至在未来都不会期待他们会有任何能使民族独立、得到拯救的力量。社会也就是外表、欧洲的面貌、一劳永逸地取自欧洲的法律，——这样的社会使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感到压抑：在社会面前他是欧洲人，公民，骑士，共和党人，他有良心和自己独有的坚定不移的见解。在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候则是——"哎，管他什么看法呢，挨顿打又算什么！"四

十年前在小市民街上被钳工席勒[1]痛打过的庇罗果夫中尉[2]是一个骇人的预见，犀利地洞察未来的天才的预见，因为庇罗果夫之流多得不计其数，多得打不胜打。请回忆一下，中尉在经历那番遭遇之后，立即去吃夹肉馅饼，在一位显赫官吏的命名日晚会上跳马祖尔卡舞，大出风头。您是怎样想的：他在轻快地跳马祖尔卡舞，变换舞步，旋转自己在片刻之前才遭到屈辱的肢体时，他是否想过，他在两个小时之前刚挨过打？毫无疑问，他是想过的。然而他感到耻辱吗？毫无疑问，没有！第二天早晨睡醒的时候，他大概是这样想的："哎，见鬼，既然谁都不知道，何必再去提它！……"当然，这句"何必再去提它"，一方面显示什么都能适应的特点，同时也显示我们俄罗斯天性的豁达不羁，一切开阔无边的胸怀在这些特点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二百年来抛弃了最起码的独立性格，二百年来鄙视自己的俄罗斯面目，这就使俄罗斯的良心放纵到致命的无拘无束的地步，对这样的良心……哎，还能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您是怎样想的呢？

我确信，这位中尉能够做出极端的事情，或者说，能够做出肆无忌惮的事情，可能，就在那一天晚上，他向与自己跳马祖尔卡的女舞伴、主人的大女儿倾吐爱情，并且正式求婚。这位小姐是极其可怜的，她在令人陶醉的舞会上同这位潇洒的年轻人翩跹起舞，她还不知道，仅仅一个小时之前她的男舞伴是怎样挨打的，而他对此竟泰然处之。假如她已经知道，而求婚之事终归还是提出来了，——您以为该怎样办，她还会同意嫁给他吗？（当然，这是在没有其他任何人知晓此事的前提下。）嘿，她必定会嫁给他！

---

①② 都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1835）中的人物。

我以为，总还是可以把我们绝大多数的妇女同庞罗果夫们以及一切“肆无忌惮之徒”区分开，在我们的妇女身上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真诚、坚毅、严肃、忠贞、追求真理与自我牺牲的品质；其实在俄罗斯妇女身上这一切向来就强似男人。即使是现在出现种种偏差的情况下，这也是无可置疑的。女人比较少撒谎，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说谎，而男人则几乎没有不吹牛的，——我说的是我们社会当前这个时刻。妇女在事业上更坚定，更耐久；她比男人更严肃认真，她是为了事业本身而做事情，而不是仅仅做给人看。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要期待来自这个方面的巨大帮助呢？

# 一篇当代的谎言

## (《公民报》，1873 年 12 月 10 日，第 50 期)

有些批评家指出，我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群魔》[1] 利用了众所周知的涅恰耶夫案件[2] 的情节；但立即又指出，在我的小说中没有真实人物的形象，或者说，没有如实地再现涅恰耶夫事件；我之所以指出我利用了事件，只是想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何会出现这种事件，是从社会现象的意义上写的，而不是作为奇闻逸事，也不是作为莫斯科的个别事件而写的。我本人认为，这些说法是完全公正的[3]。我在自己的小说中没有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小说的思想倾向引起了各种不同解释与激烈争论。

② 涅恰耶夫（1847—1882）是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1869 年在莫斯科暗杀了该团体中有叛变嫌疑的大学生伊万诺夫。逃亡国外后又被引渡回国，1873 年被判处二十年苦役，死于监禁之中。涅恰耶夫案件即 1871 年审判 1868—1869 年学潮参加者与人民惩治会成员的案件。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瓦·格·阿夫谢延科的观点。阿夫谢延科（1842—1913）是俄国作家和评论家，他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曾参与革命民主派的刊物，19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反虚无主义的小说，反对革命民主派。他于 1873 年在评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的文章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中利用了涅恰耶夫事件的情节，但按照小说的构思对情节进行了艺术加工。阿夫谢延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采用这个事件的情节，是因为这个事件对俄国的秘密组织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它反映出一种社会思想和人的本性被歪曲到何等程度，反映出这个黑暗世界的病症的全部特征。涅恰耶夫分子毫无疑问是这种秘密组织的最突出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肯定了阿夫谢延科的观点，从而表示了对与之相反的民粹派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观点的否 （转下页）

蓄意触及著名的涅恰耶夫及其受害者伊万诺夫。我的涅恰耶夫的形象当然不同于真正的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提出问题，尽可能明确地以小说的形式回答问题：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的和令人惊奇的当代社会中怎么竟能够出现不是一个涅恰耶夫，而是一些涅恰耶夫们？这些涅恰耶夫们怎么终于能够为自己网罗到一批涅恰耶夫们？

就在不久之前——一个月之前——我在《俄罗斯世界报》上读到以下几行有趣的文字：

> ……我们认为，涅恰耶夫案件足以证明，我们求学青年没有被卷进这类无理智的胡闹。类似涅恰耶夫这种愚蠢的信仰狂只能在游手好闲的、头脑不发达的青年中为自己找到新信徒，而绝不是在求学的青年中。

---

（接上页）定。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评论《群魔》的文章中指出，涅恰耶夫事件“可以作为刑事罪犯的、狭隘的、渺小的小说的材料，或许，可以在当代生活的画面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只能作为第三流的插曲”。米哈伊洛夫斯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对“次要的”、“偶然的”场面进行“精心”描绘和“艺术的”概括，“在《群魔》中叙述的故事从事件的过程和情境看与涅恰耶夫事件惊人地相似……在某些方面，小说作者似乎立意要与涅恰耶夫事件的侦察与审判所提供的情况一致……如果小说情节的重要部分取自当代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那么，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期待于作者的是当代道德的相当确切的画面，这种期待是无可指责的……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在思考时注意到那些希望做律师、做民事法官、做已经建成的交通线路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广大俄罗斯青年们；如果小说作者在他的思考中再加上那些情绪严肃、清醒的青年群；最后，如果小说作者把自己的注意放在离开见识肤浅的青年群众远一点的地方；那么，毫无疑问，他就会确信，类似沙托夫们、基里洛夫们和斯塔夫罗金们（均为小说《群魔》中的青年人）这些人物的理论在这里所能占据的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无足轻重的位置。”

下面又接着说道：

> ……特别是人民教育部长（在基辅）最近声明说，在对七个地区的教学机构视察之后，他可以说，“近年来青年人极为严肃认真地对待科学事业，极其勤奋地、脚踏实地地在工作。”

这几行字就其本身而言，就是说，如果孤立地评论它们，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我希望作者原谅我这样说）。但这些话里有闪烁其词之处，有人们听腻了的老的谎言。这些话的完整的基本思想就是，在我们这里如果说有的时候也出现涅恰耶夫们，那他们必定全都是白痴和狂热分子，即使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信徒，那也无疑“只能在游手好闲的、头脑不发达的青年之中，而决不是在求学的青年之中”。我不知道，《俄罗斯世界报》上文章的作者究竟想用这种闪烁其词的话说明什么：他是想谄媚求学的青年呢？或者相反，想用狡猾的手法，就是说以爱抚的方式给青年鼓点气，但目的是最高尚的，——就是说，是为了青年人好，——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了家庭女教师和保姆对待幼儿惯用的手法：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看，那些捣乱的孩子们多么不好，他们吵闹，打架，他们那样“头脑不发达”，准要挨打；你们都是可爱的受夸奖的乖孩子，在桌子前面身体坐得笔直，脚不在桌子下面乱动，大人一定会奖给你们糖果。最后，或者作者只不过是想要在政府面前“保护”我们的求学青年，并为此使用了也许是作者本人认为是异常巧妙的、含蓄的手法？

我坦率地说：我虽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俄罗斯世界报》上文章作者的这些个人目的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为了事先充分说清楚，我还想补充说，谎言和《俄罗斯世界报》

在表达文章思想时使用的那种人们听腻了的、闪烁其词的老说法，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不是蓄意的，是无意的，也就是说，文章作者完全相信自己的话，非常天真地认为这些话是真理，作者的天真，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会由于自己的毫无自卫之心而受到赞许，甚至令人感动。但是，被当做真理的谎言常常具有最危险的外表（尽管谎言是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出现的），——除开这一点之外，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谎言从来也没有像这篇文章以如此裸露、准确和自然的形式表现出来过。真的，你要是逼着一个人向上帝叩头，他会把头碰破的。透过这个形式考察这个谎言，尽可能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如果错过这个机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再遇到这种不加掩饰的坦诚呢！

从我们很久以前的伪自由主义时代起，我们的报纸就把“保卫青年”视为惯例了，——反对谁？反对什么？——有时候这简直是无人知晓的一笔糊涂账，因而常常显得十分愚蠢，甚至十分可笑，特别是在攻击其他报纸的时候，他们说：“看，我们比你们更自由主义，你们竟然攻击青年，可见你们更反动。”我要顺便指出，《俄罗斯世界报》上的那篇文章中有的责难是针对《公民报》的。它说《公民报》似乎不断指责我们彼得堡、莫斯科与哈尔科夫的求学青年。且不谈文章作者本人很清楚地知道，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这种普遍的、无休无止的责难，我只是要求这位谴责者解释清楚：普遍责难青年是什么意思？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当然，这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喜欢所有的青年人——而且与其说是青年人，倒不如说是我们的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荒唐到了什么地步？谁能够相信这样的谴责呢？显然，无论是指责，还是保护，都是未经好好思索，仓猝做出的。这就值得想一想：作者表明，我是主

张自由主义的，我称赞青年，我申斥那些不称赞青年的人们。为了刊物的订户，这就足够了，去它的吧！的确是去它的吧——因为只有我们青年的最恶毒的敌人才能够采取那种手段保护青年，才能够采用那种惊人的闪烁其词的说法，如同《俄罗斯世界报》上文章的天真作者所做的那样（这是无意的——对此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

整个要害就在于，这种手段不单单是一个《俄罗斯世界报》的杜撰，而是我们的许多伪自由主义报刊普遍使用的，可能，在那些报刊上使用这种手段已经不是出于天真。这种手段的实质，首先，就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加区别地赞扬青年，同时还粗暴地攻击所有那些在必要时刻允许自己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年轻人的人们。这种手段所依据的是可笑的假设：青年尚未成熟，喜欢恭维，竟至失去辨别能力，把一切都视为金玉良言。不错，这些人达到了目的，已经有很多年轻人（我们确信，远非所有的人）真的爱听粗俗的赞扬，要求恭维自己，而且不加辨别地指责那些不愿时时处处都纵容他们、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不愿这样做的人们。不过，这种损害都只是暂时的；青年人的观点是会随着经验与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然而，谎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能造成直接的、实际的损害。

在社会和政府面前“保护青年”这一手段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干脆“否认事实”，这种否定有时候是最粗暴的、无耻的；他们认为，从前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有；谁说有过，谁就是诬蔑青年，就是青年的敌人！

就是这样一种手段。我再说一遍，我们青年的最狠毒的敌人也想不出任何比这种手段对青年的直接利益更有害的了。我想必须证实这一点。运用否认事实的手段肯定能够取得惊人的

效果。

喂，先生们，如果你们立意要证明（主要的是，天知道是为了什么），“着迷的”青年，也就是可能“着迷的”（甚至是被涅恰耶夫迷惑的）那些人，必定全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头脑不发达的人”，全是一些根本不学习的人，——总之，全都是满身坏习气的二流子，那么你们想借此来证明什么，又用什么为事情开脱呢？你们这样做，就是把事情孤立起来，把它从学生的队伍中排除出去，然后再把它归结为纯粹是“游手好闲的头脑不发达的人”的事情，你们从而事先就把罪名加到这些不幸的人的头上，彻底抛弃他们：“你们是捣乱鬼，懒汉，全怪你们自己，你们不会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子后面。”把事情孤立起来，使它失去在与整体的联系上被考察的权利。（保护不幸的“迷误者”的唯一可能性恰恰在于这种权利！）你们这样就不仅对他们做出了最终的判决，甚至使他们得不到怜悯，因为你们直截了当地说明，他们误入歧途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恶劣品质，这些年轻人即使没有犯任何罪过，也应该受到蔑视和憎恶。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即那些全然不是头脑不发达的人，根本不是腿脚在桌子底下乱蹬的捣乱鬼，根本不是一批懒汉，相反，而是勤奋热情的青年，恰恰是求学的人，甚至心地也很善良，纯粹由于不良的引导而卷入某一事件，这又应该做何解释呢？（请注意引导这个词。你们现在在欧洲到处都可以发现在形形色色的倾向中摇摆不定的现象，就跟我们当前这个时刻一样！）那么，按照你们那一套“懒汉和头脑不发达的人”的理论来说，这些新的不幸者就该罪加三等：“给了他们条件，他们学习了科学，他们工作得也不错，——他们没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他们比起那些游手好

闲、头脑不发达的人更三倍地不值得怜悯和同情!”这就是从你们的理论中直接得出的结论。

先生们，请原谅（我是在一般地说，而不是只针对一个《俄罗斯世界报》的同仁），你们以“否认事实”为出发点，断言涅恰耶夫们必定是白痴，“愚蠢的狂热分子”。事实是这样的吗？这样说公道吗？我在这里不提涅恰耶夫本人，我说的是“涅恰耶夫们”，是指多数。的确，在涅恰耶夫们当中可能有心理十分阴暗的、十分忧郁和身心被扭曲的人，由于出身他们具有极其复杂的搞阴谋与渴求权力的欲望，强烈的、病态的、过早地显示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们为什么是“白痴”呢？相反，他们中间即使是真正鲁莽无知的人都可能是发育很好的，很狡猾的，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你们或许认为，知识、“科学”、学校的证书（最好是大学的）能够最终形成年轻人的心灵，一拿到文凭，立刻就有了万无一失的护身符，一劳永逸地掌握真理，远离诱惑、贪欲和罪恶。如此说来，按照你们的理论，凡是学习了科学的年轻人就能够永远不与罪恶沾边，立地成佛了。

你们又根据什么说，涅恰耶夫们无疑应该是狂热分子呢？他们常常是一些骗子。“我是一个骗子，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一个涅恰耶夫分子这样说，就算他是我的小说《群魔》里面的人物①吧，不过，请你们相信，涅恰耶夫分子真的能够这样说。这是一些非常狡猾的骗子，他们研究过人们的心灵，而研究的正是其胸怀开阔方面，更多的是年轻人的心灵，为的是学会像玩弄乐器似的玩弄人的心灵。难道你们真的

① 《群魔》中的人物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曾说过这句话。

认为，我们这里的某个涅恰耶夫分子所能招募到的新信徒必然只是一些二流子？我不相信，不完全是这样；我自己就是一个老“涅恰耶夫分子”①，我也在执行死刑的断头台上站立过，请你们相信，我是同一群有教养的人站在一块的。所有这些人差不多全都毕业于最高学府。有一些人到后来，在一切都过去之后，都成了有出色的专门知识和著作的人。不，涅恰耶夫们并不全是由那些不学无术的懒汉构成的。

我知道，你们肯定要反驳我，说我全然不是涅恰耶夫分子，仅仅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派②。就算是这样吧！（虽然，我认为这个名称是不对的；除站在行刑台上的人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与我们完全一样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触动，没有受到惊扰。是的，他们从来也不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但是，在这段早已成为过去的全部历史中，问题根本不在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个人，这就是我想强调的。）

但是，就算我属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那么你们怎样知道，在事情如果发生了转变的情况下，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不可能成为涅恰耶夫分子，也就是说，不可能走上涅恰耶夫的道路呢？当然，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想象：事情怎么可能发生那样的转变？时代完全不同。不过，请允许我讲一件自己的事：大概我永远也不会成为涅恰耶夫，但是，我不能保证不会成为涅恰耶夫分子，成为涅恰耶夫分子是可能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可能……

我现在是从自己谈起，这样我才有权利谈论别人。我要接

---

①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现身说法，他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他认为，在反政府这一点上，涅恰耶夫分子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几乎一样。

下去谈的还只是自己一个人，如果提到别的人，那也是一般地谈，没有具体的人，在纯属抽象的意义上谈。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因为已是久远的历史，我再提起这件事，大概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了，何况是顺便地抽象地提一提。

在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里面没有一个“粗鲁无知的人”和“骗子”（无论是在行刑台上站立过的，还是那些未被触动过的，——都是一样）。我不认为没有谁会出面反驳我的话。至于说我们当中有一些有教养的人——我已经说过，对此人们大概也不会反驳我，同我争论。但是，在我们中间确实没有谁能够同当时在年轻人中深深扎根的某些思想和观念进行斗争。我受了当时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染。那时在欧洲还没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头领们还反对这种社会主义。

1848 年 5 月，在一个不幸的早晨，一群失去耐心的饥饿工人冲进议会大厅①，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右翼的代表们不公正地抽打了路易·布朗② 的面颊，揪他的头发（似乎是故意揪的，他满头是又黑又密的头发），那时是阿拉戈③（天文学家、政府成员，现已逝世）把他从人们的手中解救出来的。不幸的路易·布朗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他根本没有煽动群众：这些群众由于革命和实行共和制而突然失去工作，他不

① 指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时期发生的事件。

②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1848 年二月革命后曾参加法国临时政府。

③ 阿拉戈（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829）。1848 年二月革命后曾在临时政府任部长。

过是在卢森堡宫向这些可怜的饥饿群众宣读了关于他们的工作权利的法令。当然，他毕竟是政府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演说是极不策略的，自然也是很可笑的。而孔西得朗[①] 的杂志以及蒲鲁东[②] 那些文章和小册子都竭力在饥饿的、没有任何信仰的工人里散布极端厌恶遗产继承权的思想。毫无疑问，这一切（即被未来幸福的理论煽动起来的饥饿人群的急躁情绪）就产生了后来的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实质，无论所宣告的全部目的是什么，暂时就是各个一无所有的阶级要掠夺全体私有者，然后就是“管它以后怎样呢”。（因为，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切都还没有真正解决，唯一解决了的是现在的社会瓦解了，——这也就是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目前的全部纲领。）然而，当时还是从最美好、最高尚、最符合道德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的。的确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把新出现的社会主义比做基督教，把它看做基督教为顺应时代与文明而进行的矫正与改善，社会主义的某些头领都持这种看法。我们在彼得堡非常欣赏当时所有这些新思想，认为它们是极其神圣的、极其符合道德的，主要的是，认为它们是毫无例外的全人类的未来法则。早在 1848 年巴黎革命之前，我们就沉浸于这些思想的迷人影响之中。早在 1846 年我就已经从别林斯基那里领会了未来“革新的世界”的全部真理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神圣性。[③] 所有那些认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本身

① 孔西得朗（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曾任《法伦斯泰尔》杂志（1832—1834）和《法伦吉》杂志（1836—1849）的主编。

② 蒲鲁东（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法国二月革命后被选入国民议会。

③ 参阅《老一代人》的有关论述。

（基督教的）不道德，认为宗教、家庭制度不道德，认为所有权不道德的信念，所有那些要求为了人们的普遍友爱团结而消灭民族，蔑视阻碍普遍发展的祖国思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无力克服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影响还以某种博大胸怀的名义征服了我们的心灵和智慧。这个学说至少使人感到宏伟渊博，其水平远远高出当时流行的各种观念——这也正是其诱惑力之所在。我们，就是说，不全都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总之是全部受过感染、旋即又彻底否定了所有这些梦幻般的激进狂想的人们，否定了所有这些用为了人类的革新与复活的名义而给人类准备的苦果与灾难的人们，——也就是我们中的这些人，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因，因而也就不可能同疾病进行斗争。总之，在那些火热的年代，我们的心灵沉湎于各种学说，极其紧张地注视着震撼当时欧洲的事件，把祖国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你们根据什么认为，在这种时刻，à la[①] 以涅恰耶夫方式的暗杀行为能够制止，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至少也可以制止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呢？

杀害伊万诺夫的凶手涅恰耶夫，面对自己的牺牲品，即“涅恰耶夫分子们”，毫无疑问，要把在莫斯科的骇人听闻的、令人深感厌恶的凶杀事件说成是一件政治的、造福未来的“共同的和伟大的事业”。否则就不能理解，几名年轻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同意去干这种愚蠢的犯罪勾当呢。我在自己的小说《群魔》中就是想要表现形形色色的各不相同的动机，就是把心地最纯洁的、最朴实的人们都吸引去干那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勾当的动机。可怕的就是，在我国，完全不是为非

① 法文：以……方式。按：此处接连下文意为“以涅恰耶夫的方式”。

作歹的卑鄙之徒却可以做出最龌龊无耻的事情来！这种事情不是唯独我国才有，全世界都是如此，向来如此，世世代代如此，在人们的生活发生动荡，在对社会的基本信念产生疑惑和否定、怀疑和动摇的过渡时代都是如此。但在我国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可能性都更大，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特点成了我们现代最病态的和最可悲的特点。在于明明白白是无可争辩的卑鄙勾当的时候，还可能认为自己不是坏人，即使有时候确实是坏人，——我们现代的灾难正在于此！

与其他年龄的人相比，有什么东西使青年受到那么特殊的保护，致使你们，青年的保护者们，只要青年稍加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你们立即要求他们具有那么坚定、那么成熟的信念，这是连他们的父辈们都办不到的，而现在则比任何时候更难做到。我们知识阶层的年轻人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些家庭中您现在经常看到的是不满、焦虑、愚昧粗鲁（虽然这些阶层是有教养的），在这样的家庭里几乎处处都是人云亦云，以厚颜无耻的否定取代真正的教育；在这样的家庭里物质的追求压倒一切高尚的思想；在这样的家庭里儿童受的教育没有根基，脱离正常真理，不尊重祖国或者漠不关心，对人民持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这种态度在最近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蔓延，我们的年轻人在生活中迈开最初的脚步时，——难道能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这样的源泉中汲取真理，选择正确的方向吗？罪恶的渊源就在这里：这就是背离关于继承的思想，在全民族中长期压制自己的一切独立精神，以轻蔑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为必然前提的欧洲人至上的观念！

不过，我觉得，你们是不会相信这些很普通的看法的。“教育，”——你们断然说，——“就是勤奋”；“游手好闲的人

们是头脑不发达的人”，——你们会重复说。先生们，请注意，我们所有这些高级的欧洲教师、我们的光明和希望、所有这些穆勒们①、达尔文们②、施特劳斯们③，有时以极端惊异的目光注视着现代人的道义责任。然而这些人都不是不学无术的懒汉，也不是在桌子下面腿脚乱动的淘气鬼。您会哄然大笑，并且问我：为什么我忽然想到要提出这些人的名字？因为谈到我们的青年，谈到有教养的、热情的和求学的青年时，很难想象，他们在迈出人生的最初几步时，竟会避开了这些人物的名字。对这些欧洲进步思想的先驱以及类似的其他人物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学说中与俄罗斯有关的方面，俄罗斯青年难道能够漠然置之吗？请原谅我说的“他们学说中与俄罗斯有关的方面”这句可笑的话，因为在他们的学说中确实存在着这个俄罗斯方面。这个方面存在于这些学说中那些作为难以推翻的公理的结论中，这是只能产生于俄罗斯的结论；据说，在欧洲是想象不到可能有这些结论的。也许人们要对我说，这些先生们，大概根本不教导人们去做凶恶的事情；例如，施特劳斯即使憎恶基督，以嘲笑与蔑视基督教作为自己毕生的目的，但他毕竟是尊重全体人类的，他的学说无比崇高和善良。很可能，确实如此，很可能，所有现代欧洲进步思想的先驱们都是以热爱人

---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实证论的首创者、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方面，主张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分配关系的改革，实行社会改良。

② 查理·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赞成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

③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著有《耶稣传》（1840）。他以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著名，认为耶稣是历史上的人物，而不是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不能接受的。

为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是庄严豪迈的。然而我却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给所有这些现代的高级教师们以充分的可能去把旧的社会毁灭掉，并且再把它重新建设起来——那么出现的必定是一团漆黑，混乱无序，必定是某种粗野、盲目、无人性的东西，以致这座建筑将在竣工之前就会在人类的诅咒声中整个倒塌。基督一旦被推倒，人类的智慧就能够达到惊人的结果，这是一个公理。欧洲，至少是欧洲思想的高层代表人物，正在推倒基督，而我们，尽人皆知，必须仿效欧洲。

在人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历史时刻，这就是把显而易见的、卑鄙无耻的、野蛮的残暴行径都看做心灵的伟大，看做冲破桎梏的人类的高尚勇敢行为。难道还需要举出事例吗？这样的事例岂不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吗？……的确，这是一个艰深复杂的问题，在一篇小品文中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我的推测是可以成立的：这就是，即使是正直、纯洁的少年，而且是学习很好的少年，也可能立即变为涅恰耶夫派……不言而喻，这还是说，如果他受到涅恰耶夫的影响的话；这是 sine gua non[①] ……

我们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站立在行刑台上，毫无懊悔地听着对我们的判决。当然，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不过，我想，如果我说，在当时，就是在那个时刻，纵使不是每一个人，至少也是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背叛自己的信念是可耻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因而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种顽抗和不思悔改可以仅仅归结为卑劣性格的问题，头脑不发达者和好惹事生非者的问题吗？不是，我们不是惹事生非的人，大概也不是品行不端的青年人。执行枪决的判决是在行刑

① 拉丁文：必不可少的条件（直译为：没有它就不成）。

之前向我们全体宣读的，这可绝不是为了开个玩笑；几乎全体被判决的人都深信不疑，判决是要执行的，人们至少熬过了难以忍受的、可怕至极的等待死亡的十分钟。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我确实知道），本能地陷入了沉思，瞬息之间回顾了自己还那么年轻的整个一生，可能，在自己某些沉痛的事情上忏悔了（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有那么一些潜藏在良心深处的事情）；但我们为之受审判的那件事情、掌握了我们心灵的那些思想、那些观念，我们认为，不仅不需要忏悔，甚至还是使我们净化的东西，是使我们博得很多宽恕的苦行！这种思想持续了很长时间。不是流放的年代，也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恰恰相反，任何事物都没能压垮我们，我们的信念以履行义务的意识支持了我们的精神。不，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心灵的是别的东西。（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改变了信念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明了这种改变。）这里所说的别的东西就是同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同人民的亲密结合，自己也成了跟人民同样的人的观念，同人民无区别，甚至把自己看做属于人民的最底层的人的观念。

我再说一遍，这件事不是那样快就发生了的，而是逐渐地、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发生的。而且，我（我说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可能是其中最容易回归到人民这个根基、最容易认识俄罗斯的心灵并认可人民精神的一个人。我出身于俄罗斯信仰虔诚的家庭，在家庭中，我们几乎是从幼年起就知道圣经。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记得父母对我的爱。我刚十岁的时候

就知道卡拉姆津[①]的俄罗斯历史的几乎全部的情节，父亲每天晚上都给我们朗诵这部历史。每一次参观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其他教堂都使我产生一种庄严感。很可能，别人没有像我这样的回忆。我现在经常沉思默想，并且反复地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现代青年所保留的青年时期的印象最多的是什么？如果说即使是我，在厄运把我们卷进一种新的严峻环境的时候，显然不能傲视一切，不为所动地摆脱这种环境的人，同时也不能漫不经心地、傲慢地对待自己面前的人民精神的表现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是经过了那么艰难的过程才终于认识到，我们在自己家中认为是光明和真理[②]的一切几乎全部都是谎言和错误，那么别的人，与人民的隔阂更深，从父亲、祖父那里世世代代承袭了这种隔阂的人们又该怎么办呢？……

叙述自己信念蜕变的历史，我感到非常困难，况且这可能也不是那么有意思；再说，在小品文里写这个也不合适……

保护我们青年的先生们，最后，请你们看看青年人成长于其中的那个环境、那个社会，然后再问问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了免受某些影响还有什么比青年更少受到保护的吗？

首先，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年轻人的父辈不是更好，不是更坚强，他们的信念不是更健康；如果这些孩子们从幼年起在自己的家庭中遇到的就尽是卑鄙的事情，尽是傲慢的和冷漠的（这是大多数情况）否定；如果在他们面前讲

---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著有《俄罗斯国家历史》（1～12卷）。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光明和真理”是指当时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上述欧洲思想家的学说。

“祖国”这个词时，面带嘲讽的笑容；如果所有教育他们的人都对俄罗斯的事情采取轻蔑或者冷漠的态度；如果他们的最宽宏大量的父亲们和他们的教育者们只是向他们灌输“全人类”的思想；如果还在童年时期他们的保姆就逼着他们在摇篮上读《圣母篇》；——那么请问：能够向这些孩子们要求些什么呢，并且——在维护他们的时候，如果需要维护的话，光以否认事实来搪塞，这算是人道的吗？

不久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下面一条 entre filet[①]：

> 《卡马-伏尔加报》报道，近日“喀山第二中学三年级三名中学生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罪行与他们图谋投奔美国有关”（《圣彼得堡新闻》，11月13日）。

要是在二十年以前，对某些三年级的中学生往美国逃跑的消息，我会感到荒唐。而现在却不认为是荒唐的了，相反，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只从这一点上我就看到事实本身为自己所做的辩解！

辩解！上帝啊，能够这样说吗！

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是逃跑的第一批中学生，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别的人逃跑过，而那些人逃跑，是因为他们的父兄们已经逃跑了。你们还记得克利西耶夫[②]那篇描写一名穷军官的短篇小说吗？这名徒步逃跑的军官经过托尔尼奥河[③]和斯德

---

① 法文：短讯。

② 瓦·伊·克利西耶夫（1835—1872），俄国冒险家、作家，在特写《侨民的故事》中记述彼得堡一名军官身无分文与证件，徒步经芬兰与瑞典逃至伦敦。

③ 芬兰与瑞典的边境河流。

哥尔摩到达伦敦，找到赫尔岑，赫尔岑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印刷所做排字工人。你们还记得赫尔岑自己描写一名见习军官的短篇吗？这名见习军官似乎是到菲律宾群岛建立公社去了，他还留下两万法郎供未来的侨民用①。不过，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从那时以来，跑到美国去体验“自由国度的自由劳动”的，有老年人、父母、兄弟姐妹、近卫军官……只是还缺少一些中学生。如果这些孩子，这三名中学生因为头脑简单而被关于“自由国度的自由劳动”、关于公社、关于全欧洲人等这些伟大的思想所俘虏，那能责怪他们吗？能怪罪他们把这一切废话当做宗教，把侨居国外② 和背叛祖国当做美德吗？如果要怪罪的话，那么他们有多大的罪过呢。——问题就在这里。

《俄罗斯世界报》上文章作者的思想是，在我们这里卷入“这类蠢事”的全是一些懒汉和无所事事的头脑不发达的人，他援引国民教育大臣不久之前在基辅发表的众所周知的令人兴奋的言论以支持自己的思想。大臣说，他在视察了七个学区的教学机构后可以坚信，“近年以来，青年人更加严肃地对待科学事业了，更加认真地工作了”。

是的，当然，这是令人兴奋的言论，可能，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这些言论中。当前这个时代的教学改革——几乎是我们

① 见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第 8 部，第 3 章）。其中谈到一个萨拉托夫的地主，于 1857 年带了三万法郎去新西兰，要以社会主义原则在那里建立移民区，后来不知所终。出发前曾送两万法郎给赫尔岑做宣传用。此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曾提到。

② “侨居国外”的俄文 Абсентеизм 是源自拉丁文的一个术语，在西方用以称呼拒绝参加选举的人，即弃权主义者；在俄国则用以称侨居国外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和《赌徒》中都谈到侨居国外的人。

的整个未来，我们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我还记得，教育大臣在自己的同一篇讲话中还说过，还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改革的最终结果。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的青年非常善于严肃地对待科学事业。然而，目前在我们的周围还弥漫着那么多谬误思想的烟雾，那样多的幻影和偏见在包围着我们和我们的青年，而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和这些青年的父母们的生活具有愈来愈奇特的形式，致使你有时不得不去寻找一切可能走出窘境的手段，手段之一就是——自己做有同情心的人，不论什么时候自己都不要羞于被称为公民……任何时候都要讲真理，即使你认为这一真理的自由主义精神还不太够。

## 代前言[1]：关于大、小熊星座，关于伟大的歌德的祈祷，并一般地谈谈恶习

### （《作家日记》[2]，1876 年，1 月号，第 1 章，Ⅰ）

……赫列斯塔科夫[3] 在市长家中至少是谎话连篇，不过他总还有点儿害怕，怕把他逮住，把他轰出旅店。现代的赫列斯塔科夫们什么都不怕，说起谎来完全心安理得。

如今大家都完全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可能，甚至还扬扬得意。未必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任何人都在“随意”行动，这就是最圆满的幸福。如今，跟从前一样，所有的人都被自负心蛀蚀了，不过从前的自负心是羞羞答答地、极度不安地瞻前顾后，面部的表情是在问：“我做得对吗？我说得对吗？”如今则是任何一个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首先就信心十足地认为，一切都属于他一个人。如果不属于他，那么他就连气都不生，可是眨眼之间他就对问题做出决定；你们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便条吗：

---

①② 《作家日记》原是在《公民报》上的一个专栏。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74 年退出《公民报》后，就考虑把《作家日记》作为独立的定期刊物出版。他于 1875 年底筹备就绪，至 1876 年 1 月起开始出版《作家日记》（每月一期），每期全部发表自己的作品（每期二印张），这里的代前言实际上就是新创办的《作家日记》第 1 期的发刊辞。

③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1836）中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青年的虚无主义情绪和行为实质上就是赫列斯塔科夫精神的形形色色的表现，他的这一观点在写作《群魔》时期即已形成。

亲爱的爸爸，我已二十三岁，可是我尚无任何作为；我明白了，我将一事无成，我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①

于是就开枪自杀。但这里还是有点儿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为了自豪，那是为了什么而活着?"而另一个人看一眼就走开了，他将默默无言地自杀，仅仅是因为他没有钱养活情妇。这就是纯粹的卑鄙无耻了。

报刊要我们相信，那些人之所以那样干，是由于他们想得太多。"在心中想呀想呀，突然间在什么地方就冒出头来，而且正好是预定的地方"。我深信，恰恰相反，他根本就什么都没想，他完全没有能力形成概念，他极端落后，如果他希冀什么，那也是出自本能，而非出自意识；纯系不折不扣的卑鄙无耻，这里面也没有任何自由主义的成分。

而且在这同时竟没有提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帕那边
还不知会怎样……②

这真是奇怪极了。难道这种不加任何思考就是俄罗斯人的天性吗？我说的是不假思考，而不是不理解。好吧，你可以不相信，但就是想一想也好。我们的自杀者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称之为我的，乃是不朽的人。关于这一点他似乎从来就

① 引文出自德国作家席勒（1759—1805）的剧本《堂卡洛斯》。
②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引文据卞之琳译本。

什么都没有听说过。然而，他绝不是无神论者。想一想从前那些无神论者吧：他们失去一种信仰之后，立刻就开始热衷于另一种信仰。请想想狄德罗①、伏尔泰② 等人的炽烈信念吧……而我们的人则纯粹是 tabula rasa③，哪里有什么伏尔泰：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钱供养情妇，仅此而已。

自杀者维特④ 行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在遗留下的绝笔中惋惜再也看不到"大熊星座最美丽的星体了"，同它永别了。噢，初试写作的歌德在这个细节上表现得是多么充分！这些群星对年轻的维特有什么珍贵之处？这就是，他每当观察它们的时候，他都意识到，在群星面前他根本不是一个原子，也不是一个零，他意识到，所有这些上帝的无穷的神秘奇迹全然不是高踞于他的思想之上，不是高踞于他的神智之上，不是高踞于他心灵中蕴藏的美的理想之上，而是可以说，处于与他同等的地位，它们使他与无穷无尽的大自然亲密无间……他为能够感到一种伟大的思想而倍加幸福，这就是向他揭示了他是什么人的那个伟大思想。——他只是受益于自己的人的相貌。

"伟大的神灵，为了你赐予我的人的相貌而感谢你。"

伟大的歌德在他的一生中的祈祷应该是这样的。在我们这里完全随随便便地把上帝赐予人的相貌毁掉了，而且也没有应用这些德国人的任何手法——不仅没有向大熊星座也没有向小熊星座告别，谁都没有想到要告别，即使有人想到，也不会去

---

①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法国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大词典》的创办者和主编。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启蒙运动哲学家、自然神论者。他与狄德罗都先后任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

③ 拉丁文：空白，直译为白板。

④ 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人物。

做：因为他会为此感到非常惭愧。

“您这是在谈论什么？”惊讶的读者问我。

“我想写一篇前言，因为不应该完全没有前言。”

“如果是这样，您最好是阐明您的倾向，您的信念，说明您是何许人也，怎样鼓起勇气宣告写《作家日记》的？”

但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也明白，我不是写前言的高手。前言大概也如同书信那样难写。至于谈到自由主义（我将直接使用“自由主义”一词取代“倾向”这个词），众所周知的“陌生人”① 在自己不久前的一篇小品文中谈论我们的报刊如何迎接1876年时，不无刻薄地顺便指出，一切都在十足的自由主义气氛中过去了。我高兴地看到他在这里流露的刻薄口吻。的确，最近时期我们的自由主义不是变成了墨守成规，就是变成了恶习，到处都一样。就是说，习惯本身完全不一定是恶习，但是在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一切就都成了这个样子。更为奇怪的是，我们的自由主义似乎是属于平静型的自由主义；而平静的、安于现状的自由主义，依我看，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寂静主义② 似乎最不能容忍自由主义。那又怎样呢，虽说是那样平静，可还是处处都显露出无可置疑的征兆，表明我们的社会在渐渐地完全丧失掉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又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理解，在理解上开始出现极大的混乱；混乱之极的事例也是有的。简短地说，我们的自由主义者不是要变得更自由一些，而是拿自由主义当做绳索把自己捆绑住了，因此我也就根据这个有意思的情况，不详细谈论我的自由主义了。不过，我

① 新闻记者、出版家阿·谢·苏沃林（1834—1912）的化名。他在文章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例外，并由衷地祝愿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成功。

② 来自法文，指对生活采取平静、消极旁观的态度。

要一般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想平静，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认为自己比所有的人更自由主义一些。关于这个问题，谈到这里就足够了。至于说我是怎样的人，我想这样来表述自己：“Je suis un homme heureux gui n’a pas l’ air content”①，用俄语说就是：“我是幸福的人，但是——也有某些不满足”……

前言就写到这里为止。而这也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① 法文：引自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引文略有出入。

## 未来的长篇小说。再谈“偶合家庭”[①]

### (《作家日记》，1876 年，1 月号，第 1 章，Ⅱ)

画家俱乐部有圣诞节晚会（或译枞树晚会——译者）和儿童舞会，我也去看看孩子们。我从前就时时都在观察孩子们，但这一次则看得特别仔细。我很早以前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理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谈谈当今俄罗斯的儿童[②]，当然，也谈当今的父亲，从他们当今的相互关系来谈。首先，正如小说家往常所做的那样，长诗[③] 一准备好，就立即创作出来了。我尽可能从社会的所有阶层中选择父亲和儿童，从这些孩子幼年起就跟踪观察他们。

一年半之前，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邀我为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以说明当时俄国家庭一种状况的术语。被作家称为“偶合家庭”的家庭特点是：过去时代长期形成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常关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都在衰落，人们熟悉的典型俄罗斯家庭正在演变、消失，处处充满混乱，各行其是。作家认为，这种家庭是俄国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俄国生活所发生的激烈变化后的典型现象。“偶合家庭”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作家的长篇小说《少年》的结束语中，作家以《再谈“偶合家庭”》作为本文的标题，是要说明本文与《少年》的联系。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曾构思写一部以“父与子”为主题的小说，后在《群魔》中提出这个主题，在《少年》里部分实现了这一构思。他在多处谈到儿童问题。

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意味着创作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形成作品的思想和构思阶段。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也曾如此使用过。此处“长诗”一词，也可以理解为在构思中的“长诗”，即长篇小说。

《祖国纪事》① 杂志写小说时，我几乎就动手写我的《父与子》，但幸亏我搁了笔：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当时我只是写了《少年》——这是实现我的构思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在那里小孩子已经脱离了童年时期，但还是未成年的人②，他既羞怯又果敢地希望尽快在生活中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我选取的是天真无邪的、但已被玷污了的心灵危险堕落的可能性，因自己地位卑贱与自己的"偶然性"③ 而萌生的幼稚的仇恨已经沾染了这颗心灵，这颗纯真的心灵由于自己的豁达不羁而允许邪恶念头进入自己的思想并在自己的心灵中孕育它，它还羞怯，但已在大胆和热烈的幻想中欣赏它，——这一切都只听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理智，当然还听凭上帝的支配。所有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早产儿，都是"偶合"家庭中的"偶然"成员。

不久之前，人们在报纸上读到小市民别罗娃被杀害以及杀害她的凶手也自杀的报道。她本来与他一起生活过，他是印刷所的一名工人，后来失去了工作，于是她就租了一处房子，收留来投宿的人们。从此他们就开始不和。别罗娃要求他离开她。凶手的性格是极其现代的性格："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他答应她"离开她"，在夜里就残暴地杀害了她，这是经过周密考虑，事先安排好的，然后自己就自杀了。别罗娃留下了两个孩子，十二岁和九岁的男孩，都是非婚生的，但不是同凶手而是同她从前的相好生的。她爱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目睹了那可怕的场面，这工人从傍晚就不断责骂他们的母

① 1868—1877 年由涅克拉索夫主持编辑。
② 指长篇小说《少年》中主人公之一阿尔卡季。《少年》的原文直译应为"未成年者"。阿尔卡季当时是十九岁，小说写的就是在他进入二十岁（成年）这一年的生活和思想变化。
③ 他是私生子。

亲，折磨她，直至她昏厥过去，他不准她进他的房间，但她还是进去了。

《呼声报》呼吁公众救助“不幸的孤儿”，其中那个大孩子正在第五中学上学，另一个还在家中未上学。这又是一个“偶合的家庭”，又是在幼小的心灵里就留下悲惨印象的儿童。悲惨的画面将永远留在他们年幼的心灵里，可能从那些日子起就痛苦地伤害着幼年的自豪感。

从前，我对日常生活中
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觉得新鲜。①

由此而来的力不从心的任务、自尊心，过早遭受的痛苦，为过去而承受的不应有的耻辱感，深深蕴诸内心的对人们的无声憎恨，可能，这一切都将终生不忘。愿上帝保佑无辜儿童的未来，愿他们终生都不停地热爱他们可怜的母亲，不责备她，也不为自己的眷爱母亲而感到羞愧。必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富有同情心的，高尚的。如果他们上了学，难道让他们辍学吗？据说，大的不会辍学，他的命运似乎已经有了安排，可是那个小的呢？难道是给他们凑个七百或一千卢布，然后就把他们忘掉吗？感谢《呼声报》提醒我们关心不幸的人们。

① 引自普希金（1799—1837）的诗《恶魔》。

## 画家俱乐部的圣诞节晚会。[1] 思考的孩子和不动脑筋的孩子。“贪嘴的青年”。ВУЙКИ[2]。横冲直撞的少年。莫斯科的急性子大尉

(《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1章，Ⅲ)

显然，我不会详尽地描写画家俱乐部的圣诞节晚会和舞会，因为这一切都早已有过，当时曾有人描写过，我自己还很愉快地在别人的小品文中阅读过这种描写。我要说的只是，在此之前有很长时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没有参加过任何聚会，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

开始是孩子们跳舞，全都穿着华丽的服装。很有意思的是观察儿童如何在全然不知不觉中就习惯了最复杂的观念。当儿童还不能把两个想法联结在一起时，有时却能很贴切地理解非常深奥的生活现象。德国一位学者说过，每一个儿童长到三岁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观察、评论当代俄国的社会现象时，儿童的生活和教育是他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1875年底他同自己的女儿参加了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的圣诞节儿童舞会，次日他访问了少年犯罪儿童教养院。那些在严寒中沿街乞讨、流浪的儿童随时随地都涌进他的视野。他满脑子的纷乱印象唤起他表现儿童生活的愿望，写作了一组以儿童为主题的短篇，即圣诞故事。《画家俱乐部的圣诞节晚会》描写的是富裕人家的儿童的圣诞节；《乞讨的孩子》和《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则是描写贫穷儿童饥寒交迫甚至冻馁而死的悲惨命运。

② вуй（俄文，读音为乌依）为法语“是”的俄语音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文中称缺乏文化教养、与人交往中只知回答“是”或“不是”的俄国少女为вуйка（复数为вуйки）。

时就已经获得了行将入墓的老人的思想与知识的三分之一。舞会上甚至还有六岁的儿童，我肯定知道，他们完全明白：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才到这里来，并且穿上那么贵重的服装，而在家里却穿得邋邋遢遢（在中层社会目前的财力下——必然穿着邋遢）。不仅如此，他们大概已经明白，必须这样做，毫未越轨，这才是大自然的规律。当然，他们还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心里是明了的，显然，这已是极其复杂的思想了。

在孩子们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最小的儿童；他们无拘无束，非常可爱。大一些的儿童就无拘无束得有些放纵。诚然，最无拘无束和最活泼的是将来平庸无能的人，这是一般的规律：平庸之辈向来就是不受拘束的，儿童是这样，父母也尽如此。有些才能、有些突出的儿童总是比较矜持的，他们如果玩耍，那就必定要率领别的孩子，指挥他们，这是他们的习惯。还有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总是不要孩子们费力气——不仅仅是各种学习，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游戏和玩具都要轻松。幼儿刚刚开始咿呀学语，立刻就来帮他渡过难关。现在整个教育学都倾全力于关注减轻负担。有的时候，这种减轻负担完全不是前进，甚至相反，是倒退。在童年时期经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说是磨炼）而深入领悟的两三种思想、两三种印象，远比最轻松的学校能使儿童更深刻地了解生活。从那种学校尽是出来一些不良不莠、不善不恶的人，就是在堕落中也称不上最堕落，在高尚中也称不上最高尚。

牡蛎怎样了，好了吗？多高兴！
贪嘴的青年扑过去

一扫而光……①

这种“贪嘴的青年”（这是出自普希金的唯一一首最差的诗，因为诗中没有一点儿讽刺，而且几乎是在赞赏）——而这种贪嘴的青年是如何造就出来的呢？可憎的青年，不受欢迎的青年，我确信，过分减轻负担的教育在极大的程度上促成了这类青年的出现；而在我们这里诸如此类的好事做得太多了！

小姑娘们总是比男孩子们更懂事。为什么女孩子们，差不多直至成年时期之前（不是此后），总是更成熟，或者看上去似乎比年龄相同的男孩子们更成熟呢？女孩子们在跳舞的时候特别懂事些：你就是这样在某一个小姑娘身上看到未来的“Вуйка”，这样的小姑娘无论如何都嫁不了人，虽然她很想嫁人。我说的 Вуйка 是指那些几乎快到三十岁的时候还只用 вуй 和 нон② 来回答你的话的姑娘们。此外，也有一些小姑娘，一眼就看得出来，她们很快就会出嫁，称心如意。

我认为，还有更不得体的，这就是，给快到成年的姑娘穿上儿童服装去赴舞会，实在不雅观。有些小姑娘就一直是这样同成年人跳舞，穿着短连衣裙，裸露着双腿，午夜，儿童舞会结束的时候，她们就钻进父母的马车。

不过，一切都令我非常高兴，如果不是一些少年挤来挤去的话，一切都会进行得令人十分满意。实际上，成年人都彬彬有礼，少年们（不是儿童，而是少年，来日的青年，身着各种不同的制服，这样的少年很多）——让人厌烦地挤来挤去，不

---

①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的旅行（片断）》。

② вуй 和 нон 为法语的俄文音译，意为“是”和“否”。

道声歉就理直气壮地从你前面穿过去。我被推撞过五十来次；也许，为了养成他们的无拘无束，就是教导他们这样做的。虽然非常闷热，还有电太阳① 和舞会组织者在舞场上发号施令的疯狂喊叫，不过，由于我长时间没有参加舞会了，对一切都感到兴趣。

最近我得到一期《彼得堡报》，读了其中一篇来自莫斯科的通讯，报道的是贵族集会、艺人俱乐部、戏院和化装舞会等节庆活动中的丑闻。如果完全相信记者（因为记者报道坏事时可能故意闭口不提好事），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频繁出现丑闻。奇怪的是，早自幼年起的整整一生中，我只要一踏进俄罗斯人的大型喜庆集会，总是立刻就觉得，一切都好像是他们装出来的，他们突然间就会蹦起来扭打、闹事，完全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个想法是荒唐的、离奇的，——还在童年的时候我就因为有这种想法感到害臊，还责备自己！这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想法。噢，当然啦，忠实的记者（我完全相信他）所讲述的那些商人和大尉们从前有过，今后还会有，这是不会消失的一类人；不过他们从前总还有点儿畏缩，总在掩饰着感情，而现在呢，那类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获得新权利的先生有时突然站到人群的中间。显然，在最近二十来年，有很多俄罗斯人，不知是什么原因，忽然以为他们获得了侮辱他人的充分权利，以为现在这已经是好事，现在他们会为此受到称赞，而不是被带出去②。另一方面，我明白，在集会的中间站出来是很愉快的事（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一切都在你的周围，太太们，先生们，还有长官们。讲话都是那么和颜悦

① 原文如此，实指取代烛光的电灯。
② 指被赶出舞会。

色，对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一视同仁，好像真的是在欧洲。站在这些欧洲人中间，突然用地道的民族方言高声说一句话，打什么人一记耳光，对姑娘讲句下流话，总之，在大庭广众之下胡作非为："他在说，你们看，这就是二百年[①]欧洲主义的结果，而我们就是他们那些欧洲人[②]，全都跟从前一样，什么也没有变！"这是愉快的。然而野蛮人毕竟是要打错算盘的：人们不会买他的账，必定要把他拉出去。谁来拉他？是警察的力量吗？不，根本不是警察的力量，恰恰是与这个野蛮人相同的那些野蛮人！这就是把他拉出去的力量。我再做一点儿解释。

你们知道吗，什么人最喜欢、最看重俄罗斯社会这种欧洲式的聚会、欧洲式的娱乐形式？这就是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们[③]、乞乞科夫们[④]，甚至可能还有杰尔日莫尔达们[⑤]，就是那些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有高度民族气息的人们。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有自己的聚会和舞会，但是他们看不起也不尊重这一切，他们看重省长家的舞会，看重从赫列斯塔科夫[⑥]口中听到的那种上层社会的舞会，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与上流社会不一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看重欧洲的形式，虽然他很清楚，就他本人来说，他是不会悔悟的，从欧洲式的舞会回到家中之后，他依然是那个挥拳就打的人；但他得到了安慰，因为在理想上他尊重了高尚行为。

---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二百年间的变化。

② 指当时向往西欧文明的俄国人。

③ ⑥ 均为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人物。

④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主人公。

⑤ 杰尔日莫尔达是果戈理的剧作《钦差大臣》中的人物——一个警察。他成为行为粗暴、强迫命令者的代名词。

唉，他全然知道，这都是幻影①；但在参加过舞会之后，他终于得以证实，这个幻影还继续存在，还在靠某种无形的但非常强大的力量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没有敢于走到人群中间，没有敢于用民族的土话大喊一声，——种种情况没有允许他这样做，今后也不会允许，想到这里他非常欣慰。您想象不到，一个野蛮人对欧洲的喜爱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他这样做似乎也是在参与崇拜。毫无疑问，他常常弄不明白，崇拜的是什么。比如赫列斯塔科夫吧，在他看来，这种崇拜就表现在上层社会的舞会上摆出的价值一百卢布的西瓜上②。可能，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直到现在还对那个西瓜深信不疑，虽然他已经识破了赫列斯塔科夫，蔑视赫列斯塔科夫，但是他尊敬的高尚行为哪怕是表现在那个西瓜上他也很高兴。这丝毫也不是虚伪，这是最实在的真诚，甚至还是需要。而且就连虚伪在这里也起着好的作用。要知道究竟什么是虚伪呢？虚伪就是劣行必须给予美德的一种报偿③。关于虚伪的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希望实际上始终做恶人，而同时，哪怕是在内心里又不与美德割断联系的人来说，确是令人无限欣慰的思想。哎，劣行极其喜欢给予美德以报偿④，这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对我们来说在目前这已足够了，难道不是吗？所以说，在莫斯科的舞场上撒野的大尉至少暂时只是一个例外，是一个过分急躁的人；其实，

① 指欧洲式的高尚行为。

②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第3幕第6场，赫列斯塔科夫吹嘘说彼得堡的舞会富丽堂皇，剧本原文为“桌上放着一个西瓜——那西瓜就值七百卢布”。

③ 法国作家德·拉罗什富科（1613—1680，著有《回忆录》《箴言录》）的一句名言。

④ 即劣行常爱以虚伪来掩饰自己。下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这也是非常好的”是反话，是讽刺性的话。

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暂时”这个词也是令人欣慰的。

由此可见，舞会是一件纯粹保守的事情，这是从保守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上说的，我这样说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

## 黄金时代，① 唾手可得

（《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1章，Ⅳ）

不过我是感到寂寞的，其实不是寂寞，而是有些懊丧。儿童舞会一结束，父母们的舞会就开始了，上帝啊，是多么平庸！所有的人都穿上新衣服，但是谁都不知道新衣服该怎样穿法，所有的人都在寻欢作乐，但是谁都不快乐；所有的人都爱面子，但是谁都不知道该怎样显示自己；所有的人都有忌妒心，但是人人都沉默不语，躲躲闪闪。他们甚至不会跳舞。瞧那个身材很矮的正在旋转的军官（您在中等社会的场场舞会上都会遇见这类身材矮小，发疯似地旋转的军官），他的全部舞步，他的全部舞技就是使出近似野蛮的劲头，猛推猛拉，旋转自己的舞伴，他可以一口气连续跟三十、四十位舞伴旋转，这是他的骄傲；然而这里有什么美可言呢！跳舞——这近乎表白爱情（请想想小步舞），而他却像在搏斗。于是我的头脑中冒出一个离奇的、极其粗野的想法：假如这些可爱和可敬的客人们——我想，——全都想做一回真诚的和纯朴的人，哪怕只有

① 人类的黄金时代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向往，他们不赞成把人类社会的过去、幼年时代、蒙昧时期看作黄金时代，而是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在未来。俄国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承袭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一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一员也在19世纪40年代接受了这一思想。关于黄金时代的思想在他的政论和小说中也得到反映。但由于他的世界观的变化，他对这一思想的阐述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他在本文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就潜在于当代人们的本性之中，这个观点最早出现于《罪与罚》（1866）的手稿之中。

一刹那的工夫也好，那时这座闷热的大厅突然间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呢？假如他们每一个人都突然知道了全部秘密，那又会怎样呢？假如他们每一个人突然知道了，他自己有多少坦诚，多少正直，多少最真挚的、由衷的欢乐，多少纯洁，多少博大的胸怀，多少善良的愿望，多大的智慧，——多大的智慧！——有多少最机敏、最富感染力的幽默，那又会怎样，而这一切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毫无疑问，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先生们，所有这一切你们每个人都有，是你们固有的，可这一点你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一无所知！噢，可爱的客人们，我敢发誓，你们每位男女都比伏尔泰聪明，比卢梭感情丰富，具有亚西比得①、唐璜②、鲁蕾齐亚③、朱丽叶④和贝特丽丝⑤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你们不相信你们是那样美好吗？我要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无论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还是在席勒与荷马的作品中，甚至是把他们都加在一起，也找不到一点儿那么美好的东西，就像现在，此时此刻，在这座舞厅里，在你们身上能够找到的那种美好的东西。莎士比亚算什么！这里能够出现的东西是我们的先哲们梦想不到的。然而你们的不幸就在于你们自己不知道你们是多么美好！你们知道吗？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要愿意，他立刻就能够使这个大厅里所有的

---

① 亚西比得（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军事统帅。苏格拉底的弟子，能言善辩。

② 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的同名长诗《唐璜》的主人公。

③ 鲁蕾齐亚·博贾（1480—1519），罗马教皇六世之女，切萨雷·博贾之妹；曾是他们的政治游戏中的驯服工具。第三次出嫁后成为费拉拉公爵夫人；吸引许多诗人和艺术家接近宫廷。

④⑤ 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的主人公之一；贝特丽丝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1598）中的人物。

人变得幸福起来，并且带动所有的人都跟着自己这么做。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种力量，不过是在发挥出来之前都深深地潜藏着，这种潜藏的力量早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难道黄金时代的存在仅仅表现于陶瓷茶具吗？

大人阁下，请不必一听到黄金时代一词就皱眉头：我向您保证，没有人强迫您穿上黄金时代的服装，带着耻辱证走路，而是让您原封不动地保留您的全套将军制服。请您相信，就是有将军官衔的人物也能够进入黄金时代。大人阁下，您不妨试一试，论官衔您是最高的，由您首倡，您会亲眼看到，人们突然之间能够表现出多大的皮隆式的机智①，完全出乎您的意料。您在嘲笑，您觉得不可思议吗？我为能使您发笑而高兴，不过，现在我大声呼吁的并非奇谈怪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而你们的一切不幸就是由于你们对此不以为然。

① 阿·皮隆（1689—1773），法国诗人，以机智俏皮著称。

## 乞讨的孩子

（《作家日记》，1876 年，1 月号，第 2 章，Ⅰ）

小孩子们是一种奇怪的人，他们出现在人们的梦境和隐约的幻觉中。在圣诞节前，在布置枞树之前或者正在布置的时候，我在街上某个拐角的地方常常遇到一个小男孩儿，他最多不过七岁。在严寒的季节他穿得像夏天，只是在脖子上围一件破衣服，看来，有人在打发他上街的时候，还是想到给他御寒的。他走路时，手里拎着一件“家伙”；“家伙”是句行话，意思是乞讨。这句行话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像他这样的孩子很多，他们在我们的道路上转来转去，口里哼着背熟了的歌曲；但这个男孩儿却不唱，他说话显得有些羞涩怯生，用信赖的神情望着我的眼睛，——看得出，他刚开始干这一行。他回答我的问话说，他有一个生病的、没有活儿干的姐姐；也许这是实话，不过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类孩子非常非常之多：即使是最寒冷的天气也把他们打发出来乞讨，如果什么也讨不到，等待他们的准是一顿毒打。这个男孩儿讨到几个戈比之后返回某处的地下室，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在那里，一伙懒汉喝得醉醺醺的，他们“从礼拜六的晚上就不在工厂干活了，最早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的晚上才重回工厂做工”。在地下室跟他们一块灌酒的还有他们的饥肠辘辘的、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妻子们，他们的饥饿的吃奶的婴儿也在那里嗷嗷待哺。伏特加，垃圾，堕落，主要的是伏特加。带着讨来的戈比回来的孩子立刻就被打发到小酒馆去，他又把酒带了回来。偶尔为了取乐也灌他一口酒，当他呛得喘不出气来，一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时候，

人们便哈哈大笑：

……向我嘴里残忍地
灌进一口辛辣的烧酒……①

等到他长大一点儿，就赶快把他卖进一个什么工厂，他挣得的全部工钱还是必须交给懒汉们，懒汉们又把钱喝个净光。不过，这些孩子们还长不到进工厂的年龄就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罪犯了。他们到城市的各处去游荡，知道各处能够钻进去偷偷住下的地下室。有一个孩子在一个看院人的箩筐里接连住了几夜，看院人竟然没有发现他。不必说，这些孩子都会变成小偷。八岁的孩子就偷窃成癖，有的时候他们对什么叫犯罪还一无所知。结果他们也要忍受一切——饥饿、寒冷、毒打，——只为了一件事，就是为了自由，他们要逃离自己的懒汉们，出于自愿而流浪。这种未开化的生物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连他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民族，有无上帝，有无皇上，全都不知道；关于他们传说着一些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然而一切全是事实。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童年》，引文与原文有出入。

## 与基督共度圣诞节晚会的小男孩儿①

（《作家日记》，1876年，1月号，第2章，Ⅱ）

不过我是写小说的，我好像编了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说“好像”呢，其实我自己肯定知道，我是编了一个故事，但是，我总恍惚觉得，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生过的事情。恰恰是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冷得要命的日子，在一个大城市里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仿佛觉得，在地下室有一个男孩儿，他还很小，大约六岁，或许更小。这个男孩儿一大早就在潮湿冰冷的地下室醒过来。他穿的像是件长袍，全身在颤抖。他坐在屋角的一只木箱上，从口中吐出一缕缕白气，为了解闷他故意从嘴里往外喷气，望着这股袅袅的白气觉得有趣。他太想吃点什么了。从早晨起他已经几次走到那张木板床跟前，他那生病的妈妈就躺在床上，她身下铺着一床薄得像饼似的垫子，头下枕着一捆东西当枕头。她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也许是带着自己的儿子从别的城市来的，来到这里突然病倒了。住在这个屋角的主人两天之前被抓进警察局；在这儿落脚的人都走散了，快过节了，剩下的一个懒汉还没有等到过节就醉得跟死人一样，已经躺了整整一天一夜。在另一个角落里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婆，她被痛风折磨得不停地呻吟，她曾经在一些人家当过保姆，现在是半死不活的孤零零的一个人，一直在哼哼哟哟，对着小男孩儿不住嘴地唠叨，因此小男孩儿都不敢挨近她那个屋角了。他在外屋

---

① 本篇有题解，见本卷（《作家日记》）书末附录。

找到点儿水喝，可是吃的却哪里也找不到，他想把妈妈叫醒，已经叫过十来次。后来，在一片漆黑当中他害怕了：天早已黑了，可还没有点灯。他摸摸妈妈的脸，吓了一跳，她纹丝不动，已经跟墙壁一样冰凉。“这儿太冷了”，——他想到。他站了一会儿，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手还放在死人的肩上，后来往手上吹气，想暖暖手，无意中在床上摸到自己的破帽子，悄悄地用手摸索着走出地下室。他本来早就可以走出来，就是怕上面楼梯上那条大狗，那条狗一整天都蹲在旁边的门口嚎叫。狗离开了，他就立刻走到街上。

天啊，多么大的城市呀！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他从那儿来的那个地方，夜里黑漆漆的，整条街上才有一盏灯。低矮的小木屋用护窗板遮得严严实实；天刚擦黑儿，街上就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全都关门闭户躲在家里，只有一群群野狗在狂吠，足足有千百条狗彻夜不停地嚎叫。可是那里暖和，还有人给吃的。而这儿呢——上帝啊，要是有点儿吃的就好了！这里到处是叮叮当当和隆隆轰鸣，处处是光和人，马和车，再就是严寒，凛冽的严寒！被驱赶的马从热乎乎的嘴里吐出团团冰冷的气体；钉了掌的马蹄踩在石板地面的蓬松的雪上，发出咯吱的响声，到处都是那么拥挤。上帝啊，多么想吃一口东西，吃一口什么都成，手指又忽然疼起来。从旁边走来一个警官，他不想看见这个男孩子，一扭脸走开了。

又是一条大街，——多么宽呀！在这儿走准得被车撞上；人们不停地吆喝，有的步行，有的坐车，都跑来跑去。多么亮，怎么这样亮！什么东西？噢，原来是大玻璃窗，窗子里面是房间，房子里有一棵天花板那么高的树；这是枞树，树上挂满了小灯。金光闪烁的纸玩具和苹果，树周围是小娃娃和小马；打扮得干净漂亮的孩子们在屋里跑来跑去，他们边笑边

玩，又吃又喝。一个小姑娘同一个男孩子跳起舞来，真可爱的小姑娘！还有音乐，隔着窗子也可以听见。小男孩儿望着望着，惊呆了，竟然笑出声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的脚趾也突然疼起来，手指完全变成红色的了，已经蜷不回来，一动就痛。小男孩儿猛然醒过来，他的手指疼得厉害，他哭了，跑开了，可是他又隔着玻璃窗看到一处房屋，屋子里面又是枞树，但桌子上摆的是小馅饼和油煎包，各种各样的——扁桃仁的、红色的、黄色的，桌旁坐着四位阔气的太太，有人进屋，她们就给小馅饼、油煎包，门不断地打开，很多位先生从街上走进他们的房子。小男孩儿悄悄走近跟前，猛然推开门，钻进房子里。哎呀，全都朝着他惊叫起来，还挥动着手！一位太太赶紧走到他面前，往他手上塞了一枚戈比，然后自己给他推开通向大街的门。他惊吓得慌慌张张！那枚戈比从他手中滚落下去，沿着台阶发出响声：因为他不能够把冻得通红的手指蜷回来，握住戈比。小男孩儿跑开了，赶快走呀，走呀，可是在往哪里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又想哭，可没敢哭出来，于是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往手上哈气。他心头涌起一阵苦闷，因为他忽然感到孤独，孤独得可怕，可是他一下愣住了，我的上帝！这又是怎么回事呀？站了一群人，都在啧啧惊叹：在玻璃窗子里边站立着三个布娃娃，都不高，穿着红的、绿的衣裙，跟真人一模一样！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好像在拉大提琴，还有两个人也站在那里拉小提琴，随着节拍摇晃脑袋，彼此都望着对方，他们的嘴唇也在翕动，在说话，真的是在说话——只是隔着玻璃窗子听不到说的是什么。小男孩儿开始以为他们都是真的人，当他猜出他们都是玩偶的时候，不由得笑出了声。他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玩偶，也不知道竟有这样的玩偶！他这时真想哭，但是对着玩偶哭实在可笑。猛然间他觉得有人从身

后抓住他的衣服：原来是一个凶狠的大男孩儿站在他身旁，猛打他的脑袋，摘下他的帽子，还从下面踢他一脚。小男孩儿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立刻就有人喊叫，他吓傻了，跳起来就跑——不停地跑，一口气跑到连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从大门下面钻进一所院子，——于是他就坐在一堆柴禾后面："这儿没人能找到，而且一片漆黑。"

他坐在那里，蜷缩成一团，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突然间，一点儿也没想到，他觉得好受了：手和脚一下子就不疼了，全身都暖和了，暖得简直像坐在炕炉上；接着，他全身打了个冷颤：哎，原来他睡着了！在这儿睡上一觉真舒服："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再去看那个布娃娃，"——小男孩儿盘算着，一想到那几个布娃娃，他就会心地笑了，——"跟真人一样！……"这时候他忽然好似听到一种声音，他的妈妈在他头顶上唱歌："妈妈，我稍睡一会儿，嘿，在这儿睡觉可太好啦！"

"孩子，走，到我那儿去过圣诞节晚会吧。"——忽然又一个轻轻的声音在他头顶上细语。

他以为这还是他妈妈，其实不是，不是她；这是谁在唤他，他没有看到，但是，有个人向他弯下腰，在黑暗中拥抱他，他也向这个人伸过手去，于是……刹那间，——噢，多么明亮！多好看的枞树呀！这简直不是枞树，他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枞树！他现在是在哪里：一切都亮晶晶，一切都闪闪发光，周围全都是布娃娃，——不，他们全都是小男孩儿和小姑娘，不过全都跟布娃娃那样晶莹明丽，他们把他围在中间，他们在飞翔，他们都亲吻他，携带着他一块翱翔，其实他自己也在飞翔。他看见他的妈妈正在望着他，正在对着他欢欣地笑着。

“妈妈！妈妈！这里真好呀，妈妈！”——小男孩儿向妈妈喊道，然后又去跟别的孩子们亲吻，他想尽快把玻璃窗子里面那些布娃娃的事讲给他们听。——“男孩子们，你们是什么人？小姑娘们，你们是什么人？”——他爱慕地笑着问他们。

“这是‘基督的圣诞节晚会’”，——他们告诉他，——“在这一天，基督总是为那些没有自己的圣诞节晚会的小孩子们安排圣诞节晚会……”他知道了，这些男孩子跟女孩子们从前都是像他一样的孩子，但是，有一些是在箩筐里冻死的，他们是被放进箩筐里抛弃到彼得堡大官们的门外的台阶上的；还有一些是从孤儿院领出来喂养时，在楚赫纳[①] 的家里饿死的；第三种是伏在自己母亲的干瘪的奶头上死去的（在萨马拉地区饥荒时期）；第四种是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被恶臭的浊气闷死的。现在他们全都到了这里，现在他们全都像小天使一样，都在基督的身边，基督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向他们伸出手，祝福他们和他们有罪的妈妈……这些孩子们的妈妈也站在这里，站在旁边，她们在哭泣；每一位妈妈都认出了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孩子们飞到她们面前，吻她们，用自己的小手给她们擦眼泪，恳求她们不要哭，因为他们在这里很好……

下面的故事是，天刚亮，看院子的人们就找到了跑到这里、冻死在柴堆后面的男孩子的小小尸体；她的妈妈也被找到了……她死在他之前；他们两个在天堂，在上帝那里相聚了。

我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故事，这个与通常的合乎情理的日记、而且是与作家日记不相称的故事呢？况且还许诺过主要写与真实事件有关的故事！原因就是，我总是觉得，恍惚地感到

①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对爱沙尼亚人以及彼得堡郊区卡累利阿人和芬兰人的俗称，含有轻蔑的意思。

这一切都是真有可能发生的，——这是说在地下室和柴堆后面发生的那一切，至于基督的圣诞节晚会——我就不知道了。怎样向您说呢，这种事可能发生还是不可能发生呢？我是写小说的，我的工作就是虚构。

## 俄罗斯动物保护协会。信使。绿酒。淫威欲和沃罗比约夫。从结尾还是从开头做起？

（《作家日记》，1876 年，1 月号，第 3 章，Ⅰ）

我从《呼声报》上读到庆祝俄罗斯动物保护协会成立十周年的隆重活动①。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人道的协会！据我理解，协会的主要宗旨，可以说全部概括于协会主席阿·阿·苏沃罗夫下面这段话中：

“事实上，我们的新的慈善机构的任务之所以艰巨，看来是因为在保护动物方面大多数人不愿承认以温和与合理的态度对待家畜会给人带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好处。”

的确，“协会”不仅珍惜狗和马，也珍惜人，珍惜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必须成为有个人样② 的、有人性的人，俄罗斯动物保护协会无疑是有助于实现这一点的。庄稼汉学会怜悯动物之后也会怜悯自己的老婆。因此，我虽然也很喜爱动物，但我更高兴的是，十分可敬的“协会”所珍惜的与其说是牲畜，不如说是人，变得粗野的人，不人道的人，有待于开化的半蒙昧的人！一切启蒙手段都是可贵的，只是希望协会的理想实际

---

① 俄罗斯动物保护协会成立于 1865 年 10 月，阿·阿·苏沃罗夫-雷姆尼克斯基（1804—1882）是协会的常任主席。

② 俄语原文是“образит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对它注释说：“这是民间语言中的字眼，意思是给予一个形象，恢复一个人的面目，在责备一个整天醉醺醺的人的时候常说‘你哪怕有个人样也好’，我是从服苦役的人的口中听到这个字眼的。”

上成为一种启蒙的手段。我们的儿童就是在经常见到丑恶情景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他们看见的是，农夫把车装载得过分沉重，抽打陷进泥泞的老马，他的饲养者用鞭子抽它的眼睛。又比如，我在不久之前亲眼看见，一个农夫用一辆大车把羊运往屠宰场，车上装了十来只羊，他自己则悠闲地坐在车中的羊的身上。他会觉得座位柔软，如同带弹簧的沙发，而羊却伸出舌头，瞪大眼睛，可能在到达屠宰场之前就要死掉。我相信，这幅画面没有激起街上的任何人的愤慨：反正他们是要挨宰的。然而，这类画面无疑会使人变得野蛮，起着腐蚀作用，对儿童更有影响。是的，可敬的“协会”也受到攻击；我不止一次听到对它的嘲讽。例如，顺便想起的一件事，大约五年以前，协会追究一个车夫虐待马的责任，使车夫受到罚款的惩处，似乎是十五个卢布；当然，这事有些尴尬，因为判决之后有很多人确实不知道应该怜悯谁：怜悯车夫还是怜悯马。现在，按照新的规定，应该不超过十个卢布。后来我还听说，协会还因为有人用氯气[①] 毒死无主的野狗，也就是有害的狗而奔忙；这似乎太过分了。人们说，目前在一些闹饥荒的省份里人都快饿死了，对狗却这样温情关怀，听起来似乎有点刺耳。不过这类反对意见是经不起任何批驳的。协会的目的比暂时的偶发事件有着更永恒的意义。这种思想是善良的、正确的，它迟早会被人接受并取得胜利的。尽管如此，从另一方面说，最理想的是，协会的活动能照顾到上述的“暂时的偶发事件”，像通常说的相互平衡，那么，就会更清楚地显示出协会所采用的是拯救性的、有益的途径，这种途径能使协会卓有成效，主要是达到实际的效果，真正实现目的……也许，我没有把我的

① 一种麻醉剂。

想法说清楚；现在我要谈一件往事，真实发生过的事，我希望，讲述实际的事例能够更明确地表达我想要说明的意思。

这件事是我很早以前，可以说是我的史前时期遇到的。那是在 1837 年，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左右，事情发生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路上。我和我的哥哥，随同现已去世的父亲一同赴彼得堡去进高等工程学校[①]。正是 5 月，天气很热。我们乘坐的是中途不换马的长途驿站车，速度几乎等于步行，在驿站一停就是两三个小时。我记得这次旅行持续了将近一周，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已经腻烦透了。那个时候，我和哥哥都向往新生活，非常殷切地幻想着什么，幻想一切“美好的和崇高的”[②] ——当时这还是个新鲜字眼，并不带嘲讽味道。那时流传着多少这类美好的字眼啊！我们有热烈的信念，我们两个人虽然很清楚要考数学，但却一味向往着写诗，做诗人。哥哥在写诗，每天写三首，甚至在路途中都没有间断，我则在想象中不停地编写取自威尼斯生活的小说。当时普希金刚刚去世两个星期[③]，在路上我们就商量好了，一到彼得堡立刻就到决斗的地点，设法进入普希金居住过的房间，看看他奄奄一息时所在的那个房间。有一次，快近黄昏时，我们在驿站里，也就是旅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后进的是军事工程学校。

② 美和崇高二词来自康德和柏克，他们在自己的美学论文中分析“美”和“崇高”的概念。“美和崇高”广泛流传于 18 世纪末以及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美学之中，至 19 世纪后半叶则已使用在讽刺的意义上。俄国浪漫派主要是从席勒的《审美书简》中接受这个概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曾提到“美和崇高”，在《少年》手稿中说：“美和崇高的要求，实际上也许是这样，对这个要求我终生都不能解答。”按：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柏克（1729—1797），英国哲学家、美学家。

③ 普希金 1837 年 1 月 29 日死于决斗。

店里站着，村名叫什么不记得了，好像是在特维里省；村庄很大，也很富庶。我们停留了半个小时，正准备动身，我还在从窗子往外面看，于是就看见了下面这个情景。

街的那一边，在驿站的正对面就是驿站的房子。忽然间有一辆通信马车向驿站的台阶飞奔过来，一个身穿当时那种后身有窄后襟制服的信使从车上跳下来，他头上插着白、黄色，似乎还有绿色羽毛的大三角帽（忘记了这个细节，可以查对，不过我的印象是绿色羽毛在头上晃晃悠悠）。信使是个身材高大、非常强壮有力、暗紫色脸膛的大汉。他跑进驿站的屋子，大概在那里“灌了”一杯伏特加。我还记得，我们的车夫当时说，这种信使每到一个驿站总要喝上一杯，否则是受不了“那种罪的”。这时，朝递信驿站跑过来一辆新的换班的矫捷马车，驾车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手里拎着粗呢外衣，里面穿的是红衬衫，他一蹿就跳上了车夫的座位。信使也立刻从屋中蹿出来，跑下台阶就坐进车中。驾车人马上就要出发，但在他还没来得及启动的瞬间，信使就向前欠起身体，默默的，一句话也没有说，举起结实的右拳，从上向下重重地朝车夫的后脑勺砸下来。车夫的整个身子猛然向前一晃，举起鞭子，使尽全身的力量抽在辕马的身上。马向前猛冲出去，但这丝毫也没有让信使平静下来。这不是发泄怒气，而是一种方法，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又被很多年的经验考验过的方法。可怕的拳头又一次抡起来，又一次打在后脑勺上。然后，一次接着一次，一直打到马车从视野中消失。显然，勉强挺着挨打的车夫也没有住手，他像发疯似的每秒钟都在抽打马，终于把马打得发狂似的飞奔起来。我们的车夫解释说，所有的信使大致都是这样走法，而这个信使尤其厉害，人们都知道他，他喝过酒跳上车之后总是用打开头，而且“总是按照这个样子打”，无缘无故就

打，拳头一举一落，节奏均匀，“他就这样把车夫一直打一俄里左右，然后才住手。信使如果觉得无聊，在途中还要再打；也许就到此为止；不过，总是在快到下一个新站时就又开始殴打：通常是在离下一站一俄里的地方，拳头就又开始不住地一起一落，就这样直到进站，用意是让全村的人们都为他吃惊；而脖子过后要疼一个月。”小伙子一回来，人们都拿他取笑：“瞧，信使把脖子给你扭歪了，”小伙子可能当天就毒打年轻的妻子，“我要你的命”；可能就因为“她看见了，全都看见了”……

显然，车夫这样凶狠地打马是惨无人道的：马跑到下一站的时候，不用说是精疲力竭，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但是，动物保护协会里面有谁想到要这个农夫为他不人道地对待自己的马匹而负责呢，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这一令人讨厌的情景始终留在我一生的记忆中。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这个信使和俄罗斯人民中许多可耻的和残忍的作为，后来很长时间我倾向于十分片面地解释这些现象。你们理解，这里谈的是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这种情景可以说是一个象征，它最清楚不过地呈现出事情的因果关系。这里，落在牲畜身上的每一下抽打，可以说，都是从对人的一次次殴打中练出来的。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在我执著地陶醉于幻想的时代①，有一次我忽然萌生一个想法，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能够成立慈善机构的话，我一定要用通信马车的浮雕作这个机构的标志，作为象征和解说。

噢，当然，现在不是四十年以前了，信使不打人民了，人

① 指他当年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时期。

民在自己的法庭上保留了鞭笞①，已经在自己打自己。问题不在这里，而在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信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绿酒”②。绿酒怎么能与信使相提并论呢？——很可能是因为，——绿酒同样使人变成畜牲和野兽，使人残忍，使人抛弃美好的思想，使人愚钝，对任何善良的宣传都冥顽不灵。醉汉对动物不能有同情心，醉汉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喝醉了的丈夫多少个月不要妻子，也不供养子女，却找妻子要酒喝，不幸的、干苦役的女工（请想一想妇女的劳动和我们这里妇女劳动的价值），正在为不知道用什么来养活孩子而发愁，于是就抓起刀子捅了丈夫。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之前，她正在等待受审。我讲述这个女人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事情成千上万，你们翻翻报纸就知道了。绿酒和信使的最主要的相似之点，毫无疑问，就是绿酒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抗拒地支配着人的意志。

可敬的动物保护协会拥有七百五十名成员，都是有影响的人士。如果协会愿意致力于在人民里面即使稍微减少一点酗酒现象，使酒对整个一代人的毒害减少一点，该有多好！人民的力量正在衰竭，未来财富的源泉正在干涸，智慧正在衰退，发展也趋于停滞，——在自己父亲的恶习下成长起来的人民的现代儿童在智慧上和心灵上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呢？村庄起了火，村里有教堂，可是酒店掌柜走出来，向老百姓喊话说，要是大家不管教堂，而去抢救酒馆，就给他们喝一桶酒。教堂化成灰烬，酒馆却得救了。考虑到未来还会有数不尽的灾难，这些事

① 俄罗斯自古就有的对较轻的犯罪行为的一种惩罚手段。1903 年废除了这种刑罚，但 1905—1907 年又用以惩罚起义农民。

② 即伏特加，粮食酒的俗称。

例还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敬的协会如果愿意多少做些有助于消除根本原因的事情，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善良宣传减少了困难。否则，在已经形成的仿佛是以扼杀人的一切人性为目的的环境中，怎么能够强制人们去动恻隐之心呢？在我们这个惊恐不安的时代，难道只有酒在肆虐、腐蚀人民吗？其实目前是欺诈成风，物欲横流。在人民里面，思想空前堕落，普遍崇拜唯物主义。这里我说的唯物主义就是指人民崇拜金钱，崇拜钱袋。钱袋现在就是一切，钱袋的力量无穷无尽，这种想法似乎刹那间就渗透到人民中间，而在此之前，父辈对他说过的一切，教导过的一切，全被当做无稽之谈。如果人民对这些思想执迷不悟，那就是灾难；可是怎么能使人民不这么想呢？例如敖德萨铁路运送沙皇新兵的列车不久前出轨了，死亡逾百人，难道你们认为，这种力量对人民能够不起腐蚀作用吗？人民把这种强大的威力看在眼里并对它感到惊讶："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疑问："看吧，这才是真正的力量，看吧，这才是永恒的力量；你只要有钱，一切都属于你，你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比这种想法更堕落的了。然而这种想法却在逐渐蔓延，深入人心。人民无法抵御这种思想，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听到任何相反的思想宣传。现在全俄罗斯铺设了近两万俄里铁路，各地的铁路上即使是最小的一个官吏都是这种思想的传播者，你一旦踏上铁路，落到他的手下，他看上去俨然就是一个对你、对你的命运、对你的家庭直至对你的荣誉拥有无限权力的人物。不久前，一个站长运用自己的权力亲手把一位乘车的太太从车厢里硬拖了出来，为的是把她交给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向站长申诉，说这是他的妻子，正要离开他出走，——这是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干的事，站长毫不怀疑他有权力这样做：显然，这位站长即使没有发疯，也似乎一

定是由于自己的威力而丧失理智。人民碰到的这些情况和事例都是接连不断的蛊惑，他们从每天看见的这些事情中得出不可抗拒的结论。前些时候我为了苏沃林先生与戈卢别夫[①] 先生的事情指责过苏沃林先生。我认为不能使一位完全无辜的人受辱，而且还把他的全部内心活动描绘出来。但现在我的见解有所改变，其中包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戈卢别夫无罪与我有何相干！戈卢别夫先生可能纯洁得如同泪珠，然而沃罗比约夫先生却是有罪。沃罗比约夫是什么人？我一无所知；我也相信，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但这个沃罗比约夫就是那个在所有的线路上作威作福的人，那个恣意发放列车的人，那个用暴力把乘客拖出车厢的人，那个破坏火车的人，那个让货物在车站霉烂几个月的人，那个肆无忌惮地危害一系列城市、省份和沙皇帝国，并且只是粗野地喊叫“从路上滚开，我来了”的人。不过，这个外来的毁灭者的主要罪过还是，他成了一种诱惑，一种有毒害的思想悬在人民的头上。其实，我为什么要这样指责沃罗比约夫呢，难道成为有毒害思想的只有他一个人吗？我要再说一次，在空气中弥漫着充满唯物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东西；羡慕不义之财，欣赏不劳而获；冷酷无情地进行种种欺诈，犯下种种罪行；只要能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卢布就杀人。我知道，从前也有很多罪恶的事情，但是现在则增加了十倍，这是无可争辩的。主要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学说或信念正在泛滥。在彼得堡，两三个星期之前，一个年轻小伙子，车夫，还未必达到成年，在夜里拉一位老头子和一位老太婆，他发现老头子醉得不省人事，就拔出小折刀，要杀老太婆。把他们都逮捕了，这个糊涂虫立即供认说：“我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

① 铁路管理官员。

不知道刀子怎样就到了手里。”的确如此，他真的是不知道。环境就是这样的。他被感染了，像被卷进机器似的，被卷进现代的堕落欲望，被卷进现代的人民潮流；——发不义之财，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即使只有小折刀。

“不，现在还顾不上宣传保护动物：这是老爷的玩意儿。”——这是我听到的原话，但是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说法。我虽不是协会的成员，不过我愿意为协会服务，似乎我已经在为它服务。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愿望，这就是“兼顾协会活动与临时偶然发生的事件”这两个方面，也就是我在前面写过的；由于我理解协会所持的人道的与唤醒人性的目的，我始终不渝地忠于协会。我永远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思想，即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应该获得很高的文化程度，而其余的十分之九的人则只能做前者的材料和手段，永远停留于愚昧之中。我相信，我们的全部九千万俄罗斯人（或者说，到那个时候的总人数），总会有那么一天，都将会是有教养的、有人性的和幸福的人，离开这个信念，我无法思考，也无法生活。我知道并且深信不疑，普遍的教育不会对我国任何人有害。我还相信，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能够建立起智慧和光明的王国，甚至还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快地建立起来，因为在我们这里现在任何人都不赞成像整个欧洲那样的思想：为了一部分自诩为代表文明的人的幸福，而必须使另一部分人野蛮化。在我们这里，农奴制已经被摧毁了，这是以沙皇的意志为主，由上层社会自愿实行的！因此，我再一次向动物保护协会致敬；我要说的只是一个意思，就是希望不要一切都从结尾做起，哪怕是部分地从开头做起也好。

# 谈对人民的爱。
# 同人民必须的契合

（《作家日记》，1876 年，2 月号，第 1 章，Ⅱ）

比如说，我在 1 月号的《日记》中刚刚写过，说我们的人民是粗鲁的、愚昧的，向往黑暗和堕落，是“期待光明的野蛮人”。可是，我刚才在《友爱的支援》（斯拉夫委员会为帮助正在为自由而战斗的斯拉夫人而出版的文集）中读到可敬的、全体俄罗斯人永志不忘的已故的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俄罗斯人民早已开化，早已“有教养”[①]。怎么办？我是否由于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这种表面上的意见分歧而自觉尴尬呢？丝毫也不，我完全赞同这个意见，早就真挚

---

①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1791—1860），俄国政论家、历史学家、作家、斯拉夫派思想家。主张保持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他的文章《论现代人》是他死后由斯拉夫委员会收入一部文集发表的。阿克萨科夫的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人民，主要是关于农民的论点引起了争论。阿克萨科夫认为，“团体”是人民联合的理想形式。他说的“团体”是人们的一种结合的行为，是人人都放弃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结合。人们不是基于个人利益，而是基于个人心灵中的爱、友爱情谊这个共同本原结合到一起的，这种结合建立的“团体”才是“真诚的团体”。“团体”并不是靠人的天生本性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的高尚的精神行为的结果，只有具备崇高的精神，真正意义上的团体才能成为人们的本原，因此，可以说，如何对待团体这个伟大问题乃是一个人的教养程度的表现。很久以前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就出现了团体，它的俄罗斯名称就是“村社”。俄罗斯农民至今仍然忠实地遵循着自己的团体，即村社的古老原则，这就是为什么说俄罗斯农民的教养高尚的道理。

地同情他。我如何协调这样的矛盾呢？问题在于，依我看，这是非常容易协调的，而令我吃惊的是，在别人看来，直到现在这还是两个不可调和的问题。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要善于把他们的美从他们偶然沾染的野蛮性中区分出来。由于几乎是全部俄罗斯历史的种种情况，我们的人民处于任人教唆、被腐蚀和被诱惑以至经常被折磨的境地，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竟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保持了人的美，保持了人的形象，保持了自己的形象的美。谁是人类的真正朋友，谁的心哪怕还由于人民的痛苦颤抖过一次，他就能明白并且谅解我们人民深陷其中的、不可逾越的但并非与生俱来的泥沼，他会在泥沼中找到钻石。我再说一遍：不要根据俄罗斯人民经常干的那些坏事判断俄罗斯人民，而是按照他在干自己的最坏事情的时候还经常企盼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事物来认识他。实际上，在人民之中并不全是卑鄙无耻之徒，也有圣洁无瑕的人，而且还是一些自己发光为我们大家照亮道路的人！我似乎在盲目相信俄罗斯人民里面没有那种不知道自己卑鄙无耻的卑鄙无耻之徒，而在其他国家的人民里面是有这种人的，这种人在干卑鄙勾当时还很自豪，把自己的卑鄙奉为原则，断言那就是l'Ordre[①]，就是文明之光，这种可怜人最后竟真诚地、盲目地、堂而皇之地相信这一切。不，不要根据我们的人民现在是什么样子来评判他，而要根据他希望成为什么样子来评判他[②]。他的理想是强有力的和神圣的，正是这种理想在受苦受

① 法文：秩序。

② 关于应该如何认识、评价俄罗斯人民，实际是如何认识俄罗斯农民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概括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之后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以说，都是这里所提出的观点的继续发挥和发展。陀思（转下页）

难的时代拯救了他；理想自古以来就深入了他的心灵，把纯洁、正直、真挚和豁达开朗的智慧永远赋予了他的心灵，所有这一切都极其美妙地、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同时还有那么多肮脏的东西，那么俄罗斯人自己为此比谁都更苦恼。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偶然沾染的、暂时的，都是魔鬼的妖术。他相信，黑暗必将消失，永恒的光明有朝一日必将永放光芒。我不准备去谈他那些历史上的理想，他的谢尔吉①、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②，也不谈吉洪·扎顿斯基③。顺便说一句：有许多人知道吉洪·扎顿斯基吗？为什么丝毫都不知道，还一点儿也不想读书呢？没有时间吗？先生们，请相信，你们会出乎意外地知道一些美好的事情。但是，最好还是看看我们的文学：我们文学中所有的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从普希金创造的温顺善良

---

（接上页）妥耶夫斯基这篇文章是对康·阿克萨科夫的文章《论现代人》所引起的争论的思考，他肯定阿克萨科夫的观点，不同意俄国音乐评论家盖·阿·拉罗什教授（1845—1904）对阿克萨科夫的批评。盖·拉罗什在文章中说，凡是有正义感、有人性的人没有不同情不敬重农民的，但不应像斯拉夫派那样视而不见农民的愚昧落后，把农民的生活说得那样完美和谐，认为农民是在腐朽文明中一尘不染的典范，而要求人们向农民的愚昧顶礼膜拜。拉罗什还以当时某些描写农民生活的残酷画面的文学作品反驳斯拉夫派的观点。

① 谢尔吉（约1321—1391），即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创建者和院长。曾倡导在俄国修道院中建立供给衣食的制度。

② 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1074），古俄罗斯作家，自11世纪60年代起为基辅别切尔斯基修道院院长，他也是该修道院的创建者。

③ 吉洪·扎顿斯基（1724—1783），曾任沃龙涅日与叶列茨基的主教。后来他去顿河左岸的修道院，因此被称为扎顿斯基·吉洪（“扎顿斯基”在俄语中意为顿河左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的《谒见吉洪》一章中写的就是他。

的别尔金型的人物[1] 开始，全都是来自人民。我们这里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从普希金开始的。普希金在他活动的那么早的时期就转向人民，这在他之前没有先例，也是惊人之举。在当时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创新，如果说不是奇迹，就只能以他天才的超常伟大来解释，对于他的天才直至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出评价。我不想谈现在出现的那些纯粹的人民的类型，但请想想奥勃洛莫夫[2]，请想想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当然，这里写的还不是人民，但是在冈察洛夫的和屠格涅夫的这些类型中永恒的和美妙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他们这些类型中都有与人民贴近之处；与人民的接触使他们获得了非凡

---

① 别尔金是普希金的短篇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1830）中讲故事的人。小说集收有《射击》、《暴风雨》、《驿站长》等描写俄国社会小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短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别尔金小说集》是普希金转向人民的标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观点是 19 世纪 60 年代初在阿·格里高利耶夫（1822—1864，思想接近斯拉夫派的文学评论家、诗人）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在 1863—1864 年写的记事中就有这样的话："而普希金是俄罗斯人，所以他发现了别尔金。"后来，在 1872—1875 年的札记中又说："普希金（彼得大帝的崇拜者）由于对俄罗斯古老的人民精神(《大尉的女儿》、别尔金们，等等）的热爱实质上又成为彼得大帝的否定者，他就是斯拉夫派的先驱和首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30 卷集，第 21 卷，第 269 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普希金是后世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思想的一切探索和整个发展的先驱。如他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是通过普希金接触现代的各种问题的……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的源头。"在 1877 年 8 月号的《作家日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一文中说："从他开始我们才有了真正的自觉的转向人民的行为，从彼得大帝的改革以来，在他之前，这样的事是不可思议的。"

② 俄国作家伊·阿·冈察洛夫（1812—1891）的同名小说《奥勃洛莫夫》（1859）的主人公。

的力量。与一切被扭曲的、虚假的、外来的和奴颜婢膝地模仿的东西相反，他们从人民那里吸取了真诚、纯洁、温顺、豁达的智慧和善良。请不要奇怪，我忽然谈起俄罗斯文学来了。俄罗斯文学，几乎是整个俄罗斯文学，通过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先于我们的全体知识分子（请记住这一点），对人民的真理顶礼膜拜，承认人民的理想是真正美好的理想，这正是我们文学的功绩。不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自觉地不得不把人民的理想当做自己的榜样的。的确，在这里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善良的意志，似乎不如说是艺术嗅觉。不过关于文学说到这里就可以了，其实，我谈到文学也只是因为人民的缘故。

关于人民和对人民的看法以及对人民的理解这个问题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整个未来生死攸关的头等重要问题，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实际的问题。然而，人民对我们大家来说，还依然是一个理论，仍然是个谜。所有我们这些热爱人民的人都把人民当做一种理论来看待，任何人都不喜爱像实际上那种样子的人民，只喜爱我们想象出来的那种人民。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后来发现人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无论我们怎样热爱人民，我们全都会毫不惋惜地立即离开他。我说的是所有的人，也不排除斯拉夫派；很可能，斯拉夫派比所有的人走得更远。说到我自己，我不隐瞒我的观点，这是为了更明确地说清楚我的《日记》今后所采取的方向，也是为了避免误解，让每一个人都事先就知道：我值得不值得写？我认为，我们未必都那样完美无缺，以至于把自己树立为人民的理想，要求人民一定要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请不要对从这样荒唐角度提出的问题感到奇怪。然而，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从来都是这么个提法：“谁更好些——是我们还是人民？人民应该跟随我们走还是我们跟随人民走？”——现在人

们都在这样谈论，头脑中还多少有点儿思想、心灵中还多少关心点共同事业的人都在这样说。因此我就真诚地回答：相反，倒是我们应该崇拜人民，向人民期待一切，既包括思想，也包括形象；崇拜人民的真理，以人民的真理为真理，即使这种真理有的是来自《每月念诵集》[①]，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总之，我们应该低下头来，就像离开家二百年后又回归的浪子，但依然还是俄罗斯人，不过，我们的伟大功绩也就在这里。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崇拜应该有一个而且仅仅有一个条件，这就是 sine qua non[②]：这就是人民也要采纳我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我们也不能在人民面前毫无保留地自惭形秽，我们无论面对的是人民的什么样的真理，我们的东西就让它留给我们吧，我们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把它交出去，甚至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同人民结合这种幸福，也不会把它交出去。否则，就让我们双方都各自毁灭吧。不过这种情况是根本不会发生的；我完全相信，我们自己带来的某种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它不是幻影，它有形象，有形式，也有重量。尽管如此，我还要再说一遍，在未来还有很多谜，多得甚至连等待起来都感到可怕。比如，人们预言说，文明将要使人民毁灭：事情的进程似乎是这样的，它既带来生路和光明，同时也会有许多欺诈和虚伪、许多惊恐与恶习随之闯进来，只有经过未来的几代人，也许又要经过二百年，善良的种子才能够成长起来，而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面临的则可能是什么可怕的东

① 为东正教每日必读经文，书中每日记载着东正教教会圣贤生平与有关节日的资料，供教徒全年阅读的每月一册的基督教祈祷经文汇编。在 19 世纪流传的主要是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月书》，是在 17 世纪末编成的。

② 拉丁文：必须。

西。先生们，你们是这样认为吗？我们的人民是否注定还要经过这个堕落和欺诈的新阶段，就像我们曾经带着文明的疫苗走过这个阶段那样？（我想，谁也不会反对说，我们的文明是从堕落起步的吧。）关于这一点，我倒是希望听到一点儿可以自慰的东西。我很愿意相信，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宏伟的躯体，只要有新的浊流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流淌开来，它们就会在人民这个躯体里面自生自灭。我们立刻就携手干起来吧；让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共同把事情推动，使事情能够进行得更加顺利，更少坎坷。的确，除开"热爱祖国"外，我们自己不会做任何别的事情，在方法上我们的意见还不一致，还会有很多争论；其实，只要肯定我们都是好人，那么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事情最后总会成功的。这就是我的信念。我再说一遍：在这里，两百年来丧失了一切做事的习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经过这个不习惯做事的阶段结束了我们的"文明时期"，结果是彼此间的普遍隔阂。当然，我说的只是那些严肃的、真诚的人们，——只有这些人才是彼此不理解；至于投机分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彼此之间向来都是理解的……

# 农夫马列伊[1]

## (《作家日记》，1876年，2月号，第1章，Ⅲ)

不过，我想，这些 professions de foi[2] 读起来太枯燥了，所以我想讲一个故事，其实，这也不是故事，不过是一个遥远的过去的回忆，不知为什么，我非常想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刻，在我们关于人民的议论行将结束的时候，把它讲出来。那个时候我刚刚九岁……不，还是从我二十九岁那一年讲起更好一些。

那是在复活节的第二天。天气暖洋洋的，天空一片蔚蓝，“热烘烘的”太阳高悬在空中，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可是我的心情却很阴沉。我漫无目的地沿着一排排牢房[3] 闲遛，一边望着那些坚固的牢房木桩围墙，一边数着那些圆木[4]，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可是数着数着就不想数了。整个监狱都在“过节”，今天已是第二天了；犯人们没有给带出去干活，很多人都喝醉了，到处听到没完没了的谩骂和吵架。乌七八糟的下流小调，在木铺板上玩纸牌赌博，已经有几个犯人因为特别的狂暴行为受到同伙们的私设公堂的惩处，被打得半死不活，盖着羊皮袄躺在铺板上，还不省人事，没有苏醒过来；打架时已经有几次动起明晃晃的刀子，——在两天的节日里发生的这一切使我痛苦不堪。我向来就极其厌恶民间这种纵情狂饮的行为，

---

① 本篇有题解，见本卷(《作家日记》)书末附录。
② 法文：说教文章。
③ 这里指的是他在鄂木斯克地区服苦役期间。
④ 俄罗斯的民间房屋从前均系用加工后的较粗的圆木建成的。

而在这里，在这种地方，就愈加厌恶。在这几天里，当官的也不到牢房看一眼，不进行搜查，也不查酒，他们明白，即使是对这些被逐出社会的人，也必须让他们放纵一下，一年只有一次，不然的话，就会更坏。我心里终于燃起一股怒火。一个政治犯波兰人米列茨基[①] 碰上了我；他阴郁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眼里冒着火，嘴唇哆哆嗦嗦的："Je hais ces brigands!"[②] ——他的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对我低声说了一句就走开了。我回到牢房里，虽然我是在一刻钟之前发疯似的从牢房跑出去的，那是因为六个强壮的汉子为了制服一个喝醉了的鞑靼人加津，一窝蜂似的向他扑上去，一齐打他；他们不顾一切，乱打一气，这个打法可以把一匹骆驼打死；但是他们知道，要打死这个赫剌克勒斯[③] 是不容易的，因而就毫无顾忌地打。现在，进屋的时候，我看到，在牢房尽头的墙角铺板上躺着已经没有了知觉的加津，他几乎没有一点儿活人的气息；他盖着一件羊皮袄躺在那里。人们都默默地从他身边绕过去：虽然都真心实意地指望他明天早晨会苏醒过来，"但是，那个打法，大概过不了一会儿人就完了。"我悄悄走近自己的铺板，在带铁栅栏的窗子前面，仰面躺到床上，双手垫在后脑勺下，闭上了眼睛。我喜欢这样躺着：人们不纠缠睡觉的人，这个时候可以遐想和沉思。但是我想不下去；心在不安地跳动，耳边一直响着米列茨基的话："Je hais ces brigands!" 其实，描写这

① 波兰人亚历山大·米列茨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曾数次提到此人。
② 法文："我憎恨这群暴徒!"
③ 赫剌（或译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民间英雄，宙斯之子。力大无穷，婴儿时扼杀两条大蛇，少年时打死猛狮，以后以武力建立十二功绩。

些印象干什么。直到现在，有的时候夜里我还梦到那个时期的情景，这是些使我最痛苦不过的梦。可能，人们会注意到，直到今天我还几乎一次也没有在刊物上述说过我在服苦役时的生活；十五年前我写了《死屋手记》①，是用虚构的、似乎是以杀死自己妻子的罪犯的名义写的。顺便补充一点儿细节，从那时起，很多人以为，甚至到现在还在断言，说我是因为杀害我妻子而被流放的。

渐渐地我真地陷入了遐想，不知不觉地就沉浸在回忆之中。在我服苦役的全部四年期间，我接连不断地回忆了我的整个过去，在回忆中我好像又把我过去的全部生活重温了一遍。这些回忆都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我很少有意去回想什么。回忆通常是从某一点、某一现象开始，有时，起初是无所谓的小事，然后竟渐渐扩展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成为某个强烈的和完整的印象。我对这些印象进行分析，赋予很早以前经过的事情以新的特点，主要是修改它们，不断地改变它们，这就是我的乐趣。这一次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忽然忆起了我刚进入童年时期经历的一件不显眼的一瞬间的事情，当时我才九岁，那个瞬间好像早就被我忘得精光了；但是，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回想我刚进入童年时期的事情。那是在我们村庄里的8月，一个干燥、晴朗的日子，但略有些凉爽，还刮着风；夏天快要过完了，很快就该回到莫斯科去了，又得上法语课，沉闷不堪地度过一个冬天，我真是舍不得离开农村。我向打谷场走去，先下到峡谷，然后又向上走，就到了平地，我们把峡谷对面小树

① 写于1861—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而被判处服苦役的，当时是政治犯。但在小说中他称自己是杀妻的刑事犯，以逃避审查官的耳目；可是书中又不断暗示自己是政治犯。

林前边那片浓密的灌木丛叫平地。我深深地钻进灌木丛里面。我听见好像在不远的地方，大约三十步左右的一块草地上，有一个农民在孤单地耕地。我知道，他耕的是一块陡坡地，马都难走，他的喊叫声“呶驾！驾！”不时传到我的耳边。我差不多认识我们这里所有的农民，但是不知道现在是谁在这里耕地，也没有想知道，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我正在忙着折断一棵胡桃树的枝条，要用它抽打蛤蟆：胡桃树的枝条很好看，但不结实，远远不如桦树的枝条结实。我也喜欢各种各样的甲虫和金龟子，我正在收集这些小甲虫，有的非常好看；我也喜欢矫健敏捷、身上带黑斑的褐色小蜥蜴，但是我怕蛇。不过蛇比蜥蜴少见得多。这个地方很少有蘑菇；采蘑菇要到桦树林里去，我正想要去那里。森林，还有森林中的各种蘑菇和野果、各种甲虫和小鸟、刺猬和松鼠，再就是我最爱闻的腐烂树叶那股潮湿气味，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对这一切更喜爱的了。就是现在，我正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我还能闻到我们乡间的桦树林中的那股气味：这些印象一生都留在我的心中。突然间，在深沉的寂静中我清晰无误地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我也惊吓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大声喊叫着向草地跑去，直奔耕地的农夫。

他是我们的农夫马列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不过人们都叫他马列伊，——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身体结实，相当魁梧，暗褐色的浓密的大胡子中间已经有一缕白花花的胡须。我认识他，可从来还没有机会跟他说过话。他听到我的喊声就勒住了马，我飞跑过去之后，一只手抓住他的犁杖，另一只手握住他的衣袖，他立刻看出我的惊慌失措的神情了。

“狼来啦！”我气喘吁吁地喊道。

他猛然抬起头来，不由得向四周扫了一眼，刹那间他几乎相信了我的话。

“狼在哪儿?”

“有个人喊的……刚刚有个人喊过：‘狼来了！……”我嘟哝说。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呀，哪儿有狼，那是你觉得好像有；你看！这里能有什么狼!”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在给我壮胆。可是我还在全身发抖，依然紧紧地抓住他的衣服，我的脸色大概很苍白。他安详地微笑着看了看我，看样子也在为我害怕和不安。

“你看，吓成什么样啦，哎呀!”他摇摇头。“算啦，亲爱的。看你这小伙子，哎!”

他伸出手来，突然摸摸我的面颊。

“嗯，够啦，嗯，画个十字吧，上帝保佑你。”可是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还在颤动，这似乎特别使他吃惊。他悄悄伸出自己那粗大的、沾着泥土的指甲黢黑的手指，轻轻抚摩了一下我的颤动着的嘴唇。

“哎，瞧你这样子”，他慈祥地、深情地朝着我微微一笑。“上帝啊，瞧你，这是怎么啦，哎呀!”

我终于明白了，狼是没有的，“狼来了”的叫喊是我的幻觉。可是喊叫的声音竟是那么真切,那么清晰,不过这种声音(不尽是关于狼的)在这次之前,在我幻觉中已经出现过一两次了,我是知道这回事的(后来这种幻觉也随着童年一起消逝了)。

“嗯，我走啦。”我犹豫地、怯生生地望着他说。

“好啦，走吧，我在后面看着你。我在这儿不会让狼碰你!”他接着说道，依然是那样慈祥地朝着我微笑。“嗯，基督保佑你，走吧。”他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自己也画了个十字。

我迈开脚走了，差不多每走十来步就回头看看他。在我走着的时候，马列伊一直牵着马站在那里，从后面望着我，我每一次回过头去的时候，他都向我点点头。说实话，我在他面前有点儿害羞，我竟吓成那个样子，不过我在没有登上峡谷的斜坡，没有走到第一个谷垛之前，在路上还是很害怕狼出现；我们的看院子的狗，人们管他叫狼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突然向我跑过来，我的恐惧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跟狼狗在一块我的胆子就壮了，最后向马列伊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他的面孔我已经分辨不清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仍然在那样和蔼地向我微笑，朝我点头。我向他挥手，他也向我挥挥手，然后才赶着马走开。

“驾、驾！”又从远方传过来他的吆喝声，马又拽动了自己的犁杖。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一切都一股脑儿地涌现在我的回忆中，细节还都惊人地准确。我猛然清醒过来，在铺上坐起来，现在还记得，回忆唤起的淡淡笑容还停留在我脸上。我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那时我离开马列伊回到家中之后，我对谁也没说我的“历险记”。其实这算什么历险呢？就是马列伊我也很快就忘掉了。后来我同他有时偶尔相遇，我跟他一次话也没有谈过，不仅没有谈起过关于狼的事，什么事都没有谈过。可是现在，事隔二十年之后，在西伯利亚，突然想起了那次相遇，还记得那样清楚，连细微末节都没有忘掉。这就说明，那次相遇无意中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上，是自然而然地留下的，我没有故意去记它。在必要时刻，就会突然都冒出来；贫苦农奴那种温柔、慈祥的微笑，他画的十字，他摇晃着脑袋说的“看你，吓成什么样子啦，小伙子！”全都记起来了。特别是他那沾满泥土的粗大手

指在我颤抖着的嘴唇上轻轻地、胆怯又温柔地抚摩的情景。当然，换个别的人，也会给小孩子壮胆的，然而在我们这次单独的相会中发生的似乎是全然不同的一回事，假如我是他自己的儿子，他那望着我的目光上流露出来的纯洁的爱也不可能更多一些，有谁逼着他这样做吗？他那时是我们自家的农奴，而我毕竟是他的小主人；没有人会知道他是怎样爱抚我的，他也不会为此而得到奖赏。他是不是喜欢像我那样很小的儿童呢？是有这样的人的。那次是我们单独的相遇，是在空旷的田野里，大概只有上帝从天上才能看得见，这个有时粗鲁的、极端愚昧的俄罗斯农奴，这个在当时还没有盼望自由，也没料到自己将要得到自由的农奴的心中蕴蓄着多少深厚的、开明的人性情感，充满了多么细腻的、近乎女性的柔情。请问，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所说的我们人民的高度修养，所指的是否就是这方面呢？

可是我下了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我记得，我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们，突然间，我心中的全部憎恨、愤怒，像出现了奇迹似的都一扫而光。我向外走的时候仔细地端详着迎面遇到的每个人的面孔。那个剃了光头、脸上带着烙印的受到侮辱性惩罚①的农民喝得醉醺醺的，正在扯着嗓门瓮声瓮气唱醉汉歌曲，说不定这是又一个马列伊，只是我不能看到他的内心去，在那个晚上，我又一次遇到米列茨基。不幸的人！他已经不可能有关于任何马列伊的回忆，除了“Je hais ces brigands”之外，他对这些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看法。不，这些波兰人在当时承受了比我们更多的痛苦！

---

① 使犯人蒙受耻辱是当时俄国的一种刑法。

## “理想即使不好，但现实是好的，这样也好。”这个思想正确吗？

（《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Ⅰ）

在加姆玛先生[①] 的《专论》（《呼声报》第67期）中，关于我在2月号的《日记》中谈论人民的话，我读到这样的反应：

> 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一个月之内看到同一个作家关于人民的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但这并不是轻喜剧，而是巡回展览的小画面：这其实是对活生生的人的判决；这无异于用刀子在人的身上任意捅。由于自己真实的或者莫须有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为自己辩解说，他是在邀请我们评论人民，“不要根据我们的人民现在是什么样子来评判他，而要根据他希望成为什么样子来评判他。”[②] 请看，人民实际上一文不值，但他的理想却是好的。那些理想是“强有力的和神圣的”[③]，正是这些理想“在受苦受难的时代拯救了他”。[④]这样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地狱本身也是由善良的愿望砌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也明白，“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⑤] 而且从哪里得知有这些理想呢？如果全部现实都与这些理想相抵触，与这些理想不相称，哪一位预言家或者善察心灵的人

---

① 俄国政论家格·康·格拉多夫斯基（1842—1915）于1875年后使用的笔名。

②③④ 引文均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1876年，2月号，第1章，Ⅱ。

⑤ 《新约全书·雅各书》，第2章。

能够深入地看到人民的理想或者猜透人民的理想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用这样的观点为人民开脱："他们有点打架斗殴，可是嘴不贪酒。"[①] 不过，从这里就不难导致这样的道德说教：理想即使不好，可是现实是好的，这样也好。

在这段摘录的话中，加姆玛先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而且，从哪里得知有这些理想呢？"（即人民的理想）我断然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无论就这个问题同加姆玛先生谈多久，永远不会达到一致。这是一个极其长期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争论。人民有理想还是根本就没有理想——这问题不是我们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场争论是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了的，结果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理想皎如日月，而另外一些人则根本视若无睹，断然拒绝去发现它们。是谁正确——这问题不是由我们来解决的，然而，可能很快就要解决了。近来出现了几种观点，意思是说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有任何起维护作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可维护"。事实上，如果没有自己的理想，那么还值得去操心维护什么吗？如果这种思想导致这样的宁静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随它去吧。

"请看，人民一文不值，但他的理想却是好的。"我从来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思想。仅仅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才回答加姆玛先生。相反，我指出的正是，在人民里面"也有圣洁无瑕的人，而且还是一些自己发光、为我们大家照亮道路的人"。[②] 可敬的政论家，有这样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人，能够看清楚他们的人是幸福的。我认为，在这里，也就是在这些

① 引自俄罗斯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音乐家》（1808）。
② 引文出自《作家日记》，1876 年，2 月号，第 1 章，Ⅱ。

话里没有任何含混不清之处。其实，含混不清并不总是由于作家自己不明确才产生的，有时完全由于相反的原因……

至于您在您的评论结束时所说的道德说教："理想即使不好，可是现实是好的，这样也好。"——那么我要向您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为没有理想，就是说没有某种或多或少的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望，那就绝不会有任何美好的现实。甚至可以肯定地说，除了更加龌龊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我至少还有一个保留：如果现在还不像样，只要有变得美好的明确自觉的愿望（也就是只要有追求美好事物的理想），在某个时候就真的能够鼓起劲来，变得美好，至少决不会像您的设想那样没有可能。因为您的设想是在"坏的"理想的情况下，即在坏的愿望的情况下变成美好。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加姆玛先生不要为我这几句话生气。让我们每个人都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都等待看结局；请您相信，结局可能为时不是很远了。

## 百岁老太婆

（《作家日记》，1876 年，3 月号，第 1 章，Ⅱ）

“这一天早晨我出来太晚了”，最近几天一位太太告诉我说。“我从家中出来差不多是中午了，而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堆积了很多事情。正好在尼古拉耶夫街上有两处必须要去的地方，两处相距不远。首先，该去事务所，就是在这所房子的门旁我遇到了这位老太婆，我的感觉是她很老，驼背，拄着棍子，可是我总猜不透她多大岁数了；她走到大门口就在一个角落里在看院人的凳子上坐下来休息。而我则从她身边走了过去，她只是在我眼前闪了一下。

“过了十分钟左右我从事务所出来，从那里走过两所房子就是商店，前一个星期我在这里为索尼亚定做了一双皮鞋，我顺便到那里取鞋，刚一看，那位老太婆现在已经坐在房子旁边，还是坐在门旁的凳子上，她坐在那里，还望着我；我向她微微一笑，走进去取皮鞋。三四分钟后，我继续向涅瓦大街走去，可是一看——我的老太婆已经在第三所房子那里了，还是在大门旁，只是没有坐在凳子上，而是靠在台阶上，在这座门洞里没有凳子。我在她面前不由得猛然停下来：我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在每一所房子前面都要坐一会儿吗？

‘累了吗，’我问道，‘老太太？’

‘累啦，亲爱的，一动就累。我想：天暖，太阳热烘烘的，可以到孙儿们的家去吃午饭。’

‘老奶奶，你这是要去吃午饭吗？’

‘去吃午饭，是去吃午饭，亲爱的。’

‘你这个样子是走不到的。’

‘不，能走到，就这样，走几步，歇一歇，站起来再走。’

“看着她，我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老太婆身材矮小，洁净，衣服是旧的，看上去属于小市民阶层，拄一根棍子，一张苍白、蜡黄的面孔，干枯得皮包骨，嘴唇没有血色，——简直是一具干尸，可是她却坐在那里——还在笑，阳光直射在她身上。

‘老奶奶，你岁数很大了吧？’当然，我是在嬉笑地问她。

‘一百零四岁啦，亲爱的，我一百零四岁，不过才（她这是说的玩笑话）……你自己到哪里去呀？’

“于是她盯着我看——满脸笑容，大概是因为有人跟她谈话，她高兴了。百岁老人关注我到哪里去，似乎这对她很重要，这令我感到惊奇。

‘就是这个，老奶奶，’我也笑着说，‘我给女儿在商店买了双鞋子，拿回家去。’

‘多么小的鞋，你的女儿很小吗？你真是好福气。还有别的孩子吗？’

“她又笑了，眼睛看着我。她的两眼昏暗无光，跟死人的眼睛差不多，可是似乎有一条温暖的光芒从那里放射出来。

‘老奶奶，你要是愿意，把这五戈比拿去，买个小面包吃。’我把五戈比给了她。

‘你要给我五戈比？好吧，谢谢，我就收下你的五戈比。’

‘给你，老奶奶，不要嫌少。’她接了过去。显然她不是在乞讨，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她从我手里很得体地把钱接过去，完全不像在拿施舍，好像是出于礼貌或是由于心地善良才把钱接过去的。看来，这使她非常高兴，因为有谁肯同她这个老太婆谈话呢，何况不仅仅是同她谈话，而且还热情地关怀她。

‘噢，再见，老奶奶，’我说，‘祝你顺利走到孙儿家。’

‘能走到，亲爱的，能走到。我能走到。你去看自己的孙女吧。’老太太糊涂啦，她忘记了，我的是女儿，不是孙女，看来，她以为人人都有孙女。我走开了，最后回头望了她一眼，我看见她慢慢地、吃力地站起身来，拄着棍子在街上缓慢地挪动着。在走到自己家人那里吃午饭之前，她在路上也许还得休息十来次。她要到哪里去吃饭呢？这个奇怪的老太婆！”

那一天的早晨我听到这个故事，——其实这也不是故事，不过是同百岁老人相遇的印象。（实际上，你什么时候能够遇到百岁老人，而且还是这样充满内心生活的老人？）——听了之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深夜，阅读一本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刚刚放下杂志就蓦然想起了那个老太婆，不知为什么，一刹那工夫我就在头脑中把她后来怎样走到自家人那里吃午饭的情景继续描绘出来：可能，这又画出了另外一幅非常真实的小画面。

她的孙女，也许是重孙女，反正她把他们统统叫孙女，大概都是什么行业的工人，显然是有家室的人，不然的话，她就不会到他们家去吃饭，他们住在地下室，也可能是租了一间理发铺，他们自然是穷人，不过总还算有碗饭吃，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她挪挪蹭蹭地走到他们家，大概已经是下午一点了。人们没有等她来，但是，大概还是相当有礼貌地迎接了她。

“啊，原来是她，玛丽娅·马克西莫芙娜，请进，请进，欢迎你，上帝的仆人！”

老太婆边说边笑走进屋里，门口挂着的小铃铛还在不停地发出又尖又细的响声。她的孙女应该是这个理发匠的妻子，他自己还是岁数不大的人，三十五岁上下，凭自己的手艺受到尊重，虽然这个行业的地位是不高的。不必说，像油煎饼一样，

满身是油污，也许沾的是涂抹头发的东西，我弄不清楚，不过我从未见过别种样子的“理发匠”，如同衣服上的衣领一样，它们总是像在面粉里打过滚似的。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一阵风似的跳到曾祖母跟前。这样年迈的老太婆通常总是跟孩子们很合得来：他们自己在心理上就越来越像孩子们，有的时候，完全跟小孩子一样。老太婆坐下来；主人家还有个熟人，四十来岁，不知是来做客的，还是来办事的，已经准备告辞。来做客的还有男主人的侄儿，他姐姐的儿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他想进印刷所干活。老太婆画完十字就往下坐，眼睛看着客人说：“哎，真是累！在你们家里的这个人是谁呀？”

“问的是我吗？”客人笑嘻嘻地回答说，“怎么啦，玛丽娅·马克西莫芙娜，难道连我们你都不认识吗？已经第三个年头打算跟您一块进树林去采蘑菇了。”

“噢，是你呀，我知道你，调皮鬼。我记得你，就是想不起你叫什么了，你是谁，我还记得。唉咳，我可有些累了。”

“玛丽娅·马克西莫芙娜，可敬的老太太，您怎么一点儿也没有老，我正想问您。”客人开玩笑说。

“又来啦，去你的吧。”老太婆笑着说，看得出来，其实她很满意。

“玛丽娅·马克西莫芙娜，我可是个好人。”

“跟好人说话让人高兴。噢喃，我还喘不上气来，亲爱的。谢廖什卡[①] 好像穿上新大衣啦？”

她指了指侄儿。

侄儿是个胖乎乎的结实小伙子，笑得闭不上嘴，往她跟前

① 谢尔盖的昵称。

走了走；他穿的是灰色新大衣，他还不能满不在乎地穿上这件大衣。大概再过一个星期才会满不在乎，现在他不时看看自己的翻裤脚，看看衣服的翻领，总之，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感到对自己产生一种特别的敬意。

“你过来，转过身子去”，理发匠的妻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马克西莫芙娜，你看，做得多好；在普罗霍雷奇那里他对我们说，便宜，六个卢布就像一个戈比，如今钱不值钱啦，还说，以后你们会高兴得流泪的，这料子很经穿。你看，多好的料子！你转个身！多好的衬里，多么结实，多么结实，你再转转身！钱就这样花掉了，马克西莫芙娜，我们的钱像被水冲光了。”

“咳，亲爱的，如今什么都贵了，没法比啦，你别跟我说这些事啦，别让我难过啦，”马克西莫芙娜不愉快地说道，可是，她还是喘不过气来。

“好啦，不要再说啦，”男主人插嘴说，“该吃点儿什么。你怎么啦，玛丽娅·马克西莫芙娜，我看你好像是很累啦！”

“噢，明白人，我累了，天怪暖和的，还有太阳，我想，我看看他们……干吗老躺着。唉！在路上我遇见一位年轻的太太，她是给孩子买皮鞋的。她说：‘你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累了吗？给你一个五戈比：买个小面包吃……’我就要了这个五戈比……”

“你啊，奶奶，还是先稍稍歇一会儿，你今天怎么喘得这样厉害？”男主人好像突然感到特别不安地说道。

人们全都在看着她；她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唇全发青了。她也在张望着大家，可是眼睛昏暗无光。

“我想……给孩子们买点甜饼……五戈比……”

她的话又停住了，又喘起来。所有的人突然间全都不出声

了，约莫有五秒钟的工夫。

“奶奶怎么啦?”男主人向她弯下身去。

但是，老奶奶没有回答；又是一阵子沉默，又有五秒钟的光景。老奶奶似乎是更老了，她的脸似乎突然又消瘦了。两眼呆滞了，笑容凝结在嘴唇上；眼睛在直视着前方，似乎看不见东西了。

“该去请神父啦！……”那位客人在人们身后突然急急忙忙地小声嘟哝了一句。

“对……还不……晚吧……”男主人嘟哝了一句。

“奶奶，奶奶，你怎么啦?”理发匠的妻子在呼喊老太太，人们立刻慌做一团；可是老奶奶依然纹丝不动，只是头向旁边耷拉下去；放在桌上的那只右手里还握着自己那枚五戈比，左手仍然搭在六岁男孩、大重孙米沙的肩上。男孩子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瞪大两只惶恐的眼睛盯着老祖母。

“过去啦!”男主人俯下身去，不慌不忙地严肃说了一句，顺手画个十字。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眼看她整个身子越来越往下歪斜呢。”客人深有感触地断断续续地说道；他非常吃惊，看看这个人，望望那个人。

“唉，上帝！原来这样！马卡雷奇①，现在该怎么办呢?把她送到那儿② 去吗?”女主人慌张地小声嘀咕说，她已经茫然不知所措了。

“往哪儿送?”男主人胸有成竹地回了一句。“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办了；你不是她的亲人吗?你去告诉一声就行了。”

---

① 男主人的名字。

② 意即教堂。

“一百零四岁，了不起!”客人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挪动，感慨越来越深，连脸似乎都泛出红晕。

“是啊，这几年连岁数都记不住了。”男主人一边找帽子，一边脱着大衣，更郑重其事地说。

“眨眼的工夫还笑呢，那么高兴！那五戈比还在手里呢！还说买糖饼，哎，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

“喂，彼得·斯捷潘内奇，是不是该出去一下。”男主人打断了客人的话，两个人就走出去了。当然，为这样的老太太人们不会哭的。一百零四岁，“没病没灾地体面地走了。”女主人出去找邻居帮忙。邻人们听到消息后，有的感叹，有的惊讶，差不多都是高高兴兴地立刻跑来了。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烧茶炊。孩子们带着惊慌的神情挤在墙角里，从远处望着死了的老奶奶。米沙无论活多久都会记得这位老奶奶，她忘记了搭在他肩膀上的手就死去了，可是在她死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会记得她了，也没有人知道，某个时候有过这样一个老太婆，她活了一百零四岁，她为什么活着，怎么活过来的——这也无从知道。其实，又何必记住呢：反正都是一样。千百万人都是这样离开世界的：无声无息地活着，又无声无息地死去。只是在这些百岁老头儿和老太婆死亡的时刻似乎才有某种打动人的、宁静的东西，甚至似乎是某种重要的、令人慰藉的东西：直到现在一百年似乎还在奇怪地对人起着作用。上帝祝福普通的善良人们的生和死吧!

实际上，这是一幅单薄的没有情节的画面。的确，本来想把一个月前听来的事情转述得更有趣些，可是一着手做，那就恰恰相反，或者不可能，或者是写不下去，再不就是“没有把你知道的完全说出来”，结果就只能写出这个毫无情节的东西……

## “标新立异”①

## (《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1章，Ⅲ)

实际上，我写的是“看见的、听见的和读过的”。可是还好，我没有以写“看见的、听见的和读过的”一切这个许诺来束缚自己。② 你听到的事情中怪诞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多。当这一切都自动地奔向不同的方向，无论如何也不肯汇集到一起时，怎样才能把它转述出来呢！真的，我总是觉得，我们进入了某种普遍的“标新立异”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标新立异，都要离群索居，每一个人都想杜撰出自己独有的、新的和前所未闻的东西来。每一个人都要把过去在思想和感情中存在的一切共同的东西弃诸不顾，以自己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为起点从头做起。每一个人都要从头开始。毫无遗憾地断绝与从前的各种联系，每一个人都我行我素，唯有这样才能自慰。即使还没有这样做的人，也想这样做。比如说，有非常多的人什么也没有开始做，他们也永远不会开始做什么，但是他们毕竟是挣脱了联系，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着那扯断了的地方，在期待着什

---

① 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之一康·阿克萨科夫(1817—1860)在自己的文章《论现代人》中使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阿克萨科夫的启发也使用了这个词，他用这个词表示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俄国社会的一种突出的、典型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在社会中没有精神上、道德上的一致，社会分化为各种思想见解不同的派别。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在《公民报》上设《作家日记》专栏向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写的申请中说，《作家日记》专栏将写他作为作家“看见的、听见的和读过的一切”，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则删掉了“一切”二字。

么。我们总是在期待着什么。其实在任何事情上几乎都没有道德上的和谐；一切都支离破碎，或者都正在破碎之中，碎得甚至不成堆，而是碎成许多小块。主要的是，有时竟然做得十分轻松，扬扬得意。就以我们当代的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也是新人当中的一个人来说吧。他登上舞台，就不想知道在此之前的任何东西；他的东西都是自己想出来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写的。他宣扬新的东西，他直接提出新的语言和新人的理想。他既不了解欧洲文学，也不了解自己的文学；他什么都没有读过，而且也不想读。他不仅没有读过普希金和屠格涅夫，而且，真的，连自己的人，即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也没有读过。他塑造新的英雄人物和新的妇女，这些人物的全部新颖之处就在于，他们一抬脚就迈出自己的第十步，他们忘记了前面的九步，因而就立即落到极其虚伪的境地，这是唯有借助想象才能知道的那种境地，并因教诲和蛊惑读者而把自己毁灭掉。整个教训就是由虚伪的境地造成的。在整个教诲中极少有新的东西，相反，倒是很多很多陈词滥调；然而，问题还不完全在这里，问题还在于作者真诚地认为他讲出了新话：他讲的是自己的话，他标新立异，当然，这使他非常得意。这个例子其实是旧闻，是一件小事，不过最近我还听到一个关于创新的故事：有那么一位“虚无主义者”，他否定过去，受过罪，经过长期的磨难，甚至是监禁，此后，他在自己的心中突然产生一种宗教感情。您以为怎样，他立刻就做的是什么呢？他马上就“离群索居并标新立异”，他立即巧妙地绕开了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他排除了从前的一切，迫不及待地臆想出自己的信仰，虽则也是基督教信仰，但却是“自己独特的”基督教信仰。他有妻子和儿女。他不同妻子一起生活，儿女则交给别人去管。最近他跑到美国去了，很可能是去那里宣传新的信仰。

总之，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每个人都自行其是，难道他们仅仅是要与众不同、自我表现吗？全然不是。现在在我们这里出现的时机，如果说是实实在在的时机，不如说是自省的时机更为恰当。可能是非常多的人确实正在苦闷，正在经受折磨；他们事实上极其认真地割断了与从前的全部联系，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给他们指点，而明智的人们和指导者们只是迎合他们，有些人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恐惧（怎么能不放他们到美国去呢；往美国跑毕竟表示开明），而另外一些人就纯粹是靠他们发财。新生的力量就这样毁灭了。人们对我说，这不过是两三件事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并说，恰恰相反，一切都毫无疑问地比从前更牢固地综合在一起了，结合在一起了，出现了银行、会社、联合会。然而您向我说的是那群涌进俄罗斯的胜利了的犹太人吗？说他们是胜利了的和兴高采烈的犹太人，是因为现在甚至已经出现了兴高采烈的犹太人，有持犹太教信仰的，也有持东正教信仰的。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们的报纸都在谈论他们了，说他们离群索居，例如还说，外国的报刊正在尽情地嘲笑我们俄罗斯土地银行代表们的代表大会，嘲笑的理由是：

> ……头两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报刊不无嘲讽地问道：俄罗斯的土地信贷机构在把它精心保护起来的中国万里长城后面召开自己的秘密会议，对公众隐瞒一切，而这种做法却让公众都明白，他们确实在酝酿着什么丑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企图获得公众信任的勇气是如何产生的，又以什么样的权利为依据。

看来，甚至这些先生们也在标新立异，也在关起门来，谋划自己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方式谋划，而不是像全世界都在做

的那样去做。不过，我是开玩笑插进关于银行的话的：目前这并非我要谈的问题，我要说的只是标新立异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把这个思想解释得更清楚呢？我要顺便引用一份手稿中关于我们的会社、联合会的几种观点，这份手稿不是我的，是别人寄给我的，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手稿作者向自己在外省的论战者说：

> 您是说，劳动组合、联合会、会社、合作社、商业的以及其他各种协会都是以人天生要求交往的情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要想为俄罗斯的劳动组合辩解，讲些肯定它的话，为此，对它的研究还太少了。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联合会、会社等等——都不过是一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的联盟，都是以自我保护的感情为基础，适应生存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联盟；这些联盟产生的历史就足以证实我们的意见，这些联盟最初是由一些穷人和弱者结成的反对富人和强者的组织，后来，富人和强者也开始利用自己的敌人的武器。是的，这部历史无疑在证明，所有这些联盟是由于内部的敌对而产生的，它们不是像您认为的那样建立在交往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心的恐惧感上，或者是不惜损害邻人而获取利润、利益、好处的期望上。如果仔细观察功利主义的所有这些产儿的结构，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建立每一个人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人对每一个人的可靠监视机制，——说穿了，就是由于担心千万不要被人欺骗而实施的普遍特务活动。所有这些联合会以及他们在内部的监视，他们忌妒周围一切的外部活动，都与政界进行的活动惊人地相似，在政界中各国人民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就是直至发生流血厮杀的武装活动，他们内部生活的特点就是无休止的党派斗争。这里有什么交往，有什么爱可言！我们生活得还十分地自由自在，我们还没有必要过分地相互敌视，我们彼此之间还有很多

善意和信赖，这种感情阻碍我们彼此进行监视，进行特务活动，而对一切联合会、合作社、商业及其他会社来说，则是必须的，因为离开这种监视，这些机构就不可能活动，它们就必然瓦解，正是因为这一切，这类机构在我们这里才没有发展起来。

与我们的更有教养的西方邻居相比，我们是否要为我们这些缺陷而痛心呢？不，起码我们在我们的这些缺陷之中看到我们的财富，我们看到团结的感情还以某种力量在我们这里起着作用，没有这种感情人类社会就不能够生存；这种感情虽然是无意识地在人们中间起着作用，它既可以把人们导向丰功伟绩，常常也可以把人们导向巨大的罪恶。但是这种感情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还没有被扼杀，对于这个人来说，那就一切都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它，这种感情从无意识、从本能转变为自觉的力量，转变为在我们的支配下去达到合理目的的力量，而不是听任偶然情况的盲目支配把我们抛向某一个方面的力量；没有这种团结的感情，没有相互的爱的感情，没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感情，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

请看，这位作者可能并非那样一味诅咒联合会和社团，他只是说明，这些会社现在的主要原则完全是功利主义，还有特务行为，这根本不是人们的团结。这一切写得都不够老练，幼稚，都不太切合实际，但是，原则上却完全正确，不仅写得真诚，而且是怀着沉重和痛苦的心情写成的。请注意普遍的特点：现在我们这里的全部事情还刚开始，还刚开始实践，然而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所有的人呼吁的、关注的仅仅是原则，所以无意之中实践就落到了一批犹太人的手中。我在上面引用的那段文字的原稿的历史是这样的。可敬的原稿作者（我不知道原稿作者是一位年轻人还是老人中的一位）在一个省城刊物

上发表了一篇短评，这个省城刊物的编辑部在刊登他的短评的同时又附上不赞成短评观点的保留说明。此后短评作者又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反驳与他意见不同的保留说明（其实是不长的一篇文章），但是省城刊物编辑部以这篇文章“近似宗教宣传，而不是文章”为口实拒绝刊登。于是作者写信给我，并把这篇被拒之门外的文章也寄给我，要求我阅读它，了解它，并在《日记》中谈谈我对它的意见。第一，我感谢他信任我的意见；第二，感谢这篇文章，因为文章使我感受到极大的愉快：我很少读到比这篇文章更有逻辑性的东西，我虽然不能把整篇文章刊登出来，但我摘引上述那段是有用意的，我不隐瞒我的用意。问题是，在致力于人们的真正团结的作者那里，正是在我没有大胆引用的原稿的那些部分，我也发现了某种极端“标新立异”的气势，标新立异到少见的地步；所以不仅是文章，还有文章作者本人好像都在证实着我的关于个人“标新立异”的看法以及关于当代突然出现的我们社会的分裂的看法，即关于我们社会正在高度地，可以说是化学式地分解为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的看法。

不过，我要补充说，如果说现在的一切都是“独出心裁，我行我素”，这并不等于与从前没有联系。相反，这种联系肯定应该存在，虽然看上去似乎一切都是散乱的、互不理解的，那么，考察这种联系就是极为引人入胜的事。总之，这种比喻虽然是陈旧的，但是我们俄罗斯的知识界比任何东西都更像古时候说的那捆细树枝，细树枝只有在它们合成一捆的时候，才是坚固的，而联系稍一松散，整捆枝条就会分散为很多棵没有分量的小草，一阵风就吹得它们纷纷扬扬。这一捆树枝在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散开了。我们的政府在自己的二十年改革的全部时间里没有得到我们知识界的力量的全力支持，难道这不是事

实吗？相反的是，很大一部分年轻的、新生的、宝贵的力量走向某个奇怪的方向，夹带着嘲讽和威胁走向标新立异，恰恰同样是由于离开前面已走的九步直接迈出第十步，与此同时忘记了，如果没有前面已走出的九步，这第十步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变为空想，即使这第十步本身是有某种意义的。最遗憾的是，在成千上万个叛逆者中间，可能仅仅有一个人对这第十步有些理解，而其余的人则如听敲钟一样。结果如同母鸡孵不出幼雏的卵，一无所获。你们见过炎热夏季的森林火灾吗？眼看着烧，多么可惜，多么可悲！有多少宝贵的财富、多少力量白白毁灭了，火和热陡然消失了，不留痕迹，也毫无益处。

# 关于欧洲的幻想

（《作家日记》，1876 年，3 月号，第 1 章，Ⅳ）

“然而在欧洲，在所有的地方，那里的一切联合的力量岂不是全都一样，全都变为可悲的幻影了，而我们对那些力量曾经寄予过那么多的期望；那里的瓦解和相互隔绝岂不是比我们更严重吗?”这就是不能不引起俄罗斯人注意的问题。再说，哪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不是首先想到欧洲呢?

的确，看上去，那里大概还不如我们；或许看得清楚的仅仅是相互隔绝的历史因果关系；或许因此那里就更不乐观。在我们这里要找出什么有根有据的原因，理出我们被扯断的线索的全部头绪是比什么都困难的，正因如此，也就产生了我们的某种自慰：最后会明白过来，耗费力量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没有任何理由的，有一半是人为造成的，可能到最后人们是要和谐一致的。这就是说，终归还是有希望的，箭还会再聚集到一块的。而在欧洲那边则是再也不能把箭捆成一束了；在那里的一切相互隔绝，全都不像我们这样，在那里，相互隔绝是瓜熟蒂落的结果，是清楚的、明确的，在那里群体和个体都生存到最后的时限，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彼此不愿做任何让步，宁肯灭亡也不让步。

顺便说说，我们这里现在人人都在谈论和平。全都在预言长期的和平，处处都能看得见清晰的地平线，看得见联合与新的力量。甚至从巴黎出现了共和国[①] 这件事情上都能看到和

① 这里指的当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 年 9 月法国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保皇派与共和派展开激烈斗争。至 1875 年国民议会勉强通过法案，间接承认共和制。

平；这个共和国是俾斯麦建立的[①]，人们从这一点上也看到和平。东方各大强国的一致使人们无可争议地看到和平的重要保证，还有一些人从我们的报纸上，甚至从黑塞哥维那目前的混乱局面中，一反自己不久前的惊慌，突然发现欧洲的持久和平的可靠标志。（顺便说一句，是否因为解决黑塞哥维那问题的钥匙也在柏林的掌握之中，也在俾斯麦公爵的文件柜中。）不过最让我们喜悦的是法兰西共和国。这里要顺便问一句，法国为什么仍然在欧洲占据首要位置，而不是战胜它的柏林[②]？直至现在，法国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有时也比柏林的重大事件引起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因为这个国家是时时都走在前列的国家，第一个尝试的国家和思想启蒙最早的国家，这是不容争辩的。这就是为什么"结局的开端"[③] 总是来自那里；除开法兰西外，还有谁能够率先迈出这决定性的也是最后的一步？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在这个"先进的"国度里形成了极端对立的独特存在。在那里，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直到"最后"也不可能。在欢呼共和国的时候，全欧洲都断然说，只有出现了共和国才不可能发生反对德国的"复仇战争"，在不久之前企图领导法国的所有的政府之中，唯独共和国不冒险，也不想冒险，只是由于这一个原因，法国和欧洲就需要共和国。然而，这全都是幻影，宣布成立共和国正是为了战争，如果不是同德国进行战争，那就是同更加危险的对手——全欧洲的对手和敌人——共产主义进行战争，现在，在共和国制度下这个

① 可能是指俾斯麦作为德国宰相，参与镇压了 1871 年的巴黎公社。

② 指普法战争中德国战胜法国。

③ 拿破仑一世被彻底击败及其帝国灭亡的前夕在法国出现并流行的名言。

对手的暴动比在任何其他政府时代都要早得多！任何别的政府都会与共产主义达成妥协，从而推迟摊牌，而共和国则绝不对它做任何让步，甚至自己还首先挑起并迫使它进行战斗。既然如此，就不必断言："共和国——这就是和平。"事实上，这一次是谁宣告共和国成立的？依然是资产者和小私有者。他们什么时候成了现在这种共和派？在此之前难道不是他们最畏惧共和国吗？因为他们看到的共和国只是一片混乱，是向使他们感到可怕的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在第一次革命时，由于当时持续不断的财政危机，国民公会在法国把流亡者和教会的庞大的私产分割为一些小的份额出售。这项措施使很大一部分法国人变得富有，使法国有可能几乎连眉头都没有皱，经过八十年就偿还清了五十个亿的赔款。但是，这项措施虽然造成了一时的富裕，却在极长时期麻痹了民主的追求，无限地扩大了私有的大军，使法国陷入平民的第一个敌人——资产阶级的无限统治。没有这项措施，资产阶级在取代了法国从前的统治者——贵族之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保持住对法国的领袖地位。但其后果是平民也变得不可调和地残忍起来，资产阶级自己破坏了民主追求的自然进程，把这种追求变为复仇和憎恨的欲望。党派的相互隔绝达到了使整个国家彻底毁灭的程度，直至丧失重建的任何可能性。如果说法国至今还能完整地支撑下来，那也仅仅是借助于自然界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即便是一小撮雪也不可能先于它应该溶化的期限到来之前就溶化掉。不幸的资产阶级，还有同他们一起的欧洲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们依然把这种关于完整的幻觉看做为机体的生命力，一方面以希望欺骗自己，另一方面又由于恐惧和仇恨而战栗不已。实际上，团结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寡头关注的只是富人的利益，民主派关注的则是穷人的利益，那些社会主义者的幻想

家和实证主义者的幻想家把科学置于优先地位，期望从科学获得一切，也就是达到人们的重新团结，并且获得社会机体的坚不可摧的新原则，像牢固的数学原则那样的新原则，除开他们之外，在那里已经没有人关心社会的利益、全体的利益和整个法国的未来。然而人们寄予厚望的科学目前未必能够胜任这件事情。很难想象科学对于人类的本性已经了解到足以正确无误地制定社会机体的新法则的程度；而这件事情是不能动摇和等待的，于是很自然地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科学能否现在就承担起这个任务，即便这个任务在科学进一步发展的未来也不会超过科学的力量。（我们暂且不来论证，即使把科学发展的整个未来也考虑在内，这个任务无疑也超过了人类科学的力量。）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大概就拒绝回答那种要求，由此可见，在法国（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平民的整个运动现时全是由幻想家在支配着，而幻想家则是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再说，在科学自身里面难道就没有幻想家吗？事实是，幻想家也有权支配运动，因为在整个法国唯有他们在关心所有人的团结一致，关心未来，从而在法国，从道义上说，继承权似乎就转入他们的手中，这是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的，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明显弱点和虚幻性。但是，最可怕不过的是，在这里除开全部虚幻的东西之外，同时还出现了最残忍、最无人性的追求，这已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在的、历史注定不可避免的追求。这种追求的全部内容可以用一句谚语表达出来："Ote toi de là, que je m'y mette!"[①] 千百万平民（除极少数例外）的第一个愿望，最主要的愿望就是掠夺私有者。但是，不能因此就谴责贫穷的人们，因为这是寡头使他们处于愚昧状态，使他们愚昧到这种地

① 法文："你从这里滚开，让我来取代你！"

步，除极少数人之外，所有这些千百万不幸的、盲目的人都毫无疑问实际上都极其幼稚地认为，这种掠夺就是他们的发财致富之路，这就是他们的首领们向他们宣示的全部社会思想的实质。其实，他们哪能理解他们的幻想家领袖或者那些有关科学的预言呢？尽管如此，他们必定会胜利，那些富有的人们如果不及时退让，那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是谁也不会及时让步，可能这是因为已经错过了让步的时机。其实贫穷的人们自己也不想得到这种让步，即便是把一切全都让给他们，现在他们也不愿意作任何的和解，因为他们总是认为富人在欺骗他们，暗算他们。他们要亲自动手来处理这一切。

波拿巴分子① 以可能许诺同穷人和解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们甚至也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阴险的和无诚意的。然而寡头们丧失了对平民的信任，就是平民对他们也毫无信任。至于各个国王（嫡系）的政府，② 它们能用作挽救的措施给予无产者的，其实不过是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对这一信仰，不仅平民，就连法国的广大社会公众都早已不知它为何物，而且也不想知道它了。据说，招魂术最近在无产者

① 波拿巴主义的政策最初形成于拿破仑一世，最终完成于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波拿巴主义统治形式的特点是施展小恩小惠，进行蛊惑煽动，在各种政治斗争的力量之间看风使舵。在1870—1871年的一系列事件（普法战争失败、第二帝国灭亡、巴黎公社）之后，在劳动者和中小资产阶级中共和思潮高涨，波拿巴政党在法国恢复帝制的尝试遭到失败。

② 指被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的波旁王朝。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尚博尔伯爵（1820—1883），在1830年后被正统王权拥护派视为法兰西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19世纪70年代谋求法兰西王位，1873年放弃领导保皇派的复辟活动，放弃了王位要求。保皇派得到天主教教会的支持，同时也向教权派做了很大让步。共和党人则把反对教权派视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

里面急剧发展，至少在巴黎是这样。就连资产阶级自己也开始憎恶旁系的两个国王（奥尔良派，亦即奥尔良王朝）了①，虽然在某个时期曾经认为这个姓氏似乎是法国私有者的天然领袖。但是他们的无能是所有的人都一目了然的。而私有者们需要拯救自己，为了与即将到来的可怕敌人进行伟大的最后的决战，他们必然需要并且需要尽可能快地寻求自己的领袖。思想和本能这一次都在悄悄地告诉他们一个可靠的秘密，于是他们选择了共和国。

有这样一种政治的或许是正常的自然界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两个强大的、相互毗邻的邻居，无论怎样友好相处，到头来总是一个想要铲除另一个，这种意愿或迟或早总要付诸行动（这个关于强大邻居的法则是值得我们俄罗斯人好好想一想的）。“红色的共和国直通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直至今天都使法国和私有者胆战心惊，大概要过很长时间之后，他们大多数人才会突然间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近邻单单是出于自卫的原则，就将成为他们最残酷无情的敌人。事实上，尽管红色共和国与共产主义是那么接近，要不是共和国，甚至是九三年那样

① 奥尔良王朝（亦称七月王朝）是法兰西瓦罗亚王朝和波旁王朝的旁系（亦译幼支）。王朝的支持者奥尔良派是19世纪法国的君主派，该派在1830年七月革命时拥戴奥尔良家族的代表人物路易·菲力浦登上法国王位，实行代表大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的利益、损害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是为七月王朝。但此后工人运动、工人起义与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终于爆发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当时路易·菲力浦宣布让位给幼孙巴黎伯爵，自己则逃亡国外，但革命临时政府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奥尔良王朝就此告终。此后，奥尔良派在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为支持奥尔良家族其他代表人物谋求王位，结成了许多有保皇倾向的党派。

的血腥的共和国[1]，实际上还能有什么比共和国更敌视、更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呢？在共和国里共和国的形式高于一切，“la republique avant tout，avant la France.”[2] 在共和国里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形式上：就让“麦克马洪”[3] 取代法兰西吧，但是法兰西必须叫共和国，这就是共和党人在法国现在取得的“胜利”的特点。这就是说，在形式上寻求挽救。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从根本上不仅否定一切管理形式，而且否定国家本身，不承认整个当代社会。共和国的形式对共产主义有何意义？对于法国群众来说，为了认识两种力量的这种直接对立，这种相互否定，花了八十年的时间，但它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确认了共和国：法国群众终于让敌人看到了它最危险的和最自然的竞争对手。共和国无论如何也不想因向共产主义过渡而灭亡。实际上，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自然的表现和形式，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就是共和国的产儿，共和国在第一次革命的时候才建成、哺育了整个法国资产阶级。相互隔绝就是这样最终完成了。有人说，离战争还远着呢。未必有那么遥远。也许，不希望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还更好一些。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在蛀蚀欧洲，要是等到那个时候，就已把一切都彻底毁灭了。俾斯麦公爵是了解这一切的，不过他过于按照德国的方式把希望寄托在血和铁上了。然而在这上面以血和铁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

① 指1793年法国大革命后成立的共和国（“血腥”是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最后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5月称帝，共和国遂为这第一帝国所取代。

② 法文：“共和国高于一切，高于法兰西。”

③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元帅，1873—1879年为法国总统。

## 一种垂死的力量和几种未来的力量

## (《作家日记》，1876 年，3 月号，第 1 章，V)

人们说目前毕竟还没有任何惊慌不安的原因，一切都清楚，一切都明朗：在法国有“麦克马洪”，在东方有列强的协议，军事预算普遍地大幅增长，怎么会没有和平呢？

那么教皇呢？要知道，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他即将死亡，那时又将怎样呢？难道罗马天主教愿意陪同教皇一块死亡？噢，罗马天主教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生存！① 其实我们的预言家们难道能够不嘲笑教皇吗？关于教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竟然没人提了，算不上什么问题了。然而这个“独特存在”过于庞大，过多地充满了数不胜数的和彼此极不相容的愿望。很难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而放弃这些欲望。再说，放弃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好处？为了人类吗？天主教早已认为自己高于所有的人类了。直至今天它只与世界上的强者行淫②，并且把希望寄托于他们，直至最后期限到来。这个期限现在到来了，似乎是最终到来了，罗马天主教也必然要抛弃地上的统治者，地上的统治者们其实是自己背叛了罗马天主教，并且是很早以前就

---

① 罗马天主教为争夺世俗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教皇死后天主教的未来命运等问题，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就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和关注。他在《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多次谈论这些问题。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借用《新约全书·启示录》关于“大淫妇”的故事，把天主教教会比喻为“大淫妇”。《启示录》第 17 章第 2 节的原话是：“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已经图谋在全欧洲对它掀起全面的中伤，现在，到今天，这种中伤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①。没办法，罗马天主教也没有做出过那种转折：既然是这样，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世间的统治，它就毫不犹豫地把基督出卖了。它作为信条宣布说："没有教皇在世上的统治，基督就不可能在世上存在下去。"从而它就宣布了一个新的基督，这个基督不同于从前的基督，他被魔鬼引诱迷了心窍，醉心于俗世的权柄："向我顶礼膜拜吧，我赐给你一切！"啊，我听见了，有人激烈反驳这个观点；人们反驳我说，基督的学说和形象直到现在仍然继续活在很多天主教徒的心中，像从前那样真诚，像从前那样纯洁。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但是，主要的源泉无可挽回地被搅混了，被毒化了。况且刚刚过去的不久之前罗马宣布，同意把魔鬼的诱惑作为不可动摇的信条，我们还不可能看到这一重大决定的全部直接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宣布这一信条以及这种揭开"全部秘密"的事情正是发生在统一的意大利即将走进罗马的时刻。我们这里很多人当时嘲笑说："愤怒，但却无力……"不过未必是无力。不，能够做出那些决定和转变的人不可能不战而亡。人们

① 19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为了削弱天主教的影响，使天主教从属于国家，以及为了各自的特殊目的，都在同天主教进行斗争。在德国，天主教的政党主张的是与政府对立的政策，这种政策反映的是上层神职人员、地主、官僚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反对国家统一的分离主义情绪。俾斯麦宰相的政府为了实施统一德国的政策，从1872年起就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天主教的、统称为"文化斗争"的措施，如驱逐耶稣会士、国家监督教会、解散天主教的一切僧团等等。在法国，天主教的越山派（因为从欧洲北部和西部看，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另一面，"越山派"由此得名）主张捍卫罗马教皇不受限制的至上权力，主张教皇有权干涉任何国家的世俗事务。法国共和派在选举获得胜利后即与越山派分子展开了坚决斗争。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也在进行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

可能要反驳我说，在天主教里从来就是这样的，至少是这个意思，还说，由此可见，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转折。确实是这样，然而始终有一个秘密：在许多个世纪里从表面上看教皇是满足于自己那块弹丸般的领地的，满足于教皇的辖区[①]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个寓意；主要之点是，在这个寓意里面始终潜藏着一个主要思想的种子，这颗种子里蕴涵着教皇的不可否认的和由来已久的希望，主要之点还在于，这颗种子在将来要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并荫蔽整个大地。于是，在最后的那一刻，在剥夺他在世上统治的最后一块土地时，天主教的统治者看到自己死亡的临近，突然一跃而起，向全世界宣布关于自己的全部真理："你们认为仅仅是教皇领地的国王这个封号就使我心满意足了吗？你们要知道，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的主宰者，世上所有国王的主宰者，我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还是人们的世俗生活的真实的主人、统治者和皇帝。我才是王上之王，主上之主，世界上的一切命运、时间和时限都属于我一个人；我现在向全世界声明，这是我的不可侵犯的信条。"不，这是力量；这是庄严的，而不是可笑的；这是古代罗马统治和统一全世界的思想的复活，这一思想在罗马天主教中从来也没有消亡过；这是尤里安的罗马，但不是被战胜的，而像是在新的、最后的战斗中战胜了基督的尤里安（背

---

① 教皇统治的地区自756年至1870年是中部意大利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教皇统治的地区作为一个国家，其国界经过数次变更。从1860年起，教皇统治的地区仅有罗马及其近郊，自1870年9月意大利军队解放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庇护九世退居梵蒂冈。此后，教皇的统治地区只剩下梵蒂冈（在罗马城的梵蒂冈高地上）与拉特兰宫，面积仅零点四四平方千米，人口约一千人。

教者)[1]。可见,为了争夺人世上的王权而把真正的基督出卖了。

在罗马天主教中必然发生这种出卖，并在事实上完成这种出卖。我再说一遍，这支可怕的军队有一双极为锐利的眼睛，使它不会看错它能够依靠的真正力量现在在哪里。失去各个国王这些同盟者之后，天主教必然要转向平民。天主教有成千上万名诱惑者、绝顶聪明的人物、洞悉心灵的人物和心理学家、辩证论者和听取忏悔的神父，而人民则时时处处都是心地单纯和善良的。况且在法国，现在在欧洲很多地方也同法国一样，人民虽然厌恶信仰，蔑视信仰，但对圣经毕竟是什么都不知道，至少在法国是这样。所有这些洞悉心灵的人物和心理学家们便一齐拥向人民，向人民献上新的、已经接受了一切的基督，在罗马最近的一次亵渎神的会议上被捧出的基督。他们说："喂，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们，你们所关注的一切，我们很早以前就为你们准备的这本书里全都有了，是你们的领袖从你们那里把这一切全都偷走了。如果说迄今为止我们向你们讲的与书中的有点不同，这只是因为，在此之前你们还像小孩子，还不到让你们知道真理的时候，但是现在你们知道真理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你们要知道，在教皇的手中有圣彼得的钥匙[2]，信仰上帝就是只信仰教皇，上帝亲自为你们把他安置在大地上

① 尤里安（背教者）(331—363)，罗马皇帝（361—363)，受过基督教教育，在雅典受过哲学教育，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追随者，成为皇帝后宣布拥护多神教，在新柏拉图主义基础上对多神教进行改革，颁布容许不同的宗教信仰的敕令，解除对术士的流放，发还被没收的寺庙财产，发布反对基督教的敕令，取消基督教的特权。基督教会给他取了"背教者"的绰号。他死后，基督教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② 根据《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把进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使徒彼得，赋予他无限的权力。天主教的教义认为教皇就是使徒彼得在人世间的继承人和代理人。

代替上帝。他永远是正确的，他被授予上帝的权力，他也是时间和期限的主宰；现在他决定，你们的时间到了。从前，信仰的主要力量是驯服，但是现在驯服的期限已到尽头，教皇有权力废除它，因为全部权力都属于教皇。的确，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基督自己就是所有人的兄弟姐妹；假如你们的兄长不愿意把你们看做自己的兄弟姐妹，你们就可以拿起棍棒，自己闯进他们的家门，用武力迫使他们做你们的兄弟姐妹。基督等待着你们的堕落的兄长们忏悔！等待很久了，现在他亲自准许你们宣布：'Fraternite' ou la mort!'[1] 假如你的兄长不愿意与你平分自己的财产，你就拿走他的全部财产，因为基督等待他忏悔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到了愤怒和报复的时刻。你们还要知道，在你们过去和未来的一切罪过中你们是无罪的，因为你们的一切罪过都是由于你们的贫穷才犯下的。即使你们从前的领袖和教师在过去早就向你们宣讲过这一切，你们也要明白，他们向你们说的虽然是真理，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在期限到来之前向你们宣讲，因为只有一个教皇才有上帝亲自授予的这个权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你们那些教师除开让你们上绞刑架和遭受极端贫困之外，没有使你们得到任何好处，他们的一切举措都自生自灭了；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进行欺骗，目的是借助你们的力量显示自己强大，然后以高价把自己出卖给你们的敌人。教皇则决不出卖你们，因为没有比他更强大的了，他是强者之中的最强者，你们必须信仰，但不是信仰上帝，只是信仰教皇，还要信仰的就是，只有一个教皇才是大地之王，其余的全都应该消失，因为他们的期限也到了。现在你们庆幸吧，欢乐吧，因为地上的天堂现在降临了，你们全都

① 法文："或者做我的兄长，或者砍头！"

会变成富人，有了财富你们都会善良起来，因为你们的全部愿望都将要实现，你们将不再有作恶的一切理由。”这都是花言巧语，但是毫无疑问平民会接受这些提议：平民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同盟者的身上看到可以联合的巨大力量，承认一切、什么都无法干扰的力量，真实的和历史的力量，它将取代领袖、幻想家和投机分子，平民对领袖、幻想家和投机分子们的实践能力，有时也对他们的正直，直到今天也毫无信任。施力点一下子就立即准备好了，杠杆也交到手里，需要的只是以全部重量压下去，再一转动。而人民能够不转动吗？他没有重量吗？事成之后又会向人民灌输信仰，以此安定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因为由于没有上帝而早就感到苦恼的人太多了……

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这些话，但那是在小说里面顺便提一提。请原谅我的自信，不过我深信，所有这一切在西欧是必然要实现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现，也就是说，天主教将要投向民主派，投向人民，抛弃人世上的国王们，因为这些国王自己抛弃了天主教。欧洲所有的政权也都蔑视天主教，因为看起来它现在太贫穷了，它已一败涂地，但是毕竟还没有把它的形象和处境想象得那样可笑，那是我们政治评论家们天真地想象出来的。然而俾斯麦公爵如果没有感到它是未来最可怕的、最近的和即将到来的敌人，他就不会那样打击它。俾斯麦公爵是非常高傲的人，他不会徒劳无益地耗费那么多的力量去对付软弱得可笑的敌人。但是教皇的力量是胜过俾斯麦的。我还要重复说：现在罗马教廷可能是所有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中最可怕的“独特存在”。有很多力量在威胁着和平。欧洲还从来没有面对过我们今天这样的敌对势力的威胁。似乎一切都埋伏妥当，装满火药，只在等待第一颗火花……

“可是这与我们有何相干？这一切不全都是欧洲那边的事，

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的事吗?"这同我们的关系就是,欧洲就要敲我们的大钟,并且呼唤我们去拯救欧洲,因为欧洲"目前的秩序"的丧钟就将敲响了。它要求我们的帮助,好像这是它的权利,它的要求如同呼唤和命令;它说我们也是欧洲,可见在我们这里也存在同他们那里完全一样的"秩序",我们并非徒劳无益地模仿了他们二百年[①] 并且炫耀我们也是欧洲人,所以,我们拯救欧洲也就是拯救自己。当然,可能我们也没有想把问题处理得有利,但是,这个任务是我们能胜任的吗?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真正的"独特性"是什么,我们在欧洲的真正使命是什么?我们大概已经不习惯去想这些问题了。我们现在不仅不理解这种问题,而且也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甚至连听这些问题都认为是愚蠢的事情,是我们落后的表现。不过,如果欧洲真的来要求我们挺身而出去拯救它的 l'Ordre,[②] 那么,可能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大家都同时突然明白了,我们从来就多么不同于欧洲,尽管我们想成为欧洲已有二百年的极其强烈的愿望与幻想。可是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会明白,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显然我们也不会理解欧洲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它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给它什么帮助?反过来,我们会不会像俾斯麦公爵那样用铁和血去驯服欧洲的敌人,整顿欧洲的秩序?噢,那时,有了那样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胆地祝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人了。

不过这全都是未来的事!这一切都依然是幻想,而眼前的一切则都清清楚楚,一清二楚!

---

① 指彼得大帝改革以来。

② 法文:秩序。

## 堂卡洛斯[1] 和瓦特金先生[2]。再谈“结局的开端”的征兆

(《作家日记》，1876 年，3 月号，第 2 章，Ⅰ)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阅读了有关堂卡洛斯抵达英国的报道。人们总是说，现实是枯燥的、单调的；为了寻求快乐而去求助于艺术、幻想，去阅读小说。对我来说则相反：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现实更富于幻想，更出乎意料的？有什么东西比现实有时更不可思议？现实每一天都以最普通的事物的形式向我们展示成千上万件看来没有可能性的事物，这种没有可能性的事物是小说家永远提供不出来的。别的人则根本就编造不出任何幻想。现实比小说有多么大的优势！请试一试在小说中编造一个情节，即便是律师库别尔尼克[3] 那个故事也好，您要自己把它编出来，在下一个星期日批评家就会以杂文明确地、不可辩驳地向您证明，说您是在胡言乱语，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主要的是，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因为……结果是您自己羞愧地表示同意。请看，您面前是一张《呼声报》，您忽然看到报上有一篇关于我们的射击手的全部情节的报道，请看下去：您开始读的时候感到很惊讶，惊讶极

① 堂卡洛斯（1848—1909），又称小堂卡洛斯。为老堂卡洛斯（1788—1855，自称查理五世，谋求西班牙王位未遂）之孙，自称查理七世。他也谋求西班牙王位，发动第二次卡洛斯战争。战争失败后逃至法国，法国拒绝接纳他，后又逃往英国。

② 瓦特金·爱德华·威廉（1819—1901），英国议会议员，著名铁路事业家。

③ 列·阿·库别尔尼克（1845—1905），当时俄国的一个律师。

了，以致您对读到的东西一点儿也不相信；可是当您读到最后一行，要放下报纸的时候，您会无意中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一句：“是的，这一切肯定是那样的，事情就应该是那样的。”有的人甚至还要补充一句：“我已经预感到是这样的。”小说和报纸给人的印象为什么这样不同，我不知道，但现实的优势就是这样的。

堂卡洛斯在“为了国王、信仰和圣母”浴血奋战之后，他坦然地、庄严地到英国来做客，这又是一个人物，又是独来独往！能够虚构出一件和这种情况相似的什么事情吗？顺便说一件事，您还记得两年之前尚博尔伯爵亨利五世[①] 的事情吗？他也是一位国王，一位正统派，也是在法国寻求自己的王位的人，在时间上与堂卡洛斯在西班牙战斗的时间相同。甚至可以说他们彼此是宗亲、同姓、同宗，但是他们的差别是多么大！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固守着自己的信念，是郁郁寡欢的、高雅的和心地仁慈的人物。尚博尔伯爵在确实能够成为国王（当然是片刻的国王）的关键时刻，没有为之动心，没有举起自己的“白旗”，从而证明他是气度宽宏的、名副其实的骑士，几乎是堂吉诃德，是信守情操和安于清贫的古代骑士，一个自己高傲地终结了自己古老的国王家族的统治的值得敬佩的人物。（说高傲是多少有点儿可笑，但是在生活中不可笑的事物是没有的。）他拒绝接受权力和王位的唯一原因是，他并非只为自己而想做法国国王，而是为了拯救法国。在他看来，拯救法国与为此而要求他做出的让步（很可能做到的让步）是不可调和

① 法国波旁王朝嫡系的最后一位继承人，1830 年后被正统王权拥护派视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称亨利五世）。因仇视法国大革命和君主立宪政体，主张恢复波旁王朝的君主制，但复辟图谋在国民议会被击败，至 1873 年终于放弃领导保皇派的复辟活动。

的，于是他便不愿登上王位。不久之前的拿破仑，这个狡诈人物和无产者，仅仅是为了取得政权而许诺一切，出卖一切，欺骗了所有的人，与这个拿破仑相比，差别是多么巨大。我现在是将尚博尔伯爵比作堂吉诃德，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高尚的称赞了。有一个人，或许是海涅，说过这样的话，他还是儿童的时候读《堂吉诃德》，读到卑鄙小人和工于心计的理发师参孙·加尔拉斯果战胜了堂吉诃德的时候，他哭了，哭得泪流满面。[①] 在全世界没有比这部作品更深刻、更有力的作品了。这是迄今人类思想最杰出、最伟大的成就，这是人所能表达的最辛辣的讽刺，假如大地的生命结束，您随便在哪一个地方问问人们："您是不是理解了您在世上的生活，您认为生活得怎样?"这个人可能默默地递给您一本《堂吉诃德》："这就是我对生活的看法，您会因为这种看法而指责我吗?"我不能断定说，这个人说了这样的话，他就是正确的，但是……

堂卡洛斯是尚博尔伯爵的同类人物，也是骑士，但是在这位骑士的身上可以看到宗教大法官的影子。他使血流成河，这都是 ad majorem gloriam Dei[②]，为了圣母——为人们祈福的人、我们的人民称作"庇护者和救援者"的圣母。人们对他[③]，也同对尚博尔伯爵一样，向他提议过，他也拒绝了提议。这个情况似乎是在毕尔巴鄂之后很快就发生的，是在马德里军队的总司令战死于厮杀中，他取得巨大胜利之后立即发生的。那时马德里派遣使者向他询问："如果放他进入马德里，

① 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海涅一样，混淆了《堂吉诃德》中的两个人物。战胜堂吉诃德的是装扮成白月骑士的参孙·加尔拉斯果学士，而不是理发师。理发师的名字叫尼古拉斯。

② 拉丁文：为了上帝的最高荣誉。

③ 即堂卡洛斯。

为了可能进行谈判，他可否提出某些条件，他的答复是什么？”但是他傲慢地拒绝了有关谈判的一切想法，当然，这不完全是出于傲慢，也是出于深深扎根在他心中的原则：他不能通过使者承认作战的另一方，他，“国王”，不能同“革命”进行任何谈判！寥寥数语，半吞半吐，但却明了，他使人明白，“国王自己知道，当他得到自己的首都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一句话也没有多说。当然，使者立即从他那里返回去，很快就召来国王阿尔丰沙。有利的时机失掉了，但他仍继续作战；他以崇高和庄严的辞藻发表宣言，他自己第一个对宣言深信不疑；他目空一切地、冠冕堂皇地枪杀自己的将军，因为他们“背叛”，他还镇压了自己的精疲力竭的士兵的暴动。应该给他公正的评价，作为军人，他战斗到最后的一寸土地。现在，他从法国抵达英国的时刻，在沮丧和骄傲的信中向自己的法国友人宣布说：“他满意他们的服务和支持，他们为他效力也就是为自己效力，他随时准备再度拔出自己的剑来响应自己不幸的国家的召唤。”不必担心，他还要出现的。顺便说说，他这封致“友人”的信也透露出一个秘密，虽然只透露了一点，秘密就是，这个令人畏惧的（据说还是年轻漂亮的）人能够那么长期地、顽强地进行战争，靠的什么手段，用的什么人的钱？可见，他的朋友是强大的，也是很多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最大的可能就是，给他的支持最大的是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教会是把他作为自己在国王中间最后的指望来支持的。否则，任何朋友也不可能为他筹集那么大量的钱财。

请注意，这个人在高傲地、粗暴地拒绝了同“革命”的一切妥协之后来到英国。他事前很清楚，他是要在这个思想自由的和无拘无束的国度，从他的理解来说也是革命的国度寻求好客的接待，然而，这是几种概念的多么奇特的融合啊！在他进

入英国时发生了这样一件小的但却很说明问题的事件。他在布洛涅登船，想在福克斯通登岸。在同一艘船上还有赴英国的另外一些客人，他们是布伦市政府的委员，是应英国人的邀请到福克斯通参加新建火车站通车庆典的，在应邀的客人中还有加来海峡的代表。为了欢迎这些客人，成群结队的英国人、政府人士、盛装的太太们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和代表团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聚集在岸上。这时，议会一位成员爱德华·瓦特金先生在另外两位议会成员的陪同下出现了。他得知堂卡洛斯也在乘客之中时，很快向堂卡洛斯走过去，向他表示敬意。他毕恭毕敬地把卡洛斯送到站台，送进单独的专用车厢。但其他的观众则不是那样有礼貌了。他们看到堂卡洛斯在车厢里就座时，就吹起口哨，发出嘘嘘的声音。同胞们这种行为令瓦特金·爱德华先生颇为难堪。不过他自己在报上写了这件事，尽量缓和了对“客人”的不礼貌接待的影响。他说这完全是由于一个意外的情况造成的，否则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

他是这样写的：“当我们进入站台时，堂卡洛斯举起帽子向迎接他的几个人欢呼致意，风吹展了 Odd Fellows① 会的旗帜，旗上画着保护儿童的慈善组织的标志和‘毋忘寡母和孤儿！’的口号。很快就引起惊人的反响：在人群中发出嘟嘟哝哝的声音，但这声音主要是表示悲伤，而不是发泄愤怒。我对发生的事情虽感遗憾，但是应该说明，任何一个集会庆祝欢乐节日的民众，突然面对面地看到流血和自相残杀的战争的主要人物时，都不会像福克斯通的大多数观众那样表现得那么有礼貌。”

观点是多么独特，自己的见解是多么坚定，对自己的人民

① 英文：秘密兄弟。按：秘密兄弟会为当时的一个慈善团体。

是多么骄傲自豪！可能我们的很多自由主义者要说瓦特金先生的行为几乎下流，是谄媚名人的卑贱感情，是显示自己的渺小举动。但是瓦特金先生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他自己知道，来的客人是流血和自相残杀的战争的主要人物；但是，在迎接这个人物的同时，他也借机表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自豪感，竭诚为英国服务。他在把手伸给身上沾满血迹的暴君时，也就以英国的名义并以议员的身份告诉他："您是独裁者、暴君，但毕竟是到自由的国度来寻找避难所的；这也应该是预料之中的；英国接纳所有的人，不怕给予任何人避难场所，entre'e et sortie libres;[①] 我们欢迎。"使瓦特金先生感到难堪的不单单是"一小部分集会的民众"的无礼，还有就是，他认为放纵感情、口哨和嘘声有损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必须有的那种个人尊严。假如一个民族不能控制自己受到伤害的感情，当众以蔑视和哨声羞辱歹徒，甚至不顾这个歹徒是民族的客人，即便是在欧洲大陆，在全人类，都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即使对某些巴黎人或者德国人来说也都是可取的；但是每一个英国人的表现则应不同。在这场合他应该作为绅士冷静处事，不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客人不能察觉欢迎者如何评价他，那就更好；而最好不过的是，每个欢迎者像有身份的英国人那样，手背在身后，沉静地站在那里，同时以充满冷漠的尊严的目光注视来访的客人。轻轻地、有分寸地说几句礼貌的话，不妨碍任何人：客人则立刻就明白，这只不过是习俗和礼仪，他纵然是绝顶聪明，他在我们这里也引不起轰动。而现在，这种喊叫和呼哨会使客人以为，如在欧洲大陆一样，这不过是街头一群无知的群氓。这里忽然想起一则很有趣的笑话，是我不久前读到的，在

① 法文：来去自由。

哪里读到的，谁写的，都不记得了。这是关于本世纪初拿破仑一世时期塞巴斯蒂安尼元帅和一个英国人的故事。当时的要人塞巴斯蒂安尼元帅想对一个英国人表示亲切，当时英国人都不受重视，因为他们坚持顽强地与拿破仑作战。塞巴斯蒂安尼讲了这个人的民族的很多好话之后，态度和善地对这个英国人说：

如果我不是法国人的话，我就希望做一名英国人。

英国人听完他的话，丝毫没有为他的亲切的话所感动，立刻回答说：

如果我不是英国人的话，我还是希望成为一名英国人。

可见，在英国，所有的英国人都同样地尊重自己，唯一的原因大概是，他们是英国人。看来，只凭这一点就足以在这个国家里建立起人们之间的牢固联系和团结：紧密的箭束。然而事实上，在那里也与在欧洲各地一样：极端贪求生存，丧失了生活的最高意义。在这里我举一个英国人对自己的新教信仰的观点作为英国人的独特性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就其绝大多数来说，是有高度宗教信仰的民族：他们渴求信仰，不断地探求信仰，但是，尽管有全国性的“英国”圣公会[①] 的

① 基督教新教主要派别之一，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1534 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规定英国教会不再受治于教皇，而以英王为教会最高首脑。17 世纪后，它自称与天主教会、正教会同是古老公教会之一，拒不承认罗马主教为普世教会的最高首领。

信仰，他们却都分属于数百个教派，而不是一个宗教。锡德尼·多别尔[1] 在自己不久前的文章《关于艺术、哲学和宗教》中说过这样的话："天主教宏伟，美好，睿智，强大，它是人类树立的建筑物中最坚固、最合理的建筑物，但是它没有教育作用，因而它注定要灭亡；不仅如此，它被判处死刑，因为它有害，它的结构越完善，它的危害就越大。新教狭隘，散漫，无耻，无理性，不一贯，自身不和谐；这是摇唇鼓舌和墨守成规的巴比伦，这是思想糊涂的书呆子、略通文墨的天才和形形色色的目不识丁的利己主义者的竞技俱乐部，这是装腔作势和宗教狂热滋生的摇篮；这是一切来去自由的弱智者的欢乐的聚集场所。但是，新教是有教养的，因此它注定要生存下去。不仅如此，还应养活它，安置它，关怀它并在斗争中捍卫它，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需求 sine qua non[2] 来捍卫它。"

这是多么难以想象的论断！然而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则要在这种论断中寻找拯救自己的出路。实际上，关于人类的精神要求这样郑重其事地、激情昂扬地推出这种论断的社会能说是健康的吗？"您知道，新教野蛮，乌七八糟，寡廉鲜耻，狭隘，愚蠢，但是，它有教养，因而应该保护它，捍卫它！"首先，在这种事情上，在这种问题上，这是何其功利主义！这是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它的事情（如果锡德尼·多别尔确实是在关心信仰问题的话），而对这件事情的观察，反而却只是从对英国人有什么好处这个唯一的角度出发。当然，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天

---

① 锡德尼·多别尔·汤普森（1824—1874），英国诗人。《关于艺术、哲学和宗教》是诗人的遗著，出版于 1876 年。1876 年 3 月，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当时的国务活动家）曾将此书的摘录寄给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拉丁文：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教那种没有教养的故步自封和冥顽不灵相匹配的，而这位新教教徒却正是由于天主教的故步自封和冥顽不灵而诅咒它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思想家和国务思想家”有的时候讲出一些充满智慧的名言，例如：“显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信仰也是无稽之谈，但是，对愚昧的老百姓来说宗教却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宗教就无法驾驭老百姓。”① 锡德尼·多别尔的那些话难道不是很像这些思想家的话吗？区别仅仅是，在那位有国务头脑的人物的说法中基本上是冷漠的和残酷无情的堕落，而锡德尼·多别尔却是人类的朋友，他操心的只是人类的直接好处。正因如此，他关于益处的见解才是可贵的：请看，全部益处就在于，对于任何论断、任何结论的大门都是完全敞开的；无论是进入头脑还是进入心灵都是 entree et sortie libres；没有任何封锁，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终点：随意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游泳吧，自己拯救自己吧。其实，议论是海阔天空的，广阔得如同无边的海洋，当然，“在波涛中什么也看不见”；正因如此，议论是有民族性的。噢，这是很大的真诚，不过，事实上这种真诚好像近乎绝望。在这里就连思维方式也有其特点，这些人在自己家里想什么，写什么，关心什么，都有其特点。比如说，我们的政论家在自己家里会去写、去关心那种虚幻的事情，并且把它们看得那样重要吗？因此可以说，与所有那些英国人相比，我们俄国人的见解要实在得多，深刻得多，明智得多。但是，英国人既不以自己的信念为耻，也不由于我们对他们的看法而感到羞愧；在他们的高度真诚里面有时甚至含有某种深切感人的东西。例如，一位特别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表达的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关于宗教意义的观点。

注意欧洲这些事情的观察家对我讲过英国某些彻底无神论的学说和见解的特点："您进入教堂看看，庄严的仪式，贵重的法衣、香炉，肃穆，寂静，祈祷者的虔诚，朗诵圣经，人们都走进去，噙着泪花和爱去吻这本神圣的书。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教堂，无神论者的教堂。祈祷的人全都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进入这座教堂的必须的信条、必须的条件就是无神论。他们为什么要吻圣经，为什么虔诚地听诵经，并且还为之落泪呢？这是因为他们推倒上帝之后，他们崇拜'人类'，他们现在信仰人类，他们将人类视若神明，对人类顶礼膜拜。对人类来说，在多少世纪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比这本神圣的书更可贵？人们现在崇拜这本书是因为它对人类的爱，因为人类对它的爱。这本书在多少世纪里施恩于人类，它像太阳为人类带来光芒，把力量和生命洒向人间；'现在这本书虽然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但是由于它热爱并且造福于人类，人们不能够忘恩负义，忘记它给予人类的好处……"

这里面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东西，很多热情洋溢的东西。这确实是把人神化了，这是热切要求表现自己的爱；但这些无神论者又是多么渴望祈祷和膜拜，多么迫切需要上帝和信仰，同时这里又有多少绝望，多少苦闷，多少沮丧，它们取代了洋溢着青春、力量和希望的充满活力的光辉灿烂的生活！但这究竟是沮丧还是未来的新生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问题。我想从我不久前写的小说《少年》中摘录一段话。关于这种"无神论者的教堂"我是在最近才知道的，在我的小说写成并出版之后很久才知道的。我的那段话谈的也是无神论，但那只不过是当代俄罗斯人里面一个人的幻想，这些俄罗斯人在 19 世纪 40 年代曾经是进步地主，激进的和善良的，同时在实践中又过着最具俄罗斯气魄的豪放生活的幻想家。这位地主本人也没

有任何信仰，也是把人敬若神明，“同俄罗斯进步人士一样”。当任何关于上帝的思想在他的身上都已不存在的时候，他说出自己关于未来人类的幻想，他认为，这个未来的人类毫无疑问必将在全世界出现。

他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道：“我的亲爱的，我在想象，厮杀已经结束，搏斗也已经终止。在相互诅咒、污言秽语的中伤和诋毁之后该是风平浪静了。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留下来的只有他们自己了。先前的伟大思想遗弃了他们；先前一直在哺育和温暖他们的巨大的力量源泉，就像克劳德·洛伦那幅画里[①] 壮丽而迷人的太阳陨落了，这已经像是人类的末日。这时人们猛然省悟了，留下来的唯有他们自己了，于是立刻就感到极度孤单。我亲爱的孩子，我从来就不能想象人们会知恩不报，会变得愚钝。那些变成孤儿似的人们会立即紧密地亲热地拥抱到一起；一旦明白了现在他们自己就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就会携起手来。关于不朽的伟大思想将要消逝，这就不得不用什么来取代它。从前对不朽所持的全部深厚伟大的爱都将转化为对大自然、对世界、对人和对一草一木的爱。他们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是短暂的，有终结的，就愈加强烈地热爱大地和生命，这已经不是先前那种爱，而是特殊的爱。他们会觉察和发现从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那些大自然现象和秘密，因为他们是以新的眼光，以情人观察心爱的女人的目光观察大自然。他们刚

① 关于《少年》中“克劳德·洛伦那幅画里”这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漏引，此处补上。按：克劳德·洛伦（1600—1682），法国风景画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这里指的是他的《海景·阿喀斯和伽兰忒亚》（1657），收藏于德累斯顿。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数次参观洛伦的风景画，称它们为“黄金时代”。

一醒来就急忙地互相亲吻，迫不及待地相互关爱，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日子不多，留给他们的时间就是这些了。他们做的事都是我为你，你为我，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大家，只有这样才会感到幸福。每一个儿童都知道，并且感受到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跟他们的亲生父母一样。‘每一个人眼望着落日的时候都会这样想：就算是我的末日降临啦，明天我将死去，那也不要紧，所有其余那些人还都活在世上，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后代。’一个人死后别的人还存在，并且依旧是那样彼此相亲相爱，关怀备至。人有了这样的思想也就不再向往来世的相会了。啊，为了扑灭自己心中深沉的忧伤，他们要时时刻刻地互相关爱。为自己他们豪迈而无畏，彼此相处他们则谨言慎行，每一个人都会为别人的生活和幸福而兢兢业业。他们之间的关怀无微不至，不会像现在这样为此而感到羞怯。他们会像孩子一般使对方欢心。他们相遇时将以充满深情的、理解的目光望着对方，目光中流露出热爱和愁情……”①

① 这段引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第3部第7章第3节小说主人公之一安德烈·韦尔西洛夫同阿尔卡季说的话。引文与小说中的原文稍有出入。

## 雷德斯托克勋爵[①]

### (《作家日记》，1876年，3月号，第2章，Ⅱ)

那么就顺便谈谈这些教派吧。据说，雷德斯托克勋爵目前正在我们彼得堡，他就是那个三年前在我们这里布道一个冬季、当时还创立了一个什么新教派的人。那时我也偶然在一处客厅里听过他讲道，我还记得，我没有感到他的话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他讲得既不很吸引人，也不很枯燥。然而他却在人们的心灵里制造了奇迹，人们都被他吸引住了；很多人受到震撼：人们寻找贫穷的人，以便尽快为他们做好事，甚至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散发给他们。不过，只有在我们俄罗斯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在外国他似乎并不引人注目。其实很难说他的全部迷人的力量就在于他是勋爵，是独立的人，他传播的，这么说吧，是"纯洁的"、老爷的信仰。的确，所有的传教士宗派分子们总是在摧毁宗教树立的信仰形象，树立自己宣扬的形象，即使他们不是有意这样做。雷德斯托克勋爵的真正的成功的唯一原因是"我们的与世隔绝"，是我们脱离根基，脱离民族。

---

① G. 雷德斯托克（1813—1913），在彼得堡布道的英国勋爵。雷德斯托克教派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教派福音派基督教的名称，由布道者G. 雷德斯托克而得名。雷德斯托克于1874年和1876年两次到俄国布道，他的学说是，人有原罪，只有信仰救世主耶稣才能赎罪，得到宽恕。要坚信基督，进行忏悔，遵循信仰去行善。他在彼得堡的贵族社会中有很大影响。雷德斯托克在俄国的追随者形成"帕什科夫派"。帕什科夫是俄国退役近卫军上校，是俄国的雷德斯托克信徒的主要领导者，因此，这个派别在俄国就称为"帕什科夫派"。

原来，我们也就是我们社会里的知识界，现在已经全然是某种另外的人群，非常渺小，非常微不足道，但却已有自己的习俗和自己的偏见的人群，并且认为这种习俗和偏见就是独特性，看来现在还要建立自己独具的信仰。实际上很难说勋爵的学说是什么。他是一名英国人，但是，据说他不参与英国的教会，并且与之断绝关系，而传布自己本人的学说。这在英国是很容易的，在英国以及在美国，教派可能比在我们这里的"愚昧人民"里面还要多。跳跃、震颤、抽搐诸教派和期待千年王国的贵格会①，最后还有鞭身派②（世界性的，也是最古老的教派），所有这一切数不胜数。我在谈论这些教派的时候，把它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罗列的教派在他看来是有着祈祷仪式上的共性的，它们以跳跃、蹦跳、旋转、舞蹈、抽搐等类似的动作，在不断加速的节奏中直至精疲力竭，由此表示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跳跃"教派是1820年间在俄罗斯彼得堡省的农民中间出现的。在某些英国的教派里，跳跃也包含在祈祷仪式中。在俄国还有"颤抖"教派，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或许是在18世纪英国产生、此后在美国广泛传播的"颤抖"教派（shankers或shake），关于其美国的分支在1875—1876年俄国报刊上曾有过一系列报道。抽搐派——法国的丹森教派，18世纪曾经存在过。基督教中的贵格会教派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其名称来源不一。一说在早期宗教聚会中常有教徒浑身颤抖；一说是因创始人福克斯劝人，在神说话前，应震惊颤抖，故有此名称。贵格会也称公谊派。贵格为quaker的音译（英文quaker由quake一词而来，意即发抖）。所谓千年的"地上天国"说，是认为只有在"基督二次降世"和世界末日到来才能建立"地上王国"。不同时代的不同教派都赞成这一学说；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1830年美国出现的адентисе（adentist）教派。

② 从俄罗斯正教会分离出来的精神基督教的一支，产生于18世纪。教徒常在狂热跳动中使自己达到神智入幻的地步，认为这样便可与"圣灵"结合一起，成为基督的化身。但此教主要分布在俄国及其周边地区，而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说的是"世界性"的。

们与雷德斯托克勋爵相提并论，毫无嘲笑的用意，但是，一个人如果脱离真正的教会去策划出自己的教会，即便看上去是庄严的教会，其结局也必然与这些教派一样。请勋爵的崇拜者们先不要皱眉头，这些教派、这些震颤派和鞭身派的哲学基础有时是非常深刻有力的思想。据传说，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在塔塔琳诺娃的米哈依洛夫斯基庄园里①，她和她的客人们——如当时的一位部长等人，都同农奴出身的仆人在一块儿旋转，在一块儿预言。如果信徒们能形成这种“不自然的”结合，可见是存在一股思想力量和一种冲动，塔塔琳诺娃的教派看来也是鞭身教或者是鞭身教无数派别中的一派。在有关雷德斯托克勋爵的传说中我没有听说过在他那里也有一群人，也都在做种种预言（旋转动作和预言，这几乎是西方的和我们的各种教派，至少是极大多数教派都具有的、必不可少的和十分古老的标志。圣殿骑士也做旋转动作，也做种种预言，也是鞭身教，并因此被烧死，而后来在第一次革命之前受到法国思想家和诗人的称赞和颂扬）；我只是听说，雷德斯托克勋爵似乎特别注重讲“降恩”，照一位谈论勋爵的人的说法，似乎“基督就在勋爵的衣袋里”②，就是说，他极其轻浮地对待基督和恩赐。至于说有些人躺在枕头上，等待来自上界的什么灵感，我承认，我没有理解人们所说的这一切。雷德斯托克勋爵确实要到莫斯科去吗？希望这一次我们宗教界的任何人对他的说教都不

① 叶卡捷琳娜·菲里波芙娜·塔塔里诺芙娜（娘家姓为布克斯格夫登，1783—1856）在 1810 年创立了“宗教联盟”，它与鞭身派和阉割派相近，1825 年在彼得堡近郊创立了教徒营。1837 年尼古拉一世下令关闭了教徒营，并把塔塔里诺芙娜送入修道院。

② 雷德斯托克的衣服口袋里总是装着圣经，因此人们戏弄他说：“基督在口袋里。”

要随声附和了。即使这样，他也仍然会引发强烈的反响，在追随者的心中唤起仁厚的感情。其实，也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如果确实是真诚的，是在宣扬新的信仰，那么当然他就会充满教派奠基人的全部精神和热情。我重说一遍，这里表现出我们可悲的相互隔绝，我们对人民的不理解，我们与民族精神的分裂，而最主要的是对东正教的肤浅的、点点滴滴的理解。非常好的是，关于雷德斯托克勋爵，我们的报刊，除少数之外，几乎片言都没有提及。

# 谈谈学术委员会关于招魂术现象的总结

（《作家日记》，1876 年，3 月号，第 2 章，Ⅲ）

招魂术信徒是“标新立异”吗？我想是的。我认为，我们这里新出现的招魂术在将来会产生极其危险和有害的“标新立异”。“标新立异”其实就是分裂；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年轻的招魂术里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促使俄罗斯人本已日益强烈、日益加深的分裂走向极端。有的时候我读到我们某些思想家写的东西时，感到极其荒唐和懊恼，他们说，我们的社会在沉睡，它昏昏沉沉，没精打采，漠视一切；其实，完全相反，我们的社会从来也没有表现过这么强烈的不安，这么大的摇摆不定，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追求在道德上能够寄托的东西。每一种思想，即使是最浅薄的思想，只要人们感到其中有一丁点儿能够解决什么问题的希望，它就无疑有希望取得成功。这种成功总是体现为某个新的群体的“标新立异”。招魂术也是如此。我终于在《呼声报》上读到人们议论纷纷的那个著名委员会关于招魂术现象的报告时，我太失望了，委员会在阿·阿克萨科夫先生家里对这个现象已经观察了一个冬季。我一直在等待，在盼望这个报告能抨击并击溃这个有害的（就它的神秘性意义而谈）新学说。不错，在我们这里任何学说还都没有被发现，目前只是在进行一些“观察”；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很遗憾，在目前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更详细地陈述我的思想；不过，在下一期，也就是我的 4 月号的《日记》里，可能我要再谈谈招魂术信徒的问题。也许我没有必要

指责委员会的报告：因为，我对委员会寄予那么大的希望，并且期望从它那里得到也许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是它永远不可能给予的东西，显然这不是委员会的过错。但是，至少报告的叙述和措词是有毛病的。由于这种叙述的性质，报告的反对者们从中肯定能够找到“先入为主”的态度（可见是很不科学的态度），虽然委员会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成见”，以致我们可以为此而指责它。（成见是有一点儿的，在我们这里一点儿成见都没有是绝对做不到的。）然而措词有缺陷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委员会自己承认，它对自己根本就没有观察过的招魂术的一些现象（如精神的物化）下了结论。可以想象，委员会在这些现象出现之前就这样做，可以说是为了劝谕，出于劝谕和警告的考虑，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使思想轻浮的人免受诱惑。这种思想是高尚的，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未必恰当。不过，有什么办法呢，难道由那么多有学问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本身能够真正希望在一开始就把荒唐的思想扑灭吗？唉，委员会即使提出最明显的、确凿的“作假”的证据，即便是据实捉住、揭露了“欺骗者”，就是说当场捉住了他们（不过，这是绝对没有发生的事），即便是这样，在迷恋上招魂术的人们当中，甚至是只不过想玩一玩的人们当中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委员会，这是人类本性亘古不变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在神秘性的思想里面，就算是数学般的最精确的论据也毫无作用。而在这里，在我们这里刚刚出现的招魂术，我敢发誓说，最主要的就是神秘性的思想，可是您对它又有什么办法呢？信仰和数学般精确的证据——这是两件互不相容的事情。情愿相信的人您是阻止不住的，何况这里的证据远非数学那样精确。

虽然如此，报告仍然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对一切还没有被骗上当的人和目前尚对招魂术持冷漠态度的人来说，毫无疑

问，报告是有益处的。而现在，在“情愿相信”的情况下，这种愿望可能就获得了一件新的武器。再就是报告的过于轻蔑、傲慢的语气本来可以缓和一些；的确，在阅读报告时可以想象得到，在观察期间可尊敬的双方由于某种原因彼此发生过争吵。这对群众所起的作用是不利于“报告”的。

## 一些个别现象

### （《作家日记》，1876 年，3 月号，第 2 章，Ⅳ）

但是还有相当有意思的另外一类现象，特别是在青年中间。的确，当前这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在谈论某些“到民间去”的不幸的年轻人的同时，关于全然是另外一类年轻人的议论也开始了。这些年轻人也是心神不定，给您写信或者是怀着自己的困惑，带着文章和突如其来的想法登门拜访您，但他们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我们在青年中已经习惯看到的那些人。因此，有理由设想，在我们的青年中出现了某种运动，与从前截然相反的运动。也许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实际上，他们是什么人的子女？他们就是那些“自由派”父辈的子女。那些父辈在俄罗斯复兴之初，在当今皇帝当政的时代一哄而起，全都脱离了公共事业，以为这就是进步，就是自由主义。其实，这一切多少都已是过去的了，那个时候，真诚的自由派分子有很多吗？真正痛心疾首的、纯洁的和真诚的人，如像不久之前已故的别林斯基（关于他的智慧就不说了）那种人有很多吗？恰恰相反，大多数人不过只是一群渺小的无神论者、极端无耻之徒，实质上是一群贪得无厌者和“浅薄的暴君”，是夸夸其谈的自由主义的人，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就是有权干卑鄙勾当。那个时候什么样的话没有说过，什么样的决心没有下过，卑鄙下流常常被奉为高尚正直。实际上这是一些市井小人，正直的思想沦为街谈巷议。当时正值农民解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我们知识分子社会在一切可能的意义上的瓦解和“隔绝”。人们都彼此互不相识了，自由派分子也不

认识自己的自由派分子了。后来发生了多少可悲的误解和沉痛的失望！无耻之极的反动分子有时突然作为进步人士和领导者钻到前台，居然还成功了。当时的很多子女在自己的父辈身上能看到什么呢？他们的童年和少年能够给他们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回忆呢？这就是犬儒主义，嘲弄和无情摧残儿童早期的脆弱的神圣信念；还有就是父母的常常不加掩饰的堕落，并且还劝诫和教诲说本应如此，这才是真正“清醒的”态度。再加上很多人家业衰落，因而产生焦虑不满，以及纯粹为了掩饰由于事业失败而产生的自私的、卑微的愤恨而讲的大话。噢，青年人终于能够辨别、认识这一切了！由于青年人纯洁、明朗、豁达，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青年人不愿意追随这样的父辈，否定了他们“清醒的”教导。可见，那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后果，至少是在某些人的身上。所以，可能就是这些青少年现在要寻找新的道路，开始公然抗拒他们童年时期在自己可怜的双亲巢穴中接触的可憎的思想。

## 空虚而停滞的生活理想。贪婪者和吸血鬼。推动着俄罗斯的上层先生们

(《作家日记》，1876 年，4 月号，第 1 章，Ⅰ)

今年 3 月号的《俄国导报》上刊登了阿先生即阿夫谢延科[1] 先生“批评”我的文章。回答阿夫谢延科先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很难想象一位不理解他自己所写的东西的作家。不过，他即使是理解了，其结果也会一样。他在文章中所写的涉及到我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有文化的人们应该拜倒在人民的面前，因为“人民的理想实质上主要是空虚的、停滞的生活理想”，恰恰相反，人民应该接受我们有文化的人们的教化，接受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面貌。总之，阿夫谢延科先生非常厌恶我在 2 月号的《日记》中写的那些关于人民的话。我认为，这完全是由于我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含混不清所致。含混不清就需要解释清楚，然而回答阿夫谢延科先生简直是不可能的。同一个突然用下面这些话来议论人民的人，你能找到什么共同点呢？例如，他说：

俄罗斯的独立、俄罗斯的力量及其肩负历史使命的能力建立在他的双肩之上（即人民的双肩之上），建立在他的容忍和自我牺牲、

---

① 瓦·格·阿夫谢延科（1842—1913），俄国作家，1860—1861 年曾为民主派刊物《俄国言论》撰稿，19 世纪 70 年代则在米·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攻击进步文学。

他的顽强力量、执著的信仰和不计私利的豁达胸怀之上。他为我们保留了基督教理想的纯洁高尚的和渊源于自己的伟大的温顺的英雄主义，还有斯拉夫天性中那些美好品格，这一切曾在普希金诗歌的高昂歌声中表现出来，此后将会成为经久灌溉着我们文学的长流不息的源泉……

请看，刚刚写了这些话（是从斯拉夫派那里抄来的话），可是在另一页上阿夫谢延科先生关于俄罗斯人民讲的则是完全相反的话：

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人民没有给予我们有积极个性的理想。我们在人民身上发现的美德，我们的文学教导我们热爱的人民美德（这是我们的文学值得赞扬之处），总之，我们人民的全部美德都还仅仅处于自发存在的水平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和安闲的（?）生活或者是消极生活的阶段上。人民里面如果出现积极的、朝气蓬勃的个性，个性的大部分魅力也要丧失掉，因为这种个性常常是以吸血鬼、贪婪者和独断专行者这些令人厌恶的面目出现的。在人民里面至今还没有积极的理想，期待这种理想——就等于寄希望于未知的、也可能是臆想的因素。

在前面的一页上刚刚说过那些话之后，立刻就说出这些话来，在前面那一页上说的是"俄罗斯的独立建立在人民的双肩之上，建立在他的容忍和自我牺牲、他的顽强力量、执著的信仰和不计私利的豁达胸怀之上!"不过要知道，为了表现出顽强的力量，只是消极是不成的！为了创建俄罗斯，是不能不表现出力量的！为了表现出不计私利的豁达胸怀，就必须为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为共同的、兄弟般的利益而表现出慷慨的积极

的活动。为了“以自己的双肩支撑起”俄罗斯的独立，决不能消极地坐在原地不动，至少也一定要站立起来，向前走出一步；至少要稍稍做点事情，而阿夫谢延科在这里立刻就补充说，人民只要一着手做事，就会即刻“呈现出吸血鬼、贪婪者和独断专行的人的这些令人厌恶的面目”。这样说来，竟是贪婪者、吸血鬼和独断专行的人用双肩支撑了俄罗斯。这就是说，所有我们那些神圣的大主教们（人民的保护者和俄罗斯土地的建设者）、所有我们的虔诚的大公们、大贵族们和平民们，就是那些为俄罗斯效力，直至献出生命的人们，历史怀着深深的敬意记住了他们的名字的那些人，——原来全是一些吸血鬼、贪婪者和独断专行的人们！可能，人们会说，阿夫谢延科说的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而是现在的人们，——历史就是历史，那些都是年代很久远的事情了。但是，按照这种说法，岂非等于说我们的人民蜕化了？那么阿夫谢延科所说的又是什么样的现代的人民呢？从什么时代算起呢？从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从文明时期算起？从彻底被奴役的时代开始？不过，这样的话，有教化的阿夫谢延科先生就暴露了自己，那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他说：教化您真值得，得到的代价是腐蚀人民，把人民变成清一色的贪婪者和骗子。阿夫谢延科先生，您的“光看坏处的本领”① 竟如此高明吗？我们的人民正是为了让你们得到文化（至少是根据法捷耶夫将军的学说②）而被奴役的，而他在受了二百年的奴役之后，从你们、从得到文化的人这里难道不仅得不到感谢，甚至也没有怜悯，而仅仅是居高临下的

---

①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猪》。

② 罗·安·法捷耶夫（1824—1883），俄国退职的将军、保守贵族阵营的政论家，1874 年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一组文章（当年出了单行本）。

蔑视，说他是贪婪者和骗子。（至于您在前面说的那些好话，是不能算数的，因为在另一页上您就把那些话一笔勾销了。）为了你们，他在二百年间里被束缚住手脚，为的是让你们获得欧洲的智慧，而当你们获得欧洲的智慧时，你们却居然神气十足地站在被束缚的人民的面前，从文化的高度观察人民，突然间说人民“不好，消极，很少表现出活力（这是说被束缚的人民），仅仅表现出某些消极的美德，这些美德虽然也以富有生命力的汁液滋补了文学，但实际上却是一文不值，因为人民稍一开始行动，他就立刻成为贪婪者和骗子。”不，本来不该回答阿夫谢延科先生，如果我要回答，那也只是为了承认自己的失策，对此，我在下面将要做出说明。尽管如此，由于已经发表了意见，我认为有必要让读者对阿夫谢延科先生有一些了解。他是那种稍具教养的作家类型，对他的观察是很有趣的，然而，糟糕的是，这种类型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 文明的楷模。受伤害的人们

（《作家日记》，1876 年，4 月号，第 1 章，Ⅱ）

阿夫谢延科先生很早就在写评论[①]，已经有几年了，我的过错是始终对他抱有某种期望："会写出来的，我在想，迟早要说出有分量的话来。"其实，我对他了解得太少了。我的迷误一直持续到 1874 年 10 月号的《俄国导报》杂志出刊的时候，在这一期的杂志上，阿夫谢延科先生关于皮谢姆斯基[②]的戏剧突然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果戈理强使我们的作家过分轻率地对待作品里面的内容，又过多地仅仅仰仗一个艺术性。在我们 19 世纪 40 年代的文学中有很多的人对小说的任务持有这种见解，这种文学的中心内容之所以贫乏，部分原因也就在这里（！）"。

这是说 19 世纪 40 年代的文学的中心内容贫乏！我这一生中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奇谈怪论。这里说的是这样的一种文学，它给了我们果戈理全集和他的喜剧《婚事》（唉！这是内容贫乏的喜剧），后来又给了我们他的《死魂灵》（内容贫乏的作品，这是他要说的第一句话，这个人要是说点别的什么话，

---

① 阿夫谢延科写过批评《群魔》和《少年》的文章，曾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烈不满，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此认为阿夫谢延科不理解俄国文学。

②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和剧作。

那就一切都好了）。继之又献出屠格涅夫及其《猎人笔记》（这也是中心内容贫乏之作吗?），还有冈察洛夫这位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写出《奥勃洛莫夫》的作家，当时发表的此书的优秀章节《奥勃洛莫夫之梦》博得了全俄罗斯的赞叹！这就是后来又给了我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学，然而阿夫谢延科在自己的文章中正是极其轻蔑地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典型大放厥词：

> 由于外在的原因，看来官吏们的社会不完全适宜于戏剧讽刺：于是我们的喜剧就更加执著地、全神贯注地把目光投向莫斯科河南岸和阿波拉克欣区商人阶层的社会，投向朝圣者、媒婆、酗酒小官吏、地主庄园管事、下层教士以及在彼得堡混生活者等人的社会。喜剧的任务就莫名其妙地缩小为摹拟醉汉或者文盲的行话，再现野蛮的斗殴和粗暴的、有损人的情感的典型和性格。占据了舞台的是清一色的粗鲁、龌龊、令人厌恶的戏剧，而不是法国舞台上那种有时令人陶醉的、热情、欢快的资产者（?）的戏剧。（这就是所谓的轻松喜剧：一个人钻到桌子底下，另一个人则抓住他的脚把他拖出来?①）有一些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这样的作家们向这种文学奉献了很多才能、心血和幽默，然而总的说来，我们的戏剧的内在水平却急剧下降了，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的戏剧对社会中有教养的那部分人*无话可说*，而戏剧与社会中这一部分人就毫不相干了。

① 引自果戈理的评论《剧院散场之后》，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原文为“……您只要到剧院去走一走，每一天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戏：一个人藏到椅子底下，另一个人则抓住脚把他拖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9世纪中期法国戏剧持否定态度，阿夫谢延科则相反。

这就是说，奥斯特洛夫斯基降低了戏剧的水平，奥斯特洛夫斯基对社会中那部分“有教养的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因此，原来是没有教养的社会在戏院里赞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并且对他的作品读得入迷？请看，从前有教养的社会是到米哈依洛夫斯基剧院去看戏，那里有“法国舞台上那种有时令人陶醉的、热情的、欢快的资产者的戏剧”。[1] 而柳比姆·托尔佐夫[2] 则是“粗鲁、龌龊”的。令人感兴趣而想要知道的是，阿夫谢延科先生所说的有教养的社会指的是什么人？污浊不在柳比姆·托尔佐夫的身上，“他的心灵是纯洁的”，污浊可能正是在“法国舞台上那种有时令人陶醉的、热情的资产者的戏剧”占统治的地方。艺术性排挤掉中心内容，这是什么意思？恰恰相反，正是艺术性使内容臻于高度完美：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中虽然有其特色，但却软弱无力。在《死魂灵》里面，当果戈理不是作为艺术家，而是以自己的身份直接发表议论的那些地方，他写得真是苍白无力，甚至是毫无特色，而他的《婚事》、《死魂灵》和其他作品——都是最深刻、内容最丰富的作品，这一切恰恰是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达到的。可以说，这些描写以极其深刻、难以承受的问题使心灵感到沉重难受，唤起俄罗斯的才智之士极其焦虑不安的思想，这些思想显然远非目前所能解决的；不过，在将来某个时候就能够解决吗？阿夫谢延科先生却大声疾呼说，《死魂灵》没有中心的内

---

① 米哈依洛夫斯基剧院即现在的彼得堡国立歌剧与芭蕾舞模范剧院，建于1833年，当时经常有外国剧团在该院演出，19世纪70年代末起法国剧团在这里上演巴黎的新剧目。观众主要是彼得堡上层社会的人与外国人。

②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贫非罪》（1854）中的人物。

容！再看看《智慧的痛苦》[1] 吧，它之所以成为一部力作，完全是靠了自己的鲜明的艺术典型与性格，只有艺术劳动才赋予了这部作品全部的中心内容；只要格里鲍耶陀夫稍一离开艺术家的角色，开始以自己的身份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剧中最苍白的人物恰茨基[2] 之口），他立刻就降落到十分平庸的水平，远远低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当时代表人物的水平。恰茨基的道德说教的水平比喜剧本身要低得多，有的说教纯系废话。艺术作品的全部深度及其全部内容，看来完全在于它的人物典型与性格。可以说，几乎永远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明白，他是在同什么样的批评家打交道，我已经到处都听到这样的质问：那么您为什么还在跟他纠缠？我再重说一次，我仅仅是想要说明自己的过失，在这个时刻我之所以注意阿夫谢延科先生，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不是把他看做批评家，而是把他看做一种个别的、有意思的文学现象，这是对我有益的一种人。我很长时间都不理解阿夫谢延科先生，我指的是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我从来也没有理解过，其实对他的文章没有什么理解或不理解的问题，从 1874 年 10 月号的《俄国导报》上的那篇文章起，我就干脆不想去理解它了，虽然我一直深感莫名其妙：这样一位自相矛盾的作家的文章怎么竟能够出现在《俄国导报》这种严肃的杂志上呢？然而，突然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使我突然理解了阿夫谢延科先生：在初冬时节他忽然开始发表自己的小说

① 又译《聪明误》(1822—1824)，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

② 《智慧的痛苦》的主人公。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贬低他是不公正的，原因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不喜欢的“西欧派”的影子。

《银河》。(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篇小说又停止刊登了!）这篇小说使我看清了阿夫谢延科这位作家的整个面貌。其实，由我来谈论这篇小说是不合适的：因为我自己是小说家，我不便评论同行。因此，我不打算对小说做任何评论，何况小说还给了我几分钟真正的愉快。例如，年轻主人公公爵在包厢里观看歌剧时，被音乐感动得在大庭广众面前啜泣不止，而上层社会一位贵妇人则深表同情地喋喋不休："您在哭泣吗？您在哭泣吗？"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在这里，而在于我从小说中认清了这位作家的本质。阿夫谢延科先生作为作家，他表明自己是一位对上层社会崇拜到失去理智的活动家。简单地说就是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崇拜上层社会的手套、马车、香水、香脂、丝绸衣裙（特别是当贵妇人往椅子上落座时，衣裙在腿上和腰间发出的窸窣声），最后还崇拜那些迎接看完意大利歌剧回家的太太的奴仆。他无休无止，毕恭毕敬，像作祷告似的写一切，总之，似乎在举行什么宗教仪式。我听说（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在嘲笑他），这部小说之所以被发表出来，是为了纠正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上层社会那种过分客观的态度①，本来对上层社会是应该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的。我还要再说一遍，如果说不是清晰地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当然，那也就根本用不着谈论这一切。原来，在评论家阿夫谢延科看来，马车、口红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奴仆如何迎接太太这类事情，这就是文明的全部使命，文明要达到的全部目的，这就是我们二百年间堕落和苦难的历程的全部结果，阿夫谢延科对此毫无嘲讽之意，而是加以欣赏。这种严肃、真挚的

---

① 这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斯特拉霍夫那里听到的。后者在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谈到此事。

赞赏是十分有趣的现象之一。主要的问题是，阿夫谢延科先生作为作家，并非绝无仅有；在他之前就有“穿着细白布胸衣的毫不留情的尤维纳利斯们”①，但他们从未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即使说，他们并非全是那种人，然而我的不幸也正在这里，我终于渐渐地明白了，在文学中和在生活中这样的文明代表人物实在太多了，虽然他们不是严格的和纯粹的典型人物。我承认，我似乎豁然开朗了：从此之后，诋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言论和“法国舞台上那种有时令人陶醉的、热情的、欢快的资产者的戏剧”当然就都可以理解了。哎，这里根本不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果戈理，也不是19世纪40年代（太需要他们了!），这里需要的就是一个彼得堡米哈依洛夫斯基剧院，上层社会乘坐轿式马车光顾的戏院，这就是全部原因，就是这一切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了、俘获了作家，使他眼花缭乱，神魂颠倒。我再说一遍，不应该只是从可笑的角度看待这件事，一切都不可等闲视之。在这里，总的说来，很多事情都出自一种特殊的癖好，可以说，几乎是一种病态的、但却可以原谅的弱点。比如说，上层社会的马车向剧院驶去：您只要看一看，马车是在怎样行走，穿过车窗射进路边的灯光如何使坐在车里的贵妇人兴高采烈：这已经不是在用笔写，这是在祈祷，对此应该给予同情!②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人民的面前似

① 引自俄国诗人尼·费·谢尔比纳（1821—1869）的《“新诗人”的风貌·诗体小品》一诗。“新诗人”是俄国作家伊·伊·巴纳耶夫（1812—1862）的化名，他在很多作品中对俄国贵族社会进行讽刺。尤维纳利斯（约60—127），古罗马讽刺诗人，他被誉为“辛辣讽刺作品”的经典作家，用富于哲理的笔触抨击时政，讽刺从最低层到宫廷大臣的整个罗马社会。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马车的这段话所指的是阿夫谢延科在小说《银河》中描写马车与车中贵妇人的场面。

乎以手套的贵重为荣，在他们里面甚至有大量的人是自由主义者，几乎是共和派分子，然而有时也突然显得像个手套商人。这种弱点，对上层社会及其牡蛎和舞会上价值一百卢布的西瓜等种种雍容华贵的这种痴心向往，这种心神向往，无论它怎样天真无邪，它都要在我们这里，比如说，在那些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农奴的人们之间造就独特的农奴主；他们既然认为马车和米哈依洛夫斯基剧院是俄国历史上的文明时期的成就，他们就立刻成为不折不扣的信念上的农奴主，纵然他们根本没有打算重新奴役农民，但他们起码是毫无掩饰地蔑视人民，并且摆出一副握有最充分的文明权利的架势。于是他们对人民投过来种种耸人听闻的责难：嘲弄在二百年间被束缚着手脚的人民过于消极，指责遭受租役掠夺的穷苦人十分肮脏，责备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不懂科学，申斥在棍棒下成长起来的人性情粗暴，有时竟然责怪他不到大海洋街[①] 理发店去涂脂抹粉，梳妆打扮。这样说，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确实是这样，全部问题也正在于这不是夸张。他们对人民的厌恶是根深蒂固的，如果说他们有时也赞美人民，那是出于政治需要，他们只不过是编织一些漂亮的词句，仅仅是为了装装门面，他们自己并不明白那些话的意义，因而在写了几行之后自己竟跟自己前后矛盾起来。说到这里，我顺便想起了两年半前我遇到的一件事情。我在乘火车去莫斯科时，夜间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地主闲聊起来。在黑暗中，我影影绰绰看出来，这个人身材消瘦，五十岁上下，鼻子红肿，双腿似乎有病。从气派、言谈和议论看，他是一位举止十分端庄的人，言谈有条不紊。他谈到贵族的既严峻又不明朗的处境，谈到全俄罗斯经济的惊人混乱，他语气平和，但

① 现名赫尔岑街，当时在彼得堡贵族住宅区内。

对事情的观点却是严峻的，他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没有料到：突然间，他似乎毫不在意脱口而出地说，他认为自己在体力上也远远胜过庄稼汉，当然他以为这是无可争辩的。

“这就是说，您说的是，您属于在道德方面高尚的有教养的人？”我试着解释说。

“不，完全不是，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方面，我的天生体质就比庄稼汉强；我的肉体就比庄稼汉又壮又健，这是由于历年来我们祖祖辈辈都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上等人。”

无须争辩：这个瘦弱的、长着一个患瘰疬病似的红鼻子、拖着两条病腿（可能是患了贵族病——痛风）的人，实实在在地认为自己的体质、肉体比庄稼汉更壮，更好！我再说一遍，他说的话里没有一丁点儿愤恨情绪，但是您看得出来，这个没有恶意的人，即使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突然间讲出关于人民的极不公正的话来，是毫无恶意地、平心静气地、严肃认真地讲出来的，这纯粹是出于蔑视人民的观点，这几乎是意识不到的观点，几乎是不取决于他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也必须更正我自己的过失。我曾经写过关于人民的理想的话，写过我们应该像回头的浪子，在人民的真理面前低下头来，我们应该接受的只是人民真理的思想和形象。但是，另一方面，人民也要采纳我们带来的某些东西，这里所说的某些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有形象，有形式，有重量，反之，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样做，那就只好各走各的路，我们都将各自毁灭。现在我看到的是，似乎所有的人对这些话都觉得不明确。首先，人们要问：应该向其低头的那些人民的理想是什么；其次，我们所说的那种我们自己

带来的、人民应该 Sine qua non[①] 从我们这里接受的珍贵的东西指的是什么？最后，只凭我们是欧洲，是有教养的人们，而人民只不过是俄罗斯，是消极的，只凭这一点就说，不是我们，而是人民应该向我们低下头来，这样岂不是更简单些吗？阿夫谢延科先生当然是从这个意义上解决问题的，然而我现在不想仅仅回答阿夫谢延科一个人，而是想回答所有不理解我的"有教养的"人们，从"穿细白布胸衣的尤维纳利斯们"到不久之前声明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那些先生们。现在，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我当时如果不追求简短，而是解说得更详细一些，虽然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却不能曲解我，不能指责我阐述不清楚了。

① 拉丁文：必须。

## 争议焦点的自相矛盾与含混不清

### (《作家日记》，1876 年，4 月号，第 1 章，Ⅲ)

人们直截了当地向我们声明说，人民没有任何真理，真理只存在于文明之中，保留于有教养的人们组成的上层社会之中。为了充分做到严肃认真，我从文明的最高意义上理解我们这种可贵的欧洲文明，而不是仅仅理解为马车与奴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比人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更有教养，更富有人性，更富有人道精神，因而也就完全有别于人民，这是我们的荣幸。在做过上述不偏不倚的声明之后，我就可以开门见山地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自己确实是那样好，那样尽善尽美地受到文明熏陶，直至可以把人民的文明抛在一边，而向我们的文明俯首致敬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为了合情合理，我仍要排除例如一切有关科学、工业及其他的议论，这都是欧洲可以在我们祖国面前无愧地感到自豪的。排除这一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现在谈的根本不是这些问题；何况这个科学是在欧洲那边，而我们自己，也就是俄罗斯有教养的上层社会的人们，虽然上了两百年的学，可是我们在科学上还不足以大肆炫耀，为了科学而向我们、有教养的阶层膜拜，无论如何还为时过早。由此可见，科学完全不能构成俄罗斯人的两个阶级，即平民与有教养的上层的任何本质的、不可协调的差异，我再重申一次，要是认为我们与人民的主要的、本质的差异就在于科学，完全是不正确的，而且将是一个错误，应该从全然不同的方面去寻找这个差异。何况科学是人类共同的事业，科学并不是欧洲某一个民族

发明的，而是包括古代世界在内的所有民族发明的，这是继承性的事业。从自己这方面来说，俄罗斯人民从来也不是科学的敌人，不仅如此，早在彼得大帝之前科学就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早在彼得大帝一百三十年之前，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①]就竭尽全力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带。他如果把这个地区争夺到手，掌握了它的海湾和港口，他必定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建造自己的舰船，而离开科学是不可能建造舰船的，所以必然会像彼得大帝时期那样，从欧洲引进科学。我们的波图金[②]们嘲笑、侮辱我们的人民，说俄罗斯人只有一种发明，那就是茶炊，然而欧洲人未必会加入波图金们的合唱。事情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切事情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我们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发明创造之所以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人民弱智低能和可耻的懒惰。某一种树木若干年就可成材，另外一种树木则要加倍的时间才能成材。一切都取决于人民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取决于人民首先需要什么。这里有地理的、民族的、政治的原因，千百种原因，原因全都是显而易见的和确切无疑的。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责备和羞辱一名少年，只是因为他才十三岁，而不是二十五岁。有人说，“欧洲比消极的俄罗斯人更富有进取心和更聪明机智，因此，欧洲发明了科学，而俄罗斯人却没有。”但是，在欧洲那里发明科学的时候，消极的俄罗斯人却做出了毫不逊色的令人惊讶的行动：他们在创造帝国，并且自觉地完成了帝国的统一。为了推翻凶残的敌人，他们花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假如

---

① 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530—1584），即伊万·雷帝，为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发动了立窝尼亚战争（1558—1583）。

② 屠格涅夫的小说《烟》（1867）中的人物。

没有他们，这些敌人就蹿进欧洲去了。俄罗斯人开拓了自己辽阔的边疆，俄罗斯人捍卫并巩固了自己的边疆，其巩固的程度是我们、有教养的人们即使在今天也是达不到的，刚好相反，我们大概还在动摇其巩固。结果是，在经过千年之后——在我们这里形成了帝国，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治上的统一，以致英国与合众国这两个现在仅存的有着牢固的、独特的政治统一的国家，大概在政治上的统一上也较我们大为逊色。而与此相反，在欧洲，在另一种政治和地理的情况下，科学却发展起来了。然而，随着科学的成长与巩固，欧洲的道德和政治状况则几乎普遍动摇了。可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谁将羡慕谁尚未可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掌握科学的，而欧洲的政治统一将会如何，尚难预料。可能，在十五年之前德国还宁愿付出自己一半的科学荣誉换取在我们这里早已实现的那种政治统一的力量。现在德国人只是从自己的理解来看，也达到了牢固的政治统一①，但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日耳曼帝国，当然，无论他们如何蔑视我们，他们在心中还是羡慕我们的。可见，应该提出的不是关于科学，也不是关于工业的问题，问题实际上是关于我们、有教养的人们，从欧洲回到俄罗斯的时候，在道德上，实质上有什么比人民高尚之处，我们给人民带回来哪些东西作为我们的欧洲文明不可企及的宝贵财富呢？为什么说我们是纯洁的人们，而人民依然还是肮脏的人呢，为什么说我们就是一切，而人民则一文不值呢？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有教养的人们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混乱，在“有教养的”人们里面未必有谁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相反的是，各

① 德国宰相俾斯麦在1864—1867年实现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统一。

有各的说法，有关松树成材的年限为什么不是七年，而是比这多七倍的年限之类的嘲笑更是司空见惯，这类话不仅常常出自波图金们之口，而且常常出自在教养上远远高于波图金之流的人们。关于阿夫谢延科先生我就不想提了。下面我要直接谈谈上文提出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那样好，我们受到的教养是否至善至美到可以抛弃人民的文明，而向我们的文明俯首致敬呢？如果说我们真的带来了什么，那么，带来的是什么呢？对此，我要直接回答说，我们远远不如人民，而且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如人民。

人们说，在人民里面只要出现积极人物，立即就变成吸血鬼和骗子。（不只是阿夫谢延科先生一个人这样说，其实，总的说来，阿夫谢延科先生任何时候都未说过别人未说过的话。）第一，这话不对。第二，在有教养的俄罗斯人里面难道不是也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吸血鬼和骗子吗？其实大概还更多，由于他们是受过教养的人，这也就更为可耻。人民则是没有受过教养的人，不过，主要的是，关于人民根本不能说什么在人民里面只要一出现积极的人物，大多数都会变成吸血鬼和骗子。我不知道，讲这种话的人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我从童年时代起直到整个一生所看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记得，我还只有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复活节的第三天的傍晚，大约五点钟，我们全家，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围坐在圆桌旁喝茶，谈论的正是关于农村的事以及我们要怎样到农村去度过夏天。房门突然开了，在门口出现了我们家的仆人，刚刚从农村来的葛利高里·瓦西利耶夫。主人不在的时候有时就委托他管理农庄，现在突然间出现的不是那个总是身穿德国式常礼服、仪表庄重的“管事”，而是身着旧粗呢短上衣、脚穿草鞋的人。他是从农庄步行走来的，一进屋就站立在屋中间，一句话也不说。

“出什么事啦？”父亲惊恐地问道，“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

“庄园烧了！”葛利高里·瓦西利耶夫高声低沉地说。

此后的情景我就不叙述了；父亲和母亲都不是富有的人，从事劳动的人——复活节竟得到这样的礼物！原来是全烧光了，片瓦无存：住房、粮仓、牲畜棚，还有春播的种子、一部分牲畜、农民阿尔希波。头脑里浮现的第一个可怕的思想就是：彻底破产了。我们一下子全都跪到地上祈祷，母亲哭了起来。这时，我们雇用的奶妈、属于莫斯科小市民的自由人阿莲娜·弗罗洛芙娜突然走到母亲跟前。她是把我们这些孩子抚养大之后走的。那时她四十五岁上下，性格开朗、活泼，总是给我们讲那些优美的故事！她已经很多年不拿我们的钱，“我不需要”，她的工钱积蓄了五百卢布左右，全都存在当铺里，“等到老了再用”。现在她忽然对母亲嘟哝说：

“您要是用钱，就把我的钱拿去吧，我要钱做什么，我不用钱……”

我们没有用她的钱，日子也过去了。不过，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普通的女人属于哪一类人呢，现在她已经死了，死在养老院，她的钱在那里有了大用场。我认为，不能把这样的人划进吸血鬼和骗子里面去，如果不能，那么应该怎样解释她的行为呢：她和她的行为是否仅仅是“处于自发存在的水平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安闲的生活和消极生活的阶段上”①，或者说，她表现的是某种比消极性更坚毅的东西？听一听阿夫

① 引文出自《作家日记》1876年4月号第1章的《空虚而停滞的生活理想。贪婪者和吸血鬼。推动着俄罗斯的上层先生们》一文，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谢延科先生如何说明这个问题倒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人们会轻蔑地回答我说，那是个别现象；但是我一个人就能够从我自己的生活中举出我们普通人民中间的千百例这类现象，同时我确切地知道，也有另外一些不蔑视人民的观察者。你们还记得吧，在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1] 中，母亲流着眼泪恳求农民从春天薄冰上把她送过宽阔的伏尔加河，到对面的城市喀山去看望生病的孩子。已经有几天没有人敢踏上冰层了，仅仅在几十小时之前在渡口地方冰还破裂了。你们还记得关于这次过河的那段精彩描写吧，过了河之后农民们不愿意要钱，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为了流泪的母亲，为了我们的上帝才做的事。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农奴制的最黑暗的时代！难道这都是个别事件吗？如果这也值得赞美的话，——那也仅仅是“处于自发存在的水平上的东西，都是处于封闭的、安闲的生活和消极生活的阶段上的东西”吗？由于同情母亲的悲痛而不顾自己生命的果敢冒险这件事情的出现，而且是在农奴制最黑暗的时期的行为，难道不是由于人民的真理，难道不是由于仁慈和宽宏大度以及人民的豁达观点吗？你们会说，可是人民是没有信念的，他连祷词都不会念，他向木板[2] 膜拜，还嘟哝什么关于神圣的礼拜五[3]、关于弗洛尔和拉弗尔[4] 的无稽之谈。我对你们的回答是，所有这些思想之所以出现在你们中间是出于对俄罗斯

---

① 谢·季·阿克萨科夫（1794—1859），俄国作家，《家庭纪事》（1856）是他的中篇小说。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把膜拜圣像看为膜拜木板，这是“老爷的”观点。

③ 据圣经故事，礼拜五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受难日，从古代起，在人民的宗教意识中，礼拜五这一天就有各种禁忌，违犯者死后将受惩罚，因此就形成了在这一天不能做任何事情的迷信。

④ 弗洛尔和拉弗尔是兄弟，均为石匠，都是东正教会的圣徒。

人民的长期蔑视，在俄罗斯有教养的人物中固执地保持着这种蔑视。关于人民的信仰，关于人民的东正教，我们有二十来种自由主义的、荒诞的笑话，我们以神父如何要老太婆忏悔或者农夫如何祷告礼拜五这类冷嘲热讽的笑话来寻开心。阿夫谢延科先生如果真正明白了他所写的关于拯救俄罗斯的人民信仰，而不是从斯拉夫派那里抄袭来的，那时他立即就不会侮辱人民了，不再把人民几乎全都说成是“吸血鬼和恶霸”了。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些人对东正教一无所知，因而对我们的人民也就从来都毫无了解。人民虽然没有上过学，他们关于自己的上帝基督的知识，可能还超过我们。他们知道得多，这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经受过很多苦难，在自己受苦受难的时刻，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们时时都从自己的圣徒们那里听到关于自己这个上帝基督的事，这些圣徒为人民而活着，为捍卫俄罗斯的土地而斗争，直至献出生命，人民直到今天还崇敬自己那些圣徒，铭记着他们的名字，在他们的墓前祈祷。请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人民的最落后的部分所受的教养远远超出你们所想象的，这是由于你们在教养上对他们一无所知，而且有可能，他们比你们自己更有教养，尽管你们学习过教义手册。

## 解放俄罗斯农夫的善良瑞士人

### (《作家日记》，1876年，4月号，第1章，Ⅳ)

这就是阿夫谢延科先生在自己3月份的文章里面写的。我希望做到完全不带偏见，因此才让自己用了这样非常大的一段摘录，以免被人说我断章取义。同时我认为，正是阿夫谢延科先生这些话表现了现在西方派关于俄罗斯人民的共同看法，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借此机会予以回答：

>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有教养的少数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透过分隔少数人与人民这面墙而注意观察的。毫无疑问，进入这种少数人的视野的东西应该令他震惊，并在许多方面满足他身上的内在要求。不愿充当西方文明的养子角色的人们在那里找到了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理想，同样是美好的理想。按照当时的说法，失望的、被外来的文明分裂的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普通的、完整的人格，类似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那种信仰的力量，宗法制习俗的严酷和清新。我们已经说过，两种生活的反差应能引起巨大的、强烈的效应。产生了到没有被搅浑的自发生存的水中去净化，去呼吸田野和森林的清新空气的愿望。优秀的人们被震惊了，因为在这种呆滞的生活中，在不仅与教养而且与简单的识字都无缘的生活中，竟然存在着有教养的少数人应该拜倒在他面前的那种高尚心灵的特征。所有这些印象就造成与人民接近的强烈要求。
>
> 与人民接近是什么意思呢？人民的理想之所以明确，仅仅是因为人民的生活远远离开了有教养的人们的生活，这两种生活的条件与内容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在生活上与人民非常接近的、受教养

少的人们在实践上和物质上早已达到了这种接近的要求，他们根本没有发现美好的人民理想，他们还坚持认为农夫就是狗和骗子。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人民理想的教育意义在实践中薄弱到何等程度，把拯救的期望寄予人民的理想这是多么难以理解。如若要了解这些理想并把它们提高为创造杰作的高度，就必须有一定高度的文明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说，崇拜人民的理想这件事情本身在我们这里就是掌握欧洲文明的产物，否则农夫在我们眼里至今仍然还是狗和骗子。所以说，对于我们和对于人民来说，主要的不幸、共同的不幸不在于“文明”，而在于文明基础太薄弱，在于我们缺乏“文明”。

这是多么奇怪的、出人意料的结论！这里，在煞费苦心挑选的字眼里面，最重要的是其总结，即人民的本原（同样也包括东正教，因为，实质上所有的人民本原全都源自东正教）没有任何文明力量，没有稍许教育意义，所以，为了得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向欧洲学习。请看，不是因为“在生活上与人民非常接近的受教养少的人们”依然没有发现“美好的人民理想”，他们还在坚持认为农夫是“狗和骗子”；也不是因为这些人虽然教养很差却已经彻头彻尾被文明腐蚀了，并且已经脱离了人民，尽管他们在生活上离人民很近，而是因为还缺乏文明。这里，主要的是，——恶意中伤人民本原缺乏教育意义，显然，其结论是人民的本原不会导致任何结果，文明才能带来一切。至于我，我早已声明过，我们学习欧洲文明是从堕落开始的。但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教养少、但已受到文明熏陶的人，虽然受到的熏陶只是有限的一点，还是表面的东西，最多不过是自己的某些习惯，某些新的偏见，新的装束，——正是这些人向来就是从蔑视自己原来的环境、自己的

人民、甚至是从蔑视人民的信仰入手，有的时候竟达到憎恶的地步。某些高级的“伯爵的奴仆”、爬升为贵族的小官吏之类的人物就是这样的。他们比那些受文明熏陶远远高于他们的“高贵的老爷们”更加蔑视人民，这是完全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像阿夫谢延科先生那样。在1月号发表的《日记》中我提到一件我的童年印象：一幅殴打农夫的信使的画面。这个信使与人民当然是接近的，他在大路上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然而他也蔑视并且殴打人民，——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可怕地远离人民，虽然他的生活离人民很近。他没有获得一丁点儿高等文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穿上了有长后襟的信使制服，这就赋予了他不受监督地“由着性子”打人的权力。他也就凭自己这身制服而自豪，认为自己比农夫高贵百倍。有的地主差不多也是这样，这种地主的房舍与农夫的茅屋相距不过百步；但问题不在这百步之距，问题是这个人已经体味到文明的堕落。他离人民也很近，最多不过百来步；但是在这百来步的空间横卧着一条深渊。这个地主所受的文明熏陶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丁点儿，不过这一丁点儿就使他完完全全被腐蚀了。在改革① 初期大多数情况大概正是这样的。但是我可以断言，阿夫谢延科先生如同一个幼儿，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的人，全然不是所有受教养少的人们都被腐蚀了，都蔑视人民，恰恰相反，还有那样一些人，人民的本原不停地对他们产生极大的教育意义。这样的阶层保留了下来，从彼得大帝改革起一直存在到今天。有很多，甚至非常多领略过文明的人，又从文明返回到人民，返回到人民的理想，同时又没有抛弃自己的文明。后来就从这个“信徒们”阶层中分化出斯拉

---

① 指彼得大帝实行的改革。

夫派这个阶层，他们已经是受过欧洲文明的高度文化熏陶的人。不过，不是斯拉夫派的高度欧洲文明成为他们忠于人民、忠于人民本原的原因，完全不是，恰恰相反，这个原因是人民本原对真正俄罗斯人的一个阶层的智慧与发展所发生的无穷无尽的、时刻不停顿的教育作用，这个阶层由于自己的天性的力量足以反抗文明的力量，自己个人并不化为乌有，我重说一遍，这个阶层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着。我认为，在很多人看来，我们的斯拉夫派如同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而不是作为对改革中错误的东西和极端特殊的东西的反抗从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不过，我还要重复说一次，有那么一些教养不多的人从来也不认为人民是狗和骗子。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基督教，把人民看做自己的弟兄，而不是看做狗。然而，我们的有文化的人们未必知道这一点，即便是知道，他们也要蔑视这些事实，不会去思考，也绝不会接受它们，因为这些没有抛弃自己的基督教的、文化教养少的人们是与他们关于人民本原的教育意义很小这一基本的、自鸣得意的纲领截然对立的。否则，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不是人民本原虚弱，没有教育意义，而是相反，文明太堕落了，虽然仅仅是刚起步，但已毁灭了许多不坚定的人们。（实际上，不坚定的人永远是大多数。）因而阿夫谢延科先生公然得出结论说，“对于我们和对于人民来说，不幸，主要的不幸，共同的不幸不是文明，而是文明基础薄弱”，所以必须赶紧往欧洲跑，以便在那里接受文明洗礼，直至不把农夫看做狗和骗子。

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自己既往欧洲跑，又从那里往回请教师。在法兰西大革命之前，在卢梭时代和女皇[①] 与伏尔泰通

---

① 1762年即位的叶卡捷林娜二世（1729—1796）。

信之前，请瑞士教师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时髦。

……向一切人传授文化的瑞士人[1]。

“到这里来吧，拿钱吧，只要使人变人道，有人性。”——真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时髦。屠格涅夫在《贵族之家》中为一个在欧洲受过文化熏陶又回到父亲庄园的贵族随手勾勒了一幅精彩画像[2]。他炫耀自己的人道精神和教养。父亲责备他引诱了女仆、天真的姑娘，玷污了她，而他则回答父亲说：“那算什么，我要娶她。”都记得这幅画面吧，父亲抓起棍子，在后面追打儿子，儿子穿一身青色英国燕尾服，带饰物的皮靴和驼色紧身裤——在前面穿过花园，穿过打谷场拼命地跑！虽然跑开了，可是过了几天，就真的娶了她，这是为了当时社会上传播的卢梭思想，更主要的是出于怪念头，出于观念、意志和感情的摇摆不定，也是出于强烈的自尊心：“现在你们看吧，我是什么样的人！”事后他并不尊重自己的妻子，抛弃了她，以分离折磨她，以极端的蔑视对待她！他活到晚年，至死也丝毫未改玩世不恭的态度，作为一个恶毒、渺小、无用的老头子而死去，在最后一刻钟还在咒骂，还在呼喊妹妹：“格拉什卡，

---

① 这句诗好像是赫沃斯托夫伯爵写的。我还记得诗人的这首四行诗，他在诗中把欧洲所有的民族都历数了一遍：

土耳其人，波斯人，法兰克和报复性强的西班牙人，
意大利之子、科学之子日耳曼人，
守护自己货物的商业之子（亦即英国人），
还有向所有人传授文化的瑞士人……

——作者注

② 指《贵族之家》主人公费奥多尔·拉夫列茨基的祖父伊万·拉夫列斯基（见该书第 8～11 章）。

格拉什卡，蠢货，送肉汤来，肉汤！”屠格涅夫的这段故事写得多么美妙，多么真实！其实这个人受过很好的文明熏陶；但是，阿夫谢延科先生谈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要求真正的文明，也就是现代的文明，最终改变我们彼得堡的地主们的文明，使他们一边阅读《苦命人安东》[①]，一边抽泣，然后就毅然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了农民，现在用您来称呼从前的狗和骗子。事实上这是多么大的进步！不过后来，对他们仔细观察之后，人们看到了，原来这些为苦命人安东而哭泣的地主们既不了解人民，不了解人民的生活，也不了解人民的本原，他们几乎把俄国的农夫看做来自法国的移民或者手捧瓷茶杯的牧童，而当政府为解放农奴展开长期艰巨的工作时，那些高级地主的某些意见竟以其对事物、对农村、对人民生活以及所有事关人民本原的一切的无知可笑得惊人。然而阿夫谢延科先生正是要证明，欧洲文明有助于理解人民的理想，而人民本原自身则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应该设想，为了把握人民的理想必须到巴黎去，或者，至少到马拉轿车都去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②] 去看喜剧。就算是这样吧，就算是只有通过欧洲我们才能够有进步，才能够理解俄罗斯的本原，就算是这样：文明真值得赞美！一群阿夫谢延科先生们赞叹说，看吧，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它可以把人变成什么样子！人民本原及其渊源东正教，——没有任何教育力量，让它们滚开吧！

就算如此。但是，先生们，请你们回答，只回答一个问

① 俄国作家季·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900）的中篇小说。它写的是农民安东，穷苦，诚实，因不堪地主管家的虐待，参加农民起义，最后遭到惩罚的故事。

② 当时主要是外国艺术团体来俄访问演出的场所。参阅下文《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注。

题：我们这些教师，欧洲人也好，瑞士人也好，所有这些慈善的人们，教导我们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民的人们，他们为何在欧洲自己的家里连一个人都不解放，不仅是没有带着土地解放，即使像从母腹降生那个样子的解放都没有，到处都如此。在欧洲，解放不是出自占有者，不是出自男爵，不是出自地主，而是由起义、暴动、火与剑，由血海实现的，这是为什么？如果说在那里没有血流成河就解放了，那也毫无例外处处都是按照无产者的方式作为纯粹的奴隶而解放的。可是我们却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是向欧洲人学到解放农民的！“看，我们有文明教养了，不再把农夫叫狗和骗子了。”可是，为什么在法国，在欧洲各地，至今还把一切无产者，一切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当做狗和骗子，——无需说，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按照法律不能公开说他，你是狗和骗子；但事实上，正如对待狗和骗子一样，怎样摆布他都可以，狡猾的法律只是要求，在做的时候要遵守应有的礼貌。“礼貌我会遵守的，但面包是不给的，——哪怕你现在就像狗一样地饿死。”——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怎么竟是这样呢？这不是矛盾吗？这同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截然相反吗？不是的，先生们，显然，在我们这里进行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其实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单单是靠了文明才不把农夫看做狗和骗子的，那么我们必定是已经遵循文明的原则把他们解放了，也就是按照无产者的方式解放了，像我们欧洲的老师那样：“我们可爱的小弟弟，你走开吧，你自由了，就像从母腹降生那样自由，这是你的光荣。”在波罗的海沿岸人民就完全是这样被解放的，为什么？就因为波罗的海沿岸的人是欧洲人，而我们只不过是俄罗斯人。因此，事情就成了这样的，我们是作为俄罗斯人来做这件事的，完全不像文明的欧洲人所做的，我们连同土地一

起解放人民只能使我们的欧洲教师和一切慈善的瑞士人感到惊讶和可怕。是的，感到可怕：那里已经发出惊恐的叫声，你们还记得吧？竟然喊叫起共产主义来。还记得现已去世的基佐[1]关于我们人民的解放所说的话吧："你们怎么能够希望从此之后我们不惧怕你们呢。"——这是他当时对一位俄罗斯人讲的话。不，我们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人民，不是因为我们成了文明的欧洲人，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以沙皇为首的俄罗斯人，完完全全如同四十年前地主普希金幻想的那样，就是在那个时代诅咒自己所受的欧洲教育并转向人民本原的普希金[2]。为了这个人民本原俄罗斯人民带着土地被解放了，并不是因为欧洲教我们这样做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大家突然间第一次决定膜拜人民的真理。这不仅仅是俄罗斯生活的伟大时刻，俄罗斯有文化的人们第一次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同时还是俄罗斯生活的预兆性时刻。可能，预兆很快就将变为现实……

不过……不过我要在这里暂时停笔。我发现，这篇文章占用了《日记》的全部篇幅。所以，留到下一期，5月号我的《日记》再写……当然，我要把我的解释的最重要部分留给5

---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② 这里指的是普希金的《乡村》(1819)一诗结尾几行："啊，朋友！我能否看到不受压迫的人民，/沙皇敕令废除的奴役制？/文明自由的祖国的天空/终会升起绚丽的朝霞？"
"地主普希金"一语出自普斯科夫一名地方报纸通讯员的回忆文章。回忆文章说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人要求教堂执事带路去瞻仰诗人普希金的坟墓，教堂执事"断然拒绝带路……因为他不知道有什么诗人普希金的坟墓，但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不错，我们这里是有一座普希金的坟墓，但他不是什么诗人普希金，他是地主普希金。要是想看的话，我带您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的《公民报》转载了地方报纸的这篇文章，后被误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月号那一期。为提请注意，我说说那一部分的内容。我要指出我们文化中完全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而某些先生们却恰恰相反，把这个方面看做我们的智慧唯一的救星和我们在人民面前的光荣，并据此而蔑视人民，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称赞“人民的本原”，颂扬它们，同时却又断言人民本原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并说人民本原只有“消极性”，——这就等于唾弃人民本原。例如，阿夫谢延科先生就断定说，人民不过像“自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的云游者”，“期望从这个谜，这个为自己既未找到思想，也未找到形象的斯芬克斯① 那里得到思想和形象，——简直

① 古希腊神话中长翅膀的狮身人面女妖，住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岩上，向过往行人提出无法猜破的谜语，行人猜不破谜语即被女妖吃掉。谜语是：“什么东西早晨走路用四条腿，中午用两条腿，晚上用三条腿？”如果猜不出，就被吃掉。后来忒拜的英雄俄狄浦斯回答是幼儿、成年和老年时期的人。谜语被猜破了，斯芬克斯投崖而死。斯芬克斯常被人们用来比喻捉摸不透的人或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2月号《作家日记》的《谈对人民的爱。同人民必须的契合》一文中，关于人民写过这样一句话：“……人民对我们大家来说，还依然是一个理论，仍然是个谜。”阿夫谢延科在自己的文章中按照自己的观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与引申。阿夫谢延科认为，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人民历史上以“停滞的、自发的理想”、“消极的日常存在”为特点的时期就结束了，人民接受教育、参与积极的社会活动的新时期就开始了。阿夫谢延科在文章中接着写道：“正是由于必然要离开原来的地方，并进入新的生存阶段，我们的人民显得像一个谜，不可能不是这样。他将变成什么样子？他如何前进？他从自己过去的自然天性中要把什么东西保留呢？由于新的生存条件他又将获得什么新的东西？总之，在经过学习和自治之后他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切都是问题，在目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可是，人们突然对我们说，我们应该跟着这个自己还没有认清道路的云游者走；我们应该从这个谜、这个斯芬克斯获得思想和形象。然而他还没有给自己（转下页）

是嘲弄。”我认为，这种武断的说法只能表明他完全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也就是对人民一无所知。这正是我要指出的，人民全然不是那样没有希望，全然不是那样摇摆不定，方向不明，相反，我们俄罗斯的有文化阶层倒是摇摆不定，方向不明，这些先生们还以此为荣，认为这是俄罗斯二百年的最宝贵的收获。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在我们人民里面保持了足够的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我们的文化发生偏颇的时候拯救了他们，在俄罗斯人民的面目和形象不受伤害的情况下，承受住降临到人民身上的教育。如果我也说过“人民是个谜”，那也根本不是在这些先生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说的。总之，我想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那个混乱的问题充分说清楚，这个问题是在经过所有这些争论之后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正如我在2月号的《日记》中曾经表述的：“如果我们，俄罗斯受过文明熏陶的阶层，在人民面前是如此软弱和动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带给人民什么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人民应该对之顶礼膜拜并且是 sine qua non[①]从我们手中接过去的珍品呢？”我想要指出并阐明的正是我们文明的这个方面，也就是必须承认是可贵的方面，而所有这些先生们反而至今仍未加以任何重视的方面。那么就等5月那一期再见。对我自己来说，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些问题更引人注目，更迫切的了，读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我还要保证竭力写得简短些，关于阿夫谢延科先生我要尽量、甚至根本不再提他。

---

(接上页) 找到思想和形象呢！这岂不是嘲弄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自己的观点与阿夫谢延科的区别，以及关于斯芬克斯的话就是针对阿夫谢延科的上述言论的。

① 拉丁文：必须。

## 谈点儿政治问题

（《作家日记》，1876 年，4 月号，第 2 章，Ⅰ）

人人都在议论当前的政治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怎么能不关心呢？一位很严肃的人无意中遇见了我，他非常郑重地问我："会不会发生战争呢？"我十分吃惊：我虽然也同我们大家现在一样，密切地注视着事件，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战争的不可避免这个问题。看来，我是正确的：报纸宣布，三国首脑[①] 很快即将在柏林举行会晤，当然，这个永无休止的黑塞哥维那事件[②] 到时将会得到处理，很可能，将以使俄罗斯的感情得到很满意的方式处理。我承认，罗季契男爵[③] 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很不安，还在一个月之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讲话的时候，的确，只是觉得好笑。后来这些话掀起了一场风波。其实，我认为，罗季契男爵不仅没有想要刺痛任何人，而且在他的那些话中也不包含任何"政治"，他不过是失言，顺口冒出了关于俄罗斯软弱无力的胡言乱语。我甚至认为，在说出关于我们软弱无力那句话之前，他自己心中在想："如果我们比俄罗斯强大，可见，俄罗斯一点力量也没有。而我们确实是比俄罗斯强大一些，这是因为柏林任何时候都不会把我们

---

① 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1798—1883）、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西（1823—1890）与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1815—1898）。

② 指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反对土耳其的人民起义（1875—1878）。

③ 罗季契（1812—1890），达尔马提亚地区（现属克罗地亚与黑山）的全权代理人。

奉送给俄罗斯。嗯，柏林可能允许我们跟俄罗斯厮打一番，但这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开心，也是为了更清楚地看看：谁胜过谁，每一方都拥有什么手段？如果俄罗斯战胜了我们，过分压榨我们，柏林就要发言：‘住手，俄罗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们吃大亏，就是不吃太大的亏，只吃一点儿小亏。因为俄罗斯不敢同时反对我们和柏林，这样，事情的结局对我们就没有多大的伤害；但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战胜俄罗斯，我们就可以突然间赢得很多。这样，一方面是赢得很多的机会，而在俄罗斯战胜我们时，输掉的却很少——这非常好，非常有策略！可是柏林忽然对我们说：他非常喜爱我们，因此想从我们手中拿走我们的德国领土，一定要拿过去，可能，很快就要拿；但是，由于德国为此而非常喜爱我们，为了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我们的德国领土，他必然要报答我们，把占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权利交给我们，作为交换。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他极为有利，而我们呢，即使以斯拉夫人报偿了我们，我们毕竟也完全不可能比德国强大，而俄罗斯如果获得斯拉夫人作为奖赏，俄罗斯甚至面对柏林也要强盛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人将归属我们，而不是俄罗斯；由于我没有沉住气，在对斯拉夫人的领袖们讲话时，就把这话说了出来。应该使他们渐渐地准备接受这些好的思想……”

很可能不仅仅是罗季契有这些想法，一般地说，奥地利人全都有。显然，这里存在着许多混乱。只要设想一下，斯拉夫人落到奥地利的政权下，奥地利尽管失掉了自己的德国领土，它要做的头等大事还是要把斯拉夫人德意志化！但是，在欧洲不只是一个奥地利倾向于认为俄罗斯软弱无力，的确如此；其次，也不只是一个奥地利相信，俄罗斯必然竭力想要攫取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的土地归自己统治。只有在欧洲确信俄罗斯根

本不想攫取任何东西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生活才会发生最彻底的转变。到那个时候才会出现一个无论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对欧洲来说都是新的时代。如果有那么一天人们会对俄罗斯的大公无私深信不疑，那时欧洲的整个面貌立刻就焕然一新。这种信任迟早一定会到来的，但并不是由于我们的表白的结果；欧洲自始至终都不会相信我们的任何表白，总是要以敌视的目光看待我们。欧洲对我们的惧怕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惧怕，那就一定会憎恨。欧洲出奇地不喜欢我们，从来也没有喜欢过；从来没有把我们看做自己人、欧洲人，总是把我们看做不受欢迎的外来人。因而欧洲有时很爱用这样一个思想宽慰自己，即俄罗斯好像“暂时还软弱无力”。

欧洲惯于这样去想，那就很好。我深信，假如我们战胜了，最可怕的灾难就会震撼俄罗斯，例如，克里木战争的时候，总的说来，我们原本可以取得对联盟国家的优势![1] 看到我们是那样强大之后，全体欧洲都立刻带着极强烈的憎恨反对我们。他们如果失败了，当然他们就应该签订对自己不利的和平协议，但事实上从来也不可能有任何和平协议。他们即刻就要着手准备以消灭俄罗斯为目的的新战争，主要的是，全世界都会支持他们。例如，1863 年，我们本来不可能靠交换苛刻的外交照会就应付过去的。[2] 相反，联盟国家会对俄罗斯发动

① 克里木战争，1853—1856 年俄国与土耳其争夺对近东地区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战争开始后俄军节节取胜，1854 年起土耳其联合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对抗俄国，联军逐渐占据优势，最后，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1856 年缔结巴黎和约。

② 1863—1864 年在波兰爆发了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为削弱俄国政府的国际立场，法国和英国政府施展了复杂的外交手段。在 1863 年，英法两国向俄国三次提出措词强硬的威胁性的照会，要（转下页）

协同的十字军征讨的。不仅如此，某些欧洲国家的政府肯定要利用这次十字军征讨来医治当时的国内事务，可见这次征讨从各个方面说都对他们有利。例如，在法国的各革命政党和所有对当时的政府不满的人，为了把俄罗斯赶出欧洲这一“神圣目的”都会立即支持政府，战争也就会成为人民的战争。然而，那个时候命运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对各联盟国家的优势，同时保持了我们的全部军事荣誉，甚至还提高了军事荣誉，所以我们还能够承受失败。总之，失败我们承受住了，但是，尽管我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力量，我们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战胜欧洲这一重任。本世纪初，我们使欧洲摆脱了拿破仑的桎梏，那也是命运给我们的一次拯救，那时命运使普鲁士和奥地利与我们结盟①，从而拯救了我们。当时如果是我们单独战胜了，那么欧洲就会在摆脱拿破仑之后稍作喘息，立刻在没有拿破仑的情况下又向我们扑过来。但是，感谢上帝，事情不是这样：被我们解放了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立即把胜利荣誉全部据为已有，后来，也就是现在，他们公然扬言，胜利是他们自己取得的，而俄罗斯则只是碍手碍脚。

总的说来，我们在欧洲的命运对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在欧洲我们绝不能胜利，即使我们能够取得胜利，那对我们也是极其不利和危险的。这样，只有某些局部的，或者说，家庭内部的胜利，例如征服高加索，他们还能够“宽恕”我们。在已

---

（接上页）求把波兰问题提交欧洲会议讨论，并且提出在波兰实施改革的条件。俄国政府看到英法两国都陷身于墨西哥战争，无意于为了波兰而向俄国开战，于是驳回了英法两国的照会。

① 1813年2月28日，普鲁士与俄罗斯结盟，一个月后即同法国开战，此后，奥地利也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的同盟，1813年8月12日向法国宣战。

故皇帝时代同土耳其的第一次战争以及此后紧接着对波兰的整治差一点儿导致同全欧洲的分裂。看来，他们现在“宽恕”了我们不久之前在中亚的收获，不过，实际上他们在自己那里说长道短，不能心平气和。

尽管如此，在不久的将来，事态的进程应该改变欧洲各国人民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在我的3月号《日记》中，关于欧洲的最近的未来，我陈述了几点幻想。然而，这已经不是幻想，几乎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很快，可能是最近的未来，俄罗斯将要比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强盛。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是由于在欧洲所有的强国都将消失，原因很简单：他们全都将由于自己很大一部分下层国民、自己的无产者和穷人的不满足的民主要求而变得筋疲力竭。在俄罗斯则完全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民众是满意的，今后还会更满意，因为共同的情绪，或者，更恰当地说，普遍的一致，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因而在欧洲大陆上将只剩下一个巨人——俄罗斯。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快得多，这就将成为事实。欧洲的未来属于俄罗斯。但问题是，到那个时候俄罗斯在欧洲将要做什么呢？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俄罗斯做好了扮演这个角色的准备了吗？

# 为了死者的名誉

## （《作家日记》，1876年，4月号，第2章，Ⅳ）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读完了《新时代》[①] 转载自《行动》月刊[②] 的一则奇闻，这则奇闻损害了二十年前已经死去的我的兄长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③] ——《时代》月刊和《时世》[④] 月刊的创始人与发行人——的名誉。我把这则奇闻逐字逐句地录写如下：

> 1862年，夏波夫[⑤] 已经不愿再与《祖国纪事》月刊[⑥] 共事，可是其他刊物都暂时停刊了，这时他把自己的文章《碾磨机》[⑦] 交给了《时代》月刊。秋天，他非常需要钱，可是《时代》月刊已故的发行人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应付给他的钱拖欠了很久。天冷了起来，而夏波夫连一件暖和的衣服都没有。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请到自己家里，他们之间便出现了下

---

① 1868—1917年在彼得堡发行，原为自由派报纸，1876年改由阿·谢·苏沃林发行后，成为保守派报纸。

② 1866—1888年在彼得堡发行的学术性文艺刊物，持民主倾向。

③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0—1864），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之兄。

④ 《时代》月刊（1861—1863）、《时世》月刊（1864—1865），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哈伊尔在彼得堡创办、发行的刊物。他于1864年去世后，《时世》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行。

⑤ 阿法那西·普罗科比耶夫·夏波夫（1830—1876），俄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教授。

⑥ 《祖国纪事》月刊（1839—1884），先后由安·亚·克拉耶夫斯基、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尼·涅克拉索夫等人在彼得堡发行。

⑦ 夏波夫的文章《地方自治局与分裂教派·碾磨机》(1862)。

述场面。“阿法那西·普罗科比耶夫，请再等一等，再过一周我就把钱给您送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您总该明白，我现在就需要钱！”“您现在要钱做什么？”“我连件暖和衣服都没有，没有衣服。”“我告诉您，我认识一个裁缝，他那里可以赊账买衣服，我以后从您的钱中还给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样把夏波夫带到犹太人裁缝那里，裁缝便以质量十分可疑的一件外套、常礼服、背心和裤子装备了这位历史学家，要的价钱却很昂贵，后来就连这位不过问日常实际事务的夏波夫也满腹怨言。

这是刊登在《行动》月刊上一篇悼念夏波夫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文章是谁写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向《行动》月刊了解过，也没有读过这篇悼念文章。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引用的这段文字出自《新时代》。

我的兄长早已去世：可见，这是一件陈年往事，是非难分，要辩解是不容易的，前面所谈的事情没有一个见证人。这就是说，上述指责是空口无凭的。我深信不疑，整个这则奇闻纯系一篇无稽之谈，其中的某些情节即使不是杜撰，至少也是把全部事实都篡改了，极大地歪曲了事实。我要尽我的所能来证实这一点。

首先我声明，我从未参与过我兄长的杂志的钱财事务和他从前的经商活动。在协助兄长发行《时代》月刊时，我没有接触过任何钱财账目。不过我很清楚，按当时的情况来说，《时代》杂志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我还知道，不仅没有欠作家们的债，而且相反，经常预付给作家们相当可观的数目。这是我知道的，是我多次亲眼见到的。刊物也不缺少合作者：合作者们自己来找刊物编辑部，刊物发行的第一年就收到寄来的很多文章；只要看一看总共发行了两年半的《时代》杂志，就可以

明白，当时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大多数都参加了。如果我的兄长拖欠作家的稿酬，或者，确切点说，与合作者们共事的行为不正派，情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人现在也能够为预付相当可观的报酬数目这件事作证。这件事不是在角落里悄悄进行的。从前的而且是密切的合作者中有很多人现在依然健在，他们当然不会拒绝作证：根据他们的看法与记忆，家兄是如何处理刊物的事情的。简单些说，家兄不可能“拖欠夏波夫的稿酬”，而且还是在夏波夫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如果说夏波夫把家兄请到了自己的家里，那就不是由于拖欠而“忍不住了”，而恰恰是如同许多别的人那样，要求预支。家兄去世之后留下了合作者们给编辑部的很多信函和便笺，我希望从中能找到夏波夫的信件。那时就看清他们的关系了。此外，关于夏波夫当时很可能是要求预支这种推测是无可怀疑的，是与真实情况一致的，是与所有的回忆，与现在还可能找到的关于当时《时代》的发行与处理事务的情形的一切见证是一致的，虽然已事过十四年之久，这样的见证现在仍然可以收集到不少。家兄虽然“精明能干”，可是对别人的要求却很心软，不会拒绝人：有些时候，即使无望获得作家为刊物写的文章，他也预付。我就亲眼见过这种事情，我可以随意指出某一个人来。有一位经常撰稿人从家兄那里预支了六百卢布，第二天早晨就到当时正在招募官员的西部边疆工作去了，后来就留在了那里，家兄从他那里既没有拿到文章，也没有讨回钱。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手中虽然握有凭据，可是往回讨钱的事他一点儿也没有做，很久之后，在他死后，他的家属才通过法庭向这位撰稿人（手头宽裕的人）讨还了这笔钱。法庭是公开审理的，关于这件事的全部情况可以找到最确切的材料。我只是想说明，家兄有时是多么随便、同时也愿意把钱预付给人，他不是那种拖

欠困窘作家稿费的人。夏波夫的悼文的作者在听家兄与夏波夫的谈话时，可能一点儿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谈论的是什么钱：是家兄欠的钱，还是要求预支的钱？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家兄向夏波夫建议，为他在认识的裁缝那里赊购衣服，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家兄不想拒绝帮助夏波夫，但出于某些考虑，他可能认为这种帮助方法比把钱直接交到夏波夫的手上更好一些……

最后，在前面举出的那则奇闻里面我辨认不出我兄长的话：他从来也不用那种口吻讲话。他根本不是那种样子，不是那种人。我的兄长任何时候都不谄媚任何人；他不会满口都是恭维话，用甜言蜜语奉承人。当然，他任何时候也不会让别人对自己说出这种话来："您总该明白，我现在就需要钱。"十四年之后出现在奇闻作者的回忆中的这些话，都是按照某种观点重新改写过的，是篡改了的。请所有记得家兄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回想一下，他是用这样的语言讲话的吗？我的兄长是很正派的人，为人处世如同绅士，他事实上就是绅士。他是一个很有教养和有才能的文学家，欧洲文学的专家，诗人席勒和歌德的著名翻译家。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像"奇闻"中所写的那样，阿谀奉承夏波夫。

我再说一件我的已故兄长的事情，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1849年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被投进监狱，在里面蹲了两个月。两个月之后释放了一批无罪的、与发生的案件无牵连的人（相当多的一些人），确实是这样：彼得拉舍夫斯基组织的秘密小组和杜罗夫① 的秘密小组家兄都没有参加。

① 谢·费·杜罗夫（1816—1869），诗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不过他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晚会，利用过设立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的秘密图书馆的书籍。他当时是傅立叶分子，热情钻研过傅立叶①。因此，在监狱里面的两个月期间，他根本不可能认为自己会安然无事，也不可能信心十足地指望自己会被释放。他是傅立叶分子并且利用过图书这些情况已经暴露无遗，显然，他作为危险人物，能够期待的即便不是西伯利亚，也是流放远方。如果不是遵照已故沙皇的意志把他们全都释放了，那么两个月之后获释的很多人必定要被流放（肯定是这样），这是当时我从主持侦讯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加加林公爵那里知道的。当时我至少知道有关释放我兄长的事情，那是加加林公爵为了使我高兴，特意把我从单人牢房② 叫到审讯案件的办公室通知我的。我是一个人，单身汉，没有孩子；兄长被投进监狱之后在家中留下惊慌失措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其中最大的当时才七岁，而且家中分文皆无。我的兄长热爱自己的孩子们，对他们体贴入微，我能够想象他是怎样熬过这两个月的！然而，他没有为了减轻自己的厄运而供出可能有损于其他人的任何供词，其实他是能够供出一些事情的，因为他自己虽然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可是他知道很多事情。我要问：有多少人在他那种处境下能够像他那样表现呢？我毫不含糊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明白——我在说什么事情。我知道，也看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哈伊尔于 1849 年 5 月 6 日被捕，同年 6 月 25 日被释放。他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接受的激进倾向，因此兄弟二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尤其是 1848 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尼·阿·斯佩什涅夫之后。斯佩什涅夫（1821—1882）为俄国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派领导人之一，唯物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者，1849 年被判处十年苦役。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于其兄数日被捕，二人同时被囚于彼得保罗要塞。

见过：人们在那种不幸的遭遇中是什么样子，我不是没有根据地议论人。人们如何看待我兄长的这种行为，随他们的便吧，我的兄长毕竟是不愿意为了拯救自己而去做有背自己的信念的事情。我要说明，我的这些话不是信口开河说出的，我现在就能够以确凿的事实证实这一切。实际上，在这两个月里，家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被他毁灭了家庭这个思想所折磨，一想到三个可爱的孩子和他们的前途……他就痛苦不堪。现在竟然想要把这样一个人说成是暗中与犹太人裁缝勾结，蒙骗夏波夫，分享好处，把几个卢布装进自己衣袋里的人！呸，多么无聊！

## 来函摘登

（《作家日记》，1876年，5月号，第1章，Ⅰ）

人们问我：我是否打算写写凯洛娃[①]事件？我已经收到几封这样询问的信了。其中有封信写得很有特点，显然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但是我要冒昧从中摘出几行，当然，绝对隐匿写信人姓名。希望我的可尊敬的通信人不要责怪我；我也只是引用其中我相信是出自他的一片真诚的话，我是能够充分珍惜这种真诚的。

……我们怀着极端厌恶的心情读了凯洛娃案件的报道。这件事宛如聚焦镜，表现出一副卑劣本性的画面，这幅画面中，主要活动人物凯洛娃的面貌是由于一种文化氛围塑就的：母亲在怀孕期酗酒，父亲是醉鬼，亲兄弟由于酗酒丧失了理智，开枪自杀了，叔伯兄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祖母是个疯女人，就是这样的文化造就了她那残暴的、为满足自己的卑劣欲望而肆无忌惮的性格。就连起诉

① 退役海军中尉瓦·阿·维里卡诺夫，三十三岁，1874年在奥伦堡组织剧团，自任班主，其妻阿·依·维里卡诺娃亦在剧团任职。1875年春剧团破产，维里卡诺夫携其情妇、二十九岁的剧团演员阿·瓦·凯洛娃赴彼得堡，希望在彼得堡继续从事戏剧生涯。其妻维里卡诺娃随后亦跟至彼得堡郊区，要求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凯洛娃表示同意，但她在一天夜间用剃须刀割破维里卡诺娃的咽喉。维里卡诺娃受到的并非致命伤害，彼得堡的地区法院审理此案时听取了鉴定人关于审讯凯洛娃的责任能力的证词后，并考虑到她心理上有些不正常，陪审员判决无罪开释凯洛娃。本来当时关于陪审员与辩护律师的审判制度在社会上早已在进行争论，凯洛娃案件自然成为引起争论的又一案例。

她的机关对她都大惑不解，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是不是一个疯女人？部分鉴定人员彻底否定了这个问题，部分鉴定人员认为有疯癫的可能性，却不是指她本人，而是指她的行为。但全部审判表明，她不是疯女人，而是一个极端否定一切神圣事物的女人：对于她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别的女人的权利，都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她，为了她那些卑劣的欲望，她不仅仅是对丈夫，对整个生活都是这种看法。

有可能把她作为发疯女人而无罪释放，这样还算好！至少是没有把道德的堕落视为理智的进步，而是归为病态心理之列。

但是，“在**绝大部分是妇女**的旁听席的第一层响起了一阵掌声”（《交易所新闻》）。

为什么事鼓掌？为了无罪释放疯女人，还是为了放荡不羁的狂暴本能的胜利，为了这个疯女人所体现的卑鄙无耻？

女人们在鼓掌！妻子和母亲们都在鼓掌！然而，在这个践踏女人理想的场面她们不应该鼓掌，而是应该哭泣……

（注意，我在这里删节掉过分尖刻的几行话。）

您难道对此保持沉默吗？

# 外省的新见解[①]

(《作家日记》，1876年，5月号，第1章，Ⅱ)

再谈凯洛娃的事（似乎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已为时太晚了。况且，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典型现象，面对我们大众的这种典型性情绪，我认为，我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有关这一“事件”，毕竟应该说点话，哪怕是一句，虽然是晚了些。因为一切还都一如既往，所以说什么都不算过时；相反的是，一切事情都一如往常，并且在花样翻新，虽说是已经经历了初级阶段；再说一遍，主要的是，请我的通信人原谅我摘引他的信，仅仅依据我一个人接到的这些信件判断，对我们俄罗斯生活的一个极其美好的现象就可以做出结论。不久前，我

---

① 本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外省文学和外省报刊问题的争论发表的意见。俄国的政体应以中央集权制为宜还是应以联邦制为宜的讨论已在报刊上持续了数年，外省文学与报刊的争论是从这一讨论中派生出的问题。外省报刊的主张是，同首都和大的中心城市一样，各个地方也可用自己独立的语言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作家、历史学家达鲁·莫尔多夫采夫（1830—1905）著文驳斥上述外省见解说，外省报刊的任务是关注外省的问题，而不是在全国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与首都平分秋色，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外省报刊没有这种条件。莫尔多夫采夫的文章激化了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外省的新见解》中所评论的《第一步·外省文集·1876年》是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作家文集，该文集的目的是要以此表明外省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学，是参与争论的一种方式。文集引起首都舆论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是肯定俄国的中央集权制，不赞成非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主张，因而在《外省的新见解》中对外省报刊的离心倾向表示疑虑。

曾间接地指出过这个现象，这就是，人人都不安，人人都想参与一切，人人都想发表意见，显示自己的看法，只有一点我不清楚，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每个人都想表示自己的意见与众不同，还是参与一个共同的和谐乐队的齐声合唱？这封来自外省的信是一封私人信件，不过，我要顺便指出，我们外省坚定不移地要过有自己特色的生活，几乎是想与首都截然不同。看出这一点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我之前很久，报刊已经在谈论这一点了。喀山出版的《第一步》是一本完整的文学作品集，在我的桌上放了已经两个月，关于它早就应该说几句话；——它的出版无疑是想要说句新的话，不同于首都的，而是外省的，并且是“绝对必须的”话。这也好，在古老的俄罗斯乐团中，这只不过是一些新的声音；因而才有益，至少是有趣。这种新的趋势是有其根源的。不错，所有这些酝酿中的新话，实际上，还一句都没有说出来，不过，有可能，从我们这些地方和边远地区真的能听到迄今闻所未闻的话。抽象地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从彼得大帝那时候开始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引导俄罗斯往前走；而现在呢，彼得堡的作用和向欧洲打开窗口的文化时代已经结束了[①]，现在……就是现在，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作用真的终结了吗？据我看，即使说有变化，那也微不足道；首先是，在整个一百五十年当中，彼得堡自己和莫斯科是否领导了

---

①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1833），原文为：“上天注定，/让我们在这里/打开一个瞭望欧洲的窗口，/我们要在海边站稳脚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彼得大帝所实行的改革的时代在俄国历史上结束了，因而彼得大帝所创建的城市——彼得堡的历史作用也随之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是带着讥讽的语气引用普希金肯定彼得大帝的改革的诗句的。

俄罗斯？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整个俄罗斯都汇聚到并拥挤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实质上，俄罗斯在自己领导着自己，不断地靠来自各个地区和边疆本身的新生力量的新鲜血液进行着自我更新。顺便说一句，在这些地区，俄罗斯人的任务同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在里加或高加索，以及所有地方，全体俄罗斯人的任务都完全是相同的。如果从理论上讲，按原则来判断，没有比彼得堡同莫斯科更相对立的了：彼得堡就是作为莫斯科及其全部思想的对立物而创建的。然而俄罗斯生活的这两个中心实质上构成一个中心，这是从一开始，从一出现，两个中心立刻就看出来了，尽管存在着使它们两个区分开的某些特点。在彼得堡产生、发展的东西立即一模一样而且同样独立地在莫斯科产生、巩固并发展起来。反过来也是如此。心灵不仅仅在这两座城市中是统一的，而且在这两座城市与全俄罗斯都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说，在全俄罗斯的每一个地方，处处都是一个俄罗斯。噢，我们明白，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地方特点和发展这些特点的全部权利；但这些特点是否就会引起精神上的分裂或者说简直是令人困惑而不可理解呢？总的看来，我们的未来是“水的黑暗”①，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比任何地方都更清楚。无论如何，上帝保佑，让那些只要能够发展的都得到发展，当然，是好的东西，这是一；第二，也是主要的：上帝保佑，无论如何都不可失去统一，不管是什么好处，什么许诺和金银财宝——在一块儿总比分散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这是主要的。新的话是会讲出来的，这是毫无

① 俄语用以表示扑朔迷离、困惑不解的事情的成语。原话出自《旧约全书·诗篇》，第 18 篇，第 11 节，原文为：“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

疑问的，不过我终归是在想，我们各个地区和边疆所说的不会是什么过分新的、特殊的话，至少是现在，眼下不是什么太新奇的、难以承受的话。为要讲出自己的话，可能，还是面向全世界讲，大俄罗斯现在才刚刚开始生活，刚刚站立起来；因此，莫斯科，这个大俄罗斯的中心，在我看来，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愿如此。莫斯科还不是第三罗马①，然而，预言是应该实现的，因为“不会有第四罗马”，而没有罗马，世界是不能存在的。不过，彼得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跟莫斯科是一致的。当然，我要说明，我所理解的莫斯科，现在来说，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某种借喻，因而任何喀山② 和阿斯特拉罕③没有任何必要感到委屈。我们欢迎他们的文集，假如能来个《第二步》那就更好，再好不过了。

---

① 伊万三世时，莫斯科罗斯已形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5世纪中叶即出现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第二罗马(拜占庭）灭亡（1453）之后，这一理论愈加盛行。“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实质上是莫斯科的强盛在思想上的反映，认为莫斯科是第二罗马的继承者，是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权威的继承者，东正教的维护者和斯拉夫世界的领导者。显示莫斯科的强大及其作为拜占庭的继承者的标志已出现于世，伊万三世已享有“全罗斯大公”、“伟大的国王”的尊号，在当时(1497)的印刷物上已经出现双头鹰的标志。在19世纪，斯拉夫派曾企图利用“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解决巴尔干问题。

②③ 喀山原为喀山汗国的都城。喀山汗国原是伏尔加河中游的鞑靼封建王国，1551年为俄国所兼并。阿斯特拉罕原为阿斯特拉罕汗国的都城，这一汗国是从金帐汗国中分立出来、处于伏尔加河下游的鞑靼封建王国，1556年为俄国所兼并。两地均在伏尔加河。而本文上文谈到的论文集《第一步》也正是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作家的文集（见上文注），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处提到这两个地方，大概因为它们原是被俄国兼并的两个汗国的都城，所以说“没有任何必要感到委屈”。

# 一个不合适的思想[1]

## （《作家日记》，1876年，5月号，第2章，Ⅱ）

不过，我现在说的是"独立精神"[2] 吗？我们喜欢独立精神吗？问题就在这里。在我们这里独立精神是什么意思？对独立精神能够找到两个理解相同的人吗？再说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是否存在任何一个人认真信仰的思想，即使是有一种这样的思想？我们这里的陈规陋习既多又少，我们的陈规陋习是对什么事都不喜欢思考，而且毫无顾忌地吃喝玩乐，只要有精力，还没有玩腻烦。比墨守成规好一些的人们鹤立鸡群地聚结到一起，佯装他们有什么信仰的样子，但是，看起来他们是勉强把自己捏到一块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抱住"愈坏愈好"的公式，拿这个公式做文章。最后，还有一些见解怪诞的人，这种人有时非常正直，但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十足无能的；他们，特别是那些正直的人，频频以自杀结束生命。的确，近来我们这里自杀事件多到谁都不去谈论他们了。俄罗斯大地似乎已经失去了挽留这些人的力量。而在这片大地上毫无

---

① 本文为1876年4～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参观彼得堡孤儿院时产生的联想。报刊关于杀害、虐待与抛弃非婚生幼儿的大量报道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参观孤儿院的愿望。文中提到凯洛娃太太，因他参观孤儿院时，彼得堡地方法院正在审理凯洛娃太太的情杀案。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参观孤儿院时想象到，这里抚育成人的儿童将以何种精神面貌出现在社会上：是卑躬屈膝的人物，还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

疑问有多少正直的人啊，尤其是正直的妇女！我们的妇女正在站立起来，或许她们将会挽救很多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谈的。妇女，这是我们巨大的希望，可能，在最危急的时刻，她们将为全俄罗斯效力；不幸的是：我们这里正直的人很多，非常多，您知道，这就是说，与其说是正直，不如说是善良，他们之中谁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直，根本就不相信关于正直的任何说法，甚至否认从前关于正直的最明白无误的提法，几乎处处人人都是如此，这岂非怪事？而所谓的生存的活力和炽烈的情感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们都到哪里去了，没有它们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够生存，大地也不能存在下去。在观看这处孤儿院和这群儿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在这座建筑物里我陷入了关于自杀的沉思？

我们有很多不合适的思想，就是这些思想在压抑我。思想像一巨大的石块突然落到人的身上，人的半个身体被压在石块下，于是他就在石块下挣扎，可是不能脱身。有的人就是被压着也同意活下去，而有的人则不同意活下去，于是就自杀。一位自杀的姑娘的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是一封原载于《新时代》的长信。这位姑娘二十五岁，姓皮萨烈娃。她是一位过去富有的地主家的女儿，她到了彼得堡，为进步尽了义务，学习做助产士，她的愿望实现了，通过了考试，谋得一份地方自治会派任的妇科医生职务；她的生活状况表明，她什么都不缺少，她的收入相当丰厚，但是她疲倦了，太“疲倦了”，疲倦得极想休息。“哪里有比坟墓更好的休息去处呢？”她确实是疲倦极了！这位可怜的姑娘的信通篇都散发出疲倦的气息！这甚至是一封吵闹寻衅、烦躁不安的信：——只求别惹我，我累啦，累啦。“别忘记叫他们把新衬衣和长统丝袜从我身上扒下来，我的桌子里有旧衬衣和丝袜。给我穿上旧的。”她不是用

脱字，而是用扒字，——通篇都是这样，满篇都流露着极端的焦躁。所有这些焦躁的语言都是由于烦恼，烦恼则是起因于疲劳；她竟然出言不逊：“你们真的相信我要回家：哼，我到那鬼地方去干什么？”或者是：“现在，莉帕列娃，请原谅我，还请彼特罗娃也原谅我（她是在彼特罗娃的住处服毒的），特别要请彼特罗娃原谅。我的行为太卑鄙，太令人讨厌了……”看来她是热爱自己的亲人的，但是，她却这样写：“请不要告诉小莉扎，否则她会告诉姐姐，姐姐就要跑到这里来号叫。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号叫，亲人们无一例外都要为自己的亲人号啕大哭的。”写“号啕大哭”，而不写痛哭，显然，这都是由于满腹怨气和烦躁不安的疲劳：快一点，只求快一点——让我安静一会儿！……在她身上吹毛求疵和玩世不恭的疑心太多了，多得叫人难以忍受；就连莉帕列娃和彼特罗娃这些她很喜爱的人她都不相信。这就是她的信开头的话：“不要张皇失措，不要唉声叹气，要控制住自己，把信读完；然后再议论议论怎样做才好。不要恐吓彼特罗娃。可能，什么事都不会有，一笑了之。我的居民身份证在皮箱盖夹层里。”

一笑了之！这个想法，人们将会嘲笑她，嘲笑她那可怜的躯体，什么人嘲笑呢，是莉帕列娃和彼特罗娃，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掠过她的头脑！这太可怕了！

她死后留下的区区一点钱财的处理令人惊奇：“那些钱不要让我家人拿去，给彼特罗娃，那二十五个卢布是切乔特金们给我的路费，还给他们。”对金钱的这种重视，大概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①] 这个全部生活的主要成见的最后反应。总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第3节）：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之，这里流露出整个生活的主导信念，这就是："如果大家全都衣食无虞，全都幸福，那就不会有穷人，不会有犯罪。根本就不会有犯罪行为了。犯罪行为是由贫穷和不幸的环境产生的病态现象"，等等。这就是所有这个渺小的、普通的、极具代表性的和完整的基本信念（尽管他们很快就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感到枯燥乏味），这就是他们用以取代一切，取代真实的生活，取代与大地的联系，取代对真理的信心，取代一切的一切的那些信念。显然，她疲倦了，因为生活乏味，丧失了对真理的所有信心，丧失了对一切义务的一切信心。总之，彻底丧失了生存的最高理想。

可怜的姑娘就这样死去了。可怜的，我不为你号啕痛哭，但是让我怜惜怜惜你也好，允许我吧；让我祈祷你在你不再感到生活苦闷时灵魂复活。可爱的、善良的、正直的，（你们都是这样！）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漆黑的、沉寂无声的坟墓为什么让你们感到那样可爱？你们看看吧！天空里是春天的明媚阳光，树木枝叶繁茂，可是你们却还没有生活就疲倦了。你们的妈妈养育了你们，在你们还是幼儿时他们是那样爱抚你们，她们怎能不为你们放声痛哭？在幼儿的身上曾抱着那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眼前是这里的"弃儿"，他们是多么想生存，他们是怎样要求自己的生存权利啊！你也曾经是儿童，也曾经要求生存，你的妈妈记得这一切，当她把你现在这副僵死的面庞同她看到并且至今仍然记得的那副童稚的面庞上的那副欢乐的笑容相比较时，她怎么能够不痛哭失声，我们又怎么能够因为她们放声痛哭就责备她们呢？现在他们又指给我一个名叫冬妮娅的小姑娘：她出生时腿就是残废的，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腿，代替腿的是一条带子似的东西。她才一岁半，很结实，长相好极；人们都逗她玩，她也向谁都转过头去，向谁都微笑，

向谁都把舌头玩得发出响声。对于自己的腿的事她还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长得畸形，是残废，难道说她也注定要憎恨生活吗？医生一边逗她，一边说："我们给她装上假肢，给她拐杖，教会她走路，她也就不会在意了。"上帝保佑，别让她在意。不，疲倦，憎恨生活，就是说憎恨所有的人，噢，不，不，这个可怜的、丑陋的、没有发育成熟的族群，在巨石重压下挣扎的族群将要度过一生，新的伟大思想将放射出太阳般的光辉，摇摆不定的智慧也将坚定起来，于是全都要说："生活是美好的，而我们则是丑陋的。"我说丑陋并非要责怪谁。眼前我就看到，这个婆娘，这个粗鲁的奶娘，这个"雇用的乳汁"突然吻了一下幼小儿童，就是吻这个幼儿，这个"弃儿"！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里奶娘会吻这些孩子；单单是为了看看这个场面也值得到这里来！而她吻了，并未注意，也未发现我在观察她。她们是为了钱才爱这些孩子吗？雇用她们就是要她们哺乳孩子，并未要求她们亲吻孩子。人们说，各村芬兰人家里的孩子境况更坏；但是有些奶娘已经跟自己哺育的孩子亲热了，人们告诉我，她们把孩子送回孤儿院时哭哭涕涕，后来还特意从远道来探望孩子，带来乡村的小礼物，"跟孩子们一起号啕大哭"。不，这不是钱的事！"亲人们岂不全都是号啕大哭"，就像皮萨烈娃在自己死前留的字条上说的那样，看吧，这些人也跑来大哭，又亲吻，又带来自己的贫困农村的礼物。这不仅仅是代替母亲乳房的雇用乳房，这是*母爱*，这就是皮萨烈娃厌倦了的那种"真实的生活"。难道俄罗斯大地真的是已经无力挽留俄罗斯人了吗？为什么在身边，就在这里，生活却那样蓬蓬勃勃？

当然，这里也有那些招人喜欢的母亲的许多孩子，就是那些坐在自家别墅的台阶上磨剃刀对付自己的情敌的母亲。最后

我要说，这些剃刀都有自己特别令人爱好之处，不过我非常遗憾，在关注凯洛娃太太[1] 案件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走进这里，走进这座建筑物。我对凯洛娃太太的生平一无所知，我根本不能、也没有权利把有关这座建筑物的任何东西运用到她的身上，但是她的整个这部浪漫史和在法庭上关于她的激情的全部娓娓动听的叙述，对我来说，似乎完全失去了一切力量，我一走出这座建筑物就打消了我对她的一切同情。我坦率地承认这一切，可能正因为这样，关于凯洛娃太太“案件”我才写得那样无动于衷。

① 见上文《来函摘登》(1876 年，5 月号，第 1 章，Ⅰ) 及注文。

# 乔治·桑之死

## (《作家日记》，1876年，6月号，第1章，Ⅰ)

我从报纸上读到乔治·桑[①]逝世（她逝世于俄历5月27日，公历6月8日）的消息时，《日记》的前一期5月号已经排版付印了。因此我没有来得及就她的逝世说几句话。然而，只是在读过这个消息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个名字在我的一生中意味着什么：这位诗人在当时得到我多少赞扬和崇拜，同时又给了我多么大的欢乐和幸福！我毫不犹豫地写出上面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字，因为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她是我们的（注意我们的）同时代人中的一员——19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这是我们这个强大的、过于自信同时又是病态的、满怀十分朦胧的理想和极难实现的愿望的一百年间的名人之一，一旦在自己国内，在充满“圣迹的国度里”[②]出现，立即就从我们这里，从我们这个永远在进行创造的俄罗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头脑、爱、神圣而高尚的激情力量，吸引了充满活力的生命和宝贵的信念。但是，我们无需为此而自责：俄罗斯人在赞美这些名人并在他们面前顶礼膜拜时，就已完成并正

---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曾接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她是位多产作家，文集多达一百零五卷。作品以小说为主，也写有戏剧、散文和大量书简。她对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影响。

② 引自亚·斯·霍米亚科夫的诗《幻想》。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持自由派观点，主张废除农奴制和死刑，实行言论、出版等自由。

在完成着直接意义上的自己的使命。请不要对我这些话、特别是关于乔治·桑的话感到惊讶，关于她，可能至今还有争论，在我们这里如果不是百分之九十的人，那么也是百分之五十的人已经把她忘却了；但当时，她在我们这里毕竟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们，她在世界各地的同时代人，又是谁应该在她的墓前为她祈祷呢？我们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我们的俄罗斯和欧洲，即使我们被称为斯拉夫派（请他们不要因此而生我的气）的时候，也是如此。没有必要为反驳这种说法而爆发争论。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在自己未来的崇高使命中，最最崇高的就是全人类的使命，就是普遍服务于全人类，不仅仅是俄罗斯，也不仅仅是整个斯拉夫族，而是全人类。想一想，你就会同意说斯拉夫派也认同这一说法，正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全人类性是俄罗斯人最主要的个性特点和使命，因而才呼唤我们要严肃地、坚定地并且认真负责地做俄罗斯人。不过，这一切都还要做很多解释，就拿这一件事来说，为全人类的理想服务与自愿地、满腹牢骚地抛弃祖国，漫无目的地在欧洲游荡，这是截然对立的两件事，可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它们混为一谈。相反的是，我们从欧洲拿过来并移植到本土的很多、非常之多的东西，我们不是像奴仆对主人那样，也不像波图金们所必然要求的那样，照搬照抄，而是将它们注入自己的机体，使之与我们的血肉融为一体；另外一些东西则是我们独立自主地从痛苦的经历中摸索出来的，如同我们移植的那些东西在欧洲完全一样，对于欧洲那些东西来说，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固有的。欧洲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过，目前这样更好。必要的过程进行得越是不引人瞩目，不事声张，到后来就越会震惊全世界。单从我们对其他民族文学的态度也可以更清晰、更具体地看到这个过程。他们的

诗人们对我们，至少是对我们大多数有教养人士来说，是跟自己的诗人完全一样，正像他们在本民族、在西方毫无二致。我肯定，并且重复地说，任何一位欧洲的诗人、思想家或慈善家，除去他们本国之外，从全世界看，在俄罗斯总是受到最深刻最亲切的理解与认同。比如说，俄罗斯人比德国人对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狄更斯感到更为理解、更为亲切，虽然这些作家的作品翻译数量在我们这里还达不到出书很多的德国的十分之一。1793 年[1] 的法国国民议会授予 au poête allemand Schiller, l'ami de l'humanité[2] 公民权证书，固然法国国民议会做了一件高尚的、庄严的、高瞻远瞩的事情，但它却没有料到，在欧洲的另一端，在野蛮的俄罗斯，这位席勒让野蛮的俄罗斯人感到更符合他们的民族精神，更为亲切，远远胜于他在当时的法国，甚至到后来，在我们整整一百年中都是如此。在这一百年里，在法国只有语文教授才知道席勒、法国的公民和 l'ami de l'humanité,但是并非所有的语文教授都知道，而且知道的人也只是或多或少知道一些。而在我们这里呢，他与茹科夫斯基一起渗透到俄罗斯的心灵中，并在心灵中留下了印痕，他在我们的发展历史上几乎构成一个阶段的标志。俄罗斯对世界文学的这种态度，在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几乎是不可能在同样的程度上重复的现象，如果说这一特征的确是我们的俄罗斯民族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气量狭窄的爱国主义，什么样的沙文主义有权利讲什么话反对这种现象，并且不愿意在预测我们的未来时首先在这种现象中看到巨大的希望和

---

① 指法国大革命。按：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于 1792 年 8 月 26 日授予席勒以荣誉公民称号。

② 法文：德国的诗人席勒，人类的伟大朋友。

最有预示性的事实呢。噢，读完我在上文关于乔治·桑的意义所说的话之后，很多人显然要笑出来；但是，发笑的人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对所有这些已成为过去的事来说，过去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就是乔治·桑本人，也已作为七十岁的老太婆而与世长辞了，大概她早已享尽了自己的荣誉。但是，这位诗人的出现所构成的“创新”，构成“全人类的”东西的一切，——当时在我们这里，在我们俄罗斯，都立即引起了反响，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没有被我们忽视，这就证明，任何一位诗人，一位欧洲的革新者，在那里出现的任何一个有新的思想、新的力量的人都不会不立即成为俄罗斯的诗人，不可能避开俄罗斯的思想，不可能不立即成为俄罗斯的力量。不过要顺便说一句，我完全不是在写关于乔治·桑的评论文章，只不过是想在这位离开人间的死者的新坟前向她说几句告别的话。

## 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

（《作家日记》，1876 年，6 月号，第 1 章，Ⅱ）

乔治·桑走上文坛时，正是我进入青春期的年代。现在我非常庆幸，那已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因为现在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完全可以畅所欲言了。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只准读小说，其余的一切，几乎任何一种思想特别是来自法国的思想，都是严加禁止的。噢，当然啦，人们常常是不知道如何观察，再说，到哪儿去学习观察呢：连梅特涅[①] 都不会观察，就更不必说我们那些摹仿者了。于是就冒出了一些“可怕的东西”(例如冒出了整整一个别林斯基)。但是，好像是为了防止出差错，特别是到后来，就开始查禁了，似乎无所不禁。众所周知，其结果只能是谨言慎行。可是从一开始到中期，一直到最后，小说始终是允许阅读的，在这上面，卫道者们正是在乔治·桑的身上铸成了大错。

你们还记得一首诗吧[②]：

---

① 梅特涅（1773—1859），公爵，1821—1848 年间任奥地利政府首脑，为“神圣同盟”的组织人之一。在政治上极力反对各国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主张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在奥地利与德国实行警察统治，1848 年奥地利革命时被迫下台，流亡英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于 1849 年 12 月被判处四年苦役。他在 19 世纪 40 年代曾指责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政府为梅特涅服务。

② 诗的作者为丹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他是诗人，俄国 1812 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交往甚密。

梯也尔[①] 的书和拉波[②]
他背诵如流，
如同激进的米拉波[③]，
他也赞美自由。[④]

这是颇有才气、极为罕见的诗句，它们将永远传诸后世，因为它们是有历史意义的；由于它们出自丹尼斯·达维多夫这位诗人、文学家与最正直的俄罗斯人，所以就更为可贵。既然丹尼斯·达维多夫那时把梯也尔（显然是由于《革命史》）这样的人都视为危险分子，在诗中还把他与拉波（可见他也是那样的人，不过我不知道）相提并论，那就很清楚了，在当时能够为官方所允许的就极其有限了。结果是，我们以小说的形式接触到的东西不仅仅做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可能正好相反，还是以当时最“危险的”形式进行的，这是因为拉波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多少读者，而乔治·桑的读者则成千上万。这里还应该指出，早从上一世纪起，在我们这里尽管有马格尼茨基[⑤] 与利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多卷本《法国革命史》的作者。1871—1873 年任法国总统，1871 年领导了对法国巴黎公社的镇压。

② 拉波（1743—1793），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

③ 米拉波（1749—1791），伯爵、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领袖。

④ 引自俄国诗人丹尼斯·达维多夫的《现代之歌》(1836)。

⑤ 马格尼茨基（1778—1844），俄国喀山大学区学监（1819—1826）。以思想反动闻名，主张封闭无神论倾向的喀山大学，认为鞑靼人的统治是俄国的幸运，使俄国免受欧洲的毁灭性的影响。

波兰季[1]之流，欧洲的每次思想运动还是立刻就广为人知，立刻就由我们的上层知识分子传播给对此多少有点儿兴趣的、有思考头脑的人们。19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运动正是这样。这一广泛的欧洲文学运动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初就在我们这里很快得到理解。很多新涌现的演说家、历史学家、政论家、教授的名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人们甚至部分地、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到整个这场运动的走向。这场运动特别鲜明地表现在艺术中——表现在小说中，主要在乔治·桑的小说中。不错，关于乔治·桑，在她的小说还未译成俄语之前，先科夫斯基[2]与布尔加林[3]就已向读者提出警告。他们说，乔治·桑穿着长裤在街上走，这使俄国的贵妇人们感到特别可怕，想拿她的道德败坏恐吓人，想把她变为一个可笑的人物。这位打算为自己的杂志《读者文库》[4]亲自翻译乔治·桑的先科夫斯基开始公开称呼乔治·桑为叶戈尔·桑夫人，看来，他对自己的俏皮颇为得意。后来，1848 年，布尔加林在《北方蜜蜂报》[5]上发表评论她的文章，说她每天都在关卡上跟皮埃尔·勒鲁[6]酗酒，还在内务

---

① 利波兰季（1790—1880），俄国内务部执行特殊任务的官员，曾组织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监视。

②④ 奥·尤·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读者文库》月刊（1834—1865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主编和出版人。以布拉姆别乌斯男爵为笔名发表作品，撰写反对俄国文学中“自然派”倾向的评论文章。

③⑤ 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北方蜜蜂报》（1825—1864 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发行人。他曾向当局写告发当时作家的告密信，因此颇受时人鄙视。《北方蜜蜂报》是公认的反动报纸，但该报在他去世后，发行者易人，从 1860 年起持民主倾向。

⑥ 皮埃尔·勒鲁（1797—187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为圣西门（1760—1825）的追随者，后来创立了自己的折中主义学说，对乔治·桑有重大影响。

部参加强盗和内务部长勒德律-罗兰① 狂欢暴饮的夜宴②。这是我自己读过的，记得很清楚。不过，在1848年那时候我们的所有读者差不多都已知道乔治·桑，没有人相信布尔加林的话。她的作品最初大约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被译成俄语的，遗憾的是，我不记得，也不知道，我们翻译她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是在哪一年翻译的；这也表明，她的作品给人的印象之深是令人吃惊的。我认为，她那些人物的理想高尚和纯洁无瑕，她那种严谨、矜持的叙述语调的朴素的美使大家同还是少年的我一样感到惊讶，而这个女人竟然会身穿长裤在街上行走，竟然道德败坏③！我在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她的小说《蹦蹦跳跳》，这是她早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我记得，读后我整整一夜都处在极为兴奋的心境中。我认为，即使根据我的记忆判断，如果我说，在当时突然风靡欧洲的一代新作家中，乔治·桑在我们这里几乎是名列榜首，那也不算过分。可能，在读者的心目中，差不多与她同时出现在我们这里的狄更斯也要让位于她④。我就不去说在她之前出现、同时在19世纪30年代还写出了《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这样作品的巴尔扎克了。（别林斯基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是不公正的⑤，

---

① 勒德律-罗兰（180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为临时政府内的左派。乔治·桑与左派持积极合作的立场。

② 俄语的成语，按原文字面直译应为雅典的晚宴。

③ 乔治·桑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在当时颇受非议。

④ 狄更斯的作品是在乔治·桑之后被译介到俄国的，19世纪40年代中期才在俄国得到广泛流传。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本文中提到的别林斯基对巴尔扎克的评论可能是从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的口中听到的。格里戈罗维奇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与别林斯基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他说，当他谈到翻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的时候， （转下页）

完全忽视了他对法国文学的意义。）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从任何评价的角度来谈这一切的，我纯粹是想回顾一下当时俄罗斯读者群众的趣味，谈谈在读者中直接引起的印象。重要的是，读者甚至学会了从小说里面吸取当时深恐他们知道的一切。起码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我们这里，就连读者群众也不同程度地知道乔治·桑是那个时期西方新人类型中最出色的、最名副其实的典型代表人物，这些新人一出现便公然否定上个世纪末法国（确切些说是欧洲）血腥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大革命是以这些成果结束了自己的活动的。这场革命一结束（拿破仑一世之后），就出现了要表达新的希望、新的理想的新尝试。先进的思想家们十分清楚，专制主义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已经发生的仅仅是“Ote toi de là gue je mý mette”[①]，世界的新胜利者（资产者）可能比以前的暴君（贵族）更坏，“自由、平等和博爱”只不过是豪言壮语，仅此而已。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这样一些学说，按照这些学说，“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豪言壮语变成了不可实现的空谈。胜利者们已经是带着嘲讽的口吻说出或者确切些说是提到这三个神圣的词语；还出现了一门科学（经济学家们），它通过当时也是带着新的语言登台的自己的卓越代表去嘲笑和谴责人们曾经为之流过多少鲜血的三个词语的乌托邦意义。这样，就在胜利者们欣喜若狂的同时，令这些狂欢的人们心惊胆战的忧郁的、闷闷不乐的人物开始抬头了。恰恰在这个时刻，突然产生了真正新的思想，产生了新

（接上页）“别林斯基突然大发雷霆……说巴尔扎克是市侩作家，还说，如果他拿到这本《欧也妮·葛朗台》的话，一定要一页不漏地指出这部作品的庸俗之处。”（格里戈罗维奇：《文学回忆录》，莫斯科：1961年，第87～88页。）

① 法文：“你从这里滚开，让我来取代你。”

的希望：出现了一些人，他们公然宣称，事业半途而废是毫无理由的、错误的，胜利者们的政治换班没有达到任何结果，事业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人类的更新应该是激进的、社会性的。噢，当然，与这些呼声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极为有害的、荒谬的言论，不过，主要的是，希望又重新放射出光芒，信念又在复活起来。这次运动的历史是尽人皆知的，这次运动似乎到今天还根本没有打算止步。在这里，我完全不是想说什么赞成或反对它的话，我只是想指出乔治·桑在这次运动中的真正位置。她的位置应该从运动的初期去找，当时，欧洲在欢迎她的时候，人们说她在宣扬妇女的新的地位，预言"自由妻子的权利"（先科夫斯基关于她的说法）；但这不完全正确，因为她宣传的根本不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她也没有发明什么"自由妻子"。乔治·桑属于整个运动，而不限于女权的宣传。的确，她本人作为女人，自然更喜欢表现女主人公，而不是男主人公。显然，全世界的女人现在应该为她致哀，因为女人的一位最高尚、最完美的代表人物逝世了。此外，她在才能和智慧的力量方面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女人，这个名字已经载入史册，成为欧洲人中注定不应被遗忘的、永不泯灭的名字。

谈到她的女主人公们，那么我重说一遍，我从十六岁第一次读她的作品起，人们写她、谈她的东西与我实际读到的东西之间的奇怪矛盾，使我感到惊讶。事实上，她的很多、至少是一部分女主人公都体现着高度的道德纯洁，假如在诗人的心灵中没有巨大的道德要求，不尊崇最高的义务，不理解也不承认善良、容忍与公正是最崇高的美，那么就不可能想象出这种高度道德纯洁的人物。诚然，善良、容忍和承认应尽义务就包含着提出质问与抗议的强烈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很可贵，因为它出自最高的真理，而离开这个真理，人类决不可能坚守自己

的全部道德高度。这种自豪感 guand même[①] 不是，比如说，建立在我比你好、你不如我的相互敌视之上的，它只是一种不可能与谬误和罪恶相妥协的最真挚的情感。我再说一遍，虽然这种情感既不排斥宽容，也不排斥慈善；而且这种自豪感还要求自愿地承担沉重的义务。她的这些女主人公们渴望牺牲和建树功勋。那时候，我尤其喜爱当时所谓的她的威尼斯小说（《蹦蹦跳跳》、《安蒂亚娜》就属于威尼斯小说）这类早期作品中几种类型的姑娘。这些典型后来在小说《雅克》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雅克》是一部天才的作品，它把关于贞德[②] 这个历史问题做出了高明的也许是无可争辩的处理。乔治·桑通过一个做工的农家姑娘让历史上的贞德的形象在我们面前突然复活了，她以活生生的形象为这一壮丽而奇妙的历史现象的真实可能性进行辩解，——这纯粹是乔治·桑式的风格，因为除开她之外，在与她同代的诗人中，可能谁都没有在自己的心灵里面孕育过这位天真无邪的姑娘的这么纯洁的理想，——纯洁的，由于自己的洁净无瑕而强有力的理想。我在上面说过的所有这些类型的姑娘在几部作品中，以自己的形象连续重复着一个任务、一个主题。（其实，不只是这些姑娘们，后来，在她的早期作品之一的优秀小说《侯爵夫人》中也重复过这一主题。）在作品中描写的是爽快、正直但又没有经验的年轻女人的性格，她即使无意之中突然落进罪恶的巢穴，她那值得自豪的道德纯洁不怕也不可能因与罪恶打交道而被玷污。豪迈牺牲

① 法文：同样。

② 贞德（1412—1431），又译冉·达克。在1337—1453年的百年战争末期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法国民族女英雄，出身农民家庭，被俘后，被宗教法庭处以火刑。1920年天主教会尊她为圣者，故被人称为圣女贞德。

的愿望（似乎这正是期待她做出的牺牲）激励着年轻姑娘的心，她毫不踌躇，毫不怜惜自己，以无私献身的、大无畏的精神突然迈出最危险的和致命的一步。她看到的、遇到的东西后来一点儿也没有使她困惑、恐惧，恰恰相反，却即刻使这颗年轻的、刚刚认识到自己的全部力量——天真、正直和纯洁的力量的心灵增强了勇气，使她的毅力成倍增长；向她那还未因在生活中所做的种种妥协退让而变得污浊的头脑指明了条条新的道路和新的视野，而在此之前这颗头脑虽然精力旺盛，朝气蓬勃，但却还不了解自己。与之相应的是作品的最无可挑剔的和最完美的形式：乔治·桑当时特别喜欢以幸福、纯洁、真诚和年轻的、无所畏惧的朴实心灵的胜利结束自己的诗篇。这类形象能够扰乱社会，引起怀疑和恐惧吗？相反的是，就连要求最严格的父母都允许在自己的家庭中阅读乔治·桑的作品，他们惊讶的只是："为什么都这样议论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响起了警告的声音："在女人要求的这种自豪感中，在正义与邪恶的这种不可调和性中，在这种不向邪恶做任何让步的毅然拒绝中，在纯洁无邪奋起斗争并且无所顾忌地正视屈辱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中，——在这一切里面都蕴含着毒药，也就是未来的妇女反抗、妇女解放的毒药。"那又怎样！也许，关于毒药的话说得对；毒药确实产生出来了，至于它要去消除什么，什么东西会被毒死，什么东西会因它而得救，——这正是目前摆在面前的问题，长期尚未解决的问题。

对现在来说，这些问题早已解决了（似乎是这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乔治·桑的荣誉，对她的天才的信心是那样的大，我们这些与她同时代的人都在期待她在未来还会写出无比伟大的作品，说出人们从未听到过的新

话，甚至是解决某些事情的话，作为定论的话。这些期望没能实现：原来，在这时，也就是19世纪40年代末，她已经说了一切注定该由她说、她必须说的话，现在，在她的新坟之前，关于她完全可以说盖棺论定的话了。

乔治·桑不是思想家，但她是对人类面临的更幸福的未来最具远见卓识的预感者之一（如果可以运用这种华丽的词藻来表达的话），她一生都意志昂扬，胸襟坦荡，相信人类的理想是能够实现的。正因为这样，她能够在自己的心中树立起理想。始终不渝地坚守这种信念，这通常是一切心灵高尚的人、一切真诚热爱人类的人的归宿。乔治·桑至死都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她坚定地信仰上帝，相信自己的生命不朽。不过，关于她，这样说是太不够了：她不仅是这样，可能，在自己的同龄人——法国作家中间，她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作为天主教徒，在形式上她没有信奉基督。当然，作为法国女人，按照自己同胞的观念，乔治·桑不可能自觉地宣扬希腊正教的主要思想①，即“在全宇宙中，除他之外，没有能够拯救人类的名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西欧社会、天主教教会和新教教会都丧失了“真正的”信仰，只有东正教才把这种信仰保存了下来。他在《群魔》的预备材料中也提到这一看法：“在西方，基督被歪曲了，被耗尽了……”；“成为文明人，即欧洲人之后，还能够有信仰吗？也就是说，还能够无条件地相信上帝之子基督的神灵吗（因为这是整个信仰的关键所在）？文明以事实回答这个问题说：不，不能够（勒南）；回答这个问题的另一件事实是，社会没有坚守对基督的纯正理解（天主教是反基督的，是放荡女人，路德宗新教则是莫罗勘派）。”（莫罗勘派是俄国18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个否认一切宗教仪式的教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1875—1876年的一则札记中还写道：“西方以其全部生活所造就的最高道德理想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及其理想，关于这一（转下页）

字"[1]；但这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矛盾，我要再一次说，可能，乔治·桑是最彻底的基督徒之一，虽然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情感之上，人类的精神渴求之上，人类对完美和纯洁的追求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需求[2]之上。她（直至临终）无条件地相信人的个性，一生都在赞美人的个性，拓展关于个性的观念，——在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是这样，从而在自己的思想上、情感上都与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点相吻合，这个观点就是承认人的个性和个性的自由（自然也就承认个性的责任）。由此而来的是，承认义务以及对此的严格道德要求，无保留地承认人的责任。可能，在她那个时代的法国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和作家能够那样深刻地理解"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至于她的质问与反抗的自豪感问题，我重申一次，这种自豪感从不排斥慈善、对屈辱的宽恕甚至是出于对侮辱者的怜悯而产生的无限忍耐；相反，乔治·桑在自己的作品中不

（接上页）点是没有争辩余地的。但是，保留在东正教里面的基督教的真理是高出于社会主义的。在这里我们就与欧洲冲撞了……这就是说问题将如何解决：基督拯救世界，还是以截然相反的原则，即以消灭意志，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拯救世界。"按：这段话依据的是《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节。全文为："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① 引自《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4章，第12节，引文与原文稍有出入。原文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与文章中多次以蚁穴与蚂蚁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者的象征。

止一次地颂扬这些真理的美，不止一次地塑造过最真挚的宽容与爱的形象。人们在写她的时候说，她是作为操劳一生的高尚母亲、郊区农民的朋友、为自己的友人所无限热爱的人而死去的。我觉得，她重视自己的贵族出身（按照母亲的身世，她出身于撒克逊王室），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她重视人们的贵族气质，那也是因为，她认为这种气质是以人的心灵完美为基础的：她不可能不爱伟大的事物，不可能与卑鄙的东西妥协，不可能放弃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可能是过于高傲了。是的，她也不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含垢忍辱的人物，不喜欢描写公正的但却是畏缩的、痴呆的和逆来顺受的人物，正如伟大的基督徒狄更斯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所做的那样；相反，她把自己的女主人公们塑造得高傲，简直是写成女王。她喜欢这样，应该指出这个特点；她是很有特色的。

## 我的奇谈怪论

（《作家日记》，1876 年，6 月号，第 2 章，Ⅰ）

又是跟欧洲争吵（噢，还不是战争：据说我们，亦即俄罗斯，离战争还远得很），讲坛上又是无穷无尽的东方问题，又是欧洲以不信任的眼光看俄罗斯人……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博得欧洲的信任呢？难道欧洲曾经以信任的眼光看待过俄罗斯人吗？难道欧洲能够在某个时候信任地而不是敌视地看待我们吗？噢，当然，某个时候这种目光会改变的，某个时候，欧洲会更仔细地观察我们，把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然而，关于这个某个时候是非常值得一谈的，但是现在，现在我好像想起了另一个侧面的问题，不久前我非常想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没有人会同意我，我也觉得，我是正确的，尽管是部分的。

我说过，欧洲不喜欢俄罗斯人。关于不喜欢这一点，我想，是没有人不同意的。顺便说说，欧洲指责我们，指责全体俄罗斯人，几乎无一例外，说我们是可怕的自由派，更有甚者——是革命者，说我们总是怀着某种爱去接近欧洲的破坏势力，而不是保守势力。为此，很多欧洲人都以嘲笑的和傲慢的憎恶目光看着我们：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别人的事情上做否定者，他们干脆就剥夺了我们对欧洲人的否定权利，他们的理由是，不承认我们属于“文明”范畴。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简直是在欧洲游荡的野蛮人，为了能够在什么地方破坏什么东西而高兴的人，——为破坏而破坏，只要看上一眼，所有的一切是怎样崩溃的便感到满足，如同野蛮人的部落和拥向古罗马毁灭圣迹的匈奴，他们对他们所毁坏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

毫无概念。在欧洲的大多数俄罗斯人的表现确实是自由主义者,——这是真的,简直奇怪。有谁在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我们整个世纪中,几乎十分之九的俄罗斯人在欧洲受着文化熏陶,却总是倾向欧洲人中有自由主义情绪的阶层,倾向“左翼”,也就是总要自己否定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文明的阶层,当然,否定的不尽相同。(对于文明,梯也尔所否定的东西与1871年巴黎公社否定的东西截然不同。)在欧洲的俄罗斯人也“不尽相同”,他们的自由主义也是各种各样的,不过,我重申这一点,他们毕竟从一开始就比欧洲人更直接倾向于极左派。总而言之,在俄罗斯人里面梯也尔远远少于公社分子。而且,你看得出来,他们完全不是什么潦倒漂泊的人,至少不尽是一些潦倒漂泊的人,他们甚至是很有风度和文明外表的人,有时几乎像部长。但是,欧洲人不相信这种外表,他们说:“Grattez le russe et vous verrez le tartare.”(刮掉俄罗斯人的表皮,就露出鞑靼人。)这一切也许是对的,但我有一个想法:俄罗斯人在同欧洲的交往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极左翼,这是否因为俄罗斯人是鞑靼人,像野蛮人一样喜欢破坏,或者,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在推动他,——这就是问题所在!您会同意,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同欧洲的争吵接近尾声了;向欧洲打开窗口的作用完结了,别的什么事情正在到来,至少是应该到来了。现在每一个人,凡是多少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了。总之,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应该为某种事情做好准备,准备同欧洲进行新的、比迄今为止更具独特性的接触,——这是否就是东方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天晓得!……因而所有这一类问题,探索甚至猜测,以至于奇谈怪论,仅就它们能够引发思考这点来说,就都能令人感到兴趣。对下述现象怎么会不感到惊奇呢:

有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纯粹是欧洲人，在我们这里把他们称为“西方派”，这个绰号使他们引以为荣，感到高傲，他们至今还把另外一半俄罗斯人戏谑地称作克瓦斯派和粗布衣[①]派，——我认为，不能不叫人奇怪的是，他们比谁都倾向于文明的否定者，倾向于毁坏文明，倾向于“极左翼”，而在俄国任何人对这种现象都不感到惊讶，这种现象甚至从来都没有成为问题，这怎么不奇怪呢?

我坦率地说：我心中有了答案，但我不愿论证我的思想，只想稍加叙述，试一试只把事实摆出来。其实，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证实的，单凭这个理由就不能加以论证。

这就是我的想法：在这件事上（也就是我们最激烈的西方派都倾向极左翼，实质上是欧洲的否定者），是否表现出反抗的俄罗斯心灵？俄罗斯心灵始终是，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憎恶欧洲文化，在很多、极多方面都与欧洲文化格格不入。我就是这样想的。噢，当然，这种反抗差不多一直是无意识的，但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俄罗斯的嗅觉没有衰退：俄罗斯心灵虽然是无意识的，但却不正是为了自己的纯俄罗斯，为了自己俄罗斯的被压抑的本原而进行反抗吗？当然，有人会说，即使是这样，那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否定者——匈奴人、野蛮人、鞑靼人——毕竟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东西才否定，而是由于不久前自己还处于低级阶段，竟然在两个世纪里都没有能够理解欧洲所达到的高度”。

必然会这样说的。我同意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不会予以回答，今后也不会对它做出回答，我只是冒昧地宣布，我断然否定关于鞑靼人的设想。噢，当然，现在在全体俄罗斯人

① 为旧时俄国农民穿的家织粗呢无领上衣。

中，尤其是在一切都已过去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确实已经过去了），在所有俄罗斯人中还有谁会反对彼得大帝的事业，反对打开的窗口，有谁会挺身出来反对他，并留恋古代莫斯科公国呢？问题完全不在这里，我要谈的也不是这个问题。我要谈的是，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们透过窗口所看到的一切，无论如何好、如何有益，但这里面毕竟有那么一些坏的、有害的东西，以致使俄罗斯的嗅觉不断地为之愤怒，不断地加以反抗（虽然在此之前自己也曾迷误过，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出于自己的鞑靼精神而反抗，事实上，可能是由于在自己身上还保留着比从窗口看到的东西更高、更好的东西……（不言而喻，不是反对一切：我们获得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不想知恩不报，可是，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可以反对的。）

我要重述一遍，所有一切都发生得极具特色：正是我们那些最激烈的西方派，正是这些改革的斗士们在当时成了欧洲的否定者，站到了极左翼的队伍里……这也好：结果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变为最真诚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精神而斗争的战士，当然，如果在当时就向他们说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会哈哈大笑或者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反抗的出发点的高度，相反的是，在两个世纪里，他们时时都在否定自己这种高度，不仅是否定这种高度，而且否定对自己的尊重（的确是有喜欢这样做的人），他们甚至做得连欧洲人都为之惊讶；其实，他们自己原来就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我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猜测叫做我的奇谈怪论。

例如，别林斯基从气质上看，是一个极易着迷的人，在俄罗斯人中他差不多是第一个公然倾向欧洲社会主义的人，他否定整个欧洲文明的秩序，而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文学里，同斯拉夫派战斗了一生，看上去，他赞成的完全是相反的东西。

假如那些斯拉夫派当时对他说，他就是为俄罗斯的真理、俄罗斯的独特性与俄罗斯的本原而斗争的最坚定的战士，他为之斗争的正是那些他为了欧洲而否定的俄罗斯的东西，他岂不是会觉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此外，假如再对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实实在在的保守派，而其原因就在于，在欧洲，他是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分子，对这一切，他难道不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可是，实际上，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这里，双方都犯了个大错。首先是，当时的西方派把俄罗斯与欧洲混为一谈，毫不含糊地把俄罗斯当做欧洲，在否定欧洲及其秩序时，认为这种否定同样适用于俄罗斯，而事实上俄罗斯根本不是欧洲，不过是披上了欧洲的外衣而已，在外衣下面完全是另外一个实体。斯拉夫派则请他们看清楚，俄罗斯不是欧洲，而是另外一个存在，斯拉夫派明确指出，西方派把不相似的和不相称的事物等量齐观了，适合于欧洲的结论，完全不适用于俄罗斯，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欧洲所希求的一切，——在俄罗斯早已有之，起码是已处在萌芽状态，已有其可能性，甚至正在构成俄罗斯的本质，不过不是通过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全世界人类更新的思想是在它们应该借以表现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表现于上帝的真理，基督的真理，这种基督的真理终有一天会在大地上实现，它完完整整地保存于东正教之中。他们需要首先学习俄罗斯，然后再下结论；但在当时是不可能学习的，说实在的，没有条件。再说当时谁能稍稍了解俄罗斯呢？当然，斯拉夫派了解的比西方派多百倍（这还是 minimum），但斯拉夫派也几乎是靠着自己非常敏锐的嗅觉在试探地、思辨地和抽象地行动着。只是到了近二十年，要学点什么才成为可能：但是，现在有谁稍稍了解一点俄罗斯呢？应该研究的东西非常非常多，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刚刚冒出一点儿头来——我

们这里立刻又一切都众说纷纭。比如说，现在又重新提出东方问题：应该承认，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有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接受一个共同一致的解决意见？而这还是在这样重大的、这样与我们民族命运攸关的问题上！东方问题算得了什么！哪里来的那么些大问题！请看一看我们内部的、日常的和眼前的那些成百上千的问题吧——处处是普遍的摇摆不定，没有主见，没有工作习惯！俄罗斯快没有森林了，地主、农民都在疯狂地毁灭森林。可以肯定地说，森林只卖十分之一的价钱，因为交易不能拖时间很长。我们的孩子还来不及长大，市场上的木材就会减少十倍了。结果会怎样，——可能是毁灭。可是你试一试去提出削减人们破坏森林的权利，你会听到什么呢？一种意见说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另一种意见则说这是侵犯私有财产的权利，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立即出现两个营垒，自由派的决定性意见倾向哪一方面，还是个未知数。还不只是两个营垒吧？事情将要长期拖下去。有的人以现代自由主义的口吻嘲讽说，祸不单行，假如把全部俄罗斯森林都毁掉，那么起码有一个好处，用树条抽打人的体罚就彻底消灭了，因为地方法庭就没有东西来抽打犯罪的农夫和婆娘了。当然，这是自我安慰，而且也靠不住：即使森林完全光了，打人用的树条还是绰绰有余的，将会从国外输入。看呀，犹太人要做地主啦，于是到处都在又喊又写，说他们糟踏俄罗斯的土地，犹太人花钱购买庄园之后，为了收回资本和利息，立刻就要把买到的土地的地力和资源榨取得一干二净。可是你要说点什么反对的话——立刻就对你大吵大叫，说你侵犯了经济自由和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但是这里有什么权利平等可言呢，如果说在这里，处于首

要的和第一位的是犹太教法典 Status in Statu①，如果说不仅仅是耗尽地力，而是进一步榨干我们的农夫，我们的农夫刚从地主那里获得解放，现在，毫无疑问，很快就连同自己的整个村社陷进比过去坏得多的奴隶地位，落入坏得多的地主手中——就是那些刚刚吸尽西部俄罗斯农民血汗的地主，这些地主现在不仅购买庄园和农民，而且已经开始收买自由派的舆论，还进行得卓有成效。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在解决一切问题上，无论是怎么个解决法（请注意，真的如此）都这样犹豫不决，这样众说纷纭？我认为，完全不是由于我们的无能，不是由于我们不善于办事，而是由于我们始终不了解俄罗斯，不了解它的本质和特殊性，它的思想和精神，尽管大体上从别林斯基和斯拉夫派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二十年。甚至可以说，在这二十年的学习中，对俄罗斯的研究前进了很多，可是俄罗斯的嗅觉却似乎比从前减弱了。原因在哪里？如果说斯拉夫派的俄罗斯嗅觉在当时挽救了他们，那么这种嗅觉也可以在别林斯基的身上找到，以至于斯拉夫派都可以把他看做自己最好的朋友。我重申一遍，在这上面双方都有很大的误解。无怪有时说出精辟见解的阿波隆·格里高利耶夫② 说："假如别林斯基活到今天，他多半会同斯拉夫派走到一起。"这句话里是有自己见解的。

① 拉丁文：法律规定的地位。

② 阿波隆·格里高利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评论家、诗人。世界观接近斯拉夫派。

## 奇谈怪论的结论

(《作家日记》，1876年，6月号，第2章，Ⅱ)

人们会对我说，这样，您是否断言“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在他变为欧洲公社分子的同时，因而也就立即成为俄罗斯的保守派”呢？不是，做这样的论断是太冒险了。我不过是想说明，在这个几乎一字不差地借用的思想中也有一分真理。这里主要的是有许多无意识的东西，而据我的看法，可能是对绵延不断的俄罗斯的嗅觉与对俄罗斯精神的生命力有极坚定的信念。不过就算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奇谈怪论，但是，我想提出一件事实作为结论：这是一件事实和从这件事实得出的结论。我在前面说过，俄罗斯人在欧洲的突出特点是自由主义，他们只要与欧洲一接触……至少有十分之九的人倾向左翼，而且是极左翼，我不坚持这个数字，可能不是十分之九，我要坚持的是，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人比非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人多得不可比拟。但还是有非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人。确实是有的，时时都有那么一些不仅不否定欧洲文明，相反地还拜倒在欧洲文明面前的人(其中很多人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这些人竟至丧失了自己最后一点儿俄罗斯嗅觉，丧失了自己的俄罗斯人格，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改换了祖国，他们如果没有取得外国国籍，那么，至少也是几代人都生活在欧洲。这样一些人与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人相反，与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人的无神论和公社精神相反，毫不迟疑地就倾向右翼、极右翼，成为激烈的欧洲保守派，这是事实。

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改信天主教。这还

不是保守派，这还不是极右翼吗？但是，请原谅，欧洲的保守派反过来就是俄罗斯的彻底否定派！他们变成了俄罗斯的摧毁者、俄罗斯的敌人！可见，把俄罗斯人从骨子里演变成真正的欧洲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之子，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从二百年的经验得出的重要事实。俄罗斯人成为真正的欧洲人之后，他就不可能不同时成为俄罗斯的自然敌人，这就是结论。这就是打开窗口的人所希望的吗？这就是他们的用意吗？这样，就形成两种类型的文明俄罗斯人：欧洲人别林斯基尽管说过一些有关俄罗斯的错话，可是他在否定欧洲的同时却成了纯正的俄罗斯人；而世袭的、古老的俄罗斯公爵加加林① 一成为欧洲人就认为不仅需要改信天主教，而且公然跳进耶稣会②教士里面。现在说说吧，他们之中谁更是俄罗斯的朋友？谁更是俄罗斯人？这第二个例子（关于极右翼的）岂不是在证实我最初提出的论断？我的论断是，俄罗斯人的社会主义者与公社分子首先不是欧洲人，一旦误解消失，他们理解了俄罗斯，归根结蒂又会成为纯正的可爱的俄罗斯人；我说的第二点是，俄罗斯人即使多少还保留一点儿俄罗斯气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变为严格意义上的欧洲人，既然这样，可见俄罗斯也是完全独立的、特殊的、根本不同于欧洲的国家，自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而欧洲在指责俄罗斯人、嘲笑他们的革命行为时，可能他自己就完全不正确，我们不是在还没有建设的地方只进行

① 伊·谢·加加林（1814—1882），公爵、俄国外交官、德国哲学家谢林（1775—1854）的学生。1842 年接受天主教，1843 年参加天主教的耶稣会，主张东正教归附梵蒂冈教廷。

② 天主教修会之一。在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耶稣会成为天主教反对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它的组织纪律森严，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各地会长必须服从总会长，总会长常居罗马，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统治权。

破坏的革命者，不像匈奴和鞑靼人，我们是为了别的，说实话，这别的东西是什么，目前我们自己还不知道（那些知情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减少）。总之，我们是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的革命者，甚至是由于保守主义……但是，这一切全是过渡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全是次要的、枝节的，现在永远无法解决的东方问题又摆到日程上了。

## 东 方 问 题

（《作家日记》，1876 年，6 月号，第 2 章，Ⅲ）

东方问题！我们之中有谁在这一个月里没有体验过极不寻常的感受，报纸上有多少议论！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有多么强烈的愤愤不平，在一些人的评论中有多少犬儒主义，在一些人的心灵中有多少善良正直的情感冲动，在一些守财奴中有多少嘈杂混乱！无可怀疑的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虽然有许多令人吃惊之处。再说，也难以想象在俄罗斯会有那么多怯懦之徒。不错，在俄罗斯是有那么一些故作怯懦的人，但是，看来他们选错了时间，现在他们即使害怕也已经为时过晚了，不合算；不会得到好处。不过故作怯懦的人也有个分寸，他们毕竟并不希望俄罗斯像古时候那样蒙受耻辱。古时候，沙皇、严厉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向国王斯特凡·巴托利依[①] 派遣使者，要求使者必要时可以忍受殴打，只要求得和平即可[②]。总而言之，社会舆论似乎已经明确，不赞成以屈辱换取任何和平。

塞尔维亚公米兰和黑山公尼古拉仰仗上帝和自己的权力，已经起来反抗苏丹[③]，当人们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可能事情就明朗了：是重要的会谈，或者甚至是毅然决然的战争。现在

---

① 斯特凡·巴托利依（1533—1586），波兰国王、军队统帅。

② 伊万雷帝是在多次战役大败之后，于 1581 年向波兰求和的。

③ 1876 年 6 月 30 日塞尔维亚与黑山向土耳其宣战，他们的军队于 7 月 2 日越过边境与土耳其军队交战。塞尔维亚公米兰即米兰·奥布廉诺维奇（1854—1901），1868—1882 年为塞尔维亚公，1882—1889 年为塞尔维亚王朝国王米兰一世。黑山公尼古拉即尼古拉·彼特罗维奇-涅戈什（1841—1921）。

事情进展得很快。列强的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拒绝承认柏林国际会议结论的英国外交的乖戾姿态，以及突然接踵而至的君士坦丁堡的革命和穆斯林宗教狂热的爆发，最后还有巴希布祖克人[①] 和契尔克斯人对六万保加利亚和平居民、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屠杀，——所有这一切都一下子点燃起了战火，推动了战争。斯拉夫人有很多希望。如果把他们的全部力量加在一起，他们有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其中四分之三是相当出色的正规军。但主要的是精神：他们是怀着对自己的权利的信念、对胜利的信心去作战的；而土耳其人，尽管有宗教的狂热，但他们是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极其动荡不安，如果说在最初几次交战之后，这种动荡不安就变成害怕得丧魂落魄是毫不奇怪的。看来，欧洲如不插手干涉，斯拉夫人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欧洲似乎已经决定不干涉了，但是，很难说在当前的欧洲政治中会有什么稳定的和最后确定的东西。由于问题重大，又是突然出现，大家好像都考虑等一等看，都推迟做出最后决定。但是，听说东边三个大国[②] 的联盟继续存在，三国君主的私人会晤也在继续进行，因此，从这个方面看，不干涉斯拉夫的斗争这一点目前还是确实的。龟缩的英国正在寻找同盟者：能否找到还是个问题。如果能够找到的话，看来，也不是法国。总之，整个欧洲还在观望基督徒与苏丹的这场斗争，不参与进去，但……这只是暂时的，到一定的时候……到分割遗产的时候。但可能有遗产吗？将会是什么遗产？如果上帝让斯拉夫人获得成功，那么欧洲将会把他们的成功限制在多大范

---

① 18—19世纪土耳其非正规军的兵卒。

② 指俄国、德国与奥匈帝国。三国君主的私人会晤，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先后与德国威廉一世和奥匈帝国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会晤。

围之内？是否允许从病人的床上把一切都拿光？最后这一点是很难预料的。相反，会不会在新的、郑重的会诊之后又来医治病人？……可见，即使在取得极大成功的情况下，斯拉夫人可能得到的报偿也只是相当小的一些鲑鱼。塞尔维亚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上了战场，但是，它当然知道，它最终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俄罗斯；它知道，在出现最大的厄运时，只有俄罗斯能够保护它，使它免于灭亡——在成功的情况下，只有俄罗斯能够以自己的强大影响帮助它保留住可能的最大利益。它知道这个，寄希望于俄罗斯，它也知道，整个欧洲现在都以隐秘的不信任目光注视着俄罗斯，俄罗斯的处境是令人不安的。总之，一切都在未来，但是，俄罗斯将采取什么行动呢？

这还是问题吗？对所有俄罗斯人来说，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问题。俄罗斯将正直地行动——这就是对问题的全部回答。即使英国首相出于政治考虑在议会面前歪曲事实，正式通知国会，说屠杀六万保加利亚人的不是土耳其人，不是巴希布祖克人，而是斯拉夫族人，——整个议会都出于政治考虑而相信首相，默认他的谎言：俄罗斯则不可能也不应该做任何类似的事情。有些人会说，俄罗斯总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去干对自己明显不利的事情吧。但是，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利益恰恰在于，只要是维护正义，在必要的时候，它宁可于己不利，宁可牺牲。俄罗斯不能背叛几个世纪以来嘱托给它的伟大思想，直到今天它都在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思想。顺便提一句，这个思想就是全斯拉夫人的团结；但这种团结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暴力，而是为了服务于全人类。俄罗斯在什么时候，有几次，在政治上是为自己的直接利益而行动的？如果欧洲能够看清这一点，而不是相反，总以不信任的、怀疑的和憎恨的目光看待我们，那么欧洲就会为这种大公无私感到惊讶。

是的，在欧洲，一般地说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相信会有大公无私这种事，不单是不相信俄罗斯的大公无私，——人们更相信处处是欺诈和愚蠢。当然，我们不必惧怕他们的议论：俄罗斯的全部力量，可以说，她的整个品格和俄罗斯的使命的整个前途，——就在于俄罗斯的自我牺牲的大公无私之中。令人遗憾的只是，这股力量有的时候被用错了地方。

## 乌托邦的历史观

（《作家日记》，1876 年，6 月号，第 2 章，Ⅳ）

彼得大帝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同人类的一切文明接触，同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理想接近。我们学习了也学会了使自己去爱法国人，爱德国人，去爱所有似乎曾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的人，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们，甚至打定主意永远也不爱我们。但是，这也正是我们的改革、彼得大帝的全部事业的意义之所在：在一个半世纪里，我们从改革中获得的是眼界的开阔，可能这是古代和现代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做过的。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是充满活力的、强大的，虽然它在政治上是慢慢成熟起来的；它达到了统一，准备巩固自己的边疆；它明白，在自己的身上蕴藏着任何地方再也没有的珍贵财富——东正教，基督的真理，而且是真实的真理。在一切其他信仰中和所有其他民族中都暗淡下去的真正的基督形象的捍卫者就是俄罗斯。按照那个时候的杰出的俄罗斯人的观点看来，这份珍贵的财富，这个永恒的、俄罗斯所独有的并且应由俄罗斯加以保卫的真理好像是使他们的良心摆脱了承受任何其他文化的义务。不仅如此，莫斯科还认识到，同欧洲的任何较为密切的交往都能够对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思想产生有害的和腐蚀的影响，都可能歪曲东正教，“按照其他各个民族的榜样”，把俄罗斯引上毁灭的道路。就是这样，俄罗斯由于自己的闭关自守，变得不公正，——这是对人类的不公正，因为它无所作为地把自己的珍贵财富、自己的东正教留给自己，与欧洲隔绝，也就是与人类隔绝，如同某些分裂派

教徒那样，那些教徒不跟你吃一个锅的饭，他们认为每个人用自备的碗和勺才是圣洁的。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因为在彼得大帝到来之前，我们对欧洲采取的几乎就是那样的政治和精神关系。由于彼得大帝的改革，眼界空前地开阔了，——我重说一遍，彼得大帝的全部功勋就在于此。这也就是我在前面一期《日记》中谈到的那种珍贵财富，我们俄罗斯上层的文化阶层把这份财富在它从俄罗斯消失一个半世纪之后，又带给人民，而人民也应该在我们自动向人民的真理表示崇敬之后，sine qua non[①] 从我们这里接受这份珍贵财富，“否则两个阶层的结合将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将毁灭”。“眼界开阔”的内涵是什么，表现在哪里，意义何在？这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文化，也不是科学，这不是为了欧洲文明而背离人民的俄罗斯道德本原，这正是那种唯独一个俄罗斯民族才独具的东西，因为类似的改革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这在实际上确实就是我们对其他民族的几乎是兄弟般的友爱，这种友爱是我们在同其他民族一个半世纪的往来中养成的；这就是我们为全人类服务的需求，为此，我们有时不惜损害自己的重大的近期利益；这就是我们同其他民族文明的和解、认可并体谅他们的理想，虽然他们不与我们的理想和睦相处；这就是我们积蓄起来的才能，它使我们在每一种欧洲文明中，或者说得确切些，在每一个欧洲人的身上去发掘并找到他们拥有的真理，尽管其中有很多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最后，这就是首先要公正，而且只是探索真理。总之，这可能就是有效地运用我们的珍贵财富、我们的东正教为全人类服务的开端、第一步，——这就是我们的东正教的使命，其实，也就是它的真正实质。这样看来，通过彼

① 拉丁文：必须。

得大帝的改革所达到的是，我们从前的思想、俄罗斯的莫斯科思想开阔了，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增加了、加深了：我们从而意识到我们的全世界使命，我们在全人类中的个性和作用，不可能不理解这种使命与作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类似使命与作用，因为每一民族的个性只是为他自身而存在，而且只存在于他自身，而我们现在要及时地开始做的，正是为了普遍的和解而从做大家的仆人做起。这毫不可耻，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的伟大之处，因为所有这一切将会导致全人类的最终团结。谁想在天堂高于一切——就必须先做大家的仆人。这就是我从俄罗斯的理想的角度对俄罗斯的使命的理解。我们的新的政治的第一步在彼得大帝之后就已自动地显现出来：这个第一步应该是全斯拉夫人的团结，就是说在俄罗斯的羽翼下的团结。不是为掠夺、不是为暴力而团结，也不是为在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消灭各斯拉夫族人的个性，而是使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使他们处于对欧洲、对人类的应有的关系中。最后，使他们在经过世世代代的无穷苦难之后，获得安宁和休养生息的可能；振作起来，感到自己新的力量，为人类精神宝库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文明中做出自己的成就。噢，自然，您会嘲笑上述那些关于俄罗斯使命的“幻想”，不过，请您说说：难道不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希望各族斯拉夫人的复活？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复活，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充分个人自由以及他们的精神的复活，全然不是为俄罗斯从政治上占有他们，用他们来加强俄罗斯的政治威力。然而，欧洲对我们的猜疑是什么呢？其实，事实就是如此，难道不是吗？这样看来，上述“幻想”即使是一部分，不也就因而被证实是正确的吗？不言自喻，就是为这个目

的，君士坦丁堡[1] 迟早应该属于我们……

如果一位奥地利人或者英国人有机会读完前面所写的那些幻想，他就会由此引出这样不容辩驳的结论：“君士坦丁堡、金角湾[2]，世界上的第一个政治焦点——这难道还不是掠夺吗？”上帝啊，在他的脸上会浮现出含着多少讥讽的笑容啊。

是的，金角湾和君士坦丁堡——都将是我们的，但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暴力，这就是我的回答。第一，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时机成熟了，即使说现在时机还未到，那也确实在接近，一切迹象都在表明这一点。这个结果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这是大自然本身的安排。如果说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这件事，那只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在欧洲，人们都相信有个彼得大帝的“遗诏”[3]。这纯系波兰人的伪造。如果说彼得大帝在那个时候有过不建造彼得堡而去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思想，那么我想，他也会由于某些考虑当时就放弃了这种想法，纵然他有足够的力量去摧毁苏丹，这是由于在当时做这件事的时机不相宜，可能导致俄罗斯的灭亡。

我们在楚赫纳人的彼得堡尚且没能摆脱毗邻的德国人的影响（德国人虽然对我们起过好作用，但是，在俄罗斯发展的真正道路尚未明朗之前，他们延误了俄罗斯的发展），那么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庞大的、颇有特色的、还有十分雄厚而古老的文

---

① 公元前建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始称拜占庭，后成为罗马帝国首都，易名为君士坦丁堡，别称新罗马。1453 年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首都，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后者沿用至今。

②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细长海湾，黑海沿岸国家通往地中海之要道。

③ 拿破仑一世在 1812 年入侵俄国的前夜，为进行反俄宣传，授意炮制并散布的伪诏，其内容为说明俄国的扩张野心，如驱逐土耳其出欧洲，由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

明遗产的城市里，我们又怎么能摆脱希腊人的影响。比起粗鲁的德国人来，希腊人要精细得多；比起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德国人来，希腊人同我们有难以胜数的共同衔接点；大量的、身居宫廷要位的希腊人会立即把沙皇的宝座围在中间，赶在俄罗斯人之前成为有学问、有教养的人，他们只需用自己的航海知识与技能就足以利用彼得大帝的弱点，不仅使他最亲近的后继者，而且使他本人神魂颠倒。总之，希腊人会从政治上控制俄罗斯，他们即刻就会把俄罗斯拖上某种新的亚细亚的道路，再度把她拖回到某种封闭状态，显然，这是当时的俄罗斯承受不住的。她的俄罗斯力量和俄罗斯民族性就会在自己的行程中受到阻碍。强盛的大俄罗斯就会停留在自己辽远的阴沉多雪的北方，最多不过是做帝都[1] 复兴的材料，最后结果可能是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跟随帝都前进。俄罗斯的南方就会全部落到希腊人的占领下。甚至有可能，东正教本身都瓦解为两个世界：复兴的帝都世界和古老的俄罗斯世界……总之，事情是极其不合时机的。而现在，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现在俄罗斯已经进入欧洲，自身也有教养了。主要的是，知道了自己的力量，真正强盛起来了；它同时也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胜过别人。现在它明白了，帝都可以完全不是作为俄罗斯的首都而为我们所有；而两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既然占领了帝都，他就不可能不把自己的首都迁移到那里，这将是毁灭，因为帝都不在俄罗斯，也不可能成为俄罗斯。彼得大帝即使不犯这个错误，他的最亲密的后继者们则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这个错误。如果帝都现在成为我们的，当然不能作为俄罗斯首都，同样也不能像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作为全体斯拉夫人的

---

① 古代俄罗斯人称君士坦丁堡为帝都。

首都；离开俄罗斯，全体斯拉夫人即使能够由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它也将在与希腊人的斗争中落个精疲力竭。只由希腊人继承君士坦丁堡现已完全不可能：不能把地球上这样重要的一个立足点交给希腊人，这对他们太不相称了。交给以俄罗斯为首的全体斯拉夫人——当然，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件好事吗？这可又是一个问题。这是否像是俄罗斯在政治上侵占各族斯拉夫人（这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呢？总之，根据什么、依据哪些道德权利俄罗斯可以要求君士坦丁堡？是依据哪些最高目的俄罗斯可以向欧洲要求得到君士坦丁堡？根据就是——俄罗斯是东正教的首领，是东正教的庇护人和捍卫者，——自从伊万三世把帝都的双头鹰置于古代俄罗斯国徽之上，并以此为俄罗斯的标志之日起，俄罗斯就被授予了这个角色。不过，毫无疑问，只在彼得大帝之后，在俄罗斯知道自己有力量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正教与信仰东正教的人民的真正的、唯一保护者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一角色才凸现出来。这就是原因，这就是要求据有古代帝都的权利，对此，即使是最热心于自己的独立的各族斯拉夫人，甚至是希腊人都能理解，而不感到受了侮辱。由此也显示出俄罗斯对所有其他东正教各民族，无论是斯拉夫人还是希腊人，必然要实施的政治关系的真正实质。总之，俄罗斯是他们的保护者，甚至可能是领导者，但不是统治者；是他们的母亲，而不是女主人。即或有那么一天成为他们的女王，那也只能根据他们的宣言，保留一切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独立、自己的个性的东西。结果会有那么一天，不信奉东正教的欧洲斯拉夫人也可能参加这个联盟，因为他们自己会看到，在俄罗斯保护下的大团结只能巩固他们各自的独立的个性。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的结为一体的力量，纵然在某个时候他们从现在所归属的穆斯林和

欧洲人那里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可能他们又会由于相互纠纷与争吵而闹得精疲力竭。

人们会对我说，何必玩弄文字游戏：“东正教”是什么？各民族团结的特殊思想与特殊权利的实质是什么？这不是与所有其他类似的政治联盟一样的纯政治联盟吗？即使是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建立在最广泛的甚至更广泛的基础上，也是如此。这是可能提出来的问题，我现在就回答。不对，这不是那种联盟，也不是文字游戏，这里所说的确实将是某种特殊的、闻所未闻的事情；这将不只是一种政治团结，更不是为了政治掠夺与暴力，——这是欧洲所不可想象的；也不只是为了经商和一己私利，不是为了那些永恒的、实际上在谁（除愚人外）都不相信的官方天主教的幌子下被神圣化了的罪恶。不，这将是真正树立在东方还保留着的基督的真理，这是真正的新建立的十字架节①，这是很早就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正教的不容置疑的成就。在某些人看来这将真正是一种诱惑，这些人就是当今世界上的强者，他们至今还在世界上欢庆胜利，他们总是以轻蔑、嘲讽的态度看待一切类似的“期望”，他们甚至不理解，怎么能认真相信人们之间的团结友爱与各民族的普遍和解，怎么能相信旨在为人类服务的联盟，最后，怎么能相信人们在真正的基督教原则上的新生。如果认为相信团结起来的东正教的首领——俄罗斯对全世界说的这种“过去没有人说过的话”是只堪嘲笑的“空想”，那就把我也列入这些空想家之中吧，我接受这些嘲笑。

大概，还会有人反驳说：“认为在某个时候能‘允许’俄罗斯做斯拉夫的领袖，并且进入君士坦丁堡，这纯粹是空想。

---

① 俄历 9 月 14 日为十字架节。

幻想是可以的，但这毕竟是幻想！”

够了，是这样的吗？要知道，俄罗斯是强大的，可能比她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还要知道，岂不是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最近十年里，兴起了几个雄踞欧洲的强大国家，其中的一个如同被上帝的旋风卷走一般，顷刻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在它的位置上又崛起了一个在世界上似乎还未曾出现过的强盛的新帝国。这是谁在事前能够预料得到的呢？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眼前，能够发生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人类的智慧又怎样能够准确无误地预言东方问题的命运呢？又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依据能对斯拉夫人的复兴与团结表示绝望呢？谁能知道上帝的安排呢？

# 谈谈彼得堡的巴登-巴登[1] 精神

（《作家日记》，1876年，7～8月号[2]，第1章，Ⅱ）

想读点什么，一眼就看到了《交易所新闻》[3] 上谩骂我6月号那篇《日记》的文章。应该说，没有看到谩骂，文章写得相当和蔼，但不是很和蔼。杂文作者布·先生因为我散布“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奇谈怪论，而大肆嘲笑我，虽然态度温文尔雅，但却盛气凌人。他说道：“这就是说，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攻占了，似乎有些神奇怪诞，但确实攻占了。我们连战争都没有参加，但君士坦丁堡却终归为我们所独占，因为它应该属于我们。”不过，可爱的布·先生，其实，这全是您自己编造的：我根本没有说过在这场“我们没有参加的战争中”拿下了君士坦丁堡，我说的是，迟早会实现，只是又附加了一句说，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这是可能，谁能知道呢，我这样说并没有错。在彼得堡，您把关于俄罗斯、关于它的使命的观点最后缩小了，小到像一个巴登-巴登那么大小，或者，竟至于像我现在居住并写这篇日记的纳索[4] 那么大小，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您以为，仅有一个彼得堡将继续存在。现在，有些地方的外省报刊已经开始抗议彼得堡了（不是一般地抗议彼得堡，而是抗议你们这些深居彼得堡并与世隔绝的人们），外省报刊想要在

---

① 德国西南部的城市，有著名的黑山林矿泉疗养地。

② 本期《作家日记》为7月与8月合刊，下同。

③ 俄国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报纸，1885年起改为日报，刊登交易所商业新闻，十月革命后停刊。

④ 当时德国的一个公国。

自己的地盘上说点新的话。你们会这样认为：可能他们是要说的，特别是等他们的气消了之后，现在，的确，愤怒还在妨碍他们。我所阐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和东方问题的未来这个思想，——是一个早就存在的思想，根本不是斯拉夫派的人们编造的。而且，甚至不仅是早就存在的，而是古代的俄罗斯历史观，因而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幻想出来的，从伊万三世时就已出现了①。现在，你们满脑子都是巴登-巴登，这又怪谁呢。其实，我说的不是指您一个人；如果这仅仅是您一个人的事情，我就不说了，然而在彼得堡，不只是您，很多人都染上了巴登-巴登精神。我明白，关于俄罗斯在各民族家庭中的未来使命，我说的那句“这就是我对理想中的俄罗斯的使命的理解”，使您感到有失体面，您为此感到愤怒。人类的未来，不远的未来，充满了可怕的问题。我们的和欧洲的最先进的人士早就一致地认为，我们正处于“最终解决”的前夜。您为俄罗斯能够参与这种解决而感到耻辱，甚至因设想俄罗斯敢于在全人类的事业中说出自己的新的见解而感到耻辱。但是，对您来说是耻辱的，对我们则是信念。这信念就是，俄罗斯不仅能够讲出自己的见解，而且可能讲出作为结论的话。每一个俄罗斯人，假如他是这个伟大民族和人类伟大联盟的一员，是这个伟大的人类家庭的一员，他就应该也必须相信这一点。我敢于设想，俄罗斯能够对未来的人类的新生活做出贡献，因为俄罗斯有可靠的保证，这就是它的人民本原，它的东正教。（我所理解的东正教就是一种思想，我这样理解，完全没有背离东正教。）对此，您感到惊讶吗？关于斯拉夫派，您说：要谈论他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历史观即1453年拜占庭灭亡后在俄罗斯出现的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点。

们，就要了解他们。而现在有谁了解他们呢？大多是凭道听途说和过去的记忆。现在，人们把很多事情都忘记了，早已把学过的很多东西忘却了，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有完全学会。我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是，我直接从结尾开始，说出了结果，说出了我的信念的决定性的话。倒霉在于说得毫无保留。于是您就冷嘲热讽起来:“看吧，大家都羞于启齿的话，他却说了出来；耻笑他吧！”话越说得含糊其辞越好，越有好处。不停地写，不住地暗示，可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得明白无误：这才能博得很多尊敬，甚至可能使没有一点思想的人，却以思想家著称。不过，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知道，我的读者们会因为“我答复批评”而责备我，就如从前已经不止一次地责备过那样。但是，这不是回答一个人，而是回答很多人。这是事实，不回答，也总得把它指出来。

## 关于德国人的尚武精神

(《作家日记》, 1876 年, 7~8 月号, 第 1 章, Ⅲ)

刚刚踏上德国的土地，我们火车的包厢门一关，包厢里的全部六名德国人立刻就谈论起战争和俄国来。他们的谈话使我觉得有趣，我虽然知道，现在德国的报刊正在大肆议论俄罗斯，但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在街头巷尾人们都谈些什么。这六名德国人远非"上等"人，他们中间大概没有一个男爵，甚至连一名军官也没有。他们谈论的也不是"高级"政策，谈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真实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现在的、当前的力量。他们扬扬得意，以平静得有些傲慢的口吻互相转告说，俄罗斯的武力和其他方面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软弱过。一个从彼得堡来的满脸傲气的高个子德国人用很权威的语气说，俄罗斯的多少像样一点儿的速射武器似乎超不过二十七万件，其余的都是由旧武器改造的，全部速射武器加在一起好像还不到五十万件。金属子弹的储备最多是六千万发，如果战时的全部军队按一百万人计算，那么每名士兵只有六十发子弹。不仅如此，他还断言，这些子弹都造得粗劣。他们谈得兴高采烈。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知道我是俄罗斯人，显然，他们根据我与乘务员说的几句话认为我不懂德语。其实，我说得虽然不好，可是我能听懂。过了一阵子之后，我认为反驳他们是我的"爱国主义义务"，不过要尽可能冷静，不能像他们那样。我指出，他们的全部数字与情况都往坏的方面夸大了，四年之前我们的军事装备就已达到令人相当满意的程度，从那以后又得到加强，因为军备事业一直在不停顿地发展，现在我们不比任何人逊色。

我的口语尽管很蹩脚，他们还是在注意地听我说的话，每当我忘记了词语、结结巴巴讲不出来的时候，他们还给我提词，赞许地点着头，表示他们听懂了我的话。（注意：假如你的德语讲得不好，你的听众——德国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理解你；跟一般市民，如跟佣人谈话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的理解迟钝，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你即使只忘掉一个字，特别是在你用一个不太通用的字代替了某一个通用的字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同法国人、意大利人谈话时，是否也是这样，但是，在俄国士兵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叙述和描写中都说，他们同在克里木半岛被俘的法国兵交谈〔显然是用手势〕，也能够理解他们；看来，只要能够明白法国士兵的一半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全部意思。）德国人一句也没有反驳我，他们面带微笑地听着我的话，表情不傲慢，还可以说流露着赞许，但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俄罗斯的荣誉，他们的眼神表明，我的话，他们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五年以前，就是 1871 年，他们可完全不是这样有礼貌。那时候我住在德累斯顿，现在还记得战争结束后萨克森的士兵返回的情景：那时城市为他们建造了凯旋门，向他们热烈鼓掌。还记得，一年以前，在德累斯顿的大街小巷和一切公共场所，突然之间就出现用大字体印刷的传单：der Krieg ist erklärt!（宣战了！）那时就是这些士兵开始走上战场。我当时看到他们，心中不由得就欣赏起他们来：一副副多么斗志昂扬的面孔，多么明朗、欢乐而又严肃的目光！这一切都体现出青春活力，看着他们行进中的队伍，不可能不欣赏他们那惊人的军人仪表、匀称的步伐、精确严整的队形，同时还有我在士兵的脸上从未见过的某种非同寻常的自由自在以及这些小伙子们

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脚步中所表达出来的自觉的决心。显然，他们不是被赶上战场的，而是自动去的。看不出任何刻板的、军曹棍棒的迹象，这就是在德国人那里看到的，我们从彼得大帝起建立自己的军队、军曹制度和棍棒纪律时，就是向这些德国人借鉴的。这些德国人不是这样，他们不需棍棒的驱使，他们如同一个人一样，怀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充满胜利的信心，自己走上战场。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在士兵的身上焕发着公民精神的光芒，我承认，当时我为法国人捏一把汗，虽然我还确信不疑，法国人会把德国人痛打一顿。经过一年，他们终于取得了战胜法国人的胜利，在一百年里，他们遭受过法国人的各种侮辱。可以想象，在胜利之后他们将怎样走进德累斯顿。这一切再加上德国人在取得某些成功时常有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那种过分的自我吹嘘，气量狭小到近乎幼稚的自我吹嘘在德国人那里常常变为厚颜无耻，这种相当不光彩的特点在这个民族中达到几乎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个民族值得夸耀的东西太多了，同任何一个民族比都毫无逊色，实在不必这样没有气量。结果是荣誉又一次落到他们头上，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果然，当时他们竟是如此欢欣鼓舞，以致居然欺负起俄罗斯人来。那个时候在德累斯顿俄罗斯人非常多，后来，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说，任何一个德国人，甚至是小摊贩子，只要一同俄罗斯人说话，即使是同刚刚走到摊子跟前买东西的俄罗斯人说话，立刻就想方设法地扭转话题说："我们跟法国人打完了，现在该收拾你们了。"没有俄罗斯在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政策，可能他们是得不到这种荣誉的，了解战争期间俄国的政策的报纸无论怎样说，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在人民中间还是自发地倾泻出来。不错，这是出乎意料的战争胜利所激发的最初的狂热，但是，在这股狂热中立刻就记起俄罗斯人，这也是事

实。虽然我一向就知道，早自莫斯科的德国侨民村[1]时代起，德国人对俄罗斯人从来都没有过好感，这种几乎是油然而生的对俄罗斯人的强烈憎恨当时还是令我震惊。在隆重欢迎入城军队时，住在德累斯顿的一位俄罗斯公爵K. 夫人坐在为观众设置的席位上，在她身后的几个德国人粗野地谩骂起俄罗斯来。这位夫人后来说："我向他们转过身去，用粗话骂了他们。"他们沉默不语了：德国人对女人很讲礼貌，但对俄罗斯人他们却是不讲情面。我从我们的报纸上读到过，我们彼得堡的德国人那时喝得醉醺醺的，成群结伙地在彼得堡的酒馆里向我们的士兵寻衅滋事，这就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的表现。顺便说说，现在大多数德国报纸满版都是疯狂的反俄罗斯的言论。德国的报刊断言，俄罗斯想要攫取东方和斯拉夫人地区，目的是先加强自身的力量，然后去扼杀欧洲文明，《呼声报》在不久前的一篇社论中谈到了德国报刊的这种疯狂程度，同时指出，这场疯狂的大合唱恰恰是三国皇帝晤面会谈[2]之后掀起的，像是蓄意安排的，这就更加令人惊讶，至少是令人费解。社论中的这种见解是很精辟的[3]。

---

① 16—18世纪莫斯科亚乌扎河地区外国人的自由村社之一，叫做库奎。

② 参阅上文《东方问题》（《作家日记》，1876年，6月号，第2章，Ⅲ）注。

③ 《呼声报》的社论暗示，德国报刊的反俄宣传是德国政府授意的。

## 文明的最新成就

（《作家日记》，1876年，7～8月号，第1章，Ⅳ）

是的，在欧洲正在酝酿着某种不可避免的事情。东方问题的意义在增长，如同涨潮的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其结局可能是这个问题将压倒一切，任何和平愿望、任何理智以及任何避免战争的决心都抵挡不住形势的冲击。但最重要的是一个可怕的事实现在已经明显地呈现出来，这个事实就是——文明的最新成就。这个最新的成就已经亮了出来，含义也已清楚；现在它已为人所共知，它是全部十八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是把人的一切全部人道化的结果。整个欧洲，至少是它的最早的那些代表人物，就是这些人和这些民族曾经大声疾呼反对奴役制，消灭买卖黑人的交易，废除了本国的专制制度，宣布了人的权利，创造了科学并以科学的力量令世界震惊，以艺术及其神圣理想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令人陶醉，他们向人们许诺在不远的将来就可实现正义和真理，从而在人们的心中点燃起憧憬和信念的火焰，——正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在目前这个时刻，忽然间全都（几乎是全都）一下子就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被侮辱的兄弟姐妹、基督徒——几百万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他们等待着、期望着、焦急地期待着这样的时刻，那时这些苦难中的人们都像败类、像臭虫一样被踩死，这些人的呼救的绝望号叫终于戛然而止，这些人的呼号使欧洲烦恼不安。他们被看做败类和臭虫，甚至还不如败类和臭虫，数十万、数百万基督徒惨遭杀戮，如同消灭讨厌的癣疥被从大地上连根铲除，铲得干干净净。在奄奄一息的弟兄面前蹂躏他们的姐妹，

在母亲的面前把她们的婴儿抛向空中，然后用枪上的刺刀接住；一座座村庄被铲除，一座座教堂化为瓦砾，一切都无一幸免地被摧毁——这就是野蛮下流的穆斯林寇匪、文明的死敌的所作所为。这是有计划的屠杀；这不是趁战争混乱之际偶然窜逃出来、但又惧怕法令的匪徒所干的。不，这是一种制度，这是庞大帝国的战争方式。匪徒奉行的是部长们、国家的执政者们和苏丹本人的命令和部署。而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伟大的文明却在怀着急切的心情观望着……“什么时候才会把这群臭虫踩死！”不仅如此，在欧洲，还在为这些事实辩驳，在人民议会中否认这些事实，不相信，故意装出不相信的姿态。这些人民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心中有数，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然而他们却都在争先恐后地互相欺骗：“这不是真的，没有这种事，这是言过其实的夸张，这是为了嫁祸于土耳其人，他们自己屠杀了自己的六万名保加利亚人。”“大人，它自己把自己打了！”赫列斯塔科夫们和斯克伏慈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们倒霉了！[①] 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些人怕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既不想看，也不想听，而是自己欺骗自己、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呢？您看，这是因为俄罗斯：“俄罗斯在强大起来，它将要占据东方、君士坦丁堡、地中海，掌握港口和贸易。俄罗斯将像一伙野蛮的强盗闯进欧洲，‘毁灭文明’。”（就是纵容那些野蛮行径的文明！）这就是当前在英国和德国所叫喊的，这毕竟是弥天大谎，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所说的每一句指责和担心的话。所有这些话不过是为了煽动人民群众的

① 此语引自俄罗斯作家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赫列斯塔科夫为剧中人物），但引文不确切。原文应为：“下士的老婆在您面前谎告，说我打她；她这是血口喷人！她自己把自己打了。”（满涛　译）

仇恨。现在欧洲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儿头脑、有点儿教养的人都不相信俄罗斯会希望、能够而且有力量毁灭文明。即使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大公无私，认为我们有种种卑鄙意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事例与实践之后，他们未必还相信我们比整个欧洲加在一起还强大。他们未必不知道，俄罗斯即使控制了君士坦丁堡，欧洲也比俄罗斯强大两倍。俄罗斯只有在自己的家园里，在反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土时，才是强大无比的，但她在进攻别人时，力量则要减弱四倍。当然，他们很清楚这一切，不过他们还是要说谎，继续欺骗自己和所有的人们，这只是因为他们那里，在英国有那么一些商人和工厂主，这些人出于自己的利益，病态地疑神疑鬼，病态地贪得无厌。即使如此，他们也很清楚，俄罗斯在自己最有利的情况下，在工业和贸易上也不可能胜过他们，俄罗斯要达到这一点，还要几个世纪；可是谁的贸易稍有发展，谁的海上力量稍有加强，——他们就惊慌失措，为自己的利润坐卧不宁。正因如此，全部“文明”忽然间就危在旦夕。俄罗斯又怎样妨碍了德国人，他们的报刊为什么也惶恐不安起来？对他们来说，俄罗斯站在他们背后，束缚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丧失了从地球上彻底铲除法国，从而永远高枕无忧的良机。“俄罗斯碍手碍脚，必须使俄罗斯一蹶不振，可是身边还有一个完整无损的法国，怎么能使俄罗斯一蹶不振呢？”是的，俄罗斯的罪过就在于它是俄罗斯，俄罗斯人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是俄罗斯人，也就是斯拉夫人：欧洲是憎恶斯拉夫民族的，les esclaves[①] 就是奴

① 9—10世纪日耳曼人东侵时，称被占领地区的土著人为 esclave（法语）或 Sklave（德语），即斯拉夫人，而在词义上，法、德这两词均为“奴隶”。在18—19世纪关于“斯拉夫人”一词的词源进行争论时，一般认为此词从词源上说有侮辱之意。

隶，而在德国奴隶多得几乎要暴动。只要稍一触及薄弱之处，十八个世纪中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科学和发展，就是这样，顷刻之间就成为无稽之谈，稍一触及其弱点，顷刻之间就成为无稽之谈，成为小学生的童话，成为分文不值的道德说教。而不幸和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是“文明的最新成就”，把这个成就说出来了，毫无羞愧地说出来了。不要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在欧洲、在英国，已经掀起社会舆论，表示抗议，并且要求捐献金钱给被蹂躏的人们：因为这装模作样显得更为可悲，这一切只是个别情况；这一切只能说明，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要反对普遍的、国家的、自己民族的潮流是多么无力。探求真相的人会大惑不解：“那么真理在哪里？难道世界距离真理确实还那么遥远吗？仇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人们有团结到一起的那一天吗？妨碍团结的是什么？真理强大到足以战胜人们的腐化堕落、厚颜无耻和自私自利的日子会到来吗？经过磨难而获得的真理在哪里？博爱又在哪里？这就是真理吗？这就够了吗？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高尚’情感的演练，演说词的演练，为了管束小学生而对他们进行的训练，——一遇到事情，真正的事情，实际的事情——那就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让理想统统滚开！理想统统是胡诌，是幻象，是顺口溜！难道当真犹太人又到处都当家做主了，其实，不是‘又当家做主’了，而是从未停止过当家做主？”

# 理想主义者-无耻之徒[①]

（《作家日记》，1876 年，7～8 月号，第 2 章，Ⅰ）

有谁还记得令人难忘的教授、令人难忘的俄罗斯人——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那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吗[②]？如果没错的话，这篇文章写于 1855 年，正当我们同欧洲的战争激化、塞瓦斯托波尔开始被围困的日子里。现在东方问题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上火车时我随身带了这篇文章，我突然感到这篇过去写的可敬的文章极其新奇，在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重读时的新奇感是当时无法比拟的。这一次读，令我吃惊的是一个特殊的见解：首先是当时西方派对人民的看法；其次，也可以说是主要的，是文章的心

① 此文写于 7 月。“无耻之徒”直译为“犬儒主义者”，与文中的“犬儒主义者”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季·尼·格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其实并不是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莫斯科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莫斯科欧洲派首领，反对专制和农奴制）的文章，而是克里木战争期间以手稿的形式传播开的匿名文章。其作者实为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君主立宪制拥护者的鲍·尼·契切林教授（1828—1904）。契切林在自己的小册子中宣扬的观点与官方和斯拉夫派相反，他认为政府进行克里木战争是为了巩固并扩展自己在东方的势力。他承认，从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观点看，这种目的是“合理的和正当的”，但他对政府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政府犯了一系列错误，遭受了失败，把国家引至崩溃的边缘。他指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自视“无所不能和英明盖世”的尼古拉一世实行的政策旨在维持“专制制度”和现存秩序，以与欧洲最反动的势力结盟为政策的基础。契切林提出，俄罗斯必须“彻头彻尾地革新”，实施包括废除农奴制在内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广泛纲领。

理意义。我愿与读者分享我的印象。

格拉诺夫斯基在当时的人们中间是一个最纯洁的人。这简直是某种无可指责的、完美的形象，19世纪40年代最高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毋庸争辩，在当时我们那些具有某种坚韧精神的进步人士里面，他有自己独具的、特殊的和完全别具一格的气质。他是我们最正直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们[①]中间的一个（我在长篇小说《群魔》中描写的19世纪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的类型，我们的评论界认为我写得真实。本来我是喜爱并且真挚地尊敬斯切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可能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点喜剧特征，而这是这种类型的人物通常都有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文章的心理意义让我吃惊，我也觉得这个思想很可笑。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同意我的以下看法：我们的俄罗斯理想主义者、尽人皆知的理想主义者都知道，仅仅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人们才把他看做“美与崇高”的“地道的”传教士。可是，突然间，由于某种情况，他认为，必须对某件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可是“真正的”事，实际的、现实的事，绝非什么诗歌之类，而是重要的、严肃的，可以说，差不多是高尚的事），而且不是随随便便地捎带提一句，是要说出决定性的、判断性的话，一定要产生影响，——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奇迹般地变成了不单是正牌的现实主义者和散文家，甚至是犬儒主义者。这还不够：主要的是，犬儒主义和这种散文使他感到自豪。意见一说出来，他就得意扬扬。理想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理想是胡诌，是幻象，是顺口溜。一个“现实的真理”

---

① 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是《群魔》主人公之一。他是以格拉诺夫斯基为原型的，在小说中，这个人物被赋予许多喜剧色彩，因而被漫画化了。

取代了所有的理想，但由于总是走过头，现实的真理就成为犬儒主义。于是就到犬儒主义里面去找现实的真理，认为现实的真理就在犬儒主义之中。据他看来，越粗俗，越实在，越冷酷无情，就越现实。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想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为自己的理想主义感到惭愧。感到惭愧，并且害怕人们对他说："喂，您是理想主义者，您懂得什么'事情'；您还在您自己那儿宣讲您的美吧，把'事情'留给我们来办。"早在普希金身上就有这个特点：伟大的诗人不止一次由于他只是一个诗人而感到惭愧。或许在其他民族里面也有这个特点，但也未必，至少是未必达到我们这种程度。在那里，几个世纪以来，成功地划分了人们的职业和职业的意义，基于对大家的和个人的职业及其意义的由来已久的习惯，每个人都知道，理解并尊重自己的职业和自己的意义。在我们这里，由于二百年来疏于一切事情，情况则有所不同。就连普希金和格拉诺夫斯基这样的人也不能避免内心深处怀有轻视自己的想法。果然不错，这位纯洁无瑕、一身正气的人一时心血来潮，感到有必要从一名历史学教授变为外交家，他竟在自己的议论中讲出一番惊人的言论。例如，他全然否认，奥地利会因为我们在它与匈牙利的争吵中帮助了它，确实拯救了它免于瓦解而感谢我们的可能性①。但他之所以否认，并不因为奥地

① 这里说的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争吵是指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当时奥地利曾得到俄国政府支持，而在克里木战争中，奥地利不仅未支持俄国，反而站在土耳其一方，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误认为是格拉诺夫斯基所写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契切林在文章中评论奥地利在克里木战争中的立场时说，尼古拉一世在匈牙利革命时并非是出于无私的目的而帮助奥地利的。俄国政府当时是害怕匈牙利的革命火焰在欧洲蔓延，而在克里木战争时，奥地利则惧怕西部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正由于尼古（转下页）

利是"狡诈的"，而这也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不是的，他并未看到任何狡诈之处，而是凭空论断奥地利不可能有别种选择。而且，格拉诺夫斯基觉得这样说还不够：他又凭空论断奥地利不应该不这样做。反过来说，奥地利所做的，正是它应该做的。如此说来，我们想得到奥地利的感谢的希望，竟然成为我们政策的不可谅解的、可笑的过失。个人是一回事，国家又是一回事；国家有自己最高的和当前的目的，有自己本身的利益，而要求不惜牺牲本身的利益来表示感谢——简直可笑。格拉诺夫斯基说："在我们这里，奥地利的狡诈和知恩不报，已经成为在公众中流行的话题。然而，在政治问题上谈论什么知恩不报或者知恩图报只能表明对政治的无知。国家不是个人；国家不能为报恩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况且在政治问题上最大的慷慨从来也没有大公无私的。"（就是说，也不应该这样，是吗？意思正好就是这样。）总而言之，可敬的理想主义者说了一大堆绝顶聪明的话，但主要的是——现实的话：你看，我们不尽是写些小诗！……聪明倒是聪明，然而这个真理并不新鲜，自从有外交家以来它就存在了，不过，如此热忱地为奥地利的行径辩护，何止是辩护，简直是在论证奥地利不应该有其他选择，——这是您的自由，但这有点儿令人无法接受。这里有些绝对不能同意也不允许同意的东西，尽管这是我们的历史学家-诗人、美的预言家那么突然、那么出人意外地表现出来的极其实际的政治智慧。如果认为当前利益、急功近利是至高无上的，认为只要能得到蝇头小利，就可冠冕堂皇地蔑视正直与良心，——承认这一切，那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了。大概用这

（接上页）拉一世当时的援助并非出于无私的目的，所以，契切林认为奥地利不会感恩报德，不可能不采取反对俄国的政策，而俄国舆论界普遍指责奥地利知恩不报是不恰当的。

种说法就可以为梅特涅出于最高的和现实的国家目的而制定的政策辩解。构成真正的民族利益，从而也决定“最高的”民族政策的，难道仅仅是与情感、理想等方面的一切“席勒精神”相对立的实际好处和当前利益吗？问题就在这里。相反，对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最好的政治不就是讲正直、慷慨和正义的政治吗？看来，为此即使有损民族利益也在所不惜。（事实上，根本无损于民族利益。）我们这位历史学家怎么会不知道，正是这些伟大的和正直的思想（而不只是利润和蝇头小利）最终会在各国人民和民族中获得胜利，虽然看起来这些思想都不实际得极其可笑，在外交家们和梅特涅之流的眼里尽是分文不值的理想主义；他怎么会不知道，正直无私的政治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不仅是最高的，可能还是最有利的政治，因为这个民族伟大。只顾当前实际，哪里利大，哪里更迫切，就接连不断地投身到哪里，这种政治表明一个国家的目光短浅、内在的虚弱和可悲的处境。外交家的头脑和急功近利者的头脑向来就不看重真理和正直，而真理和正直最终总是取得胜利的。尚未取胜的，终归是要胜利的，因为这是人们始终不渝的希望。废除买卖黑人的交易时，不是也有过远见卓识的反对意见，说这种“废除措施”不切实际，它会损坏一些人民和国家的切身的、必不可少的利益吗？反对意见竟然把买卖黑人说成为道义上的需要，以人种的自然区别为之辩护，得出黑人差不多不是人的论断……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起来造反抵抗英国时，务实的英国不是吵吵嚷嚷了多少年，说殖民地脱离英国的治理将导致英国利益的崩溃、动荡和灾难。我国解放农民时，不也是从各地发出了同样的叫嚷，“深思熟虑的、讲求实际的人物们”不是出来说，国家走上了一条愚蠢的、莫名其妙的、可怕的道路，动摇整个强大帝国的道路，最高的、关注现实利益的政治

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关注的不应该是以时髦的经济思想、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和以“情感”为基础的利益。真可谓无奇不有！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斯拉夫问题：现在我们要是把斯拉夫人完全抛开就好了！格拉诺夫斯基虽然坚持说，我们是想借斯拉夫人加强自己的地位，我们的行为只是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可是我认为，他说错了。跟他们在一起，即使在未来，有什么实际利益，有什么可以使你得到加强的东西？难道会有那么一天得到地中海，或者是“从来也不会给我们”的君士坦丁堡？充其量这不过像天鹅肉，即使把它拿到手，也只是为自己招惹更多的麻烦。足够我们忙活一千年的。这就是便宜，就是智者的观点，就是真正的实际利益吗？跟斯拉夫人民在一起，得到的尽是麻烦和操劳；尤其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属于我们的时候。因为他们欧洲人目不转睛地盯了我们一百年，现在已不单单是用眼睛盯着我们了，——我们稍有动作，他们立刻就剑拔弩张，把炮口瞄准我们。干脆——把他们抛开，永远抛开，这样才能让欧洲高枕无忧。不过简单地把他们抛开还不够：欧洲现在也许不相信我们真的抛开了，这就是说，必须拿出抛开他们的证据来：我们自己必须亲自扑到斯拉夫人民身上，兄弟般地把他们压死，以此支持土耳其：“就是这样，斯拉夫的兄弟姐妹们，国家不是个人，它不能为了慷慨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你们连这还不懂吗？”俄罗斯立即可以得到多少实际的、真正的并且是即刻到手的好处，而不是幻想的未来的好处！东方问题迎刃而解，欧洲哪怕是在一段时间内，也会恢复对我们的信任，其结果是我们的军费下降，我们的威望上升，我们的卢布发挥自己的真正价值，——这还不是一切：要知道，天鹅是飞不走的，他还在我们的上空盘旋！现在我们昧一昧良心，等一段时间：“国家不是个人，它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各族斯拉夫人命中注定了离不开我们，到时候，他们会自动靠拢我们，那时候我们又可以怀着爱和友谊去跟他们亲善。其实，格拉诺夫斯基在我们的政治中看到的正是这一点。他就是在证实说，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压制各族斯拉夫人，“向土耳其人告密，出卖他们”，我们的斯拉夫政治向来就是掠夺和暴力的政治，也不可能是别种政治。（这不就是说，政治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吗？他既然为别人的那种政治辩解，那也就应为我们辩解。）然而，我们在斯拉夫问题上的一贯政治，事实上，果真是那样的吗？我们的政治未必直至今日尚未大白于天下，——问题竟然这样！

## 做理想主义者可耻吗？

### （《作家日记》，1876年，7~8月号，第2章，Ⅱ）

格拉诺夫斯基当然是有自尊心的，我认为，那个时代，我们一切有才干的人，应该说，都有自尊心，有时是受伤害的自尊心，——这是由于没有事业，没有可能为自己找到事业，可以说，由于事业上的苦闷。自尊到了这种程度，一些看来有事可做的人（有的是教授，是文学家、诗人甚至是伟大的诗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的职业，这不只是因为以拘谨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职业，还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认为自己的禀赋应从事别的事业，在他看来比他当前做的更高尚、更有益、更有作为的事业。现在，一些优秀的、先进的、有才干的人物（自然只是有些人）自尊心强烈到令人惊讶的地步，都是由于上述这种原因。（我这里说的只是那些有才能的、天赋高的人，我现在还不去说那些胡作非为、动辄发怒的自命不凡和十分虚荣的很多当代“活动家”，虽然这种现象在当前非常突出。）这种为事业而苦恼，这种对事业的永无止境的探求使人们异常愤慨，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两个世纪的闲散，致使我们现在竟然不知道如何对待事业；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不知道事业在哪里，事业是什么。——有的人自命不凡，有的时候，这种自命不凡甚至是有失身份的，就个人的道德面貌来说，几乎使他成为可笑的人物；这一切都因为这位品德高尚的人物有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和意义，可以说，不知道在实践中和事业中自己的分量和自己的真正价值。他对此如果有所认识，感到自己不善于从事某种事业，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

当然不会认为承认这一点是不光彩的；在目前时刻他满腹怨气，出于愤慨，他常常从事并非自己的事业。我重申一遍，格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写得非常高明，虽然欧洲后来的事实证明文章也有政治性错误，当然这些错误是可以指得出来的；不过我不想议论这些错误，也不愿在这方面指责格拉诺夫斯基。这一次令我惊讶的只是文章中的强烈愤慨。我不认为文章的愤慨是出于他的自尊心，我也不想责备众所周知的文章的倾向性；我十分理解这篇文章所反映的“迫切问题”、公民情感和公民忧戚。最后，最公正的人也不可能总是不偏不倚……（可惜，格拉诺夫斯基没有活到解放农民的日子，当时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件事！）不，我不为此而责备他，但是，在这个东方问题上，他为什么要那样轻蔑地谈论人民，而不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不想看一看人民的参与和人民的思想。他武断地说，人民对斯拉夫问题和那场战争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感受到赋役和兵役的苦处。看来，人民也不应有意见，——格拉诺夫斯基写道：

首先要排除这是一场神圣战争（即1853—1854与1855年的战争）的思想；政府竭力使人民相信，政府是为保护共同信仰者与基督教教会的权利而战。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保卫者兴高采烈地举起这面旗帜，鼓吹反对穆斯林的十字军远征。但是，十字军远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再奋起去保卫上帝的灵柩，（对保卫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吗？）没有人再把穆斯林看做基督教的世仇；伯利恒教堂的钥匙[①]完全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借口（在

① 伯利恒为巴勒斯坦城市，据圣经记载，伯利恒为大卫王故乡和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此地建有耶稣诞生教堂，即上称的伯利恒教堂，是基督教的圣地。关于圣地的争论是克里木战争的导火线，争论涉及到圣地归属问题。

另外一个地方关于斯拉夫人也是这样说的)。

当然，我们也打算赞同下述观点：近百年来，在斯拉夫问题上，俄罗斯的政策有时可能不是无可指责的；有时它可能过于克制，过于谨慎，因此，用急躁的眼光来看，会觉得它是没有诚意的。可能，有时过多担心眼前利益，由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而模棱两可，敷衍了事，时进时停。但是，从实质上，从整体看，不能说俄罗斯的政策所追求的就是把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此加强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政治意义。当然，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政策从实质上看，即使在我们历史上的整个彼得堡阶段也不能说，在斯拉夫即东方问题上背离了古老的历史遗训、我们的传统和人民的观点。我们的政府向来就坚信不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人民只要一听到呼唤，总是挺身而出，因此，东方问题，就其主要实质而言，在我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的问题。而格拉诺夫斯基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噢，格拉诺夫斯基是热爱人民的！① 在自己的文章中，他为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而悲泣。是啊，像格拉诺夫斯基这样的人们哪能不爱人民呢？这种同情和热爱表现出他的高尚心灵，但同时也自然流露出毫不妥协的西方派对我们人民的看法，西方派一直都承认人民有很好的天资，却只存在于“消极的形态”中，停留于“封闭的田园情调的日常生活”的水平，至于人民的真正的、可能从事的活动——“最好不去谈它”。在西方派看来，我们的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因循守旧、

① 在写作《群魔》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别林斯基与一切西方派都轻视俄罗斯人。对季·尼·格拉诺夫斯基也有这种看法。至 1873 年，他的观点有所变化。

默不作声的群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大家当时几乎都是相信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责备”格拉诺夫斯基，只是揭露那个时代，而不是他个人。文章流传很广，产生了影响……问题也正在这里，使我惊讶不已的是这篇卓越的文章和文章的卓越见解与我们现在的、今天的时刻形成的对照。不，现在甚至西方派格拉诺夫斯基也会吃惊，也许是会相信的。这些给予东正教斯拉夫人的自愿贡献和人民的捐助，村社派遣自己的医疗队的旧礼仪派教徒的贡献，作坊工人拿出自己最后一文钱或者按照村社决定整个村庄做出的奉献，士兵和水兵拿出的饷钱，最后，各阶层的俄罗斯人为援助被压迫的东正教的兄弟姐妹而奔赴战场，为他们而流血。不，已经明确表现出来的这一切不能说是消极的，不能对这一切置之不顾。运动已经出现，不能不承认它。贵族夫人和小姐手持募款箱走上街头，为斯拉夫兄弟姐妹们募捐，于是格拉诺夫斯基严肃地、激动地注视着这种对他来说完全新鲜的现象：“可见，大家又都聚集到一起了，可见，并不总是各扫门前雪，这表明，我们全都是一样的基督徒。”这就是人民一定会感受到的，也许，人民已经在思考。当然，人民是了解一些情况的：他听人谈论报纸，自己也开始读报了。当然，他也听到，并且已在教堂为那个把自己生命献给了人民事业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吉列耶夫①做过安灵祷告了，说不定人民会为这样的死亡、牺牲编出民间歌曲来：

---

①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吉列耶夫（1841—1876），退役骑兵大尉，彼得堡斯拉夫委员会成员。1876 年在保加利亚招募、组织保加利亚志愿军，自任军队指挥。1876 年指挥保加利亚起义的志愿军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时阵亡，全俄各地都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纵然倒下去，依然还活着
活在人民的内心和记忆里，
他，还有美好、自由的心灵里
那股火热的激情；
光荣啊，为人民而死！①

是的，这是“为人民而死”，不只是为一个斯拉夫民族，而且是为整个东正教事业，为俄罗斯的事业，对此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很理解。不，我们的人民不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在精神上还没有堕落到只顾眼前的好处和实际的利益。在面临伟大目的时，他们会精神振奋，并把它像精神食粮一般接受下来。难道现在，直至目前这个时刻，人民还不了解、还不能领悟：这个“斯拉夫人的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使我们面临战争的威胁，就可能点燃战火？到那时，又将像二十年前的东方战争那样，兵役和重负要落在他们的身上；现在请观察观察人民：他们有什么畏惧的吗？没有。在我们人民里面，精神力量和进取力量比某些了解人民的“行家们”所想象的，显然要大得多。格拉诺夫斯基最好是将这一观点介绍给另外那些人，就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了解人民的行家们”，以及某些描写人民的作家，这些作家一生都像研究俄罗斯农民的外国人。

在最后我要重复说：我们的理想主义者常常忘记，理想主义并非可耻的事情。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只要他们为人正直，胸襟开阔，他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对人类的爱，他

① 引自康·费·雷列耶夫（1795—1826）的《沃伦斯基》（1822）一诗。

们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人，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对象的形式。不必为自己的理想主义感到惭愧：它是达到同一目标的同一条道路。因此，理想主义实质上如同现实主义一样，是现实的，永远不可能从世界上销声匿迹。格拉诺夫斯基们是为宣扬“美与崇高”而出现的，他们不应为此而惭愧。格拉诺夫斯基们如果自惭形秽，由于畏惧冷嘲热讽的和盛气凌人的最高评议会的智者们而几乎附和梅特涅[①]，那么谁还来做我们的先知呢？历史学家格拉诺夫斯基不该不知道，各族人民最珍重的是——有理想与保卫理想，某种神圣的思想不管在智者们最初看来是如何渺小、不实际、玄虚与可笑，但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最高评议会成员与“名叫大马哩的女人”[②]，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信传道者，追随光明事业，不怕与自己的智者们分裂。就是这个渺小的、不符合时代的、不实际的“可笑想法”却在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终于战胜世界，而最高评议会的智者们则哑口无言。

---

① 关于梅特涅可参看本书《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1876年，6月号，第1章，Ⅱ）注。

② 出自使徒保罗在雅典的最高评议会（即圣经中的音译“亚略巴古”）传道的典故：“送保罗的带他到了雅典……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7章，第15～34节）

## 俄语还是法语?

(《作家日记》, 1876 年, 7~8 月号, 第 3 章, Ⅰ)

在德国的所有温泉疗养地都挤满了俄罗斯人, 尤其是像埃姆斯这类名胜地区。一般地说俄罗斯人是喜欢治病的, 甚至在没有温泉的慕尼黑附近的女巫医[①] 的诊所里, 大多数病人, 据说也是从俄罗斯来的。而且找女巫医来治病的大多是有身份的人物, 比如说, 相当于将军地位的人物, 他们预先从彼得堡把装着自己小便的小玻璃瓶寄给她, 在冬季就在她的诊所为自己订下床位。她是一位严厉而执拗的女人。在埃姆斯, 你只听腔调就可以认出俄罗斯人来, 这是唯独在俄罗斯才有的、已经开始使外国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俄罗斯腔调的法语。我说"已经开始", 因为直至目前我们听到的还都是赞美之辞。我知道, 人们会说, 指责俄罗斯人讲法语这已是陈词滥调了, 这个题目和说教已经老掉牙了。但是, 我认为, 可怪的完全不是俄罗斯人之间彼此不讲俄语 (他们如果讲俄语反倒是怪事了), 奇怪的是, 他们以为自己的法语讲得很好。是什么人把这个愚蠢的偏见灌输进我们的头脑的? 毫无疑问, 纯粹是我们的愚昧无知造成的。讲法语的俄罗斯人 (就是大批有知识的俄罗斯人), 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法语讲得显然是很差的人, 另一类人以为自己的法语讲得像真正的巴黎人 (我们的整个上层社

---

① 这个女巫医姓霍亨埃斯特尔, 关于她的医疗奇迹,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听人讲的, 也可能读到过俄国《新时代》报关于她的报道《慕尼黑的女巫医》。报道说, 女巫医的奇迹在俄国上等、中等阶层中流传甚广。

会），其实，他们讲得跟第一类人一样，确实很差。第一类讲法语的俄罗斯人竟达到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一个傍晚，我沿着兰河[①] 岸单独散步时，遇见两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一男一女，看来，他们面带愁容地在谈论着他们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令他们非常关心和不安的事情。他们谈得心情激动，但二人交谈用的却是非常蹩脚的、文绉绉的法语，词句呆板、笨拙，有时表达意思和语气非常困难，以致一个人常常不耐烦地提示对方。他们彼此不断地相互提示着，却怎么也没想到试一试用俄语交谈；相反，宁愿谈得别别扭扭，甚至冒着互不理解的危险，只要讲法语就好。我突然为之感到震惊，觉得荒谬之极，不过在生活中这种事情我已经遇到过上百遍。主要的是，在这些人里大概没有偏爱——虽然我现在说的是“爱用什么语言讲话”，也不是选择语言，纯粹是按照习惯、按照风气而讲蹩脚的法语，竟然不想一想，用哪种语言讲话更方便些。这种拙劣呆板的语言中难听的、同样是拙劣呆板的发音也令人厌恶。第二类俄罗斯人所讲的法语，也就是上层社会的语言，其突出特点，首先也是发音，就是说，确实讲得好像是巴黎人，其实全然不是这样，一开口就露出自己的假冒货色，让他们露出马脚的首先是刻意造作的发音，难听的模仿，故意用法语腔调发得不清楚的俄语卷舌音，P这个字母的不文雅的发音，最后，从品德方面看，就是他们在说出这几个故意发音不清的字母时流露出的自鸣得意的神情，他们用模仿彼得堡理发馆里跑腿的小伙计的语言讲话，并以此自炫他们彼此间毫不掩饰各自的幼稚的自我吹嘘。这些奴仆般的自鸣得意令人生厌。随便您怎样说，虽然这都是从前的事了，可是这一切都持续到

① 德国莱茵河的支流。

今天还在令人惊奇，这全是因为那些正处在精力旺盛时期的朝气蓬勃的人们想用枯燥乏味的、无精打采的语言说话。显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种语言（不是法语，是他们用以讲话的语言）的粗俗和贫乏，由于自己的思想的幼稚、浅薄和空洞，他们对自己乐于用以表达自己的浅薄思想的材料非常满意。他们终究无法懂得，他们既然出生在俄罗斯并在这里长大，他们就始终不能真正变成法国人，即使他们从咿呀学语时就由保姆教法语，然后再跟家庭教师并在社会中练习，也都无济于事。因而他们这种语言必定是呆板的，不是活生生的，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造作的与不正常的语言。总之，这一切都是由于顽固地把根本不是法语的语言当做真正的法语，因为俄罗斯人同任何其他人一样，只要不是生就的地道法国人，永远不可能掌握生动的法语的全部基本的固有特征，学到的只是别人的土话，理发馆的许多粗野词句，思想也是如此。这种语言如同盗窃来的语言，因而任何一个俄罗斯的巴黎人一辈子也不能利用这种语言想出一个自己的词句，一句新的、有个性的话，能够得到公认并成为街头巷尾的大众语言的话，然而，这却是理发馆的每一个跑腿的小伙计都能做得到的。屠格涅夫在自己的一部小说[①] 中写下这样一则笑话，一位俄罗斯人走进巴黎一家咖啡馆后就喊叫道："Garçon，beftek aux pommes de terre."[②] 而另外一位已经学会按新的说法定煎牛排的俄罗斯人[③] 一走进咖啡馆就喊道："Garçon，beftek-pommes."于是那前一位照旧的说法喊"aux pommes de terre"的俄罗斯人极为尴尬，

① 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
② 法文：堂倌，带土豆的煎牛排！
③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烟》中，第二个定煎牛排的人是法国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记忆错误，说成俄罗斯人。

懊恼他怎么不知道，没有使用这种新的说法——“beftek-pommes”，担心堂倌们现在可能以轻蔑的目光看他。显然，这个故事取自作家的真实见闻。俄罗斯的巴黎人在语言的形式和堂倌的议论面前奴颜婢膝，自然也是法国思想的奴隶。这样，他们自己就为自己的贫乏的头脑注定了可悲的命运，一生都没有一个自己的思想。

不错，谈论自幼就以别人的语言取代自己母语的害处——无疑是一个可笑的、过了时的话题，幼稚得有失体面的话题，不过，我以为这个话题还远未陈旧到不能试图讲讲自己的话，况且从来也没有陈旧得不能对其说出某些新看法的话题。当然，我并不指望自己的话是新看法，（我哪里有什么新看法！）但是，为了问心无愧，我鼓起勇气来：还是要说说。我非常想尽力把我的理由述说得通俗些，希望上层社会有的妈妈能够读一读我所写的东西。

## 祖国的栋梁之材讲什么语言?

（《作家日记》，1876 年，7～8 月号，第 3 章，Ⅱ）

我想问问做妈妈的：她是否知道，语言是什么，词语是做什么用的，她是如何看的？不容置疑，语言是思想的形式、躯体与外壳（思想是什么，就无须说明了），可以说，语言是肌体发展的最新的和最终的结果。由此可见，我用以表述思想的材料和形式越丰富，我在生活中就会越幸福，就越容易为自己和别人所理解，越容易同自己和别人交流，越容易驾驭和有效地运用；就能更快地找到自己想说的话，说得更深刻，对自己说的话理解得更深刻，在精神上就更坚强，更平静——当然也就更聪明了。再说一遍：妈妈知道吗，人的思考虽然可以像电那样迅速，可是人却从不像电那样迅速地思考，而是比电慢得不可比拟，虽然比讲话迅速得多。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人必须用某种语言进行思考。的确有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注意到我们是在以某种语言思考，但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用语言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在沉思中没有发出声音来，可以说，我们终归是在运用那种语言的天然的基本力量进行思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我们乐于用以思考的那种语言。不言而喻，对于我们乐于用以思考的语言，我们掌握得越灵活、越丰富、越多种多样，就越容易、越丰富多彩地用它表达我们的思想。从实质上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欧洲语言呢？比如说，学习法语。第一，很简单，用法语阅读，第二，在遇到法国人时跟他们交谈；但绝不是在我们之间，不是自己与自己交谈。借用的、异族的语言达不到高度的生活和深刻的思想，因为对

于我们来说，它毕竟是别人的语言；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是母语，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语言。可是难点也就在这里：俄罗斯人，至少是上层阶级的俄罗斯人，很久以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出生就脱离了活的语言，只是到后来才获得某种矫揉造作的语言，他们大都是在学校按照语法学习的俄罗斯语言。噢，不言而喻，如果有强烈的愿望再加上勤奋，即使一出生就遇到呆板的语言，也还是能够重新学习，学会一些生动的俄罗斯语言。我认识一位有名声的俄罗斯作家①，他完全不会俄罗斯语言，可是他不仅学会了俄罗斯语言，而且还向俄罗斯农民学习——后来写出了取材于农民生活的小说。这种戏剧性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为数不少，有的时候竟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伟大的普希金，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也不得不重新学习，学习人民的语言和人民的精神，而且是跟自己的保姆阿琳娜·罗季奥诺芙娜学。“学习语言”这句话对我们俄罗斯人，是特别有用的，因为我们上层阶级脱离人民已经相当远了。（语言和人民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是同义词，这里有多么丰富、深刻的思想！）有人会说：既然必须“学习”活的语言，那么学习俄语与学习法语又有什么差别？问题就在这里，俄罗斯人学习俄语毕竟要容易，无论保姆如何，环境如何，只要时间来得及，这种便利就必须加以利用。为了自然而然地掌握俄罗斯语言，不采取强制灌输的方法，不是只靠科学（我这里所说的科学，

① 指季·瓦·格利戈罗维奇（1822—1900）。他自幼受母亲与祖母的教育，母亲与祖母均为法国人，后又就读于私立的法国寄宿学校，俄语是跟家人与农民学习的。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在工程学院学习时开始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荐的俄语书籍。他写作关于农民的小说有《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渔夫们》（1853）、《移民》（1855—1856）。

当然不只是学校教的语法），必须从幼年起就跟俄罗斯保姆学，像阿琳娜·罗季奥诺芙娜那样，不必担心她会带给孩子形形色色的愚昧见识，例如，三条鲸鱼的传说①。（上帝啊！三条大鱼一生都没有从他头脑中消失！）此外，不要怕接近平民百姓，甚至是仆人，而某些名人却警告做父母的要当心这些人。然后，在学校里必须熟记并背诵我们语言中古代留下的文献——从编年史、壮士歌以至教会斯拉夫语中留下的文献，——就是要背诵，不必顾虑死记硬背的副作用。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母语，也就是我们用以思考的语言，要尽可能地掌握，掌握得要好到像掌握了某种活的东西，还必须使自己习惯于用这种语言思考，这时我们才能运用我们独具的俄罗斯本领去接受欧洲语言学和多种语言的长处。事实上，只有在尽可能完美地掌握了原始材料，即母语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我们才能够尽可能完美地掌握外国语言。这时，我们会不知不觉地从外国语言中提取某些我们的语言所陌生的形式，并且同样是不知不觉地、不假思索地把它们同我们的思想的形式协调起来——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得以扩展和丰富。这里有一件绝妙的事实，能够用我们尚未完善的、年轻的语言传达欧洲各种语言的最深邃的精神和思想形式：我们用俄语翻译介绍了很多欧洲诗人和思想家的著作和言论，有一些还翻译得很完美。与此同时，我们俄罗斯民间语言和我们的文艺作品里面的非常大量的东西直到今天还根本无法用欧洲的一些语言、尤其是无法用法国语言进行翻译与传达。想起果戈理作品的一部法译本（现在很少见了）我就觉得好笑。那是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著名女歌唱家维亚

---

① 三条大鱼的传说，古老的关于宇宙起源的传说，说大地是由八十条小鱼和三条大鱼的脊背驮着的。

尔多[1]的丈夫与一位刚开始写作、现在已成为当之无愧的著名俄国作家[2]在彼得堡合译的。译出来的简直是非驴非马的东西，而不是果戈理的作品。普希金也有很多作品是无法翻译的。我想，如果翻译大司祭阿瓦库姆[3]的作品这类的东西，结果同样会是非驴非马之类的东西，往好处说是译得不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难说，欧洲的精神可能不像我们的精神那样异彩纷呈，比我们更封闭、更独特，尽管它的表现比我们更完美、更明确。既然这是很难说的，那么我们就起码不能不承认，而且是怀着希望和愉悦的心情承认，我们的语言的内涵是无比地丰富多彩，广博深邃，因为它的形式虽然不完整，但是它已能够传达欧洲思想的精华和珍品，而且我们感到，传达得确切忠实。我们要从自己的孩子那里夺走的就是这样的“材料”，为什么呢？无疑是要使他们成为不幸的人。我们蔑视这种材料，认为它是粗俗的语言，认为用它来表达上层社会的感情或者上层社会的思想是有失体面的。

顺便谈谈，整整五年前，我们这里进行过一场所谓的古典主义的教学改革[4]。数学以及拉丁文、希腊文——这两种古代语言被认为是发展智力和精神的最好手段。这不是我们说的，

---

①② 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丈夫是巴黎的意大利歌剧院经理路易·维也尔多。屠格涅夫年轻时就崇拜她，后来成为她的终身密友。下文说的俄国作家即屠格涅夫。

③ 阿瓦库姆（1620 或 1621—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思想家、大司祭、作家。因反对宗教改良派，反对官方教会，数度被流放、监禁，后按沙皇旨意处以火刑。

④ 指俄国国民教育大臣季·安·托尔斯泰伯爵于 1871—1872 年对中等教育实行的改革，改革内容是在古典文科中学加强古希腊文、拉丁文与数学教学，规定只有古典文科中学毕业生才有资格升入高等学校，改革的目的是阻止学生接受革命思潮，并阻止下层社会的子女升入高等学校。

也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事实，是欧洲几个世纪的经验证实了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不过是袭用而已。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在极力强化这两种古代伟大语言和数学的教学时，几乎完全排斥了俄罗斯语言的教学。试问，如果俄罗斯语言的水平降低了，我们的孩子们又如何、以何种手段、通过什么材料去掌握这两种古代语言的形式呢？难道仅仅是教授两种古代语言（还是捷克教师）这一机制就能构成他们发展的全部力量？如果不平行地进行最强化的、深入的活的语言教学，也就无法运用这一机制。这两种古代语言是人类思想的两种最完美的形式，它们在几个世纪里已经把曾经是野蛮的整个西方提高到发展和文明的最高阶段。而这两种古代语言的全部道德发展的力量，显然没有在我们的新的学校发挥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在我们的学校中俄罗斯语言衰落了。或许，我们的改革者可能认为，俄罗斯语言是根本用不着学的，要学的只是什么地方应该写ѣ[①] 这个字母，因为他们是与这个字母一起长大的？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我们，社会上层阶级的人们，早已不再与活的俄罗斯语言共同成长了。只有我们与人民完全结合到一起时，我们才会有活的俄罗斯语言，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的。我谈的离题了，本来我是同做妈妈的谈话的，竟谈起古典改革和与人民结合的话题来。

当然，这些话做妈妈的听起来会觉得枯燥乏味；妈妈会愤懑地挥挥手，带着嘲讽的笑容转过头去。儿子用什么语言思考，妈妈是无所谓的，如用巴黎的话，那就更好：“既高雅，又聪明，更为悦耳。”可是，她竟然一无所知，为此就需要彻

---

① 俄国教会斯拉夫语与古代俄语中的一个字母，有时读 e 音，有时读 и 音，1917 年文字改革时废除了 ѣ 这个字母。

头彻尾变成法国人，靠保姆和家庭教师是绝不能获得这种幸福的，只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出第一站，这一站就是不再做俄罗斯人。噢，妈妈不知道，孩子才两岁，就请个保姆安置在他的身边，这是在用一剂什么样的毒药在毒害自己的孩子。例如，任何一位母亲和任何一位父亲都知道，有一种可怕的儿童身体上的习惯，某些不幸的孩子几乎在十岁左右就有这种习惯，如果照料不到，这种习惯有可能使孩子成为白痴，成为委靡不振、身体虚弱的小老头儿。我可以冒昧地直言不讳，保姆，也就是从婴儿、从咿呀学话时起学习的法语，从道德的意义上讲，无异于这种可怕的身体习惯。如果他天生就是个蠢才或者是地道的庸碌之徒，那还算好；那他就可以讲着法语、自得其乐地、带着浅薄的见解和理发匠的头脑了此一生，直到临死还全然不知自己做了一生的傻瓜。然而，如果这是一个有才干、有头脑、胸怀大志的人，——他能够幸福吗？他没有掌握可以组织自己思想与自己一切内心要求的全部深度的材料，一生掌握的都是僵死的、病态的、剽窃来的语言，嗫嚅的、背熟的、使他无法发挥的和粗糙的形式，为了表达自己和自己的心灵，他无时无刻都要殚精竭虑，在智力上和精神上忍受着无穷无尽的折磨。（上帝啊，这种语言是僵死的、不自然的，这难道就那么难以理解！）他痛苦地发现，他的思想是简单的、肤浅的、卑鄙的，卑鄙是由于自己的浅薄，而浅薄则是由于思想在一生中都蜷缩在微不足道、委琐浅薄的形式中；最后还发觉，他的心灵也堕落了。堕落也出自苦恼。噢，自然啦，这无损于他们的功名利禄：所有这些一生下来就有保姆侍候的人们，无须说，早已由自己的妈妈预定为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材，他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必将飞黄腾达，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他将实施种种条例，采取种种措施，——总

之，他甚至常常扬扬自得，在利用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词句发表 plus de noblesse，que de sincerite'① 的高谈阔论时，尤其如此。然而，如果他只要是人，那么总的说来，他就不会幸福。他将因某种无能而永远苦闷，正如因恶劣习惯过早耗尽力量而痛苦的少年老头儿。然而，有哪一个妈妈会相信我说的，法语和保姆竟会造成所有这些灾难！我预感到，不只是一个妈妈会说我夸大其词；其实，严格地说，我说的是真实，并没有夸大。有些人要反驳我说，恰恰相反，这样反而更好，靠别人的语言生活，生活过得会更容易，更轻松愉快，正是该避开生活中这些问题和要求，不是把法语作为法语，而是作为替代母语的外国语言——这样的法语恰恰有利于达到上述这种生活。怎么可能？这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社交界的宠儿，言谈俏皮的人不幸福吗？他的衣着打扮那么入时，体魄那么健壮，脸上那副贵族神气，胸前那朵美丽诱人的玫瑰花！妈妈要发出傲慢的冷笑。其实，即使没有这一切（即没有法国的教育），极其大量的知识分子层的俄罗斯人，毫无疑问，已经是智力上的无产者，随着欧洲风向转的国际浪子，他们脚下没有大地，没有根基，也没有源头，现在仍然如此。而这个受过保姆与家庭教师教育的人，往好里说，即使他能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实质上，终究不过是一个带着洁白手套的年轻人，也许还喝过几瓶时髦的墨汁，但是他的头脑却徘徊在永恒的黑暗中，他的心向往的就是钱。我重说一遍，他将成为国之栋梁，当然，他要做官为宦，不是他又能是谁（我们这里，祖国的栋梁之材是从三等文官起步），——这样，妈妈眼下是满意了；不过，满意的只是妈妈而已！……

① 法文：高尚多于真诚。

## 一个受现代妇女宠幸的人

（《作家日记》，1876 年，7～8 月号，第 4 章，Ⅱ）

我当然不会把同这位旧派人物的全部谈话都写出来。我知道，他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妇女。于是，有一次我就同他谈起女人来。他说，我的观察很仔细。

“我很仔细地观察英国女人，有特殊目的。我在途中随身带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拉诺夫斯基关于东方问题的，另一本是关于妇女的[①]。在这本关于妇女的小册子中有几个绝妙的和非常成熟的思想。但是，你看，有一句话简直使我莫名其妙。作者突然写道：

> 然而，全世界都知道，英国女人意味着什么。这是女人美与女人心理素质的最高类型，我们俄罗斯女人是不可能与之媲美的……

是这样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同我们俄罗斯女人相比，英国女人真的是那么高级的类型吗？我绝不同意。

“小册子的作者是谁？”

“我没有称赞小册子中值得称赞的话，而是只摘出我所不同意的、作者唯一的一句话，因此，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大概作者是单身汉，他还没有来得及了解俄罗斯女人的全部素质。”

---

① 指批评家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小册子《妇女问题·评穆勒的〈论妇女的服从〉》，圣彼得堡：1871 年。

“您说的虽然是一句尖酸刻薄的话，不过，您却说出了俄罗斯妇女‘素质’的真相。是的，俄罗斯人不该贬低自己的妇女。我们的妇女比谁差呢？我不必列举，从塔季扬娜[1]起，我们的诗人们那些光辉的理想，——屠格涅夫的妇女、托尔斯泰的妇女，这也就是有力的证据：如果在艺术中已经塑造出这种美的理想，那么这些理想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是凭空捏造的。可见，在现实中是有这些妇女的。我也不必去说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2]和那些尽人皆知的数以千计的事例了。我们这些熟悉俄罗斯现实的人不该不了解成千上万的妇女们，不该不知道她们无声无息地做出来的、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的丰功伟绩，有的时候她们是在多么愚昧、多么恶劣的角落和贫民窟里，在充满犯罪和极其可怕的环境里做出来的！说得简短些，我不想在全欧洲的妇女中为俄罗斯妇女争取最高地位的权利，我只想说：我认为，在各国人民和民族里面，应该有这样一条自然法规，它要规定，每一名男子应该首先在自己的人民和民族里挑选自己所爱的妇女，是不是应该这样？如果男人开始把其他民族的妇女置于自己民族的妇女之上，首先被她们所吸引，那时这个民族的瓦解的时刻，这个民族的动荡的时刻就将到来。确实是这样，近百年来，在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近似的情况，正因如此，我们同人民的分裂也随之加深。我们倾慕波兰女人、法国女人甚至德国女人；现在又出了一些英国女人的爱慕者，把她们看得高于自己的女人。依我看，在这一迹象中完全没有任何值得自慰的东西。这里有两个问题：不是在精神

① 或译塔吉娅娜等，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

②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许多人被流放，他们的妻子很多都随他们去流放地。

上脱离民族，就是妻妾趣味。必须转向本民族的妇女，必须向自己的妇女学习，如果我们已经不能理解她们的话……”

“我愿意愉快地同意您的全部意见，尽管我还不知道，在自然界或者民族里面是否存在那样的法规。不过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为什么认为，我指出小册子的作者好像是单身汉，看来，他还没有机会了解俄罗斯女人的全部高尚品质，似乎是句刻薄话？可以说，我自己就是受俄罗斯妇女宠幸的人，单凭这一点说，我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刻薄的意思。是的，不管我这个人怎样，也不论您怎样看我，在我的生活中的某个时候，我自己曾经做过俄罗斯妇女的未婚夫。这样说吧，这位姑娘的社会地位比我还高，她被一群追求者包围着，她可以挑来选去，于是她……”

“看中了您？请原谅，我不知道……”

“不，她没有看上我，恰恰是把我淘汰了，一切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我坦率地告诉您，在我还没有成为未婚夫时，一切都正常，我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见她，单是这一点就使我感到幸福了。不过，顺便稍带提一句，我敢大胆地说，大概我没有给她任何不好的印象。再补充一句，这位姑娘在家中享有很多自由。忽然有一次，在一个非常奇特的、从未有过的（我可以这样说）时刻，她突然答应了我，——您无法相信，我当时是个什么样子。当然，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我被震惊得发呆地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想到我将占有这个秀丽女人，自己也将成为她的一部分，我简直郁闷透了，如同沉重的铁块压在身上。我环顾我的家具、那些我这个单身汉必须的破烂货，——我为自己、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为我的身材、我的头发、我的破烂货、我的思想委琐和心胸狭隘而感到羞愧，想到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将要拥有一笔与我很不相称的财富时，我很懊悔

地、千百次地诅咒起自己的命运来。我向您表白这一切，用意是向您述说婚姻真情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说得明白些，是一种情感，遗憾的是，做未婚夫的人很少有谁能体验到这种情感，这就是：要想结婚，就必须具有极其愚蠢的傲慢，傲视一切，也就是最愚蠢、最庸俗地目空一切，——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最可笑的姿态，而这是有身份的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怎能拿自己与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姑娘相比呢？连闪现这个念头都不可以，她的教养、鬈发、薄纱裙、舞步、天真无邪和纯朴，而又具有上流社会那种魅力的言谈举止和情感，统统是完美无瑕的。您不妨设想一下，她带着这一切进入我的房子，而我却身着睡衣似的外套。您以为这可笑吗？其实这是多么可怕的想法！还有一个问题，人们会对您说：您如果不敢娶那样完美无缺的人，觉得自己配不上那样的人，您可以找一个邋遢人（绝不是道德上的邋遢人）。没办法，您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不同意，甚至还感到愤慨，条件丝毫也不打算降低。总之，我就不向您描述细节了，反正都差不多。例如，当我绝望地、疲惫不堪地躺在我的沙发上（应该告诉您，这是世上最破的沙发，旧货市场上买的，弹簧已经断了），这时，一个无聊透顶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这就成家，现在终于再也不愁没有擦钢笔尖的碎布了，裁剪剩下的碎布头什么的。'看起来，这是最普通不过的想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必说，这是无意中一闪即逝的念头，您自己当然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天知道，有的时候在人的心灵里会冒出一些什么样的思想，甚至在心灵陷入苦难的时刻也是这样。我之所以有这样一闪的念头，大概是因为我有一种癖好，不喜欢把不擦净的钢笔尖放在那里，可是有许多人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这个想法我狠狠地责备了自己，在面对这么重要的事情和问题的时候，

竟然去想象擦钢笔尖的布头，竟然有时间和空间容纳这么委琐平庸的思想，——‘唉，此后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总之，我感到，从这时起我将在自我谴责中度过我的整个一生，我的任何一种想法，任何一个行动都要受到自己的谴责。可好，几天之后，她面带笑容地突然向我宣布说，她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原本她是要嫁给一个官吏，而我，我呢……实际上，我不是高兴，而是大吃一惊，都惊得发呆了，连她自己都害怕了，她赶快跑去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恢复过来了，可是这一惊倒帮了我的忙：她明白了，我是多么爱她……多么珍惜她，珍惜到什么程度……‘可是那时我在想，’——后来，出嫁之后，她说，——‘您那么高傲，那么有学问，您会非常看不起我’。从那时起我们成了朋友，我再重说一遍，如果说有谁曾经受到女人，确切地说是俄罗斯女人的宠幸，当然，这就是我，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您就这样成了这位女人的朋友?”

“您看，还是最好的朋友，不过，我们不常见面，甚至一年比一年少。俄罗斯的友人们通常是五年见面一次，见面多了，很多人反而厌烦。开始，我没有去拜访过他们，因为她丈夫的社会地位比我高，现在呢，现在她很不幸，我看了都觉得很难过。首先，她丈夫是个六十二岁的老头子，婚后一年她的丈夫就受到审判。为了偿还公款，他几乎花光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在牢中腿也瘫了，——现在是用车推着他在克赖茨纳赫①的街上走，我于十天前在那儿见到过他们两人。她像在推车似的，总是挨着车在右侧走，她是在尽现代妇女的最高尚的义务，——请注意，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丈夫的苛刻的指责。

① 普鲁士莱茵州的一座城市，当地有矿泉浴的疗养院。

看到她，或者更该说是看到他们两人，我心情很沉重，——因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更怜悯他们哪一个，因此，我立即离开了他们，自己到这里来了。我幸亏没有对您说出她的姓名。再加上在短短的时间里，我还不幸地激怒了她，看来，这是因为我终于坦率地向她亮明了我对幸福、对俄罗斯女人的义务的看法。”

“噢，当然啦，您不可能找到比这更恰当的机会了。”

“您是在责备我吗？但是，还能有谁向她讲这些话呢？恰恰相反，我总是认为，最大的幸福——这就是起码要知道，不幸的原因何在。请原谅，既然话已经说到这里，那我就把我对幸福、对俄罗斯妇女的义务的看法全向您说；而在克赖茨纳赫我并没有完全说出来。”

## 孩子的秘密

（《作家日记》，1876 年，7～8 月号，第 4 章，Ⅲ）

我要在这里稍作停留。我只是想先把人物说出来，先把他介绍给读者。我想把他仅仅作为一个叙事人写出来，他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我已经说过，这是一个“见解怪诞的人”。他关于“现代妇女的幸福与义务”的见解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虽然他讲得是那么慷慨激昂，可以想象，这是他的最薄弱之点。按照他的见解，女人要是想幸福并且克尽自己的所有义务，说实在的，那就必须嫁人，生儿育女，生得越多越好，“不是两个、三个，而是六个、十个，直至精疲力竭。”“只有到那个时候她才能接触血肉丰满的生活，认识这种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现象。”

“说实在的，不要走出卧室！”

“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我早就料到了，也知道，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我通盘衡量过：大学、高等教育，等等，等等。男人里面只有万分之一成为学者，这且不去说它，我认真地向您请教：大学怎么会妨碍结婚生孩子？与此相反，所有的妇女、所有的未来学者以及凡是有教养的人都一定要上大学，然后，就是大学之后，——结婚、生孩子。直到今天，在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来比生孩子更聪明的事，因此，在这方面积蓄的智慧越多，做得就会越好。正是恰茨基，或者什么人说过：

……只为生儿育女

哪一个人没有这点儿头脑？①

他说这话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最没有教养的莫斯科人，他一生只会跟着别人吵吵嚷嚷地谈欧洲教育，结果，后来表明，他连遗嘱都不会写，把财产留给了不知何许人的‘我的朋友索涅奇卡’②。‘哪一个人没有这点儿头脑’这句俏皮话持续了五十年，因为在后来的五十年里我们这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现在好了，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受过教育的人，请相信，他们会明白，生儿育女是头等大事，是世界上最主要、最严肃的事情，过去是这样，从来也没有改变过。‘请问，哪一个人没有这点儿头脑？’看吧，在这里就是没有：现代的欧洲妇女就不要生孩子。关于我们的妇女，我暂时保持沉默。”

“您在说什么呀，怎么能不生孩子？”

“我想顺便提一提，这个人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奇怪性格：

① 引自阿·谢·格里鲍耶陀夫（1794或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3幕，第3场。

② 引自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的系列讽刺小品文的第3篇《莫尔恰林先生们》（1874—1878）。谢德林在文章中把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莫尔恰林移植到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借用这个人物形象抨击自由派。文章中的恰茨基与原剧本的情节相反，最后终于娶了剧中女主人公索菲亚为妻，恰茨基在遗嘱中说：“我的祖传家产留给我的朋友索涅奇卡，直到她亡故。”但遗嘱文理不通，“我的朋友”一词用的是阳性，应指男人；而索涅奇卡虽则是女人，但也未明确说是妻子，因而不符合法律要求。恰茨基死后，索菲亚的堂兄以遗嘱未明确指何人为借口，对遗嘱提出异议。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对自由派的评论对恰茨基所进行的解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就对恰茨基这个人物持否定的评价，认为他是老一代的西方派，脱离人民的土壤，不善于从事有益的实践。在《孩子的秘密》这篇文章中又进一步否定这个人物。

他喜爱孩子，喜爱幼小的小不点儿，‘是小天使年龄’的孩子的喜爱者。他喜爱孩子到了围着孩子转的地步。在埃姆斯他竟以此闻名。他最喜欢在经常有人带小孩子去的林阴路上散步。他跟孩子们熟悉了，大多是一岁上下的孩子们，很多孩子都认识他，等待他，向他微笑，向他伸出小手。他每次必定向德国保姆详细询问，孩子是几岁或者几个月了，夸奖孩子，也间接地称赞保姆，讨保姆的欢心。总之，这在他像是一种癖好。每天早晨，一群群上学的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手拿夹肉面包，肩上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水边、林阴路上的人群中间时，他总是显得特别兴奋。应该说，这些孩子确实可爱，尤其四、五、六岁上下的最小的孩子们。”

“Tel que vons me voyez[①]，我今天买了两支小木笛。”一天早晨他对我说，露出非常得意的样子。“不是给那些小学生的，他们都是大孩子了。昨天，我有机会认识了他们学校的老师：是一位最可尊敬的人，老师只能是这样的人。不，那是一对小胖子，弟兄俩，一个三岁，另一个两岁。三岁的领着两岁的，两个都很聪明；他们在卖玩具的小摊子前停下来，张嘴望着，在世界上你想象不出来还有比儿童那种笨拙、迷人的羡慕神情更叫人可爱的了，摊主是位精明的德国女人，立刻就看出了我在观望的心情，随即给了每个孩子一支木笛：我应该付出两个马克。边走边吹，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了。这是一个小时之前的事，刚才我又到那里看了看，还在吹呢。谈到这里的社会时，我对您说过，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了。我那是瞎说，您竟相信了，请不要否认，您相信了。全然相反，请看，最好、最完美的世界在那里：这就是手拿夹肉面包，肩背书

① 法文：我，您知道。

包，一群群去上学的埃姆斯的孩子们……看吧，阳光、陶努斯山脉、儿童、儿童的笑声、那个正在欣赏这群孩子的贵族阁下和他们的夫人的优雅人群，这一切凑在一起美妙极了。您已经看到，这群人每一次都以欣喜的目光望着孩子们：这正是这群人的兴致的流露和一种正经八百的真情。但埃姆斯是愚蠢的，埃姆斯不可能不愚蠢，这就是因为他还在不断生孩子，可是巴黎——巴黎已经停止生孩子了。”

“怎么会停止？”

“在巴黎有一种叫做 Articles de Paris[①] 的庞大工业，这种工业，再加上丝绸、法国葡萄酒和水果，共同帮助支付五十亿的赔款[②]。巴黎极其看重这种工业，为了从事这种工业竟然忘记了生孩子。全法国都跟着巴黎走。部长年复一年地向议会庄重报告说：‘la population reste stationnaire.’[③] 您看，没有出生儿童，出生的也没有养活；然而，部长炫耀地补充说：‘我们的老年人都健康，可以说，法国的老年人是长寿的。’依我看，还不如让他们都死光，老年人〈……〉，法国用他们填满自己的议会。他们长寿，总算有值得高兴的；可是老的不得了的人难道还少吗？”

“我还是不明白您的话。Articles de Paris 与这一切有什么相干？”

“事情很简单。其实您自己就是小说家，因此，您大概知道一位糊涂透顶却又很有才华的法国作家、旧派理想主义者亚历山大·小仲马[④] 吧？这位小仲马做了几件好事情。他主张让

① 法文：巴黎制品。
② 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给德国五十亿法郎赔款。
③ 法文：“居民人数依然稳定。”
④ 小仲马（1842—1895），法国作家。

法国的女人生孩子。不仅如此，他直言不讳地公开了一件众所周知的秘密，法国富裕资产者家庭的女人无一例外只生育两个孩子；他们巧妙地对付自己的丈夫，只生两个，不多也不少。生下两个孩子之后就刹车了。全都是一样，不愿意多生，这个秘密极快地传播开了。后代已经有了两个，此外财产留给两个人比留给六个人要多些，这是一。其次，女人自己的青春能保持得更久：美貌常驻，还有健康，用于出游、化妆和跳舞的时间也更多。从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看，双亲之爱给予两个孩子的要比给六个孩子得多，六个孩子要淘气、烦人、摔东西，你就应付他们吧！……光是鞋子就要多少，操心的事没完没了，等等，等等。问题不在于小仲马的愤慨，而在于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一个秘密：只生两个孩子，——不多也不少，还可以继续与丈夫过着美满的夫妇生活。总之，一切都照顾到了。马尔萨斯[①] 很怕世界人口的增长，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象到这些手段。有什么办法呢，这一切太诱人了。人们都知道，在法国有极其大量的有产者、城乡资产者：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发现，这是他们的创造。然而这个发现越出了法国的边界，再过个四分之一世纪左右，您会看到，愚蠢的埃姆斯也会聪明起来。据说，柏林在这方面也已变得非常聪明。不过，儿童即使会减少，法国的部长还是忽视了一种差别，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资产者即富裕的阶级就能够解决的，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另外一头。这另一头就是无产者，八百万、一千万或许是一千二百万的全部无产者，这些人没有受过洗礼，没有在教堂结婚，为了

---

①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这里谈的是他的《人口论》(1798)。他认为人口的增长快于生产资料的增长，主张减少人口，采取各种措施以限制人口增殖。

‘逃避苛政’，以‘明智的结合’代替婚姻而共同生活，他们干脆把孩子抛弃在大街上。伽弗洛什[1] 们生下来就死了，不能成活；而那些活下来的则将挤满教养院和少年罪犯的监狱。在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者左拉的长篇小说“Le ventre de Paris”[2]中，对现代法国工人的婚姻即结婚后的共同生活做了十分精确的描写。您会发现，伽弗洛什们已经不是法国人。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自上层的，也就是生而为有产者的人，即秘而不宣、只生两个孩子的人，其实也不是法国人了。我起码是敢于肯定这一点的，这样一来，两个部分、两个相对立的方面就汇聚到一起了。由此而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法兰西将不再成其为法兰西。（难道能够说，这一千万人曾把法兰西认做祖国吗！）我知道，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会说，这样更好：法兰西人消失了，人却依然存在。但是，他们能够算做人吗？即使说是人，那也是将要吞噬欧洲的未来的野蛮人。从他们中间将会渐渐地、然而却无可挽回地、必然地孕育出未来那些毫无感情的社会渣滓。我认为，一代人肉体上的蜕化、孱弱和变坏是毫无疑问的，而随肉体而来的则是道德面貌，这就是资产者王国产生的果实。在我看来，全部的缘由就在于土地，也就是根基，把根基变为私产的现代分配方式。那么好吧，我现在就来说明这一点。”

---

① 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中的巴黎流浪儿童。

② 《巴黎之腹》（1873）是法国作家左拉（1840—1902）的二十卷集家族史小说《鲁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中之一部。

# 土地与儿童

（《作家日记》，1876 年，7～8 月号，第 4 章，Ⅳ）

“土地就是一切，”——我那位见解怪诞的人继续说道。——“我不把儿童与土地分开，在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我不想对您多谈这些，您只要思索一下就会明白的。问题就在于，一切都源于土地问题上的错误。甚至可以说，其余的一切，人类所有的灾难，可能也全都是由于土地问题造成的。千百万穷人没有土地，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的土地本来就极少。穷人没有地方生育孩子，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生育孩子，这不能说是孩子，而是伽弗洛什们，其中有一半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可能还有一半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从一边来看是这样，从另外那一边看，从上层看，我认为也有土地问题上的错误，但这已是另一种性质的错误，相反的错误，可能是克洛维一世① 这位高卢的征服者造成的：他们每个人的土地过多，掠夺得太多，过分了，他们还把掠夺来的紧紧抓住，一点儿也不放弃，因而无论是那一边还是这一边都不正常。这就应该做点什么，应该有所改变，但要让所有的人全都有土地，孩子应该出生在土地上，而不是大街上。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错误如何改正，但是我知道现在那里没有生育孩子的地方。依我看，就在工厂工作吧：工厂也是正当的事情，工厂总是靠近耕种的土地，因此它是正当的。但是，每一个工厂

---

① 克洛维一世（约 465 或 466—511），法兰克人首领，5 世纪末至 6 世纪初征服高卢，建立法兰克王国。

工人都应该知道，他在那里有一块园地，在灿烂的阳光和葡萄藤下有自己的，或者确切点儿说，村社的一块园地，在那块园地上生活着他的妻子、可爱的女人，他的儿女不是同爱他、等待他的马路女人生的，而是同妻子生的，他的孩子们摆弄着玩具马游戏，他们都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Que diable[①]，任何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儿童天生都要玩具马，每一个正常的父亲，如果他想要成为幸福的人，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他挣的钱正是应该花在这上面，而不应跟在大街上找到的放荡女人花在酒馆里。退一万步讲，即使这块园地不能够养活他和他的一家人（比如法国，那里的土地就这么少），因而没有工厂还对付不过去，那么，起码他要知道，他的儿女是跟土地、跟森林、跟捕捉到的鹌鹑一起长大，是在学校里念书，而学校是在田野里，他自己干了一辈子活之后，最终要到那里去度过晚年，然后再死去。其实，谁知道呢，也许土地足够养活全家人，再说，工厂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可能——工厂就建在园地中间。总之，我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怎样，但这一切一定会实现的，园地是会有的。请记住我的话，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之后，再想一想我在这里，在埃姆斯的人工花园里，在矫揉造作的人们中间所说的这些话。人类将在园地获得新生，园地将使人恢复元气，这就是公式。请看，过去是怎样的：最初是城堡，在城堡的外围是土房；城堡里住着贵族，土房里住着臣仆。此后，资产者渐渐不声不响地在有城墙的城市里兴盛起来。与此同时结束了城堡的时代，出现了国王的都城，拥有许多王宫和臣僚宅邸的大规模城市，一直存在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可怕的革命，资产者胜利了。伴随着资产者出现了宏伟的城市，这是任

① 法文：谁都知道！

何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大城市。19 世纪出现的这种大城市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些城市有水晶宫殿[①]、世界博览会、国际饭店、银行、各种预算案、污染的河流、货场与各种公司，在它们的周围则是各种工厂。现在人们在期待第三阶段的到来：资产者的时代结束，新生的人类的时代到来。人类将按照村社的原则分配土地，开始在园地上的生活。‘人类将在园地上获得新生，园地将使人恢复元气。’总之，这就是城堡、城市和园地。如果要知道我的全部想法，那就是，儿童，就是说真正的儿童，人类的儿童，应该出生在土地上，而不是大街上。以后可以生活在大街上，但是，一个民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在土地上出生并且成长，应该在生长庄稼和树木的那块土壤上出生并且成长。而现在的欧洲无产者全部是在大街上生长起来的。在园地里儿童们将像亚当一样，直接从土地里钻出来，而不是在九岁还贪玩的年龄[②]，就进入工厂，在机床上扭伤筋骨，在资产者顶礼膜拜的可恶的机器前变得头脑迟钝，在密密麻麻的瓦斯炉中间变得想象贫乏，而连在所多玛[③]都没有见过的工厂的堕落腐化的环境则使道德沦丧。他们全是年幼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能在这里就不错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呢。在我们俄罗斯则不同，那里有许多土地；工厂在那里

① 伦敦的一座用钢铁与玻璃造成的建筑物，曾在这里举办过世界博览会。

② 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童工，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此后也很注意，但没有在艺术作品或政论中正式展开论述，而只在手稿中有所涉及。

③ 据圣经传说，在古代巴勒斯坦的城镇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居民因纵欲无度而被火海与地震所毁灭。见《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 13 章，第 19 节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15 节。

还是新鲜事，而城镇则是只有三个小官吏的城市。如果让我说，关于未来的胚芽或者理想在哪里的话——那就是在我们这里，在俄罗斯。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在人民里面，有一个原则直至今日仍然保留着，这个原则就是，对于人民来说土地就是一切，一切都源于土地，来自土地。这里主要之点是，这是人类的正常规律。在土地里，在土壤里，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如果想使人类变得更好，直至把他从野兽变为人，那就把土地给他——你的目的就可以达到。我们的土地和村社至少是处于极糟糕的状态，这我同意，但对于未来的理想而言，这毕竟是一个茁壮的胚芽，其意义也就在这里。据我看，秩序在土地之中并源于土地，处处如此，全人类如此。每一个国家的所有秩序——政治的、公民的以及其他一切——永远是同土壤、同这个国家土地占有的性质联系着的。土地占有属于什么性质，其余的一切也属于什么性质。如果说在我们俄罗斯现在在哪里还有混乱无秩序的话，那就是在土地的占有，在占有者对工人的关系和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上，在土地耕作的性质本身出了问题。只要这一切还没有解决好，就不能期望有牢固的制度，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并非责怪什么人或什么事：这是全世界的历史，——我们是理解的。我认为，仰仗大地的赞同，我们轻易地废除了农奴制。我就是要在所有其他方面也寻求这种赞同。这种赞同——其实又是人民本原之一，这就是波图金们至今仍在否定的我们那些本原。就算是这样吧，可是我们所有的全部铁路，我们所有的那些新银行、公司、信贷——我认为，这一切目前只是累赘，在所有的铁路中我只赞成那些有战略意义的。这一切都应该在处理好土地之后再去办，那时就会是自然而然的事，而现在这不过是交易所的投机，是犹太人又活跃起来。您在笑，您不同意，就算您对吧；可是我

刚刚读过一位俄罗斯地主在本世纪中叶写的一部回忆录[1]，还在19世纪20年代他就想解放自己的农夫，给他们自由。在那个时候，这是奇闻。顺便提几句，他到农村后，办了学校，教农民儿童学唱教堂的合唱歌曲。一位地主邻居路过这里，听了合唱后说：'您想出了个好主意；现在您教他们，不难找到要买下整个合唱班的人。有些人喜好这事，会付给您大价钱买合唱班。'这就是说，在那个可以出卖儿童合唱班并把他们从父母那里“运走”的时代，给农民自由这件事还是俄罗斯大地上无法理解的奇谈怪论。于是他就开始向农民谈论这个怪主意；农民们听了他的话，都惊讶不已，又感到可怕，彼此之间商量了很久，然后才来找他说：'“那么土地怎么办?”“土地是我的，房屋、宅园归你们，你们每年给我种地，收成对半分。”农民们挠挠头说：“不，还是按老办法好：我们归你，土地归我们。”'当然，地主对此很吃惊：在他看来，这是野蛮的人民；道德堕落到连自由都不想要，自由——这是人们的第一位的财富，等等，等等[2]。后来'我们归你，土地归我们'成了尽人皆知的话，或者确切点说，尽人皆知的公式，没有谁感到惊讶了。然而，最主要的是：如果只与欧洲做个比较，'对世界历史的这种违反自然的、独一无二的'理解可能来自何处呢？请注意，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这里的聪明人在一个问题上争论得怒发冲冠，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里，事实上是否

① 指俄国十二月党人伊·季·亚库什金（1793—1857）著的《伊万·季米特里耶维奇·亚库什金札记》（《十二月党人札记》，第1卷，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62年）。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的转述把俄国十二月党人描绘成脱离俄罗斯人民本原的贵族，他的转述与伊·季·亚库什金的《伊万·季米特里耶维奇·亚库什金札记》原文不符。

还存在值得有教养的人们注意的某种人民本原？不，请允许我说句话，实际上，俄罗斯人民从最初起，从来就不能也不可能设想自己没有土地。不过，最叫人吃惊的是，在废除农奴制之后，人民仍然在固守这个公式的实质，绝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没有土地。既然不愿意接受不带土地的自由，那就是说，土地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是一切的基础，土地就是一切，而他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源于土地，也就是说，自由、生命、荣誉、家庭、子女、秩序和教堂——一句话，他所珍视的一切。为了这个公式，他甚至连村社这种事物都保留下来了。村社是什么？有的时候它比农奴制还要沉重！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村社土地占有制，人人都明白，在这种占有制里光是妨碍经济发展的东西就有多少；然而，在这种占有制里面难道同时就没有某种新的、更好的、属于未来的、理想的东西的胚芽，这些都是期待之中的东西，不知将会如何出现的东西。但是，这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只是在我们这里才有，只有在我们这里才能出现，因为这不是通过战争，也不是通过暴动才能出现的，这是要通过伟大的、普遍的和睦才能出现，而所以能普遍和睦，就是因为现在为它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儿童将要出生在园地里，并且健康成长，不会再有十岁的女孩儿同工人到酒馆喝劣质酒。先生！儿童在我们这个世纪要成长起来是很艰难的。我只是想专门谈谈孩子们的事，为此才打搅你们的宁静。儿童——这是未来，而你是只爱未来，可是，有谁会关心现在呢。当然，不是我，大概也不是您。由于这个原因您才最喜欢孩子们。”

# 俄罗斯不寻常的夏天

（《作家日记》，1876 年，7～8 月号，第 4 章，Ⅴ）

第二天我对我的那位怪人说："你们总是在谈论儿童的事，可是我刚才在大厅里，在俄罗斯的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一位保加利亚的母亲的报道，在保加利亚，人们被整整一个县一个县地灭绝了，现在那些报纸的周围挤满了这里的俄罗斯人。老妈妈是一个村庄的幸存者，她疯了，不停地在自家被烧毁的房屋的废墟中走来走去，每当有人问她发生过的事情时，她不是用普通的话回答，而是立即把右手罩在面颊上放声唱了起来，用歌谣的曲调唱出触景生情的诗句。她唱的是，她有过一个家庭和房屋，有丈夫和孩子，一共六个孩子，大的孩子们已经有了小孩子，也就是她的小孙子们。暴徒们来了，烧死了她的老头子，杀害了她的子女们的小鹰雏，奸污了她的小女儿，掳走了另一个女儿，用月牙刀挑开幼儿们的肚子，然后就点燃了房屋，把他们全都扔进烈焰中，她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她还听见儿童们的喊叫声。

"是的，我也读过了。"我的那位怪人回答说。"精彩极了，精彩极了。主要是诗好。我们俄罗斯的评论有时虽然也称赞几句诗歌，但总是倾向于认为写诗是为了消遣。观察自发形成的朴素的民歌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艺术问题。"

"喂，算了吧，不必装腔作势了。其实，我知道，您很不愿意谈论东方问题。"

"不，我也捐款了。无论您怎样想，在东方问题上我确实有不赞成的事情。"

“什么事情？”

“比如说吧，过分多情……”

“好啦，我相信……”

“我明白，我明白，您不必讲下去了，您确实是对的。其实我在一开始就捐了款。您想想看，在我们这里，东方问题到现在为止，可以这样说，还仅仅是一个爱的问题。这个问题发源于斯拉夫派，很多人事实上利用了这种多情，尤其是去年冬季在黑塞哥维那事件上①；现在甚至出现了某几种感情色彩浓厚的职业。请注意，我并没有说什么；再说多情本身是极好的事情，然而它也可以使人精疲力竭，这也正是我从春天起早就在担忧的事情，因而也就不相信这种多情。后来，到了夏天，我甚至又在这里担心，希望我们这种兄弟情谊千万不要突然消失。不过现在，——现在我就不怕了；因为俄罗斯的鲜血已经流出来了，流出的鲜血是重要的东西，是把人结合到一起的东西！”

“难道您真的想过我们的兄弟情谊会消失吗？”

“很抱歉，我这样想过。可是，怎么能不这样想呢。现在就不这样想了。您想想看，甚至在这里，距离莱茵河十俄里的埃姆斯都得到了，可以说，直接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来了一些旅游者，他们亲耳听到人们在贝尔格莱德如何指责俄罗斯。另一方面，我自己在‘TEMPS’② 报和‘DÉBATS’③ 报

---

① 当指1875—1878年开始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反奥斯曼奴役的人民起义。它得到俄国、塞尔维亚等的支援（金钱和物质上的，还包括派志愿军），后来取得重大的胜利。1878年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获得自治，但当年的柏林会议又决定由奥匈帝国占领。

② 《时代报》，法国报纸。

③ 《论坛报》，法国巴黎出版的报纸。

上读到，当土耳其人冲进塞尔维亚之后，在贝尔格莱德人们呼喊：‘打倒切尔尼亚耶夫[①]!’另外一些记者和目击者则断然说，那都是一派胡言，恰恰相反，塞尔维亚人极其敬重俄罗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切尔尼亚耶夫身上。您知道，两方面的消息我都相信。两种声音大概都有，必然是这样的，因为民族是年轻的，没有军队，不会作战，善心绰绰有余，经验却全然缺乏。切尔尼亚耶夫必须在那里组建军队，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在那样的期限里、在那样的情况下组建军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等到以后他们将会理解的，不过，到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时期了。此外，我还相信，在他们最坚定的，就是说，最有头脑的人物里面肯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深信不疑，俄罗斯一边沉睡，一边考虑如何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极大地加强自己。这也正是我感到担心的，这一切可不要给我们俄罗斯的兄弟情谊泼上冷水。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截然相反，竟然使很多俄罗斯人都感到出乎意外。整个俄罗斯大地突然发言了，突然说出了自己的有分量的话。士兵、商人、教授、温顺的老太婆——大家如同一个人。请注意，没有一句关于占领的话，人们说的是：‘为了东正教的事业。’为了东正教的事业不仅是花几个钱，即使立刻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请注意，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为了东正教的事业’——无论是现在和未来，这都是一个极端重要、极端重要的政治口号。甚至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的未来的口号。至于在任何地方都只

① 米·格·切尔尼亚耶夫（1828—1898），俄国退役将军，《俄罗斯世界报》的主编与发行人，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曾指挥塞尔维亚军队作战。

字不提‘占领’，这尤其是极端罕见的事情。欧洲无论如何，不管怎样说都不可能相信这件事，因为欧洲自己的行为除开占领之外不会是别的，因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你也不能由于它大喊大叫地反对我们而责怪它，您明白这一点吗？总之，这一次开始了我们与欧洲的不可避免的冲突……难道这次冲突能够从别处，而不是从不理解开始吗？对欧洲来说，俄罗斯是一个谜，俄罗斯的一切行动都是谜，而且始终都是谜。俄罗斯大地很久以来就没有这样显示过自己了，这样自觉，这样一致。此外，我们确实是找到了亲人和兄弟姐妹，这样说并不只是一句高尚的言辞。我们不完全是通过斯拉夫委员会[①]找到的，的确是依靠整个大地直接找到的。这是我没有想象到的，本来这是我绝不会相信的。我们这种共同的，可以说，又是突如其来的一致，即便是有人事先预见到了，那也是令人很难相信的。然而，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是发生了。你们现在在谈论不幸的保加利亚母亲，可是我知道，今年夏天出现了另外一个母亲：俄罗斯母亲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亲生儿女们，她发出了关于儿女们的伟大的悲痛声音。这正是关于儿女们的悲痛声音，正是伟大的母亲的哭号，还有就是未来的伟大的政治指向。请注意：‘他们的母亲，而不是他们的女主人！’即使是出现这种情况，新的儿女们由于对事情不理解，一时之间，对母亲抱怨起来，她也不必去听这些，也不必去看，她应该像每一位真正的母亲那样，怀着无限的、任劳任怨的母爱继续保护儿女们。今

---

① 指莫斯科斯拉夫慈善事业委员会，成立于1858年，旨在帮助在斯拉夫民族的土地上的学校、图书馆与教会以及在俄国学习的斯拉夫人。但它不限于慈善活动事业，还力图在斯拉夫世界中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在1876年曾成为俄国支援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年夏天，您知道吗，今年夏天将如何载入我们的史册？有多少个俄罗斯疑团都一下子就涣然冰释了，有多少个俄罗斯问题一下子都有了答案！对于俄罗斯的思想来说，这个夏天几乎等于一个时代。”

# POST SCRIPTUM[①]

## (《作家日记》，1876年，7~8月号，第4章，Ⅴ)[②]

“俄罗斯人有的时候极其令人难以置信。”——这句话也是我今年夏天听到的，当然，这还是因为，今年夏天发生的许多事情超出了讲这句话的人的意料，也可能，真的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也许相反的是，那些显露出来的一切，本来是早已存在于人民心中，时时刻刻都存在于人民心中？

首先，人民的思想抬头了，人民的感情显示出来了：感情——这就是对自己的不幸的、被压迫的兄弟姐妹的无私的爱，思想——这就是“东正教的事业”。在这一点上确实表现出某种似乎意外的东西。这种意外的东西（其实，远非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就是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伟大思想、自己的“东正教的事业”——在二百年的奴役制度和黑暗的愚昧过程中人民没有忘记，沉湎于腐化堕落、唯物主义、犹太习气和劣质酒的近代人民也没有忘记。其次，这种意外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社会持各种见解的上层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思想、与“东正教的事业”结合起来了，这些上层知识分子正是我们过去认为完全脱离人民的那些人。同时还请注意的是，几乎是我们所有报刊的那种高昂斗志与精诚团结……温顺的老太婆把自己的一个戈比献给斯拉夫人，同时还要加上一句：“为了东正教的事

① 法文：宗教的极端主义。此处译为宗教狂热。
② 这一篇与前一篇同属于1876年，7~8月号，第4章，Ⅴ。

业”。记者把这句话接了过来，怀着真挚的敬意把它在报上刊登出来[①]，您可以看到，记者自己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东正教的事业”：您在读他这篇文章时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大概即便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们现在也终于明白，对俄罗斯人民来说，他们的东正教和“东正教的事业”实质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很明白，这完全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宗教仪式，从另一方面说，完全不是什么 fanatisme religieux[②]（现在欧洲关于俄罗斯当前这场广泛的运动正是这样说的），他们明白，这正是人类的进步，是人类的普遍人性化，俄罗斯人民——一切都从基督出发，把自己的整个未来都寄托于基督和基督的真理，不能想象自己离开基督的俄罗斯人民就是这样认识的。自由主义者、否定论者、怀疑论者都同各种社会思想的鼓吹者一样，顷刻之间都成了俄罗斯的狂热爱国者，至少大部分人是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本来他们就是爱国者；但是，我们能否说，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迄今为止有没有进行过极其频繁的、现在看来大多是毫无必要的刻薄的相互指责呢？在我们这里，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突然间多了起来，比很多人，同样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原来预计的多得无法比拟。是什么东西把这些人结合到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什么东西告诉人们，他们在一项主要的和实质性的事情上从来也没有分裂过？事情就在于，斯拉夫思想，从它的最高的意义上说，已经不仅仅是斯拉夫派的思想，由于情况的推动，它突然进入到俄罗斯社会的心灵深处，明显地表现在共同意识中，而在现实的感情上是与人民的运动相吻合的。然而“最高意义上的斯拉夫思

① 这是刊登于《新时代》（1876 年 8 月 15 日）上的一篇报道。
② 法文：宗教狂热。

想”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全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首先，也就是在历史的、政治的以及其他解释之前，这就是牺牲，要求为了兄弟姐妹甚至牺牲自己，这就是斯拉夫种族的强者有自愿保护弱者的义务感，这样做就是为了使弱小者与自己有同等的自由和政治独立，从而也是为了基督的真理，也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友爱并服务于全人类，为了保卫全世界的弱者与被压迫者，进一步为伟大的全体斯拉夫人的团结一致奠定基础。这已全然不是理论，而是作为事实表现出来了，这也就是当前俄罗斯的、兄弟般的、无私的运动，无私到不惜自觉地准备牺牲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直至牺牲与欧洲的和平。在下一步，离开保卫弱小者和服务于全人类这个目的，从另外的目的出发，能够实现斯拉夫人的大团结吗？其所以理应如此，就是因为斯拉夫各民族大多数都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受到教育并且成长起来的。上文已经写过，我们惊讶不已的是，是什么原因使俄罗斯人在农奴制、愚昧无知和备受压迫的境遇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伟大的“东正教的事业”，没有忘记自己的伟大的东正教的义务，没有最终变成禽兽，也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只是关注一己私利的阴郁孤僻的利己主义者呢？很可能，俄罗斯人作为斯拉夫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这就是说，在苦难中振奋精神，在受压迫时从政治上坚强起来，在遭受奴役和屈辱时，为了友爱和基督的真理彼此团结起来。

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形同奴隶，忧郁的上帝
祝福着，踏遍了

整个的你，亲爱的大地！①

正因如此，俄罗斯人民在自己身受压迫、背负着几个世纪的沉重的十字架的情况下，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东正教的事业”和自己的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全心全意挺身而出，带着义无反顾的决心，全力以赴地帮助被压迫的人们。我们的上层知识分子明白了这一点，真心实意地接受了人民的愿望，接受之后就突然感到自己完全与人民融为一体了。这场席卷了所有人的运动是一场慷慨的、人道的运动。一切高尚的和团结的思想，一切真诚地团结所有人的感情是民族生活中的最大的幸福。这种幸福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不能不整个身心地感受到我们的一致性越来越多，我们从前的很多误解得到了澄清，我们的自觉性越来越强。突然发现了社会和人民都明确意识到的政治思想，敏感的欧洲立即发觉这一情况，现在正以极大的注意观察着俄罗斯的运动。俄罗斯人民中间的自觉的政治思想，——这是完全出乎欧洲的意料的，欧洲预感到出现了它必须重视的某种新事物；我们更加受到欧洲的尊重了。关于俄罗斯社会作为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瓦解和在社会上瓦解的各种谣言和议论在欧洲早已根深蒂固，这些谣言和议论，毫无疑问，在欧洲人的眼中现在应该得到强有力的反驳：看来，在必要的时候，俄罗斯人是能够团结起来的。欧洲如果依然相信确实存在着我们的瓦解势力，按照欧洲的信念，这种势力现在自然就应该采取另外的方针，取得另外一种结局。的确，从这个时代起，很多观点今后应该改变。总之，这种俄罗斯的万众一心、

① 引自俄国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的诗《这些贫困的村庄……》（1855），引文标点符号与原作不符。

齐心协力的运动已经证实了民族的成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不能不引起对自己的尊重。

俄罗斯的军官们纷纷走向塞尔维亚，在那里抛头颅、洒热血。俄罗斯的军官和退伍士兵参加切尔尼亚耶夫的军队的运动一直在高涨，还在继续高涨着。人们会说：“这是一些在家中无所事事的不可救药的人，为了找个出路而去的人，是一些野心家和冒险家。”然而，这些“冒险家”并没有得到任何金钱好处（这样说有很多确切的材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甚至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到达那里的，其中有些人还是正在工作的人，他们宁愿暂时放弃工作，毫无疑问，他们在工作方面也会受到损失。然而，无论他们是些什么人，关于他们，我们能够听到和读到一些什么呢？他们在战斗中成群地倒下去，英勇地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切尔尼亚耶夫创建的斯拉夫年轻的起义者军队已经把他们当做坚强的支柱。他们在欧洲为俄罗斯争得了荣誉，用自己的热血把我们与兄弟姐妹们团结到一起。他们英勇地献出的鲜血是不会被遗忘的，是要受到崇敬的。不，他们不是冒险家，他们自觉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们是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俄罗斯的愿望和俄罗斯的意志的先锋，欧洲是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一切的。

又出现了一个俄罗斯的人物，他是严肃地、镇静地甚至是雄伟地出现的，——这个人物就是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到目前为止他的军事行动有得有失，不过，总的来说——直到现在他还占有明显的优势。他创建了塞尔维亚的军队，他显示出严厉、坚强和不屈不挠的性格。此外，他奔赴塞尔维亚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冒着牺牲自己在俄罗斯获得的全部军事荣誉的危险，也就是冒着牺牲自己的前程的危险。正如不久前所透露的，在塞尔维亚他只同意指挥某些队伍，只是在不久之前他刚

刚被任命为总司令。他统帅的军队是由警察、从未摸过武器的新兵和刚刚放下犁杖的和平居民组成的。风险是巨大的，功绩则是尚难预料的，这真正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做出的牺牲。创建军队，进行训练，根据可能做了部署与调动之后，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就坚定果敢地投入了战斗，他取得了意义十分重大的胜利。最近一段时间，在三倍于自己的敌人的攻击下他必须后退，然而，他不是被击溃，而是保全了军队，及时后退，他仍然是强大的，他占据了坚固的阵地，使"胜利者"不敢发起攻击。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判断，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的主要行动不过是刚刚展开。他的军队已经不可能指望再从任何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援，与此同时，敌军的力量则还能够大大加强。再加上塞尔维亚政府的政治考虑，也在阻碍他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尽管如此，这个人的面貌已经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的军事才干是无可争辩的，他的性格和心灵的高尚激情使他达到了实现俄罗斯的意向与目的的高度。不过，一切关于切尔尼亚耶夫将军的话还在未来。值得注意的是，从自己奔赴塞尔维亚的那一天起，他就在俄罗斯博得了极高的声誉，他的名字尽人皆知。不难理解：俄罗斯明白，切尔尼亚耶夫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的事业是与俄罗斯最美好的、热切的愿望一致的，——他以自己的行动向欧洲宣示了俄罗斯的意愿。今后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他都可以为自己的事业而自豪，而俄罗斯也不会忘记他，并将永远爱戴他。

# PICCOLA BESTIA[1]

## (《作家日记》，1876 年，9 月号，第 1 章，Ⅰ)

七年以前，有一次我在佛罗伦萨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一直住到 9 月。意大利人说，佛罗伦萨是全意大利夏天最热的城市，冬天又是最冷的地方。他们认为，夏季在那不勒斯比在佛罗伦萨要好过得多。有那么一次，在 7 月，在我租住的房间里发生了一场惊慌，——女房东带着两名女用人吵吵嚷嚷地突然闯进我的房间：问我看见没有，一只 piccola bestia 刚刚从走廊里爬进我的房间，一定得把它找出来，打死它。piccola bestia 就是塔兰图尔毒蛛[2]。于是开始在椅子、桌子底下，旮旮旯旯里，家具里寻找起来，柜橱底下也打扫了，跺了一阵子脚吓唬它，想把它轰出来；后来人们又跑进卧室，在床上、床下、被褥里翻腾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早晨打扫房间才找到它，当然，立即打死了，可是在此之前我还是不得不在自己的床上度过这一夜，心中极其不愉快地想着，在这间屋子里有一只 piccola bestia 跟我住在一起。据说，因被塔兰图尔毒蛛叮咬而致命的是很少的，不过，我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时

---

① 意大利文：害人虫。实即一种有毒的蜘蛛，亦即下文所说的塔兰图尔毒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下室手记》、《群魔》、《少年》等作品中一再以这蜘蛛作为罪恶的象征。

② 塔兰图尔是俄语中毒蜘蛛的音译，亦可直译为毒蜘蛛。

候[1]，就是在佛罗伦萨度夏的十五年前，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一名哥萨克线路工被塔兰图尔毒蛛咬后，医治无效而死。大部分人是发烧或者是忽冷忽热地发作一阵子就熬过去了，在医生很多的意大利也许更容易对付过去；我不是医生，不知道是否如此，这一夜过得终归是怪可怕的。开始，我从头脑中往外驱走自己的思想，甚至还笑了出来，又想起了科兹马·普鲁特科夫[2] 的劝谕性寓言《列车员和塔兰图尔毒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杰作），一边背诵，一边入睡，后来就睡着了。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噩梦太可怕了。塔兰图尔毒蛛根本没有梦到，但是梦到的是别的极不愉快的沉重的噩梦，不断惊醒，到了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才睡得踏实。你们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想起从前这个小故事吗？是因为东方问题！……其实，我自己并不感到奇怪：人们对东方问题现在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谈了！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东方问题就像一只 piccola bestia 跑进了欧洲，使得一切善良的人们、一切爱好和平、热爱人类及其繁荣的人们，一切人——凡是渴望光明时刻，渴望随着这种虽然是原始的、粗野的民族仇视最终结束而到来的光明时刻的人们都为之惊恐不安起来。实际上，如果稍加深思，有时就会觉得（也可能他自己还莫名其妙），随着东方问题的彻底解决，欧洲所有的其他政治纠纷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东方问题这个公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案去鄂木斯克服苦役，至 1854 年 1 月苦役期满，当年 3 月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充当列兵。

② 科兹马·普鲁特科夫是俄国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等三位作家在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合作写作的笔名，他们以此笔名发表了讽刺诗、寓言和箴言等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引用科兹马·普鲁特科夫作品中的形象与言论。

式中，集结着欧洲所有其余的政治问题以及误解和偏见。总之，将会出现某种非常新的形势，对俄罗斯来说，那将完全是另外一个阶段，因为现在已经异常明显，只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才能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协调好与欧洲的关系，最终为欧洲所理解。然而有那么一个 piccola bestia 却在阻挠这种幸运的实现。piccola bestia 本来始终都存在，但是它带着东方问题跑进房间里面来了。人人都在期待着，人人都在惊惶不安，人人头上都悬着凶兆，人人都陷入噩梦。制造出这种混乱的 piccola bestia 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因为发生的是普遍的无理性。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种无理性，彼此谁都不理解谁，虽然所有的人似乎都被咬伤了。由此立即引起最严重的病症：如同建造巴比伦通天塔① 的情景，在欧洲所有的人似乎即刻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甚至每一个人都不能理解自己希望的是什么。所有的人仅仅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全都一致谴责俄罗斯，每一个人都确信无疑，害人虫每一次都是从俄罗斯跑出来的。其实，只有在俄罗斯才一切都是光辉的和明朗的，当然成为例外的只有对东方斯拉夫兄弟姐妹的沉痛忧伤——但这种忧伤能使灵魂变得纯洁，使心灵变得高尚。在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每一次都出现与欧洲截然相反的情形：所有的人立即就能够明确地相互理解，每一个人都能够确切地知道他希望的是什么，人人都能感觉到他们彼此是和谐无间的；最后一个农民都像最有教养的人那样，切实知道他的希望是什么。慷慨无私地援助受苦受难的

① 洪水灭世后，挪亚的子孙们企图重建巴比伦通天高塔，触怒了上帝，上帝便搅乱了人们的语言，从此，人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不能相互理解，塔未建成，人亦被分散至各地。

兄弟姐妹，这种美好高尚的感情立刻就把大家结合到一起。但是欧洲对此是不相信的，既不相信俄罗斯的高尚，也不相信俄罗斯的无私。特别是这种“无私”，它是一切茫然无知、一切罪过的根源，是使人困惑和使人人反感、人人憎恶的情况的渊源，因而任何人都不愿意相信这种无私，所有的人都倾向于不相信这种无私。如果不是这种“无私”，顷刻之间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十倍，并易于为欧洲所理解，而有了这种无私，那就成了一片漆黑、茫然无知、疑团和秘密！唉，欧洲被咬伤的人们！当然，按照被咬者的理解，这个秘密全部在于一个俄罗斯，俄罗斯对任何人都不愿意透露任何东西，而自己则在坚定不移地蒙骗着大家，诡诈地、不声不响地向着自己的某种目的前进。欧洲已经跟俄罗斯相处了二百年，俄罗斯以强力迫使欧洲把自己纳入欧洲各国人民的联盟，纳入文明世界；欧洲总是心怀不祥的预感对俄罗斯侧目而视，犹如在注视不知从何而来、但又无论如何非解决不可的蕴涵着凶险的谜。所以每一次正是在东方问题上，欧洲对俄罗斯的茫然无知和困惑不解都强烈到病态的地步。实际上，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终于能够知道这一切？这些俄罗斯人是一些什么人？亚洲人？鞑靼人？如果是这样，那倒也好，至少，事情清楚了；然而并非如此；问题就在于并非如此，问题就在于我们心中应该明白，并非如此。然而，他们同我们是那么不相似……斯拉夫人的团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种团结要干什么，有什么目的？这种危险的团结说明什么，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结果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同过去一样，同往常一样做出解释：“强占，这就等于掠夺、无耻、口蜜腹剑、文明的行将毁灭、纠集一起的蒙古强盗、鞑靼人！……”

但是，就是对俄罗斯的憎恨也无力完全把被咬伤者们团结到一起：每一次遇到东方问题，整个欧洲就立刻十分明显地开始由一个外观上的整体瓦解为各自的、单个民族的利己主义。一切都起因于一个臆造的思想，即认为有人要开始强占和掠夺："我也应该照样干，否则全被抢光了，我就落得个两手空空！"因而，每一次这个不祥的问题一出现，欧洲从前所有那些根深蒂固的政治纠葛和病痛就急剧地发作起来，并且开始化脓。于是人们自然就希望把问题扑灭，暂时扑灭也好；主要的是——要在俄罗斯把问题扑灭，设法使俄罗斯脱离这个问题，想方设法念咒语，施魔法，恐吓俄罗斯。

出生于以色列（né d'lsraeli[①]）的贝肯斯菲尔德伯爵[②]在一次宴会上，在自己的讲话中突然向欧洲宣布了一个极重大的秘密：所有这些以切尔尼亚耶夫为首的、奔向土耳其去拯救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全都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公社分子[③]。总之，俄罗斯的形形色色的破坏分子，俄罗斯似乎充斥这种分子。"你们可以相信我，因为我是贝肯斯菲尔德，首相，俄罗斯的报纸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有分量正是这样称呼我的。我是首席大臣，我有秘密文件，所以我知道得比你们多，我知道得非常之多。"——这位贝肯斯菲尔德的每一句话都流露出这样的思想。我相信，他这个纪念册用的姓氏是他在向联合王国为自己请求贵族身份时，给自己杜撰的、编造的，就像是我

① 法文：出生于以色列。

② 即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籍犹太人，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作家，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875 年受封为贝肯斯菲尔德伯爵。1856 年克里木战争结束后，代表英国进行干涉，迫使俄国政府作出有利于英国的让步。

③ 指巴黎公社成员及后来同情巴黎公社者。

们的连斯基[①]、格列明[②] 是虚构的一样；要知道，他是小说家。顺便说说，在上文我写到神秘的 piccola bestia 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读者猜测我想在这个隐喻中描写贝肯斯菲尔德伯爵，那该怎样办呢？不过，我想读者是不会这样想的。piccola bestia——这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象征，而不是人，而且对贝肯斯菲尔德先生来说这也是过分抬举他了，虽然应该说，他非常像 piccola bestia。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声明说，塞尔维亚向土耳其宣战是不光彩的行为，现在塞尔维亚进行的战争是不光彩的战争，这样，他就简直是在公然鄙视他不可能不了解的整个俄罗斯的运动，整个俄罗斯的激昂情绪、牺牲、愿望和祈求。——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来自英国的荣誉的新法官接着说（我不是逐字逐句地转述）：

> “俄罗斯当然愿意把自己那些破坏分子全部投到塞尔维亚去，虽然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在那里会纠集到一起，紧密结合起来，串通一气，建立组织，形成一股势力。”……“欧洲必须注意这股新的有威胁的势力”，贝肯斯菲尔德用俄罗斯的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威胁英国的农场主们，他又逼近一步说。“在俄罗斯，人们也会注意我对社会主义的诽谤中伤的话，”——他马上就想道，当然是在自己心中想的，——“必须也吓唬吓唬俄罗斯。”

蜘蛛，蜘蛛，piccola bestia；真的，非常像；真的，毛绒绒的小 piccola bestia！爬得多么敏捷！其实这是在屠杀保加利

---

①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② 俄国作家亚·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浪漫主义小说《考验》（1830）中的人物。

亚人，这是他怂恿的，他自己就是为此而编造了那套话；他是小说家，这就是他的 chef-d'œoeuvre[①]。其实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行将就木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因自己获得伯爵爵位无疑是欣喜异常的；这肯定是他梦想了一辈子的东西，写小说的时候就在梦想了。这种人信仰什么，他们在夜间睡得安宁吗，他们都做些什么样的梦，他们在扪心自问的时刻都想些什么？哎，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高雅的东西！……他们天天都在享用美味佳肴，置身于谈吐文雅而机智的社交界，夜晚则有美貌迷人的贵夫人在十分优雅高贵的社交界中谄媚他们，——噢，他们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他们的食欲是多么旺盛，他们的梦轻松得如同婴儿。不久前我读到，土耳其的歹徒们把两名司祭钉在十字架上，这两名司祭经过一昼夜无法想象的痛苦折磨后才死去。贝肯斯菲尔德最初在议会中虽然矢口否认有任何苦难，甚至连最微小的苦难都不存在，然而他心中有数，就连这两个十字架他也知道，"因为他有文件"。毫无疑问，他要把这些毫无意义的、拙劣的而且是肮脏的、不雅观的画面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出去。然而，十字架上那两具黑黢黢的蜷缩着的尸体是会突然钻进头脑的，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刻钻进去，比如说，贝肯斯菲尔德在自己华丽的寝室中准备进入梦乡的时刻；在他面带开朗的笑容回味刚刚度过的愉快夜晚、舞会以及他对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说着那些风趣动人的话的时刻。

"那又算得了什么，"——贝肯斯菲尔德想道，——"十字架上那黑黢黢的尸体……嗯……这件事，当然……不过，'国家不是个人；国家不能由于动感情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何况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无私的舍己为人。'""精彩极了，这是多

① 法文：著作。

么出色的名句，"——贝肯斯菲尔德心中在想着，——"令人耳目一新，主要是说得那么恰如其分。实际上，国家……可是，我最好还是躺下睡觉吧……哼。哎，这两个司祭是什么人？是教士？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教士，les popes①。无意碰上的；哎，随便往哪里藏一下……床底下……Mais，avec votre permission，messieurs les deux crucifiés②，你们和你们那愚蠢的遭遇简直使我厌烦透顶了，et je vous souhaite la bonne nuit à tous les deux。"③

于是贝肯斯菲尔德沉睡了，睡得香甜、温馨。他梦到他是伯爵，他置身在玫瑰花、铃兰和秀丽迷人的贵夫人的包围之中。他在发表动人的演说：多么 bonmots④！人人都为他鼓掌，就因为他刚刚把联盟压垮了……

我们这些身穿揉皱了的旧军衣、领章上绣着白色十字架（报道说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的校尉们，老塞瓦斯托波尔战士们和高加索的战士们，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不错，他们里面有些人爱喝酒；我们听说过这些事，这是老兵的弱点，然而这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另一方面，请看看，在战斗中他们是怎样去赴死的，死得何等豪迈英勇，走在自己士兵的前边，为俄罗斯的名字增添光彩，以自己的榜样把胆小的新兵改造成英雄！按照你们的看法，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吗？还有母亲牵着手送来的两名青年人（这样的事情是有的），——这是公社分子吗？那位率领七个儿子的老军人，——难道他想要焚毁杜伊勒

---

① 法文：东正教神父。
② 法文：喂，请原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先生们。
③ 法文：我也祝你们二位晚安。
④ 法文：机智的话。

利宫[1]吗？这些老士兵、这些顿河哥萨克、这些率领医疗队、行军教堂[2]而来的俄罗斯团体——难道他们连做梦都在想如何枪杀大主教吗？这些基列耶夫[3]们、这些拉耶夫斯基[4]们——他们都是令欧洲恐惧的破坏分子吗？而切尔尼亚耶夫[5]，这个最纯朴的英雄，俄罗斯的《俄罗斯世界报》的前发行人——他就是俄罗斯社会主义的领袖吗？算了吧，多么荒唐！贝肯斯菲尔德如果知道，按照俄罗斯的看法，这种做法是拙劣的和……可耻的，那么可能他就不至于把这种蠢话插进自己的演说了。

① 巴黎的一座王宫，巴黎公社时期大部分被焚毁。法国统治者诬蔑是巴黎公社社员纵火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以为真。这里是说，俄国的兵士不是社会主义者，是不会去烧杜伊勒利宫的。

② 指战争时期在军队中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随军神职人员与唱诗班。

③ 尼·阿·基列耶夫（1841—1876），俄国近卫军骑兵上尉，在与土耳其军队战斗中阵亡。

④ 尼·尼·拉耶夫斯基（1839—1876），俄军上校，1876 年 8 月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阵亡。

⑤ 米·格·切尔尼亚耶夫，俄国退役将军，在与土耳其之战中曾任塞尔维亚军队总司令。

# 空话，空话，空话！[①]

## （《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1章，Ⅱ）

有几种解决东方问题的意见，有我们的，也有欧洲的，简直令人吃惊。顺便说说，在我们的报界也有一些被咬伤的人。噢，我不想一一叙述我的印象了，这样我会感到疲劳的。一个“行政自治”[②]，就足以使你目瞪口呆。请看，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给予保加利亚、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与穆斯林居民同等的权利，立即找到保证这些权利的办法，——“那么我们就全然不明白，东方问题为何不能结束”等等，等等。众所周知，这种见解在欧洲特别受到推崇。总之，认为是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实施起来较之重新建立一个欧洲，较之把水与土分离开，或者随便做什么都更困难，然而人们却认为问题解决了，心平气和了，心安理得了。不，俄罗斯只是在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自己要监察它的执行，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监察[③]，当然，不会让你们，讲空话的先生们捞取好处（坐收渔利）。“给

---

① 出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卞之琳译）。

② 1876年9月初俄国军队开进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主战派的势力占了上风，推翻了继续停战的建议，恢复了反对土耳其的战争。此时欧洲列强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提出了在保加利亚与起义地区实行自治的方案，俄国的主战派极力反对这个方案。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是1876年9月俄国政府向奥地利政府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俄国与奥地利共同保证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省份里实行欧洲各国提出的改革，奥地利拒绝了俄国的建议。

予自治？寻求方案？”——可是怎样才能做到，什么人能够给予并且做到？谁能听从，谁能强迫听从？最后，谁能支配土耳其，什么派别和力量能够支配？在比其他土耳其人更文明的君士坦丁堡有没有哪怕是一个这样的土耳其人，这个人事实上根据自己的内心信念，终于能够承认非伊斯兰的基督教徒与自己有平等的权利，以便这种自治能够在实际上起点什么作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的是“哪怕是一个人”……可是，如果连一个人也没有，那该如何同那样的人民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呢？“设立监督，寻求方案”，——指导者们反驳说。可是，你就试一试寻找方案吧！有一些问题自身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有的人都被卷了进来，而这样做恰恰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问题。戈耳迪之结[①]来了——他用剑把结斩开，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又比如，还有一种报纸舆论，而且不是一种报纸的意见。这是一种古老的外交见解，同时也是很多学者、教授、杂文家、政论家、小说家、西方派、斯拉夫派等人的见解，这就是：君士坦丁堡归根结底不属于任何人，类似自由城市、国际城市，总之类似某种“共有地带”。它将受到欧洲均势的保护，等等诸如此类的见解。总之，以复杂的、带学究气的不自然的方案取代简单的、直接的、明确的解决，也是唯一可能的解决。但是只需提一个问题：什么叫欧洲均势？到目前为止均势

①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佛律葵亚国戈耳迪用极复杂之结把车轭捆到车上，牢固难解。神谕凡能解此结者会成为整个亚细亚的统治者。据传说后来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虽然未能解开此结，却用利剑斩断了它。他成了马其顿王，似乎是这一传说的应验。而斩开戈耳迪之结一语也就意味着以快刀斩乱麻，即以断然手段解决难题。

都被认为是几个最强大的欧洲大国之间的事情，——比如说，势均力敌的五个国家。（可以说，出于礼貌认为它们势均力敌。）于是五只狼在周围走来走去，在中间的是他们的那一块猎物（君士坦丁堡），全部五只狼所做的就是彼此防范，谁也不能占有猎物。这就是所谓解决问题的杰作！但是，这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吗？一切都以幼稚的谎言，以从未有过的幻想的事实，甚至以臆造的事实——以均势为基础，仅仅这一点就够了。实际上，在世界上什么时候存在过政治均势？根本没有！不过是一些奸诈的人们为了愚弄头脑简单的人而制造的狡猾说法。俄罗斯虽然不是头脑简单的人，但却是正直的人，因此似乎比所有其他的人更容易相信这种均势的真理与规则的不可动摇性，自己还多次真诚地实践这些真理与规则，充当它们的捍卫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极为卑鄙地利用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其余那些势均力敌的各方面似乎谁都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过这些均势的规则，虽然也做过暂时的表面文章，但只是暂时做做：根据算计，一旦出现了有好处的机会——人人都毫无顾忌地破坏这种均势。最滑稽的是，总是在达到目的之后又总是立即出现新的均势。可是当俄罗斯不是要违犯什么，而是稍微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所有其余那些势均力敌的各方面立即抱成一团向俄罗斯兴师问罪："你在破坏均势。"就是这样，国际化的君士坦丁堡就将会是这样的：五只狼相互之间龇牙咧嘴地卧在那里，每一只狼心中都有一个算盘：如何与邻居团结在一起，如何在消灭其他那些狼之后，自己得到更肥的一块。难道就是这样解决吗？其实在这些狼——守护者之间也在产生各种新的方案：有那么一天，在那么一个时刻，五只狼中间的某一只狼，而且还是那只大灰狼，由于某种对他不幸的事件，突然间由狼变成为小哈巴狗，甚至是完全不吠叫的

哈巴狗，那就将是均势的震动！不仅如此，未来的欧洲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可能由五种均势的力量变化为只剩下两种力量，到那个时候——聪明的先生们，到那个时候，你们的方案在哪里？……顺便提一句，我想大胆地讲一个明显的道理："君士坦丁堡不为任何人所有，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人，在欧洲永远不会有这种时刻，事情不会有这样的政治状态。"这就是我要讲的道理，我认为——不可能不是这样。如果允许我开一个玩笑的话，最可能的是在最后时刻，在决定性的关头，英国人突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如同他们占领直布罗陀、马耳他等地那样，这正是发生在各列强还在考虑均势的时候。正是这些英国人，现在正以慈母般的同情心守卫着土耳其的不可侵犯，预言土耳其可能有伟大的未来和文明，相信土耳其的勃勃生机，——正是他们，一旦看出时机已到，就把苏丹和君士坦丁堡一口吞下，这也正是他们。这样做符合他们的性格，符合他们的方向，是同他们一贯的露骨的蛮横无礼，同他们的恃强凌弱，同他们的阴险毒辣一致的！至于能否像在直布罗陀那样在君士坦丁堡坚持下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说的这一切，现在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我也是作为开玩笑而说的，但是，假如牢牢记住这则笑话，也不无好处，因为这太像真实了……

# 形形色色的方案

（《作家日记》，1876 年，9 月号，第 1 章，Ⅲ）

看来，为了解决东方问题，除了最明确、最合理、最简单和最自然的方案之外，所有的方案都是可以采纳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提出的解决办法越是不自然，社会和公众舆论就越是对它感兴趣。例如，有这样一个“不自然的方案”：有一个建议说：“俄罗斯如果公开向欧洲声明自己是大公无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一劳永逸了。”但是，谁要是相信，那就太幼稚了！其实俄罗斯如果不仅发表了声明，而且还以 de facto[①] 证实了自己的大公无私，可能这就会使欧洲更加困扰不安。我们不为自己攫取任何东西，“做件好事”就退回来，不占任何便宜，只是向欧洲证明我们的大公无私。哎，这是怎么回事呀。这对欧洲来说甚至更坏，因为“你越是无私地向他们施加恩惠，你就越是向他们表明，你不侵犯他们的独立；他们对你就愈加信任，愈加忠诚，在未来他们简直就像敬重太阳、上苍、至尊、宗主国那样敬重你。至于说他们将会是自治的，而不是你的臣民，那又有什么?！为此他们会在心中认为自己是你的臣民，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承认你。”斯拉夫各民族与俄罗斯在道义上的归属的不可避免性，这个为欧洲所害怕的事实的自然性与合理性，或迟或早终将成为欧洲的噩梦，成为欧洲未来的主要忧患。在欧洲方面有的只是力量和阴谋，在我们方面则是自然规律、必然性、民族的亲缘关系和真理；因此，斯拉夫大地

① 拉丁文：事实。

的未来应属于谁呢？

不过欧洲也确实还有一个方案，这是建立在截然对立的基础上的，可能还是有前途的可行方案。这个新的方案也是英国的产品；可以说，这就是纠正托利党[①] 的全部错误和失算。这个方案的基础是，英国自己立即施恩于斯拉夫各族人民，但是，目的是把他们永远变为俄罗斯的敌人和仇人。打算最终抛弃土耳其人，把他们作为不可救药的、毫无用处的人加以消灭，把巴尔干半岛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各族人民结合成为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同盟。被解放的、感恩戴德的斯拉夫人民自然倾心于英国，把英国看做自己的救世主和解放者，英国则“让他们认清俄罗斯的面目”：“看吧，这就是你们最凶恶的敌人；它装做关心你们，连梦中都在想如何吞掉你们，剥夺你们必然到来的、光荣的政治前途。”这样一来，斯拉夫人民一旦看穿了俄罗斯的阴谋诡计，他们就会立即结成一个反对俄罗斯的新的强大堡垒，“那时俄罗斯就别想见到君士坦丁堡，他们永远不会放它进入君士坦丁堡了！”

初看上去，即使是幻想也难以想得比这更狡猾的了。主要的是那么简单，还以现有的事实为基础。关于这个事实我已经在前面顺便说过了。这个事实就是，在斯拉夫的部分知识界，在斯拉夫各族的某些上层代表与领袖人物里面，对俄罗斯的目的确实存在着潜在的怀疑，因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甚至怀有敌意。噢，我说的不是人民，不是群众。对斯拉夫各族人民、对塞尔维亚人、对黑山人来说，俄罗斯仍然是太阳，仍然是希望，仍然是他们的朋友、母亲和保护人，未来的解放者！而斯

① 英国政党，成立于 17 世纪，19 世纪中期在托利党的基础上建立了英国保守党。

拉夫的知识界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不是说全部知识界；我不敢、也不允许自己说整个知识界：“但是，虽然远非所有的人，可就是在他们最有头脑的人中间。”（我在我的8月号的《日记》中曾这样表述过）“也能找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觉得俄罗斯阴险，连做梦都在想如何征服他们，吞掉他们。”我们无须欺骗自己，很多有教养的斯拉夫人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俄罗斯人。例如，他们总是认为我们比起他们自己来是没有教化的人，几乎是野蛮人。他们对我们人民生活的成就，我们的内部结构，我们的改革和我们的文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中间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知道普希金，但是，在有识之士中也未必能够找到很多承认普希金是斯拉夫的伟大天才的人。比如说，很多有教养的捷克人深信不疑，他们已经有四十位像普希金一样的诗人。此外，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作为没有经验的民族，不了解生活的民族，在政治上自尊心却很强，很容易激动。在这样的民族中间，英国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英国就能够得逞。如果说在英国随着辉格党人① 的胜利，这个方案也到了实施的时机，很难想象这个方案为什么不能出台。然而这个方案中有多少矫揉造作的东西，不自然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和虚伪的东西！

首先，如何把巴尔干半岛那些不同的种族联合到一起，而且还要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呢？那里有希腊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君士坦丁堡应该属于谁？共有。那就将既是纠纷又是争吵，首先是在希腊人与斯拉夫人之间展开（如果设想斯拉夫人全都是意见一致的）。人们都会说，可以设置一个首脑，

① 英国政党，建于17世纪下半期，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期在辉格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自由党。

建立一个帝国。似乎想象中的方案应该如此，但是谁做皇帝呢——斯拉夫人？希腊人？会不会是哈布斯堡王朝[①]家族的人呢？至少立即就要开始二元化，分裂为二[②]。主要的是，希腊与斯拉夫两个部分不可能结合：这两个部分，全都抱有强烈的、完全无法协调的和虚假的幻想，每一方都在向往着他独自面临的光荣的政治未来。不，英国假如一旦决定抛弃土耳其人，他就可以把一切都处理得更坚实牢靠。我认为，这样一来，我在前面作为笑谈提到的那种方案就可以实施了，这就是说，“为了斯拉夫人的利益”，英国自己独吞君士坦丁堡。“我利用你们，斯拉夫人，在北方构筑起反对北方强人的联盟和屏障，防止他进入君士坦丁堡，因为他一旦占有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侵占你们。到那时你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光荣的未来。希腊人，你们也不必担心，君士坦丁堡将属于你们；我现在占有它，正是为了它能归你们所有，我只是为了不让俄罗斯得到它。斯拉夫人从北方保卫它，我则从海上保卫它，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君士坦丁堡。我只是暂时留驻在君士坦丁堡，等待你们的地位得到巩固，等待你们形成坚强的、成熟的联邦帝国。在此之前，我是你们的领导人和保卫者。我在哪里没有留驻过，在直布罗陀，在马耳他；我不是已经归还了伊奥尼亚群岛[③]……”

总而言之，辉格党人的这个方案如果得以实施，我重说一

① 奥地利历史上的王朝。

② 按：奥地利与匈牙利于1867年至1918年期间合并为奥匈帝国，帝国握有外交权与军权，而在内政方面则奥、匈均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所谓“二元化”即指此。

③ 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岸，1809年起成为英国的保护地，1864年归还希腊。

遍，那就难以怀疑它会成功。当然，成功是暂时的。不仅如此，这个暂时也许能够持续很多年，然而……当这一切走到尽头时，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破灭，到那个时候毁灭将是彻底的，因为这个方案全部都是以诽谤和不自然的东西为基础的。

谎言就是诽谤俄罗斯。任何云雾都遮盖不住真理的光辉，总有那么一天斯拉夫各族人民会理解俄罗斯的无私精神的全部真实，到那个时候，他们与我们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就会建立起来。要知道，我们与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积极团结是不久之前形成的，但是现在——现在这种团结就再也不会停步不前了，一切都将日趋牢固。即便有各种各样的诽谤中伤，俄罗斯对斯拉夫人民的源于种族关系的爱，斯拉夫人民终于是深信不疑了。伟大的气势磅礴的俄罗斯精神的那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作为与他们种族相近的精神在对他们起作用。他们感觉到，在小规模的联合中，在纷争与妒忌中，他们从精神上是得不到发展的，必须全斯拉夫人整个联合起来。俄罗斯的团结的恢弘与强大已经不再使他们感到惊慌恐惧，恰恰相反，而是像中心，像本原那样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们。信仰的一致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纽带。俄罗斯的信仰，俄罗斯的东正教，这是俄罗斯人民所认为的自己的最神圣的事物；其中包含着俄罗斯人民的理想、生活的全部正义和真理。斯拉夫各族人民在遭受穆斯林四个世纪的蹂躏的时期里，如果不是靠自己的信仰，那又是靠什么团结起来，靠什么生存过来的呢？为了信仰，他们承受了那么多磨难，仅仅因此，信仰对他们来说也应该是弥足珍贵的。最后，俄罗斯曾为各族斯拉夫人流过血，而鲜血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狡猾的人们总是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取得的成功和对成功的不可动摇的信心，鼓励他们向斯拉夫人民诽谤俄罗斯，但是这种成功并非永恒的。我重说一遍，这种成功是暂时取得

的。如果辉格党人获胜，这一方案肯定能够付诸实施，这是必须看到的。英国人决定采取这一方案只是为了在最后时刻警告俄罗斯："我们自己也会施舍恩惠。"

再谈谈流过的鲜血。假如我们的志愿者在俄罗斯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最后击败了土耳其人，解放了斯拉夫人，那又将如何？据悉，有那么多俄罗斯志愿者从俄罗斯开拔出去，捐献也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可能，最后在切尔尼亚耶夫那里真的就组成一整个俄罗斯人的军团。无论如何，欧洲及其外交官们都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极大的震惊："如果光是他们的志愿人员就能战胜土耳其人，那么，假如全俄罗斯都武装起来，结果又会怎样呢?"欧洲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

上帝保佑俄罗斯志愿者成功；可是，据说在战斗中又有数十名俄罗斯军官被打死。亲爱的人们！

我还提出一个小小的却非多余的意见，我认为还是相当迫切的意见。由于俄罗斯志愿者不断奔赴塞尔维亚，在战斗中很多人英勇阵亡，不久前在我们的报纸上又开设了一个新的捐献专栏《援助为解放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民而与土耳其人作战中牺牲的俄罗斯人的家属》，捐款源源而来。《呼声报》的这个专栏已经收到三千卢布，当然，捐献愈多愈好。据我看，不够尽善尽美的是，这个口号提得不够全面。收集救济的捐款只是给阵亡的俄罗斯人的家属，等等。那么伤残者的家庭怎样办呢？难道这些家属一点儿也得不到吗？实际上这些家属可能比阵亡者的家属更困难。阵亡者已经阵亡了，人们为他们哭泣，可是后面这种人却作为残疾者回来，缺胳膊少腿，或者是带着伤，他的健康从这时起需要加倍护理和医疗救助。此外，即便是残疾人，他也总是要吃，要喝，这就是说，贫困的家庭里又多了一个吃闲饭的人。此外，我认为，在这个专栏中还有一个十分错

误的含混不清之处：援助阵亡的俄罗斯人的家属，等等。但是，有的家属其实是富裕的，或者不大困难的，有的则很贫穷，很困难。如果人人有份，很贫困的家属摊到的就很少了；因此，我认为，这个专栏可以改成这样的：《援助为解放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民而与土耳其人作战中牺牲的或致残的俄罗斯人的家属》。不过我只是提出一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够表述得更确切，当然更好。最大的希望是这个捐献专栏更快、更多地丰盈起来。这个专栏是极为有益的，十分必要的，它能够对我们为俄罗斯的思想而战斗的见义勇为的志愿者们产生巨大的道德影响。

## 长袍和肥皂

（《作家日记》，1876 年，9 月号，第 1 章，Ⅳ）

在有关东方问题的讨论中我曾遇到一个十分怪诞的见解。不久前，有一次在外国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件怪事：人们以热烈的、近乎是幻想的见解设想，假如把土耳其彻底消灭掉，把它赶回到亚洲去，那时全世界将会怎样。结果是，将会有灾难和可怕的动荡。人们预言说，在亚洲，在阿拉伯的某个地方，将要出现新的哈里发国家①，极端主义又将复活，穆斯林世界又将扑向欧洲。见解深刻一点的思想也只局限于指出，把整个民族都抓起来，从欧洲放逐到亚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我读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并没有想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忽然明白了，所有这些外交官-幻想家们的确是在认真地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消灭了土耳其帝国之后，真真实实地把全部土耳其人都抓起来，把他们运往亚洲的某地，这件事如同正在进行之中。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我简直无法理解；毫无疑问，至少是在宴会上、群众集会上拿这件事吓唬老百姓：可怕的动荡和灾难就要降临了。其实我认为，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根本无须迫使任何一个土耳其人移往亚洲。在我们俄罗斯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鞑靼汗国行将灭亡的时候，喀山的王朝突然强盛起来，致使一个时期里很难预言俄罗斯的大地将属于谁——属于基督教还是穆斯林？这个王朝统治着俄罗斯

① 封建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国家首脑为哈里发。

当时的东部，联结着阿斯特拉罕，占据了伏尔加河，在俄罗斯的侧翼则是他的忠诚盟友克里木汗国，这是一个给莫斯科制造了很多灾害的凶恶强盗和掠夺者。事情迫在眉睫，于是年轻的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时还不叫雷帝）下决心解决当时这个东方问题，征服喀山。

围困是残酷的，——后来卡拉姆津[①]极其生动地描写了这次围困。喀山人拼命进行抵抗，战斗得顽强卓绝，坚韧不拔。终于爆破了城墙，人群冲了上去，攻占了喀山！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进入喀山之后，他怎么办呢？是否把居民斩尽杀绝，如同后来在大诺夫哥罗德为了杜绝后患所做的那样呢？是否把喀山人迁移到草原或者亚洲呢？根本没有，甚至连一个鞑靼儿童也没有迁移，全都像从前一样原地未动，而英勇的曾经是那么危险的喀山人也永世臣服了。一切都是以最简单的合情合理的方式达到的：刚刚占领城市，立即把圣母像抬进去，在喀山举行建城以来的第一次祈祷仪式。然后建造了东正教教堂，彻底收缴居民的武器，设置俄国政府，把喀山的皇帝送到他应该去的地方，——一切就是这样；这一切全都在一天就做完了[②]。没过多久，喀山人又开始卖长袍给我们，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卖肥皂。（我想，这件事正是按照这个次序发生的，先卖长袍，后来就卖肥皂。）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有了最终从政治上消灭这个哈里发的高明思想，土耳其问题也会丝毫不差地像喀山那样得到解决。

---

①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著有《俄罗斯国家史》、小说《苦命的丽莎》等。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有悖。据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记载，在喀山汗国被征服后的最初年代里曾发生过数次骚乱与起义。

首先，立即在圣索菲亚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大牧首再一次祝福索菲亚；我想，在同一天也会从莫斯科把大钟赶运到索菲亚①，把苏丹送到他应去的地方，——一切就这样全部宣告结束。的确，在土耳其人那里还有一条法令，差不多等于《古兰经》的教条，这就是只有穆斯林的男子才可以也应该携带武器，非穆斯林是不允许携带的。最近也允许非穆斯林携带了，但必须交纳巨额税款，这也是国家的一个新的生财之道——相对而言，携带武器的非穆斯林仍然非常少。看起来，大概只有这一条法令在第一天就可以改变，就是在圣索菲亚举行第一次祈祷仪式那一天把这条法令颠倒过来，这就是只有非穆斯林才可以也应该携带武器，而穆斯林男子则绝对不允许，即便交纳税款也不准许。这样一来，太平也有了保证——我敢说，此外什么都不需要了。过不了多久，土耳其人也会开始卖长袍给我们，再过一些时候——还有肥皂，可能，这些东西比喀山的还要好。至于种植庄稼、烟草和葡萄，我想，在新的秩序、新的法令下也会很快很好地发展起来，最后，也会渐渐地偿还过去土耳其政府拖欠欧洲的债务。总而言之，除开最好的、最恰当的事情之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不会有任何动荡，我再说一次，也不会有一名土耳其儿童被从欧洲迁移出去……

这样，在东方什么事件也不会发生。即使在某个地方，在

---

① 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532—537年。1453年土耳其人占领拜占庭后改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增建了四座清真寺塔，涂盖了教堂原有的壁画。斯拉夫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幻想重建教堂的十字架，并在教堂举行有象征意义的祈祷。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莫斯科向圣索菲亚教堂赠送大钟的想法也是着眼于象征意义。1853—1855年俄国与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时期，俄罗斯人曾向俄军占领地区的保加利亚教堂赠送大钟作为保加利亚解放的象征。

亚洲的草原，在沙漠，又出现了哈里发，但是他要想侵犯欧洲，在我们这个时代那就需要大量金钱，大量新式武器，大量从枪尾装弹药的枪炮，很多辎重，很多供应工厂，不仅是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就连英国的极端主义也无力给新哈里发帮什么忙。总之，除开好处之外，根本不会有任何坏处。求上帝保佑，好事快点到来，否则将会有很多坏事！

## 积习难改的人们

（《作家日记》，1876年，9月号，第2章，Ⅰ）

“一切高尚的和团结的思想，一切真诚地团结所有的人的感情是民族生活中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不能不整个身心地感受到我们的一致性越来越多，我们从前的很多误解得到了澄清，我们的自觉性越来越强。”①

这是我在8月号《日记》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我现在还相信这话没有错。在民族生活中，正确的团结的感情的确是一种幸福。如果说我的话有什么不妥之处，可能，那就是把我们的“加强了的一致与自觉性”多少有些夸大了。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还不想让步。谁热爱俄罗斯，他早就会由于俄罗斯人的上层与下层、上层与人民以及人民生活的分裂而痛心，这种分裂是现存的不容置疑的事实。根据我的看法，今年的斯拉夫事件引发的真正的全俄运动使这种分裂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和缓解，当然还不能认为我们与人民的分裂已经完全终止了，愈合了。分裂依然存在，还将长期存在，不过，像我们今年所经历的这种历史时刻无疑会有助于已经“加强了的一致与自觉性”。总之，一方面，促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民与俄罗斯生活，另一方面，促使人民更进一步熟悉奇特的、使他们感到似乎不是俄罗斯人的陌生的人们，也就是熟悉“老爷们”，人民至今仍这样称呼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年整个这场席卷全俄罗斯的

---

① 见本书《宗教狂热》（原为法文）一文（1876年，7～8月号，第4章，Ⅴ）。

运动[①]中，人民比我们知识阶层的很多人表现得更为健康，更为切实，更为明朗。人民表现出来的感情是直率的、朴素的和强烈的，观点是坚定的，还有，主要的是观点具有惊人的普遍性与一致性。在人民中间下列这些问题根本没有争议：“为什么应该帮助斯拉夫各族人民？要不要帮助？对谁给予更好更多的帮助，对谁根本不应该帮助？我们会不会由于某种举动而损害我们的道德情操，会不会由于我们采取过分的帮助行为而贻害我们的正常发展？最后，我们跟谁作战，需要作战吗？”等等等等我们的知识分子感到困惑的成千上万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上层知识分子的某些人里面，在那些至今仍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人民，从欧洲文明（有时完全是徒有其表）的高度蔑视人民的那部分知识分子里面，也就是在这些上层的“某些人”里面，流露出十分强烈的不和谐的音调，不坚定的观点，有时对最简单的事物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理解，在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的举棋不定几乎到了可笑的程度。“帮助还是不帮助斯拉夫各族人民？如果帮助，那么为了什么而帮助——为了什么而帮助才更道德，更正大光明：为那个还是为这个？”所有这些有时简直是奇怪得惊人的特点确实已经表现出来，在言谈中听得到，在事实中看得到，在文学中读得到。但是，从这一点上说，没有一篇文章比我在《欧洲通报》[②]上读到的文章更令人吃惊的了，该文登在今年9月号《欧洲通报》的《国内评论》栏。它议论的就是为了给被压迫的斯拉夫各族人民以友谊的援助，目前正在进行的俄罗斯运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1876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人声援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运动。

② 俄国文学与政治月刊，1866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发行。

动。文章力求以尽量深思熟虑的眼光观察这次事件，文章涉及俄罗斯人民与社会的部分并不长——四至五页，因此，我想按顺序来谈谈这几页，当然不是把全文都摘录出来。我认为，这几页非常值得注意，可以说，足以构成独特的文献。我这种做法的目的在我这篇文章的结尾自然会显现出来，所以我想没有必要再写特别的道德说教。

不过，作为最简短的说明，我只想指出一点。十分清楚，文章的作者属于早已过时的理论上的西方派，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西方派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说是我们知识界的偶像；可是现在它已经这样过时，以致纯粹的、原始形态的西方派已经极其罕见了。可以说，这是脱离人民和生活的理论上的俄罗斯欧化论的残余，最后的莫希干人，这种欧化论尽管在当时曾经有过自己存在的必然原因，即便是这样，除开某些有益之处之外，它也遗留下了大量极其有害的偏颇的无稽之谈，这些见解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起着有害的作用。这些人物的主要历史作用是反面作用，他们的这种作用就在于他们的结论和最终判断（这是因为他们十分傲慢，认为他们的判断都是终极的）的极端性，在于他们那些最后的坚定分子，他们的激烈理论在这些分子的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极端性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的头脑清醒过来，推动了面向人民的转变，以及同人民的结合。现在，经过这个整整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经过对俄罗斯生活的实际研究获得了很多新的、过去闻所未闻的事实之后，——持这些陈旧理论的“最后的莫希干人”① 不知不觉中就呈现出滑稽可笑的形象，虽然他们竭力摆出郑重的气派。

① 借自美国作家库珀（1789—1851）的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指衰落的种族或社会集团的代表人物。

他们认为，自己仍然是关于现代俄罗斯生活应该遵循的（按照他们的看法）前进道路的学说的年轻的、也是唯一的捍卫者和体现者，这就是他们的可笑之处。但是，他们已经远远落后于生活，完全不了解生活，因而他们也是生活于纯系幻想的世界中。在某一社会情绪强烈高涨的时刻，这种理论上的欧洲主义就狼狈地脱离了人民与社会；在社会生活的某种紧急关头，这种欧洲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尽管依然自视甚高，盛气凌人，但与人民的感情与智慧的明确、纯朴、坚定不移的结论相比较，它们实质上却是脆弱的、动摇不定的、愚昧的和错误的，所以说，仔细考察一下这一切竟然达到了何等地步，这是极其有意思的，也是极其有教益的。然而，让我们还是看看文章本身吧。

不过，必须公正地对待文章的作者；他承认，也就是说同意承认，无论是人民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是为了斯拉夫各族人民，甚至还承认运动是十分真诚的运动。当然他也无法不承认！……不过对于我们的文章作者这样的积习难改的“欧洲派”来说这毕竟是不小的长进。然而，他总是对什么都感到不满，他莫名其妙地对这场运动已经开始了而感到不满。的确，他并没有公然说他不满意的是运动已经开始，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毛求疵。我们的理论上的西方派的最纯洁、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格拉诺夫斯基[①] 当时也评论过东方问题，评论过 1854

①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历史学家，俄国西欧派，自由主义者的最早代表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以他作为小说中主要人物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多方加以讽刺。

年至1856年的战争[①] 期间那场与现在多少有些相似的人民运动（请看我的8月号《日记》中关于格拉诺夫斯基那篇文章）。我是说，我认为格拉诺夫斯基对我们现在这场人民运动也是不会满意的。毫无疑问，他宁愿看到我们的人民依旧是从前那种停止不前的、因循守旧的群众，也不愿看到通过这种竟然有些不发达的、可以说是原始的形态，与我们的欧洲世纪不相适应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人民。一般说来，这些从前的老一辈的理论家们虽然也热爱人民（虽然我们对此不太清楚），在此之前他们仅仅是从理论上热爱人民，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们热爱的是虚构的意念和形象中的人民，热爱的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种样子的人民，实质上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爱过人民。不过，他们是可以谅解的，必须承认，他们从来就一点儿也不了解人民，他们也不认为需要了解人民，需要与人民交往。他们并未歪曲事实，纯粹是对事实毫不理解，所以，有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他们把人民的精神、思想和深厚纯洁的感情的纯金简直看做为庸俗、蒙昧和俄罗斯人民的冥顽不灵。在他们面前，人民只要稍稍表现出不是他们喜欢的样子和形象（他们喜欢的大多是法国巴黎的平民形象），可能他们就根本不承认他们是人民。格拉诺夫斯基在自己的论述东方问题的小册子中呼吁说："首先必须排除把这场战争看做神圣战争的一切观点，在今天不可能唤起任何人去进行十字军远征，今天不是那个时代，谁也不会去为解放圣陵而战争。"[②] 等等，等等。《欧洲通报》的

---

① 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史称克里木战争。战争的确切时间是1853—1856年。

② 西欧封建主与天主教会以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陵"（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巴勒斯坦）为名自1096年(转下页)

理论家与格拉诺夫斯基如出一辙：《欧洲通报》的理论家也不喜欢那些栏目，吹毛求疵。例如，他非常不高兴的是，我们的人民与社会不是在他打算设立的那种栏目下捐献。他希望的是，这样说吧，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更开明的观点。然而，我们又离题了。

这篇文章的开头关于俄罗斯援助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运动的议论，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这个开头是很有自己的特点的，不过我们不可能在每一行上都停一停。以下就是文章作者继续写的话。

---

（接上页）至1270年对近东（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非）发起过八次战争，历史上总称为十字军东征。

## 基法莫基耶维奇习气[1]

## (《作家日记》, 1876 年, 9 月号, 第 2 章, Ⅱ)

然而不能否认，在我们的报纸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多声明中，有一些声明是令人惊讶的，不策略的；有一些声明流露出一种愿望，这就是过分突出自己个人，这就不必去谈它了，因为这并不重要，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有一些声明暴露出来的则是要试探非俄罗斯族的俄国公民的感情。很遗憾，我们至今还没有抛弃这种不良的习惯，而就我们谈论的这件事情的实质而言，在对待加入俄罗斯人民整体的各个民族的关系上需要特别谨言慎行。我们还要指出，对于援助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整个运动不应该赋予过多的宗教信仰的性质，反反复复地一再谈论“我们的同一信仰者”。为了唤起俄罗斯社会援助斯拉夫各族人民，那些能够把全体俄罗斯人团结起来的理由就足够了，而那些可以使他们分裂的说法则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说，我们同情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是我们的同一信仰者，那么我们将如何对待我们那些假如要为援助土耳其人而募捐，或者表示愿意参加土耳其军队的穆斯林呢……在高加索某些地方发生的骚动不安应该提醒我们，东正教的大俄罗斯人在他居住的家庭中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虽然他是俄罗斯的长子。

---

① 基法·莫基耶维奇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第 1 卷，第 11 章) 中的人物，此人整日沉湎于荒诞不经的空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基法莫基耶维奇习气表示徒劳无益的、没有实际价值的空想。

为了指出在当前根深蒂固的理论上的欧洲主义与社会思想的距离是多么远，他能够说出一些多么空洞无聊的、充满基法·莫基耶维奇习气的话来，摘出这一段话就足能说明问题了。作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折磨着他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其凭空杜撰、装腔作势、最空洞无物的理论，主要的是，以其毫无目的性而令人惊奇。“如果我们是出于同一信仰而捐献，那么我们将如何对待我们那些假如要为援助土耳其人而募捐，或者表示愿意参加土耳其军队的穆斯林呢?”够了，这里可能存在任何问题吗？在回答上可能有任何迟疑吗？每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俄罗斯人都能够立刻做出最确切的回答。而且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任何一个欧洲人，任何一个北美洲人对这个问题都能够做出最明确的回答；也许欧洲人在回答之前要先以极其惊讶的目光打量你一番。我们还要指出，只是顺便地谈谈，我们俄罗斯的西方派学说，也就是欧洲化理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成长的过程中，总是渐渐地披上一层远非欧洲的色彩。这样一来，这些学说的某些“崇拜者们”移植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些欧洲思想有的时候竟变得面目全非。这种学说在俄罗斯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中磨来磨去，在运用于理论家全然不了解，而且也不认为有必要去了解的俄罗斯生活的过程中磨来磨去，竟然变得有时根本无法辨认了。“我们将如何去对待我们的那些穆斯林”等等，其实非常简单：首先，假如我们要与土耳其人打仗，而我们的鞑靼人，比如说，开始以财物帮助土耳其人，或者去加入他们的队伍，那么在整个社会向他们表示态度之前，我认为，政府本身要按国家的叛逆者来论处他们，当然，政府也会及时制止他们。其次，如果还没有宣战，而土耳其人就已开始屠杀全体俄罗斯人都一视同仁地寄予同情的斯拉夫各族人民，那么，如果俄罗斯的穆斯林开始捐助，以钱财或

者人力援助土耳其人，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您认为有哪一个俄罗斯人会不是怀着受侮辱的感情，不是怀着满腔愤慨对待这件事情吗？……按照您的看法，一切过失都在于捐助的宗教信仰性质，就是说，如果俄罗斯人由于同一信仰而帮助斯拉夫人，那么他又如何既不违犯公民的平等权利与公正，又能禁止俄罗斯的鞑靼人进行同样的捐献以帮助自己的同一信仰者——土耳其人呢？不对，俄罗斯人完全能够禁止，也有最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为俄罗斯人在帮助斯拉夫人反对土耳其人的时候，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做鞑靼人的敌人，没有想过进行战争反对鞑靼人，而鞑靼人如果帮助土耳其人，那他就是与俄罗斯决裂，成为俄罗斯的叛逆，他就是站到土耳其人的队伍里，直接进行反对俄罗斯的战争。此外，其实如果我，俄罗斯人，即便是出于共同信仰而捐助与土耳其人作战的斯拉夫人，希望他战胜土耳其人，那也根本不是因为土耳其人是穆斯林，完全是因为土耳其人屠杀斯拉夫人，而鞑靼人如果站到土耳其人方面，他这样做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基督徒似乎想要消灭穆斯林信仰，其实我根本没有想灭绝穆斯林，只是要保护自己的同一信仰者……在帮助斯拉夫人时，我不仅没有攻击鞑靼人的信仰，土耳其人自己的穆斯林信仰也与我毫不相干：有多少人愿意做穆斯林，就让他去做他的穆斯林吧，但是不要去触犯斯拉夫人。也许人们要说："你要是帮助同一信仰者反对土耳其人，从而你也就是在反对俄罗斯的鞑靼人，反对鞑靼人的信仰，因为他们有一部伊斯兰教法典，苏丹是一切穆斯林的国王。根据《古兰经》，非穆斯林不能自由，不能与穆斯林平等；俄罗斯人帮助斯拉夫人成为与穆斯林平等的人，这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看来都不只是反对土耳其人，而是反对全体穆斯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鞑靼人，而不是我了。

您明白，这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反驳了，在这里任何狡辩、任何借口都无济于事……您认为，全部过失都在于为了同一信仰，假如我对鞑靼人隐瞒了是为同一信仰而帮助斯拉夫人，相反却摆出一副为了其他别的理由而帮助斯拉夫人的姿态，比如说，是因为斯拉夫人被土耳其人压迫，失去了自由——“人的第一幸福”，这样一来鞑靼人就相信我了吗？恰恰相反，我可以向您保证，在任何一个穆斯林看来，无论以任何借口帮助非穆斯林反对穆斯林，完全都是一回事，都与我为了信仰而帮助非穆斯林没有区别。您莫非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不过您的确是这样写的：“为了唤起俄罗斯社会援助斯拉夫各族人民，那些能够把全体俄罗斯人团结起来的理由就足够了，而那些可以使他们分裂的说法则是多余的……”您这里所写的正是关于同一信仰、关于使人们分裂的理由以及关于俄罗斯的穆斯林，您还立刻对这些话做了解释。您提议用“为自由而斗争”的口号，按照您的说法，这是俄罗斯人捐助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最好、最高尚的口号或“理由”，看来，您确信，鞑靼人非常欣赏“斯拉夫各族人民为自由而战”这个理由，这个理由能够使鞑靼人彻底平静下来。但是，我还要告诉您，对于俄罗斯的穆斯林来说，如果他是那种决心要帮助土耳其人的人，所有的理由都是没有区别的，战争无论是在什么口号下开始，在他看来，归根结底都将是宗教战争。但是，鞑靼人这样理解，是不能怪罪俄罗斯人的……

## 两起自杀事件

(《作家日记》，1876 年，10 月号，第 1 章，Ⅲ)

不久前我同我们的一位作家（大艺术家）[1] 谈话，话题是关于生活中可笑的事情和辨别一种现象并且把它确切表述出来是多么困难。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告诉他，我读到《智慧的痛苦》[2] 快四十年了，可是直至今年我才对这部喜剧中最鲜明的形象之一，莫尔恰林，有了应有的理解，也就是他，这位同我谈话的作家在自己的一篇讽刺随笔[3] 中突然引用了这个人物形象，他给我阐释了莫尔恰林这个人物时，我才理解的。（我还要在某个时候谈谈莫尔恰林这个人物，这是值得一谈的题目。）

“可是您明白吗”，我的谈话者突然对我说，看来他早就对自己的思想深感惊异了，“您知道吗，您无论写了什么，刻画什么，也无论您在艺术作品中发现了什么，您决不能与现实媲美。任凭您怎样描画，写出来的东西总要比现实苍白得多。您以为在作品中触及到了某种生活现象中最可笑的东西，捕捉住了生活现象的最丑陋的方面，全然不是！现实立刻就能向您提供同类现象的这样一个场面，这个场面是想象不到的，而且是超越您自己的观察与想象所能创造的一切的场面！……”

---

① 指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

② 又译《聪明误》，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 或 1794—1829）的诗体喜剧。莫尔恰林为该喜剧中的一个反面人物。

③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系列讽刺随笔《莫尔恰林先生们》。

我从1846年刚刚开始写作时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也许还在早些时候就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不止使我感到惊讶，艺术的如此明显的无能为力还使我对艺术的用处感到困惑不解。确实如此，请仔细观察一下现实生活中那种乍然一看根本不怎样突出的事实，只要你有能力并且有眼力，你就能发现这一事实里面包含着连莎士比亚都没有达到的那种深度。但是要知道，全部问题就在于：用谁的眼光和谁有能力？其实不仅是为了创造和写作艺术作品，仅仅为了发现事实也需要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家。对于有的观察者来说，所有的生活现象都简单得惊人，一目了然，没有什么要想的，甚至没有什么可观察的，也不值得观察。对别的观察者来说，同是那些现象却使他感到不安、担心（这也是常有的事），到头来无力把这些现象归纳起来，使它们变得简单明了，把它们理成一条直线，从而使心情平静下来。他采取另一种把事情变简单的办法，不过是对准自己的额头一枪，一下子就勾销了自己的备受折磨的头脑和所有的问题。这不过是两个极端，在这两者之间的则是人的目前拥有的全部智慧。显然，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现象都观察透彻，把现象从结局到开端都了解得水落石出。我们熟悉的仅仅是眼前看得见的主要现象，而且这也是浮光掠影，至于结局和开端这一切目前还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顺便说说，我的一位可敬的通信者早在夏天就告诉了我一件离奇的、颇费猜测的自杀事件，我一直想谈谈它。这起自杀事件当中的一切，从里到外都是一个谜。我出于人的天性，当然竭力要多多少少解开这个谜，以求能“了却一件心事，安下心来”。自杀者是一名不过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姑娘，一位很有

名气的俄国侨民[①] 的女儿，出生在国外，按血统是俄罗斯人，按所受的教育而言则几乎完全不是俄罗斯的。某个时候在报纸上好像含含糊糊地提到过她，不过细节是很引人注目的："她用三氯甲烷蘸湿棉花捂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床上……就这样死了。"死前留下一张字条：

> Je m'en vais entreprendre un long voyage. Si cela ne réussit pas qu'on se rassemble pour fêter ma résurrection avec du Cliquot. *Si cela reussit*, je prie qu'on ne me laisse enterrer que tout à fait morte, puisqu'il est très désagréable de se réveiller dans un cercueil sous terre. *Ce n'est pas chic*!

译为俄文就是：

> 我要做长期旅行。如果我的自杀未成，那就请大家聚会以香槟酒祝贺我死而复生。**如果自杀成为事实**，我只有一件请求，请在确信我已死亡之后再埋葬我，因为在地下的棺材里苏醒过来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极其难堪的**！

---

① 自杀者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芙娜·赫尔岑（1858—1875）为俄国革命家、作家亚·伊·赫尔岑之女，1875年12月自杀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直接死因是与一名四十岁的法国人的爱情。同继母争吵，她的神经质与敏感也是促成自杀的原因。俄国的报道说法不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的说法来自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据说伊丽莎白的原信中没有最后一句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引文中这句话也是从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抄来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在信中还说道："显然，女人（赫尔岑的女儿——译者）自童年起接受的就是十足的唯物主义与无宗教信仰的教育。"

我以为，在这种讨厌的、粗鲁的派头中含有一种挑战，也许是愤懑、怨恨。然而，这是针对什么呢？纯粹愚蠢的人之所以用自杀来结果自己，那只是出于物质的、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而从上述便条的语气看，她不可能有这样的原因。这种愤懑可能是针对什么呢？……难道是针对眼前一切的平淡无奇，针对生活的空虚吗？他们就是大家极其熟悉的生活的法官和人生的否定者吗？他们对人在世界上出现这种“蠢事”表示愤慨，对人出生于世这种糊里糊涂的偶然性表示愤慨，因受断然不能接受的因循守旧的道理的压制而表示愤慨，这确实是由于对各种事情都那么浅薄而感到愤懑的心灵发出的声音，这是无法承受从幼年起父亲的家庭就赋予她的那种浅薄精神的心灵发出的呼声。最最说不过去的是，她的死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确实存在的困惑。她的心灵中多半是没有她意识到的困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她不假思索地相信她从幼年起就学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说，她的死是由于“冷酷的绝望和郁闷”，可以说是怀着本能的、莫名其妙的痛苦而死去的，如同缺乏空气似的，纯粹是窒息得难以活下去。心灵自然而然地承受不住这种浅薄，自然而然地要求更复杂一些的东西……

一个月之前彼得堡的各种报纸都用小型字体刊登了一条几行字的简短消息，报道彼得堡的一起自杀事件：一名贫穷的当裁缝的年轻姑娘，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下去，“因为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给自己挣一口饭吃的工作。”报道还说，她纵身跳下，落地时手里还捧着圣像。[①]手捧圣像——这是自杀事件中新奇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篇小说《温顺的女人》(见1876年,11月号,第1章)中的最初构思,就是由这个姑娘和这一细节引起的。

的、从来未听说过的情景！这是一种温顺的、平和的自杀。看来，她没有任何怨言或责难：纯粹是无法活下去了，“不想活了”，于是做过祈祷就死了。有些事情，看上去不管是多么简单，可是却也不能不去想它，仿佛总是在眼前晃来晃去，甚至好像你自己在这件事上有过错似的。这个温顺的、结果了自己生命的心灵使你的思想不由自主地感到痛苦。就是这起死亡使我想起了人们在夏天告诉我的那起侨民女儿的自杀事件。然而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人啊，仿佛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这又是两起多么不同的死！如果既不失礼又可以提出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问题的话，那么请问，这两个心灵当中哪一个在世上遭受的痛苦要大些？

# 判决

## （《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第1章，Ⅳ）

这是一名由于苦闷而自杀者的议论，显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实际上，这个大自然有什么权力让我出生在世界上，它根据的是自己的哪些永恒的法则？我是作为有意识的人被制造出来的，我也意识到这个大自然：它有什么权力没有我的允许就把我制造为有意识的我？造成有意识的我，就是造成忍受痛苦的我，但是我不愿意忍受痛苦，我为了什么要忍受痛苦呢？大自然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宣告，存在着某种整体的和谐。人类的意识根据这一宣告制造了宗教。大自然对我说，我，虽然我很清楚，我不能、永远也不能参与到这种“整体的和谐”里面去，而且也完全不了解这种和谐，不知道它是什么，然而大自然却对我说，我终归应该服从这个宣告，应该顺从，为了整体的和谐应该承受苦难，应该同意活着。假如让我自觉地选择，那么，不言而喻，我宁愿只是在我存在的这一瞬间成为幸福的人，至于整体及其和谐，在我消逝之后，与我毫不相干，在我之后，不管这个整体及其和谐是否还存在于世间，或者，立即与我同时灭亡，都是一样。再说，我为什么应该要在我死后还要为保存它而那样操心——问题就在这里？最好是我像所有的动物那样被制造出来，也就是活着，但不能合乎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我的意识恰恰不是和谐，正好相反，是不和谐，因为意识使我不幸。请看一看，在世界上谁是幸福的，哪些人同意活着？恰恰是那些像动物的人，那些因意识不大发展而接近动物类型的人。他们很愿意活

着，但要在像动物那样的条件下生活，这就是吃、喝、睡、营造巢穴、生儿育女。过着像人样的吃、喝、睡的生活就是要发财致富，要掠夺，而营造巢穴主要就是要掠夺。人们要反驳我说，也许，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在合乎科学的正确的社会原则上，而不是靠迄今为止的那种掠夺来安置、营造巢穴。就算是这样吧，不过我要问：这是为的什么？为了什么目的而营造，为了什么目的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在人们的社会中进行正确的、合理的、符合道德规范的安排？显然，对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向我做出回答。人们能够给予我的全部回答就是："为了得到享受。"不错，假如我是一株花或者是一头牛，我是会得到享受的。然而，像现在这样永无休止地向自己提出问题，即使是我有仁爱之心和人类对我的爱这种最高尚的和真挚的幸福，我也不可能幸福，因为我知道，明天这一切就将被消灭：我、整个幸福、全部爱、整个人类都将转化为零，化为从前的一片混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决不能接受任何幸福，这不是由于我没有同意接受幸福的愿望，也不是为了原则而固执己见，仅仅是因为乌有在威胁着明天，我不会、也不可能有幸福。这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直接的感受，我战胜不了它。那么，就算我死了，只要人类取代我而永恒存在下去，那时，也许我仍然感受到安慰。但是，要知道，我们的星球不是永恒的，给人类的期限也是那样的一瞬间，如同给我的一样。人类在世界上为自己安排得无论如何聪明、愉快、公正和神圣，所有这一切到明天同样等于乌有。根据大自然的某种不可抗拒的、永恒的、僵死的规则，虽然不知因何缘故这一切都是必需的，但是请相信，在这种思想里面包含着对人的某种极大的不尊重，使我深深感到侮辱的东西，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有过失的人。

最后，如果设想，在世界上，在合理的和科学的基础上安排的人的生活这个童话是可能的，相信这个童话，相信人们未来的幸福

终归会到来，那么，一想到大自然遵循某种一成不变的法则，在使人达到这种幸福之前，必须首先把人折磨几千年，单单是这一个思想就令人无比愤慨。现在，再想想那个使人最终得到幸福的大自然为什么必须在明天把这一切都化为乌有，毫不顾及人类为了这种幸福所付出的痛苦代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牛隐瞒了这一切，对我，对我的意识却不像对牛那样，毫不掩饰，想到这里，头脑中不由得就冒出一个十分可笑但又极其可悲的思想："假如做一次卑劣的实验，把人化作泥土，再看一看这个物体能不能在大地上适应生存，这又会怎样呢?"这一想法的可悲之处，主要是仍然没有谁承担过失，谁都没有做过这种实验，没有应该诅咒的人，一切都纯粹是按照大自然的僵死的法则发生的，这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法则，我的意识决不能够加以承认的法则。Ergo①：

因为对我所提的幸福问题，我是通过我的意识从大自然得到回答，而回答只是，只有在整体的和谐中我才能够幸福，别无其他途径。然而，这种和谐却是我所不理解的，显然，对我来说，是永远也无法理解。

因为大自然不仅不承认我有权向它要求说明，甚至根本就不回答我，这并不是因为不愿意回答，而是不能回答。

因为我深信，大自然指定（无意识地）我本人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而且是由我的意识回答我（因为我一直是自己对自己说话）。

最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在同一时间内既扮演原告角色，又扮演被告角色；既是受审者，又是法官。我认为这出喜剧，就大自然来说，纯粹是愚蠢的；从我来说，我认为扮演这出喜剧是一种侮辱。

那么，作为不容置疑的原告与被告，法官与受审者，我判决消

① 拉丁文：由此可见。

灭这个肆无忌惮地、卑劣地使我遭受苦难的大自然和我自己……但是，由于我不可能消灭大自然，我就消灭我自己一个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忍受这种无任何人承担过失的压制太苦恼了。

N. N.①

① 某某。

## 优秀人物

（《作家日记》，1876年，10月号，第2章，Ⅲ）

优秀人物，这是一个值得说几句话谈一谈的题目。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物，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人物都不可能生存并存在下去，即便在具有最广泛的平等权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优秀人物通常有两种类型：1）人民也好，民族也好，都自愿地、自由地服从他们，尊敬他们真正的高尚品质；2）人民或民族中所有的人或者是很多人，可以说，都是在某种强制下服从他们，如果认为他们是“优秀人物”，那也或多或少是规设的，而不是实实在在的。这种“规设的”优秀人物，可以说，是官方为了实施有秩序的和稳定的管理这些更高的目的而认可的优秀人物，对他们的存在是不能非议的，因为这类“优秀人物”是由于历史的规律才出现的，在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中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存在到现在，没有某种类似自愿地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制手段，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形成，不可能把自己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社会，为了能够维持并生存下去，必定要尊重某个人或某种事，主要的是，整个社会都要这样做，而不是每一个人想怎样便怎样。由于第一类优秀人物，就是真正高尚的、全体或者全民族中绝大多数人都真心诚意地崇拜景仰的那些人，这些人有的时候多多少少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他们太理想了，有时是难以辨认的，他们以其奇异与独特性而与众不同，从表面上看常常有某种不大起眼的外表，于是作为他们的代替者，在官方的保护下就安排一批规设优秀的人们作为优秀的人物：“那就请你们尊敬他们吧。”

如果这些“规设的”优秀人物真的与第一类优秀的人们毫无二致（因为并非第一类人中全都有不像样的外表），真正是高尚的，那就不仅能够充分达到目的，而且能够加倍达到。这种优秀的人们在我们这里最初是大公的侍从，继之是大贵族[1]、司祭（只限于上层），甚至有某些显赫的商人，——但是这类人是非常少的。需要指出，这些优秀的人们，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一切地方，也就是在欧洲，归根结蒂总是要为自己制定一套十分严整的关于高尚和荣誉的规范，虽然这套规范就整体而言，当然历来都是相对的，与人民的理想有时相去甚远，不过，这些规范在某些方面有时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优秀的”人物必须为祖国去赴死，如果要求他做出这种牺牲的话，他也确实是为了荣誉的义务而出生入死，“因为我这种人将要承受巨大的灾难”，——显然这终究比无耻行为的权利好得无法比拟，无耻行为的权利使人在危急时刻抛弃一切和所有的人，自己去找藏身之处：“任凭世上的一切都毁掉吧，只求我自己和我的财产完好无损。”在我们俄罗斯已经这样做了很长时间，还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在我们俄罗斯，这些相对优秀的人物的理想极其经常并且在很多方面都是与绝对优秀的人物，也就是与人民的优秀人物相一致的。当然不是完全，甚至远非完全一致，但是，起码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当时，俄

---

① 大贵族（боярин），在基辅罗斯时期（10—12 世纪）是王公的臣仆（亦即侍从），必须在王公的军队中服役，并兼任公国议政会成员，王公的谋士或助手，拥有世袭的田庄，并享有一些特权。至 12—15 世纪封建割据时期，大贵族的势力开始强大。至 15 世纪下半期，逐渐削弱。此后在伊万·雷帝（1533—1584）即位之后，便沦为与当时新兴的、可以称之为“服役”贵族的地位相近，二者统称为贵族（дворянин），逐渐失去尊卑之分了。

罗斯的大贵族与俄罗斯人民在道德上的接近程度之深差不多是同一时期里在欧洲各地胜利的暴君——骑士与被征服的奴隶——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我们这里，突然之间在我们的优秀人物的组织中出现了某种急剧的变化：按照国家的命令，优秀的人物无一例外全都被划分为十四个具有各自称号的品级，像阶梯似的，一级比一级高，这样一来，人的高尚品质就分为冠有德国名称的整整十四个品级①。这种变革在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完全达到采取这种设置时的初衷，因为从前那些“优秀人物”自己就立刻占据并且占满了全部十四个新的品级，只不过是用贵族的称号取代了大贵族的称号。不过变革也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一变革极大地扩展了旧的樊篱。新的力量从社会下层涌现，用我们的术语说，这就是民主力量，特别是来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的涌现给优秀人物这个行列带来很多富有生气和富有成效的东西，因为出现了一些拥有才能的和有新观点的人，有教养的人，在当时还是前所未有的人，虽然这些人当时极力蔑视自己从前的出身，迫不及待地借助于官衔尽快把自己变为

① 彼得大帝于1722年1月24日制订了《官阶表》，把官吏分为三类官阶：军职（海陆军）、文职和宫廷职。每一类分为十四品级，一品最高。出身社会下层的官吏可按品级获得不同的贵族身份：低级官吏不能获得世袭贵族身份（即自身贵族），高级官吏（文官八品以上）获世袭贵族身份。《官阶表》的制订废除了从前的大贵族的供职特权，确立了官吏按个人政绩晋升的原则，开放了社会下层的人物进身贵族社会的仕途，扩充了统治阶级的营垒，改变了其社会成分，使官吏逐步脱离其出身的社会环境，形成特殊的官僚集团。这种官阶划分一直至十月革命后才废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自己的“根基派”的观点出发，认为《官阶表》的制订加深、加剧了社会上有教养的阶层与人民的分裂。

纯粹的贵族。必须指出，除开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之外，极少有出身人民和商人的人挤进“优秀人物”的行列，贵族继续充当民族的首领。这个行列组织得十分严密，那个时候，金钱、财产和钱袋在全欧洲统治着一切，在那里被人们真诚地看做高尚的东西中最高尚的，人间与人们相互关系中的好的东西中最好的；而在我们俄罗斯，我们还记得，将军极受尊敬，以至最富有的商人，也把能够宴请将军视为自己的极大光荣。不久之前我读到一则趣事，如果我不知道真有其事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彼得堡上层社会的一位夫人在一次音乐会上当众把一位拥有百万家财的女商人从座位上赶走，自己坐在她的位置上，而且还当面辱骂她，——这不过是三十年之前的事情！然而，必须指出，这些“优秀”人物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稳之后，他们也学会了某些甚至是极好的规范，例如，接受一定的教育几乎成了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义务，所以这些优秀人物的整体在当时是俄罗斯主要的有教养的阶层，是俄罗斯文化的保护者和体现者，无论这是什么样的文化。无须说，这种文化也是荣誉规范的唯一保护者和体现者，不过，它已经完全是按照欧洲的模式，因此最终是规范的字面意义和形式压倒了真正的内容：各种荣誉很多，但正直的人毕竟不那么多。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这个时期之末，“优秀”人物阶层的“优秀人物”的理想已经远离人民，因而几乎所有关于“优秀”的人民观念全都受到公然嘲笑。但是，突然发生了俄罗斯从未有过的最大转折：废除了农奴制，在一切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确，十四个品级像从前那样保留下来，但是“优秀人物”则似乎动摇了。在社会大众中仿佛失去了以前的魅力，关于“优秀”的看法似乎出现了某种变化。的确，变化只是部分的，也不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不仅如此，对优秀的理解也开始变得极端混乱和模糊

了；而且，从前的看法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因此非常多的人在意识中出现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现在什么样的人是优秀的，主要的是，他们在哪里，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谁来负责宣布他们是优秀人物，依据是什么？需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吗？最后是，这些新的依据都家喻户晓了吗？谁相信，这就是需要重新树立很多优秀人物的依据？确实，很多人都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 再谈优秀人物

（《作家日记》，1876 年，10 月号，第 2 章，Ⅳ）

全部问题就在于，从前的“优秀人物”似乎脱离了权威的庇护，似乎丧失了他们的官方性质。于是，首先，令人宽慰的是，“优秀人物”从前那种帮派形式即使不是彻底被摧毁了，至少也是被剧烈地动摇了，范围被扩展了，所以，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自己从前那种意义，他就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从“相对的优秀的人物”转变为真实的优秀人物。一种美好的希望出现了，“真实的”因此就要逐渐占据从前那种“优秀”人物的全部位置，但这种转变如何实现呢？显然还是一个谜。不过，对于很多深深值得尊敬的，但却是性急的和自由主义的人们来说，这里并不存在任何谜。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早已像预料的那样解决了，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一切都已实现了，“真实的”人今天如果还没能占据首要的位置，那么明天，只要天空破晓，他就一定能站到那个位置上……与此同时，深思熟虑的人们都不断地就从前那个题目提出问题：“这些真实的人，他们是什么人？有没有人知道，现在如何称呼他们？反过来说，在我们这里，他们的理想是否彻底丧失了？普遍公认的‘优秀人物’如今在哪里？整个社会尊崇什么，尊崇什么人，仿效什么人？”

可能，这些问题不是一字不差地以这样的表述、以这些问题的形式被提出来，但是，我们的社会正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经受着所有这些“忐忑不安的心情”。情绪热烈激昂的人们指责怀疑论者说，“新人”是有的，他已被发现了，他的面貌是

清晰的，他就在眼前。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个新的、“优秀的”人无非就是有文化的人，懂科学的、没有以前的偏见的“人”。但是，这种意见不可能为很多人所接受，原因很简单：有教养的人——并非总是正直的人，科学也不能保证人是高尚的。在这种普遍动摇不定与含混不清的时刻，有一些人试图提出这样的建议：可否求助于人民或者人民的本原？但是，仅仅是“人民的本原”这个词就早已使很多人感到极为厌恶和可憎；再说人民自从获得解放以来也并没有特别急于显示自己的高尚方面，所以说要从人民身上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也是可疑的建议。相反的是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混乱、伤风败俗、劣等的杂质烧酒、失败的自治制度以及关于占据了先前的地主位置的富农和吸血鬼、最后还有犹太人等等的各种传言。“聪明绝顶的”作家们甚至宣称富农和吸血鬼在人民中间主宰一切，同时人民自己也把他们看做自己的真正的“优秀”人物。后来甚至还出现一种最好的意义上的纯自由主义的见解，认为在创建优秀人物的理想方面人民现在甚至不可能有资格，这不是说人民本身有无资格，而是说他们还没有能力参与这一创举，首先需要的是教他们认字，改善他们的形象，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发展，建立学校，等等，等等。必须承认，很多怀疑论者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又出现了新的危险，降临了新的灾难——这就是“钱袋”！在从前的“相对”优秀人物的位置上出现了新的社会习俗，这种社会习俗在我们这里几乎突然就获得了极大的意义。噢，当然，钱袋在以前也曾有过：它一直是以从前的百万巨富的商人的形式存在的；但它从来也没有达到过我们最近时期这样高的地位，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意义。尽管百万富翁和资本家在欧洲各地都在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我们先前的商人在

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比较而言，并不怎样高。说实在的，他也不配有更高的地位。我要事先声明：我说的只是富有的商人；这些人的大多数还没有被财富所腐蚀，还过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那种类型的商人的生活，可能，如果只是从比较上说，并不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更坏，而下层的和最大多数的商人——那就差不多完全与人民一样。然而以前的商人越是富有，就越变得坏。实质上商人就是农夫，只是被腐蚀了。从前的商人-百万富翁分为两类——一类人尽管腰缠万贯，照旧蓄着大胡须，尽管居住在自己的装饰着玻璃镜和镶木地板的宽敞房屋里，在道德上和肉体上却过着有些龌龊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尚存的最好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爱听教堂的钟声和喜欢嗓音洪亮的助祭。然而，虽说有这种爱好，可是他们在道德上已经完全与人民断绝了联系。很难想象有什么比人民与某些百万富翁-工厂主在道德上更不相投的东西了。据说，奥夫相尼科夫[①] 在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路上经过喀山时，把人民天真地投进他乘坐的马车里的施舍给他的戈比用脚踢了出来：这是在道德上与人民的最终决裂，完全丧失了对人民的理性与精神的理解。人民还从来没有遭受过在这些老爷的工厂中所遭受的那种奴役！另一类商人-百万富翁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是，燕尾服，刮得精光的下颏，阔绰的欧式居住环境，女儿学习法语、英语和钢琴，经常以巨款为代价而获得的勋章，在地位低于他的一切人面前目中无人，趾高气扬，蔑视平凡的“有宴必赴”

① C. T. 奥夫相尼科夫，彼得堡巨富、面粉商、承包商。为获取巨额财产蓄意纵火焚毁其租赁的蒸汽机磨坊，1875 年被判处剥夺全部财产，永远流放西伯利亚。他在被押赴西伯利亚途经下诺夫哥罗德时，卫兵不准施舍的人们接近他，于是人们便向他乘坐的有篷马车内投掷铜币，但他自己又把这些钱扔了出来。

的将军；与此同时在高官面前则低声下气，特别是在天知道出于什么阴谋或要求而邀请高官出席自家的、自然是专为高官举办的舞会或午宴时，尤其如此。千方百计地宴请要人已经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项目。如饥似渴地追求这种生活，因为这几乎就是百万富翁活在世上的目的。不言而喻，这个从前的阔绰商人像对上帝那样，对自己的百万家财顶礼膜拜，因为在他的眼中万贯家财就是一切，万贯家财使他摆脱了贫贱，获得了全部意义。在这个堕落的“庄稼汉”（因为他无论穿什么样的燕尾服，仍旧是个庄稼汉）的粗鲁心灵中永远不可能哪怕在瞬间产生一点点比自己的百万财富更高尚的思想和情感。不言而喻，尽管表面上衣冠楚楚，这种商人的整个家庭都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百万财富不仅不能促使他们受教育，在他们这种情况下，反而成为使他们愚昧的主要原因：这种百万富翁的儿子进入大学读书，即使不学无术也能得到一切，何况所有的百万富翁由于有了百万财富，往往是事先就获得了享有贵族特权的保证。从少年起就腐化堕落，关于世界、祖国、荣誉、义务的概念都是极端扭曲的，除此之外，财富没有给这个荒淫放荡、厚颜无耻的少年的心灵带来任何东西。世界观的扭曲达到惊人的程度，因为“我可以用金钱购买一切，购买一切荣耀、一切高尚品质，我可以收买任何人，也可以行贿免除一切”，这种信念已经变成他的高于一切的公理。很难想象这些在阔绰家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心肠的冷酷。出于傲慢，为了不落后于别的人，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虽然这种情况在 1812 年[①] 仅有过一次），这种百万富翁也向祖国捐献过大量钱财，但他的捐献是指望得到奖赏的，而在自己一生的

① 指 1812 年拿破仑的入侵和由此引起的卫国战争。

其余时刻，他随时准备与第一个遇到的犹太人合作，以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一切人和一切事物；在这些人的心中，爱国主义、公民感情几乎是不存在的。

噢，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只是作为一个阶层的、我们俄罗斯经商的百万富翁。例外是随时随地都有的。可以指出，在我们这里也有以受过欧洲教育和高尚的公民功勋而与众不同的商人；但是在百万富翁中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甚至可以一一列举出来，这个阶层不会由于例外而改变自己的性质。

于是，从前的商人的范围在今天，突然之间大大扩展了。他突然同欧洲的投机者，同前所未闻的俄国交易所的赌棍纠结到一起了。现代的商人已经不需要在家中宴请"要人"，或为之举办舞会；他已经是在交易所，在股东会议上，在与要人合建的银行里与要人混在一起，结成亲密的朋友了；如今他自己就是人物，就是要人了。主要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容置疑地处于社会最上层的位置，这是在全欧洲早已正式地、真诚地分配给百万富翁的位置，当然，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自己占有这个位置确实是受之无愧。总之，现在他就是大地上的"优秀"人物，他取代了在他之前存在过的全部优秀人物。然而可怕的灾难还不在于他有这种愚蠢的想法，而在于其他的人（而且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似乎也开始有一模一样的想法。绝大多数人现在毫不怀疑钱袋高于一切。当然有人要起来争论，反驳这种忧虑。但是在我们这里现在实际上已经拜倒在钱袋面前，这不仅是无可争辩的，而且从突然出现的这种崇拜的规模来说也是无可比拟的。我再重复一遍：在我们这里从前也全都知道钱袋的力量，但是从来还没有像现在的俄罗斯这样把钱袋看做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东西。在官方划分的俄罗斯人的品级中，从前的商人钱袋在社会等级中甚至不能排在官吏的前边。而现在

呢，在新的优秀人物的如此可爱和美好的新“条件”面前，从前那个品级似乎无需任何外来的压力便甘心自动退居次要地位，因为这个新的优秀人物已经“如此长久，如此不公正地没有得到自己的真正权利”。现在的交易所经纪人雇用文学家为自己效劳，律师卑躬屈膝地迎合他。“这是使头脑能够随机应变，使心灵变得干枯的年轻课堂，这是使一切健康的情感按照需要而扭曲的课堂，这是按照需求和愿望而经常不断地、无所畏惧地、不受惩罚地尽可能地侵占一切的课堂”——这所年轻的课堂十分合乎现代交易所经纪人的胃口，并为他唱赞歌。噢，不要以为我是在影射“斯特鲁斯贝格案件”①：因为那些律师宣布在该案中“落入法网的”自己的被保护人是人们的理想，把自己的被保护人当做“全莫斯科的优秀人物”（大致如此）而加以颂扬，那些律师们纯粹是犯了个错误。他们表明，他们自己不仅仅是毫无严肃信念的人，而且还是没有任何自持力和分寸感的人。如果他们在我们这里竟然能扮演“欧洲才子”的角色，那只是由于山中无虎，猴子称王。实际上，他们像外交家，价要得尽可能的高，以便争取最大的 minimum②：“不仅正确——而且神圣！”据说，有一次在听众里面竟然发出嘘声。然而首先律师不是外交家；这个比喻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如果用手指着被保护人，然后按圣经的方式质问：“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③”这就更恰当些，恰当

① 比特尔·亨利·斯特鲁斯贝格（1823—1884），德国人，在俄国承办建筑铁路工程，通过行贿，以分文不值的证券抵押获得七百万卢布贷款，后来破产，无力偿还贷款，于 1875 年导致莫斯科商业信贷银行破产，这是当时的重大诈骗案件之一。

② 拉丁文：最小、最少。

③ 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8 章，第 7 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得多。噢，我不是反对审判：审判是对的，可是我也不奉承审判；审判应该宣布，即便是只宣布对银行的审判。正因为问题的性质是，以“社会的良心”审判这个“落入法网的”、不幸的莫斯科贷款银行，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银行、所有的交易所和全部交易所经纪人都在受审判，虽然说他们还没有落入法网，其实，反正不都是一回事吗？谁没有罪过，凭良心说，谁没有同样的罪过？有的人发表文章说，对他们的惩处太轻了。我有保留，我指的不是良达乌①：他的罪过确实非同小可，不过，我并不想评论这件事，至于因诈骗而被审判的丹尼尔·舒马赫尔②，那是判得太重了。我们扪心自问一下：难道我们中间的很多人没有做过同样的事情吗？不必大声讲出来，只在心中想一想就够了。然而，法律万岁，我们毕竟把他们关进了监牢！“看吧，这就是你由于我们这个交易所的时代和堕落的时代而得到的，这就是由于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这些人对生活幸福、生活享受持无耻的物质观念而使你得到的，由于我们的冷酷的、为了保全自己而不惜背信弃义的情感而使你得到的！”不，因为我们自身的罪恶即使是审判一个银行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上帝啊，我扯到哪里去了？难道我也写起“斯特鲁斯贝格案件”来了？够了，我得赶快简略些。我本来是在谈“优秀人物”的，只是想说明，真正的优秀人物、甚至是“一

---

①② 良达乌与丹尼尔·舒马赫尔二人均因卷人斯特鲁斯贝格的修筑铁路案件而受审判。良达乌（应为兰达乌——俄编注）系莫斯科某商业信贷银行经理，因受贿，贷出巨款，致使银行破产。丹尼尔·舒马赫尔，莫斯科市长，在得知银行资产遭受巨大损失后，利用职权提走自己个人的全部资金。1876年10月号《作家日记》出版后，法庭宣判丹尼尔·舒马赫尔一个月的监禁。

般”的人的理想在我们这里已经极其含混不清。旧的已经破灭了，过时了，新的还在幻想中翱翔，而在实际上，在我们的心目中出现的是某种丑恶的东西，它在俄罗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赋予钱袋这个新的力量的魅力，在某些人的过分多疑的心灵中甚至唤起恐惧，比如说，甚至为人民担心。我们，上层社会，比如说，虽然也可能为新的偶像所迷惑，但我们毕竟不至于彻底垮掉：教育的明灯不是徒劳无益地照耀了我们二百年。我们有教育的全副武装，我们能够抗击邪恶。在最肮脏的交易所的道德败坏的时刻我们把莫斯科的贷款银行送上了法庭，虽然只是一个银行！但是人民，我们的一亿人民，这些“因循守旧的、道德败坏的、麻木不仁的群众”，已经浸透了守财奴习气的群众，——他们以什么东西去对抗正在以钱袋形式向他们袭来的唯物主义怪物呢？以自己的贫穷、自己的破烂衣衫、自己的赋税和歉收、自己的恶习、劣质酒和所受的鞭笞来对抗吗？我们担心，在力量不断增强的钱袋面前他们要立刻栽倒下去，过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就会变成钱袋的奴隶，比过去的农奴处境还要糟。他们不仅是被强制依附于钱袋，而且是从精神上，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依附于钱袋的。我们担心的正是他们最先说出：“这就是主要的东西，这就是力量，这就是安宁，这就是幸福！我们向它顶礼膜拜，追随它走。”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这样。很多人想来想去，——可是突然之间……

但是，今年夏季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关于这个问题我留待下一期《日记》再谈。我想不带“幽默”地谈谈这个问题，真挚地、坦率地谈谈。今年夏季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令人感动，令人高兴得难以置信。其所以难以置信，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这种人民不抱希望，认为他们粗鲁，没有资格对俄罗

斯的“优秀人物”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我们以为，这个人民的整个机体都被物质的和精神的堕落所玷污了；我们以为，人民已经把自己的精神本原忘得一干二净，在自己的心灵中没有珍惜它；由于贫穷和堕落而丢掉或者歪曲了自己的理想。可是突然之间，这个“千人一面的、因循守旧的群众”（当然，这是我们某些聪明人的看法），这个由一亿人构成的群体散布在千万俄里的土地上，无声无息，永远在孕育着什么，被认为永远也无力说出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显示出一副永远没有觉悟的、温顺的样子，——突然之间，整个俄罗斯全都苏醒过来，站立起来，温顺地，但却坚定地公开地说出了自己的精彩的话……不仅如此，俄罗斯人收起自己的木犁，在数千人的欢送下，数百人一群群地走向新的十字军远征（人们已经这样称呼这次运动；这是英国人最早把我们俄罗斯的运动比做十字军远征的）——到塞尔维亚去，为那里的兄弟姐妹而去，因为听说那里的兄弟姐妹正在经受折磨和压迫。父亲，老头子，这本来是安静生活的岁数，却突然行动起来，边走边问路，步行数千俄里为了兄弟姐妹去与土耳其人作战，并且还带领九岁的小女儿与自己同行（这是事实）。“我在路上会找到基督徒照顾我的女儿的”，他回答问题说，“那我就可以走了，去为上帝的事业服务。”他就这样走了……像这样的事例成千上万！假如有什么人事先，就算在冬天吧，说我们这里将要出现这种事情，我们是不会相信的，不会相信确实已经开始了的这次“十字军远征”（但还远未结束）。即使是现在，虽然已经清清楚楚看到了，有的时候还不禁自问：“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怎么会做出这种出人预料的事情呢？”俄罗斯大地公开宣布了一切，它尊敬什么，相信什么，它说明了，它认为什么是“优秀”，它尊崇的“优秀人物”是什么样的人。关于这是一些什

么样的人，显示出了什么样的理想，我留待下期的《日记》再谈。实质上，这些理想，这些“优秀人物”是明确的，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按照人民的观念，“优秀的人”——这就是不崇拜物质诱惑的人，这就是坚持不懈地寻找为上帝的事业献身、热爱真理的人，在必要的时刻，他们可以背井离乡，以至于牺牲性命，挺身而出捍卫真理。我想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有教养的人们，为什么现在可以勇敢地、坚决地相信，“优秀人物”的形象在我们俄罗斯不仅没有丧失，而且相反，这个形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夺目，他的传递者、保护者和体现者现在就是普通的俄罗斯人民。我们，由于我们的文明的傲慢，还由于我们的幼稚无知，曾经认为俄罗斯人民是“没有资格的”。我特别希望谈一谈，在“优秀人物”的问题上，就是在现在，我们的“教养”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怎样才能够与人民提出的要求完全趋于一致，尽管人民借以指出“优秀人物”的形式是那样显而易见的天真、朴实。但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虽然形式也是出色的），内容是无可辩驳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欣喜地信赖新的希望：我们的地平线打扫得洁净异常，我们的新的太阳升起来了，放射着耀眼光芒……从现在起，在对“优秀人物”的理解上，只要有可能的话，我们全都赞同人民，与人民一致，那么从今年夏季起，可能，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就开始了。

# 温顺的女人[①] ·虚构的故事

（《作家日记》，1876 年，11 月号）

## 第一章

### 作者的说明

我请求读者谅解，这一次我只是拿出一个中篇小说来取代通常形式的《日记》。不过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我确实是用在写这篇小说上了。无论怎样说，我还是请读者见谅。

现在就来谈这篇小说。我给小说加的标题是“虚构的”，其实我认为它本身是高度真实的。不过里面也真的有幻想的成分，这就是小说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必须事先做点说明。

这不是一篇小说，也不是一篇札记，这就是需要说明的。请你们想一想，有这样一个丈夫，在他身旁的桌子上躺着他自杀的妻子，她是几个小时之前从楼窗跳下去自杀的。他还惊魂未定，还顾不上梳理自己的思想。他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竭力要把发生的事情思考个明白，“要把自己的思绪聚集到一点上”。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抑郁症患者，是那种自言自语的人。这不是，他正在自己跟自己说话，说的就是这件事，在向自己做解释。他的话看上去虽然有条不紊，可是在逻辑上，情感上，却时不时地自相矛盾，他时而为自己辩解，时而责备她，

---

① 本篇有题解，见本卷(《作家日记》) 书末附录。

时而又转向不相干的解释：这里面既有思想上和心灵上的糊涂，又有深厚的感情。他真的渐渐解释清楚了，把“思想聚集到了一点上”。他唤起的一系列回忆终于不可抗拒地使他走向真理；真理又不可抗拒地提高了他的智慧和心灵。到结尾，同杂乱无章的开头相比，叙述的语气也变了。在这个不幸的人面前真理相当明白、确切地呈现出来，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这样的。

这就是故事的主旨。当然，叙述的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时断时续，形式也不连贯：他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又像在对一个看不见的听众，对某一个审判员讲话。是啊，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景。假如有个速记员能够窃听他的话并且给他全部记下来，记下来的比我写的要粗糙一些，也没有像我这样加工过，不过据我看，心理的过程可能与我写的相同。设想有一个速记员把一切都记录下来（此后我会对记录进行加工的），这也就是我所指的故事中的幻想成分。然而，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的手法在艺术中已经运用过不止一次了。比如说，维克多·雨果在自己的精湛之作《死囚末日记》[①] 中就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手法，他虽然没有设想一名速记员，但是他假定，一名死囚能够（也有时间）不仅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甚至在最后一个小时，简直是在最后一分钟撰写札记，这就更加难以置信了。但是他假如不这样去幻想，他也就不可能写出这篇作品——这篇在他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现实的和最真实的作品。

## Ⅰ 我是谁，她又是谁

……她暂时还在这里，一切还都好：我时而走过去，过一

① 雨果的早期作品。

会儿就看一眼；可是明天就要把她抬走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可怎么办呢？她现在躺在厅里用两张牌桌拼成的长桌上，明天就把棺材送来了，雪白雪白的那不勒斯绸[①]，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我一直在来回走动，想把这件事考虑明白。现在已经是六点钟了，我想解释清楚，可总也不能把思想集中起来。我老是在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原因就在这里。这件事情本来是这样的。我干脆按照顺序谈。（顺序！）先生们，我可绝非文学家，你们会看得出来的，不管这些了，我怎样理解就怎样讲。我的可悲就因为我全都明白！

你们如果想要知道，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想知道，那就是这样的。她当时不过是到我这里来典当东西，为了交付在《呼声报》上登的广告费，广告无非是说，某某家庭女教师愿意外出授课，也愿意在家中授课，诸如此类的话。一开始就是这样，我，自然，也没有觉得她与别的人有什么不同；同别的人一样来去，都一样。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她的不同了。她身材苗条，一头淡黄发，中等个儿；她跟我来往总是有点儿不大自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她跟所有陌生的人都是这个样子，而我呢，不必说，在她的眼中与任何其他人都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说她如果不是把我看做当铺掌柜，而是看做一个一般的人的话。）她总是一拿到钱立刻转身就走。她从来不说一句话。别的人则总是争论，索要，讨价还价，为了多当几个钱；而这一个则不是这样，给多少就是多少……我好像又说得颠三倒四了……是讲乱了；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她的物品：镀金的银耳环，不值钱的项饰——总共值二十戈比的东西。她自

① 指产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质地很好的软缎，这里说的是棺材里的衬布。

己也知道，这都是一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但我从她脸色上看出来，她把这些东西视如珍宝，——后来我知道，这真的就是她父母留给她的全部东西。只有一次我放任自己奚落了她拿来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做这种事情，我对人是以礼相待的：少说话，有礼貌，严肃。“严肃、严肃又严肃”。可是她竟把敞胸兔皮袄的破衣片（实实在在的破衣片）拿来了，——我也实在忍不住了，猛然冲她冒出一句有些刻薄的话。天啊，她面红耳赤！她有一双浅蓝的、若有所思的大眼睛，可是现在燃烧起来了！不过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收起自己的“破衣片”——走了出去。这时我头一次特别注意到她，在心中也大致上这样琢磨了一会儿，这就是说，是一种特别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印象，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印象，是全部印象的综合：这就是她太年轻了，年轻得就像才十四岁。其实那时她差三个月就十六岁了。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些，也不是这一切的综合。到了第二天她又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带着这件皮袄到多布龙纳沃夫和莫泽尔① 两家当铺去过了。但是那两家只收金银，此外什么也不收，连看都不看一眼。有一次，我已经收过她一块宝石（也是没用的东西）——过后一琢磨，我也觉得怪：我也是除开金银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收，可是却让她当了宝石。这是当时关于她的第二个想法，我还记得。

另一次，她从莫泽尔当铺来，拿来当的是琥珀烟嘴——东西还可以，有人爱好这东西，但是在我们这里依然是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只收金制品。她是在昨天那场风波之后又来的，

① 这里的多布龙纳沃夫和莫泽尔，两个当铺老板的姓氏都是虚构的。

所以我严肃地接待了她。我说的严肃——就是冷淡。可是在付给她两个卢布时，我就抑制不住自己了，又说了一句带点火气的话："我这是只有对您才这样做，莫泽尔那里是不要您的这种东西的。""对您"这两个字我是特别着重说的，带有某种含意的。我正在气头上。她听到这是"对您"两个字后又是满脸通红，但是一声没响，钱也没有扔下，拿走了，——都是因为穷啊！可是她的脸却多么红啊！我明白了，我伤害了她。当她离去之后，我突然自己问自己：难道为了这样占她一次上风就得花两个卢布吗？嘻——嘻——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一连两遍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值得吗？值得吗？"我笑着在心中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心情愉快极了，但我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意图：我是故意盘算好那样说的；我想试探她，因为我心中突然浮现出某些关于她的想法。这是我的有关她的第三个特别的想法。

……就这样，一切都是从那个时候开的头。当然，我马上就想方设法从侧面打听各种情况，怀着特别焦急的心情等待她的出现。其实我预感到她很快就会来的。她一来，我就跟她热诚地闲谈起来，对她彬彬有礼。我颇有教养，举止得体。嗯，就在这时候，我看出来她是善良而温顺的女人。善良、温顺的人是不能够抗拒多久的，这种人尽管不大愿意敞开心怀，可也不会躲躲闪闪地避开谈话：回答很简短，但还是回话。只要你自己不厌倦，需要谈，那就越谈话越多。那个时候她自己什么也没有向我解释，这是很自然的。关于《呼声报》和其他一切，我是在后来才知道的。她那时正在拼命登广告，开头，不必说，还有些傲气，不外是"家庭女教师愿意外出授课，条件可函商"，往后就改为"愿任一切工作，教课、做女伴、照料家务、护理女病人、缝纫"等等，这一切都是人们熟悉的！自

然，这都是一次一次地加进广告的，末了，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甚至降到“不付薪水，只供膳食”的地步。然而不成，还是找不到工作！我下决心最后试她一次：我突然拿起当天的《呼声报》，把广告指给她看：“年轻女子父母双亡，愿任年幼儿童之家庭教师，尤愿任教于年迈鳏夫之家。可分担家务之劳。”

“你看，这是今天早晨登的，到晚上大概就能找到事干。广告要这样才成！”

她又涨得面红耳赤，眼里又冒出火星，立刻就转过身去走了。我非常喜欢看她这个样子。其实，那时我已经心中有数，不再害怕了：烟嘴之类的东西没有人再要了，而且她连这类东西也当光了。果然如此，第三天她来了，她面色异常苍白，神色异常激动，——我明白，她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是出了事。我马上就说清楚出了什么事，不过现在我想先简单提一句，我在她面前突然做了一件多么有风度的事，因而在她的眼中提高了我的身份。那是我偶然产生的一个想法。事情是这样的：她拿来这个圣像（她是下了狠心才拿来的）……唉，请注意！请注意！就是从现在开始的，可是我又说得颠三倒四了……因为我现在想把全部事情回忆起来，每一个细枝末节，每一件小事，我一直在尽力把思想归结到一个点上，——可是办不到，所以总是点点滴滴……

那是一个圣母像。怀抱圣婴的圣母，一件家庭供奉的古老的家常圣母像，带镀金的银衣饰的圣像，值——嗯，值六个卢布。我看得出来，她很珍惜圣像，要当没有取下衣饰的整个圣像。我告诉她：最好是把衣饰留下来，把圣像带回去；她像有点那个，毕竟是一个圣像。

“是不是不准您收？”

“不是，不是不准，而是您自己也许……”

“那您就摘下来吧。”

“您听着，我不想摘，我想把它摆在那边的神龛里，”我想了想说道，“跟别的圣像一块，放在神灯下面（从开当铺起，我的神灯就一直点燃着），您干脆就拿十个卢布吧。”

“我不需要十个，给我五个就够了，我一定要来赎。”

“不想要十个吗？圣像可是值十个啊！”（我发现她的眼睛又闪烁了一次，我就补充说了一句。她没有做声，我拿出五个卢布交给她。

“不要蔑视任何人，我自己也受过罪，而且比遭罪还坏，如果您现在看见我在干这种行当就……这是因为我在经过全部遭遇之后才……”

“您是在报复社会？是吗？”她冷不防地打断了我的话，她的语气里含有相当尖刻的嘲讽，同时也含有很天真朴实的成分。（就是说，对人人都一样的嘲讽，因为那个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所以她的话可以说是没有恶意的。）“啊！”我想，“你原来是这样的，性格露出来了，性格中的一个新的方面。”

“您看，”我立刻以半开玩笑半神秘的口吻接着说，“我是总想作恶却总行了善的那种力量的一部分……”①

她立即流露出带着许多稚气的十分好奇的神情望着我说：

“等一等……这是什么思想？从哪里来的？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别伤脑筋了，这是梅菲斯特向浮士德做自我介绍时说的话。读过《浮士德》吗？”

---

①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第1部中《书斋》一章。

“没……没细读过。”

“那就等于根本没有读。应该读一读。不过，我发现您的嘴上又露出嘲讽的笑容了。对不起，请不要以为我那样低级趣味，为了美化自己的当铺掌柜身份，把自己比做梅菲斯特。当铺掌柜就是当铺掌柜。这我知道。”

“您这人真怪……我根本就没有那样看您……”

她本来想要说：我没有想到您是个有教养的人，但没有说出口，可是我知道，她是这样想的；我使她非常满意。

“您看，”我说，“人不管是在什么处境下都能做点好事。我当然不是在说自己，我，比方说，除开坏事外，什么都没有做，然而……”

“当然是在任何处境下都可以做点好事，”她一边说，一边用敏捷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在任何处境下。”她突然又加了一句。噢，我至今还记得，所有这些一瞬间的动作我全都记住了！我还想补充说的就是，这些年轻人，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一旦想说点什么聪明的、真挚动人的话，立刻就十分真诚地、稚气十足地在脸上表现出来，“我这就要对你说聪明的、真挚的话”，这并不是像我们这种人似的，出于虚荣心理，你知道，这是由于她自己极其珍视这一切，相信这一切，尊重这一切，她认为您也像她一样尊重这一切。啊，真诚！他们就是靠真诚降服一切。而在她的身上这又是多么迷人呀！

我都记得，一点儿也没有忘！她一走开，我就下了决心。在当天我就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探询，我还不知道的有关她的一切，她目前的底细，全都了解到了；她以前的底细我全是从卢克里娅的口中打听到的，卢克里娅曾经在她们家干过活，我前几天就贿赂了她。这个底细可怕极了，我竟然无法理解，她怎么还能像刚才那样笑得出来，自己处在那种可怕的境遇中，怎

么还能对梅菲斯特的话那样感兴趣。然而——这是年轻人！当时我自豪而喜悦地想到她的时候，想到的正是她的这一点，因为这里就有心灵的豁达。这就是说，我虽然身临绝境，歌德的伟大语言依然在闪耀着光辉。青春即使只是一点点，即使是被扭曲的，那也永远是豁达的。我这里说的是她，是她一个人。主要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她看做是我的，我也不怀疑自己的力量。你们知道，假如一个人对自己没有怀疑了，这个想法就是极具诱惑性的。

可是我是怎么啦？要是我还这样继续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一切都理出个头绪来呢？快点吧，快点吧——事情完全不出在这里，噢，天啊！

## Ⅱ 求婚

我用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我所了解的她的“底细”：她的父母都死了，早在三年以前就死了，留下她一个人跟着两个杂乱无章的姑姑过活。说她的两个姑姑杂乱无章是太轻了。一个姑姑是寡妇，一大群孩子，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另一个还没有出嫁，可恶的老处女。两个姑姑都可恶。她的父亲是个小官吏，录事出身，不过是个非世袭贵族——一切对我都有利。我称得上是来自上层社会：总算是堂堂正正的退伍大尉，世袭贵族，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等等，至于当铺，只能引起两个姑姑的敬重。她在姑姑家里奴隶似的干了三年活，但她竟然还通过了某处的考试，——考试成绩不错，她是从残酷无情的劳动中挤时间准备考试的，——这就表明她是在为生活得更高尚更美好而挣扎！可是我为什么想要娶她呢？不过，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留待后面再谈……问题未必就在这里！她教姑姑的孩子们念书，缝内衣，到后来就不仅是缝内衣，虽然她肺部有

病，还要她擦洗地板。甚至干脆动手打她，责骂她吃闲饭。最后是盘算把她卖出去。呸！我不想细说这些肮脏事了。后来她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有个邻居是小铺子的胖掌柜，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小掌柜，他有两座店铺，有整整一年的工夫，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已经折磨死了两个妻子，正在找第三个，一下看中了她，说她“文静，贫苦出身，为了没妈的孩子，我也要娶她”。不错，他是有几个没妈的孩子。他于是来求婚，跟两个姑母商谈起来，再加上他已五十岁；她可是吓坏了。于是，她就常往我这里跑，张罗《呼声报》的广告费。最后，她请求姑母们留给她一点点考虑的时间。给了她一点儿时间，但只给这一回，再也不给了。她们难为她说：“就是没有这张多余的嘴，我们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我早已知道这一切，在那天早晨之后我就下了决心。那一天的晚上商人就去了，从小铺带去一磅值半个卢布的糖；她陪他坐着，我就把卢克里娅从厨房叫出来，要卢克里娅小声告诉她，说我在门口，有件事情急着要对她说。我觉得自己干得很漂亮。总的说来，整个那一天我都得意扬扬。

她已经因为我把她叫出来而感到诧异，我在门口当着卢克里娅的面就向她说明，我把这看做我的幸福，我的荣幸……其次，请她不要对我的行为和在门口跟她谈话感到奇怪，我说：“我这个人是个直筒子，这件事的全部情形我都仔细想过了。”我说我是个直筒子并不是说谎。好啦，不说这个。我的话不光是说得很得体，就是说显出了我这个人有教养，而且说得不落俗套，这是最重要的。这算不了什么，难道承认这一点还是罪过？我愿意认清自己，也正是在这样做。我应该表示 pro 和

contra[1]，我也在这样说。我事后回忆起来还感到很愉快，虽然有点儿笨拙：那时我也没有感到任何难为情，坦率地向她说明，第一，我不是很有才能，不是很聪明，也许还不是很善良，还是一个相当自私自利的平庸的人。（我还记得这句话，当时我是在去的路上想好的，我一直为这句话感到得意。）另外还说了——非常，非常可能——在其他方面我还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毛病。这些话都是我怀着特殊的自豪感说出来的，——谁都知道应该怎样说这些话。当然，我还多少有一点儿水平，不至于在坦诚相见地讲出自己的短处之后，不去谈一谈长处，于是说："不过另一方面，我还有这样那样的长处。"我看出来，她这时还是怕得要死，但我并没有把话说得缓和一点，不但没有缓和，我在看到她害怕的情形时，还故意加重语气直截了当地说给她听：吃穿不用愁，可是穿戴讲究的衣着，在戏院和舞会进进出出，这些都做不到，除非日后我达到目的。我很欣赏自己这种严厉的语气。我又尽量从容不迫地接着说：既然我干上这一行，也就是开当铺，我就只有一个目的，这样说吧，有那样一种情况……不过，我是有权利那样说的：我确实有那种目的和那种情况。慢一点，先生们，我一辈子都在憎恨这个当铺，要说恨当铺，没有人超过我，自己对自己说，使用玄虚莫测的语言，说来可笑，其实，我实际上是在"向社会进行报复"，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她在早晨说的关于我是在"报复"那句挖苦我的话是不公正的。就是说，你们知道，我要是实实在在地告诉她："是的，我是在向社会进行报复。"她会像不久前的早晨那样哈哈大笑起来，事实上也真的可笑。嗯，原来用间接的暗示，用玄虚莫测的语言倒是可以

---

① 拉丁文：赞成和反对。

唤起想象。再说，我那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其实我知道，无论如何她也会觉得，那个胖掌柜比我更讨厌，我站在大门口竟成了前来搭救她的人。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唉，一个人对卑鄙的事是特别容易心领神会的！不过，这是卑鄙吗？在这种情形下应该怎样评价一个人呢？就在那个时候我难道不是已经在爱她了吗？

等一等，很清楚，关于我的行为高尚的话我对她半句也没有提，相反，噢，完全相反，我说的是："得到恩赐的是我，而不是您。"我抑制不住自己，竟脱口把这些话说了出来，大概显得很笨拙，因为我看见她很快皱了一下眉头。不过，整个说来，我肯定是赢了。等等，假如把这些卑鄙的事全都说出来，那就把最后那件肮脏事也说出来：我站在那里，可是心中却在打量：你身材修长匀称，有教养，还有——最后，说实在的，你模样俊俏。这就是我头脑里想的。不必说，她当时站在门口就对我说了"愿意"。然而……然而，我必须再加上一句：她站在门口在回答我"愿意"之前，想了很久。她想呀，想呀，我真想问她一句："怎么样？"——我终于忍不住了，于是不失身份地礼貌地问了她一句："嗯，怎么样？"

"请让我再想一想。"

她那张小脸严肃极了，严肃得我当时就能看透她的意思！我觉得受到侮辱："我想，莫非她在我和商人中间进行选择？"唉，当时我还不明白！当时我还一丁点儿都不明白！直到今天也没有明白！我记得，在我往回走的时候，卢克里娅随后赶来，她站在路中间连呼带喘地说："先生，您娶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姐，上帝会保佑您的，您可不要把我的话告诉她，她很高傲。"

嗯，高傲！可以说，我自己就喜欢高傲的人！当你……

嗯，在你确信自己对他们有威力的时候，高傲的人就特别好，是不是这样？唉！我这个卑劣、蠢笨的人！噢，我是多么自鸣得意！要知道，她为了回答我“愿意”而站在门口沉思默想，而我则觉得奇怪的时候，你是否知道，她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无论在哪里都注定是不幸，干脆挑一个最坏的，就是说挑胖掌柜，岂不更好，可以让这个醉鬼快点打死！”是不是这样？您想她可能有这种想法吗？

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现在也一点儿都不明白！我刚才只是说她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从两种不幸中挑选最坏的，就是挑选商人？可是她认为谁更坏——是我还是商人？是商人还是能引用歌德诗句的开当铺的人？这还是问题！什么问题？你连这也不明白：答案就躺在桌子上，可你还在说“问题”呢！不过我算不了什么！问题根本不在我身上……再说，问题在我还是不在我——现在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上床睡觉。我头疼……

## Ⅲ　最高尚的人，但我自己却不相信

我睡不着，我头脑里似乎有条什么脉搏在叩击。我真想把所有这一切，把所有这些龌龊的事情全部了解清楚，唉，真龌龊！唉，我那时是把她从什么样的污泥中拉出来的！其实她本该明白这一点，理解我的行为是可贵的！还有各种各样想法都让我高兴，比如，我是四十一岁，她刚十六岁。这也是让我陶醉的思想，这是不平等的感受，这是非常愉快，非常愉快的感受。

我想，例如，à l’anglaise[①] 结婚，就是说，只有我们两个

---

① 法文：按照英国方式。

人，再加上两个证婚人，其中一人是卢克里娅，然后就登上火车，比方说，去莫斯科（在那里我凑巧有事情要办），在旅馆里住两个星期。她反对，她不同意，她强邀我像对岳父母那样去向她的姑母表示敬意。我让了步，她的姑母们也得到应得的一切。我甚至给这两个女人每人一百卢布，并答应以后还要给。对她当然没有说这件事，免得这种卑微的处境使她难过。她的两个姑姑马上就变得服服帖帖。在嫁妆的事上也有过争论：她什么嫁妆也没有，几乎是一无所有，不过她什么都不想要。但是我说服了她，什么都没有是不成的，我也就置办了嫁妆，因为谁能够为她做点什么呢？嗯，关于我用不着说了。那时我终于能够把我各种各样的想法告诉她，使她至少能够了解我。可能是有点儿匆忙了。重要的是，尽管她拘谨，她从最初就是满怀着爱投向我的。每逢傍晚我去她那里时，她总是兴高采烈地接待我，轻声细语地（天真无邪的、令人迷醉的轻声细语！）述说自己童年、幼年时代的一切，讲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而我则总是立即给这种沉醉于喜悦的心情浇冷水。这是我打定的主意。对她的兴高采烈我报之以沉默，自然，我的沉默是善意的……不过她还是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两个人是不同的人，我是一个谜。而我呢，主要的盘算就打在这个谜上！也许我正是为了叫人猜这个谜，才干了这些蠢事！头一件蠢事就是严厉。我是以严厉的态度把她领进家的。总之，那个时候我虽然是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我还是建立了一套规矩。噢，这套规矩毫不费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事情只能是这样，由于不可抗拒的情况我必须建立这套规矩。我怎么啦，事实上，我这不是在作践自己吗！规矩是名副其实的规矩。不，你们还是听我说吧，假如要判断一个人，那就要弄清事情再判断。你们还是听下去吧。

怎样开头呢，因为这是非常难说的。你要想为自己辩解——这就难办了。请看吧，举个例子说，青年人蔑视金钱，——我就喋喋不休地谈论钱；话题离不开钱。说得她越来越沉默不语了。她睁大了双眼，听着我说，眼睛盯着我，可是一声不响。你们知道青年人的心灵是豁达的，这是指的好青年，豁达，但容易冲动，涵养不够，稍有一点儿看不惯，就报之以蔑视。而我则想要使她开朗些，想把开朗的心情直接灌注到她的内心去，灌注到她待人接物的内心态度上去，我想的不就是这样吗？我拿一个俗气的例子来说吧：我该怎样来向她这种性格的人解释我开当铺呢？显然，我不能开门见山地提这件事，否则就变成我请她原谅我开当铺，可以说，我是用我的傲慢做了这件事，差不多是用沉默说明的。我是用沉默说话的能手，我在沉默中度过了我的一生，独自一人在沉默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要知道，我是个不幸的人！我是被所有的人抛弃的人，被抛弃掉，又被遗忘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这个十六岁的姑娘忽然从一些无耻之徒的道听途说中听到关于我的一些琐事，她就以为什么都知道了，其实，隐秘的东西全都留在我这个人的心中。我始终在沉默，特别是对她保持沉默，一直沉默到昨天——为什么沉默？因为我是性情高傲的人。我指望她自己弄明白，不用我说，也不是凭那些无耻之辈的传言，而是她自己看清楚这个人，理解这个人！我把她接进自己的家中，希望得到她的充分尊重。我希望她站在我的面前，为我遭受的苦难而祈祷，——我是受之无愧的。啊，我这个人一向是高傲的，我的要求向来就是要么全部到手，要么什么都不要！就是因为我对幸福的要求不是有一点儿就满足的人，而是要求得到全部，——就是因为这个，那时候我的态度才只能是这样，似乎在说：“你自己去琢磨，自己去

衡量吧！”你们一定会同意的，假如我自己向她解释，开导她，讨好她，请求她尊重我，——这就等于乞求她的施舍……不过……不过，我何必说这些呢！

愚蠢、愚蠢，愚蠢透了，愚蠢透了！我直截了当地和残酷无情地（我要着重指出残酷无情）用两句话向她解释说，青年人的豁达是很可爱的，但是——这种豁达一文不值。为什么一文不值？那是毫不费力就得来的，不是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可以说，那全是“日常生活的最初印象”[①]，我们还是从事业上看看你们吧！廉价的豁达任何时候都是容易的，甚至为它付出生命，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只需要热血沸腾，精力充沛，对美好的追求就够了！不，那就再看看另一种豁达的壮举吧，艰巨，无声无息，默默无闻，没有耀眼光辉却招致诋毁，做出许多牺牲却没有一丝荣耀，——在这种壮举面前，你们，光彩夺目的人，在人们的眼中被看成卑鄙小人，其实你们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就是这样，你们试一试这样的壮举吧，不，你们会拒绝的！可是我呢，我这一生所做的就是这种壮举。起初她还问这问那，到后来她就默默无言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吃惊地睁着眼睛，瞪得大大的，大大的，倾心地听。可是……可是除此之外，我突然看见她微微一笑，这是不信任的、默默无声的、不怀好意的笑。我就是把面带这种笑容的她领进了我的家。确实也是，那时她已走投无路……

## Ⅳ 全都是计划，计划

那么，我们两人是谁先开的头呢？

---

① 引自普希金的《恶魔》（1823）一诗，但与原文有出入。原诗是：“从前，我对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切印象都觉得新鲜。”

谁也没有。从第一步起就是自然而然开始的。我说过，我把她接进家门的时候，态度是严肃的，然而刚迈出一步我就变软了。

她还是我的未婚妻的时候，我就向她说明白了，由她收纳典当的物品和付钱，其实她那时什么话也没有说（请注意这一点）。不光是没有说话，做起事来的时候还很热心。哦，当然，住房、家具——这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住房一共是两间：一间是宽敞的厅屋，一部分隔开做铺面，还有一间，也很宽敞，是我们的活动房间和卧室。我的家具很简陋；还不如她姑姑家。我的神龛和神灯放置在铺面的房间里；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柜橱，里面有几本书和一个箱子，钥匙在我身上；嗯，那儿还有一张床和桌椅。她还是我的未婚妻的时候我就向她说了，我们过日子的费用，就是我、她以及我想法挖过来的卢克里娅的伙食每天一个卢布，不能超出。我说："在三年之内我必须积攒三万卢布，不然，钱就攒不起来。"她没有反对，是我自己把每天的花销多加了三十戈比。看戏的事也是这样，我跟她说定不看戏，可是又改为一个月看一次，还是在体面的池座。我们一块去的，看了三次，看的好像是《追求幸福》[①] 和《会唱歌的鸟儿》[②]。（噢，算了，不谈这个！）沉默不语地去又沉默不语地回来。为什么我们从开头就沉默，为什么呢？要知道，开头并没有吵嘴，可也沉默。我记得，那时她好像总是在偷偷地用眼瞧我；我一发现她这样看我，就更加沉默。说实在的，是我打定主意要沉默，而不是她。她有那么一两次感情冲动，扑过

① 是俄国剧作家 П. И. 尤尔克维奇（？—1884）的剧作。
② 即法国（原德籍犹太人）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奠基人之一奥芬巴赫（1819—1880）的轻歌剧《别里科拉》（1868）。

来拥抱我；但这种冲动是病态的，歇斯底里的，而我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幸福，出自她对我的尊敬的幸福，所以我就冷淡地回报了她的感情冲动。我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每一次冲动过后第二天就吵架。

这样，嘴总算是不吵了，但依然沉默，她露出倔强的神情。其实就是“反抗，要自己做自己的主”，只不过她不知怎样做罢了。的确，这副温顺的面孔越来越暴躁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她觉得我讨厌了，这是我观察出来的。至于她抑制不住自己而不止一次发火，这是毫无疑问的。就这件事来说吧，她虽然出身贫寒卑微，擦洗过地板，可是突然嫌弃起我们的贫穷了！其实，这不是贫穷，而是节俭，在应该讲究的时候——还是阔气的，比如床单内衣之类要保持清洁。我以往一直想象丈夫的纯洁会熏陶妻子。实际上，她不是嫌弃贫穷，而是嫌我花钱似乎太吝啬了。她说：“人家是有目的的，要显示坚强的性格。”她忽然拒绝去看戏了。冷嘲热讽的劲头越来越厉害……我呢，就越发沉默，越发沉默。

这不是在为自己开脱吗？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当铺。请听我说：我知道，女人，况且是十六岁的女人，不能不完全听命于男人。女人没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一公认的道理即使到现在，即使到现在我也是这样看！在堂屋里躺着一个人，那又怎样：真理终究是真理，穆勒①本人也毫无办法！热恋中的女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论著《论妇女受压制》（1861）于1869年在俄国出版了两个译本，俄国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对此书发表了详细的评析文章《妇女问题》。当铺掌柜的观点出自尼·斯特拉霍夫在文章中引用的穆勒的下述一句话：“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当代妇女的作品，并拿它们与男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作品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发现，它们能够招致批评的全部缺陷（转下页）

人，噢，在热恋中的女人的眼里连她所爱的人的恶德暴行都是神圣的。男人为自己的罪恶行为找不到的辩解她都能想得出来。这是宽宏大度，但却不是什么独特个性。就是这种无个性把女人给毁灭了。我再说一遍，你们把桌子上躺着的人指给我看，那又怎样呢？难道桌子上躺着的人就表明独立个性吗？哎——哎！

请听我说：我最初是相信她的爱情的。当初就是她常常扑到我的怀里拥抱我。她爱我，说得确切些就是她愿意爱我。主要是我没有任何需要她寻找理由为我辩护的罪恶行为。你们会说我是“当铺掌柜”，人们也都是这样说。可是，我是“当铺掌柜”又怎样呢？如果一个心地最宽厚的人成了“当铺掌柜”，那就是说是有原因的。先生们，你们知道，有些想法……就是说，要是把有的想法说出来，用语言表达出来，你就看吧，那是极愚蠢的。自己都会觉得害臊。那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些废物，都不喜欢真理，或者是我不知道的原因。我刚才说过“最宽厚的人”。这有些可笑，然而事情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真理，就是说，是最最真实的真理！的确，当时我“有权利”要保障自己的生活，开这个当铺：你们都排斥我，你们，就是大家，都以轻蔑的沉默驱逐我。你们用使我终生难忘的屈辱回报我对你们的满腔热情。因此，现在我有权利

(接上页) 几乎毫无例外地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同时应该承认，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最主要的缺陷：缺乏独特个性……”当铺掌柜企图拿这个思想为自己开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斯特拉霍夫的观点，在《群魔》与《作家日记》中与斯特拉霍夫进行争论。按：穆勒在其《论自由》和《论妇女受压制》中，主张个人要有最充分的可能的权利，并认为，压制妇女对社会的损失比对妇女更大。

用一道墙把我自己同你们分隔开，积攒三万卢布，然后在克里米亚的某个地方，要在克里米亚的南岸，在丛山和葡萄园中，在自己用三万卢布购置的田园里度过自己的余生，最主要的是要远远离开你们，但不怨恨你们，心灵怀着理想，心头有自己珍爱的女人，如果上帝肯恩赐的话，还有一个家庭，同时要帮助周围的居民。很清楚，好在这是我现在的自言自语，不然的话，假如我当初把这一切全都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她，那还会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傲慢地沉默不语，为什么我们两个都相对无言。因为她能明白什么呢？她才十六岁啊，刚刚步入青春，——她能够从我自己的解释中，从我经历的苦难中理会什么呢？在她的身上是直率、对生活的无知、青年人的廉价信念、“美好心灵”的盲目性，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当铺，这就一切都完了！（难道在当铺里我是恶人，她难道看不见我是怎样为人的，我什么时候拿过不该拿的钱?）唉，世上的真理多么可怕！这个迷人的人，这个温顺的女人，这个天神——她是暴君，是我心灵无法承受的暴君，折磨者！我要是不把这些都说出来，那就等于我自己诋毁自己！你们以为我不爱她吗？谁能说我不爱她呢？看吧，这是嘲弄，这是命运和大自然的恶意嘲弄！我们是被诅咒的，总的说来，人们的生活都是被诅咒的！（我的生活尤其是这样！）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错在哪里！这里面有的事情不对头。一切都清楚了，我的计划清楚得如同白昼：“严厉，高傲，不要任何人的精神安慰，默默地受苦受难。”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我没有说谎，没有半句谎言！“以后她会明白这是宽宏大量，只不过她还没能看到这一点——总会有那么一天她会恍然大悟，到那个时候她会十倍地看重我，跪在地上合手向我膜拜。”这就是我的计划。不过，这里我好像忘掉了点什么，不然就是疏忽大意了。这里头有的

事情我没能办到。不过够了，够了。现在还能向谁请求宽恕呢？完结了就是完结了。你这个人啊，勇敢些，照旧高傲！你没有过错！……

好吧，我要讲真理，我要无所畏惧地面对真理：是她的过失，是她错了！……

### V 温顺的女人反叛了

吵闹开始了，开头是因为她忽然异想天开地要自己决定付多少钱，她的估价总要高出物品所值的价钱，有两次竟然为这事跟我发生口角。我不赞成她。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这位大尉的寡妇。

大尉的寡妇老太太拿来一件颈饰——已故丈夫的礼物，嗯，显然是纪念品。我付给她三十卢布。她可怜巴巴地诉起苦来，要求把东西保管好，——自然啦，我们是要保管好的。嘿，简要地说吧，过了五天她忽然来了，要用一只手镯换回颈饰，手镯八个卢布都不值；我自然拒绝了她。看来她当场就从我妻子的眼神上猜到了一点儿什么，她趁我不在的时候又来了，我的那一位就把颈饰换给了她。

在当天我就知道了，我委婉地，但坚决地、通情达理地跟她谈了一次话。她坐在床边上，眼睛盯着地，右脚尖在地毯上划来划去（这是她的习惯姿势）：嘴角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那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提高声音，心平气和地宣布说，钱是我的，我有权利用我的眼光来看待生活，还说了当我把她请进自己家门的时候，我对她没有隐瞒任何事情。

她忽地跳了起来，全身突然颤抖起来，——你们猜怎样——忽然冲着我跺起脚来；这简直是头野兽，这是发狂，是野性大发的野兽。我都吓呆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料到的举动。

但是我没有惊慌失措，我甚至连动也没有动一下，依然用刚才那种温和的语气直截了当地宣布说，从现在起不准她再参与我的经营。她冲着我的脸哈哈大笑着从家中走了出去。

事情是这样的，她没有权利离开家。没有我，她哪儿也不能去，这是我们早在结婚前就约定的。一直到傍晚她才回到家里，我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出去了，第三天又是这样。我锁上了当铺，到她姑母家去。从结婚那天起我就和她的姑姑们断绝了来往——既没有请她们到自己家来，我们自己也没有到她们家去。原来，现在她也没有去过她们那里。她们满有兴趣地听完我的话，就当面嘲笑起我来，她们说，“您这是活该。”不过，我也料到她们是要嘲笑的。我在那里买通了那个岁数小的姑母，那个老处女，答应给她一百个卢布，先给二十五。过了两天她来到我家里告诉我说：“有一个叫叶菲莫维奇的中尉军官，是您从前一个团队里的同事掺和到这件事情里边来了。”我惊讶极了。这个叫叶菲莫维奇的在团里叫我吃的苦头比谁都多，可是一个月以前，他到我这里来了一次，以后又来过一次，他恬不知耻，说是来典当。我记得，那时他就开始跟我妻子说笑。当场我就走到他跟前，提醒他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许他再来找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类事情，只不过认为他是个无赖而已。可是现在姑姑突然告诉我，他们之间有约会，全部事情都是她两个姑姑从前的一个熟人从中撮合的，这个人是尤莉亚·萨姆索诺芙娜，还是一个上校的寡妇。这个姑姑说：“眼下您的太太就是到她那里去了。”

这些情况我就说得简单点。这件事情一共花去了三百来个卢布，用了两天时间做出这样的安排，我躲在隔壁房间虚掩着

的门后面，听我妻子与叶菲莫维奇两个人的第一次 rendez-vous[1]。在预期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她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对我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争吵。

她在傍晚之前回到家中，坐在床沿上，以嘲讽的目光望着我，用脚尖敲击着地毯。我望着她的时候头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在最后这整整一个月里，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在这件事发生前的最后两个星期里，她变得完全不像她自己了，甚至可以说，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成了一个暴戾的人，无理取闹的人，我不能说她不知羞耻，但却可以说是不循规蹈矩、寻衅滋事的人，硬要吵闹。然而温顺的性格牵制了她，每当她要大吵大闹的时候，即使是太过分了，可是总还看得出来，她这是在自己勉强自己，自己驱使自己，首先是她自己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洁白无瑕的心境和羞耻感。正因为是这样，这种人胡闹起来有的时候就过分越轨，竟至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目睹。而习惯于放荡不羁的人则恰恰相反，总是和颜悦色，做起事来则卑鄙无耻，表面上却装作温文有礼，还自以为高人一等。

“人家说，您是因为胆怯不敢决斗，被从团队里赶出来的，这是真的吗?”她劈头盖脸地猛然问道，眼睛睁得亮晶晶的。

“是真的；军官们裁决要我离开团队，虽然在这之前我自己已经提出报告要求退役。”

“被当做胆小鬼赶出来的?”

“是的，他们判决我是胆小鬼。但是我拒绝决斗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不愿意服从他们那种专横的判决，在不认为自己受到侮辱的情况下要求决斗。您知道吗，——我这时没有控

---

① 法文：幽会。

制住自己，就脱口而出，——挺身而出，用行动反抗他们那种专横并且承受由此引起的全部后果——这就要拿出比任何决斗更大得多的勇气。”

我没能抑制住自己，我这句话似乎在为自己辩解；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就是再一次使我受辱。她歹毒地笑起来。

“据说，您从这以后的三年里像个流浪汉在彼得堡的街头游荡，乞讨施舍，在弹子房的桌底下过夜，这也是真的吗？”

“我还常在干草市场的维亚泽姆斯基大院①里过夜。对，是真的；离开团队之后，我在生活中遭受过很多耻辱，我也曾堕落过，但在道德上并没有堕落，因为即使在那种情形下我自己也憎恶自己的行为。这只是我的意志和头脑的堕落，是我的绝望的处境造成的。不过，这一切都已过去了……”

“嘿，现在您是个人物，是个财主了！”

显然这是指当铺说的。不过我已经克制住自己了。我看得出来，她在心急火燎地等待我再说有损我的尊严的解释——可是她没有等到。恰巧这时来典当的人拉响了门铃，于是我就走到厅里去接待来典当的人。后来，过了一个钟头，她忽然换上衣服要出去，这时她走到我面前说：

“在结婚之前，关于这些事您可什么也没有跟我说过，是不是？”

我没有吭声，她就走了。

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就站到那个隔壁房间的门后，想听一听决定我的命运的谈话，在我的衣袋里装着一支手枪。她穿得整整齐齐坐在桌旁，叶菲莫维奇则站在她面前装模作样。结果呢，结果与我的预感、我的设想一点儿不差，虽然我并没有察

① 彼得堡的大贫民窟和罪恶渊薮。

觉我有这种预感，有这种设想（我说的这些是我的光荣）。我不知道，我是否都说明白了。

结果就是这样。我听了整整一个钟头，整整一个钟头我都置身于一个正大光明的、高尚的女人同一个上层社会放荡无羁的、愚蠢的、心灵卑鄙的家伙的较量。我大吃一惊，我在想，这个天真的女人、温顺的女人、寡言少语的女人从哪里知道的这一切？美德对罪恶的这种嘲笑、这种最天真的纵情取笑和神圣的蔑视的场面，就连最机智的上流社会喜剧作家也绝写不出来。在她的话、她的片言只语里面闪耀着多少光辉；她的敏捷回答多么机智，她的斥责是多么真切！与此同时，她的话里又有那么多几乎是少女般的真诚。她面对面地取笑他的爱情表白，取笑他的姿态，取笑他的求婚。他是抱着粗鲁行事的打算来的，没有料到会碰壁，他一下子就泄气了。开头我还以为她不过是在卖弄风情——“虽然是堕落的但却还机智地一个人为了抬高自己而故意卖弄风情。”然而，不是这样，真理皎如白日，没有怀疑的余地。只是由于对我的憎恨，无中生有的、突然爆发的憎恨，她，阅世不深的人，是能够想出安排这个约会的，可是事情一开始——她立刻清醒了。为了侮辱我，可以不择手段，她费尽了心机，然而一旦下决心采取这个龌龊手段时，她又极其厌恶这种放荡行为。她这样一个纯洁无瑕的、有理想的女人岂能受叶菲莫维奇或者任何一个上流社会的败类的诱惑？刚好相反，他只能惹起嘲笑。整个真理从她心灵升腾起来，愤懑从她的内心唤起刻薄的嘲讽。我再说一遍，这个小丑到后来垂头丧气，皱着眉头坐在那里，有气无力地回答着话，这倒使我担起心来，他会不会为了卑鄙的报复而不择手段地侮辱她。我还要再说一句：我听完了这场谈话并没有感到一点儿惊愕，应该说这是我早就料到的。我好像是碰到一件熟悉的事

情。我像是为了办这件事才到那里去的。我在去的路上并不相信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责怪任何人，别看我在衣袋里藏了手枪，——事实的确是这样。难道我能够把她想象成为另外一个人吗？我凭什么爱上了她？我凭什么看重她？又凭什么娶了她？噢，不必说，我是过于相信她当时对我的憎恨了，我同样深信她是清白无辜的。我把门一开，突然打断了这场戏。叶菲莫维奇一下子蹦了起来，我拉住她的手，请她跟我走。叶菲莫维奇马上反应过来，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起来：

“噢，我不反对神圣的夫妻权利，领走吧，领走吧！您要知道，”他在我身后喊道，“虽然一个有身份的人不应该跟您决斗，不过，出于对您太太的尊重，我奉陪到底……当然，如果您肯冒险的话……”

“您听见了吧！”我拉住她在门口稍停了一下说道。

后来在走进家门之前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牵着她的手，她也没有反抗。相反的是，她看上去极为震惊，不过这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的样子。一进家门她就坐在椅子上，用眼睛盯着我。她显得异常苍白；嘴立即撇起来，露出嘲笑的神情，眼光却流露出庄重严厉的挑战神气。看来，在最初那一瞬间，她真的相信我会开枪打死她。但是，我沉默地从衣袋中掏出手枪，放到桌子上。她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枪。（请注意：她熟悉这支枪。起初开当铺的时候我就买了这支枪，装进了子弹。当铺一开张我就决定不饲养大的护家犬，也像莫泽尔当铺那样，不雇用彪形大汉做仆人。我这里由厨娘给来客开门。但是，干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不能没有自卫的措施以防不测，于是我就购置了这支装上子弹的手枪。她初到我家的那些日子，对这支枪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问这问那，我甚至向她讲解了枪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另外，还说服她对准目标放了一枪。这一切

都请注意。）我没有去理她那惶恐的目光，脱下外衣就躺到床上。我已经很累了；这时已经十一点左右。她连窝也没有挪，一直坐在原来的地方，又这样坐了一个来钟头，后来熄灭了蜡烛，和衣躺到靠墙的沙发上。她这是第一次不同我睡在一张床上，——这一点也请注意……

## Ⅵ　可怕的回忆

现在说说这幕可怕的回忆……

我在早晨醒过来，我想，大约快八点了，房间里差不多已经大亮了。我一醒过来头脑就很清楚，马上睁开眼。她站在靠桌边的地方，手里握着那支枪。她没有发现，我已经醒过来，并且正在观望她。突然间我看到，她手中握着枪向我走过来，我立刻闭上眼，装成熟睡的样子。

她走近床沿，站在我身旁。我全都听见了；虽然紧接着就如同死亡笼罩一切似的沉寂，然而就连这样的沉寂我也能听见。这时猛然发生了一次痉挛似的动作——我也忽然憋不住了，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她面对面地望着我，盯着我的眼睛，手枪已经对准我的太阳穴。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但我们对看不过一刹那的工夫。我强使自己闭上眼睛。就在那一刹那间我用发自内心的全部力量决定再也不动，不睁眼了，无论等着我的是什么。

实际上，的确是有这种情况的，睡得很实的人突然睁开眼，有的还把头抬起一小会儿，向房间周围瞥一眼，然后，过那么一瞬间，又毫无意识地把脑袋放到枕头上，睡着了，什么都不记得。在我同她的目光相遇，并感觉到太阳穴上的手枪的时候，突然又闭上眼，跟沉睡的人似的一动也不动，——她完全可以认为，我真的是在睡觉，什么都没有看见，何况像我这

样看见了我所看见的事情之后在那么一刹那的工夫重又闭上眼睛，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的确，不可想象。不过她还是可能猜到了真实情形，——这个想法也在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过，这也是在那一瞬间产生的。噢，就在不到一眨眼的工夫一阵多么强劲的思想和感受的旋风在我的头脑中一掠而过，人的思想的电流真了不起！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我觉得），她猜到了真实情形，知道我并没有睡着，那么我就是以我凛然赴死的气魄镇住了她，她的手现在就可能颤抖。从前的决心可能被新的异常印象所摧毁。据说站在高处的人似乎是自动地往下面，往无底深渊摔下去。我想，许多人的自杀与被杀之所以成为事实，仅仅是由于手枪已经握在手里。这里也是深渊，是四十五度的斜坡，非得顺着斜坡往下滑不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呼唤你扳动枪机。然而，我全都看见，全都知道，正默默地等待着从她那里来的死亡——可能是这种意识阻止了她从斜坡向下滑。

还是那样沉寂，突然间我感到太阳穴的鬓发边上有一块冰凉的铁器。你们会问：我强烈希望幸免于难吗？我像对上帝那样回答你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即便有也不过是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为什么要等死呢？那么，我要问：我倾心爱慕的人举起手枪对准了我，我再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不仅如此，我的生命的全部力量告诉我，此时此刻我们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较量，可怕的生死搏斗，进行决斗的正是昨天那个因为怯懦而遭同事们驱逐的胆小鬼。我明白这一点，她只要猜到真实情况，知道我并没有睡的话，她也会明白这一点。

也许那时的情形并不是这样，也许当时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就算没有想过，情形也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以后我的生命的每一个钟头我都在想着这件事。

那么你们又要提问题：你为什么不拯救她，使她摆脱罪恶的行为？唉，事后我也曾向自己千百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每一次，当我感到脊背上发凉时，我就想起那一片刻来。可是，那时我的心灵正陷于阴郁的绝望境地：我完了，我自己都完了，我还能够去救谁呢？你们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还要去挽救什么人呢？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有感受呢？

然而当时我的各种思绪纷纷涌现在脑海时，简直像沸腾似的；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房间里沉寂得如同死亡一般；她依然站在我身旁，——没有泯灭的希望使我猛然战栗了一下！我即刻睁开了眼。她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下了床：我战胜了，——她则永远失败了。

我走去喝茶。我们的茶炊向来是摆在前边的房间，茶一向由她来斟。我坐在桌旁一句话也没说，从她手上接过一杯茶。过了五分钟左右，我朝她看了一眼。她的脸色苍白得吓人，比昨天还厉害。她正在望着我。突然间——突然间她觉察到我在看她，她那苍白得没有血色的嘴唇轻轻地惨然一笑，眼神带着畏怯的疑问。“看来她心中的疑团一直没有解开，她在不断地揣测：他知道不知道，他看见了，还是没有看见呢？”我漫不经心地移开了目光。早茶过后我锁上当铺，到市场去买了一张铁床和一架屏风。回到家中就叫人把铁床安放在厅堂里，用屏风把床遮挡住。这床是给她用的，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就凭这张床，不用说她也明白了，我“全都看见了，全都知道”，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夜里我跟往日一样把枪放在桌子上。她一声不响地睡在自己的新床上：婚姻这条线算是扯断了，“她被战胜了，但是没有得到宽恕。”夜里她就说起呓语来，早晨发了热病。她在病床上躺了六个星期。

## 第二章

### Ⅰ　高傲的梦

卢克里娅立刻提出，埋葬了太太，她就不在我家待了，——她要走。我跪着祈祷了五分钟，我本想祈祷一个钟头，可是想了又想，全是沉痛的思想，头也在痛，——祈祷有什么用——全是罪过！我不想睡觉，这也是怪事：人在遭遇沉痛的、极其沉痛的悲哀时，在最初的几次强烈冲击之后，总是想要睡觉的。据说，被判处死刑的人在最后一夜睡得异常踏实。就是该这样，这是本能，否则就没有力量熬过这一夜……我躺在沙发上，可是睡不着……

……在她生病的六个星期里我们日日夜夜地守护在她的身边——我、卢克里娅，还有我在医院雇用的受过训练的护士。在钱上我毫不吝啬，我还愿意为她多花钱。我请的医生是施雷德尔大夫，每看一次病付给他十个卢布。她神志清醒之后，我就减少在她面前露面的次数了。其实我述说这些干什么。她的病痊愈之后，她就总是轻手轻脚地、不言不语地坐在我的房间的一张桌子旁，桌子也是我在这个期间特意为她买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彼此间一句话也不交谈；就是说后来我们才开始讲话，不过——说的全是无关紧要的话。我当然是故意不多说，可是我看得很清楚，她似乎也高兴不多说废话。我觉得从她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她受的震动太大了，失败得太惨了，"——我这样想，——"显然应该给她一段时间，让她忘却，让她习惯。"这样一来我们俩都保持沉默，不过我在心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下一步做准备。我想，她也是这样，我最关切

的是：现在她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还想说说，唉，当然啦，谁都不知道，在她生病期间我是多么痛苦，我为她多少次唉声叹气。但我是在内心里呻吟，背着卢克里娅把哀叹闷在心里。我不能想象，也不能设想，这一切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就死了。在她脱离了危险期，健康开始恢复的时候，还记得，我的心情马上就很平静了。另外，我打算把关于我们的未来的事尽可能推到以后再说，一切都维持目前的状况。那时我还有一种奇怪的、特殊的心情，我只能这样表达我的心情：我胜利了，仅仅这种心情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整整一个冬天就是这样过去的。嗯，我心满意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一个冬天都是这样。

你们想想看，我一生中有过那么一次可怕的意外遭遇，一直到我跟我妻子这件惨痛事件发生之前，它无时无刻不压在我的心头上，这就是——名声扫地和离开团队。用一两句话说，这是对我的专横不公。不错，由于古怪的性格，同事们不喜欢我，也许是由于可笑的性格，虽然常有这样的事情，你认为是高尚的东西，你内心珍藏的东西，你敬重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在你那伙同事看来却觉得可笑。唉，就是上学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人喜欢过我。我时时处处都不招人喜爱。就连卢克里娅也不会喜欢我。在团队里的事件虽然是由于人们讨厌我才造成的，不过，那也无疑是带有偶然性的。我要说这些话，是因为一个人的毁灭如果是由于本来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的事件造成的，是由于本来可以像一片浮云那样从身边飘浮而过的种种情况不幸地凑在一起而酿成的，那就没有比这更叫人委屈，更叫人愤愤不平的了。这是有教养的人的屈辱。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有一次看戏，我在幕间休息时走进小卖部。一个叫阿——

夫的骠骑兵突然闯进来，他当着在场的所有军官和观众的面大声同另外两个骠骑兵议论，说我们团里的别祖姆采夫大尉刚才在走廊里无理取闹，“看来是喝醉了”。他们的话就说到这里，但说的不符合事实，因为别祖姆采夫没有喝醉，也没有闹事，其实也没有出事。骠骑兵接着就换了话题，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到了第二天，闲话就传到我们团里，在团队里立刻就议论起来，说我们团队只有我一个人在小卖部，骠骑兵阿——夫无礼地谈论别祖姆采夫大尉时，我并没有走到阿——夫面前指责他，制止他。可是我凭什么这样做呢？如果他跟别祖姆采夫有仇，那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事情，我掺和进去干什么？然而军官们则认为这件事不是私人的事，而是事关我们的团队，既然我们团队的军官当时只有我在场，那就等于向在小卖部的所有军官和公众表明，在我们的团队里有些军官对自己的荣誉和团队的荣誉漠不关心。我不能同意这种论断。他们向我指出，事情到了现在虽然晚了，但是如果我愿意公开向阿——夫说清一切，我的事还可以挽救。我不想这样做。还由于愤慨，我高傲地拒绝了他们。紧接着立刻提出退役，——全部经过就是这样。我昂首阔步地离开了他们，但精神上却垮了。我的意志和思想再也振作不起来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我姐姐的丈夫在莫斯科把我们一家的小小家产全部挥霍掉了，其中也有我的小小一份，我落了个身无分文，流浪街头。我本可以在私人手下谋点事做，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穿过闪闪发光的军装之后我不愿在铁路上随便找个工作。那么，羞愧就羞愧吧，耻辱就耻辱吧，堕落就堕落吧，反正是越坏越好，——这就是我的选择。接下来就是三年的悲惨回忆，竟至落到维亚泽姆斯基大院。一年半以前，一个富有的老太婆，我的教母在莫斯科去世了，她在遗嘱中留给我的东西里面有一项是三千卢

布，这是意外之财。我反复思考了一阵子，于是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决意开当铺挣钱，然后找个安身之地，抛开过去回忆，过新的生活。——这就是我的计划。尽管是这样，暗淡无光的过去和我的无可挽回的被败坏了的名誉还是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我。但是我终于结婚了。这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我把她接进家门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找到一个朋友，我太需要朋友了。但是我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朋友是需要驯服的。我能不能向这个十六岁的、抱有成见的小姑娘立刻就把某些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呢？比如说，假如不是发生了可怕的手枪事件偶然帮了我的忙，我怎样才能够使她相信我不是懦夫，团队的同事把我作为胆小鬼来指控是不公正的？幸好手枪事件出现得正是时候。手枪的考验把我阴暗的过去全部洗刷净了。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她知道，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因为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在我的梦想中她就是我的未来的全部希望！她是我为自己找到的唯一的人，别人我不需要，——现在她全都明白了；至少她明白，她急不可待地同我的敌人站到一块是不公正的。这个想法使我打心眼里高兴。在她的眼里我再也不会是卑鄙小人，顶多不过是个怪人。但是，现在，在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并非那样不喜欢这种看法：古怪不是罪恶，相反，有的时候它还能够引起女性的兴趣。总之，我有意推迟事情的结局：已经发生的事情目前足够使我心平气和的了，而且还绰绰有余，这里面还包含着许许多多供我幻想的场面和材料。我是个幻想家，这也就是我的卑劣之处：我的材料足够了，关于她，我想等一等再说。

整整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冬天都在期待着什么。她有时坐在自己的桌子旁边，这个时候我总想悄悄地瞟她一眼。她干缝衣服之类的活计。傍晚，有的时候从我的书架上拿

本书读读。从书架上挑选书也应是对我有利的表示。她几乎是不出家门。每天午饭后黄昏前这段时间我都带她出去散步，活动活动身体，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句话都不说了。我尽量装出一副样子，好像我们都没有沉默，而且我们的话都很合得来，不过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敞开心思谈一谈。我是有意这样做的，对她，我觉得必须"给她时间"。显然很奇怪的是，一个冬天都快过去了，我竟然一次也没有想过，我喜欢悄悄地看她，可是在整个冬天我就没有碰上过一次她看我的目光！我想，她是没有勇气。再说，从她的外貌看上去，她是那样畏怯、柔顺，病后那样虚弱无力。不能急，最好还是等一等，到时候——"到时候她自己会突然向你奔过来……"

这个想法叫我高兴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我再补充一句：有的时候我似乎故意刺激自己，也真的使自己在情绪上和理智上对她产生了怨恨。这样也能持久一些时间。然而我的憎恨从来也达不到深恶痛绝、刻骨铭心的程度。我自己都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甚至在我购买铁床和屏风，扯断了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把她看做罪人。这并不是因为我以无所谓的态度看待她的犯罪行为，而是因为有一种完全宽恕她的考虑，早在买床之前，从第一天起就有这个想法。总之，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就有些奇怪了，因为在道德方面我的要求是严格的，现在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她是被战胜了，受侮辱了，被压垮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地可怜她，尽管是这样，可是有时一想到她的屈辱我就由衷地高兴。我们两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个想法使我高兴……

这个冬天我乘机有意做了几件好事。我免除了两笔债务，不要典当物品送了点钱给一位穷女人。这件事我并没有告诉妻子，我完全不是为了让她知道才做这件事的；可是那个女人自

已跑来致谢。还差一点儿没有下跪。这样才把事情传开了；我感到她知道这个女人的事情后确实很满意。

春天临近了，已经是4月中旬，摘下了双层窗子，明媚的阳光照亮了我们沉闷的房间。然而一块遮眼布挂在我面前，它也遮盖着我的头脑。可怕的致命的遮挡！我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的：一切都从我眼前突然落下了，我也突然心明眼亮起来！这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的日子来到了，再不就是阳光点燃了我变得迟钝的头脑中的思想和悟性？不，在这里不是思想，也不是悟性活动起来了，而是一条筋脉，一条已经僵死的筋脉突然活跃起来，这条筋抖动了，复活了，照亮了我的变得麻木不仁的心灵和我的恶魔般的高傲。那时我如同从原地蹦了起来。这件事发生得确实很突然，很意外。事情发生在黄昏之前，五点钟左右，午饭之后……

## Ⅱ 遮眼布突然落下了

开头我先说两句话。还在一个月之前我就发现她有一种奇怪的沉思的神情，不是沉默，已经是在沉思。这也是我突然发现的。她当时在坐着干活，正在低头缝东西，没有看见我正在端详她。我突然感到惊讶的是，她变得纤弱、消瘦、面孔苍白，嘴唇苍白得没有血色，——这一切连同她那沉思的神色凑到一块一下子就把我震惊了。我在这之前就常听到她轻声干咳，尤其是在夜里。我一句话也没有跟她说，立刻起身去请施雷德尔医生。

第二天施雷德尔来了。她非常吃惊，一会儿看看施雷德尔，一会儿又望望我。

“我没病。”她捉摸不透地笑着说道。

施雷德尔没有仔细地看（这些医生有时候架子很大，治病

草率),在另一间屋子里只是告诉我是病后未恢复过来,最好是春天到海边去住住,不然的话,到别墅去也好。总之,除了病后体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之外,什么也没有说。施雷德尔医生走后,她极其严肃地望着我,又对我突然说道:

“我真的一丁点儿病也没有。”

但是说着话的工夫,脸立刻红了,看来是由于羞愧。看起来,她是觉得羞愧。噢,现在我明白了:我还是她的丈夫,关怀她,依旧跟真正的丈夫一样,这使她感到羞愧。但是,那个时候我没能明白这一点,以为她脸红是由于温顺。(这就是遮眼布啊!)

就是从那之后一个月,在4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五点钟,我坐在当铺里结账。她在我们房间里自己的桌子旁边做活,我突然听见她开始声音轻轻地,轻轻地唱起歌来。这件新鲜事情产生了使我感到震惊的印象,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把她领进家门最初的那些日子,我们还能够随意嬉闹,用手枪打靶,除开这些日子以外,直到现在这个时刻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歌声。那时她的嗓音还很清脆嘹亮,音调虽然不太准,但听起来很舒畅悦耳。现在听起来歌声是那么微弱——唉,——不是悲戚(这是一首什么抒情曲),在嗓音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打颤,要断裂似的,她的嗓子似乎唱不了这支歌,歌曲本身似乎也是有病的。她小声地唱着,调门一提高,嗓音就突然中断了,——那么虚弱的嗓音,它一断就显得怪可怜的;她清了清嗓子,又轻轻地、轻轻地唱起来,声音小得刚刚能听到……

有人要笑我感情冲动,可是永远也不会有人理解我为什么冲动!不,我还没有觉得她可怜,这是某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最初,起码是在开头那一阵子,突然感到的是困惑,是可怕的

惊讶，是可怕的和惊奇的、病态的和类似报复性的东西：“她唱歌，还当着我的面唱！难道她把我忘掉啦？”

我被震惊得全身颤抖，呆坐在原处，后来猛然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出去，我的这些动作好像都是不假思索就做出来的。至少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去和到哪里去。卢克里娅帮我穿上大衣。

“她在唱歌吗？”我不由得问卢克里娅。她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用眼望了我一会儿也仍然没有明白；其实，我的话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她第一次唱歌吗？”

“不，您不在的时候，有时也唱。”卢克里娅回答说。

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走下楼梯，到了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街的拐角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那里人来人往，有人推撞了我，我也没有发觉。我叫来一辆车子，雇车夫把我送到警察桥，我没想过，到那里去干什么。不过，后来我又突然改变了主意，给了车夫二十戈比：

“这钱是因为麻烦了你。”我无意中笑了笑对他说，这时一种说不出的喜悦突然涌上我的心头。

我转身就加快脚步往家里走去。颤抖的微弱的断断续续的歌声又在我心中突然响起来，我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遮眼布落下了，落下了！她既然当着我的面唱，那就是把我忘记了，——这是一目了然的，也是可怕的。我的心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我的心中洋溢着喜悦，喜悦压倒了恐惧。

啊，命运的嘲弄！要知道，整整一个冬天，除了这种喜悦外，在我的心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东西，然而，这一个冬天我自己在哪里呢？我的心中有过我自己吗？我急急忙忙地跑到楼上，我不知道，我是否是轻手轻脚走进房间的。我只记

得地板如同波浪似的在起伏，我是在顺流漂走。我走进房间，她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低着头做针线活，可是已经不唱了。她漫不经心地向我瞥了一眼，其实，说不上是用眼看，这不过是在有人走进房间时的一种习惯的冷漠的反应。

我一直走到她跟前，坐在她身边的椅子上，紧挨着她，真像发了疯似的。她好像吓了一跳，很快地看了我一眼：我握住她的一只手，不记得对她说了什么，我是说，不记得想对她说什么话了，因为我竟然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我的嗓音颤抖得说不出话来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口接着一口地喘气。

"咱们谈一谈……你知道……说点什么都行！"我突然嘟囔了一些蠢话，唉，哪里还顾得上想啊？她又颤抖了一下，眼睛看着我，十分惊慌地向后退了一步。可是突然间——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严峻的惊讶。是的，是惊讶，而且是严峻的。她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这种严峻，眼中严峻的惊讶一下子就把我压倒了："你还想要爱情吗？要爱情？"她虽然没有说话，可是这种惊讶似乎突然向我发出了问话。我全都看出来了，全都明白了。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扑通一下跪在她脚边。是的，我是瘫倒在她脚旁的。她急忙跳开，可是我使劲抓住了她的双手。

我也完全明白我的绝望处境，啊，完全明白！可是，你相信吗，一种惊喜的心情在胸中沸腾起来，简直抑制不住了，我想，我快要死了。我陶醉在幸福中，不住地吻她的双脚。是啊，陶醉在无边无际的幸福中，这还是发生在我明白自己的毫无出路的绝望的情景下！我哭了，还说了什么，但是我已经说不出话来。突然间她的惶恐和惊讶变成了某种心神不宁的思虑和异乎寻常的问题，于是她惊奇地，甚至有些粗野地看看我，

她想尽快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同时露出一丝笑容。我吻她的脚，使她感到极其害羞，把双脚抽回去，可是我立刻就吻她的脚踩过的那块地板。她看到了这一切，羞臊得突然笑出来。(你们知道，害羞得发笑是什么样子。)紧接着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我看见了这情景，她的手不住地颤抖。我顾不上这些了，一个劲地向她嘟囔，我爱她，我不站起来，“让我吻你的衣服……我这一辈子都要这样宠爱你……”我不知道，也不记得——她怎么突然哭出声来，全身都在颤抖；这是歇斯底里地可怕地发作起来。我把她吓坏了。

我把她抱到床上。发作过去之后，她在床上坐起来，她的面容沮丧得可怕，她抓住我的双手，劝我放心：“没什么，不要难过啦，放心吧！”可是她又哭起来。我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离开她。我不住嘴地跟她说，我带她到布洛涅[①]去洗海水浴，现在就去，过两个星期，立刻就去；还说我刚才听到她的声音是在颤抖；我告诉她，我要把当铺关了，转卖给多布龙纳沃夫，一切都重新开始，而主要的是到布洛涅去，到布洛涅去！她一直在听，总是觉得可怕。她越听越害怕。可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越来越强烈地俯伏在她脚下，吻她的脚，吻她的脚踩过的那块地，膜拜她，我不停地重复说：“我什么也不再问你了，决不再问了，你什么也不要回答我，你根本就不要把我放在眼里，只要让我从角落里看看你就够了，你把我当做自己的一件东西，自己的狗……”她只顾在哭。

“我还以为您就那样把我丢下不管了呢，”她无意中突然顺口说出这句话，无意到连她自己大概都没发觉说的是什么，然而——啊，对我来说这却是那个晚上她的最重要、最严厉的一

① 法国北部港口城市，有海滨疗养地。

句话，也是我最容易明白的一句话，这句话就像一把刀子扎到我的心上！她全都向我挑明了，毫无保留，然而只要她还在我身边，在我的眼前，我就总是会抱着希望，同时感到非常幸福。噢，我知道，那个晚上我把她折腾得太累了，可是我不停地想了又想，想立刻就重新开始一切。到夜晚，她终于精疲力竭了，我劝她睡觉，她马上就睡着了，睡得很踏实。我想她会说呓语，呓语是说了，但那是最轻微的呓语。夜里我几乎是每分钟都起来一次，穿着拖鞋轻轻地走过去看看她。看看我当时花三个卢布为她买来的这张小破铁床上躺着的病弱身躯，我痛苦得直搓手。我在她身边跪下来，但是没有敢去吻正在睡觉的她的脚（在她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向上帝祷告，可是又跳起来。卢克里娅在窥视着我，不断从厨房走出来。我走过去让她去睡觉，告诉她从明天起“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也在盲目地、着迷似的深深相信这一点。啊，狂热的喜悦，我沉醉在喜悦之中！我期待的只是明天。最重要的是，尽管有种种征兆，我还是不相信会有任何灾难。遮眼布虽然已经落下了，可是清醒的理智还没有回到我的身上，而且是很久，很久没有回到我身上，唉，一直到现在，到今天这一天!! 可是怎么能，怎么能理智起来呢？要知道，她当时还活着，她就在那里，在我的眼前，我呢，也就在她的面前。“她明天就醒过来，我把一切都告诉她，她全都会看明白的。”这就是我那时的推断，简单，明了，因而才无限喜悦！这里最重要的是到布洛涅去。不知道我为什么总以为，布洛涅就是一切，在布洛涅就会有某种结局。“到布洛涅去，到布洛涅去！……”我如醉如痴地盼望天明。

## Ⅲ 我全都明白

其实这总共不过是几天之前的事，五天，总共才五天，上一个星期二！是啊，是啊，只要再有一点点时间，她再稍微等一等，我就会把阴云驱散了！再说，她不是已经平静了吗？第二天虽然还有些惶惑，但她已经是面带笑容听我说话了……重要的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在这五天里，在她身上有一种惶惑或者是羞愧感。她也恐惧，非常恐惧。我不想辩解，也不愿像疯子那样抗争：她是恐惧，其实她怎么能不害怕呢？我们长期以来就彼此形同路人，彼此各不相干，可是忽然发生了这一切……不过我没有在意她的恐惧，新的生活已经在闪烁光芒！……我做了一件错事，确实是错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也许，我甚至还做了很多错事。第二天一睁开眼，从早晨起（这是星期三）我立刻就做了错事：我忽然把她看成我的朋友。我做得心急了，太急了，当然忏悔是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忏悔还远远不够！我甚至把一生中连自己都回避的问题都向她摊开了。我坦率地告诉她，整整这一个冬天使我对她的爱情深信不疑，我对她解释说，开当铺仅仅是我的意志和头脑的堕落，是我的自我谴责和自我炫耀的个人打算。我解释说，在戏院小卖部那个时候我确实是胆怯了，这是由于我的性格，多疑的性格：那个环境使我精神崩溃了，小卖部使我精神崩溃了；使我精神崩溃的是，我怎样才能一下子摆脱掉这件事，这样做会不会显得愚蠢呢？我不是怕决斗，而是怕干得愚蠢……可是到后来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于是就折磨所有的人，也为这事折磨她，后来娶她，也是想用这事折磨她。总之，我说的话大部分像是在高烧中说的。她自己握着我的双手恳求我不要再说了：“您说得太夸大了……您这是在折磨自己。”她又流起

眼泪来，又差一点儿歇斯底里地发作！她不住嘴地恳求我，要我再也别说这件事了，再也不要去想它了。

我没有把她的请求放在心上，或者说看得不够认真。春天，布洛涅！那里有阳光，那里有我们的新的太阳，我只顾说这些话了！我关闭当铺，把它盘给多布龙纳沃夫。我突然建议她把所有的钱财全都散发给穷人，只留下我从教母手中最初得到的那三千卢布，我们就用这笔钱到布洛涅去，然后就回来，开始过新的劳动生活。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微微一笑，事情就算这样说定了。不过我感到，她是怕我伤心，出于情理才微笑的。其实我看明白了，我成了她的累赘，你们不要以为我愚笨、自私到连这都看不出的地步。我全都看在心里了，一直到细枝末节都看清楚了，我看得比谁都清楚；我的整个绝望处境是明摆在那里的！

我一直在向她诉说有关我自己和有关她的事情。也谈到卢克里娅。我告诉她，我曾经哭过……啊，我其实也转变了话题，我也在尽量避免重提某些事情。有那么一两次她甚至也活跃起来，我全都记得；什么也没有忘却！你们怎能说我看见了，可什么也没有明白呢？假如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一切都会重新开始，都会好起来的。要知道，在第三天上，我们谈到读书和她在这一冬天读了哪些书的时候，她也对我说了她读的书，在提到吉尔·布拉斯① 伺候格拉那达大主教的场面时，她还一边说，一边笑呢。而且笑得那么稚气，那么可爱，跟当初做新娘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有一瞬间！一瞬间！）我是多么高

---

① 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一部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德·山悌良那传》（简称《吉尔·布拉斯》）的主人公。作家通过小说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的升降沉浮的经历，揭露并嘲讽了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法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

兴啊！她在说到大主教的场面时，简直叫我吃惊：她冬天坐在家里读书的时候，那部杰作能使她笑出来，可见她的内心是多么平静、愉快。看来，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已经不怀疑我就让她这样生活下去了。“我还以为你就那样把我丢下不管了呢”，这就是当时在星期二说的话！唉，十岁小姑娘的想法！实际上她以为，真的以为一切都将那样继续下去：她坐在自己的桌子旁，我则坐在自己的桌子旁，我们两个人就那样一直活到六十岁。可是突然间，我走过来了，我是丈夫，丈夫需要爱情！唉，真是莫名其妙啊，唉，我真是瞎了眼！

我怀着如醉如痴的喜悦心情对待她，这也是一个错误；本来应该克制一些，不然，这种喜悦会使她受惊。不过我也克制自己了，我再也没有吻过她的脚。我一次也没有表示过……嗯，我是丈夫——啊，我连这个想法也没有过，我一味膜拜她！然而，总不能老是哑口无言，不能完全不说话！我突然告诉她：我很欣赏她的谈话，说她在文化修养上比我高得无法比拟，无法比拟。她马上面红耳赤了，羞羞答答地说我太夸大了。这时，我一时糊涂，失去了自制，顺口说出，当初我站在门后听她那场舌战，纯真与邪恶交战的时候，是多么佩服她的智慧，她那机智的光芒，还有她那带着稚气的天真无邪，这都使我喜出望外。她好像全身颤抖了一下，又轻声说我夸大了，可是她的神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她用双手捂住脸，哭出声来……这时我再也忍不住，又跪在她面前，又开始吻她的脚，结果又像星期二那样，一场歇斯底里地发作。这是昨天傍晚的事，到了今天早晨……

到了早晨?！你疯啦，这不就是今天的早晨，刚过不久，就是不久之前！

请你们听一听，仔细想一想：我们刚刚在一块喝过茶（这

是在昨天的发作之后），她心情的平静竟然使我吃惊，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整整一夜都在为昨天的事吓得心惊胆战。可是她忽然向我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耷拉着手，（这就是刚才的事，刚才的事！）开口对我说：她是罪人，她自己知道这一点，她的罪过折磨了她整整一个冬天，至今还在折磨着她，……还说她非常珍爱我的宽容大度……“我要做您的忠实妻子，要敬重您……”这时我跳起来，像发疯似的拥抱她！像久别重逢后丈夫第一次吻他的妻子一样吻她，吻她的脸，吻她的嘴唇。可是为什么我刚才偏偏要出去呢，总共才出去两个钟头……是为办我们出国的护照……天啊！只差五分钟，早回来五分钟就好了！……而现在呢，看看我们门口那群人吧，看看那些盯着我的目光吧……上帝啊！

卢克里娅说（唉，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卢克里娅走，她全都知道，她一冬都在这里，她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我），她说，从我离开家到我回来之前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她突然走进我们的房间去向太太问一件什么事（什么事，我不记得了），她看见她的圣像（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圣母像）已经取出来，放在她面前的那张桌子上，太太似乎刚在圣像前祈祷过。“太太，您怎么啦?”“没什么，卢克里娅，你去吧……等一等，卢克里娅。”她走到卢克里娅面前，吻了她。“我说，您幸福吗，太太?”“是的，卢克里娅。”“老爷早一点来向您请求宽恕就好了，太太……谢天谢地，你们和解了。”“好啦，”她说，“卢克里娅，你出去吧，卢克里娅。”说完就那样微笑一下，可是笑得那么不自然。因为觉得奇怪，过了十分钟卢克里娅突然又返回来看看她。她紧靠窗边的墙站着，手扶在墙上，头又伏在手上，就这样站在那里想什么，她聚精会神，没有发现我正站在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看她。我看到她好像在笑，站着

边想边笑。我看了她一会儿便悄悄转身走出去，我自己正在心里琢磨的工夫，忽然听到打开窗户的声音。我立刻走过去说："外边冷，太太，您可不要着凉。"猛然看见她站在窗台上，整个身子站得直挺挺的，窗子是敞开的，背对着我，手里拿着圣像。我的心当时往下一沉就喊出来："太太，太太！"她听见了，身子挪动了一下想朝我转过来，可是没有转过来，而是向前迈了一步，把圣像紧捂在胸前，从窗口跳下去！

我只记得，我走进大门的时候，她的身体还是温暖的。主要的是，人们全都在看着我。开头全都吵吵嚷嚷的，突然间又都一声不响了，都给我让开路……她抱着圣像躺在那里。我记得，我眼前一片漆黑，默默地走过去，看了很长时间，后来人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卢克里娅也在场，我没有看见她。她说，她跟我说过话。我只记得有一个小市民，他一直对我嚷嚷说："从嘴里流出一小口血来，一小口，一小口！"他还指着石板地上的血叫我看。我好像还用手指蘸一蘸血，手指沾上了血，我还看看手指（这我还记得），那个小市民还不住地说："一小口，一小口！"

"什么'一小口'？"人们说，我吼叫着，使尽全身的力气抡起胳膊向他冲了过去……

唉，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误会！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啊！

## Ⅳ 只晚了五分钟

难道不是这样吗？这难道是真的吗？难道能说这是可能的吗？这个女人为什么，干什么要死呢？

啊，请相信，我明白；但是她为什么要死呢——这仍然是个疑问。我的爱情使她惊慌失措，她严肃地扪心自问：接受还

是不接受我的爱情，她经受不住这样一问，宁肯去死。我知道，全知道，用不着冥思苦想了：她给出的许诺太多了，害怕兑现不了，显然是这样。这里有一些情况是十分可怕的。

她为什么要死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问题要求回答，不停地在叩击我的头脑。要是她愿意那样过下去，我可以让她就照那样过下去。她不相信能够这样，就是这么回事！不，不，我这是在胡说，完全不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对待我必须诚实：爱就爱得毫无保留，而不能像应付那个商人的那种爱法。然而她太纯洁，太清白了，她不能像商人所需要的那样去爱，她也不愿意欺骗我。她不愿意把半份爱情或者四分之一的爱情当做完整的爱情来欺骗我。她这种人太真诚了，事情就出在这里！你们还记得吗？当时我本想使她心地开朗一些。真是异想天开！

我竭力想弄明白的是：她是否敬重我？我闹不清楚，她蔑视我，还是不蔑视我？我不认为她蔑视我。太奇怪了，怎么会整整一个冬天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蔑视我呢？直到她用严峻的惊讶目光看了我一眼那一刻，我都过于自信了，认为事情恰恰相反。确实是严峻的。就在那个时候我即刻就明白了，她蔑视我。明白得一清二楚，没有回旋的余地！唉嗐，随她的便吧，就随她蔑视吧，哪怕是蔑视一辈子，只要她活着就好，只求她还活着！前不久她还在走动，还在说话。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她怎么要从窗口跳下去呢！五分钟之前我怎么能料想得到呢？我喊过卢克里娅来。现在我决不能让卢克里娅走掉，决不！

啊，我们本来是可以和好如初的。我们只是在这一个冬天里彼此太疏远了，可是，难道彼此就不能够再相互习惯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共同生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呢？我是个宽宏大度的人，她也是——这就是结合点！只须再说几句

话，再等两天，不要多，她就会全都明白了。

主要的是，这全都是偶然发生的，简单的、野蛮的、固执的偶然事件，这是最叫人懊悔的。真是懊悔！五分钟，总共、总共才晚了五分钟！我要是早到五分钟，那一眨眼的偶然就会浮云似的一掠而过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有这种念头了。到后来她会全都清楚的。现在又剩下空空荡荡的几个房间，又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钟摆依旧在那儿滴滴答答地走，它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不怜悯。一个人影都没有，这真是灾难啊！

我走来走去，不住脚地走着。我知道，知道，不必提醒我。我怪罪那种偶然，怪罪那五分钟，你们觉得好笑吗？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就拿这一件事你们想想看：她连一个字条都没有留下，比如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之类的话，所有自杀的人都要留下的。难道她就不想一想，这可能给卢克里娅找麻烦，人家会说：“你一个人跟她在一块，是你把她推下去的。”要不是在院子里有四个人从厢房的窗口看见她手里拿着圣像站在窗台上，是她自己跳下去的，卢克里娅即使没有罪，至少也要把她折磨一番。然而，要知道，院子里有人看见了，这也是一种偶然。不，所有这一切——都是一闪现的念头，仅仅是一种一闪现的糊涂念头。一时冲动，想入非非？她曾在圣像前祈祷又能说明什么呢？不能说这就是临死前的祈祷。一闪念的念头也许总共持续了十来分钟，正是她靠墙站着，把头贴在手上，还在微笑的时刻，才下了决心的。一个念头钻进了头脑，在里面翻腾起来，她就顶不住了。

随便你们怎样说，这里是明显的误会。本来还可以跟我一起生活。即便是贫血，那又算什么？仅仅是由于贫血，由于耗尽了生命力吗？在这个冬天她精疲力竭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来晚了！！！

她躺在棺材里显得多么瘦小，鼻子多么尖啊！眼睫毛像一支支箭码在那里。其实她落到地上后身上什么地方都没有摔破，没有摔断！只是流出“一小口血”。有一茶匙。内部的震荡。一个奇怪的想法：要是可以不埋葬多好？因为如果把她抬走，那么……啊，不，抬走她，几乎是不可能的！噢，其实我知道，应该抬走，我没有发疯，一点儿也没有说呓语，相反，我的头脑从来也没有这样清醒过。可是家中怎么又没有人了，又是两间房子，又是我一个人守着典押物。梦呓，梦呓，这才是梦呓！我折磨了她——就是这样！

现在你们的法律对我算得了什么？你们的习俗、你们的风尚、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国家、你们的信念跟我有什么相干？你们的法官审判我吧，你们把我送上法庭吧，送上你们公开审判的法庭吧，我要说的是，我什么也不承认。法官会吼叫：“住嘴，军官！”可是我要大声告诉他：“你现在凭什么要我俯首听命？黑暗的保守势力为什么摧残了比什么都可贵的东西？你们的法律现在对我有什么用？我不承认它们。”唉，我反正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她糊涂，她糊涂啊！她人已经死了，听不见了！你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天国来保护你的。天国就是我的心，我会把这个天国安放在你的周围！嗯，你可以不爱我，那就不爱吧，那又算什么？一切就该是那样的，一切都会那样继续下去。你只需像对朋友那样跟我说话，——这样，我们也会快乐的，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高兴得笑起来。我们本来可以这样生活的。假如你爱上另外一个人，嗯，随你的便！你可以跟他边走边笑，我可以站在街对面看你们……啊，怎样都可以，只要她再把眼睛睁开，睁一次也好！睁一刹那，只要一刹那！再

看我一眼，就像不久以前那样，那时她站在我面前，发誓要做忠实的妻子！噢，看一眼她就全都明白了！

因循守旧的势力！噢，自然界！人们在世界上是孤独的——灾难就在这里！“在田野里有活着的人吗？”① 这是一位俄罗斯壮士的呼声。我不是壮士，我也要喊，可是谁也不回应。人们说，太阳孕育万物。太阳升起来了，你们看看它，它岂不也是一具尸体吗②？一切都是死的，到处都是死人。仅有的只是一些人，可是包围他们的却是一片沉寂——这就是世界！“人们，彼此相爱吧”③ ——这是谁说的？这是谁的遗训？钟摆在麻木不仁地、讨厌地滴答地响着。现在是夜里两点钟。她的鞋在床边放着，好像在等待她……不，说实在的，明天人们把她抬走以后，我该怎么办呢？

---

① 这句话可能引自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5—1846），但与原文有些出入。原文是：“我的生活是失败了，由她去吧。我就如同我们民间传说中在条条大路上奔走的那个英雄，他在每个十字路口都大声高呼：‘田野里有人活着吗？’然而活着的人没有回应……”

② 太阳由生命的源泉变为死亡的象征，——这个思想是由圣经引起的联想。《新约全书·启示录》：“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大地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第 6 章，第 12 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上帝之名……”（第 16 章，第 9 节）

③ 引文出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第 15 章，第 17 节）

## 迟到的规劝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1章，Ⅱ）

我的10月号这一期《日记》给我招惹来不少麻烦，当然这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的麻烦。那一期的短文《判决》是一名自杀者的自白，这名自杀者在向自己开枪之前，为了辩解，也可能是出于告诫的目的，亲自写了这篇绝笔。我的一些朋友，其意见很受我尊重的一些朋友，也称赞这篇文章，但同时他们也证实了我的疑问确实是问题。他们称赞的是，文章的确说出了能表达这类自杀者的本质的信条，但是我的朋友们也心存疑虑：是否所有的人和每一个读者都能明了文章的目的呢？会不会事与愿违，给某些人造成完全相反的印象呢？事情还不止如此：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在这篇文章之前就已萌发了关于手枪或绳索的隐隐约约的念头，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会不会受到文章的诱惑，会不会因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不幸意图？总而言之，他们表示的疑虑与我自己心中产生的那些疑虑完全一致。最后的结论应该是，在文章的结尾应该以作者的名义用直言不讳的、简洁明了的言语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阐述清楚，甚至加上规劝。

我同意这种说法，我自己在写文章时，也感到有必要写上规劝的话；可是对此我在当时似乎羞于写上。我觉得，即使把最天真的读者想象成简单到自己猜测不出文章的潜在含义和文章的目的，看不出文章的规劝性质，那是可耻的。对我自己来说，文章的目的已经足够清楚了，因而无意中认为对任何人都是同样清楚的。看来，我错了。

有一位作家早在几年之前就公正地指出：在从前，承认对某种事物一无所知，将被人看做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显然表明说这话的人笨拙、愚昧、头脑和心灵的发育滞后以及低能。现在则恰恰相反，常常听人说“我不懂”这句话，说话时几乎是表示高傲，至少是自鸣得意。这句话似乎可以立即使说话者在听众的眼中身价倍增，更可笑的是在自己的心目中抬高自己，而且丝毫不觉得这种廉价的地位是可耻的。如今，诸如“我根本看不懂拉斐尔[①]”，或者“我特意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坦率地说，在他的作品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丁点儿独特的东西”之类的话，不仅可能被认为是智慧深邃的标志，甚至是豪迈之举，几乎是高尚的道德行为。其实，现在受到这种评判和怀疑的岂止是一个莎士比亚，一个拉斐尔？

我在这里用自己的话转述那位作家关于傲慢的不学无术者的见解，这个见解是十分确切的。确实是这样，不学无术者的傲慢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些智力不大发达、智力欠缺的、愚钝的人丝毫不为自己这些不良品质感到羞耻，而且相反，不知为什么，反而使他们变得更加“神气”。我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文学中和私人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非常突出的标新立异的思潮，而渊博的学识则消逝得无影无踪：有些人与自己的敌手争论得口吐白沫，而在十来年当中，敌手写的东西他们有时却连一行都没有读过。他们说：“我不是持那种观点的人，不想去读那些蠢话。”这实在是，真正的货色空空如也，架势却摆得非同小可。这种极端的片面性与故步自封精神，标

---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建筑师，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名画《西斯廷圣母》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赏。

新立异与偏执精神都是在当代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在近二十年才出现的。与此同时，非常多的人都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勇气：一些知识浅薄的人竟然当面嘲弄那些学识和见解都胜过他十倍以上的人们。然而，最坏不过的是“简单化的思想”越来越占上风。例如，对比较、讽喻和隐喻的鉴别力显然衰退了。人们明显地不能理解（一般地说）滑稽和幽默了，按照德国一位思想家的说法，这是一个时代的智力上和精神上衰退的最突出的标志之一。不仅如此，出现了一些阴郁的蠢才，他们愁眉不展，面庞瘦削，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笔直而又笔直，一切都在一条直线上，集中在一点上。你们以为我指的完全是年轻人和自由派吗？请你们相信，我指的还有老头子们和保守派。好像是在模仿青年人（其实现在他们已经头发花白了）似的，早在二十年前就涌现出一批奇特的头脑简单化的保守派、怒气冲天的老头子们，这些人对眼前的事情、对新的人们和对年轻的一代似乎一无所知。他们的简单化思想，就其僵硬、激烈和蠢笨的程度而言，也许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新人”。嗯，很可能，他们的这一切全都是由于过多的善良愿望和他们的宽宏大度，但却被当代的轻率行为伤害了的感情；然而他们有些时候毕竟是比当代的头脑简单的人们更要盲目一些。不过，我觉得，由于指责简单化思想，我离题太远了。

我的文章刚一出现，就有人写信，有人当面向我提出各种问题。他们问，你的《判决》是什么意思？您想在文章中说明什么，莫非是在为自杀辩解？我感到，有些人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居然高兴起来。一位叫恩佩的作者最近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寄给我，这篇颇有礼貌而又尖酸刻薄的文章刊登在莫斯科

《消遣》[1] 周刊上。我没有订阅《消遣》周刊，我想该刊发行人也不会把这一期寄给我，所以，我认为寄给我的这一期是出于文章作者本人的盛意。文章作者谴责并且嘲笑我的文章：

我得到10月号这期《作家日记》后，一边读一边在想：在这一期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新奇的东西**。我简要地谈谈我的困惑。比如说，在这一期为什么要登载一名由于苦恼而自杀者的那篇“议论”？我完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这种**议论**，如果可以把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人的胡言乱语称之为议论的话，**对于所有应该知道、应该了解这件事的人们来说**，早就都知道了（当然略有变动），因此说，它在**当前**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日记中出现纯系一种可笑和可怜的过时现象。现在是**钢铁般坚强观念**的时代，积极的意见的时代，高举“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旗帜的时代。当然，正如事事处处都有例外一样，自杀者有的是要**发表高谈阔论，也有的是一言不发**，但是，对这种庸俗的英勇行为如今没有人会去注意它了。它，这种愚蠢行为是太愚蠢了！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的自杀，尤其是**发着高谈阔论**去自杀的行为被赞扬为高度“自觉”的表现，不过，没人知道是**什么**自觉？而英雄主义，也没人知道英雄主义在哪里。不过，这个**腐朽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谢天谢地，这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

每个发着高谈阔论——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日记中所刊登的那种议论——而死去的自杀者是不值得任何怜悯的；这种人是拙劣的利己主义者，沽名钓誉的人，人类社会中极其有害的成员。他

---

① 在莫斯科出版的幽默的文学刊物（1859—1916）。该刊主要迎合小市民趣味，但也发表过弗·伊·达里以及安·契诃夫等人的作品。

甚至不能把自己这件蠢事做得不引人注意；他在这件事情上也不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不能把自己装出来的性格坚持到底；他虽然能不发表任何议论而轻易地死去，可他却要发表高谈阔论……

啊，生活中的福斯塔夫们，装腔作势的骑士们！……①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感到沮丧。天啊，难道我的读者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吗？难道断言我写的自杀者一点儿也不值得怜悯的恩佩先生真的认为我是要他“怜悯”这种人吗？其实，本来用不着认真地对待像恩佩先生这样的个别意见。然而问题在于，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恩佩先生无疑是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人，代表了像他恩佩先生那样的一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恬不知耻的类型，恬不知耻而又头脑简单的类型，正如恩佩先生自己在我节录的他那篇文章中所说的那种具有“钢铁般坚强观念”的类型。关于存在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的猜测真的是太可怕了。当然，也许我是太认真了。不过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尽管我有这样的感受，我也可以对这一类型的人不予回答，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蔑视这种人，（为什么不同人们交谈呢?）仅仅是因为这一期刊物的篇幅不够了。总之，如果说现在我做了回答，牺牲了篇幅，可以说我是在回答自己的疑问，也可以说是自己回答自己。看来，对我 10 月号那一期的文章必须赶紧补写规劝、说明，详尽解释文章的目的。这样做，至少我就问心无愧了。

---

① 福斯塔夫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1597—1598）等剧中的人物，装腔作势的骑士们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中的人物。作者在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引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的用意是说明自杀的人都是生活中的虚无主义者，爱说大话的、无益于生活的人物。

## 毫无根据的论断

(《作家日记》，1876 年，12 月号，第 1 章，Ⅲ)

我的文章《判决》涉及到人的存在的基本的和最高的思想，这就是人的灵魂不死这一信念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这是一篇“由于逻辑上的自杀”而苦恼不堪的人的自白，自白的潜在意义就是必须立即做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对自己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死的信念，人的生存就是不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和不堪忍受的。我认为，我清楚地表达了逻辑上的自杀这一说法，发现了这种说法。这个人没有不死的信念，他在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感到自己没有目的性，他对周围的因循守旧势力的沉默无声感到憎恨，他渐渐得出一个必然的论断，即人在世上生存完全是荒唐的。对他来说，明显得如同皎日，只有那些类似低级动物的人，以及意识发达的程度低下，纯肉体的需要则很强烈，因而近似低级动物的人才能够同意生活下去。那些人同意的正是像动物那样生活，也就是“吃，喝，睡，营造巢穴，生儿育女”。噢，吃喝，睡，糟踏环境，还要生活得舒适——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切把人引诱到世界上来，但这不是人的高级类型。然而，正是高级类型的人在统治着世界，向来就是他们在统治，结局也永远是这样的：时机一到，千百万人就跟随着他们走。什么是高尚的话和高尚的思想呢？首先讲出这种话、这种思想（没有它们人类就不能生存）的常常是那些贫穷的、平凡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往往是受迫害的，在迫害中和默默无闻中奄奄待毙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说出的话却是永存的，任何时候也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

话、这种思想一旦被他们说出来，就永远也不可能消失，——这简直是人类社会中的惊人现象。等到下一代人或者经过二十、三十年之后，天才人物的思想就会支配一切和所有的人，吸引一切和所有的人。——结果是，胜利的不是千百万人，也不是看上去那样可怕、那样坚不可摧的物质力量，不是金钱，不是利刃，也不是力量，而是在起初并不显眼的思想，并且常常是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某一人物的思想。恩佩先生写道，在我的《日记》中出现这种自白“纯系”（对谁来说纯系，为什么是纯系?）“一种可笑和可怜的过时现象”……因为如今是“思想钢铁般坚强的时代，积极意义的时代，高举‘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旗帜的时代。”（原来是这样！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目前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自杀现象才越来越多。）请可敬的恩佩先生以及与他近似的先生们相信，时机一到，这块“钢铁”就将在另外一种思想面前化为羽毛，无论这种思想在“思想钢铁般坚强”的先生们最初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对我个人来说，为了我们的未来，可以说，为了我们最近的未来，最可怕的忧虑之一就是，按照我的看法，由于某种特殊的、奇怪的……简直可以说是命运，在俄罗斯的知识阶层相当大的、极大的一部分人里面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灵魂和灵魂不死，这种无信仰的思想正在日益强烈地并且以极快的累进速度深入到这部分人中间。不仅如此，这种无信仰还由于一种信念而得到巩固（无论是什么信念我们这里都非常少），而使无信仰得以巩固的就是对人类存在的最高思想的某种普遍的、奇怪的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有时是冷嘲热讽式的，天知道它是从哪里、根据什么规律降临到我们这里的；而这种漠不关心并非只针对一种思想，而是针对一切朝气蓬勃的东西，针对生活的真理，针对一切赐予生命、哺育生命的东西，针对能使生活健康并能

清除腐朽和污秽的东西。这种漠不关心在当代几乎成了俄罗斯的特点，即便是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较也是如此。它早已渗透到俄罗斯知识界的家庭，差不多已经把这种家庭毁掉。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没有最高的思想都不能够生存。而最高的思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关于人的灵魂不死的思想，因为所有其余那些个人可能赖以生存的“最高”的生活思想都是溯源于这一个最高思想的。对此人们可以同我争论（就是在关于世界上一切最高的东西的起源的统一性这个问题上），不过我现在还不想进行争论，只是一般地把我的思想亮出来。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一步一步地解说会更好一些。今后还会有时间的。

我谈到的自杀者正是自己的思想即必须自杀的思想的激烈表达者，他不是漠不关心的人，也不是钢铁般的人。他确实在承受着痛苦与折磨，似乎我已把这一情况表达清楚了。他非常明白，他不能再生活下去，同时他也明白得再清楚不过，这就是，他是正确的，他是驳不倒的。一些最高的、最重要的问题无法抗拒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已经意识到，像动物那样活着是令人厌恶的，不正常的，对人来说是不够的，这时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这时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把他挽留在世界上呢?”他是得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这一点他也是知道的，他虽然也意识到（像他自己所说的）“整体的和谐”是存在的，（他自己说）但是我“不理解这种和谐，永远也无法理解，我自己不会参与这种和谐，这也是必然的，是自然而然的”。正是这种明确的思想结束了他的生命。不幸在哪里？他错在什么地方？不幸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丧失了灵魂不死的信念。

但是他自己还在竭力寻找（就是说只要还活着就不停地探索，而且是痛苦地探索）妥协的途径；他希望在“对人类的

爱”中找到这条途径：“即便不是我，而是人类能够幸福，有那么一天能够达到和谐。这个思想本来可以使我留在世界上。”他脱口而出地说了这句话。当然这是一种豁达的思想，豁达而又痛苦的思想。但是，他有一个无法抗拒的信念，这就是，人类的生命实质上如同他个人的生命一样，只有那么一瞬间，在达到“和谐”（如果相信这种幻想是可以达到的）的第二天，由于大自然因循守旧规律的作用，人类也同他个人一样，就将化为“乌有”，而且这还是发生在人类为了实现这一幻想而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这一思想彻底激怒了他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对人类的爱而愤愤不平，这种思想使他感到他是在为全人类而遭受侮辱，按照思想的反应法则，这个思想把他对人类的爱也扼杀了。类似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在一个由于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家庭中，当孩子们的痛苦使父母无法忍受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到末了就开始憎恨这些他们一直喜爱的孩子们，这正是因为目不忍睹孩子们的痛苦。不仅如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当你意识到完全无力帮助人类或给予任何好处，或完全无力减轻人类的痛苦，与此同时，你又确信人类在遭受苦难，此时，会使你心中对人类的爱转化为对人类的恨。思想钢铁般坚强的先生们当然不相信，也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爱和人类的幸福——这一切都是那样轻易，一切又已安排得那样合适，一切都早就有了，已经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不值得再去考虑了。但是我打算让他们痛快地大笑一番：我声明（暂时仍然不拿出依据），没有人的灵魂不死的共同信念，对人类的爱就是不可思议、不可理解，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剥夺了人对自己灵魂不死的信念的人们，想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生活的最高目的以取代这种信念，我认为，他们是在谋害自己，因为他们向人的心灵中灌输的偏偏不是对

人类的爱，而是对人类憎恨的幼芽。就让那些具有钢铁般的思想的聪明人们对我这种观点惊讶地耸耸肩膀吧。然而这种思想却比他们的智慧要明智些，我还深信不疑，总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思想将成为人类的公理，虽则目前我只是顺便提一提它。

我还要肯定地说，大胆地说，对人类的爱作为一种思想，一般地说是存在的，这是人类的智慧最难理解的思想之一。这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思想，唯有情感才能证实它的存在。但是，只是在具有人的灵魂不死这个共同信念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这种情感（又是没有拿出论据）。

现在终于明白，由于失去了灵魂不死的思想，自杀对任何一个在自己的发展上稍稍高于牲畜的人来说都成了实实在在的、无法逃避的必然结局。反过来说，灵魂不死的思想许诺生命是永恒的，它把人与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如果有那么多的生命，就是说，除了人世间的生命之外，还有不死的生命，那又何必还珍惜人世间的生命呢？其实，事情恰恰相反，因为只有有了灵魂不死的信念的人才能够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全部合乎理性的目的。没有灵魂不死的信念，人与世界的联系就割断了，这条纽带就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腐朽了，而丧失生活的最高意义（即便只是在最无意识的苦闷中被感受到的）必然导致自杀。由此可以从反面看到10月号我那篇文章的规劝意义：“如果对于人的存在来说灵魂不死的信念那么重要，那就是说，这种信念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既然如此，那么人的灵魂的不死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总之，灵魂不死的思想——这就是生活自身，就是生机勃勃的生活，是生活的最确切的表述，是真理和人类的正确意识的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文章的目的，我想，任何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自然会看清楚这个目的。

## 说几句关于青年人的话

（《作家日记》，1876 年，12 月号，第 1 章，Ⅳ）

我只是顺便说说。看来，人们会向我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来也不思考高深问题的人也在自杀，而且是莫名其妙地自杀，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如此之多也是一个谜）自杀事件，奇怪的、莫名其妙的自杀，根本不是由于贫困，不是由于受到委屈，也没有任何要这样做的明显原因，自杀完全不是由于物质困难，不是由于受到侮辱的爱情，以及忌妒、疾病、忧郁症或者发疯，天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这样做的。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出强烈的诱惑，由于根本不可能不承认其中有流行病，它们就变成使很多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当然，我不打算解释所有的自杀问题，其实，显然我也不可能做这种解释①。不过我深信不疑，这些自杀者，就大多数来说，就整体来说，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出于同样一种精神疾病——在他们的心灵中没有生存的最高理想。在这方面，我们的冷漠态度是一种俄罗斯的现代病，它正在腐蚀着所有人的心灵。不错，我们这里现在有的人甚至还祈祷、进教堂，然而却不相信自己的灵魂不死，就是说，不是不相信，而是从来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有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是那种钢铁般的人，也不是像牲畜似的低级

---

① 我收到很多述说自杀事实的信件，信中也提出许多问题，问我对这些自杀事件有什么看法，并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作者注

的人。然而，人生的所有最高思想和意义、生活的期望和意愿都只能来自这一信念，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嗯，我再说一遍，有很多人愿意过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最高的生活意义的生活，他们过的简直是低级动物的生活；但是也有甚至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从外表上看，他们可能是异常粗鲁、品行不端的人，然而他们的天性（大概他们自己还没有发觉这一点）早已在为没有生活最高目的和意义而苦恼了。这种人已经不满足于吃吃喝喝、大馅饼、高头大马和纸醉金迷的生活，不满足于官阶权势、下级的谄媚和拥有自家门前的看门仆人。这样的人自杀了，从表面上看的确是无缘无故。实际上肯定是由于他在任何地方都寻找不到最高的生活意义而产生的苦闷，即便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苦闷。在这种人里面有的人并不是简单地一死了事，而是在临死之前还要制造某些不体面的卑鄙丑恶的勾当，耸人听闻的事件。哎，当你眼看着很多这样的人的时候，很难相信他们是因为没有"生活的最高目的而苦闷"才自杀的，"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什么目的，关于这类问题他们从来就一字不提，相反的是，尽干些'龌龊勾当'"，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那么就算是他们无所用心，尽干坏事吧！可是，你们是否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生活中，这种高级的苦闷有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复杂途径去感染并打动某一个人的心灵的？思想在空间回荡，但必定要遵循某些规律；思想的存在与传播是遵循着我们很难掌握的某种规律进行的；思想是有感染力的，在一般的生活氛围中只是有高度教养的、头脑发达的人才能产生某种思想，但是它也可能突然打动几乎是没有文化的人，粗野的、从来也不为任何事操心的人，它突然以自己的影响打动他的心灵，这一点你们知道吗？大概人们还要对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儿童或者

还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生活的那种岁数不大的青年人也在自杀。而我恰恰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想法，这就是，我们的青年人由于没有生活的最高目的而痛苦，而苦闷。在我们的家庭中几乎不谈生活的最高目的，不仅根本不考虑灵魂不死的思想，而且还常常对它持嘲讽的态度，当着孩子们的面，在他们童年的时期就这样做，也许这是在有意进行教导。

“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家庭。”这是我们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①]不久前在反驳我的时候，对我这样说的。有什么办法呢，其实这话里也有一部分真实。显然，由于我们对生活的最高目的的普遍冷漠态度，可能，在民族的某些阶层里面我们的家庭已经摇摇欲坠了。至少一眼就可以看明白，我们的青年一代注定要自己去摸索生活的理想和最高意义。但是他们的这种孤立，这种孤身奋斗是可怕的。在现在这个时刻，在我们生活的当前这一瞬间，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青年的处境是，在任何地方都根本找不到关于生活的最高意义的任何指导。我再说一遍，我们的青年从我们的聪明人那里，总的来说，从自己的指导者那里现在能够借鉴的，最多不过是冷嘲热讽的观点，而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就是说，没有应该相信的、敬重的、崇拜的和向往的东西，而这一切对青年人又是那样需要，那样必不可少，青年渴望获得这一切，时时处处都抱着这种渴望！如果说，在家庭或者学校能够也有力量给予青年某些正确的引导的话，那么家庭和学校（当然不是没有某些例外）又是为了许多另外一些更实际的、更富有现代趣味的任务和目的，对这个问题依然采取过于冷漠的态度。12 月 6 日在

① 指俄罗斯作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下文所说的“我们的聪明人”、“指导者们”，也是指的谢德林等作家。

喀山广场上的青年①，毫无疑问，不过是掌握在某些阴险的骗子手中的“被驱使的群盲”，至少根据《莫斯科新闻》报②指出的事实判断是这样的。这件事将会有什么结果，说明了什么——更多的事情我就一无所知了。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有糊涂观念，有害的、不道德的糊涂观念，鹦鹉学舌般的人云亦云。但是那些骗子毕竟使他们聚拢在一起了，而且是只有在使他们相信，他们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美好的事业，是在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付出令人震惊的自我牺牲时，才能把他们召集起来的。这种“寻求自己的理想”即使是人们当中很少数人的事情，但这批为数很少的人却控制着其余的人们，带领他们跟自己走，——这已是很明显的了。他们的理想反常到这种地步，那么这是谁的过失呢？无须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失，然而并非只是他们自己。可以肯定地说，即便是他们现在的周围的实际能够拯救他们，使他们摆脱那种与一切迫切的、现实的事情隔绝的状态，摆脱那种对最普通的事物都愚昧无知的状态，我们年轻一代中的那种脱离根基、脱离人民的真理的状况也已经达到使他们的“父辈们”自己也应该感到震惊、感到可怕的时刻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些“父辈们”同样是很早以前就断绝了与一切俄罗斯事物的联系，他们正在作为俄罗斯大地的最高批评者欣慰地安度着自己的晚年。这就是教训，——对家庭、对学校、对怡然自得的坚定批评者们的教训是，他们自己

①② 彼得堡一批青年人于1876年12月6日在喀山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这是1876年普列汉诺夫等民粹派分子成立的“土地与自由社”发动的第一次政治活动。米·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报就此事发表社论说，游行是“外国的阴谋”，并且是以革命恐吓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所用的“被驱使的群盲”一语在他以前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但也可能是借用自卡特科夫的上述社论。

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后果，不承认这些后果。但是……但是，难道能够又把这一切全都归罪于他们，即“父辈们”吗？他们自身不也是某些特殊的、致命的规律与命运的产物和后果吗？这种规律与命运统治俄国社会整个知识界几乎连续两个世纪了[①]，差不多一直持续到当今王朝的伟大改革[②]。很清楚，与根基、与一切事件的二百年的脱节并不是毫无代价地过去了。一味怪罪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救治的药物。我认为，药物还是有的，药物就在人民中间，在人民最珍视的东西里面，在我们与人民的结合之中。不过……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我要撰写《日记》的部分原因，就是要尽我的力量谈谈这些药物。

① 指从彼得大帝以来的两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认为，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国社会中有教养的阶层与人民（即“根基”）相脱离。彼得于1682年即位，1689年亲政，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此文时近二百年。

② 指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

## 关于自杀和傲慢

（《作家日记》，1876 年，12 月号，第 1 章，V）

应该结束与恩佩先生的争论了。他的态度和他那种“类型”的很多人的态度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那种一目了然的事情和他们极易理解的事情都是愚蠢的，他们的倾向不是称赞而是蔑视明确的事物。而那种故弄玄虚、迷离恍惚的东西则是另当别论：“我们不懂，就是说这里很深奥。”

恩佩先生说，我那位自杀者的“议论”不过是“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人的胡言乱语”，“早已是尽人皆知的话”。我的看法主要是，他是在读了我的文章之后才“看懂了”这篇“议论”的。至于说“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那么这篇胡言乱语（恩佩先生与所有他们那一类人是否理解呢?）就是关于必须自杀的论断，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是对很多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科学的最新发现。我用简要的语言对这一“科学的最新发现”做了明确的、通俗的表述。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驳倒它，既不是用议论，也不是用逻辑来驳它，因为逻辑是驳不倒它的。(我在这里不仅是呼吁恩佩先生，呼吁随便哪一个人从逻辑上把这篇“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驳倒。）然而，信仰、必须相信人的灵魂不死的论断却能够驳倒它。这个论断坚定地认为，只有这种信仰才是世界上朝气蓬勃的生活的唯一源泉，也就是生命、健康、健全的思想和健全的论断与结论……的唯一源泉。

我的文章的结尾写的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在 10 月号那一期上写了一位侨民的女儿的自杀事件：“她用三氯甲烷蘸

湿棉花捂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床上，就这样死了。死前留下一张字条：‘我要做长期旅行。如果我的自杀未成，那就请大家聚会以香槟酒祝贺我死而复生。如果自杀成为事实，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在确信我已死亡之后再埋葬我，因为在地下的棺材里苏醒过来是极不愉快的。甚至是极其难堪的！’”①

恩佩先生对这个轻率的自杀女人傲慢地发起脾气来，认为她的行为“不配得到任何关怀”。他由于我的“极端幼稚”的问题也对我怒气冲冲。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两名自杀者中哪一个人在世界上遭受的痛苦更大？但在这里闹出了一个笑话。他突然加上一句话，“我敢说，希望用手举起香槟酒杯祝贺自己复活的人”（自然是用手举起），“在生活中遭受的痛苦是不多的，因为她再度那么隆重地走进生活时，丝毫也没有改变生活的条件——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件事……”

多么可笑的想法和多么可笑的判断！这里，主要是香槟酒把他闹得晕头转向：“喝香槟酒的人显然是不可能痛苦的。”其实，假如她那样喜欢香槟酒，她可以为了喝香槟酒而活下去。不过，要知道，她是在临死之前，也就是在严峻的死亡之前写下关于香槟酒的话的，写的时候她很清楚，她肯定是要死的。她不大会相信再复活的机会，何况这种机会对她来说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再度苏醒，对于她当然等于是为了再次自杀的苏醒。可见，香槟酒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就是说，根本不是想再喝香槟酒，难道这么丁点儿事还需要详细解说吗？她写了香槟酒，是想要在临死时制造一起更为卑劣、更为龌龊的乖戾的恶作剧。她之所以选择了香槟酒，那是因为当自己“死而复生”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别的比喝香槟酒更卑劣、更龌龊

---

① 见本书《两起自杀案件》（1876年，10月号，第1章，Ⅲ）注。

的画面了。她写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用这些污浊的东西来凌辱她留在世上的一切，诅咒世界和自己的人世生活，蔑视自己的人世生活，把这种蔑视告诉自己所遗弃的亲人们。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请注意，她是十七岁，不是二十岁，我在那篇文章中说错了，后来对这件事情知道得比我更清楚的人们纠正了我的说法）哪里来的这么强烈的怨恨呢？怨恨谁？没有人欺负过她，她什么东西也不缺少，看来，她也是无缘无故就死了。但是，正是这个便条，正是由于她那个时刻还有心思去干那件卑劣的、充满怨恨的恶作剧（显然是这样的），正是这一点使人们想到：与她所做的恶作剧相比，她的生活是无比的纯洁，她的怨恨、她的恶作剧里的强烈愤怒反而表明她在精神上那种痛苦不堪的心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绝望。如果她是由于无缘无故地对任何事情都冷漠无情而死的，她就不会去制造那种恶作剧。对待这样的精神状态应采取仁爱的态度。她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她肯定是由于精神上苦闷，在忍受了很多折磨之后才去死的。是什么原因使她在十七岁就经受了那么大的折磨呢？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可怕的问题。我说的是一种推测，我想，她是因为苦闷（过早的苦闷）和没有生活目的而死的，是在家庭中接受的被理论歪曲了的教育的后果，这种教育是错误地理解生活的最高意义与目的的教育，蓄意要扼杀她心灵中关于灵魂不死的一切信仰的教育。就算这只是我的推测吧，不过，实际上，她的死并不只是为了在身后留下一张卑鄙的便条，让人们大吃一惊，如同恩佩先生所想象和推测的那样吧？

"从来没有人恶恨自己的身子"。[1] 无论怎样时髦，消灭自己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知识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瘟疫似的消灭自己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值得密切注意和研究的极其严肃的事情。一年半以前一位才华卓越、在我们司法界很有名望的人把一包材料交给我看，这是他搜集的自杀者在临死之前，也就是在死前五分钟亲手写的书信与便笺。我记得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写的两行字，还记得一个自杀者在行驶的马车里面用铅笔写的潦草的字迹，车还没有把他送到要去的地方，他就在马车中开枪自杀了。我想，假如恩佩先生仔细看看这包有趣的材料，在他的心灵中就可能出现某种变化，他平静的心灵就会惶恐不安了。当然，我不知道是否会这样。无论怎样，都应该以仁爱的态度对待这种事情，决不能那样傲慢。在这些事件中也许我们自己全都犯有过错，任何钢铁到头来都不能使我们免于我们的冷静和傲慢造成的灾难后果，期限一到，这些后果必将呈现出来。

不过，就到此为止吧。我回答的不只是一位恩佩先生，而是很多位恩佩先生。

---

① 引自《新约全书·以弗所书》，第5章，第29～30节。这句话的全文为："从来没有人恶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是'恶恨'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 关于我参与即将发行的《光明》杂志的说明

(《作家日记》, 1876年, 12月号, 第2章, Ⅱ)

在《作家日记》(又是在10月号这一期)上我刊登了一则关于瓦格纳教授将于1877年创办新杂志《光明》[1] 的广告。这则广告一刊出，人们立即开始向我询问这一杂志未来的情况和我将要参加的情况。我答复了一切我能够予以回答的人，我告诉他们：根据瓦格纳的邀请，我只在《光明》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这就是将要参加该杂志的全部情况。现在我感到必须登报声明，因为人们还在不断提出问题；我每天都接到我的读者们的来信，从这些信中我清楚地看到，我的读者们不知根据什么突然认定我参与《光明》杂志的活动比瓦格纳在广告中宣布的要广泛的多得多，就是说，我差不多是转而加入《光明》杂志，开创新的活动，扩展从前的活动，我即便不是发行或编辑这份未来杂志的同仁，那也必定是参与为杂志出谋划策、制定计划等事的人。

对此，我现在声明，在1877年我只发行《作家日记》，与去年一样，我的全部作家活动都属于《作家日记》。至于新的刊物《光明》，无论是关于它的构想、计划，还是它的编辑工作，我都不参加。这一未来的杂志的宗旨到现在我甚至还毫无所知，为了了解它，我正在期待它的第1期问世。我估计，人

① 俄国动物学家、作家尼·彼·瓦格纳教授（1829—1907）在彼得堡创办的科学普及性月刊。

们是从下述事实判断我与《光明》杂志有特殊的密切关系的，这就是，关于杂志的第一个广告是在《作家日记》刊出的，此后不知什么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种报纸再刊登这则广告。在任何情况下，许诺为另一个刊物写小说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刊物，转而参加那一个刊物，而我真诚祝愿尊敬的瓦格纳的事业取得成功，则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期望，也是出于我相信在他的刊物上能够看到新的、独特的和有益的东西。关于《光明》杂志的进一步的详细情况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对这个杂志是生疏的，目前我所知道的，同任何一个读过关于该刊的那则报纸广告的人是一样的。

## 现在问题的焦点何在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号，第2章，Ⅲ）

一年结束了，《作家日记》第一年的发行也以这本第12期结束了。我从我的读者那里听到了令我深感荣幸的赞许，然而我打算说的话还没有讲出百分之一，而已经说出来的话，现在看来，有许多话也没能一下子表达透彻，甚至有的时候被理解反了，当然，这主要怪我自己。不过，我虽然还没有来得及说多少话，但还是希望我的读者们从我今年所说的话中能够领会明年的《日记》的性质和方向。目前《日记》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阐明关于我们民族的精神独立性的思想，尽可能地通过当前发生的事件说明这一思想。在这方面，《日记》在所谓的“斯拉夫事件”上对今年突然爆发的民族的和人民的运动，已经说得很多了。我要事先说明，《日记》并不打算每一个月都发表政治性文章；但是它在任何时候都竭力探寻并且尽可能地指出在当前的政治事件中我们民族的和人民的观点。比如说吧，读者们从我今年关于“斯拉夫运动”的文章中大概能够看得明白，《日记》不过是希望认清这场运动的实质与意义，主要是对我们、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它的实质与意义；并且希望指出，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只是一个斯拉夫主义，也不只是从这个问题的现代意义而言对问题进行的政治处理。斯拉夫主义，也就是所有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人民以及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团结一致，再就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就是关于国界、边境、海洋、海峡、君士坦丁堡的问题，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俄罗斯及其未来命运虽然都是头等

重要的大事，但在我看来，也就是从以我们人民的精神解决问题的角度看，还不能说东方问题的实质就是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头等重要的问题就退居于第二位。因为按照人民的理解，整个事情的主要实质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整体看，就是东方基督教即东正教的命运问题。我们的人民既不了解塞尔维亚人，也不了解保加利亚人；他们用自己的铜板也好，用志愿人员也好，去帮助的不是斯拉夫人，也不是为了斯拉夫主义，只是因为听说东正教的基督徒、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为了基督教的信仰受到土耳其人、受到“不信上帝的阿加尔① 人”的蹂躏；这就是今年发生的整个人民运动的唯一原因。东正教现在的命运和未来的命运——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的全部思想，俄罗斯人民对基督的奉献，他们为基督建立功勋的强烈愿望也就表现在这里。这种真诚的、伟大的、在我们人民中自古以来就从未间断的、可能永远也不会间断的强烈愿望，——这就是在评价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时的极端重要的事实。莫斯科的旧礼仪派② 教徒以自己的捐献装备了整整一个卫生队，把它派往塞尔维亚；然而，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塞尔维亚人不是旧礼仪派教徒，而是跟我们一样同旧礼仪派教徒在信仰上不交往的人。这里恰恰表现出关于东正教未来的最终命运的思想，尽管这还是遥远的未来，遥远的时期的事情；这里还表现出全体东方基督徒在将来的团结一致的期望。可见，在帮助基督徒反对土耳其人，帮助基督教的受迫害者的时候，他们认为塞尔

① 古历史学家对阿拉伯游牧部族的称呼。

② 亦称旧教派，是17世纪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不接受17世纪尼康的改革，反对并敌视官方的俄罗斯正教会，主张保持旧礼仪，故被称为“旧礼仪派”或“分裂派”。1903年前一直受沙皇政府的迫害。

维亚人也是与他们自己同样的真正基督徒，虽然存在着暂时的差别，但是只要在将来能够与他们一样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捐献甚至具有历史意义，令人产生乐观的想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我指出的下述看法：俄罗斯人民虽然由于信仰上的某种虚构的差异暂时还是分裂的，但是俄罗斯人民的整个目的就是基督教的命运。在人民中间无可争辩地牢固地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整个俄罗斯的存在就是为了向基督做奉献，为了保卫世界东正教的一切，反对异教徒。如果不是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向你们直接讲出这个思想，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人民中间的很多人已经能够很自觉地把这个思想说清楚，而且这些人对所有其余的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可以明确地说，这个思想在我们全体人民里面差不多已经是自觉的，而不仅仅是蕴藏于人民的情感之中。总之，东方问题只有在这一种意义上才能为俄罗斯人民所理解。这是要点之所在。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有的人对东方问题的观点就应该具有更加明确得多的性质。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是由于自己的人民和人民的精神，而不仅仅是由于诸如自己的教养、财富、文化等等，像某些欧洲国家那样，这些欧洲国家，由于衰老和丧失了充满生机的民族思想，已经变成矫揉造作的甚至似乎是不自然的国家。我以为，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如果人民只是在东正教的命运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斯拉夫问题以及总的东方问题，那么从这里也能看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也不完全是外部的政治问题，而是关系到俄罗斯人民的根本性质，就是说，这是直到最后解决为止始终都存在的、永恒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已经不可能停止自己向东方的前进运动，不可能改变这个运动的目

的，否则就等于俄罗斯否定自己。如果从暂时看，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能够有时也肯定应该采取另外的方法，如果我们愿意，有时也应该向形势让步，抑制我们的追求，那么，作为俄罗斯人民生活的本质的这个问题从整体上说在某个时候必定应该达到自己必要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达到所有的东正教各族人民在基督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在博爱的基础上的团结一致，斯拉夫人与其他东正教各族人民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这种团结可能完全不是政治上的团结。其实，狭义上的斯拉夫问题与狭义上的政治问题（即海洋、海峡、君士坦丁堡，等等）无疑都将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因为它们与解决主要的、基本的任务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再说一遍，可见，从这种人民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整个都具有不可动摇的、一贯的性质。

在这个方面，欧洲虽然并不十分理解我们的民族理想，也就是说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民族理想，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掠夺、暴力、征服领土的欲望，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事情的重大意义却了解得很清楚。

对欧洲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在我们并不占领土地，并且保证什么也不掠夺，对欧洲来说重要得多的是，我们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帮助斯拉夫人，永远也不打算放弃这种帮助。如果说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帮助斯拉夫人，那么在欧洲看来，我们就是给正在东方逐步建造的堡垒加上一块反对欧洲的新的石块，全欧洲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帮助斯拉夫人的同时，我们从而也就继续在斯拉夫人里面培养、巩固对俄罗斯的信心，对俄罗斯必然强盛的信心，并且使他们日益习惯于把俄罗斯看做他们的太阳，看做整个斯拉夫，甚至是整个东方的中心。在欧洲人心目中，这种思想上的巩固就无异于占领，尽管俄罗斯为了让欧洲放心，真心实意地准备做出一切让步。欧洲

了解得非常清楚，整个问题的主要实质在目前就是这种思想的播种，而不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单纯的物质利益。欧洲也知道，俄罗斯的政治对自己任务的这个实质有极深刻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怎么能不害怕呢？这就是欧洲千方百计地要把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的原因，可以说是要把他们从我们的手中偷走，只要有可能，就唆使他们永远反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这就是欧洲希望巴黎和约①尽可能延续下去的原因，这也就是关于比利时人、关于欧洲宪兵②等等方案产生的原因。嗯，怎样都可以，只求没有俄罗斯人，只要想办法使俄罗斯从斯拉夫人的视野和思想中消失，直至把俄罗斯从斯拉夫人的记忆中抹掉！现在，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

① 1856年3月18日在俄国、法国、英国、土耳其、奥地利、撒丁和普鲁士等国之间签订的结束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战争（1853—1856）的协定。这次战争是以俄罗斯失败而告终的。

② 1856年12月欧洲六国为调解土耳其与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冲突，召开会议，会议提出设立观察委员会，委员会拥有一支由比利时人或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欧洲各国均被邀请轮流参加这支占领军，而俄罗斯则被拒之门外。

## 谈谈“天亮后的彼得”[1]

(《作家日记》，1876 年，12 月号，第 2 章，Ⅳ)

最近以来许多人都在议论，说我们知识阶层里面经过夏季那阵子狂热之后，出现了冷漠、怀疑、犬儒主义，甚至是愤恨。除开那些对我们的斯拉夫运动深感不满的人以外，我认为，所有其余的人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可以说是守业型的。他们说的是战争对经济的危害，他们以银行破产、证券牌价下跌、贸易停滞来恐吓人们。他们甚至说，我们不仅在欧洲人面前，就是在土耳其人面前，在军事上也是弱小的。他们忘记了土耳其强盗、手无寸铁的没有自卫力量的人的蹂躏者、砍人头颅的刽子手，用俄罗斯的谚语说就是，“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守业者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答案是一目了然的。第一，也是主要的，就是妨碍了他们的舒适生活。不过，我们不想过多地谈论事情的道德方面，我们要指出第二点，这就是他们对当前任务的历史意义与民族意义的认识是极其浅薄的。按照他们的理解，这件事情简直如同偶然出现的顽皮儿童，可以随时随地制止他，说一声“玩耍一阵子了，够了，现在又该做事情了”。而所谓的事情——显然，就是交易所。

第二类，这就是欧洲化的人，我们的积习难改的欧洲方

---

① 借用自俄罗斯的一句谚语：“捉彼得要起早，天发亮就臭了。”意即做事应恰如其时，恰如其分，不可错过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趁热打铁。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也曾用这句谚语说明艺术家应善于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特征的那一瞬间。

式。到现在为止从这个方面提出的问题是最“激烈的”：“斯拉夫人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爱斯拉夫人？我们凭什么要为他们打仗？我们会不会由于追随没有益处的事物而妨碍了自己的发展，并损害自己的声望呢？会不会由于追求民族性而损害了人类性呢？最后，我们会不会在我们这里唤起宗教狂热呢？”等等，等等。总之，问题虽然是激烈的，但却是很久以前就过了时的。这里主要的是，我们对俄罗斯可能有独立精神的大胆想法怀有一种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古老的、年代久远的、历史性的恐惧。从前有个时候他们都是一些自由主义者、进步人士，人们也认为他们是这种人，可是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很难想象有什么比他们更落后的了。然而他们怡然自得地停滞在自己 19 世纪 40 年代、30 年代的思想上，依然认为自己是进步人士。从前他们被认为是民主派，而现在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无法想象还有比他们更令人厌恶的贵族了。人们会说，他们揭露的只是我们人民的阴暗面；然而问题是，他们在揭露黑暗面的同时，也嘲笑一切光明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他们把光明也看做黑暗。他们没有分清光明与黑暗！的确是这样，如果对我们知识分子的全部观点进行一番仔细考察，那就再也想不到有比他们的观点更与俄罗斯人民健康的、正确的、独立的发展相敌对的了。

而这一切完全都是极其真诚无邪的。嗯，要知道，他们是热爱人民的，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至于说什么我们这里的一切总有一天会团结到一起，一切都会明朗起来，那又怎样呢？那个时候可能出现重大的事件，使我们的知识界措手不及。到那个时候岂不是为时已晚了吗？有句谚语说：“捉彼得要起早，天发亮就臭了。”这句谚语很难听，也不文雅，但却是真实的。欧洲化的俄罗斯人不至于陷入像天亮时光的彼得那

种境地吧？这种人是否为时过晚了呢？某种类似的情况好像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就在这里。

然而对我来说，明显得有如公理的是我们俄罗斯的一切分裂与标新立异从一开始起就是基于一些纯系莫名其妙的甚至是极其愚蠢的思想，其中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最可悲的是，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对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弄清楚，而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作家日记　　上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５６１
ＳＳ号＝１２６８４７１４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２８５９６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号，第１章，Ⅴ）
堂卡洛斯和瓦特金先生。再谈“结局的开端”的征兆（《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３月号，第２章，Ⅰ）
雷德斯托克勋爵（《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３月号，第２章，Ⅱ）
谈谈学术委员会关于招魂术现象的总结（《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３月号，第２章，Ⅲ）
一些个别现象（《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３月号，第２章，Ⅳ）
空虚而停滞的生活理想。贪婪者和吸血鬼。推动着俄罗斯的上层先生们（《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４月号，第１章，Ⅰ）
文明的楷模。受伤害的人们（《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４月号，第１章，Ⅱ）
争议焦点的自相矛盾与含混不清（《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４月号，第１章，Ⅲ）
解放俄罗斯农夫的善良瑞士人（《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４月号，第１章，Ⅳ）
谈点儿政治问题（《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４月号，第２章，Ⅰ）
为了死者的名誉（《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４月号，第２章，Ⅳ）
来函摘登（《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５月号，第１章，Ⅰ）
外省的新见解（《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５月号，第１章，Ⅱ）
一个不合适的思想（《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５月号，第２章，Ⅱ）
乔治·桑之死（《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６月号，第１章，Ⅰ）
关于乔治·桑的几句话（《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６月号，第１章，Ⅱ）
我的奇谈怪论（《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６月号，第２章，Ⅰ）
奇谈怪论的结论（《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６月号，第２章，Ⅱ）
东方问题（《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６月号，第２章，Ⅲ）
乌托邦的历史观（《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６月号，第２章，Ⅳ）
谈谈彼得堡的巴登—巴登精神（《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１章，Ⅱ）
关于德国人的尚武精神（《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１章，Ⅲ）
文明的最新成就（《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１章，Ⅳ）
理想主义者－无耻之徒（《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２章，Ⅰ）
做理想主义者可耻吗？（《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２章，Ⅱ）
俄语还是法语？（《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３章，Ⅰ）
祖国的栋梁之材讲什么语言？（《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３章，Ⅱ）
一个受现代妇女宠幸的人（《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７～８月号，第４章，Ⅱ）

**谈谈“天亮后的彼得”（《作家日记》，１８７６年，１２月号，第２章，Ⅳ）**